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卷——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第 7 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 卷 主 编 余伟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7卷/沈志华执行总主编;余伟民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内部发行)
ISBN 7-80149-634-5

Ⅰ.苏… Ⅱ.①沈… ②余… Ⅲ.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苏联-现代 Ⅳ.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5922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7卷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本卷主编:余伟民
责任编辑:章若男 刘仲亭
责任印制:盖永东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科技印刷厂
本《选编》正文用纸由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

开 本: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21.75
字 数:523千字
版 次: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34-5/K·086 全套定价:4000.00元

内部发行 不得公开引用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　　任：王忍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 主 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明*　于　沛　王　正　石　泽

叶　军　叶书宗*　刘　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　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　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　一　姚　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　　书：方　琼

编　　务：罗淑娴　闻　静　胡甫强　宗　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34卷（包括总目录卷1卷），收入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10000余件，文献上限为1917年初，下限至90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档案共编为3个专题

“喀琅施塔得事件”（1921年2月至1923年4月）：收入档案文献69件，反映了发生在1921年2～3月间震惊苏维埃俄国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环节，其中包括俄共（布）中央机关处理危机的决定和指示，军事机关下达的实施镇压的命令，兵变组织者的宣言和通告，地方党政机关及情报部门关于当地实际情况的报告等等。目前俄国已经公布了许多有关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档案文献，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真相。尽管本专题选编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也足以让人了解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及苏维埃政权处理这一事件时的政治考虑。

“新经济政策与党内斗争”（1921年2月至1927年12月）：俄共（布）领导层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是众所周知的，本专题选编的109份文件，都是俄共（布）党的领导人之间的通信或电话记录，仔细阅读这些文献，可以了解这一时期俄共党内派别的分组和变化情况，斗争方式在不同条件下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特点，以及党和国家的权力渐渐集中于个人手中的发展过程。

“共产党情报局匈牙利会议”（1949年11月）：本专题收入的是有关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即匈牙利会议）的档案文献，其中包括会议的主报告、各党代表的发言、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等。这14份文件，有助于了解情报局这次会议的宗旨和进程，

苏共与欧洲特别是东欧共产党关系的实质，东欧各国共产党实施政治大清洗的起因和准备过程，以及情报局活动与冷战历史同步发展的关系。

余伟民

2001年6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 7－1

喀琅施塔得事件

（1921 年 2 月至 1923 年 4 月）

专题说明 …… 7－1

№04783 波德沃伊斯基等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1 年 2 月 13 日） …… 7－3

№04787 共和国保卫芬兰边界部第二分部情报处处长的工作报告（摘要）（1921 年 2 月 14 日） …… 7－5

№04784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就彼得格勒局势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摘要）（不早于 1921 年 2 月 16 日） …… 7－8

№04785 梅辛和萨姆索诺夫致捷尔任斯基的电报（1921 年 2 月 24 日） …… 7－11

№04788 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会议记录（摘要）（1921 年 2 月 24 日） …… 7－13

№04789 彼得格勒防区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第一号命令（1921 年 2 月 25 日） …… 7－15

№04791　波罗的海舰队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报告（摘要）（1921年2月26日）…… 7－16
№0479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次会议记录（1921年2月28日）…… 7－17
№04793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同反革命斗争的命令（1921年2月28日）…… 7－19
№04797　季诺维也夫致列宁的密码电报（1921年2月28日）…… 7－21
№04798　托洛茨基致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的电报（1921年3月1日）…… 7－22
№04802　驻喀琅施塔得第1、第2战列舰队全体会议的决议（1921年3月1日）…… 7－23
№04803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专门处处长的报告（不晚于1921年3月2日）…… 7－25
№04905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告要塞和喀琅施塔得市居民书（1921年3月2日）…… 7－28
№04809　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书（1921年3月2日）…… 7－30
№04811　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1921年3月2日）…… 7－32
№04814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1921年3月3日）…… 7－34
№04883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出的第二号战斗命令草案（不晚于1921年3月4日）…… 7－36
№04880　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的呼吁书（1921年3月4日）…… 7－40

№04882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给“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命令
（1921 年 3 月 4 日）…… 7－42
№04850　苏俄国防委员会关于从彼得格勒抓获人质的通告
（1921 年 3 月 4 日）…… 7－44
№04822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发布的 616 号命令
（1921 年 3 月 5 日）…… 7－45
№04823　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致驻喀琅施塔得军民的公告
（1921 年 3 月 5 日）…… 7－47
№04820　苏俄情报机关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报告
（不早于 1921 年 3 月 5 日）…… 7－48
№04988　俄共（布）中央主席团关于十大召开时间的讨论记录（1921 年 3 月 7 日）…… 7－50
№04842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特派员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报告（1921 年 3 月 7 日）…… 7－51
№04827　托洛茨基致俄联邦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电报
（1921 年 3 月 7 日）…… 7－53
№04828　彼得格勒局势报告（1921 年 3 月 7 日）…… 7－54
№0500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公告
（1921 年 3 月 7 日）…… 7－55
№0500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传单
（1921 年 3 月 8 日）…… 7－57
№04831　彼得格勒局势报告（1921 年 3 月 8 日）…… 7－60
№04832　第七集团军作战部部长普柳托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1921 年 3 月 8 日）…… 7－61
№04839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摘要（1921 年 3 月 8 日）…… 7－62

№04835　普柳托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电报（1921年3月9日）…… 7－66
№04914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1921年3月9日）…… 7－67
№04916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1921年3月10日）…… 7－69
№04889　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第69号令（1921年3月10日）…… 7－73
№04891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1号令摘要（1921年3月11日）…… 7－74
№04892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2号令（1921年3月11日）…… 7－75
№04893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3号令（1921年3月12日）…… 7－77
№04924　南方军队集群政委伏罗希洛夫给芬兰湾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的命令（1921年3月13日）…… 7－78
№04932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斯大林的作战情况报告摘要（1921年3月14日）…… 7－81
№04935　北方军队集群司令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指令（1921年3月14日）…… 7－84
№04938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斯大林的战事密码电报摘要（1921年3月15日）…… 7－86
№04941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向明斯基团归还武器和革命称号的命令（1921年3月15日）…… 7－89
№04903　喀琅施塔得港地方革命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全体联席会议记录（1921年3月15日）…… 7－90

№04904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的文章（1921 年 3 月 15 日） …… 7－92
№04957　加里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发给各省委员会和各省执委会的电报（1921 年 3 月 16 日） …… 7－94
№04962　南方军队集群司令的命令摘要（1921 年 3 月 17 日） …… 7－95
№04963　图哈切夫斯基给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1921 年 3 月 17 日） …… 7－96
№04968　南方军队集群参谋部的报告（1921 年 3 月 18 日） …… 7－97
№04972　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命令（1921 年 3 月 18 日） …… 7－98
№04973　图哈切夫斯基向北方军队集群、南方军队集群发出的命令（1921 年 3 月 19 日） …… 7－100
№04911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致芬兰卡累利阿战区司令的报告（1921 年 3 月 19 日） …… 7－101
№04979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电报（1921 年 3 月 20 日） …… 7－104
№04981　关于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重新登记的报道（1921 年 3 月 20 日） …… 7－105
№04897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工人、红军和水兵发出的呼吁（1921 年 3 月） …… 7－106
№04851　喀琅施塔得要求释放人质（1921 年 3 月） …… 7－109
№04898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铁路职工发出的呼吁（1921 年 3 月） …… 7－110
№04956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专门处对芬兰湾南方战区的居民发出的呼吁（1921 年 3 月） …… 7－113

№04987　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关于叛乱调查结果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1年4月5日）…… 7－114
№05046　全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致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电报（1921年4月18日）…… 7－131
№05047　捷尔任斯基致亚戈达的信（1921年4月19日）…… 7－132
№04867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1921年4月20日）…… 7－133
№05048　波德盖伊斯基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的电报（1921年4月23日）…… 7－134
№0504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1921年4月27日）…… 7－135
№05050　全俄肃反委员会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计划草案（1921年6月4日）…… 7－136
№05055　彼得格勒省委关于清除反革命分子的建议（1921年6月28日）…… 7－144
№05054　科兹洛夫斯基、佩特里琴科等人的口供摘要（1921年）…… 7－147

新经济政策与党内斗争

（1921年2月至1927年12月）

专题说明 …… 7－150
№04232　波德沃伊斯基、梅霍诺申就群众不满情绪致列宁的信（1921年2月24日）…… 7－153

№04233　契切林就与土耳其代表团会谈事宜致斯大林的信（1921 年 3 月 10 日）…… 7－159
№04234　穆拉洛娃就某些党员的恶劣行为致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1921 年 3 月 21 日）…… 7－161
№04235　拉柯夫斯基就乌克兰经济情况致列宁的电话电报（1921 年 3 月 31 日）…… 7－166
№04236　布琼尼就骑兵状况致列宁的信（不早于 1921 年 4 月 6 日）…… 7－168
№04237　皮达可夫就顿巴斯煤矿租让问题致列宁的信（1921 年 4 月 8 日）…… 7－170
№04238　别洛博罗多夫就斯塔夫罗波尔省情况致列宁的信（1921 年 4 月 10 日）…… 7－175
№04239　别洛博罗多夫就边疆区形势严峻致列宁的信（1921 年 4 月 23 日）…… 7－179
№04240　奥新斯基就粮食税执行情况致俄共（布）中央的信（1921 年 5 月 11 日）…… 7－181
№04241　契切林就拉脱维亚党的情况致列宁的信（1921 年 6 月 9 日）…… 7－183
№04242　扎斯拉夫斯基就莫斯科地区党员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1921 年 7 月 22 日）…… 7－185
№04243　契切林就发布收成情况信息致加米涅夫的信（1921 年 7 月 30 日）…… 7－187
№04244　契切林就国际援助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1921 年 8 月 11 日）…… 7－189
№04245　契切林就南森提出的援助条件致莫洛托夫的信（1921 年 8 月 27 日）…… 7－192

№04246　斯大林就援助阿富汗起义者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7－196
№04247　克拉辛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8日）…… 7－198
№04248　契切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10日）…… 7－205
№04252　李维诺夫就租让对象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1年11月13日）…… 7－208
№04249　契切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1年11月22日）…… 7－210
№04250　斯大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契切林的信
（不早于1921年11月22日）…… 7－214
№04251　契切林就卡累利阿问题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6日）…… 7－216
№04253　奥尔忠尼启则就顿巴斯煤矿情况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1月10日）…… 7－218
№04254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转寄电气化计划意见致列宁的信（1922年1月10日）…… 7－225
№04255　鲁祖塔克就工会作用和任务致列宁的信
（1922年1月10日）…… 7－226
№04256　季诺维也夫就工会提纲草案致列宁的信
（不晚于1922年2月4日）…… 7－229
№04257　契切林就西藏考察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2月6日）…… 7－230
№04258　拉科巴就外高加索联邦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年3月12日）…… 7－232

№04259　加里宁就党员队伍的规模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2 年 3 月 27 日）…… 7－234
№04260　索尔茨就接收新党员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2 年 3 月 27 日）…… 7－238
№04261　斯米尔诺夫就限制工人入党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2 年 3 月）…… 7－240
№04262　彼得斯就布哈拉政权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2 年 4 月 3 日）…… 7－242
№04263　斯大林就解决布哈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 年 4 月 21 日）…… 7－246
№04264　卡拉汉就阿富汗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2 年 4 月 25 日）…… 7－248
№04265　奥尔忠尼启则就布哈拉局势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2 年 5 月 12 日）…… 7－251
№04266　斯大林就处理布哈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 年 5 月 14 日）…… 7－253
№04267　奥尔忠尼启则就土耳其斯坦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2 年 5 月 18 日）…… 7－255
№04268　纳扎列强就个人工作状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 年 6 月 14 日）…… 7－258
№04269　奥尔忠尼启则就格鲁吉亚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22 年 6 月 26 日）…… 7－260
№04270　纳扎列强就斯大林的东方政策致奥尔忠尼启则的
信（1922 年 7 月 12 日）…… 7－263
№04271　纳扎列强就列宁身体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 年 7 月 19 日）…… 7－265

№04272　越飞就对华政策总方针致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7月22日）…… 7－266
№04273　纳扎列强就斯大林工作作风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不早于1922年8月9日）…… 7－269
№04274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驻外机构考察情况致列宁的信
（1922年10月3日）…… 7－271
№04275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问题处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
的信（1922年10月21日）…… 7－275
№04276　斯大林就出售白金及党内关系致列宁的信
（1922年11月13日）…… 7－277
№04277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年11月27日）…… 7－279
№04278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一些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
信（1923年1月24日）…… 7－282
№04279　纳扎列强就对格鲁吉亚政策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的信（1923年1月28日）…… 7－284
№04281　伏罗希洛夫就同加里宁视察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3年5月22日）…… 7－287
№04282　捷尔任斯基就与李可夫的冲突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8月3日）…… 7－289
№04283　捷尔任斯基就处理投机商人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10月22日）…… 7－294
№04284　皮达可夫就党内问题和工人状况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11月1日）…… 7－296
№04285　马吉多夫就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党内的情况致斯大
林的信（1923年11月10日）…… 7－302

№04286　克列斯廷斯基就米亚斯尼科夫出境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13日）…… 7－309
№04287　斯大林就中央已消除意见分歧致马吉多夫的信（1923年11月22日）…… 7－312
№04288　皮达可夫等九人就是否曾建议逮捕列宁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12月20日）…… 7－314
№04289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4年1月10日）…… 7－318
№04290　捷尔任斯基就如何看待党内斗争问题致安东诺夫－奥夫申科的信（1924年1月12日）…… 7－319
№04291　皮达可夫就个人工作安排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4年5月15日）…… 7－320
№04292　契切林就个人工作安排致莫洛托夫的信（1924年5月17日）…… 7－322
№04293　捷尔任斯基就工作安排致赖因霍尔德的信（1924年6月12日）…… 7－323
№04294　加里宁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斯大林的信（1924年8月）…… 7－324
№04295　捷尔任斯基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方针致明仁斯基的信（1924年12月24日）…… 7－326
№04296　伏龙芝和斯大林关于如何称呼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1924年12月10日）…… 7－328
№04298　奥尔忠尼启则就党内派别斗争致伏罗希洛夫的信（1925年3月12日）…… 7－329
№04299　皮达可夫就有意辞去劳动国际委员会职务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5年3月25日）…… 7－331

№04300　捷尔任斯基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权限致梅利斯的信（不晚于1925年5月1日）…… 7－332
№04301　皮达可夫就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争吵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5年7月14日）…… 7－338
№04302　捷尔任斯基就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争吵致皮达可夫的信（1925年7月14日）…… 7－340
№04303　捷尔任斯基就工农联盟问题致皮达可夫的信（1925年10月2日）…… 7－342
№04304　捷尔任斯基就退出党派运动致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5年10月5～6日）…… 7－344
№04305　波波夫就统计局的数据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5年12月22日）…… 7－348
№04306　基洛夫就党内的争论致马尔库斯－基洛娃的信（1925年12月）…… 7－351
№04307　基洛夫就地方党内紧张局势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1月10日）…… 7－352
№04308　联共（布）中央就对政治局决议进行表决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6年1月13日）…… 7－353
№04309　基洛夫就地方党内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1月16日）…… 7－357
№04310　捷尔任斯基就对米柳亭的态度问题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2月1日）…… 7－358
№04311　斯大林就基洛夫任职事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6年2月1日）…… 7－359
№04314　古比雪夫就米柳亭调查工业发展计划问题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6年2月1日）…… 7－360

№04313　伏罗希洛夫就列宁格勒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2月6日）…… 7－362
№04315　基洛夫就与反对派斗争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2月13日）…… 7－364
№04312　捷尔任斯基就政治局会议冲突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2月15日）…… 7－365
№04316　基洛夫就派往巴库的人选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3月17日）…… 7－367
№04317　谢列布里亚科夫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斯大林的信（1926年3月27日）…… 7－369
№04318　捷尔任斯基就地方乱收费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6年3月28日）…… 7－371
№04319　捷尔任斯基与李可夫关于皮达可夫工作安排的通话的记录（1926年4月5日）…… 7－373
№04320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公布列宁信件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6年4月14日）…… 7－374
№04322　捷尔任斯基就皮达可夫工作情况致李可夫和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6月1日）…… 7－377
№04323　奥尔忠尼启则就个人工作情况致基洛夫的信（1926年6月22日）…… 7－379
№04324　捷尔任斯基就驻巴黎外贸机构情况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6月23日）…… 7－381
№04325　古比雪夫和李可夫关于捷尔任斯基工作安排的谈话记录（不早于1926年7月3日）…… 7－382
№04326　托姆斯基就劳动报酬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的信（1926年7月10日）…… 7－384

№04327　斯大林答复皮达可夫的信
（1926年7月13日）…… 7－386
№04328　捷尔任斯基就公布对经济机关的调查结果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7月13日）…… 7－387
№04329　莫洛托夫就工作调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年9月9日）…… 7－389
№04330　帕尔霍缅科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12月3日）…… 7－391
№04331　拉科巴就阿布哈兹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年12月27日）…… 7－393
№04332　拉舍维奇就中东路干部工资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月4日）…… 7－399
№04333　叶努基泽就请求安排会见致加里宁的信
（1927年5月17日）…… 7－402
№04334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拉狄克的宗派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5月）…… 7－403
№04335　瑟尔佐夫就党内对他个人的传言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6月22日）…… 7－404
№04336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党纪事件处理小组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8月11日）…… 7－407
№04337　斯大林就反对派的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年9月23日）…… 7－409
№04338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党内反对派的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0月4日）…… 7－411
№04339　施基里亚托夫就反对派公开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0月10日）…… 7－414

№04342　费金就反对派召集开会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 年 10 月 23 日） …… 7－416
№04340　施基里亚托夫就工人对反对派的态度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 年 10 月 29 日） …… 7－421
№04341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反对派状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 年 10 月 29 日） …… 7－422
№04343　奥新斯基就当前经济问题致李可夫、斯大林的信（1927 年 12 月 12 日） …… 7－425

共产党情报局匈牙利会议

（1949 年 11 月）

专题说明 …… 7－430
№11765　情报局匈牙利会议开幕式发言记录（1949 年 11 月 16 日） …… 7－432
№11766　苏斯洛夫在情报局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 年 11 月 16 日） …… 7－439
№11767　法、匈、捷、波代表团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 年 11 月 16 日） …… 7－464
№11768　保、意、罗代表团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 年 11 月 17 日） …… 7－492
№11769　陶里亚蒂在情报局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 年 11 月 17 日） …… 7－518
№11770　法、波代表团关于陶里亚蒂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 年 11 月 17 日） …… 7－533

№11771　乔治乌－德治在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49年11月18日）…… 7－551
№11772　波、法、苏代表团关于乔治乌－德治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8日）…… 7－571
№11773　情报局会议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决议的讨论记录
（1949年11月18日）…… 7－600
№11774　匈、意、捷、保代表团关于乔治乌－德治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8日）…… 7－609
№11775　情报局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决议的讨论记录
（1949年11月19日）…… 7－639
№11776　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握中”决议的讨论记录
（1949年11月19日）…… 7－645
№11777　匈牙利会议关于情报局章程草案的报告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记录
（1949年11月19日）…… 7－651
№11778　情报局匈牙利会议闭幕式
（1949年11月19日）…… 7－663

【专题说明】

喀琅施塔得事件

（1921 年 2 月至 1923 年 4 月）

本专题选编的 69 件档案，反映了发生在 1921 年 2～3 月间、震惊苏维埃俄国的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环节。

1921 年初，刚刚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的苏维埃俄国陷于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中，战争破坏导致的经济生活瘫痪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引起的人民群众不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国内政治形势的紧张状态。农村和城市的群众性骚动不断发生，有些发展为反政府武装暴动。喀琅施塔得事件就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个案。这一事件集中反映了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国内主要矛盾，它所提供的教训促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改变政策方针，由此开始了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档案文件显示，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不是某些政治组织事先策划的，而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所积聚的对政府不满的群众情绪在一个集中点上的爆发，它既表现了运动的自发性，又表现了客观形势将矛盾推向尖锐化的必然性。

面对突发的兵变事件，苏俄领导层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他们拒绝与起事者进行任何谈判，而且从一开始就给事件作了“反革命”的政治定性，并随即调动大量兵力，重新组建第七集团军，向

喀琅施塔得要塞区展开了猛烈进攻。进攻的日期定在俄共（布）十大召开的同一天——3月8日，而正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作出了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决定。显然，满足起事者的经济要求与镇压他们的政治反叛并不矛盾，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巩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收入本专题的档案文件既从起事者方面，也从政府方面反映了喀琅施塔得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绝大部分文件是首次公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情报部门的秘密报告和军事机关发布的命令。

（本专题文件由余伟民编辑和校注，
朱小萍翻译）

№04783

波德沃伊斯基等
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21年2月13日）

当前，俄罗斯联邦总的局势呈如下状态：

1）在一系列地区正发生的农民动乱需要党特别注意。这些动乱毫无疑问只是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反无产阶级行动的一个开始。现今的农民动乱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有组织有计划（见农民联盟委员会纲领和安东诺夫的报纸）。

2）同时，无产阶级群众在最主要的中心城市（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城市）如今处于这种状况，即党未对其发挥最有效的和革命的影响，他们不仅不能以自己的组织与脱离无产阶级国家领导的农民相对抗，而且自己在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脱离了俄罗斯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在反苏维埃政党的影响下反对苏维埃政权（罢工运动增加、工团主义思潮出现、反苏维埃政党的影响力增强）。

3）同时党的内部状况明显地反映在最近一次有关工会的讨论中，特别是最近的一段时间由于整个地脱离开共和国群众的实际状况，而空前地降低了党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力。党内的状况需要采取紧急有力的措施以加强党并使党进入战斗和革命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应当指出党内思想中已具极其危险的倾向，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层中，这种趋向表现为极力将我们的挫折和经常的无能力胜任面临的任务解释为仅仅是客观条件所致。

4）至于红军在完成国内战争第一阶段后紧接的复员极大地削弱了红军，并越来越降低了它的战斗力，在个别方面已等于零。在这种状况下红军已不可能成为苏维埃政权可靠的支柱。同时，共和国已变化的局势从根本上正改变着近期军事任务的特点（同农民动乱的斗争取代了同武装的白匪的斗争）。……由此已出现了红军指挥机关系统本身与完成这些任务的不相适应。

上述事实要求：

1）立刻在中央委员会内由中央委员会一个委员领导组成临时军事委员会，使党的工作适应当前形势。

2）委员会应首先注重共产主义的部队（特殊使命部队），提高其战斗力，清除其动摇分子，并在每一个工厂建立牢固的无产阶级核心。

3）该委员会应视察红军部队，制定措施使其适应面临任务的需要。

波德沃伊斯基、梅霍诺申、穆拉洛夫、
克德罗夫、明仁斯基、亚戈达[①]
1921年2月13日于莫斯科

① 尼·伊·波德沃伊斯基（1880～1948），时任俄共中央特别调查部负责人；康·亚·梅霍诺申（1889～1938），时任苏俄政府内务人民委员；尼·伊·穆拉洛夫（1877～1937），时任第十二集团军军事委员，1921年3月起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员；米·谢·克德罗夫（1878～1941），时任北方地区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成员；维·鲁·明仁斯基（1874～1934），时任全俄契卡委员、特别部部长；亨·格·亚戈达（1891～1938），时任全俄契卡主席团成员。

№04787

共和国保卫芬兰边界部第二分部情报处处长的工作报告（摘要）

（1921年2月14日）

情报和通讯工作的目的是收集情报和向部里报告承担共和国军事任务的各部队、最主要的机关、组织和各方面的情况。保卫芬兰边界部第2分部情报处的工作遍及所有海军和海岸部队及其司令部、军事和苏维埃机关，位于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的军工厂和企业。

为顺利进行与反革命活动的斗争，情报处应当及时了解熟悉各部队、机关人员、工人和居民的情绪。为此通过设立经常观察群众情绪的情报人员，建立与各部队、机关和工厂的联系。以这种方式获取的情报能及时地制止反革命活动的企图和发生。在出现上述情形的情况下能帮助迅速掌握情况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此外，情报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弄清有军事间谍和反革命活动嫌疑的人和组织。

授权委托人对收到的报道有关部队生活和情绪、不正常现象、发现可疑人的报告进行审查、综合、整理，并与发到特别部的定期情报报告相对比……

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许多障碍使情报处担负的所有任务难以顺利而迅速地完成。例如：在特别处工作的整个期间都感觉到缺乏工作人员。阻碍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党的工作者都缺乏愿望和志向，甚至不响应俄共中央委员会号召所有共产党员成为特别部门情报员的通知……然而尽管完成这些或那些工作的情况和条件极其不

利，但通过顽强的努力，所有任务在相当程度上都得以顺利完成。同所有部队和其他站点建立了联系，经常得到在每一个上述工作点都有的情报员的支持。

应征作为情报员的总人数是175人。所有这些人都尽可能地收集和传递特别部需要的各类情报。必须指出，所有情报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在没有任何报酬下工作的。通过各部队、机关和工人中的情报工作，发现了153个可疑人，对他们一直在进行着监视。这些人从事反革命性质的各种犯罪活动，例如：暗中破坏，在群众中搞反苏维埃宣传和其他……

借助情报部门的工作弄清了许多不正常情况和部队中的不足，以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且领导人始终熟悉情况，了解有关必须调整现存不正常现象的建议，并将此通报中心。通过观察大多能发现在群众中利用各类不足散播不满的人。由此有可能及时采取措施以预防发生群众动乱。这种动乱已不止一次地危及过火药厂工人，有退役倾向的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及因食品和休假不满的某些军舰上的船员。并且在上述情报中均发现有人在群众中散布不满和引发波动，一直采取措施以发现可疑人的行为，并将他们与群众隔离开。

情报处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监督要塞、军用仓库和设施的保卫工作，了解全体人员的警惕性和在保卫工作中存在的所有不足之处。

在情报处里设有登记室，其目的是登记特别部调查的人和指控犯有某些罪行的人员的所有案件。在登记室注册的被调查人总数为2554人，其中大多是反革命分子。

为了细致和顺利地对在旧军队里有军官阶衔的人员进行监察，现正进行登记要塞警备部队指挥员和收集每一个人员个人的履历资料，以便在需要时能对他们进行分析。

根据现有资料，要塞的指挥人员共计 1143 人，在红军部队里有 609 人，其余 534 人属海军部队。

红军部队中的指挥人员可分为以下几组：旧军队中的旧军官 252 人，其中共产党员 24 人；红军军官 31 人，其中共产党员 22 人；医疗和其他人员共 356 人，其中共产党员 99 人，在白军中供过职的有 16 人，受过处分和审查的 38 人，现仍被怀疑和在所在部队被监督的有 57 人。

在海军中有旧军官 141 人，其中共产党员 7 人，过去在白军中的有 9 人。

如今在情报处中不特别缺乏人员。

1921 年 2 月 14 日于喀琅施塔得要塞

№04784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就彼得格勒局势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摘要）

（不早于1921年2月16日）

绝密

呈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处

1. 总的政治形势

没有变化。对粮食定额的减少普遍不满。2月份工厂中工人骚动仍旧是基于粮食问题而发生的。

2. 罢　工

2月份上半月在许多工厂中多次发生。

1）2月9日彼得格勒电车库工人开始罢工。于次日12时以后才恢复工作。参加罢工的工人共计1037人。原因是没有按时供应面包。

2）2月9日波罗的海造船厂开始罢工，于2月11日结束，参加罢工人数共计3700人。

原因是粮食供应减少。

在电缆制造厂、第一国营卷烟厂、制钉厂、军械库以及其他工厂召开了全体会议，这些会议多数都迅速通过了要求自由贸易，提高定额供应以及可以自由转厂的决议；在军械厂曾有以孟什维克思想为指导的致词，可见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对工人实施着普遍而有步骤的宣传，所以罢工几乎是同时的。

2月9日、10日、11日电缆制造厂的工人和职员罢工以示对其他工厂的支持。

5. 反革命现象

以“粮食问题”为基础在工厂中的宣传（参见上文）。

向一些工厂分发旧传单（另附信件抄件）[①]。

存在着大量苏维埃政权即将终结的挑拨性谣言，而且还指出了终结的日期——今年春天。

8. 军事状况

没有变化，也是对粮食、制服的缺乏和复员的缓慢感到不满。

红军战士只要有可能，则竭力拿点东西换取面包，下班后无聊地在房里走来走去。

在一些部队存在着因为没有鞋而拒绝执行勤务的情况。

11. 委员会的工作

1921年2月委员会（不包括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在15天当中的工作。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在15天中逮捕了：

1）依法逮捕——112人

2）设埋伏逮捕——32人

3）彼得格勒契卡——51人

4）各地押送来的——63人

5）其他——8人

共计266人

（男的被判刑少于17年的有1人，超过17年的有215人；女的被判刑超过17年的有50人）

266人因以下情况被分别逮捕：

① 所收集文件中无此附件。

参加反革命活动——24人。

渎职——83人。

参加各种投机倒把——81人。

刑事犯罪——33人。

罪犯——45人。

2月1日受审人数——597人。

2月份15天里逮捕人数——266人。

共计863人。

对313人有判决决定。

2月16日有550人受审。

判决决定：

1）年限不等的强制劳动——20人

2）从各机关调任出去（其中包括从革命法庭调任出去的114人）——148人

3）完全释放——145人

共计313人

主席（签名）[①]

机要处处长（签名）[②]

① 此处签名字迹不清。

② 此处签名字迹不清。

№04785

梅辛和萨姆索诺夫致捷尔任斯基的电报

（1921 年 2 月 24 日）

哈尔科夫

呈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

首先向您提供我们于 2 月 23 日采取的措施的情况及综合报告：贯彻均衡莫斯科一些企业的供应定额的总方针，其中包括对位于哈莫夫尼基的有国家采购定单的工厂减少 1.5 俄磅的份额供应。

由于这个原因上述工厂在群众集会后于上星期六停止工作，星期天工作的只有共产党员和青年联盟的成员。

2 月 23 日总人数已达 3 万人的罢工人群使得其他工人也停止了工作，随后，游行队伍开往哈莫夫尼基营房，以争取来自第二后备旅红军战士方面的支持。在此之前以及与此同时，一群工人不仅去联合企业，而且企图到处拉拢工人，把他们联合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在戈斯日纳克厂的人的实际压力下，热姆帕拉托克、基瓦尔多斯基、格尤涅尔三家轻工厂于中午 1 点钟停工。绝大部分工人各自回到家中，其中也有少数人参加到游行者的队伍。工人们企图闯入哈莫夫尼基兵营的大门，警卫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向空中射击。一名共产党员的腹部以及一名妇女的手意外受伤。兵营的内部形势变得复杂起来。这个兵营有 700 名红军应当复员，他们有着明显的反苏维埃情绪。在经过许多同志被殴打的一系列事件后，游行的人群开始解散，并且约定于翌日 18 点在“妇女高级训练班”楼前举行全体群众集会。值得注意的是，戈斯日纳克轻工厂的人在其他轻工厂、

特别是在卡乌鲁克厂力图扩大运动影响的许多努力均未达到目的。兵营事件后，红军战士组织集会，充分地表达了上面已提到过的反苏维埃的情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社会革命党也参加了这些事件的组织。18点在“妇女训练班”楼举行区域工人集会。与会者达5万人。很快的，两个大厅的人通过了痛斥罢工者可耻行为的决议。在第三个大厅的，绝大部分是戈斯日纳克轻工厂的人，会议一直延续到凌晨，加里宁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群众同意必须从早晨恢复工作的决定。街区的一切又归于平静。鉴于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央委员会政治部专门成立了由热列恩斯基、雅科夫列夫和梅辛组成的三人小组，以把握镇压惩罚的策略以及方式方法。同时，政治部还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逮捕企业无产阶级出身的工人。为了实施一系列工会和党的性质的措施（把共产党员从机关调到企业）成立了由洛若夫斯基、雅科夫列夫、热列恩斯基、梅辛和杜利亚科夫组成的五人小组。由加米涅夫、科尔涅夫组成，并且包括梅辛在内的委员会被要求积极工作，保卫莫斯科。由于2月20日事件全俄肃反委员会和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恢复了自己的力量，控制了哈莫夫尼基区，并且建立了与附近企业和机关的联系。晚上召开了全俄肃反委员会、莫斯科肃反委员会军事会议，会上详尽阐明了当前局势。为了便于领导工作，全俄肃反委员会和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成立了由阿尔杜若夫、列奥诺夫和萨姆索诺夫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他们必须考虑到力量、通讯、组织（直接的）等因素的情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三人小组已于深夜开始投入实际工作。最后汇报的是关于平息骚乱的群众。我们将在一天之内向您呈交正式的综合报告。

梅辛[①]、萨姆索诺夫[②]

① 梅辛，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主席。

② 萨姆索诺夫，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处处长。

№04788

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会议记录（摘要）

（1921 年 2 月 24 日）

听取：针对在一些工厂发生的叛乱明天将要采取的措施。

决定：设立由拉舍维奇、安采洛维奇和阿夫罗夫同志组成的总部，设立附属这一总部并由卫戍区司令领导的技术部门。

在各区组织成立三人小组，应由地方官、民兵派相应共产党员的指挥官以及司令部核心人物组成。各省也应成立这样的三人小组，由共产党省委员会书记、执委会主席以及省军事委员会主席组成。

总部应当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工作，并迅速恢复中央同行政区的联系。

以执委会的名义宣布戒严，随着这一指令的下达军事委员会也发布命令。从公告实际发布的那一刻起就进入戒严状态。

只允许晚上 11 点钟以前在街上走动。

区里恢复特别部队，并且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区里有日夜值班的连队。

只有经过总部的同意才能从开工的企业中撤掉共产党员。责成各区总部在所有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机关和企业中组成三人小组。

责成中央总部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各区提供武器。

责成彼得格勒委员会同中央总部机关一起根据事件的发展关闭工厂。

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护“86年”和奥布霍夫斯基电站，向该站提供能源，由其他机关承担费用。

责成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动共产党员走出苏维埃机关，到街上进行宣传。

发动处于军事实习期的共产党员按军区政治部的指令，以营为单位进行党的工作（例如宣传等）。

责成军区、彼得格勒燃料局和区委员会采取措施彻底改善兵营的燃料状况。

责成国民经济委员会尽可能多拨些灯泡给兵营；责成管理局各部门把这些部门保存的灯泡交给军区。

立即把部队政委必须住兵营而不能住私人住房的指令付诸实施。

以军事院校学员和军事部的名义向工人发出号召。

责成彼得格勒戏剧局按区总部的命令关闭不严肃的戏院。

逮捕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知识分子领导集团；根据同各区的初步协议委托契卡逮捕其他领导集团。

所有其余建议将转呈彼得格勒委员会。

№04789

彼得格勒防区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第一号命令

（1921 年 2 月 25 日）

为执行军事决定，建立革命秩序，各区在区党委会的组织领导下建立革命的三人小组。

防区全体居民都必须遵行革命的三人小组在军事行政方面的所有命令和决定。

防区内部署的所有军事力量应服从革命的三人小组，经军事委员会同意可在每一个别情形下使用军事力量。

本命令自发布之时起生效。

彼得格勒防区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　阿夫罗夫

军事委员会委员　M. 拉舍维奇

№04791

波罗的海舰队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报告（摘要）

（1921年2月26日）

什利斯基地。举行了重要工作人员会议，该会讨论了党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事件。

喀琅施塔得基地。召开政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在连队和全体船员中召开群众大会，组织讨论会，排练上演戏剧。

喀琅施塔得兵团乌克兰区域一连的红军拒绝工作，除非亲手拿到供应食品。

561团。政委的工作由于缺乏积极的工作人员显得较差。

阿穆列茨号驱逐舰。全体船员对已发生的事件持否定态度。

在阿扎尔德号上，船员们反对派遣武装的共产党员入城。在会议期间曾经流传过挑拨性流言，以致人心大乱。

加里巴利基号驱逐舰。曾经发出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

鱼雷大队。一些驱逐舰上的情绪令人不安。曾派去宣传部的侦察员。绝大多数水手以消极态度对待政治事件。

彼得格勒基地。举行了彼得格勒基地水手全体会议，讨论当前问题，通过了停止兵变和继续工厂工作的决议。

“北极星”和“查列纳”。工人到1号海岸队大门劝水兵撤岗位，但没有成功。

187舰队。举行关于彼得格勒事件的座谈会。

№0479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次会议记录

（1921年2月28日）

出席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阿尔乔姆。

1. 听取有关燃料情况，决定：

1）速召皮达可夫和伏龙芝同志到莫斯科商量，以确定由他们中的一人担任共和国整个燃料方面的领导人。

2）以中央委员会名义给新闻界下达指示，使新闻界不停止实事求是的批评，全力支持燃料工作者们的毅力、勇气和忠诚。

2. 听取有关莫斯科局势

1）任命托洛茨基同志为莫斯科市国防委员会主席（应托洛茨基同志请求，有关问题交中央全会讨论）。

2）委托列宁同志将今天季诺维也夫同志有关在彼得格勒找到的传单和发现的反革命宣传的特点的报告作为评价局势的重点考虑。

3）委托托洛茨基同志编写关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事态的正式报道及作出给新闻界的书面指示草案。

4）不释放孟什维克分子，指令契卡加强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不排除个别工人，特别是那些活动积极的人。

5）立刻询问全俄肃反委员会，了解同目前反革命活动有关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非苏维埃党派的活动情况。

6）立刻召捷尔任斯基同志到莫斯科。

3. 听取有关任命莫斯科军区司令员情况。

任命穆拉洛夫同志为莫斯科军区司令员。

4. 听取季诺维也夫同志有关总局势的建议。

1）今天向粮食人民委员部发出指令：鉴于最严重的政治的理由必须倾注全力按现行的口粮标准，最少不少于三周保证彼得格勒市和其卫戍部队的供应。

2）建议最高运输委员会重新察看提供给彼得格勒的七条通西伯利亚的粮食运输线路，使这些线路预先通到叶卡捷琳堡和秋明。

3）委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今天拨出近1000万卢布的黄金用于购买工人们最需要的物品，并指派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为此目的往国外派出一专门代表团，为加快速度应吸收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参加这一代表团。

№04793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同反革命斗争的命令

（1921 年 2 月 28 日）

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孟什维克分子利用工人因生活条件恶化而自然产生的不满，力图号召旨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和俄共的罢工运动，并使这一运动具有组织性和全国性。

所有省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内粉碎反苏维埃政党的机关，为此，全俄肃反委员会命令：

1. 把你们所管辖区域的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孟什维克，特别是从供职于地方自治机关、粮食机关和配给机关的知识分子中清除出去。

2. 禁止在工厂工作和号召罢工、演讲、游行示威的积极的社会革命党分子、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对工人采取行动应特别谨慎小心，只有在有确切资料表明他们有反革命行为时才采取惩罚措施。

3. 逮捕工人出身的人应同党委共同决定，而且这项工作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

4. 应让党委、省执委会及其他委员会行动起来以最大的努力满足工人们刻不容缓的需求，因为契卡工作人员的力量应当致力于让工人群众的情绪发生令人满意的转变。

5. 应同白卫军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同时特别应警惕地观察，不让指挥人员中的白卫军分子挑动红军用武器反对工人。

6. 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白卫军演讲，同他们斗争的所有方法应同党委商量讨论。

7. 当工人在街上演讲的情况下，用共产党员打入他们领导层的方法分散人群。

8. 在众目睽睽下，绝对不能进行逮捕。

9. 所有罢工和事件的具体类型应用加密电报立即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汇报。

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　克谢诺丰托夫

全俄肃反委员会行政组织部部长　阿佩捷尔

№04797

季诺维也夫致列宁的密码电报

（1921 年 2 月 28 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喀琅施塔得两艘最大的军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通过了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关于提出 24 小时最后通牒的决议。在彼得格勒居民中的工人的局势原先就非常令人不安。大厂都在停工。估计社会革命党已决定加速事件的发展。

季诺维也夫

发自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

№04798

托洛茨基致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的电报

（1921年3月1日）

绝密

1921年3月1日，23号文件

给克列斯廷斯基同志的复印件

给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的直通电话（叫至机器前）

最近在国外的出版物上经常刊登关于喀琅施塔得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阴谋以及起义的情况。所有以往的经验都说明，这种宣传是实际行动的先兆，因为困难的中心在国外，外国出版物的消息皆来自白卫军侨民界图谋谋反的准备。比如，这样的情形曾发生于下诺夫哥罗德，这样的例子很多。必须立刻同所有的主管部门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必要措施。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04802

驻喀琅施塔得第1、第2战列舰队全体会议的决议

（1921年3月1日）

在舰队全体船员至彼得格勒了解彼得格勒局势，听取全体船员会议派出的全体船员代表的报告后作出决议如下：

1）鉴于现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刻通过不记名投票重新选举苏维埃，在选举前应对全体工人和农民进行公开的预备宣传。

2）对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党派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

3）实行工会和农民联盟集会自由。

4）最迟在1921年3月10日前召开彼得格勒市、喀琅施塔得市和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

5）释放社会党的所有政治关押犯以及与工农活动有关的所有在押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

6）选举复查监狱和集中营在押犯案件的委员会。

7）撤销各类政治部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享有宣传自己思想的特权和从国家领取为这一目的的资金。代之应建立由当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由国家拨给其资金。

8）立刻撤除所有阻击队。

9）对全体劳动者均等供应口粮，有害健康的车间除外。

10）在所有部队中撤销共产党员战斗队，在各工厂亦撤掉共产

党员担任的各种值勤。如需要这些值勤和战斗队，可以指定部队中的连队担任，工厂应由工人们酌定。

11）应给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全权，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并希望有以自力而不是雇佣劳力喂养和使用的牲畜。

12）我们请求所有部队及军校的委员同志们赞同我们的决议。

13）我们要求，所有决议广泛在报刊公布。

14）应确立巡回执行部，监督执行。

15）允许以自力进行自由手工业生产。

本决议舰队全会一致通过，两票弃权。

舰队会议主席　佩特里琴科

书记　佩列佩尔金

［喀琅施塔得市水兵、红军士兵和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1921年3月3日］

№04803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专门处处长的报告

（不晚于1921年3月2日）

关于“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形势。

2月25日前“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形势平静，舰队中存在着不满，出于以下原因：

1. 由于补充队伍的到来缺乏制服和鞋。

2. 拖延2月1日前应当复员放假的期限，这是波罗的海舰队同意并命令的。

3. 拖延给医生委员会认定为伤员的士兵应当免职放假的期限，省地方政权的不正当行为及阻击队。所有这些都对群众的情绪产生了十分不好的影响，但以激烈形式表现的不满还未出现。由于彼得格勒事件舰队的情绪变得很糟糕，开始发生骚乱，具有暴动的性质。2月25日晚“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上的士兵开始聚集于公共甲板上，要求举行会议。在舰队政委佐西莫夫同志到来后会议开始，舰队提出了如下要求：

1. 于2月26日中午1时召开舰队会议，集体反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

2. 不允许逮捕在彼得格勒演讲的特鲁勃奇工厂的工人，即不允许在演讲工人中进行逮捕，也不允许在部队中进行。

3. 必须阐明演讲工人的要求。

4．必须阐明是哪支海军部队向演说的工人和他们的首创精神射击。政委佐西莫夫阐明了形势并回答了舰队提出的问题，会议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但在这时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诺维科夫同志来到军舰上，他不了解事情的实质，并声明他作为要塞的政委可以保证几天后所有的人都将得到制服，而且他已对此采取了措施。这之后舰队士兵们重又骚动起来。呼喊着："他们想要收买我们并且向我们隐瞒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一切"。当时佐西莫夫同志就提议士兵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形势，舰队士兵表示同意，并选举由海军萨夫琴科、乌兰诺夫、安德烈琴科、叶费米切夫和利哈切夫五个人组成的代表团。

代表团得到文件后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却不允许他们进去，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归来后他们在政委不知晓的情况下命令召集大会，萨夫琴科向与会者声明，不允许他们进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并企图就在喀琅施塔得逮捕他们。可见，舰队中骚动的规模已达相当程度，舰队政委奇斯佳科夫自告奋勇带领代表团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这样使舰队士兵骚动起来。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也选举了代表团，同上述代表团于2月26日晨前往彼得格勒。这样，在军舰上开始了骚动。

2月26日后的第二天军舰上的骚动并未停止，而愈来愈具有剧烈骚动的性质。轰轰烈烈的集会上，水兵们声称准备要捍卫演说工人们的要求。舰队对共产党员的态度尖锐到极点，在这天的集会上没有通过任何确定的决定和决议。2月27日清晨在"彼得罗巴甫罗斯克"号战列船上发现了散放着的几册右翼社会党性质的地下刊物，有：《劳动旗帜》1920年11月20日第三期，社会党、革命者党、国际主义者党莫斯科委员会1号传单和这些党派非法工会的小册子。

2月27日舰队的情绪十分激动，代表们从彼得格勒归来，为此举行了会议。在会上代表们描叙了彼得格勒的局势，舰队则表示准备完全支持工人的要求。当天晚上“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士兵举行了会议，要求把枪放入枪架，他们办到了。

2月28日骚乱继续发展。白天在他们的军舰上举行暴风雨似的集会，几乎不让共产党员发言。彼得格勒基地的水兵会议推翻了以前的决议，而代之以建议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修改自己的决议。一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的水兵很快拿出了一份准备好的决议，这时，一个来自“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水兵讲解了需要全体船员表示完全同意并通过的决议的内容。为了充分地修改军舰的决议，在晚上举行的会议上选举了委员会并提交了这份决议。

情报处处长　尼古拉耶夫

于喀琅施塔得要塞

№04905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
告要塞和喀琅施塔得市居民书

（1921年3月2日）

同志们、公民们！我们国家正经历着艰难的时刻，饥饿、寒冷、经济崩溃已严重围困了我们三年。统治国家的共产党已脱离了群众，且无力领导群众摆脱总的崩溃。近来发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波动足以鲜明地证明，党已失去了工人群众的信任，党不重视，甚至不顾及工人们提出的要求，认为这些都是反革命的阴谋，党严重地错了。

这些波动，这些要求是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的心声。如今所有工人、水兵和红军战士都清楚地看到，只有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共同意志才能给国家以木材、煤，给无鞋的和无衣的人们以衣和鞋，将共和国救出死路。这一全体劳动者、红军战士和水兵的意志在3月1日，星期二，我市防区大会上明确地体现出来，在这次大会上一致通过了第一和第二舰队全体船员的决议。在决议中决定立刻重新选举苏维埃。这一选举应在较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苏维埃成为劳动人民的真正代表，才能使苏维埃成为务实有效的机构。

今年3月2日所有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们集会于教育之家，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制定新的选举的基础，目的是今后着手进行苏维埃制度的和平的改革工作。然而由于有根据担心镇压，政权代表甚至有威胁性的话，会议决定组成临时革命委员会，将城

市和要塞的全部权力转交给临时革命委员会。

临时革命委员会设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上。

同志们、公民们！临时革命委员会为不流一滴血，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在城市、要塞和炮台建立革命的秩序。

同志们、公民们！不要停止工作。工人们留在车床旁，水兵和红军战士们守在自己的部队和炮台里，所有苏维埃工作人员和机构继续自己的工作。临时革命委员会号召所有的工人组织、工厂作坊、工会、部队和每一个公民给其全力的支持和帮助。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以齐心协力和共同的努力在城市和要塞为正确公正地选举新的苏维埃创造条件。

因此，同志们，为秩序、平和、忍耐、为全体劳动人民谋利益的新的诚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吧。

喀琅施塔得，1921 年 3 月 2 日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
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佩特里琴科
秘书　图金

［喀琅施塔得市水兵、红军战士和工人临时革命委员会通报，1921 年 3 月 3 日］

№04809

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书

（1921年3月2日）

白卫军的新的阴谋。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的叛乱。

早在1921年2月13日就在法国《晨》报上刊出了2月11日从赫尔辛福斯发出的电报，说在喀琅施塔得好像发生了反苏维埃政权的水兵起义。法国情报机关仅仅是预测了事件。上述时间几天后法国情报机关期待的事件，而且毫无疑问正是他们准备的事件真正地发生了。在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出现了白卫军的传单。在逮捕期间拘捕了著名的间谍。同时右翼社会党分子开始利用粮食和原料的困难局面努力在工人中进行宣传。2月28日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骚动，还通过了极端反动的社会党决议。3月1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骚动还在继续。在全体大会上重又通过了上述决议。

3月2日从早上开始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炮兵首领）一伙人公开露面。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同三个军官，名字尚不清楚，以叛乱者的身份公开发表演说。在他们的领导下逮捕了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喀琅施塔得委员会主席瓦西里耶夫和其他一些重要人物。这样，最近事件的意义得到充分解释。这次在社会党分子后面站着的是沙皇将领。

鉴于上述原因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宣布旧俄将领科兹洛夫斯基和他的追随者不受法律保护。

2. 宣布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戒严。

3. 彼得格勒防区的全部政权转给彼得格勒市国防委员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B. 乌里扬诺夫（列宁）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1 年 3 月 2 日

№04811

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

（1921年3月2日）

1

基于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3月2日的指令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宣布戒严。

2

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的所有政权转交给彼得格勒市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

3

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命令：

1）所有的军事和国家机关应非常注意防卫仓库、桥梁、车站、铁路、电报和电话线，为此应给予卫戍区长官以足够的军事力量。防卫不利的后果由相应机关的长官和政委承担责任。

2）所有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的执委会、区委员会和苏维埃机关应采取一切果断措施在居民中广泛宣传戒严的实施。

3）卫戍区司令在严格执行现有的规章、条例和规定的同时，应特别重视部队卫戍任务的执行。

4）剧院演出应暂时停止。在街道上步行和乘车只允许到晚上9时；应采取一切措施维护彼得格勒市和彼得格勒省范围内的严格的革命秩序，一切破坏行为应立即向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报告。

4

对不执行上述命令的犯罪分子应按戒严法予以查办。

如若在街上有人群聚集，部队可动用武器。如有抵抗者——就地枪决。

5

命令自宣布之时生效。

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主席　格·季诺维也夫

军事委员会成员　米·拉舍维奇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　阿夫罗夫

№04814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3月3日）

瓦西里耶夫区波罗的海制钉厂停工。新阿德米拉尔捷伊斯基厂由于重新登记而关闭，在普梯洛夫厂出现了工人，但随后又各自回家了。亚历山大厂也停工了。其余的工厂都在照常开工，城里很平静。红军部队的情绪还算让人满意。

水兵们异常平静，没有任何演讲。我们在彼得格勒的部队情绪比沿岸一带的好。我们已经拿到了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1号命令的复印件，其中讲到了把喀琅施塔得的政权完全转交给设立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艇上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是佩得里琴科，秘书为图金。两个方向的枪击暂时还没有。

今天深夜开始逮捕舰队和彼得格勒军区委员会成员，不可信任的非无产阶级专家也被逮捕。下达了占领要塞的指令。

喀琅施塔得全体会议决议如下：

“在舰队全体船员至彼得格勒了解彼得格勒局势，听取全体船员会议派出的全体船员代表的报告后作出决议如下：

1）鉴于现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的意志，应立刻通过不记名投票重新选举苏维埃，在选举前应对全体工人和农民进行公开的预备宣传。

2）对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左翼社会党派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

3）实行工会和农民联盟集会自由。

4）最迟在1921年3月10日前召开彼得格勒市、喀琅施塔得市和彼得格勒省的工人、红军战士和水兵的无党派会议。

5）释放社会党的所有政治关押犯以及与工农活动有关的所有在押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水兵。

6）选举复查监狱和集中营在押犯案件的委员会。

7）撤销各类政治部门，因为任何一个党都不能享有宣传自己思想的特权和从国家领取为这一目的的资金。代之应建立由当地选举的文化教育委员会，由国家拨给其资金。

8）立刻撤除所有阻击队。

9）对全体劳动者均等供应口粮，有害健康的车间除外。

10）在所有部队中撤销共产党员战斗队，在各工厂亦撤掉共产党员担任的各种值勤。如需要这些值勤和战斗队，可以指定部队中的连队担任，工厂应由工人们酌定。

11）应给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的全权，因为他们希望这样，并希望有以自力而不是雇佣劳力喂养和使用的牲畜。

12）我们请求所有部队及军校的委员同志们赞同我们的决议。

13）我们要求，所有决议广泛在报刊公布。

14）应确立巡回执行部，监督执行。

15）允许以自力进行自由手工业生产。

本决议舰队全会一致通过，两票弃权。

舰队会议主席　佩特里琴科

书记　佩列佩尔金”

№04883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出的第二号战斗命令草案

（不晚于1921年3月4日）

绝密

1英寸比2俄里地图

1[①]

2

鉴于支持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喀琅施塔得要塞革命委员会决定进攻，并为此命令：

1）右路纵队（560步兵团，配有两门炮）的克拉斯尼科夫同志，请尽可能地悄悄转移集中于北边的5号、6号、7号炮台。3月__日__时开始向利西诺斯岬进攻。最首要的任务是占领利西诺斯岬、卡乌皮列沃村的拉兹杰利纳亚站。

2）左路纵队（工人护航队，配有两门团炮），__日__时前集中于较南边的托特列边要塞，开始向杜布基进攻。占领谢斯特罗列茨克和塔拉索夫卡。

① 原文如此，所收集文件未发现地图。

3

两路纵队应当互相支援，保持联系，迅速夺取海湾沿岸。秘密集中小部分部队于原来的据点（北方的炮台和托特列边要塞），注意隐蔽性。

4

拨给炮兵司令4个团的兵力。炮用雪橇运输，每门炮有100枚炮弹。给纵队司令增配两门炮。雪橇和马匹可以从要塞交通运输队获得。

5

进攻的纵队应有供应3天的粮食：预计每天每人要有一俄磅饼干，一个罐头，4所洛特尼克[①]糖，2所洛特尼克茶。

6

两个纵队应互相支援，互相保持联系，并且通过托特列边要塞与要塞总部、北方7号炮台联系。应当指出的是在塔拉索夫卡的过的白色别墅（旧日的涅克拉西沃）里通过8线可以直接与炮兵司令部联系；如果这条线还在的话可以开通它。野外电话机和野外电缆数量不够可向要塞、要塞水雷部队和喀琅施塔得港口的通讯部门取得。

7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

① 所洛特尼克，旧俄重量单位，约合4.26克。

红军要塞、托特列边要塞、北方4号及6号炮台应处于准备开火的戒备状态。开火的命令将按纵队司令的要求通过要塞总部由海军和陆军炮兵司令发出。

8

右路纵队可从要塞炮队处取得700枚手榴弹，左路纵队可取得500枚。从那里还可取得300枚照明弹，包括白色和彩色的。

9

挖战壕的工具不够用，可从要塞工程处取得。

11[①]

3月__日5时前北方第二战区部队应占领从里弗要塞（不包括该要塞）到康斯坦京要塞（包括该要塞）的南方第一战区。除此之外那里还分别从机械化部队和工人护航部队抽调了500多步兵和200名步兵。

12

5时前北方第一战区部队应占领南方第二战区（康斯坦京要塞包括在内，第二革命营房除外）。

战区司令由560团团长助手叶戈罗夫[②]担任。从流动部队抽调200名步兵，从学员鱼雷部队抽调300名步兵，从主要炮兵连抽调90名步兵，从机枪电工兵部队抽调100名步兵，和从要塞鱼雷部队抽调（150名步兵），以补充战区兵力。

① 原文如此。第10在13之后。

② 在文件中首先任命的人是彼得罗夫，后划掉。

分别从第4炮兵营和空军拿出4挺和6挺机关枪给战区，以作补充。

从战区部队调出配有两挺机关枪的一个连到康斯坦京要塞，一个连到米柳京，配有1挺机关枪的半个连队到南方第二炮台。

13

南方第一、第二战区的部队需特别警惕。黑暗中进攻要有所警惕，并派人事先侦察。

希望事先通知邻近的部队，科特林岛北岸从第二北部军营到里弗要塞都要设置岗哨。

10

卫生部队主任命令在托特列边要塞以及更北的地方设置包扎站。每个站的5辆雪撬听命于要塞交通运输队。

14

探照灯在得到命令后才使用，比如像上述的夜晚。

15

空军部队应处于对地面以及空中目标开火的戒备状态。

为了直接保卫科特林区任命普洛霍夫为指挥官。

16

全体后备部队听韦谢洛夫斯基同志指挥……

№04880

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的呼吁书

（1921年3月4日）

在苏维埃所有部门、职业组织、工厂委员会、所有的经济和生产机关以及在驻防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同志们，俄共临时局向你们致以同志的敬意，并向你们提出下列坚决的主张：

当前的时局要求我们特别谨慎、克制和要有分寸。

我们的党从未出卖、也决不会出卖工人阶级，党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已有多年。

政治事件的进程是同你们，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现在你们要坚守岗位，无论如何不能让自己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你们要记住，我们经济生活微小的削弱和破坏导致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

让我们党的每一位同志深刻意识到我们正经受的这个时刻吧！

不要去相信那些无稽的谣言，这明显是由那些企图引起流血事件的挑拨离间者制造的谎言，说什么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枪决，共产党员准备武装进攻喀琅施塔得。

这是谎言和谣传，协约国间谍们想以此起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作用。

我们公开宣称，我们的党手握武器过去保卫了，现在也必将保卫工人阶级的全部利益，反对公开和隐蔽的期望消灭工农苏维埃政权的白卫军。

俄共临时局号召所有党员坚守岗位，不要对临时革命委员会采

取的措施加以任何阻挠。克制、守纪、冷静和团结，这是全世界工人和农民反对协约国所有隐蔽的和公开的阴谋取得胜利的保证。

苏维埃政权万岁！

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一致万岁！

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

Я. 伊利因

Ф. 佩尔武申

А. 卡巴诺夫

№04882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给“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命令

（1921年3月4日）

1. 决定性的时刻到来了。命运本身让我们去反对那个三年来利用你们的名义，夺取你们的生命，剥夺你们的福利，洗劫你们的村庄，将数万俄罗斯人投入监狱和处决，掠夺了二月革命的成果，剥夺了所有自由的政权。

2. 在这一时刻，没有动摇、没有疑惑。我们所有的同情、所有的忠诚、所有的爱都应属于临时革命委员会，我们所有的憎恨、所有的蔑视和愤怒都应指向我们的敌人。

从我们的军舰上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向光明的未来，通向美好的命运，自由和真理；另一条则通向奴役，从未有过的奴役。在这一正到来的斗争的决定性时刻，请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集聚起自己全部的勇敢、全部的坚强和意志力，毫无畏惧和动摇地去完成良知和对家乡、对我们共同的祖国俄罗斯的爱所赋予的使命。

水兵公民们，你们应当知道，整个备受苦难受尽折磨的俄罗斯与你们在一起。

在这些伟大的历史性的日子里，俄罗斯同你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心。

去完成已经开始的吧，俄罗斯人民将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让我们的军舰以共同的伟大的信念奔向我们的正义的事业，我们将完成那昨天似乎还不可能的事业。

斗争已经开始。

没有退却，也不可能有退却。

从水兵到军官每一个人都不是为惧怕，而是为良知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去以双倍的努力和奋斗来完成服从指挥员的天职使其担负的那些职责。

革命委员会主席

№04850

苏俄国防委员会关于从彼得格勒抓获人质的通告

（1921年3月4日）

对兵变者的警告

彼得格勒特别委员会逮捕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这一叛变军舰上的10名水手，其中包括使奥拉宁包姆受重大影响的所谓“代表”。被捕的还有受到怀疑的指挥人员以及参加了喀琅施塔得叛变的旧俄将领和军官的家人。

国防委员会宣布逮捕这些人质的目的是解救那些被喀琅施塔得兵变者逮捕的同志，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政委H.H.库济明同志，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和其他的共产党员。

如果被捕的同志哪怕是头发掉了一根，那上述人质将会人头落地！

国防委员会

№04822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发布的616号命令

（1921年3月5日）

一、宣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以便领导和执行：

1）鉴于喀琅施塔得起义，命令组成第七集团军[①]，直接服从于它的总指挥；

2）由图哈切夫斯基同志任第七集团军临时指挥官，同时兼任高射炮兵团指挥；

3）彼得格勒军区的所有部队和所有部队指挥官、波罗的海舰队指挥官都必须完全服从第七集团军临时指挥图哈切夫斯基同志；

4）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同时被指定担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

5）任命科扎诺夫同志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任命水兵库克利同志为波罗的海舰队参谋长；

6）任命第七集团军临时指挥图哈切夫斯基同志替代阿夫罗夫同志为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委员；

7）给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准备好进攻的部队，其余军队的调遣需经过彼得格勒军区司令；

8）第七集团军临时指挥官应在最短的时间里镇压喀琅施塔得

① 第七集团军初建于1918年11月，当时是为加强彼得格勒的防御，反击尤登尼奇部队的进攻。1920年5月被派往波兰前线作战。当年12月撤消独立编制，编入彼得格勒军区。1921年3月5日重建并直属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完成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任务后于当年5月再次撤消编制，重又编入彼得格勒军区。

的起义；

9）3月5日预先警告喀琅施塔得，如果24小时之内骚动还不平息，则将采取军事行动；

10）集中力量，以充分保证战役的胜利，特别是如果战役的规模扩大时；

11）所有集中于第七集团军的航空力量和装备都直接归空军总司令谢尔盖指挥，而他在这方面又听命于第七集团军指挥。

1921年3月5日，№28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总司令　C. 加米涅夫

参谋长　列别捷夫

二、于3月5日17时45分执行此命令：

1）喀琅施塔得的军事领导权交由第七集团军指挥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行使；

2）我就任彼得格勒防区司令；

3）任命布林同志为我的助手，作为彼得格勒防区负责彼得格勒内部防卫的司令；

4）军区参谋长应按第七集团军总部的指令给军事局派一些必须的工作人员；

5）军区通讯指挥员和通讯员应服从第七集团军指挥员的军事命令。

军区司令　阿夫罗夫

部队助理　亚历山大罗夫

№04823

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致驻喀琅施塔得军民的公告

（1921 年 3 月 5 日）

工农政府决定：

立即使喀琅施塔得和叛变的舰艇归苏维埃共和国管辖。

为此命令：

所有反社会主义祖国之手应立即放下武器。

解除固执己见者的武装并转交由苏维埃政权处理。

立即释放被捕的政委和政权的其他代表。

只有完全投降者可视做对苏维埃政权的无条件投降。

同时得到指令不惜一切用武力击溃兵变和兵变者。

使和平居民突然遭受到灾难的责任应完全算在白卫军兵变者头上。

这是最后一次真正的预先通告。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红军总司令　C. 加米涅夫

第七集团军司令　图哈切夫斯基

红军参谋长　列别捷夫

1921 年 3 月 5 日 14 时

于彼得格勒市

№04820

苏俄情报机关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报告

（不早于1921年3月5日）

绝密

加急

我们情报机关于1921年3月5日3时前得到的消息是可信的。

查明了设立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的喀琅施塔得政府的成员组成：海军1、佩特里琴科，2、雅科文科（二人来自“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炮塔），3、神甫谢尔盖·普季林，过去是高等党校的教师，资本家布尔史谢尔和技术工程师奥列申。

科兹洛夫斯基将军不是政府的成员，但却是运动的重要领导者。

所有指令都由军舰的领导成员（无党派）同三人小组共同发出。

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出版自由，取消阻击队，实行贸易自由，通过全面而秘密的投票改选苏维埃。

有两个阵营：第一个是军官阵营，设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一部分年轻水兵也加入其中，军官阵营认为应同芬兰联系，据传这种联系已经建立。第二个阵营，主要是水兵和工人，后者反对同芬兰进行任何联系。

喀琅施塔得居民对运动采取消极态度，食品还未运到。面包已完全没有了，饼干仅够两天，肉仅够6～7天供应。工人提出每天

供应 3 俄磅面包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满足，本来准备 3 月 3 日袭击奥拉宁包姆面粉厂，那里有将近 10 万普特面粉，不知什么原因袭击取消了。

“塞瓦斯托波尔”号上的煤完全用光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有 300 吨，但每天就要烧掉将近 40 吨，燃料储备也没有了。

由于出现了我们军队将要进攻喀琅施塔得的传闻，那里一片慌乱。由于没有破冰船，政府预备用炸弹炸开冰面，一部分人表示反对，因此这一企图被取消。

据传闻，喀琅施塔得准备于两、三天后投降。

不准备采取针对彼得格勒的积极行动。

守卫喀琅施塔得的主要是水兵。

巡逻队队员（除了水兵）被派往在科济姆博济托靠近奥拉宁包姆的道路和通往彼得格勒方向的道路。守卫很警惕。

晚上 6 个探照灯一直照射。

从喀琅施塔得出来惟有往奥拉宁包姆走，其余的地方全是水。

№04988

俄共（布）中央主席团
关于十大召开时间的讨论记录

（1921年3月7日）

1921年3月7日全体会议№94笔录摘要。

决定：1. 明天3月8日中午12时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代表大会，以在白天的会议中履行所有的程序和解决所有问题，午饭休息后开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

赞同列宁同志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讲话中的总计划。[①]

中央委员会书记

① 俄共（布）十大原定1921年2月6日召开，后改为2月初，再改为3月6日，这是第4次讨论的决定。当天，对喀琅施塔得兵变的镇压行动全面展开。

№04842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特派员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报告

（1921 年 3 月 7 日）

波罗的海舰队发生的事件是有一系列原因的，其中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因是绝大多数水兵被束缚于一个固定的地方已三年有余，没有直接参加过任何实际的战事，他们被人为地聚集起来，不是充满活动健康的组织，不是以事实上已不存在的舰队来组织，而是向他们灌输“水手的爱国主义”意识。水兵们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由于无所作为他们蜕化为寄生分子，表现为孤独而有等级优越感的一群，并且水兵们还不知不觉地把自己认为是“革命的光荣、自豪和开路先锋”，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取代了无产阶级的理想。

由于其他的客观和主观原因，海军这一特殊团体过去是、现在仍是职业革命家的一群，他们也是可能发生的第三次革命的基础。这些看法我已在大约一个月以前呈克列斯廷斯基同志的报告笔录中加以说明过。

最近出现的反对派的言论得到了共产党员水兵的强烈反响，因而在如此温床中不可能不出现瓦解的危险征兆。由佐夫同志抛出并大肆宣扬的关于重建舰队的臭名昭著的思想在这儿不是最近才起作用，它已经深入水兵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无党派群众的意识中。现在，不得不治疗已耽搁了的病，并且只能用外科方法来治疗，因为有计划的治疗已没有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已如加尔金所料，我认为必须成立一个特别部人员的临时机关，将由政府授予全权，

这样，这一机关就可在波罗的海舰队从事特殊工作。我认为彼得格勒现在的特别部的机构对于这一转折的特殊时期是不够的，因为彼得格勒特别部完全合并了特别部的各种工作部门：第一，它要防卫与芬兰接壤的所有边界；第二，它要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工作；第三，它要在彼得格勒卫戍军和波罗的海舰队中做工作。很清楚，在这种条件下，对于最后一项在当前具有超乎寻常意义的工作，特别部不能分出足够的力量来适应危急的形势，因为它不能使同样具有特殊意义的自己工作的其他部门遭受损失。

根据这些意见，我不得不同意科扎诺夫和加尔金关于为了便于特别部在舰队工作而成立临时机关的必要性的意见，当前，必须逮捕和疏散彼得格勒的不可靠分子。如果仅靠水兵中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发力量进行，而没有特别部的参与，在技术上是不能获得真正结果的。这使我相信上述意见的正确性。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需要通过讨论寻求最正确的解决方案，因为组成一个具有相应编制和预算的特别机构需要不少时间，依我看，这是不必要的。我认为，为了当前的目的最合适的办法是仅成立一个特别三人小组，它将完全独立，从特别部……取得可能性并直接服从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同时有必要使彼得格勒特别部的机关和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听命于这个三人小组，小组将直接与他们联系，能够在进行工作的同时不妨碍上述机关按直接受命进行的工作，重新成立的三人小组的工作只有到全部不可靠分子被清除，兵变者同右翼政党的联系中断，爱沙尼亚和芬兰的参与被完全查明时才可视做结束。应赋予三人小组包括采取极端惩罚措施在内的镇压权。

费·谢韦伊

1921年3月7日

№04827

托洛茨基致俄联邦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电报

（1921 年 3 月 7 日）

机密

从托洛茨基同志的列车上发出№133δ/c 直通电话

1921 年 3 月 7 日 16 时

莫斯科，契切林

鉴于当前对叛变者开火的形势我认为向芬兰政府大致做以下声明是适宜的："我们认为必须预先通知，白卫军奸细由于自己处于绝境可能会向芬兰海岸射击以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至于苏维埃司令部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力图在当前消灭叛变的同时不使芬兰公民遭受任何损失。"

通过别尔津[①] 通知对方，您不会对此表示异议吧。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发往莫斯科，梅特罗波尔

3 月 7 日 16 时 15 分

① 扬·安·别尔津（1881～1938），时任苏俄政府驻芬兰全权代表（大使）。

№04828

彼得格勒局势报告

（1921年3月7日）

3月7日6时35分，开始向喀琅施塔得射击。

谢斯特罗列茨克要塞首先开始射击，“红色高地”随后。喀琅施塔得很少有反应。

彼得格勒的情绪很稳定，部队的行动生气勃勃。

转达：奥佐林

接收：克谢诺丰托夫

№0500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公告

（1921 年 3 月 7 日）

彼得格勒的工人、水兵、红军和军事院校的学员们

停止杀人！

大炮隆隆作响……自己是属于工人政党的共产党员却用大炮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工人射击。

我们不清楚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细节。但我们知道，喀琅施塔得要求自由重新选举苏维埃，要求释放因工人运动被捕的社会主义者、无党派工人、红军和水兵，要求于 3 月 10 日召开工人、红军、水兵的无党派代表大会，以讨论摆脱苏维埃俄国所处的严重局势。

工人政权应当查明喀琅施塔得事件的真正原因，应当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与喀琅施塔得工人和水兵进行公开的谈判。但他们却不这样，而是宣布戒严，提出要求投降的最后通牒，并开始向工人和水兵开火。

同志们！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安然无事地听着炮声隆隆。每一声炮响可能会夺取十条珍贵的生命。

我们应该阻止和结束流血。

请要求政府立即和他们进行有彼得格勒工厂代表参加的谈判。

立即选举代表参加这些谈判。

停止杀人！

1921年3月7日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

［《社会主义公报》，1921年，№5。］

№0500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传单

（1921 年 3 月 8 日）

“对诽谤者的回答”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建筑摇摇欲坠，风雨飘摇。乌克兰、西伯利亚、俄国东南部发生了农民起义。彼得格勒发生了工人罢工和骚动，俄国其他地方的居民愤怒无比……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三年后出现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这样令人沮丧的画面。

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建筑摇摇欲坠，风雨飘摇，布尔什维克对此十分清楚。布尔什维克不仅不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改变政策以挽救革命于几乎不可避免的失败之中，反倒激愤地寻找自己不成功的罪人，并怪罪于所有人——除了自己。

不希望因为暴力而交出自己粮食的农民错了，在三年“自己”专政的时期里没学会喝饱苏维埃面汤的工人错了，有自己的判断并把它公开说出来的社会主义者也错了。

布尔什维克用自己虚假的、诽谤的宣传这一惯用的手法把我党（孟什维克）当做替罪羊。

孟什维克协助武装干涉，孟什维克唆使农民起义。

官僚主义的笔调日复一日地这样写着，竭尽全力“讨好”自己的主人，“诚实”地赚得一份口粮。

御用文人之后到来的是真正的特派强盗，他们每天晚上闯入我党和同情我们的工人家中，翻个底儿朝天，并且要逮捕所有走掉的人。最近逮捕了我们的十位同志，其中包括唐恩同志、卡缅斯基同志、纳扎里耶夫同志、切尔特科夫同志等等。

这一切都是以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名义做的。

我们知道，那里的彼得格勒工人当然与此无关，我们知道，一系列工厂的工人罢工，要求释放被捕者。我们知道，布尔什维克努力收买他们，许诺给每人50金卢布。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布尔什维克给工人良心定出的价格比起犹大来贵得多。但我们十分怀疑这一举措能否成功。

收买彼得格勒工人，布尔什维克是不会成功的。

布尔什维克和针对我党的造谣集团是不会成功的。不成功是因为工人们知道，社会民主党人从来都号召工人团结自己的队伍，保持无产阶级阵线的一致，社会民主党人在工农中从来都反对国内战争，社会民主党人从未号召工人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我们只是指出布尔什维克政策失败的结局。号召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用民主的办法进行有组织的战斗。

这不是我们的错，如果政府用逮捕工人代表来回复彼得格勒、莫斯科工人改变政策的要求，而对喀琅施塔得水兵、驻防军要求自由改选苏维埃的要求则用重炮齐射来回答。

没有善就没有恶，现在，所有工人，甚至是最落后的工人都明白，布尔什维克政权依赖的不是工农苏维埃，而仅仅依赖赤裸裸的暴力，现在，所有工人都明白，摆脱困境的惟一办法是把政权转交给真正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手中，他们明白要同我们一起斗争，为的是：

取消戒严、军事状态，为全体劳动人民要求言论、出版、结盟和集会自由；

自由选举苏维埃和其他工人组织；

释放所有因政治信仰而被捕的社会主义者、无党派工农。

真正的劳动人民政权万岁！

1921 年 3 月 8 日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

№04831

彼得格勒局势报告

（1921年3月8日）

现在很安静，没有任何枪击。

敌我距离有12到15俄里。

今天抓获了一名水兵，他企图散发传单。

我们的飞机今天在喀琅施塔得上空散发了传单。

今天我们的火力非常猛烈，以致城中几处地方出现了火灾。

我们在谢斯特罗列茨克的一门炮被他们打坏。

今天我们不准备再采取什么行动。他们还没有灰心丧气。

明天将恢复战役。反革命分子力图同芬兰取得联系，但他们不会得逞。

№04832

第七集团军作战部部长普柳托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1921 年 3 月 8 日）

彼得格勒　1 英寸比 3 俄里的地图

1921 年 3 月 8 日 22 时军事报告

由于通讯中断没有按期收到北方军队集群的消息，通讯部队退回到最初的位置。我方重炮的不足，敌方军队火力、力量的优势，特别是 561 团行动的不坚定以及这个团的一个营转向敌方都是导致失败的因素。特别汇编团部队曾冲入喀琅施塔得，在那里遭受了敌人强烈的机关枪交叉扫射和激烈的反击，后不得不撤退，失去了两个连和炮兵连长，撤离的部队受到了敌人机枪火力的猛烈追击。我们缴获了一挺机关枪，4 人死亡，3 人受伤，4 人因一组 10 英寸的排炮而被震伤，两人受到 12 英寸炮的射击而受伤。一天之内敌人随时用重型炮和轻型炮轰炸我们的驻地和城市。

里弗要塞炮轰克拉斯诺弗茨基要塞长达 10 分钟。我们也炮轰了敌方的要塞。

我们的三架纽波尔机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铁甲舰扔了 3 普特的炸药。在军区外线较平静。在老俄罗斯县抓获了 81 名逃兵。

第七集团军作战部部长　普柳托

军事委员会委员　马克西莫夫

№04839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
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摘要

（1921年3月8日）

以下援引的材料由部队通过直通电话所得，用了省肃反委员会当前报告的材料，报告中按相应的省标明材料的种类和来源。

彼得格勒军区
彼得格勒省

（呈报：3月6日省肃反委员会的报告，3400号和3375号电报，3月7日23时45分、3月8日3时11分和12时18分的电话汇报）

1. 总的政治局势。

彼得格勒居民的情绪较为平静。卫戍军和舰队的情绪无甚变化。

2. 骚动，罢工和演讲。

3月7日涅瓦河造船厂、阿尔谢纳尔厂，奥布霍夫斯基厂的一部分未开工。在阿尔谢纳尔厂的会议上，一些水兵请求听从喀琅施塔得叛变者。要求预先呈请确定会体会议于明天3月9日早上召开。在其他厂没提出任何要求。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汇报。据未经审查的消息称驻扎于喀琅施塔得的560团拒绝服从革命委员会。独立喀琅施塔得团的战斗力难以

令人满意。我方海岸整夜被敌人照得通亮。已在托特列边要塞区域进行侦察。要塞处于战备状态，武器被运往谢斯特罗列茨克。托特列边要塞和喀琅施塔得联系频繁。要塞的粮食状况十分恶劣。有消息发现喀琅施塔得由于这样的粮食状况，储备少得可怜出现了分裂。发生了原料危机。“塞瓦斯托波尔”号上煤已完全没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的煤也将用完。对被捕的重要的共产党员至今还未实施暴力。他们的行动派了专人监视。

允许俄共成员成立以卡巴诺夫、伊利因、佩尔武申为代表的党的组织。喀琅施塔得司令任命泽姆斯科夫，一个年轻的水兵负责通讯勤务。喀琅施塔得城中居民的情绪消极，担心我方采取军事行动，老的水兵不同情革命委员会。据说革命委员会同芬兰保持着联系，未发现革命委员会准备主动发起战役的企图，他们仅仅是准备好保卫城市。革命委员会期待着彼得格勒发生起义，那里他们派去了自己人以便联络。保卫城市的任务除水兵之外。革命委员会最终决定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迁往城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周围的冰被凿开，舰队的武器运往奥拉宁包姆和“红色高地”。

克洛米亚吉站运来并卸下了 3 车厢的面粉。

3 月 3 日从芬兰运到喀琅施塔得 8 车厢货物。还发现了许多从喀琅施塔得返回的马拉货车。据消息称，在芬兰南部组成了志愿者队伍。发现他们一小撮一小撮的在捷里斯克和雅尔塔茨村之间活动。在我们的边防地带区域内有部队在行动。

据芬兰报刊的消息称，志愿者队伍从芬兰出发，他们的方向不清，目的不明，上述国外的消息不可信。

3 月 7 日 18 时 35 分我方开始采取积极行动反对兵变者。

北方战区开始向喀琅施塔得开炮。

起初喀琅施塔得没有反应，晚些时候向谢斯特罗列茨克发了两

枚炮弹，城中无损毁和死伤。紧接着喀琅施塔得开始从“红色高地”和谢斯特罗列茨克开炮。“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托特列边要塞和康斯坦京要塞向“红色高地”和“利西诺斯”一带猛烈开火以示回应。向奥拉宁包姆投去两枚炮弹。没有死伤。

我方开火的结果仍未明朗。

临近晚上托特列边要塞开始向谢斯特罗列茨克射击，因此造成几处火灾。

晚上收到一个关于谢斯特罗列茨克区我方一门炮断裂的报告，没有人员伤亡，但爆炸引起了恐慌。

3月7日早晨由于我方已确定打击目标，我方军队向喀琅施塔得逼近，但因为敌人的火力过猛，军队不得不后退。

据15时30分得到的消息，局势没有变化。

彼得格勒的局势由于采取了主动行动总的来说是平静的，在阿尔谢纳尔厂工人会议上提出了同喀琅施塔得起义一起行动的提议。大会为了同喀琅施塔得联络选举了由3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分别是布尔什维克、社会党分子、无政府主义者。

3．军队状况

彼得格勒卫戍区部队情绪无甚变化，令人满意。561团的士气高涨，但用他们参加战役较困难，因为驻守喀琅施塔得的560团是由他们的库班哥萨克同乡组成。

海军中发现了个别同喀琅施塔得分子联合的宣传。上述宣传没有成功。

4．省肃反委员会的措施。

从彼得格勒这面不能把喀琅施塔得照亮，因为缺乏探照灯。

省肃反委员会逮捕了由阿尔谢纳尔厂工人会议选出的同喀琅施塔得联络的代表团。

派去侦察托特列边要塞的人被水兵逮捕。

省肃反委员会调查了谢斯特罗列茨克区我方大炮断裂的事件。

3月7日起彼得格勒基地的水兵部队被调往亚述海和黑海。第一梯队有1195人，由年轻的海军指挥人员组成。梯队在19时被调遣时情绪平静，第二梯队有500人，由水雷师和其他岸上及军舰舰队的水兵组成，调遣于晚上1时15分进行，秩序井然。梯队首长为共产党员加耶夫斯基。

第二梯队的水兵在调运的过程中由于在车厢中长久的等待而非常愤怒，从政治方面讲被调遣者的情绪平静。

第三梯队于3月8日10时出发。

第四梯队于3月8日18时30分出发。

同每个梯队同行的都有15名共产党员。

遣送其余水兵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全俄肃反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助理

№04835

普柳托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1年3月9日）

彼得格勒　北方集群

1921年3月9日11时军事报告

3月8日晚敌方对军区连队进行了疯狂的射击，特别是对我军已占领的7号要塞要道和高尔站、利西诺斯站区域予以重点射击，看来他们是准备把我们同7号要塞隔开，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开火，用12英寸炮射击。我们部队对托特列边要塞的进攻再次体现了诱使炮兵部队离开7号要塞的目的，但敌方火力的自发性，右方战区遭受的损失都恶化了军队的状况，委员会成员和政委任何的训导及个别英勇的例子都无法促使进攻加大力度，部队还受命在少数炮兵火力掩护下改善行军状况，以夜间进攻的方式夺取7号要塞。夜间敌方对所有战区进行了少量炮击，并且向利西诺斯发射了12英寸的炮弹。我方炮兵夜间也向敌方发出了少量炮弹。敌方的炮火使我方损失惨重，并使和平居民多人死亡。3月8日我方空军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投了5枚4普特5俄磅重的炸弹，向加瓦尼和其他军舰投了14枚炸弹，南方军队集群的定时汇报还未送到。

第七集团军作战部部长　普柳托

军事委员　马克西莫夫

作战处处长　基奥伊巴什

№04914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

（1921 年 3 月 9 日）

彼得格勒军区

彼得格勒省

（3 月 8 日 13 时直通电话，3 月 8 日 19 时 5 分、19 时 35 分，3 月 9 日 14 时、14 时 45 分、16 时 20 分的电话谈话）

1

总的政治局势仍然不稳。居民因实行完全的戒严而感到压抑。有部分轻工厂罢工。街上很平静，没发现任何集会。

3 月 8 日彼得格勒停工的有普梯洛夫厂（局部）、奥布霍夫斯基厂、阿尔图拉·科佩拉厂、阿尔谢纳尔厂和诺别利亚厂以及莫斯科关卡外的两家小厂。从 3 月 9 日早晨起在罢工的工厂开始了对工人的重新登记。从重新登记的一开始罢工者的情绪有明显转变。对愿意工作的人的登记进行得很顺利。有一种预测，认为从明天起所有工人将开始工作。

2

关于喀琅施塔得的消息。由于我方 3 月 8 日白天投放的炸弹，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几处火灾。

3月8日晚我方火力逐渐减弱。深夜有少量射击。

3月8日白天抓获了一名从喀琅施塔得逃出来的水兵，带有叛变者的各种传单。被捕者说，叛变者的士气很高。

还未得到新的关于芬兰方面给喀琅施塔得提供供给的资料。据未证实的材料看来，白俄芬兰方面企图同喀琅施塔得保持政治关系。

3

军队中和彼得格勒水兵的情形没有变化。据未证实的消息称，原莫斯科军事院校学员的士气正在下降。

4

3月8日14时从各种舰艇抽调了第三海军梯队，人数为1262人，在15名护送人员的护送下被调往莫斯科。梯队指挥官为普柳延科。梯队的情绪令人满意。

3月8日18时30分人数为1047人的第四梯队被调走。梯队的指挥官为拉普杰夫，有15名护送人员。梯队的情绪让人不太满意。大部分梯队士兵是不守纪律的年轻水兵。

第四梯队的水兵在被送上火车时举行了大会，通过了一项拒绝离开彼得格勒的决议。在大会上一名共产党员被打死。在骑兵连骑兵的“帮助”下，水兵不得不坐入火车，这样梯队才离开了。

对我方的大炮在谢斯特罗列茨克区爆炸的侦查仍未查明其罪恶意图。

按彼得格勒指令，至今仍缺乏用于照亮海面的探照灯。

我方正准备着进行决定性行动。省肃反委员会正向部队中增派自己人。

№04916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
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

（1921 年 3 月 10 日）

彼得格勒军区
彼得格勒省

（3 月 9 日 21 时、3 月 10 日 13 时直通电话谈话，彼得格勒区运输系统肃反委员会 3 月 4 日至 6 日的政情报告，3 月 10 日 11 时的电话报告）

1

彼得格勒区较平静，在早先停工的工厂中重新登记工人（诺别利亚、阿尔谢纳尔和奥布霍夫斯基），其他的厂都已开工。

2

从彼得格勒区运输系统肃反委员会得到的消息表明了喀琅施塔得局势的一些详细情况，比如：

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因为加剧的原料危机，发布命令，拆除木质的房屋。

正加紧布置一系列鱼雷场。一个鱼雷场已布好，但具体在哪儿

不清楚。

从起义的最初就逮捕共产党员，但逮捕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以及在起义者看来最为坚定的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工厂工作人员仍在原岗位上从事工作，号召在重新选举新的苏维埃之前保持平静。粮食委员会政委伊利因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临时革命委员会领导了喀琅施塔得运动，其成员为：1）佩特里琴科，水兵，舰队总部的文书；2）奥列申，过去是政治总教员，有较高学历；3）佩列佩尔金，水兵，神甫的儿子，传闻他的兄弟因反革命活动而被枪决；4）普季林（没有准确确认他是不是革命委员会成员），积极参与社会革命党的演讲，过去是神甫；5）图金，水兵，革命委员会的秘书，党籍不详。

水兵中充满了对政治部的巨大不满，包括对拉斯科利尼科夫同志的不满。水兵们说，非常遗憾，喀琅施塔得没有拉斯科利尼科夫。有一种意见，反对逮捕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同志。

3月2日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发出公告，说革命委员会重审了拘留重要共产党员的条件，并说拘留他们是完全符合条件的。

到3月9日晚双方的炮击都加剧。暂时中断了与谢斯特罗列茨克的联系。

在奥拉宁包姆抓获喀琅施塔得成员，“塞瓦斯托波尔”号舰水兵——韦尔申宁·谢尔盖·斯捷帕诺夫，他曾几次因刑事犯罪而被审。韦尔申宁无党派，因侮辱妇女被提起诉讼，同年2月因侮辱阻击队政委而被判六个月监禁，缓期执行，1921年2月8日起处于喀琅施塔得革命法庭监督之下。

韦尔申宁在审讯时交待说，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有10个，其中几个新的是：第二战列舰队的基利加斯特，重要水雷手连的帕夫洛夫，工人罗曼年科，佩列佩尔金和雅科文科是哪儿的不清楚。至今

为止革命委员会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所有问题都是代表独立解决的。给每人交付一定的行动领域。

喀琅施塔得的防御由专家负责。

看来，韦尔申宁对于事件的政治问题不太了解，又因为自己文化程度低不可能告知革命委员会以后的打算和策略。

对于出现在奥拉宁包姆，韦尔申宁解释说是为了执行革命委员会交给他的与苏维埃进行停止军事行动谈判的任务，但他没有对此的委任书。

3月8日敌方从北方进行了猛烈的射击，然后步兵转入对整个战区的进攻，占领了7号炮台，我军向第6号炮台和托特列边要塞进行长距离的转移，因为长时间战役轰炸使得冰面断裂，在这里进行射击是不可能的了。在敌方猛烈火力的压力下和损失惨重后，曾占领过第7号要塞的我方军队士气低落，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敌方用火力破坏了拉赫塔站和拉兹杰利纳亚站之间的桥。谢斯特罗列茨克有6所房屋被毁，2所房屋起火，和平居民中有死亡的。

我方飞行员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上投了5枚炸弹，往喀琅施塔得港投了14枚炸弹。

3月9日南方战区向喀琅施塔得进攻未获成功，因为缺乏重型炮，主要是由于561团不坚定的行动造成，该团的一个营投诚到敌方。有消息表明，上述的叛变行为发生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使得投诚的营失去了退却的机会。特别汇编团成功地进入了城市，但在反革命猛烈攻击的压力下和机关枪扫射下，整个团的部队不得不离开城市，两个连被俘虏。

3月9日一天敌方一直向奥拉宁包姆和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射击。

据现有消息，叛变的里弗要塞和奥布鲁切夫要塞预备转向我

方。

从3月10日早晨开始我方向喀琅施塔得猛烈炮轰。

3

据省肃反委员会的消息称，彼得格勒卫戍区部队的形势总的来说还较令人满意。

红军骚动的问题有：粮食的、原料的、假期、因警戒任务造成的疲劳。

因为征召共产党员调往军舰特派部队和彼得格勒基地海军部队，反革命宣传加强了。

部署在北方战区的部队的情绪大部分是好的，除了莫斯科军事院校学员兵的两个营。

部队中十分缺乏烟草和军服。

缺乏炮弹确定无疑。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部长助理

№04889

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第69号令

（1921年3月10日）

命令所有住在喀琅施塔得城的共产党员，从此命令颁布起的两天内必须向城市司令部（罗沙利亚广场）上交自己的全部武器，包括：左轮手枪、步枪、子弹，以及军刀、短佩剑、蓄电电筒和手电筒。

不遵照此命令执行的将被视做违抗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一经发现私自存有武器将负严肃的责任。

№04891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1号令摘要

（1921年3月11日）

关于行政部分

1

鉴于当前形势和喀琅施塔得要塞戒严的客观状况，从3月2日开始要塞卫戍区的所有部门和机关必须执行临时革命委员会防卫司令或委员会值班人员的命令和指令。

由阿尔卡尼科夫同志临时担任防卫总部司令一职。

防卫司令（签名[①]）

革命委员会代主席（签名[②]）

① 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② 签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

№04892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2号令

（1921年3月11日）

关于监察部分

1

今天要塞防卫司令已就职。

证明：今年3月11日关于防卫的1号令。

2

总军事分部的负责人阿尔卡尼科夫同志报告，已就任临时委托他负责的防卫总部司令一职。

依据：今年3月11日关于防卫的1号令。

证明：今年3月11日阿尔卡尼科夫的151号报告。

关于行政部分

3

为了让城市消防队和要塞消防队转入修筑工事以备要塞消防之需，指定要塞工程部于3月14日上午11时成立以军队管理员A.马季松同志为领导的委员会，成员包括：1）要塞消防队长；2）公用事业消防处；3）公用事业处住宅基金会主席；4）喀琅施塔得的

代表；5）波罗的海舰队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主席；6）国民经济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主席。委员会必须编写条例，并附有上交目录和必需维修的清单，请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上交。

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防卫司令　索洛维亚诺夫

革命委员会主席　佩特里琴科

№04893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3号令

（1921年3月12日）

关于军事部分

要塞炮兵火力由炮兵司令助手布尔克谢尔同志负责，开火与否，他直接听命于要塞防卫司令。在其他所有方面布尔克谢尔同志服从于炮兵司令的命令。

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防卫司令　索洛维亚诺夫

革命委员会主席　佩特里琴科

№04924

南方军队集群政委伏罗希洛夫给芬兰湾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的命令

（1921年3月13日）

奥拉宁包姆

机密

1

为了迅速镇压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兵变分子，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自己的第四方面军调往芬兰湾沿岸战区。党代会把苏俄各地最优秀的工作人员派了过去，为的是保证和加速对喀琅施塔得白卫军的胜利。

从党代会代表中任命的特派员除了加强军事行政工作和政治工作，还被派往军队和机关。

政委和指挥人员应把特派员看做帮助自己指挥和处理事务的老同志。

特派员团是临时的。

命令和指令由指挥人员和政委根据全局下达。

2

抵达的党代会代表中以下人员被任命为特别全权代表：

布勃诺夫同志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
穆拉夫尼克同志炮兵军队集群管理处，
拉维科维奇同志炮兵连供给处，
米拉同志军队集群卫生部队，
扎通斯基同志汇编师，
莫罗佐夫同志汇编师政治处，
列温同志 187 步兵旅，
别扎伊斯同志 187 步兵旅，
拉德琴科同志汇编师炮兵连管理局，
罗加切夫同志汇编师供给处，
皮亚塔科夫同志 27 步兵师，
奥什列伊同志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和佩列多沃伊要塞，
佩特鲁宁同志汇编团，
尚金同志附属于通讯部队指挥，
鲁希莫维奇同志附属于南方军队集群供应处处长

3

南方军队集群全体师政治部主任和政委必须用最严厉的方式检查一下所任用人员的指挥年限，因为发现有用最普通的红军和办事员做指挥人员的情况。

4

从收到此命令开始，所有的传单和打算印刷出版的文字材料必须交给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文字出版处审阅，没有该处的允许，这样的材料不得印刷。

5

暂时调往南方军队集群的俄共十大代表瑟尔佐夫同志被任命为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主任助理。

任命伊波同志为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情报处处长。

南方军队集群军事政治委员　伏罗希洛夫

军队集群政治部主任　Ю. 米列伊科夫斯基

№04932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
呈列宁、斯大林的作战情况报告摘要

（1921 年 3 月 14 日）

彼得格勒军区
彼得格勒省

（3 月 13 日 21 时直通电话谈话和 3 月 14 日 16 时的电话汇报）

1

彼得格勒一切正常。工厂正常工作。

2

3 月 13 日白天双方偶有互相炮击。

从 3 月 14 日早晨起由于大雾的影响炮击停止了。一切正常。

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向铁路职工发出号召，请求援助，请求停止铁路运输，在每个站组织秘密的革命三人小组。

3

3 月 11 日 32 旅 94 团抵达奥拉宁包姆。该团被安置得十分不

好，营房又脏又冷。因为缺乏木材没有开水。急需军服和便鞋。情绪良好。

32旅96团，情绪令人满意，但红军害怕进攻，担心在开阔的冰面上会被全部打死。

32旅独立汇编团的红军充满了不满。他们认为喀琅施塔得是不可攻克的。

奥拉宁包姆步兵团红军的情绪十分不满。他们不愿进攻。

11营的重炮兵营已抵达。还在开火前安装炮的过程中，炮兵连已经向敌方炮击，并击毁敌方用于间谍工作的一个侦察点。在后来的侦察中在一些地方发现了与喀琅施塔得联系的电话线的线头，没有人对它们进行维护。

南方军队集群一些部队，特别是561团和喀琅施塔得独立团的情况和情绪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或者是解散部队，或者是用积极的政治工作者加以补充，并且必须改善喀琅施塔得人的经济条件。

所有其他到达的部队由于没有安置好和营房糟糕的卫生状况以及部队到手的粮食都是干的，情绪受到了巨大影响，以上所述需要军事指挥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

下述事实使我们怀疑给我们造成损害的一些无名组织的存在，3月10日从驻扎在斯特列尔卡抽调出来的70人队伍被派往奥拉宁包姆以寻求皮靴，同时团里就有皮靴。发现有阻止炮兵部队移动和集结的行为，一些部队应于3月11日就位，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未抵达。

所有重炮兵部队联合成一个集团，服从于同一个指挥官。提出的人选（波波夫）令人不信任。

从彼得格勒防区送往奥拉宁包姆6盏从舰队总部得到的聚光灯。后来发现聚光灯完全是坏的，对行动无益。说明书表明，这些

灯是由彼得格勒要塞交出的，彼得格勒军区未经检查就接受了。

对所指出的事实特别部进行了调查。

4

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克谢诺丰托夫同志到彼得格勒后致力于在战区补充契卡人员和加强侦察工作。

全俄肃反委员会情报处处长

№04935

北方军队集群司令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指令

（1921年3月14日）

绝密

从北方战区参谋部发出的系列13/50命令……向左战区司令发出的强攻HP4要塞和科特林区的7号命令：

1）白天进攻要塞要求特别谨慎和小心。

2）在和所指挥部队的联系方面应尽全力，做到用信号弹、联络兵、传递哨和其他一切信息联络的方法，当然应尽可能地利用电话。

3）应用足够的子弹、手榴弹、梯子供应给士兵以使他们克服在冰上的困难。

4）在夺取要塞时应严厉镇压兵变者，处决那里的士兵不要有丝毫怜悯。在要塞不要让士兵耽误一分钟，应让他们尽快去达到战斗任务的最终目的。

5）预先想好弹药供应、粮食供应、疏散和给予伤员帮助的方法。

6）在喀琅施塔得的巷战中部队应紧密作战，在每个连队都有熟知城市街道分布的人。应消灭一切武装力量，不要太在意俘虏，不要惊动房间里的士兵。

7）再次强调通讯问题，仅仅是缴获来的电话是无法满足需要

的。所有的通讯设施及部队都由您调度。据我的上述观察通讯应保持连续不断。

8）在进攻喀琅施塔得城的时候应采取一切措施与我方南方军队集群的部队保持联系。

9）强攻的形势比较困难，但并不复杂，它要求果断、坚定和灵活多变。

军队集群司令　扎恩斯基

军事委员　韦格尔

军队集群参谋　图尔昌

№04938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
呈列宁、斯大林的战事密码电报摘要

（1921年3月15日）

彼得格勒军区
彼得格勒省

（3月14日21时、23时、3月15日12时直通电话谈话）

1

彼得格勒工厂的状况没什么变化。从3月15日早上起所有工厂都开工。卫戍部队和舰队一切正常。

3月14日发现有社会民主党彼得格勒委员会针对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散发的传单。传单中有“停止打死人的行动”的词句并号召工人要求立即暂停军事行动。另一些传单是“对造谣中伤者的回答”，依据的是喀琅施塔得决议精神。

在拉弗尔姆轻工厂除了上述传单外还发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传单。

2

3月13日北方战区炮兵连对4号、6号要塞和托特列边要塞进

行了炮击。对方最后一次炮轰是对准“利西诺斯”的，拉扎杰诺耶站的铁路遭到破坏。北方战区军队已集结成群，避弹所已修好。有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参加的会议决定，在工程准备和我方军队集结成群未完成之前不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

3月13日凌晨在北方战区敌方用重炮向“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进行了炮轰。将近110枚炸弹轻而易举地投到了要塞，但没有造成严重损失。同时奥拉宁包姆区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康斯坦京要塞炮轰。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对托尔欣灯塔和里弗要塞进行了回击。

敌方在北方战区的火力集中在铁路线、车站和奥拉宁包姆的城市建筑。

平民有伤亡发生。

在我方炮兵进攻时不能给予实际的帮助，因为兵变者占有炮兵质量和数量上的优势。为了白刃战敌方有可能派出5000到6000人，拥有300挺机枪。对于强攻喀琅施塔得最严重的障碍是冰面的状况，虽然还算坚固，但已经是到处被水覆盖，达半俄尺深。这种状况使得士兵犹豫不决，心生恐惧。

3月14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用3门12英寸炮向克拉斯诺弗洛茨基要塞开火，康斯坦京要塞向奥拉宁包姆区的铁路开火，用了6门炮。我方炮兵联手予以回击。

3

彼得格勒军事院校学员兵的情绪仍然令人难以满意。特别是5连、6连军纪涣散，两个连已被隔离开，并被带到后方。

炮兵部队的情绪较好，除了重炮兵营1连，该连的红军明确宣称，不会开火。

79旅235涅韦利斯基团、236奥尔尚斯基团、237明斯基团无可挽回地瓦解了。该旅已无战斗力。

没完成军事命令的明斯基团被解除了武装。头目已被处罚。

上述师的其他团公开拒绝进攻。

据3月14日23时的报告表明，涅韦利斯基团和奥尔尚斯基团已经起义并等待着武装对抗。

据3月15日12时的报告表明，27师明斯基团、奥尔尚斯基团已被解除武装，骚动已平息，涅韦利斯基团归于平静。

3月12日两名被揭发的从托特列边要塞来的间谍被处以了最高惩罚。被指定执行该项处罚的学员兵拒绝执行。该项任务最后由反临阵脱逃委员会的部队完成。

№04941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向明斯基团归还武器和革命称号的命令

（1921 年 3 月 15 日）

№11 015
彼得格勒
1921 年 3 月 15 日

光荣、胜利的明斯基团和涅韦利斯基团昨天召开的应受谴责的群众大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苏维埃政权用解除这些团的武装和逮捕他们表明，无论是目无纪律，还是叛变，都是不允许在红军中发生的。

所有的奸细和造谣者都要为自己的反革命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现在，当被他们蒙骗的英雄们请求给予机会夺取喀琅施塔得，在苏维埃俄国工农面前赎罪的时候，我特此命令：

归还明斯基团和涅韦利斯基团武器和革命称号。

我相信并且希望，重新看到自己的老战友成为英雄，我们曾一起夺取车里雅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一起攻占华沙。

前进！向喀琅施塔得叛徒进攻！

第七集团军司令　M. 图哈切夫斯基
军队参谋长　A. 佩列梅托夫

№04903

喀琅施塔得港地方革命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全体联席会议记录

（1921年3月15日）

听取：

1. 关于解除过去的共产党员政委和所有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的职务。

决定：

现在的问题全部转交由地方三人小组处理，他们有责任在地方上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并按群众的意见解除思想危险的共产党员的公职，并且每次要通告群众，这些被解除公职的人员，按三人小组的裁定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的监督。

2. 关于禁止被解除公职的共产党员和人员进入军港，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到军港去。

决定：

建议所有的地方三人小组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军港政委波洛佐夫同志和他的助手博罗维克同志已被解除职务，所以不允许让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被解除公职的其他人进入军港，除非得到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允许和地方三人委员会军港处的签字同意，一旦发现这样的人企图潜入军港，将一律被捕。

3. 关于解除共产党员工作人员的武装。

决定：

喀琅施塔得港地方三人小组请求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立

即发布命令对全体政委、共产党员、党的工作人员进行普遍的搜查，不要考虑先前的搜查，以搜出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武器。

搜查按地方革命军事三人小组提供的共产党员名单进行。

№04904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的文章

（1921年3月15日）

“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

喀琅施塔得在“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的口号声中前进。

在有了三年共产党员统治的痛苦经历后，它确信，它遭受的是党的专政。

那些共产党将领很快地爬上了舞台，他们确信自己从不犯错，并且不择手段地按自己的纲领安排生活，仿佛这纲领没有一点与劳动大众的利益不一致。在这些将领后面必然爬着一帮卑躬屈膝的走狗，他们不仅同人民，并且同自己的党也没有一处共同点。于是，产生了一个寄生虫阶层，他们靠劳动人民生活，所操心的却是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是那些能给他们无忧无虑生活的人的利益。

无论怎样的政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独裁者，因为它不具有哪怕一点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将有的是计划性的、策略性的条条框框，它不是生活所要求的，而是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创造出来的。

劳动人民常处于生活的熔炉中，自然而然胜过那些党的自作聪明的人制定的全部脱离实际的策略。所以任何一个党都没有无论是

法律的，还是道德的其他任何权力操纵人民，劳动人民通过生活观察和学习而得来的真理可以断定，哪种体制可以给他们完整的自由。为了让自己的存在有意义，党应该只为自己留下两个角色——领导者和“教育者”，而将国家的领导权交给劳动人民。否则就是死抱住政权不放，就像共产党员做过的那样。

当政权里不仅一个党，而是几个党的时候，事情将变得更糟，各党派都为在掌权中占据优势而处心积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和关心劳动人民。

而到那时，官僚之间的斗争就像有毒的蘑菇一样生长起来，他们的座右铭：“一切为了自己，不是为人民。”但劳动者无论怎样努力学会忍耐，无论怎样闭上嘴巴，都不会让自己受命于专政者——共产党，他们要摆脱奴役，自己夺取政权，建立自由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劳动者自己本身就是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革命政党可以给他们一个哪怕是工农用自己痛苦的长久忍耐和挣扎也应换得的社会主义王国，而他们为摆脱压迫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将达到这一王国。

这就是为什么在红色喀琅施塔得起义者的旗帜上写下了这样的口号：“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

№04957

加里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发给各省委员会和各省执委会的电报

（1921年3月16日）

各省委员会和各省执委会：

鉴于新一轮反革命运动的加剧，为了及时获得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信息，决定通过全俄肃反委员会机关建立一系列相互传递信息的场所和中心，为此必须：第一，加强你们情报部门的工作，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特别要注意省肃反委员会的机关，必须在省委员会和省执委会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得到加强。

第二，得到的全部信息材料集中送往省肃反委员会，委员会编写关于全省状况的每日情报报告。

第三，省肃反委员会应按全俄肃反委员会建立的秩序向后者通报信息。

第四，全俄肃反委员会向地方分别派送关于共和国全部省份政治状况的各种报告。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上述情报给地方以适时辨清其他省份形势的可能性，并且以此预先采取及时措施防止大规模事件爆发。

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　加里宁

俄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克列斯廷斯基

№04962

南方军队集群司令的命令摘要

（1921 年 3 月 17 日）

我宣布，奥拉宁包姆城所有自愿投降的人，无论是水兵，还是其他反对者，如果他们立即自愿放下武器，我们将保障他们的生命。

南方军队集群司令　谢佳金

军事委员　K. 伏罗希罗夫

参谋长　马林诺夫斯基

№04963

图哈切夫斯基给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

（1921年3月17日）

彼得格勒，1921年3月17日4时50分

北方军队集群、南方军队集群司令，仅限司令员听令

我命令，应果断地扩大第一次强攻的战果，为此：第一，北方军队集群司令应暂时限于消极反对托特列边和克拉斯诺阿尔梅伊斯基要塞的行动，重点打击喀琅施塔得城的西北部以协助南方军队集群。第二，南方军队集群司令今天应最终占领城市，并在其中实行铁的纪律。占领城市后用快速打击控制科特林岛和里夫炮台的其他部队。第三，在协同下充分利用炮兵部队进行城市中的巷战。第四，炮监应下令不晚于明天用窒息性气体和有毒气体的炸弹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和“塞瓦斯托波尔”发起进攻。第五，军队集群司令应调整好从陆地到岛上可靠的交通，并保证在岛上自己部队几天的炮弹和粮食供应。第六，炮监应下令准备对托特列边和克拉斯诺阿尔梅伊斯基要塞（康斯坦京和米柳京的大陆部分），被占领的要塞和托特列边岛发起炮火攻击。第七，要表现出最大的力量，速度和坚定。第八，得到此命令的时间编号为0558号。

第七集团军司令　图哈切夫斯基

第七集团军参谋长　佩列梅托夫

№04968

南方军队集群参谋部的报告

（1921 年 3 月 18 日）

№056 /ОП，奥拉宁包姆
1921 年 3 月 18 日 8 时 40 分

整个喀琅施塔得被英勇的红军占领了。兵变者决定破坏“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但海军予以反对，不允许这形同犯罪的行为发生。战列舰舰队向我方派来了军使，要求投降，谈判正在进行。兵变者革命委员会已逃往芬兰。

军队集群参谋长　马林诺夫斯基
军事委员　巴克拉奇

№04972

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命令

（1921年3月18日）

1

即日起我开始履行城市卫戍司令的职责。

2

即日起城市进入军事状态，只允许晚上11点以前在街上走动。

3

通往卫戍司令部的苏维埃街允许通行。

4

命令城市全体公民和区委在本命令公布之时起的24小时之内交出全部武器。

5

命令全体公民保持绝对安静、冷静，交出所有可疑的人以及协

约国的所有间谍。

6

任命……[1] 同志为我的副手。

7

违抗此命令的犯人将按战时法律追究责任。

城市卫戍司令　彼得罗夫

[1] 此处姓名无法辨认。

№04973

图哈切夫斯基向北方军队集群、南方军队集群发出的命令

（1921年3月19日）

仅供军队集群司令阅读，复印件给总司令。

彼得格勒

1921年3月19日0时45分

由于已完全消灭了喀琅施塔得城和喀琅施塔得要塞的兵变者，我命令：第一，联合要塞防御的各方面力量，由要塞司令控制，北方军队集群和南方军队集群在他的命令下行动。第二，南方军队集群司令谢佳金同志被任命为代理要塞司令。第三，谢佳金同志在已无需要之时返回彼得格勒11师总部。第四，谢佳金同志应在今天24小时之内开始履行要塞司令的职责，同所有部队建立牢固的联系。第五，应汇报完成情况。

第七集团军司令　图哈切夫斯基

参谋长　佩列梅托夫

№04911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
致芬兰卡累利阿战区司令的报告

（1921 年 3 月 19 日）

进入了芬兰共和国的领土，我们觉得有必要向您——芬兰共和国的首席代表汇报一下我们不得不做出上述行为（越过边界）的动机。

由于俄国共产党掌握的政权确立了这样的选举代议机关的制度（苏维埃），因而在俄国也就确立了共产党人的血腥专政，使得国家已完全破产，精神和政治的压迫之烈，以致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生活下去成为不可能。尽管恐怖在加剧，但人民的不满才开始表现出来，除了外省，首先在有血腥镇压的彼得格勒表现出来，然后是在喀琅施塔得。

在今年 3 月 1 日召开的由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主持的共产党员召集的喀琅施塔得全体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决议的附议，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曾被挑拨离间的方法所破坏的自由选举新的苏维埃的权力。

考虑到当时的形势，由喀琅施塔得的全部当选人再选举组成了临时革命委员会，从今年 3 月 2 日起全部政权实际已转到该委员会手中。

委员会企图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好当前事件的全部努力，比如通过谈判，都无功而返，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政权。尽管通过无线电电话同彼得格勒认真地谈判着，但出于掌握政权这一目

的，按托洛茨基的命令飞机撒下了大量传单，要我们无条件地服从于旧政权。

临时革命委员会让所有居民和驻防部队了解了最后通牒的内容，在得到他们同意后决定：不屈从于托洛茨基的命令。担心政府会采取军事围剿性措施，要塞用设立警卫和隔绝共产党员的行动来保证安全。

3月7日谢斯特罗列茨克和利西诺斯的炮台向城市和要塞开火，使得驻防部队不得不用自己的炮与之相对抗，我们尽量不给建筑物造成破和不伤到居民，这就给托洛茨基以机会集中兵力进行关键性的一次攻击。

3月8日深夜，被挑选出来的共产党部队和学员兵（指挥人员学校学员）开始了对科特林岛的攻击，但被驻防部队击退。对城市的炮火攻击和飞机轰炸日夜不停。

尽管有共产党员挑拨性的宣传，把喀琅施塔得事件说成是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领导的一小撮军官的阴谋，并有对俘虏审讯获得的口供为证，但面对刚从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维捷布斯克省赶来的增援师，他们身着配有肩章和勋章的旧军服，好像是被俘虏的喀琅施塔得驻防部队军官，岸上的部队拒绝进攻喀琅施塔得，结果在一些团开始了枪决，比如明斯基团、奥尔尚斯基团和涅维利斯基团，这些团的某些连每五人中就有一人被枪决。

3月17日深夜，在经过对城市和要塞猛烈的、无人道的轰炸后，要塞又被可观的军事力量攻击。尽管在进攻的时候潜伏下来的行动自由的共产党员用手枪和机关枪向建筑物和军队射击造成了惊慌，但在驻防部队以及居民的努力下，3月17日早上10时，除城里东端一块较小的区域外的整个岛曾击退了敌人的围攻。好在就在这天深夜，我方夺回了北方航道第二线除1号要塞的所有要塞及南方1、2号要塞，但丢掉了18门三英寸口径的炮，这些炮在步兵数

量不足的情况下是击退攻击的基础。

注意：

1）缺乏粮食，又不能提供粮食，驻防部队因有大量俘虏问题更为严重。

2）驻防部队步兵数量少，连续15天的战斗和劳动使他们疲惫不堪，在绝对不可替换的情况下，有三支部队缺乏皮靴。

3）炮过度射击，炮身受到损坏，缺乏炮弹，特别是速射弹。

4）由于共产党政权严厉的惩罚得不到外来支持。

5）在这样的进攻中不可能守住要塞：缺乏指挥人员、各军种的专家，在潜伏下来可以自由行动的共产党员的蓄意破坏下，通讯中断。鉴于完全没有可能性和继续对抗毫无意义，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退却，以避免公民、居民不必要的流血和牺牲。

托洛茨基的传单、最近三年共产党政府的言行就是对被占领城市的居民的枪决和侮辱。临时革命委员会同军事专家们讨论了形势，专家们从行动一开始就提供了自己的帮助，考虑到不能向共产党员交出要塞，由他们独断专行，委员会决定退到中立地区。

报告上述内容，是请您向芬兰共和国政府提出申请，请按照享有交战国拘留者的权利接纳我们。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佩特里琴科

秘书　Э. 基利加斯特

喀琅施塔得要塞防卫司令　索洛维亚诺夫

总参谋部参谋长　Б. 阿尔卡尼科夫

1921年3月19日

№04979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电报

（1921年3月20日）

呈政治局

复印件送中央委员会组织部

复印件送斯克良斯基同志

首先必须坚决地恢复波罗的海舰队共产党领导成员小组。无论是库济明同志，还是博季斯同志都因舰队中发生了他们不曾预料到的事件而完全损害了名誉，随后他们又被捕，不能在波罗的海舰队履行职责。

请提出合适的人选，尽可能地从完全没有卷入波罗的海舰队内部斗争并表现出具有对党的坚定信仰的工作人员中挑选。

1921年3月20日

托洛茨基

№04981

关于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重新登记的报道

（1921 年 3 月 20 日）

喀琅施塔得，3 月 18 日。鉴于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被逮捕的共产党员的党证已被兵变者缴走，彼得格勒委员会现通告彼得格勒以及其他城市的全部组织，喀琅施塔得组织已经被破坏，将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建议所有党的委员会暂时拘留所有出示喀琅施塔得组织党证的人并向俄共彼得格勒省委员会查询他们。

［俄罗斯通讯社］

№04897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
向工人、红军和水兵发出的呼吁

（1921年3月）

我们，喀琅施塔得人，早在3月2日就摆脱了共产党员万恶的压制，并举起了第三次劳动者革命的红色旗帜。

红军、水兵和工人们，革命的喀琅施塔得向你们发出号召。

我们知道，你们感到迷惑，他们没有讲发生在我们这儿的实情，在这里我们都准备为解放工农的崇高事业献出生命。

所有的人都在努力去相信，我们这里有白军将领和神甫。

为了永远结束这一切，我们向你们通报，临时革命委员会是由以下十五个成员组成的：1）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过去的文书。

2）雅科文科——通讯部喀琅施塔得区域的话务员。

3）奥索索夫——“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机械操作员。

4）阿尔希波夫——机械操纵海军军士。

5）佩列佩尔金——“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

6）佩特鲁舍夫——“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海军军士、机电工兵。

7）古巴洛夫——主任医师助手。

8）维尔希宁——“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战士。

9）图金——电机厂工人。

10）罗曼年科——抢险船坞主任。

11）奥列申——第三劳动学校主任。

12）瓦利克——锯木厂工匠。

13）巴甫洛夫——水雷厂工人。

14）拜科夫——要塞建设处车队主任。

15）基利加斯特——远洋航行领航员。

这是我们的将军：布鲁西洛夫，卡梅涅夫等。

而宪兵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向你们掩盖了真相。

同志们！仔细看看，他们对你们做了些什么，他们正在对你们的妻子、兄弟和孩子做些什么。难道你们准备忍耐，在暴虐者的压迫下死去吗？打倒委员专制！

共产党夺取了政权，答应我们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幸福。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三年前他们对我们说："如果愿意，可以撤回代表，可以改选苏维埃"。

而当我们喀琅施塔得人要求改选苏维埃，摆脱党的压制获得自由的时候，胡说八道的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弹"。

红军战士，你们看见，共产党员是怎样珍惜你们的生命的。你们赤裸着双手，被派去渡海湾，夺取革命的劳动堡垒——红色喀琅施塔得，被派去夺取用十二英寸炮也击不破的坚不可摧的要塞和舰队。

这是何等的出卖啊！

我们要求派彼得格勒劳动者代表团来，以让你们能够相信，我们有怎样的将领，是谁在我们这里发号施令。但是没有人派代表团。共产党员害怕代表团了解到，并且告知真相，他们在发抖，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基在动摇。

但钟声已经敲响。拿开吧！沾有我兄弟和父亲鲜血的肮脏的手。劳动人民争取自由的精神是十分有力的。他们不会让自己再次

受役于残酷的剥削者——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正在吸干痛苦不堪的无产阶级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劳动者，难道你当初推翻沙皇制度，抛弃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反动政策，仅仅是为了受制于以托洛茨基为元帅的马柳特·斯库拉托维禁卫军[①] 吗？

不！一千次不！

长满双茧的双手感到很沉重，因为没有顶得住暴虐者的进攻，他们为攫取政权已经毁灭了数百万劳动者的生命。

然后就是共产党人令人深恶痛绝的压制。

滚开吧！党的专制！

工农政权万岁！

自由选举的苏维埃万岁！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

① 对红军的蔑称。

№04851

喀琅施塔得要求释放人质

（1921 年 3 月）

发往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无线电广播内容如下：

以喀琅施塔得驻防军的名义，临时革命委员会要求在 24 小时以内释放被彼得格勒苏维埃作为人质逮捕的工人、红军和水兵的所有家人。

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告知，喀琅施塔得的共产党员享有完全的自由，而他们的家人也绝对不受侵犯，驻防军并不想以彼得格勒苏维埃为榜样，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处于极端的仇恨中，这样的逮捕在所有的态度中也是最为无耻和卑鄙的。

这样的逮捕旷世未见。

水兵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　佩特里琴科

秘书　基利加斯特

№04898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铁路职工发出的呼吁

（1921年3月）

铁路工人弟兄们！

审判的日子来到了。为反对暴君、暴徒和投机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举起了自由的旗帜。我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身于自由，献身于伟大的俄罗斯工人和农民的幸福。

我们已经看了三年暴君和投机者们的猖狂，看了三年俄罗斯人民的饥饿、寒冷、大量死亡和被驱逐。我们农村的父辈们三年来给暴君们流汗，我们三年在前线牺牲，是该对暴君们说“够了”的时候了。让我们的死亡给人民带来自由。我们决心赴死。但是铁路工人兄弟们，如果你们不支持我们，那么我们的血将落在你们的头上，你们直到死都将听到被奴役的俄罗斯人民的诅咒。你们在奴隶般地死去时，将后悔自己的犹豫不决。支持我们吧，只有铁路员工们能够拯救俄罗斯人民。

我们请求你们支持向苏维埃提出的微薄要求。

1）选举权对所有人、农民和工人是平等的。

2）不记名投票要让选举人依自愿而不是受强迫来选举，这样坏蛋才不会进苏维埃。

3）为了使国家不能任意让工人们挨饿，通过自由的合作社解

放吃饭的权利。[①]

5）言论和宣传自由，使每一个诚实的工人都能够无所顾虑地讲真话。

6）集会自由。

7）废除死刑，这一暴君们卑鄙的制度。

8）关闭所有的契卡，只留下刑事警察局和法院。

9）取缔共产党人的所有特权。

10）有从一个机关转入另一机关工作的自由。

11）军队的复员是农村的需要，阻碍复员会造成播种面积不足及各城市的全面饥饿。

12）解散劳动军，它是对劳动的工人和农民的新型奴役。

13）所有公民有乘火车和轮船的自由。

14）工人们有权与农民进行直接的商品交换，撤销阻击队，这些新的铁路强盗。

15）工人合作社自由购买国外货物，以避开用工人的汗水发数万万财的政府投机商们的中介。

16）为此应以黄金支付给工人们工资，而不是废纸币。

17）撤销政治部门，这些暴君们的特务组织。

18）立即以不记名投票重选所有的苏维埃和政府，使俄罗斯工人和农民能有自己的政权。

我们的请求是微薄的，我们想得到比 1917 年少的自由。为此我们准备献身。但我们希望我们的牺牲不会白费，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战斗中牺牲还是被契卡在地下室中枪杀，我们都会诅咒你们。

支持我们的请求吧。暂停旅客和军用运输，你们将看到，暴君

① 原文无 4）。

们，这些胆怯的败类，同沙皇将军们镇压工人如出一辙的人，将蹈走，使被折磨的人民得到安宁。

齐心协力，无所畏惧，在所有的车站、交通点上组织起秘密的革命的三人小组，同各工厂建立起联系，像一堵墙般地齐心站起，那么所有的冒名的小沙皇就会像教堂里的耗子一样跑掉。

我们已派出水兵们去联系，但暴君们有许多收买投靠的坏蛋，我们的代表可能会在还没与你们联系上时就会牺牲。因此请珍惜每一个新的号召书吧，你们自己来散发，齐心勇敢地行动吧。

为我们和我们的父兄们的自由和幸福前进，为我们和整个遭受痛苦的祖国的孩子们的未来前进。

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

№04956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专门处对芬兰湾南方战区的居民发出的呼吁

（1921 年 3 月）

公民们！

因为喀琅施塔得兵变者的罪行，芬兰湾南部沿岸地区成为了战场。

反革命分子、叛徒、变节者和间谍企图削弱被号召起来消灭喀琅施塔得白卫军阴谋的红色部队的士气。

他们在红军和居民中散布谣言，散布恐慌、谎言、诽谤，进行反革命宣传。

在公开的战斗中软弱的兵变者企图从内部削弱我们。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专门处警告所有被发现参与间谍活动，探听军队的部署和数量，散布谣言和恐慌，进行诽谤，进行反革命宣传的人员，将按革命法律进行严厉处罚。对他们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

隐瞒上述分子的任何消息，甚至窝藏他们本人将被作为白卫军的直接协同者而受到审查。

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们，警惕叛变者、变节者和奸细，请尽快把他们全部转交给工农政权。

谁要是妨碍红军执行他们的革命义务，谁将受到严厉的惩治。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专门处

№04987

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关于叛乱调查结果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

（1921年4月5日）

在起义的喀琅施塔得被攻陷后大部分叛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整个要塞司令部和大部分起义的积极参加者都逃到了芬兰。这样，就侦察不到最重要的活动家的活动。

侦察材料和对一些被捕的兵变积极参与者的单独审讯表明了以下一幅喀琅施塔得武装起义爆发、发展过程以及发生原因的画面。

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和工人发动的反革命起义（今年3月1日至3月7日）是今年2月下旬彼得格勒一些工厂突然爆发的骚动和罢工的直接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集中于彼得格勒工厂的绝大部分工人，被征召参加义务劳动的行列，随后在今年2月初由于原料危机大部分刚刚开工的工厂突然宣布关闭，这引起较为落后的彼得堡工人的不满和愤恨。被征召来劳动的人从农村给工人们带来了小私有者的具有腐蚀性的情绪，他们已经被余粮征集、禁止自由贸易和阻击队的行动搞得快发疯了。

随后在2月中旬缩减粮食定额使得部分彼得格勒工人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直接一下子表现出来，并引起一系列工厂罢工：波罗的海厂、特鲁博奇厂、拉费尔姆厂等等。这一骚动最基本的原因之一是代表大会前关于俄共队伍的激烈讨论，党内团结的削弱以及很大一部分党员纪律性的丧失。罢工的工人不仅要求提高粮食份额和取消阻击队，更多的落后工人甚至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但总的来说，

运动是在取消共产党专政和建立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号召下进行的。如果说彼得格勒发生的骚动没有组织性，并且没有发展为大的骚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及时而迅速地消灭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右翼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彼得格勒的组织，这样就使骚动很快地失去了组织领导。

类似的情况和情绪在喀琅施塔得兵变前夕也同样存在。存在于饿坏了的工人群众中的神经紧张不断地恶化了现存的条件。对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审讯表明，海军和红军中不满的氛围几乎同农民一样十分紧张，不可抑制的不满主要由于从家乡农村传来的消息而积累起来，这些人没有同农村失去联系，农村常常给他们捎来关于农村经济危机、地方政权滥用权力、征集的沉重等等消息。

集中于喀琅施塔得不大范围内的士兵，总的来说是不尽职的，在集体军营生活的条件下很快地酝酿起一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十分敌视的情绪。

喀琅施塔得共产党组织由于有不受约束的水兵和成员政治水平不高而开始瓦解，甚至早在起义前已开始迅速瓦解，激烈的争论更是使当前共产党队伍中的基本问题变得严重。

在现有条件下把整体组织分到各军队集中的地方和意见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组织的分裂。普通党员的政治觉悟比非党员的水兵、工人的政治觉悟并未高出许多，后者向党员灌输那些思想分歧，这破坏了共产党组织，并进一步促进了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群众从共产党中脱离出来，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全面崩溃的罪魁祸首。

但这些大众的消极情绪是由于彼得格勒突然爆发的骚动而受到了剧烈的震动，他们失去了本已有些不稳的镇定状态。广大海军骚动起来。在随后的形势突然急转直下的情况下，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的领导、波罗的海舰队和喀琅施塔得要塞政委从未有过的惊慌起

了很大作用。即使喀琅施塔得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迅速退出共产党，并且手持武器在兵变者一方作战，担任职位的共产党员也不应该因为不了解骚动的意义和目标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去驱散充满火药味的气氛，而且尽管是无意识但直接促使了起义的爆发，有人甚至允许在海军如此激动不安的情况下号召召开海军队伍全体大会，并协助从喀琅施塔得派遣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起义的工厂。

如果兵变的军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的政委们在俄共大部分党员都还在的时候迅速采取果断措施，不允许召开会议，控制通讯部门，想到用团结的共产党员的集体力量去对抗虽然激动，但无组织的群众，骚动是会得到控制的，并从一开始就会被消灭。但恰恰是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更谈不上付诸实施。

软弱无力的党组织发展下去，就渐渐溶解于它周围充满着不满情绪的群众中了。

起义总的过程如下：当彼得格勒发生罢工的消息传到喀琅施塔得后，广大海军骚动不安起来。这表现在纪律的迅速丧失，海军们在公开的交谈中尖刻地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并表示对起义工人的同情。

今年2月25日，巨型战列舰支队政委佐西莫夫同志允许召开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全体大会根据政委奇斯佳科夫的建议决定派遣由五名水兵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以查明彼得格勒工厂骚动原因以及工人提出的要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选出了由七名水兵组成的代表团。代表的准确姓名除一名叫萨夫琴科的之外均不得而知，他无党籍，是古斯塔纳县农民出身的文盲水兵。在该舰上，作为最后一次水兵大会，选出了上述一批候选人。抵达彼得格勒后，代表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深入到罢工的工厂中，既同个别工人交谈，也同工人团体交谈。这样，代表们片面地

了解了彼得格勒的形势，无疑地感染了罢工工人们的情绪，尽管一些反动的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仍使他们感到不安，这些口号在一部分工厂取得了成功，比如：召开立宪会议，要求给予所有政党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些走得太远的口号均出现在海军中。今年2月27日代表们返回自己的舰队并向舰队全体大会作了报告，报告了波罗的海厂、特鲁博奇厂、停泊在涅瓦河上的“甘古特”号和“波尔塔瓦”号战列舰发生骚动的原因，彼得格勒的形势被他们描绘得十分郁闷。他们还报告了罢工工人大批被抓的情况并且宣读了波罗的海厂工人的反革命决议。由于这些向舰队大会作的报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全体成员于2月28日通过了著名的决议，共13点，由7～8名水兵组成的小组撰写而成。该小组包括佩特里琴科——“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文书，韦伊尔-金捷尔·杨·扬诺维奇——“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枪炮电工兵，后来成为该舰的舰艇委员会委员。其他人的姓名暂时没有查明。这份决议最初仅仅是在原则上通过，最后的校订交给了该委员会。就在2月28日那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最后通过了这项决议，之后是“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通过，并且已查明大部分党员对这项决议表示赞成。仅仅是少部分党员反对通过决议。3月1日，有第二战列舰支队代表参加的战列舰支队全体大会通过了这项决议。在这次大会上，对该决议补充了第14、15点。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参加了这次舰艇支队大会。几乎所有的这种大会都有共产党员参加。舰艇支队大会的主席是佩特里琴科。3月1日，这项决议提交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全体大会审议，这次会议在雅科尔广场举行，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波罗的海舰队政委库济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喀琅施塔得委员会主席瓦西里耶夫同志是这次大会的主席。在大会上无政府主义者舒斯托夫发表了演讲，他是“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的司炉，在兵变期间担

任侦察拘留所所长，佩特里琴科也发表了演讲。后者提出的上述议案获得驻防军多数通过。同天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上从水兵中选举了舰艇委员会以维持舰艇秩序。这些委员会取代了政委权力。“塞瓦斯托波尔”号选出的舰艇委员会有9人，其中有：科罗夫金，过去的共产党员，1920年秋天重新登记后退党，佩列佩尔金和奥索索夫，他们后来成为兵变的革命委员会成员。科罗夫金被选为“塞瓦斯托波尔”号舰艇委员会主席。舰艇上的通讯部门和警戒卫队由舰艇委员会控制。3月1日晚上举行了舰艇委员会会议，停泊在彼得格勒涅瓦河上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舰队会议根据担任会议主席的舰队政委的建议解决了派遣代表团参加喀琅施塔得无党派舰队大会的问题。公民坦－法比安·格奥尔基·弗兰采耶夫是代表之一，他在被捕后声称自己同情右翼社会革命党。

在上面提到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晚间会议后部分代表决定留在喀琅施塔得，晚些时候同喀琅施塔得代表团一起去彼得格勒，另一部分人于3月2日返回彼得格勒，在那里的“特鲁沃尔”号和“奥戈利”号由于坦－法比安的报告全体通过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而反对决议的只有几个人。

在3月1日晚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那次会议上还提议逮捕加里宁同志并把他作为人质，但大部分与会者反对这项决议，之后从喀琅施塔得放走了加里宁同志。

3月2日，根据上面提到的舰队会议的决定，确定召开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工人的无党派代表会议，改选代表苏维埃。选举前的大多数会议由共产党员主持。由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场地拥挤，会议挪到了“教育楼”举行。佩特里琴科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库济明同志和瓦西里耶夫同志根据该会议决定被捕。然后，在

会议上突然有谣言传播开来，说军事院校学员兵队伍将要带着机枪开进召开代表大会的地方，意图是逮捕所有与会者。会场慌作一团。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会议选举了有5人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他们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奥索索夫、图金和奥列申。革命委员会被赋予喀琅施塔得政权的全权，并受委托将驻防军会议通过的决议付诸实施，如有必要，用武力实现这项决议。以后的代表大会被确定于3月4日召开，之后，会议很快就解散了。“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被选为革命委员会的驻地。3月2日整整一天“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最积极的水兵——佩列佩尔金、韦尔希宁等跑到各要塞和红军部队，号召响应革命委员会政权，去消灭政委。3月2日晚上，大多数要塞和要塞的全体红军决定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联合。通讯部门所有的机关都被革命委员会的警戒队占领。革命委员会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了几个号召，其中阐明了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通过审讯被捕的兵变参加者可以知道，起初无论是革命委员会还是推举它的群众都相信喀琅施塔得是不会被攻破的，并且相信，工农政府是不愿走向流血的，是会被迫让步的。

3月2日晚上在奥拉宁包姆召开了第一舰艇大队全体会议，大队长科列索夫（已被捕）主持了会议。在几个人反对的情况下会议通过了喀琅施塔得的决议并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以取得信息和联系。深夜，“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上有人建议科列索夫占领车站和粮库。对于科列索夫因其所辖武力不足希望从喀琅施塔得获得武力援助的要求，“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向科列索夫许诺会派海军队伍来。舰艇大队司令部加强了自己的警戒，可见，它是预备给起义实际帮助的，但就在那天晚上司令部被军事院校的学员兵所包围，全体成员被捕。

3月3日大量俄共党员和预备党员的退党声明开始寄往革命委

员会。在共产党组织如此迅速的瓦解中，刊登于《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上的所谓俄共喀琅施塔得组织临时局的号召起了很大的作用，该号召由俄共党员伊利因（粮食部人民委员）、佩尔武申（劳动部人民委员）和卡巴诺夫（工会委员会主席）签署。号召中说，没有任何武力可以强迫共产党员，全体共产党员应响应号召留守自己的岗位以把著名的决议付诸实施。在兵变期间革命委员会和编辑部大约收到了800～900封退出俄共的声明。绝大部分声明是1919～1920年加入俄共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发出的。这种从共产党大规模的逃跑是对俄共及其领袖厚颜无耻的侮辱和威胁，它还使得非理智的大众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将不可避免地破产。

3月4日，在有202人参加的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工人代表大会上，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补选了10名革命委员会成员，因为老成员的工作过于繁忙。这样，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确定为以下15名：阿尔希波夫、巴拜科夫、瓦利克、韦尔希宁、基利加斯特、古巴洛夫、奥列申、奥索索夫、帕夫洛夫、佩特鲁舍夫、佩列佩尔金、佩特里琴科、罗曼年科、图金和雅科文科。佩特里琴科被选举为委员会主席，雅科文科和阿尔希波夫任主席助理；基利加斯特任秘书（他曾负责情报）；瓦利克和罗曼年科负责公民事务；巴拜科夫负责交通工具；帕夫洛夫领导侦察部队；图金负责粮食部门。编辑部成员包括：奥列申、基利加斯特和佩特里琴科。

大部分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党籍归属没有查明，因为革命委员会成员作为兵变的参加者，在无党派这个幌子下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自己的党籍特征。起义的领导者料到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大众一般什么党都反对的自然反应，所以每走一步都标明自己无党籍的身份，并推荐无党派人士担任重要职位等等。但通过侦察，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运动领导者的党籍归属。是这样的，瓦利克·弗拉季斯拉夫·安东诺维奇，根据他自己的交代，他从1917年起就是俄国社会民

主党（孟什维克）党员，是地下工作人员，1917 年起就成为喀琅施塔得执委会成员；罗曼年科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参见洛马诺夫的供状）；奥列申，劳动学校教师，是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佩特里琴科，依我看是右派社会革命党成员。所有不利于佩特里琴科的供状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的技术指导是积极的社会革命党成员、极端主义者洛马诺夫·安纳托利·尼古拉耶维奇，此人于 1917 年曾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主席。这份报纸最重要的工作人员是普季林，几乎所有重要的文章都出自他之手，是人民社会主义党党员。领导喀琅施塔得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扎哈洛夫，在担任该职务期间直到起义前是孟什维克成员。除佩特里琴科、基利加斯特（远洋航海长）和奥列申，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都为水手和工人。

在上面提到的代表大会上，佩特里琴科在自己关于国内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强调要塞和舰队、驻防军要作好充分的准备。会议一致决定武装全体喀琅施塔得工人并委托他们进行城市的内部防御，会议还决定在三天内改选工会和苏维埃的管理委员会。

3 月 4 日，革命委员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三人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分别是佩特里琴科、雅科文科和奥索索夫，他们被委托与要塞司令部商量，制定总的行动计划。

3 月 5 日，军事三人小组向军事委员会报告，已同司令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司令部的专家愿意从各方面向革命委员会提供帮助和知识，司令部同意保持密切的接触并在军事三人小组的监督下工作。

3 月 6 日，要塞和革命委员会司令部命令所有部队领导人、队伍指挥、要塞和舰队指挥人员前往要塞司令部。原来的要塞卫戍司令科兹诺列克没有参与随后的行动。聚集在要塞司令部的有要塞参谋长、前沙俄中校索洛维亚诺夫，要塞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阿尔卡尼

科夫，炮兵司令、前沙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空军司令、通讯指挥营长、大型战列舰支队队长、前沙俄海军少将德米特里耶夫，“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长卡尔宾斯基，“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长赫里斯托福洛夫，海岸部主任、校官济列诺伊，港口负责人叶尔马科夫，海军、陆军部队的代表，军事三人小组成员佩特里琴科、奥索索夫、雅科文科及其他指挥人员代表。索洛维亚诺夫和阿尔卡尼科夫要求来宾通报他们每个队伍的人数，并开始把他们分到各战区和要塞。司令部建议坚持进攻的战术，并打算为打击苏维埃部队采取行动，但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因为该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仅限于防卫要塞，所以反对采取进攻的计划，司令部的建议遭到反对。之后，司令部通过了防御性的计划，包括在海湾的整个海岸线上部署除“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舰队以外的步兵和水兵部队，因为这两艘军舰的军队需留在军舰上。在靠近彼得格勒门户的港湾区域应部署560步兵团；其余的海岸线被分为三个区域，为海军舰队占领，在叶戈罗夫港南岸部署工人护卫队（队长佩尔斯涅夫），在北岸部署主鱼雷水兵以及舰艇部队汇编队（队长沃扎涅先斯基）。其余的岸上部队有：学员鱼雷手队、机械学校队、枪炮电工兵队、海军专家连以较小的军队集群被划到各要塞，以加强要塞驻防军力量。海军部队以及被派到海岸线区域的560团的总人数达3000人，而有将近2000人的海军部队被派往各要塞。然后，在索洛维亚诺夫的主持下要塞指挥人员讨论了关于炮台、军舰射击的问题和进攻北岸，占领利西诺斯、谢斯特罗列茨克的方案。这个方案本准备由560团和工人护卫队中的2000人实施，但由于如果这样要塞留下的战士将会太少，不足以防卫海湾的安全，这个方案后来被推翻了。总的来说，全体指挥人员留守原来的岗位。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作为炮兵司令对参谋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由于革命委员会的粮食储备有限，后来司令部决定每天供给要塞占

领者1/2磅面包代用品和1/2听罐头，成年居民每天可获得1磅燕麦，而儿童每天只可获得1/2磅大麦或小麦。3月7日，防卫司令索洛维亚诺夫向集中的指挥人员代表通报，以这样的配额可保证驻防军和城市在今年3月31日前的粮食供应。

战列舰的燃料状况是这样的：临近3月1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有大约用到3月10日至12日的液体、固体燃料储备，3月7日至8日，战列舰大队队长德米特里耶夫在港口破冰工人的帮助下给两艘军舰弄到了一驳船的液体燃料，这样，“塞瓦斯托波尔”号的燃料储备还能维持大约18天，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则可维持大约14天。后来证明，总的来说，绝大部分指挥人员是自愿参加兵变，没有受到来自革命委员会的一丁点压力。个别军事专家的动摇和些许忧虑说明他们对战斗尽快结束没有信心，他们的家人住在国家大陆上，他们有理由为家人的命运担心。司令部表现出的狂热行动，多少让那些习惯于看到早先呆板消沉的司令部的人感到震惊。根据司令部的命令，上述的指挥人员代表必须每天在司令部集中，但已不邀请部队代表。索洛维亚诺夫向与会者通报过去一天里全部的军事消息，佩特里琴科则通报政治形势和驻防军的情绪。然后，陆军军事专家讨论军事问题，主要集中于组织射击，炮火和步兵部队行动的协调，打退进攻的方法以及其他的军事问题，总的来说集中于防卫问题。

在这样的一次指挥人员会议上，佩特里琴科说，部队，特别是舰队在催促革命委员会采取进攻及其他积极措施方面施加给委员会很大的压力。索洛维亚诺夫对他说，以部署在要塞的力量，是不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的，所以必须授意部队，让他们耐心等待并承受被包围的压力。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兵变要塞总的管理情况如下：最高政权集中于革命委员会，它完全掌握了政治权力；军事权力集中于防卫司

令部，成员包括：防卫司令索洛维亚诺夫和参谋长阿尔卡尼科夫。关于步兵行动、开火、停火的命令都是由这个司令部发出的。控制火力，修正射击，是由炮兵部队司令科兹洛夫斯基和他的助手布尔克谢尔对炮兵部队的控制来实现的。他们还控制着舰队炮火。要塞工事防御司令由H.A.尼基京担任。当军事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政治问题或同它有联系时，防卫司令会同革命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商量，而革命委员会主席一般会服从防卫司令的决定，不反对他采取的军事措施。索洛维亚诺夫和阿尔卡尼科夫一般独立行事，这样，有一次他们甚至与旧俄将军科兹洛夫斯基发生了冲突，他们根据防卫要求命令解除科兹洛夫斯基对火力的控制。他们是根据营长们的报告作出这样的决定的。营长们发现，科兹洛夫斯基行事太呆板，太犹豫。但到第二天，这一命令因为佩特里琴科的坚持而被撤消。成立了附属于步兵部队领导人的革命三人小组，其职责是监督指挥人员的行动，鼓舞部队士气。如果说运动一开始是水兵和工人群众自发的起义，那么从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天起，特别是要塞司令部开始掌握军事工作，起义就具有了计划性，并且开始有前沙俄将领有经验的领导。但侦察材料无法确定，在兵变发生以前，反革命组织在要塞指挥人员中做过什么工作，也未发现协约国间谍的活动。运动的整个过程都说明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兵变是由某个在它发生之前就存在的秘密组织发起的，那么这个组织无论如何不会把它安排在那个时候，剩下的燃料、粮食储备仅够两周用，而且在冰面解冻之前也有太长的时间可以安排。但要塞高层指挥人员的团结一致表明，他们互相是非常了解的，正因如此，在起义的过程中战争机器可以很快地把他们组织起来。无法确定要塞司令部的政治立场，因为它总是小心地掩盖这一点，而且司令部的成员都逃到芬兰去了。但3月4日前沙俄中尉卡尔宾斯基向“塞瓦斯托波尔”号发出的命令对指挥人员的隐秘情绪和希望作了些许的说明，此命令也

由舰队委员会主席签署。这个命令尽管只是顺便提到革命委员会政权，但它的撰写却与一般的白卫军传单相符。命令中讲到二月革命的自由，讲到为“多灾多难的、忧愁的、痛苦不堪的俄罗斯”而战，讲到对祖国和俄国人民的义务等等。

指挥人员多少有点相信革命委员会关于彼得格勒急于援助喀琅施塔得的通告，但军事专家觉得最可靠的是他们希望如果起义不成功可退到芬兰。

革命委员会成员党籍归属的不确定性说明了它不具有稳定而明朗的政治。它只是偶尔可以解决问题。革命委员会对留下来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实行的镇压似乎公开反驳了起义者要求和平的情绪。几乎所有的革命委员会记录表明，同留下来没有被捕以及被捕的共产党员作斗争是他们专心致力的目标。最后他们甚至用战地法庭相威胁，不顾他们已经宣布撤消死刑。

3月16日，革命委员会讨论过枪决重要共产党员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提议是由侦察拘留所所长、无政府主义者舒斯托夫提交给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委员会没有采纳他的提议，但给了他在共产党员逃跑或企图枪杀他本人的情况下对他们处以枪决的权力。仅有佩特里琴科和图金同意枪决共产党员。这意味着被捕共产党员的命运实际交予了舒斯托夫掌握。喀琅施塔得很快被攻陷才阻止了舒斯托夫实现自己的罪恶意图。

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是由革命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已被捕）负责的。舰艇委员会给他派去了水兵以前往喀琅施塔得外更远的地方。佩列佩尔金给他们提供文字材料——革命委员会的号召和报纸，水兵必须带着这些材料穿过包围圈前往彼得格勒、奥拉宁包姆、佩捷尔戈弗、加特其纳等等其他区域。但这些人绝大多数被红军部队逮捕。革命委员会在3月13日的会上讨论了委员瓦利克、阿尔希波夫等人醉酒行为的问题。革命委员会对他们仅仅作了警

告，并决定对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加以保密。

革命委员会委托负责各部门的委员要研究形势、部门的管理制度以及自己工作的内容和方向。但没有人可以介绍形势，革命委员会的各部开始迅速走向衰败。革命委员会撤消了工人十字勋章。检查机关和它的职权交给工会委员会。

在兵变的最后时期，瓦利克和罗曼年科（二人都是孟什维克）提出了组建城市管理局的问题，但这个方案没来得及实现。

在《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中除上面提到的人外还有以下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报纸的出版者、该报的技术指导弗拉季米罗夫曾担任情报部主任——“新闻经纪人”（被捕）和公民别洛夫。发往编辑部的文章都出自革命委员会。但所有的材料都经过社会革命党人、极端主义者洛马诺夫修改，他力图使报纸符合社会革命党的精神。佩特里琴科十分关注报纸。没有一期是没经过他预先审查而出版的。佩特里琴科、奥列申、别洛夫曾制止洛马诺夫放入针对立宪会议的文章，他们说明自己的制止理由是希望保持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这说明在某些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内心深处对立宪会议抱有希望，只是暂时没决定公开把它说出来。革命委员会发布了许多明显的假消息，为的是鼓舞兵变者的士气，让他们一直相信各地都在发生起义，彼得格勒人会紧急援助等等。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情况是，彼得格勒国防委员会劳动防卫会议对喀琅施塔得居民发出的号召激怒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号召说协约国间谍和科兹洛夫斯基将军是起义的发动者。而当时广大的群众几乎不知道谁是科兹洛夫斯基。另一方面，群众自己觉悟到这一运动的自发性而更加相信群众自身的力量，他们充满了好战的热情，认为白卫军间谍不可能在他们中间工作。几乎所有的苏维埃政府的号召不经删节都刊登在喀琅施塔得报刊上。

3月9～10日，“塞瓦斯托波尔”号过去的舰长维利肯男爵率

领的美国红十字会委员会抵达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向革命委员会和要塞司令部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药品援助，但同时指出，由于没有得到芬兰政府的许可，这些物资只是偷运过来。革命委员会在没有承担任何政治义务的情况下接受了提供的援助。但革命委员会被捕的委员瓦利克和佩列佩尔金的口供表明，革命委员会十分清楚这些资产阶级的赠与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将来最终要同这些资产阶级妥协。

在3月11日的代表大会上佩特里琴科报告了红十字会的提议，并且向全会强调，革命委员会是在没有任何政治义务的前提下接受这一提议的。会议批准了革命委员会的决定。红十字会的提议还被拿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和“塞瓦斯托波尔”号舰队上讨论，自然，他们赞成革命委员会的决定。之后，维利肯留在了喀琅施塔得，红十字会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返回芬兰。维利肯参观了“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消息报》编辑部成员经常出现在司令部。3月1日，革命委员会向芬兰派去两名委员——奥列申和阿尔希波夫，好像是同芬兰政府谈判允许把粮食运往喀琅施塔得。但革命委员会不知为什么把派遣代表团的事实严加保密。革命委员会从芬兰获得了400普特的粮食。在革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佩特里琴科报告说他们得到了维克多·切尔诺夫[①]的关注，他从雷瓦尔派来了信使。切尔诺夫的建议是，允许他以立宪会议主席的身份到喀琅施塔得，这样可以在为立宪会议斗争的旗帜下同苏维埃政权展开斗争，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领导权都可交给立宪会议。切尔诺夫表示愿意提供武力援助。佩特里琴科说，他已经给了切尔诺夫答

① 维·米·切尔诺夫（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之一。1917年二月革命后曾担任临时政府土地事务部长、立宪会议主席。十月革命后，加入“保卫立宪会议联盟”。1920年流亡国外，并领导社会革命党在国外的代表团。

复，感谢他的支持，但拒绝了他的提议。在革命委员会会议上瓦利克赞成接受切尔诺夫的提议，佩特里琴科和基利加斯特的态度不甚明确，但大部分与会者反对切尔诺夫的提议。革命委员会决定对切尔诺夫的提议和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加以保密。

在革命委员会3月11日的会议上根据佩特里琴科的提议讨论了起义者以后的战术问题，因为被包围的喀琅施塔得已陷入困难的境地。可以确定，彼得格勒工人没有响应喀琅施塔得要求给予帮助的号召，粮食储备到3月31日将被用尽，对兵变要塞已形成强而有力的包围圈，为了挽救局势必须下决心采取一些积极而有力的行动。

佩特里琴科提醒与会者注意，在当前形势下有三条路：1. 完全投降，祈求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宽恕；2. 把喀琅施塔得的全体居民迁移到芬兰沿岸，然后在喀琅施塔得布雷，分出一部分军队进攻奥拉宁包姆，其余的部队留守岗位从要塞和军舰上向红军开火，进行战斗，大炮和弹药暂时还够用，然后炸毁喀琅施塔得；3. 向全世界发出呼吁，请求援助，为了防卫不惜用任何方法去获得援助，援助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经过讨论，大部分委员会成员赞成最后一种办法，并通过了这一决定，以在部队和工人中进行讨论。确实进行了类似的讨论，大家都赞成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这样，战斗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是促使喀琅施塔得起义者不顾那些战斗一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而直接与反动势力拥抱。迅速地镇压了兵变让白卫军分子和口号没能最终显现出来。

根据海岸部主任扎列诺伊的口供，在喀琅施塔得被攻陷的前一两天，在要塞司令部佩特里琴科、索洛维亚诺夫、通讯部部长和一名要塞工程师举行了会议，讨论了恢复伊诺要塞现有电缆的电话通讯问题以及铺设电缆至更远的捷里奥克的问题。但这个计划照现在看来是没有来得及实现。革命委员会向国外发射了一系列电波。兵

变者因为维利肯男爵的到来，稍稍有所振作，但很快士气又低落下来了。

3月17日，佩特里琴科通知革命委员会成员，司令部决定退到克拉斯诺阿尔梅伊斯基和托特列边要塞，在要塞的掩护下退到芬兰岸边。当天晚上，“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也得到了司令部这样的命令。司令部从众所周知的革命委员会发出炸掉炮闩以毁掉军舰上的大炮的命令，但舰队不愿执行这项命令。“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部分共产党员（“塞瓦斯托波尔”号上水兵没有逮捕一名共产党员）利用混乱状态和舰队的犹豫不决迅速逮捕了指挥官。“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仅仅一小部分人在舰长的领导下躲了起来。这两艘军舰的成员几乎都留守原地。从喀琅施塔得逃出了约800人。仅仅抓住了三名委员会成员——佩列佩尔金、韦尔希宁和瓦利克，重要的军事专家——德米特里耶夫、卡尔宾斯基、扎列诺伊，编辑部工作人员——洛马诺夫和弗拉季米罗夫，少数其他的或重要或不太重要的运动参与者也被逮捕。

我在这里没有提及红军在进攻起义的喀琅施塔得的军事行动中的种种细节。我侦察的任务是查明个别党和军事集团在起义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与在苏维埃俄国境内和国外活动的反革命政党和组织的联系。但这样的联系并未建立。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起义是自发产生的，要塞几乎所有居民和驻防军都卷入了这一旋涡。喀琅施塔得起义是现阶段小资产阶级自发运动的最后和弦，这一运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映，是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对苏维埃政权粮食政策的不满，是他们对政权加于小私有者自由周转上的桎梏的公开反抗。原料危机，随后发生的缩减运输工具和部分工业企业停产，饥饿加剧——这都加速了不满的爆发。如果说喀琅施塔得的起

事起到了用武装力量批判苏维埃政权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大部分水兵没有中断同农村的经常性联系，而他们的社会成分都属于农民；第二，水兵常常趋向于武力，这就是武力；第三，共产主义组织灾难性的崩溃。喀琅施塔得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哪怕是半无产阶级的队伍。影响喀琅施塔得起义产生、发展的口号，大多是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提出的右翼口号。我重复一句，惟一的大型政治组织——共产党组织的瓦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组织本是善于团结大众的。喀琅施塔得驻防军和工人通过决议的基本要求与右翼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这些极端主义分子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这点由社会革命党重要成员、极端主义分子洛马诺夫是兵变的参与者得到证明。总的印象是，整个起义带有右翼社会革命党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想听到关于立宪会议的声音。最后应该说，落后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热月党人的情绪，是由于长期危机造成的疲惫和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速度的放慢引起的，代表大会的无党派工人和红军有可能成为我们敌人的危险武器，他们企图在无党派的幌子下利用大众的情绪。在召开类似的代表大会时应十分谨慎，因为到那时任何无党派代表大会都有可能宣布自己为罢工或起义委员会。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　阿格拉诺夫

莫斯科

1921年4月5日

№05046

全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
致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的电报

（1921 年 4 月 18 日）

“统一”紧急电告，有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了领导作用。公告需要你们所拥有的确切资料才能确定。收到电报后请确定资料。

1921 年 4 月 18 日

全俄肃反委员会　萨姆索诺夫

№05047

捷尔任斯基致亚戈达的信

（1921年4月19日）

致亚戈达同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把喀琅施塔得水兵安置到克里木和高加索很危险，我们认为，应当把他们集中于北方的某个地方。关于粮食问题应与外贸部门谈好。以尽可能地从国外购买。给我写信，告知这事的进展状况。应当和沙因曼商量一下。

1921年4月19日

Ф. 捷尔任斯基[①]

① 便条写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表格上，上面有一注释："№11/B. 格尔松公爵"，盖有№4606印章。Ф.Э. 捷尔任斯基的档案。在反面有："可以在乌赫塔组织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的委员会，亚戈达，4月21日"。

№04867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

（1921 年 4 月 20 日）

听取：关于喀琅施塔得兵变的 1027 号案件

娜塔妮娅·康斯坦丁诺夫娜·科兹洛夫卡娅，基辅省人，是参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夫人。当其夫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后，她抛下住房躲到亲属那里，在被红军逮捕后她说，他们知道要被逮捕，但这没关系，如果是少了一个家庭，总比别的什么好，在审讯的时候，她的回答不准确，并且明显表现出不愿意。她作为其丈夫的人质被逮捕。

决定：判处在押强制劳动 5 年。

主席　谢苗诺夫

秘书　弗里什曼

№05048

波德盖伊斯基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的电报

（1921年4月23日）

莫斯科，全俄肃反委员会

萨姆索诺夫

“统一”，根据4月19日HP3697/1987/II的确定指令，没有查找到左派社会革命党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起领导作用的资料。佩特里琴科是兵变的正式领导者，关于他，《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消息报》过去的工作人员洛马诺夫有点印象，说他好像是左派社会革命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中有2名是孟什维克，一名是人民社会主义者，其余的人党籍不明。

1921年4月23日，HP53/5104

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副主任　波德盖伊斯基

№0504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

（1921 年 4 月 27 日）

听取：

11. 关于乌赫塔惩戒营的设施问题把喀琅施塔得匪徒水兵分散安顿。

决定：

委托捷尔任斯基同志在部门项目中安排建立一个乌赫塔集中营，关押流放者，同时立即派出侦察小分队对周边地区进行全面的侦察，写出准确的数字资料以开始实际工作。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和其他部门协助捷尔任斯基同志，并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和粮食委员会应提供准确的消息，成立集中营需要国家支出多少，捷尔任斯基同志或者是他的副手要每月向政治局报告一次。

№05050

全俄肃反委员会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计划草案

（1921年6月4日）

机密

草案

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为了同最近以农民起义和工人阶级落后阶层骚动的形式出现的反革命运动作有计划的、系统的斗争，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在1921年夏秋和1922年初这段时期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领导运动的政党、政治组织和团体——要消灭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1）首先，全俄肃反委员会准备继续破坏上述政党组织机关的系统工作，无论是单独的地下工作人员，还是组织的领导都要予以逮捕。现在，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孟什维克，在组织和精神上的崩溃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任务是不让上述党恢复自己政党和（……）[①] 的统一性，这样，让他们失去利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困难境况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6月份这一个月里，因为渐渐来临的饥荒，一方面，鉴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无党派为幌子积极行动，从另一方面、就必须在

① 原文如此。

全国范围里对上述政党开展群众性的战役。（这种战役对所有的白卫军或者是表现出反苏维埃政权行为的人展开。）

考虑到实行粮食税确定的时间和过去的经验，这种群众性的战役应在7月底8月初以及今年10月下旬进行。1922年在上述政党中开展的群众性战役应安排在2至4月份。群众性战役必须集中开展。

全俄肃反委员会对国外的上述政党大大地加强了谍报工作，为此，俄共中央委员会拨出了足够的党员干部。

鉴于社会革命党少数人、沃尔斯基－布列维伊集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贝格－卡姆柯夫集团在最近一段时期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对内政策，地下社会革命党人隐蔽地工作，他们以自己“要求无某党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造成了劳动人民队伍的混乱，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意见，必须开展消灭这些集团的群众性战役。同时，必须取缔支持因不满而发生的反革命骚动和反苏维埃体制的起义（比如喀琅施塔得）的所有团体和逮捕社会革命党——极端主义分子党的每个人。

在进行战役的同时，为了隔离这些团体，必须关闭他们合法刊物的机关。

对孟什维克在六月份不要进行战役，把它推迟到七月底至八月。而仅仅用集体和个人隔离的方式限制孟什维克，不管他们表现出的积极性如何，全俄肃反委员会必须采取措施把其监视的孟什维克积极分子从大型的城市工业中心流放到共和国边疆偏僻的地方。

2）对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联合会，鉴于他们人数较少，对工农群众影响较小，战役应根据他们行动表现出的积极性而定，应密切监视坐侨民专用列车从美国来的所有无政府主义分子。

3）全俄肃反委员会会根据总的政治情况确定对上述政党进行群众性战役的确切日期和速度。

4）必须印刷出版俄共中央委员会关于禁止共产党员个人和集体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提出释放反苏维埃政党被捕成员的申请的命令。

5）在进行所有战役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机关应和相应的省委员会和省执委会协商好，及时地为属于隔离的对象，但又占据着苏维埃重要职位的人准备好副手。

二、关于同极端反动的宗教界作斗争

无论是有组织的宗教界全体宗教会议，还是宗教教派会议在现阶段都不允许召开，宗教团体的出版机构在现阶段也必须关闭。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严格而顺利地实施。

三、关于同工人的骚动作斗争

1）在不满自然增长的情况下，必须迅速查清某些工厂中出现的骚动，囚禁运动的领导者和协助者，肃反委员会机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发生于这些企业中的罢工和骚动进一步发展、并扩展到另一些企业。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所有类似的行为，要和地方人民经济委员会和这些企业相应的工会协商好，开除罢工者，在出现最初的运动征兆时就必须全面地采取类似的措施，一般运动是从不遵守劳动纪律、在上班时间集会开始的，这必然导致骚动。2）在1921年7月至8月、10月后半个月和1922年2月至4月这段时间里召开无党派性质的工人、农民和其他会议时必须特别小心，一定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商量好。

四、关于省政治机关和省民兵的工作

为了迅速地预警和消灭农民起义，和国内事务人民委员会商量后，认为必须立即审视省政治机关和民兵之间的相互关系。

1）国内事务人民委员会必须下令解除被起义影响过的区域的省、乡民兵系统中所有负责任的工作人员的职务，任命另外区域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去，国内事务人民委员会必须随地域的不同，根据

各区域群众骚动的特征有系统地进行。[①]

五、关于解除农民的武装

全俄肃反委员会必须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在两星期内拟定出解除所有发生过起义或曾被起义所威胁的省份的农民、居民武装的计划。为此，肃反委员会应利用北高加索前线红军特别部在库班、捷列克和顿河流域解除武装的经验，他们已取得显著成果。解除武装必须赶在今年8月份左右结束。

俄共中央委员会对那些在解除武装时有可能发生斗争的地区应特别注意，为协助此项工作而将成立的机关，党委应征召党的队伍中著名的干部。

六、关于把红军指挥人员训练班迁到外省

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必须在俄罗斯中心省份，沿伏尔加河、顿河省份，东部省份（奥伦堡省、乌法省）以及各省各县城市沿线修建铁路。在车里雅宾斯克－伊尔库茨克的重要点必须集中完全可靠的、纪律性强的军队，以便迅速利用他们同农民起义作斗争。

全俄肃反委员会在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后应在短期内拟出计划把红军训练班调到上述地区的省城，如有可能，调到县城。在把训练班转到外省的同时必须注意改善这些训练班的政治工作，任命有经验、负责任的共产党员去进行政治工作。全俄肃反委员会必须对指挥人员，以及红军指挥人员训练班的学员进行系统的清理，首先是对军事院校管理总局进行清理，清除掉所有过去的白卫军的军官和不可靠的指挥人员。

七、关于特派队

共和国特派队指挥必须化语言为行动，在中央委员会指定的最短期限内使队伍进入战斗状态。

① 原文如此。

八、关于对合作社机关采取的措施

合作社机关和联盟在现行经济政策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政治联盟机关，成为了城市，主要是农村中全体小私有者的集中组织，社会革命党公开宣称希望恢复自由合作社，认为它是劳动农民的职业阶级组织。

这里的斗争要在两个方面展开：

1）让全党所有的力量为共产党在城市，特别是在农村合作社中占有理想的优势和有组织地领导合作社机关的斗争。这一任务一次又一次地摆在党组织面前。

2）在工作中应系统并且不间断地从合作社机关中清除所有的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孟什维克。全俄肃反委员会应在最短的时间里拟出专门的详尽的命令，在其中指出对合作社机关进行清理的方法，指出在各个省必须成立特别处，在合作社联盟中与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孟什维克作斗争。

九、关于清理国营农庄、公社、集体农庄管理处的个人

全俄肃反委员会必须同土地人民委员会协商后在两个星期内拟定出关于以下措施的草案：

1）立即清算和登记所有过去的地主、大承租者，过去的警察、军官和在上述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高官。

2）大约到今年八月份，必须从国营农庄和公社中清除上面列出的这些人，把他们转交政治部处理，并作为劳动力分配到地方劳动部门。

3）用信仰苏维埃的人，最好是工农出身的人替代他们，同时这种变更不能影响国营农庄的工作。

十、关于清理农村中国家政权机关

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在这方面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全部省委员会必须组织一个专门的权威监察委员会，成员

由省委员会、省肃反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各单位一名）组成，每个县单独建立一个。

2）这些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所在县的所有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学校进行监察，撤换在农民看来是有罪的、名声败坏的乡、村政府的代表，把进行反苏维埃宣传的乡村学校的教师清理出来，派到别的地方去，把确定无疑的富农和其他人从乡村执委会中打发走。

3）要由县党委负责任的工作人员进行这项工作。

4）这些委员会必须巡视所有的乡，有可能的话，对较大的村也进行巡视。

5）必须在七月份以内建立起委员会。

6）为了把这些措施付诸实施俄共中央委员会必须对省委员会给予特别的关注。

十一、关于清理经济部门和工业企业的机关

鉴于全俄肃反委员会准确发现的最近的以下情况：

1）在工业企业国有化之前在德国、英国等大型资本主义合资企业工作的部分工程师，现今担任了苏维埃的职务。与国有化的企业过去的业主有罪恶的联系。2）这些工程师根据自己过去的资本巨头的命令行事，有意对抗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机关的措施。3）这些工程师的谍报工作有利于外国资本。

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讨的基础上拟定出措施草案：

1）立即清理出工业国有化以前在外国辛迪加、托拉斯和其他资本主义合资企业中工作的工程师和厂长。

2）把这些专家调到其他企业去。

3）把那些与国际资本家有秘密联系的专家清理出来。

十二、关于清理萨马尔省、萨拉托夫省、坦波夫省和伏尔加河沿岸的德意志人区域

除当前在上述区域为镇压起义而进行的军事战役外，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实施下列措施：

1）清理上述区域所有的起义的积极参与者，把他们迁居到边远省份。

2）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在被匪徒清洗过的地方普遍解除农民的武装。

3）把红军指挥人员训练班分散安置在各县城，首先应安排在上述省。

4）鉴于这一总体现象和事实，即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区域的德国移民积极支持匪帮，向他们供应武器，在破坏铁路时提供技术指导，补充起义者队伍，组织零散的通讯队伍。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全俄中央执委会和国内事务人民委员会有必要重新考虑使某些较大的经济区域性中心，如萨拉托夫省，隶属于该自治区的问题。

5）俄共中央委员会必须组建专门委员会制定措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担当职务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从上述区域调到别的地方，用来自工业省份（彼得格勒省、莫斯科省、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等等）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替代他们。

为了尽快把该草案中的措施付诸实施，全俄肃反委员会认为必须：

1）俄共中央委员会应向省委员会发出通令，规定省委员会无权在没有预先通告并征得全俄肃反委员会同意前开除和任命省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县委员会无权在没有预先通告和征得省肃反委员会同意前任命和开除县政治机关工作人员。

2）俄共中央委员会应对党机关发出通令，规定因党的工作使用契卡工作人员应征得相应肃反委员会的同意。

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签名）[①]

1921 年 6 月 4 日[②]

① 签名字迹无法辨认。

② 此文件随有用全俄肃反委员会公文用纸写成的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信中有 И.С. 温什利赫特的签名。写着："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建议，附上全俄肃反委员会 1921 年下半年和 1922 年上半年消灭白卫军的计划。"

№05055

彼得格勒省委关于清除反革命分子的建议

（1921年6月28日）

绝密

由于彼得格勒是一个边界和港口城市，海路、陆路与资产阶级国家相联，使得彼得格勒聚集了反革命白卫军组织，组织和协助白卫军、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活动家渡过边界，以及让反苏维埃书籍流通，组织书信联系和获取信息，正因如此，彼得格勒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大型海上中心，在无产阶级以及反革命中都具有知名度，特别是在前者加强对后者的影响力的情况下。

由于这些原因，应对彼得格勒以及周边地区进行仔细的清洗，把积极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孟什维克清除出去。

1.

1）彼得格勒清洗的基本任务之一是把反革命白卫军分子以及他们的党团清理出来，毫无疑问，也要把社会革命党分子、孟什维克和在彼得格勒省的经济机关以及独立托拉斯等任职的积极协助他们的人从彼得格勒揪出来。

这次清理按隔离、遣送别处的顺序进行，先逮捕，再隔离，后流放。

2）这次清理要清除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在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中积极协助他们的人之间的合作。

2. 随之，应把所有在政治上明显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白卫军的政治活动家、知识分子代表、自由职业者从彼得格勒清理出去，他们能够从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表达，领导地方上的反革命活动，对反革命活动的发起给予积极的、完全的协助。

3. 承认必须清理反革命大学生，并把他们从彼得格勒清理出去，这一清理的顺序相应机关正在特别地进行研究。

4. 对在工厂无产阶级中的社会革命党分子和孟什维克（他们有些人以无党籍隐藏身份）的团体以及个人的清理应特别小心和谨慎。所有积极的、明显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分子毫无疑问应从彼得格勒和省里清除出去，没有返回的权力。应对所有积极反无产阶级革命、反苏维埃政权的较为年轻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分子以及宣称自己是无党派，实际上被我党除名的积极反革命的人实施这样的清除。

5. 不应认为对彼得格勒进行清理、清除是反对反革命党的临时措施，而应使它系统化，随着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组织、单独的团体以及个人的被发现而不断实施。被工厂除名的人没有返回彼得格勒的权力，为的是让这些人不能从一个厂到另一个厂，破坏这一点应受到严厉惩罚和严格隔离。

6. 把到彼得格勒生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分子立即清除出去。如有不履行者应对之进行镇压，无条件的清除。

7. 主要把积极的社会革命党分子、孟什维克、白卫军分子从彼得格勒清理出去，应在 4 个月里完成，以后随着这类人的出现再实施清理。

8. 根据党纪，责成所有经济事务的工作人员、托拉斯和工厂管理局的代表不得吸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分子、以及带有政治性质骚动的积极参加者、领导者和希望骚动带有政治意义的人进入工厂。委托给他们对此加以严格监察的全部责任。

如不履行，以纵容反革命论处，会为此受到党纪的处罚。

9. 承认必须把讲授社会科学的反动教授从教育部门清理出去。把确定的反动教授报告俄共中央委员会。

10. 应把白卫军军官（高尔察克分子、弗兰格尔分子、邓尼金分子等等）迁出彼得格勒和彼得格勒省。

11. 委托梅辛同志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把清理彼得格勒省反革命分子的这些建议报告俄共中央委员会。

省委员会秘书　П. 扎鲁茨基

№05054

科兹洛夫斯基、佩特里琴科等人的口供摘要

（1921 年）

科兹洛夫斯基将军口供摘要

沙皇将军，48 岁，获得过沙皇政府的奖励，从未参加过反对专制的组织，对向他提出起诉的理由不予承认。

他认为自己行为的主要理由是：看到自己的祖国四分五裂，处于艰难困苦中，认为这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造成的。热烈地期望能挽救俄罗斯，恢复它的强大，保护它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旧传统，曾强烈反对与波兰签订对俄国不利的和平条约，（……）——科兹洛夫斯基认为必须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在兵变前尽早与西欧，也就是英国、法国、罗马尼亚的侨民们取得联系。曾通报了舰长——冯·维利肯男爵和协约国代表的到来，他在组织兵变的准备阶段和他们一直保持了联系。他认为，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行动必须利用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的身份以及“要求正义的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他也认为，为了获得外来援助，这个多余的累赘可以被抛弃。

“革命委员会”主席佩特里琴科口供摘要

28 岁，无政府主义者，对向他提出起诉的理由不予承认。他

说，马赫诺组织[①] 同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公开战斗中忍受着痛苦，认为需要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到北方去组织地下工作，在那里可以利用粮食和原料的困难情况达到自己的目的。

喀琅施塔得被选中了，考虑到它的地理位置以及拥有一批较为接受马赫诺思想的水兵，它对实现上述目的较为有利。

水兵基列夫的口供摘要

23～25岁，游手好闲的匪徒，父亲死于苦役，被判苦役时，年仅10岁，受过苏维埃政府的审讯，因打架斗殴被判两年强制劳动，缓期执行，对向他提出起诉的理由不予承认，希望从参加兵变中谋取好处，有几次在私运货物时被阻击队抓住，为此他觉得要向苏维埃政府复仇。这些都是他积极参加起义的动因。

协约国间谍口供摘要

姓名已被隐埋，在伪造的证件上名为谢苗诺夫，在搜查时找到了黄金和密码手稿，关于自己在兵变中的作用他蛮不讲理、厚颜无耻地说：曾在邓尼金的军队中呆过，在被击溃后他被送到位于阿德里安堡的营地，在那里他被推荐派往俄罗斯从事地下工作，法国驻瑞典领事馆给了他黄金，文件以及指令。经过芬兰他到了喀琅施塔得，与军官组织联系，开始时他到工厂，但在那里差点被工人打死，换成水兵的装束后，他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号，在那里，他与流氓水兵串通起来，一会儿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会儿称自

① 马赫诺，涅·伊·（1889～1934），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小资产阶级及革命匪帮首领。

己是社会革命党人，宣传反对苏维埃政权，他请水兵们吃饭，并向他们许诺，如果赶走了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很好的生活。

兵变开始后，他还组织人马到附近地区组织起义。

社会革命党人普季林神父的口供摘要

过去的神父，父亲为谢尔盖，44岁，革命后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政权时期为职业教师，曾参加过政治教育委员会中学分组的工作，一开始就以伪善和卑躬屈膝著称。口供混乱不堪，对于参加兵变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相信苏维埃政权和工人专政对于俄国来说是灾难，必须召开反映人民意志的立宪会议，他还相信，布尔什维克掠夺了政权并奴役了人民。

对审讯人的提问："为什么白卫军会成为首领，普季林难道不认为这是危险的"，被审讯人回答说，在从苏维埃到立宪会议的过渡阶段必须实行专政，以压制住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对"要求自由苏维埃"的口号作了自相矛盾的解释，所谓自由的苏维埃，就是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他赞成完全的贸易自由。

他夸张而虚假地讲叙社会革命党的历史作用，说是为了挽救被布尔什维克教唆坏的和弄得不幸的伟大的人民。他讲述了切尔诺夫派出信使的到来以及切尔诺夫本人打算到来。

【专题说明】

新经济政策与党内斗争

（1921 年 2 月至 1927 年 12 月）

本专题选编了 1921 年 2 月至 1927 年 12 月俄共（布）党的领导人之间的通信或电话记录，共 109 件。

由于列宁的重病和随后去世，在党内公认的惟一权威告缺的情况下，党内政治力量必然重新组合。可以说，这一时期在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是党内斗争最复杂、最激烈、最尖锐的几年，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取得了替代列宁的党内独一无二的地位。

从 1921 年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开始，列宁便经常卧病。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控制党和国家的是“三人小组”：加米涅夫——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手，政治局会议主持人；斯大林——实际上的党中央机关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由于托洛茨基的威望和影响，“三人小组”起初行动很谨慎，与列宁保持一致。但随着第一领袖健康状况的恶化，他的拥护者便开始认真地准备继承权力。列宁对此看得非常清楚，恢复工作后不久，便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斯大林手中集中了“无限权力”的问题上，同“三人小组”发生了冲突。

这次冲突主要反映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提出了“各共和国自治”的思想，列宁则主张建立联盟国家，而“格鲁吉亚事件”则集

中表现了双方的分歧。由于个人的竞争和傲慢，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之间在高加索联邦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对抗。一贯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奥尔忠尼启则主张三个高加索共和国结成联邦，格鲁吉亚党中央则坚持格鲁吉亚不经过高加索联邦而独立地加入苏联。在斯大林的唆使下，奥尔忠尼启则态度蛮横，竟对一位格鲁吉亚领导人大打出手。于是，列宁要求将此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来处理，既要惩罚奥尔忠尼启则，也准备打击斯大林的大国主义行径。但因政权高层政治力量的制衡和列宁再次中风，这次冲突不了了之。

列宁彻底离开工作之后，“三人小组”领导内部便开始了磨擦和分歧。但1923年秋爆发的同托洛茨基的尖锐冲突暂时使得“三人小组”团结了起来。为了动员力量和协调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而形成了多数派。多数派召开了自己的全会，全会上成立了由六个政治局委员（除托洛茨基外的所有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组成的“七人小组”。1924年至1925年期间，“七人小组”经常开会并实际上领导着党，已经能够在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政治局正式会议上做出一致通过的决议。但多数派和“七人小组”在组织上并不坚固。在剥夺了托洛茨基的权力以后，昨天的盟友又进入了严重的政治冲突阶段。这种冲突以“七人小组”的完全瓦解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政治局多数派之间的尖锐对立而宣告结束。斯大林的忠实拥护者十分敏感地认识到这种对立，他们担心上层的这种危机会发展成整个制度的危机。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彻底粉碎了以季诺维也夫为领导的和以列宁格勒党组织代表为骨干组成的反对派。代表大会以后，政治局多数派开展了“整顿秩序”运动。基洛夫被任命为新的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也对十四大上对反对派的胜利进行了组织上的巩固，在政治机构中进行了大规模改组。例如，加米涅夫被撤销了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降职为商业人民委员。尽管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了

抗议，但这个决议还是得以通过。

然而，对反对派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党内斗争的结束，1926年，遭到失败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更早些时候倒台的托洛茨基联合起来，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反对派”。1927年9月向中央发出了“列宁－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即反对派）对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草案”（题为“党的危机和克服危机的途径”）。签署这一文件的有13个党的活动家——穆拉洛夫、叶夫多基莫夫、拉科夫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彼得尔松、巴卡耶夫、索洛维约夫、里兹金、阿夫杰耶夫。反对派要求散发他们的“纲领”并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就其“纲领”进行公开辩论。但根据政治局决议，“纲领”不准公布。在反对派决定私下散发自己的“纲领”，并组织秘密出版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出动了。在组织了大规模的挑衅以及逮捕和搜查后，反对派被指控参与了“反革命组织”，甚至还准备策划军事叛乱。使用这种手段，斯大林彻底战胜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1927年10月21日至23日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根据上述指控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反对派继续进行抵抗，企图向党员群众和工人群众呼吁抵抗，召开会议，在各种群众集会上演讲。终于导致1927年底反对派的彻底崩溃，其主要成员全部被开除出党。

这一时期苏联党内斗争的概况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大体揭示出来，但这里选编的档案文献补充了许多细节，诸如上层领袖个人之间的关系、政治斗争手段的变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和品质等等，因此，对于全面研究苏共党内机制的演变以及斯大林如何实现个人权力至上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专题文件由余伟民编辑和校注，
何金贵、毛子成翻译）

№04232

波德沃伊斯基、梅霍诺申就群众不满情绪致列宁的信

（1921 年 2 月 24 日）

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列宁

附在我们 1921 年 2 月 13 日第一次[①]，2 月 24 日第二次[②] 呈送给中央的简要报告上的材料。

① 波德沃伊斯基和梅霍诺申 2 月 13 日的第一次报告在 1921 年 2 月 14 日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决定将该报告交给托洛茨基审核。

② 1921 年 2 月 24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市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报告。除了粮食和燃料危机外，列宁还提出了工人不满问题并注意到莫斯科组织的争吵纠纷。依据他的谈话，争吵是从 11 月（1920 年）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开始的，而且也与开始辩论工会问题有关系。列宁指责了莫斯科党委员会的少数反对派久拖冲突，并号召加强团结。反对派别的一些成员也按不同方式评定了已形成的经济政治形势的原因。本信也证实了这种经济政治形势。

1）昨天，在莫斯科苏维埃大厅内的负责工作人员会议[①]上，莫斯科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娃同志的报告指出，由于饥饿和在此基础上由反苏党派组织起来的第一次工人不满浪潮在三个星期前就出现（金属工人罢工）了，但很快就消失了。突然（?）第二次不满浪潮今天又起来了，而且还要更严重些。

雅科夫列娃同志的报告不准确。部分莫斯科工人中的工潮实质上并没有停止。在上周举行的面包师大会上不愿听共产党员的讲话，阿尔乔姆同志在明显敌对情绪下讲了话。3名最高纲领派分子[②]、1名无政府主义者和1名共产党员被选入主席团。面包师大会的决定是这样的："被驱逐出食品工人联合会的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成员帕夫洛夫（最高纲领派分子）应与他的两个同伴一起返回联合会，而面包师分部应恢复"。

---

① 1921年2月23日，在中央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党委会成员联席会议上，曾讨论了莫斯科粮食和燃料的严峻形势。列宁参加了会议。通过的决定写道："一、1）委托季诺维也夫同志同布哈林和斯捷克洛夫同志谈谈有关莫斯科事件在报刊上刊登消息性质问题。委托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同志写告莫斯科工人的信……。2）建立由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州燃料和森林工业托拉斯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为：审核在政治方面减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劳动动员问题，依据中央委员会要求马上完成这件事的原则，讨论用多大规模和什么方式进行这种减轻活动。此外，委员会还应审核因燃料危机和减轻劳动动员而加速关闭较小的企业是否合适的问题……。还要委托这个委员会审查将部队复员军人分配到工厂（这些工厂的同龄人已于……年被解职）去的问题。3）广泛推广预防和加强宣传措施，不管怎样要避免工人和红军战士之间发生冲突，为此，将一些无武器的共产党员分配到各地区去……。4）为了解决逮捕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应组成由雅科夫列夫、梅辛和泽连斯基组成的委员会，给它下达在与工厂无直接联系的人员中进行首批逮捕的指示，和向中央提出关于第二批逮捕正在进行反苏维埃宣传更广泛人士期限的意见……。"1921年2月24日，在中央全会上讨论了莫斯科的形势问题。全会委托2月23日组成的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的委员会在2月25日前向中央政治局呈送工作总结报告。1921年2月26日，在组织局会议上讨论了雅科夫列夫、明仁斯基和拉狄克的报告。

② 1919年解散的最高纲领派成员于1920年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废品加工厂工人（在莫斯科，他们有 7000 人：中央废品厂和莫斯科废品厂）在 2 月 11 日星期五用罢工布告威胁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他们提出的要求有：实物奖金、服装、鞋子。2 月 17 日，他们比较克制地举行了无党派代表会议，但重申了全体工人的要求。（废品工厂是一些被社会遗弃的真正工人，他们不受重视，把他们叫做收破烂的，在工会中凌辱他们，工会工作人员以老爷作风对待他们。）今天，废品厂工人向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主席团提出：如不需要我们，解雇我们好了，不然，应与其他工人同等看待。主席团决定从实物奖金余额中一次性发放 1500 普特[①] 面粉。这是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的一个大错误。它引起其他工厂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第二浪潮”的“突然性”表明了莫斯科组织和工会的僵化、与群众失去联系和没有能力贯彻针对当时情况制定的整个纲领。

2）莫斯科委员会挑选出的五人小组（就是这个小组!!）承认，由于昨天发生的这些事件，各基层组织产生了极端惊慌失措的情绪，并就昨天发生的这些事件指出两个极端情绪：一些人要求采用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主张，而另一些人则干脆认输，因为他们不能经常深入群众，从而无法对滥用职权、不平等和其他弊端的责难进行辩驳。

3）鉴于有“混入分子利用运动进行挑衅的危险”（只因为这一点?!）和拟订的恢复保卫措施只是为了“显示政权还存在”，五人小组决定不采用镇压手段。加米涅夫同志也按照同样的精神在昨天的会议上讲了话。

4）莫斯科国防委员会的呼吁书极不成功。呼吁书从分析国家印钞厂的自私自利行为开始，谈了他们想关闭工厂并以加强保卫而

① 俄国重量单位，等于16.38公斤。

告终。其实，第一，本应该将这两个问题分开，因为这样结合在一起不合逻辑，也没有好处。第二，政权机关不应该处理各行业工人之间的争吵。第三，揭露国家印钞厂的自私自利行为应该是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和印刷工人工会的事情。

5）列宁同志在昨天的会议上谈到了我们在粮食和燃料方面的一些错误，说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粮食、燃料问题已出现过几次。发现错误（仅仅是错误吗?），并平稳地转入日常工作。在无党派代表会议上一名五金厂工人说，在沙皇制度下，会将犯错误的部长赶走，并暗示说，应将整个人民委员会赶下台。这种情绪是由于所有的人，包括犯错误的人永不换班而产生的。“唉，有什么办法，因缺少经验犯错误。上半年，每月要分发2500万吨粮食，余下的留到下半年，下半年每月分发1500万吨”。这里不仅仅是缺少经验，而且是十足的不负责任。工人们抱怨作为机关领导人的每个共产党员为了本机关的利益（为了不失去燃料，不短缺粮食）公开对工人们隐瞒真相。工人们说：“只要催促一下，施加点压力，仓库里就什么都有了”。

由于关于粮食和燃料形势的这次与另一次报告间有明显的矛盾，中央委员会按党的系统要求每个领导人提供他们所领导的机关的粮食燃料的实际数字，并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予以公布，以免把一般的工作人员弄糊涂。

6）巴达耶夫同志发现，在莫斯科有30万份军人（很明显指后方军人）口粮。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点呢？须知这是可以减轻危机的。

7）在莫斯科委员会五人小组拟订的措施（昨天会议上已通过了）中，发放肉类、服装等几乎占第一位。在五金厂工人罢工后也是这样。如果能够发给，为什么不早点发给呢？为什么要等待催促施压呢？这就会使工人产生一种可以用罢工争取得到改善的想法。

人们对政府关于没有物品的声明已经失去了信任，政权机关的威信遭到损害。这就形成一种危险情况，在莫斯科一片惊恐中分发了许多东西，从而损害了组织全共和国范围工作的可能性。

8）已经多次提出取消（或减少）享有特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口粮的问题。[①] 不知要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才会不出现？这里说的不是人民委员会的口粮，他们有一部分已经废除了，而是指在苏维埃机关内对大规模发放工作的检查。这里，政权明显表现出某种无能为力，迅速避开了这个问题。在日用消费品供应证上也是这样。

9）在昨天的会议上“领导小组”的代表谈到必须消除领导干部有别墅等不像话的状态。这一因素无疑会损害政权机关的威信。将别墅转给工人村和幼儿园命令的发布无疑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意义。现在那里正居住着共产党的显贵。从宣传方面来讲这个措施极端重要，其中有些东西也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

10）将共产党人从苏维埃机关调到各地区、工厂去，让他们固定在基层组织内，这在莫斯科委员会的计划中占有重要位置。布置了由中央委员会[②] 批准的紧急任务。有理由认为，这件事同以前一样将不会得到贯彻，如果是得到部分贯彻，那也不好。已决定停止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业，停办指挥员训练班。如果这一条像昨天似乎应该是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人做过的那样，将会感到难为情，因为大约有75%从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和训练班中调出的共产

① 1921年2月8日，通过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减少各种粮食定量和停止非法发放的决定。人民委员会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人供应中央委员会在3天的期限内确定特别负责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标准，但要使这个标准不超过工人的供应标准。人民委员会取消了所有特别高的粮食定量标准。

② 2月26日，组织局决定：“将中央机关的30名党务工作者转交给莫斯科党委会书记进行审查”。

党员都不适合做这件事。

11）在莫斯科委员会拟定的整个计划中，所有的内容都是在今天仓促拟就的，没有系统性、计划性，因此，这种整治不会有结果，不能预防经过很短的时间后再出现新的风潮。不仅需要一个能满足工人阶级今天的需求，而且更需要一个在各个方面持续时间较长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

与此同时，还需要采取一些示范性的措施，以净化气氛和得到非党群众的信任，在这些群众中恢复秩序。

12）最后，需要实施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与群众接近的广泛计划，从所有机构中消除官僚作风。这项工作应具有长期坚持不懈的性质。[①]

波德沃伊斯基

梅霍诺申

① 1921年2月25日，中央全会未采纳波德沃伊斯基和梅霍诺申的意见。全会委托列宁和拉狄克“为了弄清其宣传鼓动的不正确方面”找波德沃伊斯基谈话。

№04233

契切林就与土耳其代表团会谈事宜致斯大林的信

（1921 年 3 月 10 日）

1921 年 3 月 10 日

致斯大林同志

敬爱的同志：

土耳其代表团宣布，他们有签署关于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和黄金援助的书面协定（不是口头协定）的绝对授权书。[①] 以前，他们没有提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与他们的交谈和谈判，我相信，这是他们现在想起来的。

土耳其人说的总数为 1.5 亿金卢布无疑是东方人提的要求。去

① 这里讲的是在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土耳其代表团就亚美尼亚－土耳其边界上调整领土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一事。1921 年 12 月 2 日，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政府同土耳其政府签订了亚历山德罗波利斯基条约。依据条约，纳希切万、沙鲁尔、沙赫塔赫等转入土耳其的保护之下。为了交换，土耳其应向达什纳克党人提供军事援助。而俄罗斯苏维埃政府则在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中利用凯末尔的援助，尽管要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保持亚美尼亚领土完整，但仍然在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上可将凯末尔当作可能的盟友。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与土耳其人进行了谈判。1921 年 3 月 9 日，斯大林会见了土耳其代表团，对谈判结果产生重大影响。1921 年 3 月 16 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土“兄弟友好”条约。确定土耳其的边界阿尔达汉和喀拉区北部行政边界。同时还做出决定，在土耳其遵守在格鲁吉亚的苏维埃利益的情况下继续给土耳其提供金钱和武力援助。斯大林深知政治承诺的意义，于 1921 年 3 月 19 日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则称：“根据已经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巴统应归格鲁吉亚……力求用强有力的突击从巴统清除出土耳其人，然后宣布这事为误会。指挥部应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

年，别基尔－萨米坚持要800万卢布。中央委员会同意拨出700万金卢布，土耳其人已经收到了其中的300万卢布。此外还要再给200万卢布。对于这200万卢布和总数500万卢布到现在还没有同他们谈判，而总是笼统地对他们说还要援助一些。对他们的预算来说，这当然是微不足道的援助。由于我们能给他们的武器很少，他们坚持要大量的黄金，以便他们自己去购买武器。

这一点实质上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大量地援助他们，对土耳其人来说，同我们接近所获实惠就很少。如果我们不援助他们，实际上他们将会被迫改变自己的政策。因此，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特别认真的关注。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04234

穆拉洛娃就某些党员的恶劣行为致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

（1921年3月21日）

亲爱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①]：

在斯塔夫罗波尔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的一年里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有意使居民，包括工人起来反对共产党员。这里对共产党员根深蒂固的概念是过着饱食无忧、游手好闲、酗酒闹事生活的人们，他们不耻于将公共财物据为己有，为每件区区小事用抽鞭子和打耳光等强制手段惩罚人。这都是不容置辩的事实。而在这里首先是本地的上层共产党员有错误。

掌握政权的是一些受宠的人，追求名利毫无原则的特权阶层，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缺乏党的自制力，经常与共产主义观念格格不入，浸透了旧制度的观念、关系和工作方法：表现为表面守纪律，而实质上是处处闹纠纷和不尽职，掩盖有个人关系和联系等人员的犯法行为。

他们不会也往往不理解苏维埃的建设事业，他们曾拥有维系其功名利禄的一套陈旧手段，可惜是掌握在狡猾无赖汉手中的手段，而现在却更厉害了，通过酗酒、提供物品和任何方式的个人效劳（按现在的道德和纪律是不允许的）来吸引那些不够坚定的同志。几乎会邀请每个新来的同志参加饮酒作乐的“家庭晚会”。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信上签有附注：“列宁同志，为了便于您了解情况，现将我收到的穆拉洛娃信转给您。”

没有勇气或机智马上和公开提出抗议的同志一旦出席了这样的晚会就会陷入他们的手掌；然后给他们开物品的条子，不限数量和品种，还要加上提供其他方便，直至与女性（准备好的牺牲品）认识，他已被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从前的省委会也参加了这类狂饮，并签好了“工业用”酒精的条子。

甚至还有这方面的文件。

这里没有规定粮食定额，而是按熟人关系挑东西，而这种批条在粮食这么紧张的时刻其厚颜无耻是骇人听闻的。缺少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没有阶级敏感性，在地方资产阶级、孟什维克、白卫军亲属（白卫军上校的女儿曾当过革命委员会女话务员并且与革命委员会主席伊科尼茨基的妻子很亲近）和不妨碍吃喝、卑躬屈节的任何人群中都进行过这种狂饮活动。

“负有责任的共产党员”的这种举止品行已引起居民的注目，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幸灾乐祸并对俄国共产党诽谤中伤，另一方面，工人和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忿恨、不信任和绝望的情绪日益增长。所有这些人都在不换班地在这里执政掌权，因高加索地方局对自己怀有全面好感，而军人有高加索方面军对自己怀有全面好感。为什么会这样？斯塔夫罗波尔城除了粮食、酒和自我供给品外，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讲都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作用，然而都向这里开来了高加索方面军政委佩切尔斯基同志、革命军事委员会特里福诺夫等同志的列车。已失去工人、红军战士和普通共产党员信任的革命委员会主席伊科尼茨基、省军事委员巴图林在这些列车上都曾是“自己人”，而相反，在罗斯托夫，在高加索地方局委员、高加索方面军成员那儿已为他们“准备好了桌子和房子”。地方掌大权的人由于有高加索地方局和高加索方面军的强有力的支持，而变成完全蛮横无礼、肆无忌惮，而终于崩溃。

某些“小”同志对作为共产党员的他们的不可容忍的举止行为

提出任何诚恳的意见时，他们马上就会回击，并暗示，他们有高加索地方局的支持。

所有这些酗酒、放纵、无所事事都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时其中有一个军人共产党员怀有最终制止这种酗酒的目的，决定正式给肃反委员会提出意见，规定出日常安排这些狂饮和宴会的日期和场所。实际上肃反委员会正好碰上了革命委员会主席伊科尼茨基和省军事委员会委员巴图林为首的几乎所有日常参加这种狂饮的人，还看到了空的满的酒桶、带盖小酒桶、空的满的俄石[①] 和酒瓶，以及大量食物甚至甜点心。

除了党内群众外，这里还有一些地方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红军战士（后者为服务人员）。档案材料被转到省委会，结果，所有参与酗酒者都被开除出党。

清除他们出党并不是因为他们在这次晚会上酗酒了（有的人来得很晚，还没有来得及饮酒，肃反委员会早已到达了），而是他们的酗酒一般已习以为常，成为一种习惯和一种经常的现象。害怕新的省委会会按原省委会的样子掩盖这个事情，在第二天，工人和红军战士支部便脱离了参加这次酗酒的人员所在支部。党的区域会议要求省委会作关于一些同志被清除出党的报告和一致做出完全同意省委采取这一措施的决议，使省委会今后清除堕落党员，坚决贯彻纯洁党的路线。巴图林是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省的党代表会议上，在选举省委员时他连一票也没有得到。总之原革命委员会、省委员会委员中的任何人也没有在新的省委会中得到席位，在代表大会的 112 名代表中，他们得到的票最多的为 4 票，而有的连一票也未得到，例如巴图林。以前，巴图林在穆洛夫的军队里工作过，他在那里曾是一个谦

① 旧时俄国容量单位，等于 3.0748 升。

虚的工作人员。在这里，他就酗酒了，保护非劳动阶层的妇女，总之完全堕落了，而在四周有大量白匪的时候，卫戍部队却处在极困难状态。革命委员会主席伊科尼茨基十月革命时在莫斯科的一个县保健医生克利赫那里服务，他曾是一怠工者，然后他逃到阿斯特拉罕，在那里，他加入红军，在这里成了共产党员，后随11集团军进入斯塔夫罗波尔，以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名义在这里定居，最近当上了革命委员会主席。以前一些革命委员会主席都来到这里，但很快他们就被迫离开这里。其中最后一个就是加拉克季奥诺夫同志。伊科尼茨基曾是个怠工者，不久前才入党，所有这些都不要紧，而问题在于他是个狡猾的阴谋家、追名逐利者、无原则性、卑躬屈节的人，在心理和习惯方面与共产主义社会格格不入。他对待工作的态度还是旧的：讨好首长，表现自己露一手，只做表面的工作，为达到个人升迁和显示良好外部秩序的需要就隐瞒，甚至掩护犯罪行为，将个人关系而不是公务关系带到工作中去，等等。因此，所有部门都还处在极端腐败中，到目前为止就其实质来说，仍保持着老专家和苏联职员不尽职时的老样子。

在各个县里，共产党员、政治委员和党务工作者亲自参与刑讯、鞭笞农民，未经审判就单个枪杀他们。对所有这些都有凭证。在共产党员当中，可以找到受贿行为、伪造文件等行为。真是令人憎恶的事情！

而如果俄共高加索分局不加速清党，即使人数不多也罢，那么它就会使工人和忠实的共产党员同自己疏远，这里就不能工作下去，白白地损耗体力和精神。

如果高加索分局从这里将所有被开除的人员带走，恢复他们的权利，再将他们派遣到别的地方去，走上负责岗位，则就需要纯洁这个高加索分局，使它不会在共产党员中成为污垢的导体。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像高加索分局那样，看到这些并未采取任何措

施，相反地却在支持他们，不责备所有这些酒鬼和追求名利的人。因此即使到现在工人们还恐惧高加索分局会干扰清党。请原谅，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我要耗费您一点时间，但您也该了解一下，边疆在做什么，来年，将从哪儿得到粮食、肉类、毛衣、等等。

今天，一位最平凡的地方农民对我说："请你们哪怕派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到我们村镇来吧，要知道列宁不可能到每个地方去"。当然，如果这里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说，没有粉刷宿舍的石灰，然后找到1000普特。如果伊科尼茨基隐瞒某人说，为修理农具已向抢修厂发出了1000普特煤，其实才发了300普特。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应该重新安排所有这一切，然而所有这一切仍需要有一些为数不多但却是坚强的共产党员。

就说这些吧。我已经写了不少了，这里的群众是很厉害的，我不能摆脱开。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请不要忘记边疆、苏维埃俄罗斯的科尔米利察。你在莫斯科，我很高兴。

祝一切顺利。

玛丽亚·穆拉洛娃[①]

1921年3月21日

① 穆拉洛娃不是俄共（布）党员，但因是穆拉洛夫的姐姐和利扎列夫的妻子（两人都是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的积极活动分子），她始终处于事变中心并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许多代表有直接交往。

№04235

拉柯夫斯基就乌克兰经济情况致列宁的电话电报

（1921年3月31日）

急件

莫斯科市

1921年3月31日

致列宁同志

乌克兰总的情况

一、3月份，在顿巴斯生产的3200万普特的煤中，预计地方需求为1500万，闲散存量推测为1700万，这是最大的数字。4月份，由于过节，预计会有猛烈的动荡。

二、在城市中没有特别的动荡。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浪潮[①] 1月份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是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曾经出现过，但很快就过去了，而且势头要弱得多。

三、我们只能保证到4月份的粮食供应。我们担心，一旦公布粮食税就会停止在我们这里总共已完成将近三分之一的摊派。在这种情况下，估计到5月份会出现强烈的不满。据省里的消息称，公布粮食税对收购的负面作用并没有表现出来，如果收购减少了，对已开始的播种运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① 这里谈的是在粮食和物质生活状况极度恶化时工人发表反苏演讲的浪潮。

四、我们这里已开始进行播种运动，我们想尽快知道，征收粮食税的方法是怎样的，以及要采取哪些实际措施，以便在播种运动的转变关头出现之前就及时宣读这些措施。为自己本身消费而播种的农民要决定他还要为国家播种是否值得的问题。[①]

五、红军参加播种运动取得了自己的成效[②]，仅在尼古拉耶夫斯克一个省，约有6000匹红军载重马车队的马匹参加了播种运动。

无论在居民中还是在红军战士中，对红军的这种参与反应都很好。相信不会出现什么复杂的事情。

六、盗匪活动已大量减少，但小股匪徒仍四处流窜。4月份，播种运动结束后，盗匪活动将有所抬头，特别是在右岸地区。

七、给我们规定的粮食税为11700万普特，其中1800万用于贫农委员会的需要和国外商品交换基金。本年度剩余的摊派还有一半多。总共剩下5000万，据估算，通过摊派将全部完成。

八、所有问题（税务问题、财务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正致力精简苏维埃机构的委员会，但最终的决定权在莫斯科委员会。

九、恳切地请求在列扎瓦面前支持我，以便利用萨利列尔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实际解决著名的乌克兰商品储备协定提出的一些问题。

拉柯夫斯基

① 1921年3月21日，列宁接到彼得罗夫斯基代表乌克兰中央政治局签署的电报，询问关于征收乌克兰农业经济粮食税的办法。列宁做了许多批注后，将此电话电报副本转寄给瞿鲁巴，并就在当天打电话给彼得罗夫斯基，进行了交谈。彼得罗夫斯基要求尽快给予答复，而列宁则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建议尽快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上讨论制订征收粮食税实际措施问题。1921年3月27日或28日，列宁获悉了3月27日中央委员会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并对乌克兰粮食工作问题作了许多数字计算。

② 关于摆脱军事行动的红军分队参加播种运动的决定是建立劳动军队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是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0年提出的，并得到了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支持

№04236

布琼尼就骑兵状况致列宁的信

（不早于1921年4月6日）

您好！

最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接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该指示说，军队（集团军）应驻防在靠近西部边界的地方。简而言之，继续死亡下去。我曾要求将军队转移到顿河、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并指出，这是拯救军队的惟一办法。[①] 我决定向您报告，到5月末在乌克兰的军队将被消灭，马匹会死亡。使顿河、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成为骑兵区，将军队调到那里去和委托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实施这一切，以便我们有常驻的骑兵，我认为这是一个解救方法。我知道，这里不是西部边界，如果能像我讲的那样，保留下骑兵，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歹徒会威胁到我们，但如果骑兵留在乌克兰，那我们就任何骑兵都没有了。我怀疑，今年西欧会进攻我们。我看到，许多人担心将骑兵集团军转移到顿河、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会成为起义者的助手。这是不对的。我对此承担责任，并用脑袋担保，这将是惟一的办法。如果必须从那里调往前线去，那我可带两个这样的集团军前往。务请您不要担心，当我向您讲时，所有这些都是真

① 1921年3月18日，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一方，以波兰为另一方，签订了和平条约。苏波边界确定在“寇松线”以东较远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一片土地划给了波兰。苏维埃俄国得到3000万金卢布的赔款。签约双方都认为条约为临时性的。此后，军队开始复员。

实的，我会做好一切，保证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巨大益处，您只要下命令就行。我感觉到，特里福诺夫兄弟[①] 向您报告的军队情况不正确，因为他们不愿部队到顿河去。保存骑兵集团军的问题要求特别关注马匹。集团军的战斗力和威力就取决于这一点（马匹），而马匹又是不容任何迟缓的事情，然而马匹的情况却在一天天变坏，解决这个问题不容迟缓。由于马匹饥饿和死亡，不满情绪就会不断增长。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却没有人能理解我愤怒的声音。[②]

你的　布琼尼

① 特里福诺夫兄弟是第1骑兵集团作战的前线军事行动的积极参加者。他们曾多次向中央写信谈部队做出的一些不成体统的事。1920年1～2月份，在高加索方面军（高加索前线），特里福诺夫和布琼尼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布琼尼写信给列宁，谈了他的意见："……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便决定简要地向您报告一下，从我们的同志方面来说，军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萨温科夫、巴拉霍维奇和整个敌视我们的营垒来说，关系一点也没有改善。差别只表现在以下方面：敌视我们的营垒想方设法将自己更多的代理人打入我们的部队，以便用非法手段从内部瓦解我部队。而我们的同志从小的军事和地方机关到中央，自觉或不自觉地公开分解和诽谤部队……"。布琼尼宣布必须将部队转到顿河（为了保存部队），提出，如果被拒绝，他就不担任军队的职责，请求解除他军队的指挥权。

② 1921年4月20日，中央政治局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第1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缩减集团军编制，并将其转移到马内奇地区去。

№04237

皮达可夫就顿巴斯煤矿租让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1年4月8日）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①]

在巴赫木特河，我收到了你通过通信员给我的便函。[②]

首先，您不公正地责怪我“说大话，并加入了卑鄙的俄罗斯派，而它准备轻而易举地打败”危险和强大的敌人。您给我罗列了许多“罪行”，把一些我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加在我身上。我从来没有自吹自擂，也不怕见到“领导”，并向他反映在实际中看到的事情，对这些实际情况视而不见，是令人不快和不安的。

第二，我完全不赞成“将四分之一的顿巴斯转让给一个承租商，另外四分之一的顿巴斯交给另一承租商，而你的任务是在你的

① 此信由巴赫木特（顿巴斯）寄往莫斯科。在公文纸上写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煤炭总委员会。顿涅茨矿区煤矿工业中央理事会”。

② 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之一是将一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的代表。1921年3月28日列宁同李可夫多次交换了关于组成租让委员会和拟定租让合同草案最后文本期限的电报。就在这一天，列宁接到了皮达可夫1921年3月22日写来的信。信中写道：“……我听说，您准备在顿巴斯搞租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不知道这可实现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这样做一定会破坏顿巴斯的整个工作。如果这个问题具有实际的现实意义，我请求您征求一下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的意见，不要在没有我们这些直接从事顿巴斯煤炭开采工作的人参与的情况下对这么重大的问题做出决策。况且顿涅茨矿区要摆脱困境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租让对此问题帮不了什么忙，以后会受到许多损害……”。1921年3月30日列宁给皮达可夫写了回信。

其余两个四分之一的顿巴斯中赶超他们俩”这样一个如此天真简单的提法（请原谅我这么说），这完全不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于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这里好像与说大话毫无关系!!我确信，在顿巴斯的两个承担商现在会不断地给我们提供商品，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比我们更强大一些。将最强有力的美国资本家派到我们这里来，并对我说，赶超他们，这意味着，这是按书本方式来对待问题，而没有看到真正最困难的实际情况。须知情况将会是这样的：在顿巴斯的美国人发展自己的承租事业有两个动机：第一是为了利润，第二是为摧残布尔什维克。很明显，美国人利用美国的整个经济实力，给自己的企业提供比我们更好的条件：1）他们提供良好的技术装备，2）他们构筑舒适的工人住宅，3）他们给工人发放好的服装。您能证实，事情不是这样吗！所以，在我们矿井中的工人，1）得到了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明显证据，2）完全被美国矿井中的良好的工作装备瓦解。如果美国人给“自己”的工人每人发一双鞋、一套工作服、烟卷、甚至还有美国火腿，按政治动机看，他们可能也应该做这些事情。除此以外，如果他们以金属货币，而不是用“皮达可夫”纸币支付，则我们将会成为：1）我们矿井大量愤怒的见证人，和2）工人从我们这里跑到美国人那里去的目睹者。而您写道：“你的任务是在‘自己’其余两个四分之一中赶超他们……”。赶超！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习惯于在很大的范围考虑问题，在“一百俄里”的范围内解决所有战略问题，而我们只得在“三俄里”或者至多在“十俄里”的范围内解决小的战术问题，因此您在这个问题上，按我的看法，陷入了公式主义和真正的说大话（请允许我这样说）：我们没有经受住强大的美国资本家邻居的挑战，是因为我们太弱了，而您却认为，我们不仅要“经受住”，而且要赶超！

第三，您向我发出了号召——“磕头拜托，每月至少也得提高10%。现报告如下：1月份，我们采掘了2300万普特煤，2月2900万普特，即增加了21%，3月份3300万普特，即增加了400万普特，增长14%。这是在不时转变为经常性灾难的极端严峻的粮食形势下完成的。到4月份，因为野外作业、节假日等的干扰，产量自然会急剧下降。不管怎样，如果粮食形势始终保持良好，则每月增长10%是可能的（急剧下降的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估计，由于许多原因，我们将不能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

第四，最主要的一点。我向您谈谈我的观点。我知道，尽管这样，承租还是有贡献的，我向您建议，搞联合。联合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会缓解承租的严重后果并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益处。

基本原理。

1. 承租不是在最发达的地区搞的，而是在一些未被整治过的地区，例如：1）格里申斯基地区，2）阿尔－格鲁舍夫斯基地区叶卡捷林斯基联营组织（无烟煤），3）多尔扎诺－科什特文斯基博古拉耶夫斯基联营组织，4）多尔扎诺－科什特文斯基斯温采夫斯基联营组织，5）巴赫木茨区涅斯韦捷维切斯基和斯卡利科夫斯基联营组织等等。具体讲，请把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确定的这些地区的正式任务交给我们吧。

2. 承租矿井和这些矿井的工人的供应品不应成为一种独享的特权。我的具体建议是：责成承租人将他们送给自己企业的供应品，也送给我们一些，其数量与所用工人数成正比。这就是说：

承租人有5万工人，

我们有10万人。

承租人要想给自己提供100辆载煤机，他们就应向我们这里运

来 300 辆载煤机，他们从中得到 100 辆，而我们得到 200 辆。我们可以假定，我们可以用阿尔汉格尔斯克或乌拉尔斯克的木材来向他们支付这些供给品的费用。如果他们想给他们的工人供应 5 万双美国鞋子，则他们可向我们这里运来 15 万双鞋子，他们从中得到 5 万双，我们得到 10 万双。

3. 承租企业的全部供应品经过我们的供应机关实施供给，而且我同意受到他们的监督，即在我们供应主任处将有一“资产阶级的政委”（我们暂且称之为“监督员”，一个美国人?）。

4. 日常供应（如矿坑支柱等）的完成倒不会损害我们，然而事实上，木材采伐与加工总局和燃料工业总局不想丢面子，将所有的支柱材料都送给了美国人，而使我们陷入困境。

5. 关于所有这一切，应该在巴赫木特河具体详细地商定，为此，应往这里派一个由来自万杰尔利普的代表或其他美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制订协议的细节。

再一次，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非常不安，务必请求您给我一个回答，首先请您谈谈，您怎样看待我提出的联合。

想一想，难道使承租企业处于另一种不那么重要的地位不是更好吗，要知道，您自己就写道：“顿巴斯是很弱，但它是我们的支柱”。难道我们不是用这些毁坏我们的支柱吗?！要知道，我本来就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我不仅从书本上，而且也亲眼看到，资本家是怎样扼杀自己的竞争对手。我担心，我不得不再次的亲自体验来研究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竞争角逐的实践。只可惜，由于这种竞争角逐，我不准备写下这个角逐的理论，不过我却希望，在得到您的批准后，我的朋友，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从我这里取一些必要的材料，写一份关于金融资本家经营和无产阶级采煤经营之间竞争角逐理论的报告。。这本小书是有益的，列宁在什么时候研究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时会说：我看，这些人失策了——巴

黎人没有得到银行，俄罗斯人送出了顿巴斯，而我们不能再犯这些错误。①

敬礼

皮达可夫

① 1921年4月14日，列宁在给皮达可夫的信中曾作了标注："秘密，绝对不可发表"。其中还写道："……您要知道，我们怎样进行租让政策。至于顿巴斯，我们期待您工作的成果……，当然如果供给您……不，自己艰苦奋斗就能得到一切：盐巴、粮食和其他。积极主动、首创精神、地区流通往来，不要向人乞讨东西，如果有人给我点什么……耻辱！"

№04238

别洛博罗多夫就斯塔夫罗波尔省情况致列宁的信

（1921 年 4 月 10 日）

顿河，罗斯托夫

1921 年 4 月 10 日 21 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刚从斯塔夫罗波尔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回来（我来到这里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之前，省里还未有过民选的政权）。会议上的情绪很能反映省里当前的思想情况。

在大会之前召开的县代表大会大多数都是由非党人士（占60～65%）组成的。这是因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与“群众”的关系“搞糟了”，因为基层组织参加了，有些甚至相当成功地参加了完成余粮征集活动。共产党员越过了大多数县的执行委员会，这就表现出一种压力，和产生这样一种情况，非党人士不能分担自己分管执行委员会各部门相应数量的工作。

在省代表大会上代表名额的构成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占 69%，非党人士 31%，按照省委的决定，选举 5 名非党人士进入省执行委员会。

省里来了一批新的力量：从军队复员的斯塔夫罗波尔农民——布琼尼和日洛巴战士[①] 和他们的指挥员。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将在省的生活中起相当大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共产党

① 这里指从布琼尼和日洛巴部队兵团动员来的红军战士。

员。我们党的这部分农民与其余农民群众的区别仅在有较高的觉悟，但却完全保持了农民的世界观和农村人的情绪。他们在代表大会的大批代表中具有最明显的特点（在代表的总数中，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占40%）。这些共产党员（布琼尼战士）以直接参加过国内战争和会打仗这样的观点来定周围人员的革命功绩。游击队员和主张乌克兰独立的人员极厌恶这些刚来的人，对自己的才能评价很高，要夺到政权。他们只想把“自己的人”引入省的执委会。省委花了很大的力量才拿出了自己的名单，给他们提供了6～7个席位。

播种运动和余粮征集是代表大会期间最重要的事情。省里只完成了43%的余粮征集（在3000万普特中，只完成了300万），但所有的人，其中也包括共产党人都宣誓，拿走一切“一扫而光”，种子也没有了，无处可以得到，与规定的任务比较，春播最多只能完成20～30%。从各地传来的消息说，已开始的播种进行得很差，有些地方还根本没有开始。允许购买和转运种子材料；尔后当从某些县得到消息说，在寻找谷物种子时，发现了必需的谷物，我们给省政权机关施压稍微减少一些定额。注意中心已转移到地方政权的工作上。在各派别代表大会上，群情激昂，以至严厉批评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的政策”，并声明，在省里工作的“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也就是站在全国的立场上）将农民的经济引到了破产的境地。在一些代表的话里，认为“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这个外号已成为一句骂人的话。

本来准备在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用税收取代余粮征集物的公告被搁浅了。部分原因是在这个时候整个俄罗斯的纳税数字还不清楚。各地区的比例也不知道。许多人，尤其是偏僻地区的人，认

为这是在一种新幌子下的相同的余粮征集制（虽然在纳税后有剩余和允许交换，但仍然是“一扫而光”，没有剩下什么可用于交换）。

纳税问题在代表大会的农业组内进行了讨论研究。他们谈到了反对累进税，——“纳税不应采用累进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雇佣劳动”。承认“扩大合作社组织，以便使剩余农产品不流入投机商手中，而在合作社内相互交换”是必要的。

对纳税所持态度的总的情况和关于春播的消息暂时还不可能得到。通知将要经过一周至一周半的时间才能传达下去。将所有我们采取的措施传达到农村是很慢的。

从库班河地区得到的一些资料证实，关于纳税的通知马上缓解了气氛（道理很明白：库班河的哥萨克人在其智力发展方面要比斯塔夫罗波尔农民高一些）。春播进行得更有效。

在新的庄稼收获前，我们应在东南地区用摊派的方法收集1000万普特粮食（而不是无法收集的6500万）。因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告农民书中讲道：“从现在开始取消摊派制”，而我们将这种摊派称为“任务单”。现在还很难确定，这个“任务单”能不能实现，尽管斯塔夫罗波尔代表大会已接收了在斯塔夫罗波尔省完成500万普特的建议。

回来后，我发现弗鲁姆金和中央委员会间就第1骑兵集团军转移到顿河地区的问题的信件。如果这样做了的话，则一方面将导致集团军不复存在，因为战士们当然要回家：回库班、回斯塔夫罗波尔和顿河地区，另一方面这将会在政治上构成放荡自发势力的放肆侵犯，以致打乱整个工作，首先是粮食工作。

寄上两份斯塔夫罗波尔的统计通报[①]。其中有一些有关由战争引起的在居民构成变化方面很有趣味的资料。

别洛博罗多夫[②]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无此资料。

② 1921年4月17日列宁读了这封信。在本信第1页的上半部分上有列宁的批示："送莫洛托夫同志。望所有政治局委员知悉。注意，有关布琼尼战士和其他战士的问题很重要。列宁，4月17日"。莫洛托夫作了指示："已阅，分别送各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加米涅夫和加里宁也签了字。

№04239

别洛博罗多夫就边疆区形势严峻致列宁的信

（1921 年 4 月 23 日）

顿河，罗斯托夫

1921 年 4 月 23 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今天接到了您 4 月 17 日的来信。

在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之前，对允许自由贸易问题要谨慎从事。阻击队[①] 还存在。除了谷物及颗粒和粉状饲料外，允许在市场上销售和运进。大规模的“集市”还没有形成；剩下的是担心冬季粮食压力。总的来说，价格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

在边疆区经济会议上，原来的平衡被打破了，现在主要是做准备以致实现征购任务和商品交换方面的日常工作。增加商品交换基金，在不使企业受损失的情况下，从所有仓库将可能收集到的一切物资收购上来。

库班河地区在喧嚷翻腾。分散的匪帮开始联合起来，有时士兵的人数可达到 400～500 人。拉达[②] 的一些成员（躲藏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在领导此运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消灭在阿尔马维尔和斯塔夫罗波尔之间突然爆发的哥萨克人起义。

斯塔夫罗波尔省。农民承受着内心的痛苦：他不需要我们，但

① 阻击队是一支专门负责取缔自由贸易的部队，配置在城市、铁路和公路车站、海岸码头、道路上，防止粮食和其他国家货物的自由流通。

② 1917～1918 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反革命组织。

他知道，哥萨克人将来到，农民害怕我们，更害怕他们（1918年哥萨克人在斯塔夫罗波尔省组织了全省的屠杀和抢劫）。在省内，有些匪徒在活动，主要是捣毁国营农场。

顿河地区。与库班比较，总的来说，要平稳得多。也有一些匪徒在活动。

自实行粮食税以来，运动正在各处展开。在库班要进行严峻的斗争。在其余的地区也将会出现一些骤起的风波。在这些情况下，缩减高加索方面军[①] 势必大大加大了消灭白色富农运动的难度。

要得到有关实施新经济政策详细情况的消息非常难。只有通过读报了解很少一点情况。许多情况，其中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合作社，不得不靠猜测来确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别洛博罗多夫

附注：最近几天内将寄上有关租让方面的材料。不得已，再次重复以前呈送过的旧材料。

别洛博罗多夫

① 缩减高加索方面军是随国家逐步退出国内战争，以及武装力量总裁减的时候进行的。

№04240

奥新斯基就粮食税执行情况致俄共（布）中央的信

（1921 年 5 月 11 日）

1921 年 5 月 11 日

俄共中央：

在沿图拉、奥勒尔、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省的两周旅行中，使我确信，各地方对因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而推行的农村新政策还掌握得很不够。还没有充分领会新方针的精神实质。有些人认为，我们正逐步倒退到资产阶级关系的道路，相反，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是预先采取的装样子的政治措施（例如，耶列茨基机关的一个负责工作人员微笑着秘密地询问我："秋天将会恢复余粮征集制吗？"）。也没有接受从新政策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没有主动精神，没有建设新事业的热情，其中包括合作社建设和地区流转发展。例如图拉机关的两位负责工作人员表示，对我们的机关能够胜任这项任务和提高相应的主动精神产生公开怀疑。在奥勒尔省耶列茨基县有机会碰到对农民持"粮食贫农委员会"观点的明显表现，把农民看做对苏维埃政权的天生怠工者，以及在农村老是只靠贫农来反对农民的倾向。

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前一阶段党的生活的总结上，没有给各地区的同志提供足够的材料去领会新的政策

方针，没有在新方针指导[①] 下推动他们做好工作。

鉴于以上讲的，为了详尽和准确地讲清新政策和与新政策有关的各项任务的实质，看来尽快召开一次全俄党代表会议是必要的。是不是可以将此次党代表会议定在5月25日[②] 召开，因为这一天正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这次党代表会议日程的主要问题应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和我们在农村的工作"。

兹建议党中央做出相应的决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奥新斯基

① 俄共（布）第十大于1921年3月8～16日在莫斯科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列宁论证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规定了新政策的一般方向。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提出来。

② 俄共（布）第十次全俄代表会议于1921年5月26～28日举行。5月26日，列宁在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根据代表会议工作的总结，通过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04241

契切林就拉脱维亚党的情况致列宁的信

（1921 年 6 月 9 日）

1921 年 6 月 9 日

致列宁同志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对于拉脱维亚的共产党员，形势是非常不正常的。我几次提请中央委员会注意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的行为和方法，这对我们与拉脱维亚的关系以及我们的国际地位，都有很严重的影响。[①]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拉脱维亚共产党员或将他们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在武装进犯和抵抗的恐怖行动之后，当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公开谈到行将开展游击活动和从俄国将武器运送到他们那里去时，当资产阶级政府开始镇压时，我们不得不出来处理整个这一切的后果。如果

① 1920 年 1 月，拉脱维亚的苏维埃政权垮台和苏维埃拉脱维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动解散。新组成的拉脱维亚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了会谈，并于 1920 年 8 月 11 日签订了苏拉和平条约，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和确定了苏拉边界。俄罗斯联邦承认拉脱维亚独立。规定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在俄罗斯联邦同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关系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当地共产党的代表并未放弃报复的希望，并继续进行地下斗争。1921 年 1 月 18 日，契切林就这一点给克列斯廷斯基写信说："因现在的政治要求有必要严肃提出边疆地区共产党的活动。如果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路线是要求和建立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合作的建设性（生产性）政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各共产党进行一些重要活动（演说），应该承认它们是有害的……。总起来应该说，所有边疆政府，甚至包括与我们存在最友好关系的政府认为，令他们无好感的当地共产党的存在，是由于从苏维埃俄罗斯流入了货币资金。在俄罗斯，苏维埃政府是实际的源头。边疆共产党的活动不能不因此而反映到这些国家对我们的关系上。"

我们在处理，我们应有影响能力。同时，拉脱维亚共产党员人实际上有可能使我们的国际关系受到伤害。或者是经济恢复，或者是危险行为，如果必须是前者和不该是后者，则我们就应该有实际安排成不会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机会。难道必须破坏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国际关系是因为，对我们的话什么也听不进的地方党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尔后迫使我们干预他们的活动结果。拉脱维亚的部长们一直到现在还在用在他们那里被判处死刑的拉脱维亚资产阶级换被判死刑的拉脱维亚共产党员。可以预见到他们总有停止这种交换的时候，因为实际上，这种交换是完全不正常的。一方面是拉脱维亚公民，另一方面也是拉脱维亚公民，如果我们处决俄罗斯白卫军分子，难道我们允许拉脱维亚干预或谁迎合另外一个人。我们甚至在1918年的情况下也没有允许米尔巴赫的干预，在这些情况下，他总是预先说明，要求（例如为谢格洛维托夫）说情，私下作为个人的熟人，而不是作为德国的代表。如果我们的地位（形势）是这样，即在镇压拉脱维亚共产党人时我们不能洗干净手，则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对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的活动和手段进行实际的监督。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① 1921年6月21日，在政治局讨论了契切林提出的问题。在通过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委员会提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员同志们注意，他们必须使自己的政策与俄罗斯联邦国际地位的特点相适应……。中央要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共产党员在内外政策方面持慎重态度，和注意俄共中央的指示，这就是在现在不可能谈到俄罗斯向他们提供军事援助问题。"

№04242

扎斯拉夫斯基就莫斯科地区党员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1年7月22日）

文件副本

1921年7月22日

致俄共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同志：

最近，在莫斯科各地区的党员大会上，开始明显表现出不合时宜和持反对立场的特点。

从普通群众、平凡的人以及常常还是从一些负责工作人员中出来的党员对最近的一些法令[①]采取了一种完全令人无法容忍的态度。

政策急剧地改变了。采用收费原则。允许将企业租让给旧的占有者。有为大工业建立基地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破产了。组织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的全俄委员会。有许多全套的法令。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慌乱，而慌乱又加剧了饥饿。

需要准确及时的消息，然而却没有这样的消息。结果不是共产党员影响非党群众，而是相反，共产党员或许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那些能产生白匪（白卫军分子）的思想。

① 这里指在新经济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通过一些法令。

7月21日，我在俄国共产党莫斯科委员会上提出必须向非党人士通报情况的意见，因为代表会议取消了。[①] 群众靠传闻和流言蜚语过日子。我建议恢复周五例行群众大会。此建议引起了许多抗议。同志们开始议论，这将束缚共产党员的手脚。只有群众鼓动员安东·洛吉诺夫同志支持我的意见。莫斯科委员会代理书记明科夫同志逐字声明如下：现在的一些群众大会不知是一种什么会，这些大会自己发布的一些法令却不清楚这些法令的目的是什么，和对其后果（如要客运运费）感到惊讶。当莫斯科委员会临时代理书记在有各地区的20个人出席的常委会正式会议上这样讲时，你可知道，这是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而在工人大会上增强了这种反对情绪。这种情绪同工人反对情绪相似，但却更危险，因为是来自基层的要求。这里没有外交手腕，外交手腕在没有军队的将军那里曾有过。

向您写信，请您考虑并说明以下问题：1）共产党组织的落后状况、不学无术，和2）组织与非党群众失去联系。

列宁同志建议想一个新的联系方式来代替无党派代表会议。还没有这种联系方式。甚至在莫斯科都成为了酝酿慌乱的适宜土壤。

致敬礼

俄共莫斯科党组织市委会书记　扎斯拉夫斯基

① 这里指1918～1925年举行的无党派代表会议，目的在于向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通报党的政策问题。无党派代表会议的工作主要因“工人反对派”工人演说和活动风潮而于1921年春季和秋季引起中断。

№04243

契切林就发布收成情况信息致加米涅夫的信

（1921 年 7 月 30 日）

文件副本

1921 年 7 月 30 日

致加米涅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必须有计划地、慎重地发布有关收成情况和饥饿者形势的消息。在我们这里发布的一些东西不是大肆散布谣言就是让人放心的说法，说什么形势根本不是那样糟，有马铃薯或有了荞麦，等等。听了我们消息灵通的无线电广播，我认为我无权暂停这种正式的新闻消息。而且我无权制止通过俄国国内的无线电广播这些消息。在我们的内部广播并不比我们外部无线电广播少的时候，西方国家也在收听和截获我们的内部广播。我自己读了我们的正式新闻，最终也不知道，是不是把十个省转变成了一片连绵不断的沙漠或在雨水改善了形势之后是否出现部分欠收。我们的正式新闻的特点是前后不一贯和周密思考不够。外国正着重利用了这些。谁想把我们的形势形容成大崩溃的样子，就可以搞到我们的谣言消息；另一些人能弄到令人快慰的消息。芬埃德·乔治在回答询问时声称，关于下了雨和雨水改善了形势的俄国无线电报消息倒把我弄糊涂了。戈尔登贝格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主管我们的情报局和情报处的责任。需要尽快以党中央决议的方式对这件事办好手续，尔后您才能够以某种形

式让他来参与领导，以便使他熟悉在这个问题[①] 上我们政策的所有细微差异。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负责的无线电广播对强化悲观或乐观情绪有无影响。应当知道，在信息和制造舆论方面我们需要什么和为什么。我们已经收到了全权代表发来的许多电报，他们自己以及各种各样的慈善家、红十字协会和其他团体要求消息、消息还是消息。我们为满足这个要求做得很少。我们应该利用戈尔登贝格同志的出现，来解决这个头等重要的任务。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除我以外所有与戈尔登贝格谈过话的人都没有强调这个任务的极端重要性，他已同意承担这个任务。我感到，在他那里甚至出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特别地感兴趣。

同时，有人给我们发来了电报和无线电电报，要求进行电报和无线电电报采访。其中有的要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另一些是找高尔基，第三是找我，第四是找李维诺夫同志，等等。应当利用这种对新闻消息的渴望，而不是将这些要求抛入纸篓。为了使援助饥饿者的运动不致转为反对我们的武器，应尽可能地去关注新闻报道事业。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① 8月5日，列宁将电话通知转交给莫洛托夫，要求他在询问所有政治局委员后将戈尔登贝格的任命定下来。就在当天，组织局做出决定："建议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确定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同志为俄罗斯通讯社社长。同时责成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同志主管外交人民委员部情报处的工作。"

№04244

契切林就国际援助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1 年 8 月 11 日）

1921 年 8 月 11 日

致莫洛托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在当前援助我国饥饿者的问题已成为头等重要的国际问题。[①] 虽然这时毫无疑问世界反动阵营内的主要集团和政府正对这个问题在进行磋商，但很明显，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我们应该加倍警惕，以便预先防止准备反对我们的突击，我们的政策应该非常灵活，经过周密考虑，适合于复杂情况，因为在我们的敌人中间肯定有很大的分歧。在这种形势下和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在对这方面产生的极重要问题迅速做出决策的常设领导集体尚未建立前，不能停留在政治局极少的全体会议上。在征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意后，我建议，由现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同志同您一起组成了三人政策小组，全权代替政治局就每天因援助饥饿产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做出决策。[②]

---

① 关于给俄国饥饿者提供援助的问题在当时已成为国际社会舆论、某些金融集团和国家议论的焦点。1921 年 8 月 10 日举行的协约国最高议会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设立“查明给饥饿居民提供援助可能性”委员会的决议。这里指打算在协定参与国的监督下设立援助俄国饥民的统一国际组织。

② 在第二天，即 1921 年 8 月 12 日，政治局为解决与援助饥民有关问题任命一个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莫洛托夫和契切林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至少两天聚会一次。

此外，我们也不能没有一个哪怕小一点的机构来处理这件事。我们遇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每天我们接到一些电报，提出了关于援助饥饿者的建议和要求。所有这些都经过我的手，并由我转交给加米涅夫、克拉辛和李维诺夫同志。但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机构来处理这件事。在加米涅夫同志那里积压了许多各种各样有关这个问题的电报和文件，他不能一个人顶替一个机关。结果没有给德国红十字会做出答复，对挪威政府给我们送鱼来的建议没有做出回答，对最近几天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提出的要求和建议谁也没有作过研究。每天我们接到从伦敦来的关于援助饥饿者运动的大量专门通报，收到大量有关同样材料的外国无线电广播和电报。我们必须掌握这些文稿，关注它们，进行深入思考，以便从中捕捉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一晃而过，我没有这个问题方面的顾问，因为这不是我们人民委员部自身的问题，而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①] 的问题。但他们那儿也没有一个机构，没有研究整个这些材料并使之系统化的顾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掌握充分的事实来考虑我们的行动和判断在每个规定时刻的形势。因此，必须在加米涅夫和克拉辛身旁建立一个专门秘书处。秘书处应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集中所有这些材料，并使之系统化，以及关注这些未了结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我们也没有向我们的公使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驻外国代表发过足够详细的指示。伊格纳托夫同志要求给他提供详细的指示，因为在我寄给他的报道中，他似乎弄不清楚，由六人组成的代表团怎样进行工作，要不要聚在一起，作为完整的统一体，怎样做出决定和确定自己的活动，或者这六个人以单个人在不

① 指附属于全俄中央委员会的援助饥饿者委员会。

同国家工作和直接接收莫斯科的领导。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络在波兰，但在弄清代表团工作的主要问题以前，代表团无法展开自己的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04245

契切林就南森提出的援助条件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1年8月27日）

1921年8月27日

致莫洛托夫

敬爱的同志：

必须尽快确定，政治局同意不同意在与南森签的条约[①]中提到的社会活动家委员会[②]。这个问题的断然提出，不仅涉及到获得

① 这里讲的是签订在日内瓦会议（1921年）上建立和由南森领导的国际援助俄国饥民委员会的地位、组成和活动原则条约。1921年8月25日政治局委派由契切林、克拉辛和克列斯廷斯基组成的委员会在南森抵达莫斯科后同他进行预先谈判。

② 这里指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1921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次全俄农业试验代表大会上普罗科波维奇教授进言，建议建立反饥荒社会委员会。在高尔基和加米涅夫的中介下为了得到国际援助，问题摆在俄共（布）中央面前。1921年6月29日，政治局根据高尔基的报告做出关于设立援助饥民统一委员会的决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长时间讨论后确定了委员会组成的法令。出于政治考虑，共产党员进入次要地位。形式上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由普罗科波维奇、科斯科瓦和基什金领导（所有三人对布尔什维克都持反对态度）。在口头上委员会享有搜集和分配国内外粮食的广泛权力，实际上甚至连一个做出和实现实际决定的严密机构都没有。根据1921年7月15日政治局的决定，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接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面监督。这种形势是部分党的领导害怕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及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转为反布尔什维克反对派组织中心的结果。1921年7月30日，加米涅夫在给列宁的信中写道："当获悉国外在工人和政府界人士中有关援助饥民的做法后，确信只派遣一个社会代表团将是一个大错误。代表团必然成为资产阶级圈子和工会等的援助中心。我认为出路在于将我们的工会和合作社代表团赶在那个代表团之前

援助的问题，而且也与借债一事有关。谈到在日内瓦会议上组建南森组织的执行机构的组成。这个执行机构应按同等原则由南森的一个代表和我们的一个代表组成。南森和他的同事的最后底线是执行机构的二号人物将由苏维埃政府任命，但应从社会活动家委员会中选出。我们可能从像加米涅夫或谢马什科同志，或其他的共产党员中任命一位，但必须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成员。南森说，他很熟悉西欧各界人士的情绪，他相信，如果这里不提到社会活动家委员会，他的措施一样也不会成功。让我们从我们的同志中任命一位，但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招牌应该在这里提到。不这样做，事情注定要失败，南森和他的同事们也会中断工作并离开这里。至于说到1000万英镑的借款，两位英国专家声称，如果在这里没有提到社会活动家委员会，英国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提供借款，而没有英国的参加，一般来说就不可能得到借款了。

我们争辩了几个小时。南森和他的同事宣布，对他们来说，想继续让步无疑是不可能了。在争论过程中施莱辛格建议，作为同类组织中的一个，只有附注中提到社会活动家委员会。但另外一些人认为这是不够的。弗里克建议，整个结构换成另外的样子，遵循戈韦尔协会的样子，即不是对等的执行机构，而是整个组织完全掌握在南森和他的协会的手中，不受我方的干预，只有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但是南森本人也承认，这种完全独立的组织对于像戈韦尔那样完成供给儿童这个狭窄的任务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苏维埃政

（接第192页注释②） 派往国外……”。1921年8月3日，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洛佐夫斯基称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的代表团为反苏维埃、反共产主义的团体，在他自己给政治局的信中说要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路线委派代表团，并坚持行期提前。尽管契切林、克拉辛采取了较“灵活”的立场，1921年8月25日，还是做出了不让全俄饥荒救济委员会代表团出国的决定。

权，事情涉及到包含对整个饥民援助的庞大组织，就会形成极为不方便的形势。而且这也不能解决无论如何要设立专有苏维埃政府参加的组织才能借款的问题和必须要提到社会活动家委员会的问题。然后，当所有其余各点都已拟定和各点之间已协调好后，最终南森又重申，最大的让步是由苏维埃政府从社会活动家委员会成员中任命执行机构的二号人物。

今天晚上，他们全部应该离开这里。南森务必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到达日内瓦去参加会议，在途中，他应顺道去伦敦，所以今天是他启程的最后期限。或者是他们走掉，中断同他们的联系，或者是同意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应签署条约。因此应接受这个决定，如果是一个有益的决定，则条约将由南森和我立即签署。

各点间都已协调好了。南森起初要求，所有从国外送来的援助（除戈韦尔的援助外）都要经过这个执行机构，但后来他和他的同事同意，执行机构只要知道通过其他途径和其他渠道获得的援助，目的在于协调。为了监督这1000万英镑借款的使用，应给执行机构增加几个主要政府的代表，不作为执行机构的组成人员。他们的任务仅仅是监督。为了确定人员的权力，可直接借用的转抄一些戈韦尔条约中的条款。如南森或某政府用我们得到的借款购买商品，要有专家的援助指导以便买得更便宜，但这也要与我们联系商量，如果是比较便宜，我们提出的牌价才能被接收。

因此，关于援助和借款的整个问题可归结为政治局是否同意在前文中提到社会活动家委员会一事。我还要补充一句，就在同一天，埃尔卡特[①] 曾在我这里，他谈了他打算提供1000万英镑的商

① 1921～1922年，英国企业家和金融学家埃尔卡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关于获得自己原先在俄占有的租让企业的谈判。

品借款，而且条件之一也是社会活动家委员会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在某种程序上参与这件事。

情况是这样：或者是拒绝借款和援助，或者是在规定的范围内提及上述委员会。[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① 就在同一天（1921年8月27日），南森和契切林签订了条约和补充协定。

№04246

斯大林就援助阿富汗起义者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日）

1921年11月2日

托洛茨基同志：

昨天贾迈利－帕沙在我这里（苏里茨也在场）。从谈话中（对我来说至少）发现（谈话持续了三小时）：

1）我们应该给予支持，将贾迈利的要求缩减一半，而对起义者的要求缩减80%。

2）我们应向喀布尔给贾迈利派去10名或5名有经验的军事教员——穆斯林（伊斯兰教徒）（这样的人员我们这里是有的），形式上是去帮助贾迈利，实际上是对资金和军事装备消耗是否正确进行监督（贾迈利也不反对）。

我很清楚，构成印度河和旁遮普地区绝大多数的穆斯林部族（贾迈利在这个部族中享有很大的影响）可作为我们的一个基础。如果英国在1922年春天或夏季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给它以最沉重的打击。[①] 此外，如果我们有可能使贾迈利在阿富汗至少有一个由我们的和土耳其的教官参加的旅（组织得很好），那么我们就可以为阿富汗的反英力量建立一个实用的基地。这个基地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没有它，第二个任务（对印度起义运动的

① 尽管1921年10月签订了英国－阿富汗条约，而且根据条约英国承认阿富汗完全独立，苏维埃俄罗斯仍然继续给在阿富汗及其邻国的人反英起义运动以军事和物质援助。俄国和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张的。

直接影响）就不可能完成。所有这一切，我们得一次性直接向起义者领袖们支付 10 万卢布才够，另外为供养土耳其和俄国穆斯林教官需 10 万金卢布，补加 6000 支步枪（英国的或德国的）、几百万发英国枪械子弹、12 挺马克西姆机枪、12 或 8 门炮，最后加 1 个穆斯林印刷所。

我想，我们能够而且应该这样做。否则，我们就要冒削弱我们在阿富汗势力的风险（那么就会相应地强化英国的势力），并且在国际形势要求这样做的时候，失去在春季或秋季沉重打击英国的机会。

我想，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明天就要政治局彻底解决这个问题。[①]

斯大林

① 在 1921 年 11 月 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了这个问题。会议做出决议："给指定的目的增加拨款 20 万金卢布。指派两名完全掌握了外语的同志和五名以内的助手去"。

№04247

克拉辛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1年11月8日）

莫斯科

1921年11月8日

致列宁同志[①]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在英国的一些报纸上援引了您在某次党员大会上的讲演[②]。在讲演中，您似乎声明要拒绝国家资本主义和转向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的完全自由。当然，这些报纸几乎经常搞错您的讲话，然而，我却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向您谈谈我的看法。

如果谈话真的讲到了这种让步，我认为就绝对不能用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可得到某种直接的物质利益来证明这种让步的正确性。

世界资本主义已或多或少地承认，在最近这段时期在俄国除了苏维埃政府以外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别的政府了。只要能给他们

① 在信的第1页上有列宁的批注："秘密，莫洛托夫同志，请各位政治局委员传阅，列宁，11月19日"；在莫洛托夫和托洛茨基签字的下面，有莫洛托夫的批注："已阅"。在信的空白处，有列宁的批注：在第1页"您似乎声明要拒绝国家资本主义和转向私人资本主义关系的完全自由"一句的旁边，列宁写道："真是胡说!!"，在第3页"这里，我第一千零一次地要求您中断格罗曼委员会的工作"和"委员会将所有的东西都揉成一团"这句话旁边，列宁补写道："胡说"。

② 指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第七次莫斯科省的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新经济政策的报告。

提供参与利用俄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机会，世界资本主义也能顺从苏维埃制度的存在。根据我最近几周进行的谈话和留下的印象，我可明确肯定地说，资本家能够容忍我们制度的许许多多的特点，因此我们没有任何必要放弃国家对大工业的监督，放弃运输和对外贸易的垄断，因为在实际运作中我们将要采用的垄断，是不排除外国资本广泛参与开发俄国的垄断。没有任何必要从手中放弃按国家统一计划调整整个国家生产的机会。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做。实际上，对我们来说，保护这些革命成果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如果彻底的共产主义消失，和不能经过工会或国民经济委员会调节整个生产，我们就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和保持对工业、运输和对外政策的国家计划调节，这样就能在国内避免纯资本主义生产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各个企业和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强烈的相互竞争——这种情况业已存在，这将是反对纯资本主义原体制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也是一个优势，这个优势一点也不比苏维埃国家制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占的优势小。

放弃国家垄断和国家计划经济，我们坚决不用这个代价换取任何附加让步，也不会为了外国资本的任何施舍而实施这一无异于政治自杀的行为。

资本家现在向我们提出的要求可归结为以下几条：

第一，要建立和坚决实行能保证工业和商业工作，贵重物品、商品和人员无障碍流通的制度，没有此制度就不可能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我们的肃反委员会以及工会干预工业工作的问题在这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技术设备生产问题上他们暂时还不是内行，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些不学无术的人。机关和侦查员根据一些荒谬的、经一些无知外行人员发明的罪过——“技术抵制”，或“经济间谍活动”，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长期关押在狱中，不论什么重要的工

作，都不能用在俄国的外国资本去干，不管他们多少次地宣誓放弃从共产主义中恢复私有制的努力。被迫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式缩减这个领域内的肃反委员会人员。我几乎不怀疑，要将肃反委员会的所有针对外国公司职员的案件转给某些一般司法机关——可能会给使用在俄国的外国资本提供进行任何工作的条件。如果不规定某个不受全俄肃反委员会恣意妄为的明确保证，我们在俄国就不能建立一个重要的租让企业和商业企业。不久前电报普及运动理事会主席弗利克斯·杰伊奇在我这里，他宣布说，为恢复俄国经济首先是为恢复农业，他在继续同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最大公司就组成康采恩进行谈判。这个计划使德国特别感兴趣，因为实施这个计划不会与德国工业展开任何竞争，相反，会付给德订购犁、拖拉机、农业机械和其他产品的资金。同时，德国发展了农民的耕作业，并给自己打开了获得比较便宜的粮食和原料的来源，一部分用来支付这些康采恩提供的债款。可能在12月，我势必与这个集团的代表一起去莫斯科进行较认真的谈判。但在谈话的结尾，杰伊奇从口袋中取出一份拘留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程师的完整名单并宣布，在肃反委员会的这种政策下，同俄罗斯不能开展任何工作。我应该说，我对我们谈话的这一部分不是特别自信，因我非常清楚，这些逮捕绝大多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例如，在彼得格勒，拘留了一个叫戈什的人，是一个60岁的老头儿，原西门子公司的经理，因从国外得到了几百马克或克朗的补助金而被捕。我确实知道，这个戈什饿得要死，绝对不能认为他熟人中的谁给他寄一点钱就是犯罪。杰伊奇还把施瓦茨称为囚犯。他因一个很荒谬的理由而关押了好几个星期，7月份当我在场的情况下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种事例不胜枚举。而我们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却暂时处在像阿格拉诺夫这样一些人的魔掌中，他们对技术，对经济是绝对的一窍不通，这样，任何

工作，甚至最简单的资本主义在我们这里都是不会成功的。[①]

第二个条件是私有制、财产和各种已得到的权利不可侵犯的全面保证。这当然不排除禁止投机倒把、购买贵重物品等我法律为外国人规定的义务。我们能全面严格执行这些法律，如果违犯了这些法律，要使外国人受到法庭审判。这种法庭应按某些法律规范组织，我不认为，我们怎么就不能设立人民法庭或法院，庄严地将那些购买钻石或出售可卡因的外国人关进集中营。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经过全俄肃反委员会而不经过法庭，这完全不可理解。对法庭，谁也不能反对什么。当然，全俄肃反委会不满意，他已决定枪决博格达季扬，而案子送到革命法庭，案件变成了原告的全面丑闻，不仅要宣告无罪，而且还要以完全恢复被告的名誉而告终。

第三，极重要的条件是为各种商品（古图耶夫斯基海关）、银行账户、保险等等提出补偿要求。还有工业产权非国有化要求，以及因我社会法律与地方苏维埃、一些苏维埃机关和职员任意行动造成损失的补偿也要附加到这些条件上去。

这一点将是我们谈判中最难办的一条。拒绝没收土地所有权的某种补偿较为容易。很值得注意的是，大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代表，甚至包括厄克特这样的人都同意，要得到被夺去土地的某种补偿是不可能的。因此将全面坚持要求类似古图耶夫斯基海关等对未偿付商品的补偿，而这里不能得到大的折扣。制造厂、轻工业厂和其他企业方面的问题就要困难一些。就实质来说，我们能够非常有秩序地实施收回所有权的整个计划，但缺少国家责任，促进所有者管好企业的动力，就是说，不能让出像铁路、电能等应由国家占有

① 1921 年 6 月 30 日，列宁询问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逮捕施瓦茨工程师的情况。在明仁斯基和阿格拉诺夫签署的回答中说："施瓦茨犯有参与为西门子效劳的经济间谍罪"。1921 年 6 月 28 日，施瓦茨被判两年缓期徒刑。

的东西。当然很难坚持这个阵地，而资本家也开始利用对他们所有权的原则承认，以后又通过他们的政府就能够向我们施加压力，并得到整个国家的援助。从另一方面，实际实现某些奢望将会碰到很大的困难。如果每个所有者都提出各自的要求，则需用几十年时间去检查这些要求，且仍然不能得到确实的成果。更准确地说，我们势必要重视某些概括总和的要求，这就像1918年在柏林会谈时中出现过的那样。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们因干涉和封锁造成损失所提要求的必须条件下，我们才能在原则上承认这些总和要求。这里，我第一千零一次地要求您中断格罗曼委员会[①]的工作。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配给物，而使此项工作半途而废。戈伊赫巴尔格委员会[②]将所有的东西都揉成一团，而一些有说服力的数据（资料）却没有采集到，现在我们在谈判中一无所获。

因正在形成一种我们将把被我们打碎的饭碗碎片抛向世界资本的形势，我认为正是这种总和协定（就像1918年8月与德国人达成的协定一样）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换句话说，就是用一定金额赎买外国原来在俄国的所有利益。这就使我们免遭就外国人收归最大和最重要企业进行的艰难且对我国不利的谈判之苦。我们已成了所有俄国工业的主人，然后，就能在租让合同的基础上引进外国资本。我们的补偿金应纳入我们债款总额，可以说，已在总额中溶化了。

---

① 指由格罗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从1920年开始工作，确定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给俄国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1920年末，工作暂时中止，但在1921年年中，在研究租让政策问题时，又重新恢复工作。

② 指由戈伊赫巴尔格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研究与外国承租商要求自己的革命前财产所有权有关的问题。1921年，此委员会与格罗曼领导的类似委员会平行工作。1921年10月22日，列宁在给契切林的书信中，要求他从克拉辛关于租让政策的困难的书信的角度检查格罗曼和戈伊赫巴尔格分别领导的两个委员会的工作。

将所有者原来的企业还给各个所有者，而且要偿还他们的损失，是很赔本的，由进一步发展这些企业而出现的所有潜在好处当然会落入所有者的手中。如我们走上这条道路，则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某种崭新的法律和工业课税的完整制度等，以便没法让资本家纳税。

根据一系列迹象，我发现，合作社方面和国民经济委员会方面为争取“对外贸易自由”正在展开一场最激烈的运动。

这种自由没有任何必要至少在目前无法预料。我们的对外贸易垄断是有足够弹性的，以便能够满足合作社以及某些总局和中心对外国产品的所有需要。这里确有大投机商人和小骗子十分明显的反革命阴谋，他们不仅想发对外贸易的不义之财，想经常与外国往来，而且简直是要破坏国家某些经济关系调节的最后余额。不久前劳动国防委员会下的某个委员会似乎准许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自由在国外开设自己的部门，似乎政治局已批准了这个决定。[①] 这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补偿完全不需要的对苏维埃制度敌人的自杀性让步。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甚至还没有试过进行对外贸易，它还不能肯定，经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组织能否进行这种贸易，但他坚持要设立独立的组织，以便得到对任何大投机商和投机倒把交易不进行检查的机会、派遣自己人员的权利等等。您怎么不理解，只要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的头儿可自由出国，资本家就将想尽一切办法，使同我们的任何贸易都化为乌有，封闭给我们的任何贷款，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这条轨道的。难道您不想一

① 10月8日，中央全会研究了欣丘克、弗鲁姆金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商品交换和合作组织的提纲和为研究这个问题任命了由丘巴尔、欣丘克、弗鲁姆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组成的委员会。在委员会的指示中曾指出：“要使合作社具有最大的优势”。10月14日，政治局原则上同意委员会的建议，其中也包括给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在外国设立自己的代表机构的权力。

想，科罗博夫们和贝尔肯海姆们为共和国的贸易利益服务，服务得会比可能做到的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已在做的还要好。当我们的贸易机关今年春天准备接收贝尔肯海姆公司买的商品时，在接发货仓库检查时，发现赫赫有名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买了质量最坏、价位更高的商品，甚至比我们的贸易代办处发展缓慢时期时我们做过的还要差。

我要结束此信了。不应急忙对资本家做出让步。十月革命成果中的许多东西还可以抢救。在拟定计划方面，应当有计划地行动，不要发生我们在8月和9月份做出的那些怪僻行为，这些行为会把我们抛到至少半年或一年前去。

我建议不管多重要，所有的政策变化都要经过一些哪怕是短暂的预先讨论。例如，如果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同意契切林建议召开的会议[①] 的话，则必须现在就确定一个将委托它进行谈判的委员会。应当预先考虑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员和工作程序。否则，我们又会在匆忙中造成许多错误。

致同志式的敬礼

克拉辛

① 国际经济财政问题会议于1922年4月10日至5月10日在热那亚举行，有29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了欧洲经济制度的恢复问题。“俄国问题”是会议工作中的主要问题之一。给俄国提供贷款问题取决于是否能向协约国偿还沙皇政府的债务。苏维埃政府的代表提出了关于国内战争和干涉时期遭受损失的反诉讼。

№04248

契切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1 年 11 月 10 日）

急件

送列宁同志

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们不能突然抛弃经政治局多次坚决确认的我们已坚持一年有余的政策。

我向您寄去过罗特施泰因关于吉兰事件的报告[①]。如您那里这个报告已丢失了，为您再复写一份很容易。罗特施泰因坚决驳斥对他的责难，并绝对否认，他支持沙赫君主政府反对起义者。[②] 他的

① 指 1921 年 10 月 24 日，罗特施泰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驻伊朗全权代表）给契切林的报告。报告详细描述了伊朗的政治形势，首先是围绕吉兰共和国的形势。

② 1921 年 10 月 24 日，罗特施泰因在给契切林的报告中写道："……我不完全理解，政治局从哪里得到这样的印象，好像我提议沙赫去消灭库奇克汗人和其他起义分子。您应该明白，我总是阻止里扎汉在吉兰前线进攻，千方百计力争在库奇克汗人和政府之间安排妥协……这时，我建议库奇克汗和他的全部伙伴可自由来往俄罗斯……顺便说一说库奇克本身。我发现在莫斯科你们那里仍然对他充满着同情的态度。您自己评论他，称他为"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革命者，虽然蒙昧无知。我完全不赞同这个观点。我已非常熟悉各种类型的波斯人，我把库奇克汗看做仅是各种利益的探求者和国家财产的掠夺者（这种人整个波斯是很多的）中的一种。库奇克汗无论从其起源还是从其服务年限来说都不属于拥有使用国家财产垄断权的高官显贵，他们设法使自己成为革命者的角色，目的在于从我们这里得到资金组成自己的总督管辖区、恫吓中央政府。这个人拥有土耳其人和英国人的援助，而当我们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他则用伪装的革命行动很机敏地也考虑利用我们的可能……"。

干预的惟一目的是应某些起义者领袖的要求帮助他们能无阻挡地撤走。起义阵线的被消灭是因为没有我们的援助他们不能坚持下去。汗与汗之间相互厮打，阵线几乎自身瓦解了。

我们的东方政策已完全由事件证明正确。我军的占领和大战争，与英国的战争是惟一的选择，起义者的运动意味着来自我们方面的军事威力，我们方面的军事威力又意味着占领和随后的大战争。可能我们将在未来不定什么时候能够进行东方的共产主义战争。

下面这个论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仿佛罗特施泰因有影响力仅仅是因为波斯政府想在他的帮助下消灭吉兰阵线。正好相反，吉兰阵线妨碍了他的影响。我们按照所有英国人的连续退出来评定他政策的结果，而这个情况的发生当然不是为了消灭吉兰阵线。我们对波斯政策的结果是消灭英国专制独裁。收买高官显贵和小问题上的亲英决策毫无意义，而却开始形成……政治集团、大政党的萌芽。伊朗共产党德黑兰委员会曾同他有接触，他们就在波斯本国工作，完全赞同他的方针。不知道为什么共产国际需要由俄罗斯的波斯人在巴库组建共产党，[①] 这

① 契切林也借用了罗特施泰因报告中的这个材料。罗特施泰因宣称："……在巴库，正像您知道的，不久前违背共产国际的决定，成立了新的伊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个中央委员会怎样和为什么要成立，我不清楚，但现在，他在纳希切万召开了阿塞拜疆共产党员会议。在这些共产党员中有一个竭力想夺取波斯阿塞拜疆的政权和将这个省从波斯分出去的小组。有人转告我说，在这个小组里有明显的奸细……。很明显，我们的巴库人或在那里靠他们庇护的某人又想干某种危险的事情，我想请您将这一点通报给我们的中央委员会以及共产国际，以起制止和警告作用"。罗特施泰因害怕高加索地方局预言的行动，早在1921年夏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使"巴库人"从属于自己的问题。契切林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方便的和多余的"，契切林于1921年7月16日在给列宁的信中仍写道："……原则上在巴库不能接受我们的波斯政策。但会有这样的危险，'秘密地'，就像不久前关于格鲁吉亚那样，会破坏这个政策。如果有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的话，则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是守纪律的。因此，我感到最好是政治局命令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及高加索的所有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应密切关注，使俄国波斯条约与中央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波斯政策的命令无论如何不能被任何苏维埃机关、负责人员和党组织破坏"。

时，在波斯国的德黑兰已有开展工作的共产党。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计划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由倾向于起义分子组成这种联盟必然会导致鼓吹叛乱和新的起义尝试，这正是，而不会是别的什么东西，能引起罗特施泰因政策的垮台和英国人的返回。

当然会提出整个我们的东方政策问题。因此，如果将要提这个问题时，我恳切地请求把我召回政治局。[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②]

① 1921年11月11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波斯政策问题。列宁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演说。1921年11月17日提出的波斯政策问题已“全部”解决了。1921年11月12日，契切林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将罗特施泰因的报告和信、驻恩泽利的苏维埃领事的报告和塔什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关于波斯形势的报告转发给政治局各委员。他在附信中给北部波斯起义运动领导人作了明确的说明。他概括自己的报道说：“从苏维埃政府建立的一开始，然后是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在这些人物间一直存在着各种变故、相互逮捕等等的内部斗争”。11月17日，政治局决定召请罗特施泰因和奥尔忠尼启则到莫斯科来开会。还决定答复奥尔忠尼启则和基洛夫说，“在他们的电报中，建议立即在阿塞拜疆组建地下波斯解放委员会和着手在吉兰组建革命组织的这一部分与要求高加索地方局完全停止为此而进行的所有行动的中央决定是根本矛盾的”。

② 在最后一页的背面，有列宁的手稿：“要修改政策。这里罗特施泰因是对的。是否应该召他来？”

№04252

李维诺夫就租让对象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1年11月13日）

1921年11月13日

抄件送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波格丹诺夫同志

致俄共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同志

从同外国人谈判租让的会谈中已完全明白，租让的对象不可能是革命前属于私人的企业，也不可能是被我们收归国有的企业。所有承租者都异口同声地声明，他们只接受革命前属于国家的企业的租让。因为这种企业数量很少，如果不采纳我在数月前给中央写信提出的建议（昨天我才知道，这个建议甚至还没有讨论过），那我们的租让政策注定会完全失败。外交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已同意我的建议，可归结如下：我们宣布，外国人可以按租让原则得到以前属于他们的企业，条件是要与苏维埃政府做好谈判。过了一定时间，如一年以后，在原企业家还未发出声明的情况下，企业就将会租给别人了。

只接受其政府与苏维埃政府保持正式关系的公民的声明。

这个建议对那些至今还规避与我们进行任何谈判的国家，以及以前在俄罗斯的原企业主同我签订协定具有很大促进作用。至于这些企业主比新的承租人能更好地承担他们熟悉的事务，那是不需要

证明的。

对我们来说，丝毫也没有在任何情况下必须将所有外国企业都租让出去的想法。如果我们想将某些企业或甚至某些工业部门留给国家，我们就可以向承租人提出一些不可接受的条件。

请不要拒绝，尽快地送政治局讨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李维诺夫

№04249

契切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1年11月22日）

1921年11月22日

致斯大林同志

敬爱的同志：

您对我关于东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信件持的不同意见是建立在我们的私有经济状况非常不适应基础上的，你的不同意见认为，协约国的资本现在很快就要深入到东方国家，对于这一点，我们已无能为力。但要知道，这个问题并非是这样。问题涉及到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长过程中，我们也不会停止不前。即使在那些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也不会马上在协约国资本掠夺面前投降，在他们之间正在进行长期斗争。在罗马尼亚塔克·扬涅斯库是协约国侵略性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表，但布拉季安总是以还未被协约国魔爪控制的民族资本来进行反对它和反对这些利益的激烈斗争。东方国家要达到即使是罗马尼亚的水平，还要走很长很长一段路程。而我们在这段时间内也不会停止原地不动。

现在我们逐个考察一下三个中东国家。在土耳其由小民族资产阶级执政。在土耳其最近两年出现的事情就等于一场小资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军官、城市小资产阶级、富裕农民相当彻底地断绝了与旧的统治阶层的关系，以及结束了在经济上隶属于欧洲的旧形式。欧洲借以搞乱土耳其的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清除了。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土耳其出现了资产阶级化和民主化的趋势，欧洲

资本也投放到这里。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过程。与法国签订的条约[①] 是法国第一次抛出的试探，之后必将有一段很长的过程。只有当工业破产、自然资源转入大资本家的手中而且这个大资本家与协约国结合在一起，这时协约国在经济上吞食土耳其的时间才会到来。但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波斯由于我们现在的政策度过了摆脱英国强权势力的蜜月。现在仍有英国人贿买高官显贵的，但这并不能阻止废除林奇的租让企业。对这个事实，我们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由于取消了英国专政波斯的资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打碎了英国资本套在他们身上的套索（以林奇租让企业形式出现）。在波斯，只有在经过我关于土耳其指出的同样那样长的过程之后才将会谈到协约国的吞没问题。

在阿富汗，十八世纪欧洲开明君主型的开明近乎专制制度[②]，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的技术援助之下正设法为发展私有工业创造条件。在那里摆在面前的道路还会更长些。

连在由英国人发展了地方工业的埃及，甚至在有很发达工业的印度，我们是在反对英国人专政和反对英国资本家经济压迫的激烈解放运动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在埃及发展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如果在一个很长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则通过与协约国资本的汇合，会使国有化废止和埃及在经济上从属于英国。这种从属状态（瑞典对协约国的资本就处在这种状态）只有在资本主义走过很长的发展过程和地方资本与世界协约国资本有机汇合后才可能出现。东方国家还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才能抵达这个阶段。

---

① 这指 1921 年阿塔图克政府与法国军事代表签订的协定。该协定规定应停止两国之间的战争，除由法国委托统治在叙利亚范围内的亚历山大列特郡之外，法国军队应从西利西亚撤出。

② 指 1919 年阿迈努拉·汗（阿富汗国王）即位。

但我们不会停滞不前。我们现今新方针的无比奇特性在于，无产阶级把政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购买资本家的服务，不允许资本家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这是夺取政权原理的全世界历史性的试验。我在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别赫戈费尔的谈话中，我指出了我们两种制度的完全对立。基尔特社会主义者[①] 承认这样的原理，认为在完全否认政治斗争和集中从事建立大工业工作之前，经济权力要摆在政权的前面。他们完全错过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我们现在可以讲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就会导致我们给私人资本提供有限的活动场地，严格监督私人资本。我们用这种方法使俄罗斯摆脱对协约国资本经济上的依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反动政策意味着民主的假象和协约国资本家的实际专政。牢固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够运用资本，不让它在经济上征服俄国。因此，我们的新政策，就像我们原先的直接革命化政策一样，确实也处在触目惊心的对抗状态。在我们和协约国之间可能会签订条约和协定，但在坚持新政策的条件下，我们双方仍处在相对立的两极上。

但我们因此将能够阻挠协约国资本家吞食各东方国家。由于他失去了在他控制下的亚洲（不仅仅是亚洲），我们与他们正在展开世界范围的斗争。在我们经济上并不虚弱的时候，不管我们怎么无能为力，都应抵抗英国资本深入拉脱维亚，拉脱维亚一直在经济上依靠我们避免了英国资本家的吞食。英国各银行给整个拉脱维亚的拨款计划未能实现主要是因为拉脱维亚有我们某种程度的经济支

① 基尔特社会主义，即基尔特主义——一种改良主义思潮，20世纪产生于英国。其创始人为“费边社”的成员，1914年创立基尔特民族联盟并制订其纲领。“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家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想像为通过将国有企业管理转变为全国同业公会（将在某个经济部门工作的劳动者联合在一起）管理的办法将资本主义垄断排挤出去的渐进过程。

撑。在波兰，和平潮流建立在波兰资产阶级竭力想在与我们的经济中找到支撑，以便使自己不被德国吞食。

因此，我认为，在从现在开始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还不清楚），我们能成为东方国家反对世界协约国资本经济吞食的支柱。这就给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生活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威力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前景，这也为发展东方国家的工农运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这样，东方国家将与俄罗斯及其无产阶级政权联系起来。

因此我认为，尽管有许多困难，今天的全部任务就是东方国家现在应走向独立经济政策的道路。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04250

斯大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契切林的信

（不早于1921年11月22日）

抄件送列宁

致契切林同志

我仍然坚持我关于在东方各国有实施我们经济政策的可能性的意见。

当然，我们在不定什么时候将从现今的经济崩溃中摆脱出来。当我们摆脱出来后，那我们就能谈到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组合了。但要知道，我们这里谈的不是“未来的麻烦事”，而是现在的实际政策，在土耳其、在阿富汗，我们不必在我们对方的几百万现金的面前退却，而在波斯，我们尽管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却为自己找到了亲英政府。我毫不怀疑，我们不论在贸易还是工业方面都不能与上述国家的敌人竞争，因为——1）俄国卢布的兑换率在下降，2）我们这里没有或几乎没有出口基金，3）我们的对外贸易完全是逆差，4）我们没有能够补偿我在上面讲的三点上经济亏损的足够数量的黄金。

应该承认，在您的第二封信中，我没有找到反对您这样（实际）提出问题的不同意见。

而在这个时候，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才能制订最近几年我们的实际政策。所有这一切当然都要在其他条件相同，即国际条件相同，所有的一切都按目前的样子和平地运行时才行。当然，对这一

点，不可保证做到。

我认为，更合理更实际的方法似应是集中精力发展与上述东方国家毗邻的一些边境国家的工业，也就是在阿塞拜疆、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只要在这些边境地区成功地发展了工业，我们就能够与这些国家首先建立贸易联系，而后建立工业关系，使他们接受俄罗斯的经济影响。例如，似乎可以将每个工厂（纺织厂和制革厂）转移一部分到阿塞拜疆去；每 2 个或每 3 个工厂（纺织厂或制革厂）转移一个到土耳其斯坦去；比如说在乌尔加和西伯利亚之间蒙古人和远东共和国按入股原则铺设铁路。实施这些措施不那么远离国土，也不像您的那个将一些工厂搬到土耳其去的计划那样不现实，因为这样，不用在一个陌生国家进行装备，而是在自己的，就是在自己的边境进行，这里俄国的卢布可以流通（因此，不需要花费黄金），这种创举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有厂房，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机关全力支持这些创举，乌尔加－西伯利亚公路为铺设铁路提供了方便条件，等等）。我认为，在我们现有的经济状况下，不经过特别的努力和俄罗斯中部的经济事业没作一些牺牲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不能实现这样一个与你提出的问题只有间接关系的最低纲领的经济计划。俄罗斯中部经济事业不作某些牺牲，我们甚至不能幻想俄罗斯经济的恢复和对协约国竭力想在经济上奴役俄国进行抵抗。

至于说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他们同土耳其和波斯相提并论，因为它们（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是俄罗斯和欧洲的中间环节，它们在把我们同欧洲联系在一起时，已作为我们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列入我们的总体中，这对恢复俄国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为此，我们还向这些国家支付了一定数量的过境捐款），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不能谈土耳其和波斯的理由。

斯大林

№04251

契切林就卡累利阿问题致托洛茨基的信

（1921年11月26日）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芬兰报刊正在大规模地谈论卡累利阿起义[①]：一部分队伍跑到克姆去，一部分进到索罗基，还有部分抵达波韦涅茨，说是很长的一段铁路已被破坏。据我们的消息，起义者在离克姆20俄里的地方，我们的队伍已从各地被驱逐，一些力量不够足的势力也遣散走了。如果现在不严肃对待，将会遭受到非常巨大的牺牲。积极分子都兴高采烈，他们的情绪都很高涨，工作热火朝天。文诺拉政府从来对积极行动不感兴趣，开始它对这件冒险的事情非常拘谨，但现在对它进行了激烈的猛攻而且起义的辉煌成就使它不可能完全无所作为。时间愈长，形势就会愈复杂。文诺拉可能被迫向国际联盟控告我们破坏条约[②]，总的来说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其后果不堪设

① 根据俄罗斯、芬兰尤里耶夫和约（1920年10月14日），在东卡累利阿地域建立了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东卡累利阿自治领。佩特萨莫（佩钦加）州转让给芬兰。1920年10月在赫尔辛基在芬兰政府的协助下组建了“卡累利阿联盟”。1921年秋，在卡累利阿爆发了口号为卡累利阿并入芬兰的起义。苏维埃军队企图镇压起义而越过了与芬兰的边界。这就成了芬兰公开入侵的借口。1922年10月，起义最终被镇压。

② 指尤里耶夫条约。1921年11月28日，托洛茨基给彼得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打电报说：“基于总司令发出的所有命令，我请军区注意，必须尽快和最坚决地消灭反卡累利阿匪帮，因为战争的拖延无疑会损害国际关系……”。

想。我觉得，我们对卡累利阿起义应该予以最严正的关注，顺便要进行一些宣传鼓动演说，以便不仅用一些照会去[①] 撵走文诺拉。

契切林

① 指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1921年11月18日致芬兰驻俄罗斯联邦代办的照会。

№04253

奥尔忠尼启则就顿巴斯煤矿情况致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1月10日）

旧莫尔斯卡亚

1922年1月10日

抄件送列宁、俄共肃反委员会成员丘巴尔和乌克兰共（布）中央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同志[①]

致俄共中央政治局

同一些工人，县党委会、基层组织、工会的书记，工作主管人员，专家，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理事会各成员进行的一系列谈话，和在哈尔科夫、巴赫穆特、卢甘斯克、迭巴耳策沃、卡迪耶夫卡、耶纳基耶沃、尤佐夫卡召开的一些会议中，我想象皮达

① 在信的第1页上有奥尔忠尼启则的批注："送列宁同志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马努伊尔斯基"和斯大林的批注："已阅，斯大林"。

可夫同志与顿涅茨的同志们分歧的原因是这样的[①]：

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在我们苏维埃和经济机关是一个少有的例外，其突出特点是守纪律、有秩序、准确和迅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领导小组选配得很成功。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完成恢复煤炭工业的艰巨任务的同时，还能不脱离党和工会组织，与组织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如赖因霍尔德、科罗布金、拉林、希特科夫、基里尔金同志，近期还有帕夫洛夫等同志）。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做了很多工作。它与它的工作人员领导小组实行煤炭专制，肩负着恢复庞大煤炭工业这个艰巨而责任重大的工作，在省的生活中，自然在经济上占有主导地位，并力争在党的生活领域也占有同样的地位。如果能想起皮达可夫、鲁普和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的许多其他工作人员为有影响的老党务工作者的话，这就特别容易理解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如帕夫洛夫、比特克尔、尤林）就不能想像在省委员会完全而自觉地执行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政策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会有什么不同。比特克尔同志说，我们不仅在地方上有工作管理人员，而

① 很快，奥尔忠尼启则就给列宁写信，在信中坦诚地谈了自己对皮达可夫和鲁希莫维奇之间分歧原因的看法："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当然没有能谈皮达可夫同志和鲁希莫维奇之间斗争尖锐的主要原因。这里，问题是这样的。我们乌克兰同志坚信，皮达可夫同志想把所有托洛茨基分子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掌握住顿涅茨的组织，我们进行了反对皮达可夫同志的无情斗争，决定将皮达可夫从顿巴斯撵出去，当然对他，什么也没有原谅，相反地，所有的事情都夸大了。我们这里的朋友直截了当地说他们不能让皮达可夫把顿巴斯转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堡垒。如果顿巴斯已在托洛茨基的支配下的话，他是不会沉默的。开始，我对这些声明持批判态度，但经仔细考察后确信，这里的一些皮达可夫分子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也不特别掩盖这一点。我们乌克兰朋友的推测和顾虑到底可靠到什么程度，很难讲清楚，但是，托洛茨基分子聚集在皮达可夫和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周围这一点是真实的。至于是否进行了组建和拼合党团的组织工作，很难说。"

且还有政治工作人员（他们把将党组织转入生产轨道作为自己的任务）。以鲁希莫维奇为首的小组对我们在顿巴斯的经济任务的看法与皮达可夫同志及其同道者不同。鲁希莫维奇同志说，“我们坚决反对煤炭专制在顿巴斯占优势，使所有其余的东西化为泡影。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还可能有燃料工业总局的这种倾向总体上不能经受国家的任何批评。不应忘记，在顿巴斯有我们主要的煤炭燃料基地，而且在顿巴斯还有共和国最重要的钢铁基地，还有主要的化学工业。完全不是用‘门第观念’来评定关于我们必须均衡发展相互紧密联系、由数千条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我国工业所有基础的指示；而是用具有向中央建议的勇气的‘大胆的人’的果敢来评定，建议认为不仅不应该这样经营管理，而且这样的经济领导人为了恢复经济应远离经济工作……我们已证实，作为一个临时措施，不要紧张的活动，不需要特别消耗国家的资源，在少量消耗粮食的情况下就能得到大量附加燃料。我们的观点仍是原来的，这就是靠小矿井增加燃料产量就可以缓慢地，但却能可靠地恢复大工业。为此，不应给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增加大量的生产任务，而应把注意力放在恢复大矿井上”。接着，鲁希莫维奇转入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他是这样描述的：“皮达可夫同志和他的追随者们开始在巴布亚人中（所有的人都应无条件地服从自称为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的一小群人）中以征服者自居。”[①] 另一部分皮达可夫的追随者，如尤佐夫分子、卢甘斯克分子都以地方保卫者自居。他们对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及其机关贬低

① 根据鲁希莫维奇的书面文件“我们的分歧”，他与皮达可夫的分歧是“关于正确对待工人群众的问题”，并于1921年2月开始，在讨论工会时就愈发特别激烈起来。

地方机关的作用和威信无疑是不满意的，他们有个要求，如果工作主管人员不能全服从地方机关，至少也要让他们不妨碍自己。卢甘斯克的利亚平同志在委员会情况报告的第 14 页上写道："需要削弱我们经济机关垂直结构的锋芒。不然的话，现存的内讧在其持续加深的情况下，不会使顿巴斯复苏，而会导致第二次七月大崩溃。在顿巴斯党组织上层领导人员的这种情绪支配下，皮达可夫和他的同志们要求在实际贯彻必需的煤炭专制中特别谨慎和非常有分寸。特别是把煤炭分配给突击组，这样就能使煤炭工业的工人和工作人员得到比顿巴斯其他企业工人更好点的生活条件。应该承认，皮达可夫同志和他的同事没有能始终坚持这种谨慎和分寸。在尤佐夫卡，丘古林夏天酗酒的丑相和尤佐夫卡县委会不止一次地要求撤走丘古林（这个要求暂时还没有处理），这些都还没有得到谢马什科和霍列奇科同志的承认，当然也不可能促进尤佐夫卡人士和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之间联系和团结的加强。在阿尔马兹纳亚，为了农业强迫迁出 80 名孩子，卢甘斯克组织的代表后来对此加以确认。这种迫迁十足丢人，这些孩子唱着国际歌返回居室并想住进去但却被拒绝了。顺便提一下，强迫迁出倒不是比特克尔造成的，因这个时候他还在莫斯科，是他的副手搞的。皮达可夫本人在 9 月 10 日出版的《共产党人》中发表的言论——"受伤的巨人"中说："从前，人们遵守党务职业礼节，和在不止一次损坏这种礼节的情况下，不会怀疑我们没有恶意……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我们将完成此项任务，也许会触犯某人。共和国要求这一点，工人阶级要求这一点，我们党要求这一点，而官方礼节被扔在一旁。"皮达可夫的命令没有给省经济委员会任何信息，在皮达可夫同志给尤佐夫卡县委会和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威胁他们，如果逮捕丘古林将把他们送交法庭和党的法院。对于这一点，还要补充说一下关于党的小煤

矿利用委员会的斗争。皮达可夫同志不相信开采小煤矿的成绩，而将它们转给省经济委员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碰到了以党的小煤矿利用委员会为代表的非常明显的竞争者。皮达可夫同志想让党的小煤矿利用委员会从属于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而省经济委员会不同意，从而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与顿涅茨的同志有严重分歧时，所有这些都会使气氛更趋紧张，最后使地方同志和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间本来就不怎么好的关系恶化。这种关系在全乌克兰会议[①] 上最终遭到破坏，一直到顿涅茨代表团中多数人要求立即将皮达可夫同志从顿巴斯撤除出去，否则，他们将撤销皮达可夫同志中央委员会候选人资格，形成使皮达可夫同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顿巴斯逗留的丢脸事情。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不想把事情弄到政治丑闻的地步，允诺撤除皮达可夫同志，然后，代表团投票赞成皮达可夫同志为候选人。整个这次斗争只局限于党的负责人员的圈子内，没有成为广大党员和非党群众的资料。

在全乌克兰会议之后，皮达可夫当然不可能在顿巴斯工作了。这一点，拥护皮达可夫的人和反对皮达可夫的人都承认。据同志们反映，广大工人群众的情绪还是令人满意的。在小部分党务界人士中对新经济政策的某些不理解据双方的声明来看已顺利消除。对待专家的态度，总的来说是好的。乌克兰支部书记杀害莫洛索夫工程师一事暂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这次杀害是对专家持敌视态度的一种表现。杀人者为一些19岁的年轻人，是1920年入党的党员。

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这一支部的成员扎瓦利申（想占据被杀害工程师的职位）手中的工具。根据工人们的反映，莫洛索夫工程师

① 乌克兰共产党（布）第六次全乌克兰会议于1921年12月9～13日举行。

受到工人的普遍尊敬。莫洛索夫被扎瓦利申的步枪杀害，在行凶的时候，扎瓦利申及其同伙都酗了酒。所有的杀人者都已被逮捕。在莫洛索夫被杀害后，扎瓦利申马上占领了他的职位，直到被逮捕。杀害阿利亚什克维克工程师的未遂罪是由因投机倒把而被开除出党的办事员尼库林犯的。矿井支部出面辩护，宣布尼库林无罪，释放他，还他自由。支部当然被解散，应进行重新登记，尽管拖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措施都采取了。尼库林由革命法庭大赦释放，返回到被工作主管人员开除出党的原矿井。在省委会施加了适当压力的情况下，顿涅茨组织中的不和和缺点被克服了。

现在粮食危机也威胁着煤炭工业的生产。现在只有两个星期的储备粮。如果不能及时将足够数量的粮食运来，煤炭的开采量就不可避免地急剧下降。党组织方面对待丘巴尔同志的态度是最好的，所有的人都相信，丘巴尔同志的工作是称职的，并答应全面支持他。顿巴斯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认为选丘巴尔同志作候选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除帕夫洛夫和比特克尔同志外，他们都允诺同他合作。帕夫洛夫和比特克尔不反对丘巴尔为候选人，认为自己不可能在顿巴斯长期逗留，要求过一个月后放他们走。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对顿涅茨铁路的彻底瘫痪必须给予最大的关注。在铁路员工中没有一点纪律和责任。一亿多[①] 煤炭堆放在那里并开始燃烧，这在矿工中引起了混乱。同时，在哈尔科夫－巴赫穆特区段，火车靠烧柴才能开动，因为蒸汽压力不足，在田野上时走时停。铁路在缺少机车和食品供应、奖金也不能支付的状况下，不可能把已开采的煤运送出去。

现在谈几句帕夫洛夫同志。我认为帕夫洛夫同志是优秀工作人员中的一个。帕夫洛夫是个病号，神经疲惫不堪，患有肺病。检查

① 原文没有量词。

委员会将“警告”记入他的党证使本来就很紧张的他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如果能把他党证上多余的“警告”去掉，那将是最好的“奖赏”。

奥尔忠尼启则

№04254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转寄电气化计划意见致列宁的信

（1922 年 1 月 10 日）

1922 年 1 月 10 日

亲爱的弗·伊[①]：

现转寄上西伯利亚委员会两位工程师（值得重视的人士）的反映意见。看来，“从旁边”来的草案中倒好像有些有意义的东西。[②]

我很欢迎与皮达可夫合作共事，对于这个问题[③]，您是怎样考虑的？

请允许我提下面这样一个医疗方面的建议，供您的医生参考。我记得，我的一些熟识朋友因神经疲劳过度而患失眠症，他们夸奖一些磷制剂的良好功效。如瑞士的“磷药”——一种完全无害的药，莫斯科的一些资产阶级家庭把它当做一种极寻常的药服用，这种药对失眠正好有显著的疗效。格季耶对此有什么说法？我再次重说一遍，您对待自己的态度就像一个“手工业者”，您就是这样的！……（嗯！）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您不是一个始终坚持实现电气化的人。

对于您，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您的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

① 此信寄往高尔克村。1922 年 1 月 13 日以前，列宁在此休假。

② 这里讲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制订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

③ 这里指任命皮达可夫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一事。任命已公布实施。

№04255

鲁祖塔克就工会作用和任务致列宁的信

（1922年1月10日）

1922年1月10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这些是我和安德烈耶夫对您的提纲草案[①]作的修改意见。其简要理由如下：

对第5条。对本条的结尾部分要修改，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有工厂的工人和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不同阶级的代表，这实质上是不正确的。[②]由此，不可能在某个企业产生阶级矛盾，而只会在劳动问题上出现误解。

对第4条。在第4条上，我们与安德烈耶夫和多加多夫有原则分歧。他们认为承认国有企业罢工的合法性是不可能的。最后，集

① 1922年1月4日，列宁在高尔克村完成了《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工会作用和任务提纲草案》的起草工作。遵照列宁的指示，提纲分寄给工会问题委员会各成员——安德烈耶夫和鲁祖塔克，以及莫洛托夫（转给政治局各委员）。除此以外，列宁要求转告安德烈耶夫和鲁祖塔克，要求他们在读完提纲后立刻给他打电话。1月12日，政治局会议研究了提纲草案，会议决定："可将列宁同志提出的提纲作为……基础，将提纲连同所有修改意见交给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安德烈耶夫和布哈林组成的编纂委员会作最后审定，并以党中央的名义公布，注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局支持该提纲"。最后的提纲草案作为党中央的决定于1922年1月17日在《真理报》上公布。

② 在列宁的提纲草案第3条中讲道，由于转入新经济政策，在允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商业资本基地……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工人群众和厂长间利益的某种对立……。因此，反对雇主和保护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阶级利益的责任无疑就会落在工会身上。

中到我提的这一条的措词上。托姆斯基不同意我的措词，指出在这个措词上损坏您合乎逻辑的思想发展。我不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不会坚持自己的措词，但我仍然认为某些地方需要稍许缓和一些。[①]

对第5条。我、安德烈耶夫和托姆斯基对第5条的措词的看法已完全一致。

对第7条。在第7条上，在组成工厂管理委员会中工会的作用问题上，我们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安德烈耶夫和多加多夫坚持老的提法，即“按工会和国家机关的协议任命”。我与托姆斯基也同样坚决维护您的措词，即在这个问题上，工会只应起协商的作用。[②]

其余的修改无关紧要，这里就不谈了。

对托姆斯基的工作讲几句。开始安德烈耶夫、多加多夫和安季波夫以棍棒来对待党中央关于托姆斯基返回的决定。[③] 安德烈耶夫甚至声明如果托姆斯基返回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他就退休。昨天这一群同志突然宣布完全同意托姆斯基返回，并建议今天就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办理手续。我从这里得出结论，他们举行了不仅有一些工会工作人员参加的“派别”会议。会上他们考虑了反对托姆斯基在政治上无利可图。我自己也很愿意他们能放弃自己的立

① 在列宁起草的提纲草案的第4条中讲道：“只要存在阶级，就不可避免地有阶级斗争……。由此可见，在现阶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罢工斗争，原则上不允许有关于以强制的国家中介取代罢工的律法。”

② 列宁起草的提纲草案第7条第1和第2款是专讲工会参与干部任命问题的。例如在第1款中讲道：“工会参与编组所有经济管理机关和与经济有关的国家机构的工作，提出候选人，和有发言权……。”在第2款中说：“工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从全部工人和劳动群众中提拔和培养行政干部……”。

③ 这里指托姆斯基返回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一事，这事曾在有中央监察委员会参与的情况下，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领导中引起过纠纷和争议。列宁支持托姆斯基。1921年1月4日，向各地分发了提纲，同时向莫洛托夫写信并寄去了政治局关于组织清洗工会领导干部的中央组织局委员会决定草案。

场。

经过与托姆斯基的谈话，我已确信，在他身上不存在委屈怨恨思想。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个别同志有些隔阂，但这已毫无意义。因为他在全苏中央理事会的工作中只能与我联系，我相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他是完全能镇定自如的。

致同志式的敬礼

鲁祖塔克

№04256

季诺维也夫就工会提纲草案致列宁的信

（不晚于1922年2月4日）

我给一些很亲近的同志看了您关于工会的提纲草案。我们在俱乐部一些关系密切的同志内进行了讨论。

工会工作人员总的来说没有反对的。只有一部分实事求是的反对意见。谈到罢工的论题（在国有企业里），其中只有个别人感到有些为难。

米柳亭谈了一些使人震惊的话。提纲实质上是“对工会的嘲弄”。工会完全不参与经济。党中央给工会抛来了一块啃剩的骨头。他反对不通过代表大会和诸如此类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最坏的莫斯科达官显贵同出一辙。唠叨不休、闹纠纷、吹毛求疵！

斯米尔诺夫讲了一些非常明显的话。总的来说，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在这里工作得也很好。但有时他会有一些特有的“莫斯科情绪”。

总体上，他同意提纲的意见。但他也补充了下列美中不足的话，当然，党中央不能大声讲完所有的东西，但这正是我们这些老工作人员应该知道：一旦我们将失去苏维埃政权时，提纲准备了第二种立场；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应该特别保证自己与群众的联系……。

致敬礼

季诺维也夫

№04257

契切林就西藏考察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2月6日）

1922年2月6日

致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否决第二次西藏考察用的2万金卢布拨款，其理由是不够充分的。我们期待舒米亚茨基来这里把此问题更详细地讲清楚。在同他会商之后，我请求政治局重新审查这个问题和对第二次去拉萨考察用的2万金卢布的拨款一事。我们在1921年秋天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团，现在已经抵达拉萨，在那里，它为我们今后的进一步接触，其中包括我们送去达赖喇嘛极感兴趣的技术性礼品提供了条件。第一个考察团带去了代表俄罗斯联邦送给达赖喇嘛的礼物——无线电台。此电台已成为我们与他们进行联系的基础。在当时，我们还没有懂西藏语言和因参加了喇嘛教能长期驻留在拉萨的无线电报务员。经过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艰苦努力，成功地物色到了懂藏语又参加了喇嘛教（布里亚特人和蒙古人）的人士，同时，从政治上看，他们很可靠，又对我们很忠诚。克服了许多困难，才训练他们学会了复杂的无线电报务技术。我们的第一个考察团已答应达赖喇一有机会（即1922年春季）就会以第二个考察团的形式给他们派去无线电报务员。但仅派我们已训练过的无线电报务员是不允许的。即便是这样，也不能满足对这个考察团的期望。英国特使加紧谋求向达赖喇嘛虚伪地介绍作为一个只剩下沙漠和痞棍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同时，他们将苏维埃政府描绘成残酷迫害佛教的政

府。第一个考察团的一个目的是首次与达赖喇嘛接触，在这个考察团内没有指导员。在第二个考察团中，除无线电报务员外，还应派指导员，他们应同他们的随行蒙古同志在拉萨传播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正确观点并加强俄罗斯与西藏的联系。

首先，这种联系具有政治意义，因为与拉萨的友好关系对整个佛教界有重大意义。另外，这种联系也具有经济意义，因为这首先给我们提供了与西藏建立商品交换关系的机会，除此以外，会异乎寻常地复活与所有佛教国家的商品交换。从这些国家得到的原料，其中包括畜牧产品对我们的整个贸易平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拉萨没有友好的联系，我们就不能在亚洲各佛教国家和欧洲间好好地完成我们贸易中介人的作用。

要求拨给这个考察团 2 万金卢布的款项必须尽快拨付，因为去西藏的季节快到了，从气候条件来看，这个季节是很短的。

外交人民委员部　契切林

№04258

拉科巴就外高加索联邦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年3月12日）

1922年3月12日

亲爱的谢尔戈：

今天我去过你那富丽堂皇的阿布哈兹，要是你什么时候豁出钱去购得某种“政治上的富丽堂皇”就好了。不用夸大，也没有矫揉造作，完全可以真诚地宣布，作为领袖，作为我们能以纯洁理性和心境这样轻快接受的鼓舞者，亲爱的谢尔戈，在所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条件下在我们的革命工作中处处都将伴随着我和我的同志们。在这方面，我们不把那些真正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人，对所有促成你在无产阶级革命辽阔空间这样愉快完成大量工作感到敏感的人（这些人是很多很多的）当作例外。当然，我称之为共产主义演员、共产主义骗子、共产主义反正教仪式派信徒的那些人是不想见到所有这一切的。

去它的吧……

我是从梯夫利斯与一些精力充沛的人（可以说，是教授）一同去的。不要认为，我患夸大狂病。绝对没有这回事。我也保证免遭所谓共产主义妄自尊大的危险。简单地说，我能轻松地分析哪怕是很复杂的事情，至少，对识破不同的“库塔伊斯英雄们”[①] 的任何计谋，我已不感到那么困难……。不要惊讶我思想的模糊不清。我

① 这里指在建立外高加索联邦问题上同奥尔忠尼启则发生冲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

本来可以将我要向你讲的一些想法表述得更清楚些。但现在我故意没有这样做，也许对你来说，对这一点不那么特别需要。我只想直接向你说一件事，这就是我过去和现在都激烈地渴望以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行动、自己的革命意图使你相信，我忠于共产主义革命和你本人。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任何条件下，我都将会表明这一点。耳朵有点障碍，但没有关系。我的听力，在关键时刻就会恢复，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任何情况下，我向你报告，我不是那种每天过分颂扬你的许多人才的一个，鬼知道为什么。

有时，应该想一想阿布哈兹的蚊虫，他们会叮咬革命领袖的敌人的。

我敢这样闲谈，是因为您对我亲切的态度，尽管我现在还没有得到，但我想我会得到的。

致深厚的共产主义敬礼

永远忠于你的　拉科巴

附言：我们已同拉比诺维奇同志商量过并已达成“协议”。

№04259

加里宁就党员队伍的规模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2年3月27日）

1922年3月27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 我们不仅靠威望，而且还要靠站在所有重要管理岗位上的共产党员生活。

最后，要看每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很好地、情不自禁地在他所在的每个地方成为国家制度的捍卫者。

这样就能束缚住我们敌人的手脚；扯碎敌人的联系网络。

2. 您说必须把党的人数减少到一定的规模，这时就能比较容易地在某种程度上观察研究党的情况，而且党的这种规模也能使党中央能够轻快地随机应变。①

① 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清理党的问题是在1921年12月举行的第十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组织局草拟了“关于加强党”的提纲草案。在1922年3月9日，列宁已知道了草案的第一方案。当天列宁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谈到在接受工人入党时必须有有3年党龄的俄共（布）党员的介绍，农民和红军战士入党时，必须有4年党龄的党员介绍，所有其余人员入党时必须有5年党龄的党员介绍。1922年3月24日，即中央全会的前一天，列宁口述了对提纲的意见和建议。他建议组织局只对已生产劳动了10年以上的工人保持半年的预备期，而对所有其余的工人增至1年半。对农民和红军战士，确定预备期2年，而对职工为3年。莫洛托夫向列宁报告说，“关于你就中央全会（3月25日）决定给中央委员们的信，我答复如下：我完全同意你信中所表达的精神。1）除了工人和红军战士（后者为青年，在红军中，他们都经过良好的政治训练）都应增长预备期。对农民、职员和其余

毫无疑问，从战略方面来看，这个任务是正确的。但要知道，我们迫不得已而建立红军，红军不仅要有相当的质量，而且也要有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数量。

我好像觉得，必需的共产党员的总数量比您想的多一些，我感到，这个最低数应该不小于 50 万。

无论如何，对于这个问题，在解决之前，必须预先进行实际需要党员人数的统计。

3. 我们全然不知道，我们党在这个时候（未清党）是在扩大或是在缩小；所有的客观数据说明，党在缩小，和有理由认为，这

（接第 234 页注释①） 的人员增至 2 年（我和许多同志都同意，在全会上大家都赞成）。我觉得，再加长就不该了。无论如何，在下一次党代会上可完成这件事。2）这样说吧，规定检查预备党员的政治工作必须严肃认真。我认为，应要求有入党的推荐信（工厂企业中的工人预备党员，在城市，这是可以做到的）。在实际接收党员入党的县委会和区委会应有 3/4 人员的同意（甚至有一致同意更好）。4）检查委员会最好不参与这件事。省委会（在区委会或县委会之后）也应有 2/3 的选票才能做出决定。5）建议采用（取代新的清党）一次性措施，将十月革命后入党的所有职员（不是工人，不是农民，也不是农民出身的红军战士）转为 1 年期或 2 年期的预备党员，以便进行补充检查。县委会或区委会一致同意接收的不包括在内。这一条是可以改变的。”总之，党中央全会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并批准了“关于加强党和党的新任务”决议提纲草案。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是在 1922 年 3 月 27 日开幕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展开的。在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和党的新任务”决议中，讲到：“修改加入俄共的条件出于这样的思想，使不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难以入党。其目的是确定下列三种接收入党的方式：一、确定三种接收入党的类型：1）由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工人和红军战士；2）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农民（不含红军战士）和手工业者；3）其余的人（职员，等等）……”。接收第 1 和第 2 类代表入党的条件是要有有 3 年党龄的 3 名党员的介绍，对第 3 类代表要有有 5 年党龄的 5 名党员的介绍。同时，对第 2 类和第 3 类人员入党必须要有俄共（布）省委批准才能入党。所有年龄在 20 岁以下的青年（不含红军战士）都要经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入党。对第 1 类代表的预备期，规定应不得少于 6 个月，对第 2 类为 1 年，对第 3 类为 2 年。

种缩小主要是由于我们党内的两个社会集团——农民和工人减少造成的。现在不存在任何能说明这个缩小过程不仅已停止，而且还向相反方向发展（工人和农民蜂拥参加党）的客观事实。热亚那会议当然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一些老的共产党员不再担任职位，他们甚至会离开党。

现在工人或农民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真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苦难，只要注意到他们必须参加余粮征集工作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参加共产党并不能给普通党员提供任何好处，相反地，因经常奉献和服务而损害着他们最起码的福利，因此，退党之风愈刮愈烈。

4. 照我看来，多年的工龄不能成为选拔优秀工人多么重要的保证和优异的方法。1）它对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居住的工人有利，2）渴求过自觉生活，竭力要改善自己的业务的工人都是很不固定的、求知欲旺盛的人，正因为如此，工人的入党预备期在实际上拖长了好多倍。

5. 你说，小资产阶级可能利用工厂（在我们如此马虎的情况下，也只能如此。）认为在工厂可随便游荡六个月那就大错特错了。工人最不喜爱游手好闲的人。如果有的人能进入工厂，工作六个月，博得党支部的信任，我们将无法反对这些人去保卫党；而他们经过不太大的障碍就能轻易地弄到伪造文件。

最后，可采用一条能准确确定只有真正进行体力劳动的人才算工人的条款。

而将所有各式各样的人士——工长、记分员、守卫者等等都列入职员一类。

6. 不妨进行一下各工厂党的基层组织增长情况的检查（哪怕只限于莫斯科），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些资料肯定会说明从1922年1月1日起共产党员人数在减少，它们的附属区还没有计算。

7. 六个月，是一段够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在检修厂内已能对工人在职业政治觉悟上形成一个明确意见。

我再重复说一遍，工人好久不踊跃入党了，小资产者想经过工厂溜进党内比骆驼穿针还要难。他在找一条更容易走的道路以得到列宁同志本人或党中央其他有威望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介绍。

8. 关于红军战士的军龄

我们战士的服役期大概为两年或两年左右，这就是说军龄确定不移地应比这个时间短，如果我们认为，除了政委和指挥员外，普通的红军战士中也应有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就让指挥部确定这个最小的百分数吧。

我认为，谁也不敢冒只让军队中的指挥员为共产党员的险，因为那样的话，无疑，将使指挥员失去与红军战士群众的联系。没有理由在他们离开时发给党证，毫无疑问，几乎 9/10 的来自农村军人党员，刚一回到农村就会离开党。但为军事行动而动员他们入伍时，他们又会重新入党。

9. 党好像成了可以通行的大门，但我感到，这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快。从党的利益来考虑，这是必不可少的，党经常在缩小也经常在壮大。我们没有理由阻止谁离开党，但也没有理由死死地关紧党的大门。

我毫不怀疑党是靠选择而生存的，同样也不怀疑在选出的人员中，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由于一系列原因又会出现一些不习惯的人士。党员人数的任何减少也不可能保证这个过程的停止。

10. 限制和阻碍入党，就会使积极分子加强非党群众的力量，并为他们造就领袖人物。我担心这一点甚于担心最近一二年党会发生蜕化的危险。到那时就会看到事物将向何处发展。

加里宁

№04260

索尔茨就接收新党员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2年3月27日）

莫斯科

1922年3月27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你所有关于接收入党要谨慎的意见都是完全正确的。但应该接收工厂的工人和年轻的红军战士入党。

并不总是老的比年轻的优秀。不应忘记，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有许多冒险主义的人以及一些认为应享受社会主义财富的幼稚人物径直钻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这种情况正像小说《经过100年》中所描绘的一模一样。

现在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再往前迈进艰难困苦还是很多的，所以工人和红军战士都不那么拼命地往我们这里钻了。

那些躲藏在工厂怕被动员走的所有工人早已离开工厂了。现在应把工人定义为至少在车床旁呆过不少于1年的那些人。

监察委员会全俄会议确定，监察委员会将来应进行清党的工作。应只向省委会建议多关心相应监委会选拔的工作，但应不妨碍监委会进行清党工作。

应该加强党的工作，重新教育青年们，要对党的负责工作人员，特别是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他们不很喜欢的严格的党组织纪律的教育并且通过党内调配，撵走那些不遵守这种纪律的人。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遵守这一条，我们就会做好我们的事情。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索尔茨

№04261

斯米尔诺夫就限制工人入党问题致列宁的信

（1922年3月）

就工人入党所采取的限制措施问题致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农民开始大规模的退党，城市小市民也在退党，但少一些。惟一忠实的后备军为工人。但他们入党的很少。（在彼得格勒的一些工厂有2～3%的工人入党，而在陆海军中有10～12%的农民入党）。

不应加强阻挠工人入党的力度，况且工人群众中的外来成分已经离开，走向农村，去搞贸易或其他行当。我们不得不看到工人对那些不仅靠工厂工作生活而且还从事贸易活动的人持激烈的反对态度。

我们的不幸不在于党被堵塞了，而在于老干部之间和老干部与党中央没有任何联系，不能抵抗党内新阶层的压力，反而被新人溶化了。

应该寻找到一种联合这些老干部的形式，否则，在工人反对派[①]的压力下（这个反对派由于物质生活的困难状况而施加压力），我们的党真的就会出现裂缝。

斯米尔诺夫

① 工人反对派，俄共（布）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一个派别。1920年9月成立。1920年11月，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组织了特别会议。1921年1月25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施略普尼科夫“关于工会任务”的提纲，它与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一起构成该派别的纲领性文件。主要的一条要求是将国民经济的管理交到工会手中，设立由生产者（工人）组成的经济管理机关（“生产者代表大会”），将工业各部门的管理权集中在相应的工会的手中，等等。在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工人反对派”共有45人。在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和大会举行过程中展开辩论（“关于工会的争论”）之后，通过了“关于我们党内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并谴责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并宣布，宣传这种思想与俄共（布）党员不相容。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再次谴责了小组的派别活动。

№04262

彼得斯就布哈拉政权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4月3日）

旧布哈拉

1922年4月3日

敬爱的斯大林同志：

除了3月21日的报告书，我还要报告下列情况，如果莫斯科或塔什干的什么决定不妨碍的话，则布哈拉政府的危机就应结束了。

最近在布哈拉政府领导层周围的气氛是非常紧张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法伊祖拉·霍贾耶夫不在政府，这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当他从莫斯科返回后发现政府已完全混乱了。在布哈拉差不多都是

巴斯马奇匪帮，公开的代理人恩维尔·帕希在布哈拉逍遥法外。[①] 谁

① 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于1920年9月在布哈拉酋长国的领土上成立。布哈拉共产党在俄共（布）中央的土耳其事务委员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下准备了反对赛义德、阿利姆－汗艾米尔政府的武装起义。在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布哈拉战役中，艾米尔政府的部队瓦解了。这时，有大量的黄金被运到塔什干。后来，契切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在布哈拉革命中，不好的是我们的部队掠夺了一些东西，与此同时，有大量属于布哈拉的贵重物品被运到塔什干。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在整个东方传开了，因而严重损坏了我们的威望……”。1920年9月，在布哈拉成立了新的最高政权机关——全俄布哈拉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包括其他民族组织的代表。由于极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和在这个地区党的力量和干部不足而被迫接受的这种妥协成为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不稳定和闹纠纷的原因。除了军事存在外布尔什维克领导向布哈拉输入大量财政援助（其中一部分是作为对运走的贵重物品的补偿）。从1920年底到1921年中，给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提供了400万卢布。按照1921年3月4日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和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同盟条约及经济协定，这种援助是合法的。这种援助的官方宣布的总额每月已达到200万卢布。然而按苏维埃精神的改造却遇到了政府和居民的反抗。1922年春，当伊斯兰运动领导人之一恩维尔·帕希转入反苏营垒和从莫斯科回到中亚后，形势就尖锐紧张了。恩维尔·帕希在布哈拉的出现引起了政府的分裂。例如，全俄布哈拉革命委员会首领毛希丁诺夫接纳了恩维尔一方。中央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委员捷克尔曼给驻阿富汗的俄罗斯联邦全权代表拉斯科利尼科夫写信道，“恩维尔以许多巨大的麻烦相威胁，建议我们放弃中亚并让土耳其斯坦人和布哈拉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务。……这是很奇特的历史。我们不能强迫这只突厥狮子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也许，我们方面的疏忽大意加深了被赶进布哈拉洞穴的这个有皱纹人物的心理悲剧，似乎是想从那里因受这种忽视而向我们报复。……当然，也可能，这里的心理因素会增加一个恩维尔搞的某种一般政策的缜密性。我们一点也不了解阿富汗－恩维尔关系。但我有这样的印象，这就是由于在中亚已成功地奠定了基础，恩维尔开始有结束已给我们带来许多巨大困难的政策的心理活动。”。拉斯科利尼科夫1922年3月19日从喀布尔向卡拉汉也通报说：“根据从东布哈拉来的我们的朋友的消息，恩维尔正在坚决实施从高加索到卡西皮的东方总起义准备计划。计划活动中心在东布哈拉、费尔干纳和撒马尔罕。向希瓦和土耳其斯坦所有各地区（州）给他们派去了特使。给各代理人发了扮演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拥护者的守则，同时又进行着反对我们的地下工作。有穆赫特金去撒马尔罕和到这里的消息，穆按照恩维尔给的任务应前来请罪并要求在布哈拉成立真正的共产党政府。在东布哈拉和费尔干纳完成组织工作后，恩维尔准备首先在土耳其斯坦的某个地点举行起义，然后扩展叛变区，与行动开始的同时，开展游击袭击，破坏铁路。”在阿富汗方的支持下，恩维尔－帕希的联合武装力量于1922年2月占领了杜尚别并集中进军布哈拉。由于出现了政治危机，布哈拉政府的代表霍贾耶夫乘车去了莫斯科。

也不愿到前线去，中央控制下的左派共产党员，除人民委员会的以外，有一半拒绝接受任何工作。

这种形势最终将全部工作搞垮了，在法伊祖拉·霍贾耶夫面前，我坚持要召开负责工作人员会议（这种会议曾召开过两次）。所谓的左派抛出对政府一些人士的各种控诉，并宣布（在我同索科洛夫一道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分析所有起诉材料，并推荐索科洛夫同志为该委员会领导时）说他们手中掌握有关于政府罪行的文件。委员会在工作，但正像索科洛夫声明的那样，已可以看出，所有的起诉材料都经受不住任何批判，甚至最左派的代表也证实这一点。委员会的最后决定应能缓和气氛和中止任何相互指控。我们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在政府和中央周围保留没有刑事案件和巴斯马奇分子案件的所有派别中最有能力和精力的人士。最不能调和的是那些右的共产党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我攻击过他们和在两次会议上揭露过他们，索科洛夫也这样做过，以驱使他们后退。

我坚信，气氛很快就会得到缓和并组成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和可靠的政府。只是要重复说一遍，那必定要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

最近，这种外来的干涉有过不少次，特别是来自土耳其斯坦，从方面军司令到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的干涉。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命令在这里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要求赶快将布哈拉骑兵部队及其马匹转交给派来的俄国部队。这个决定是在布哈拉人想尽一切办法从各单位为俄国红军战士购买或没收马匹之后做出的，但可以看出来塔什干不愿考虑。我认为，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来组建布哈拉部队集群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便使在布哈拉领土上采取的一些军事措施与政治措施协调一致，否则就会出现全面的不一致。通过往那里输送布哈拉政权的代表，在布哈拉专门组建不那么独立的军事委员会，就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我们在犯最大的错误，表现在我们损坏了布哈拉共和国的独立，因此使居民来反对俄罗斯居民，给恩维尔冒险行为提供借口，不但如此，我们在遵守布哈拉的外部独立时，完全有可能遇到来自内部和同志的压力。因此，我们势必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完全有理由重组布哈拉肃反委员会，更换其人员。最近决定要采取下列措施：1）最大限度地简精苏维埃机关。2）设立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高层苏维埃机构。3）给农民做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以改善情况。4）尽可能的多吸收一些农民、手工业者和一些民族的代表参加建设。5）采取一切措施加强布哈拉共和国革命武装部队的战斗威力。6）清除布哈拉共和国中的泛伊斯兰主义代理人。

注：本信附有描述艾米尔计划的三封信[①]。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彼得斯[②]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无这些信。

② 在本信的第1页的左上角上，有斯大林的批注："列入政治局档案。斯大林"，旁边盖有俄国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处执行局的印记，以及收到日期：1922年5月11日。

№04263

斯大林就解决布哈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4月21日）

发文：莫斯科4月21日7时55分

收电：4月23日10时30分

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1922年4月21日，中央委托你立即赶往塔什干，自你到达之日开始的一周内，从顺利肃清费尔干纳和布哈拉地区巴斯马奇匪帮的观点出发，查清土耳其斯坦前线的情况，并将你的结论尽快报送中央委员会。中央决定了解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的军事情况，而且，你必须取得土耳其斯坦政治局的协同，定下了解军事情况的期限，并将一切报知中央。在你做出结论时必须回答如下问题：

第一，当地地方部队是向巴斯马奇匪帮供应了武器吗？

第二，当地政府真的干涉军事并且把军事部门的行动搞瘫痪了吗？

第三，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领导机构需要进行调整吗？如何进行调整？

第四，土耳其斯坦政治局和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组成需要进行调整吗？如何进行调整？

第五，丢失布哈拉和费尔干纳会有多大危险？

第六，巴斯马奇匪帮的组成和人数如何？当地政府和党组织是

如何对巴斯马奇匪帮作政治斗争的？

第七，我军的战斗力到了何种程度？其人数和对取胜的指望有多少？

第八，经过调研获得了哪些需要提请中央采取的切实的措施？

收到该密电和政治局决定的抄件后，连同你抵达塔什干的时间一起电告中央。[①]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

① 1922年4月23日，斯大林给奥尔忠尼启则发电报一份，内容如下："你过3、4天动身的通报我已收到。没有补充指示了。"1922年5月12日，奥尔忠尼启则寄来了完成受命情况的总结。

№04264

卡拉汉就阿富汗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4月25日）

俄共中央政治局

斯大林同志：

现就您4月23日质询的古谢夫同志在4月18日密电中提出的问题答复如下：

在阿富汗内部组成自治阿富汗土耳其斯坦，或北阿富汗并入布哈拉，并在这一新的实体上组建新的土库曼省，这些是古谢夫同志提请中央批准的建议。

这一计划，从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思想上看，从可行性的观点看，都应予坚决的批驳。没有我们的直接帮助，在北阿富汗不可能组织起任何起义。根据布哈拉和希瓦（还有土耳其斯坦本身）的经验，我们知道，居民对替代艾米尔组建的政府的认知程度取决于俄罗斯在这些共和国驻扎的军队数量。

所有从乌兹别克压迫[①]下解放阿富汗人并请他们拥护我们的尝试，只能通过惟一的办法——向那里派出红军——才能实现，其他的任何办法暂时都行不通。而所有与北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保持着旧有联系的布拉托夫分子和贝依穆拉托夫分子，都不可能唤起受压迫的怠惰的阿富汗乌兹别克群众必需的热情和决心起来与阿富汗政权作斗争，为此，必须继续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这个

① 指阿马努拉·汗政府。

工作现在还没有开始。最重要的是要使阿富汗的乌兹别克人确信，阿姆河对面，在布哈拉生活的他们的同族人过得比他们好，比他们安宁，有着阿富汗艾米尔政权无法给予他们的许多优越性。我相信，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认识，而且尽管受到阿富汗现政权的压迫，他们也宁可要现政权，而不会选择对他们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令人怀疑的布哈拉人民共和国的生活。不仅我们的部队直接进入北阿富汗（没有这一步，无论作者谈什么样的计划都是空的），甚至一些反对阿富汗艾米尔的起义也会最终使阿富汗落入英国人之手，导致同他们的战争，甚至作为宣战的事由；将会尝试着（即使不成功）夺取阿富汗的土地（就算不是为了俄罗斯）。我们不是祈求对阿富汗的战争，相反，它对于我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最大的不幸，因为同穆斯林国家的外部战争可能造就一条巨大的战线：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希瓦、外里海国，使得所有民族主义的敌视我们的穆斯林国家扬眉吐气，耗费我们大量的人力物力。

对阿富汗的战争将从政治上彻底破坏我们在穆斯林国家的声望，英国人将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而且比起我们在东方利用我们的特殊作用更容易。

古谢夫同志的计划除了对阿富汗作战外没有别的东西。古谢夫同志提出的这个简单的计划，也就是把东布哈拉作为“起义区”从阿富汗分离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起义区并不是使布哈拉脱离阿富汗的一堵密实的城墙，相反，构成了更有力地，主要是更切实地支持东布哈拉巴斯马奇匪帮的方便通道。现在阿富汗给予的这种支持是暗中进行的，还有很大困难；有了这个起义区，可以为他们进行最大规模的支持和武装提供各种借口和掩护。

目前，全部精力都应该集中在肃清东布哈拉巴斯马奇匪帮上，并且开辟不会使我们在布哈拉的主要任务变得复杂化的新战线。

还可以肯定的是，费尔干纳的巴斯马奇分子不可能命令什么外部敌人支持他们，也用不着将东布哈拉的活动列入阿富汗对它支持的账内。迄今为止，除了一般的指示外，我们没有任何有关这种支持的具体证据。我不怀疑恩维尔得到了阿富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不会大，而且也不是全部。不久前被我们截获的布哈拉艾米尔与巴斯马奇头目之间的来往信函和其他情报都可以证明这点。

如果我们还有人力物力在北阿富汗搞起义，那就是最好把它用在保护连接布哈拉和阿富汗的为数不多的山路和通道上，以此使起义区与阿富汗人隔离开，也比古谢夫同志电报中所说的既复杂又冒险的办法好。

惟一可以答应他的是，在阿富汗领土上组织一系列的“小刺”：组织一些规模不大但装备精良（胜过马队），可以撤去阿富汗的哨所，可以进攻阿富汗的邮局和官方机构，进攻某些孤立的部队或军用仓库，但没有任何政治旗帜的小队。这件事的意义在于：我们和布哈拉人得向阿富汗人表明，而且也可以明白地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反对我们在布哈拉的存在，他们也甭想在北阿富汗过安心日子。

我就该问题同苏里茨同志及戈帕涅洛夫同志商量过，他们俩都很熟悉布哈拉和阿富汗的情况，都表示坚决地反对古谢夫同志的计划。

卡拉汉[①]

① 4月25日，卡拉汉的信被送到列宁处。

№04265

奥尔忠尼启则就布哈拉局势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2 年 5 月 12 日）

塔什干

1922 年 5 月 12 日

莫斯科，俄共中央，斯大林同志

布哈拉的局势可以说几乎是全面的起义。据这里的资料，在东布哈拉，在恩维尔的领导下，起义正在变成有组织的行动。现政府的孤立无助、缺乏威信、办事无能，以及掠夺我军仅有的装备和服装，都促使了起义的扩大。为挽救局势，必须尽快做好准备，推翻恩维尔。向东布哈拉的进军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地形极端的崎岖不平，恶性疾病横行，缺乏交通工具和宿营地，对地形不熟，居民纷纷逃离，像卡尔希城一样）。大家都认为，恩维尔将避开硬战，迅速离开。指挥部认为，凭现有兵力要进行布哈拉战役是不够的：两个步兵旅，还有两个编制不足一半的骑兵旅。卡库林要求再增调一个步兵旅，方面军司令员没有预备队，没法给他，团是没有辎重的。第 1 骑兵旅的部队已展开，红军战士要求前线撤下来；刚刚从莫斯科调来的步兵旅和第 10 骑兵团还是块生料，没有一匹马，没有一辆车。

反恩维尔战役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不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如下措施，布哈拉问题也是无法解决的。这些措施包括：第一，尽快改组政府机构，建立民族民主的政府。

第二，允许布哈拉在境外经由我们的港口从事除俄罗斯必需品之外的贸易。没有这一点，整个经济就无法避免崩溃的命运，迫切希望取得我们支持并希望与我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工商业集团最终也会离我们而去。

第三，解散共产党和共青团。据阿共中央书记和一些领导同志说，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哪都不中用。这一条要通过重新登记来进行。党内只留下少数可靠的同志（目前有14000名党员）。交给这一少部分同志的主要任务是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多半由前艾米尔官员和波斯人组成的右翼共产党人，则宣布为党外人士，只留下少数个别的同志。

第四，要实际控制布哈拉政府，必须有一名全权代表，而科热夫尼科夫同志并不适合担任此职。

第五，政府的基本核心应由以法伊祖拉·霍贾耶夫为首的一批人组成。

第六，军队的薪俸，除布哈拉政府供给口粮以外，都由我们承担起来，为此需拨出100万金卢布。不要求布哈拉政府通行我们的阿尔帕里纸币而尽量保持布哈拉货币的汇率。

第七，不宜向布哈拉公布军事情况，因为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第八，为实施上述各点，临时派遣深得布哈拉人信任的埃利阿瓦同志去布哈拉，召回索科洛夫和彼得斯同志。关于土耳其斯坦的事，我另行报告。我打算14日动身，顺便去一趟布哈拉，见一见法伊祖拉[①]。这个人，在布哈拉的时候没见过，那时他去外地了。[②]

① 即霍贾耶夫。

② 在1922年5月13日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中，斯大林写道："电报已收到，有关土耳其斯坦局组成的变动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变动，你都没有告诉我。如果有空的话，都告诉我一下……。"

№04266

斯大林就处理布哈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2年5月14日）

5月14日

塔什干，奥尔忠尼启则

所有来电均已收到。中央的回电只有等明天才能发给你，今天我已不能召集中央会议。暂时把我个人关于布哈拉的意见告诉你。埃里阿瓦的事不妥，因为战端一开，占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快越好，问题只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占领。[①] 我明白，在实施占领的同时必须对主张返还被赎回土地的民族的、宗教的割让路线进行长期的政治斗争。有关对于布哈拉人和土耳其斯坦人的指示已在3个月前下达给中央委员会。穆赫吉诺夫这个人很危险，他是阿富汗现行政策的主要责任者。没有贫下中农代表的民族民主政府要么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复辟艾米尔。我劝你在布哈拉事务上没有霍贾耶夫不要轻易做出判断，土耳其斯坦人至今在布哈拉问题上还没有表现出客观性。把霍贾耶夫和其他人派到塔什干去很好，要详细地跟他们讲一讲，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我们。关于布哈拉和土耳其斯坦右翼共产党的事，你的意见是对的，召回萨法罗夫。我的意思是削弱推行强行分化路线的左翼共产党，显然，应该把他们彻底

① 指已经开始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反对布哈拉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巴斯马奇匪帮的军事行动。

击溃。应当解散布哈拉的左翼势力，穆赫金这个人应该赶走，他的追随者是恩维尔的代理人和走狗。

我完全支持解散布哈拉共产党。关于索科洛夫和彼得斯，不应当听土耳其斯坦人的，可以让他们自我检查一下，自己从中得出结论。霍贾耶夫就不要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了，有拉希姆巴耶夫就足够了。在法院审判问题上，克富连科是对的。土耳其斯坦人要求自己比乌克兰人和其他独立的共和国拥有更多的权利，无法容忍对土耳其斯坦共产党的娇惯，不为别的，因为他们不应该享受这种娇惯。最近两年的事实证明，他们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富斯古洛夫。我不反对把富斯古洛夫调回来。需要巴拉诺夫……对于阿塔巴耶夫、丘拉库洛夫，还有其他一些人的随心所欲，大家已经厌烦了。如果认为古谢夫的消息是令人满意的，那是危险的。古谢夫依靠当地一些在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编造谎言，只有通过对错综复杂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核查，才可得出自己的结论。毫无疑问，中央在决定其组成时需征得你和埃利阿瓦的同意。我们还得在塔什干多待两天，不要因此而骂我们。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

№04267

奥尔忠尼启则就土耳其斯坦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

（1922 年 5 月 18 日）

塔什干

1922 年 5 月 18 日

莫斯科，俄共中央，斯大林同志

暂时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在土耳其斯坦，我们应该逐渐转向新的政体——人民苏维埃，就像北高加索已经实施的那样。我们威信不高的共产党员队伍无法控制土耳其斯坦的最高层。要控制它只能靠非常丢脸的红军的刺刀。像阿塞拜疆一样，土耳其斯坦对于东方有着重要意义，而对于印度和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意义更大。这里的人非常痛恨我们。巴斯马奇匪帮的猖獗无疑与这里心怀不满的城市群众有关。一些人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们也不否认巴斯马奇与恩维尔的联系。巴斯马奇分子保卫宗教、保卫伊斯兰教、反对俄国人的歌曲，或许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悦耳动听的。[①] 依我看，类似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经验，经过某些地区和在人民中的试验后，应予以抛

① 在 1922 年 5 月 13 日致斯大林的私人信件中，奥尔忠尼启则更肯定地表示了自己对于必须重新研究土耳其斯坦政策的观点："巴斯马奇分子是一帮脱离群众、四面楚歌的强盗。在某些条件下，他们又是宗教和习惯的捍卫者。……必须从根本上，重新研究我们的土耳其斯坦政策，坚决摒弃这里已开始的共产主义实验"。

弃。[①] 应允许一些有威望的无党派人士进入中央政府，哪怕他们没有辉煌的过去，应该宣布大赦等。一句话，要开创“土耳其斯坦的新纪元”。应该投入一笔相当数目的款子来恢复这里的棉花生产等。经过4年战争后，这里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领地和自己臣民的汗，这些瞪着双眼的封建主代替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里的名为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和土耳其斯坦中央的共产党员们与这些封建主进行着平等的和平对话。只要不可侵犯的他们放弃被他们掠夺来的财物，几十位武装人员就可以因此使他们合法化。甭看和平的这种光荣条件，他们仍然不赞同，而且欺骗我们。从另一方面讲，也缺乏足够数量的军队来进行代价非常昂贵的、坚决系统的斗争。

挑头的是这群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似乎对一切都没有反对意见，但无疑他们仍想成为时局的主人，不值得这么做，应当打垮他们。在中央的坚决压制下，他们不会特别尥蹶子了。群众，如果不是耍滑头，似乎是理解时局的。给他们一个坚定的、无条件的反殖民主义者（他们推翻了所有的殖民主义者，但还不得要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我看，或许鲁祖塔克对了解边境地区并深受信任的埃利阿瓦是很有用的，他这个人是柔顺点，但这对于鲁祖塔克和巴拉诺夫并没什么。

古谢夫，我看得多了，太软弱，这事要求精力充沛和机警。土耳其斯坦局目前的这些成员都缺乏威信。也许，如此快地更换代表有些不妥，但事情未必能暂缓。土耳其斯坦政治局包括鲁祖塔克、埃利阿瓦（他是布哈拉的代表）、巴拉诺夫、列格兰、雷斯库洛夫、

① 因此，斯大林在1922年5月19日给奥尔忠尼启则的回电中指出：“只有在取得对巴斯马奇匪帮的重大胜利之后，才可以转入人民苏维埃体制，无论如何不能早于此时，否则，恩维尔的代理人就会钻入人民苏维埃……”。

丘拉库洛夫、拉辛姆巴耶夫、阿塔巴耶夫，以及布哈拉和希瓦的代表，而且，布哈拉的事取决于全权代表霍贾耶夫和代表鲁祖塔克，他们的威信会高起来的。暂且不要去刺激布哈拉人，希瓦只参与电报来往。我考虑，有这些人的坚决支持，工作是可以开展起来的：主席团包括鲁祖塔克、丘拉库洛夫、埃利阿瓦，雷斯库洛夫作为埃利阿瓦的候补。霍贾耶夫和索科洛夫已在我处。晚上再把跟他俩的谈话告诉你。

就谈这些吧，能在电话里说的我都说了。现在请允许让我回家去。[①]

① 指俄共（布）中央中亚局（1922年5月后改称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的改组。斯大林在1922年5月19日的回电中写道："根据最终批准的中亚局的名单，会专门通知你的，你可去第比利斯"。

№04268

纳扎列强就个人工作状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年6月14日）

1922年6月14日

亲爱的谢尔戈：

我们这里真是疯狂的一个星期，忙得没法坐下来好好地写封信。我对工作满意吗？既满意也不满意。一方面，我在这里进了一所大学校，学了全世界和俄罗斯生活的课程；进了纪律学校养成了工作的准确性，从这一角度看，我是满意的；从另一方面讲，这一工作纯粹是文牍主义的，需要细心和耐心的，本人难以应付这一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繁重工作，连打喷嚏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尤其在柯巴[①]的铁腕之下。你说我们相处得好吗？挺好的，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可以从他那儿学很多东西。从近处了解了他，更使我增添了对他的非同寻常的尊敬之情。他的令人羡慕的品格，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的严厉主要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正在使中央的工作走上正轨。整个运作如人所愿，虽然需要干的事还很多。给你写了一封信，同样我也给伏罗希洛夫写了一封。给基雷契的信已寄出了。我工作到秋天，然后打算请求去干更加独立、更加有意思的工作。你在哪儿休养？7月初你们一家来这儿吧，如果夏天你想在那儿过，那就九月初来这儿吧，我有了一套房子。阿韦利给我安排的，我自己住那儿（波瓦尔大街11号），房子很好，伊

① 柯巴是斯大林早年参加革命时使用的名称，20年代初，党内老布尔什维克还经常这样称呼他。

里奇的身体还好，现在他每天有经验丰富的医生照看着。工作么，总得想办法积极地干好。特别的消息就没有什么了。局势是很稳定，我们不准备在哈格让步。[①]

深深地吻你！

你的阿马亚克

① 指1922年7月15～19日的哈格国际财经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要求苏联偿还债务和向它提供贷款之事。

№04269

奥尔忠尼启则就格鲁吉亚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22年6月26日）

亲爱的索索[①]：

请原谅拖到现在才给你去信，但晚写总比不写强。刚从土耳其斯坦回来，我就在床上躺了4天，在我之后，阿拉姆也躺倒了。正因为此，我手里的土耳其斯坦的材料耽误了，拖到现在也用不着在上面花太多精力了。现在只寄上两份材料：一份是关于社会民主派的（我们的契卡称之为“民族解放委员会”），另一份是给雷斯库洛夫的好朋友的。我们和社会民主派有过许多接触，作过很长时间的对话。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很有本事，可以有效地加以利用。我想，不久就要再见面了，到时候再详细地谈谈。昨天收到了法伊祖拉·霍贾耶夫从布哈拉寄来的一封信，是他让我转给你的。

现在谈谈这里的情况。格鲁吉亚外表很平静，虽然有时候也爆发个什么。第比利斯市代表大会上就有过很激烈的争吵，会上出现了两套名单，伊利科·齐夫齐瓦泽还在会上搬出了你很熟悉的菲利普[②]的报告。据说搞得很不好意思（这还是我在土耳其斯坦时的事）。说起来，这个报告已在各区传得很广，已落到孟什维克手中，他们把它译成了格鲁吉亚文，并加上了前言，印了很多，这里给你寄去一份。在省里，集团内讧和吵架还没有，但无疑有人在小心翼

① 索索是斯大林的小名，奥尔忠尼启则在私下场合经常这样称呼斯大林。

② 即马哈拉泽。

翼地进行互相挖墙脚、互相破坏威信的事。科捷[①] 和格格奇科坦克就是最爱争吵的人。而且，后者还想与科捷取得谅解，但一点也没用，他们双方都恨不得把对方生吞了。由于安贾帕里泽至今也没提出任何材料，而由卡夫塔拉泽、奥库贾瓦、米亚斯尼科夫、雅库博夫组成的委员会则一致判明，马穆利亚从来就不是孟什维克，没有加入过渐渐由老爷先生们[②] 组成的联合组织。此外，还找到了刊登有他批驳安贾帕里泽 1917 年 7 月 15 日发言和我们的 7 月发言文章的《斗争》报[③]，可见，格鲁吉亚的政局无疑是稳定的。看起来，收成也挺好，但西格鲁吉亚、绍拉帕尼、拉恰等县的饥饿情况也很严重。我会回来的，但暂时还不能接手联盟苏维埃的工作。我和他们说得已经很多了，但效果并不好。他们已决定在我结束休假的时候也结束这种谈话。在纳里马诺夫到达之前，阿塞拜疆的一切都进行得平平静静和井井有条，他一来，我想，争吵就该开始了。对于把他从人民委员会主席位子上撤下来，他是非常不满的。在边区委员会全会上，他就提出了辞职，没等无产阶级回过味来，还没有对他的工作做出评估并重新召唤他参政，他就提出了让他从事文学工作的申请。尽管他提出了这样的申请，还是尽量劝说他，他才答应 6 月 30 日上班。我在想，他是想自由放任一通。联盟苏维埃的情况暂时是这样。有米亚斯尼科夫一个人在，我暂时还不会去那上班。纳里马诺夫不在。敌人通过静悄悄的破坏活动，拼命地想整垮他或使之威信扫地，但是谁也不会成功，米亚斯尼科夫办事非常有分寸，非常巧妙。

自从米亚斯尼科夫离开亚美尼亚后，当地的同志们，看起来，

① 即钦察泽。

② 指布尔什维克。

③ 第比利斯社会民主组线的格鲁吉亚文秘密的机关报。

又决定开始争吵了。由阿维斯－科斯塔尼扬和米高扬挑头，对卢卡申向你表示的撤换米亚斯尼科夫、米高扬他们是无法接受的话进行了指责，掀起了反卢卡申的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为了米高扬，实际上为的是通过争吵取得更大的成功。我和米亚斯尼科夫去过亚美尼亚，我们搞明白了：米高扬只不过是个借口。他们知道，他们未必能得到他，只不过仍然要嚷嚷而已。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拒绝在发给你的声明上签字。我们对此作了很好的批评，撤了科斯塔尼扬，还有另外一个人，对亚美尼亚中央的组成作了某些变动。我在想，这叫什么结局。卢卡申之后上任的都是亚美尼亚共产党员，从根本上与亚美尼亚联系挺密切的。阿维斯－科斯塔尼扬这一帮人还是年轻的孩子，不仅不能控制亚美尼亚，而且连它的一个县也控制不了。

尽管这样，3个共和国的政局仍然是稳定的，完全没有土匪活动。暂时写这些。

今天格鲁吉亚代表会议[①]开幕了，进行得很顺利。格鲁吉亚中央，一如既往，请求留下托洛舍里泽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最近这段时间他变得活跃多了。那就让他留下吧，天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纳里马诺夫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太没有分寸。马米亚会把报纸寄给你看的。

① 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于1922年6月26～28日召开。

№04270

纳扎列强就斯大林的东方政策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 年 7 月 12 日）

7 月 12 日

亲爱的谢尔戈：

你的信和孟什维克出版的菲利普的小册子都收到了，真让人笑了个够。柯巴的电报想必你也已收到。有关外高加索的详细情况我是从马米亚那儿得知的。柯巴仍然信守最近与你达成的协议[①]。总之，在我看来，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东方问题上，无论是外高加索政策，还是所有边区的自治或自治共和国的政策明显分为两派，他在这两派之间随机应变。伊里奇完全得到了康复，医生已允许他做少量的工作，不用担心，现在一切都挺好。昨天，柯巴去看了他，柯巴只得多注意看看伊里奇和拉谢娅大妈。谢尔戈，如果你来参加全会和代表会议[②]，就把玛尼娅和孩子们都带上。依我看，应该会来的。从马米亚的来信看，似乎联盟正在爆炸，那儿的局势正趋于尖锐化。我完全赞同你在亚美尼亚问题上的观点，阿维斯这个人用于管辖亚美尼亚当然是太弱了，他既领导不了党，又领导不了苏维埃。他这个人无论是理智上，还是道德方面，都不具备作为领

① 似指建立外高加索联盟的计划。

② 俄共（布）中央例行全会于 1922 年 8 月 2 日召开，而俄共（布）第十二次全俄代表会议于 1922 年 8 月 4 日至 7 日。

导的条件。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快结束了[①]，在哈格，也正在走向成功。8月初，瓦尔金同志要去找你。代表会议后，大概柯巴要去休假。好吧，就写这些。

此祝

一切更美好！向济娜问好！

你的　阿马亚克

你来不来开全会和党代会，请通知我。如果你不来，那就让玛尼娅和开会的代表一起来或者以某种更合适的方式来。

阿马亚克

① 有关“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和某些其他组织”的审判于1922年6月8～8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

№04271

纳扎列强就列宁身体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 年 7 月 19 日）

莫斯科

1922 年 7 月 19 日

亲爱的谢尔戈：

你的使者来过。从柯巴的电报中你已经知道我收到了你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信。我就简单写几句，因为过些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再详细谈。你大概能在巴库碰到带着这封信的安东诺夫同志。关于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我再对电报中说的作点补充：他的自我感觉很好，他每天都要给柯巴写信，而后者居然发怒，担心他又会疲劳过度。看来，过不了两个月，伊里奇又会跟原先一样工作了。我希望你能满足我的请求和履行自己的诺言，（我给你发了电报，你收到了吗?）把家也随你一起搬来。卡莫死得多蠢，怎么能想得到！列万进了社会主义研究院，现在浑身都有病，可怜的人更加消瘦了。我想把他送到城外去。多想早点见到你们大家，还有玛尼娅和孩子们。请把动身的准确日子通知我，不管多忙，我也要去车站接。好吧，就此搁笔。

祝一切顺利

向济娜、伏罗希洛夫问好！

给你一个热吻！

你的　阿马亚克

№04272

越飞就对华政策总方针致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2年7月22日）

绝密

于斯莫尔尼宫

1922年7月22日

呈：俄共中央政治局斯大林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
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
外交人民委员部契切林

我们对华政策的总方针

1. 对华政策如同整个国际政策一样，首先要追求的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个目标。为此，俄罗斯联邦驻中国特命全权使团发表的所有讲话都要宣示，俄罗斯联邦完全没有帝国主义的利益，始终一贯地捍卫社会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甚至包括在个人的私人生活中）表明苏维埃政权作为工农政权的民主制性质。

2. 在与现北京政府的关系上，须记住这个政权是不牢固的，并且不要损坏与其可能的继任者的关系。

3. 在中国内政上须执行民族解放、中国统一以及建立真正统一、独立和自由民主（苏维埃的?）的中华共和国的政策。为此须特别强调俄罗斯联邦的反帝国主义性质。

4. 在蒙古问题上，避免与现北京政府正式讨论此问题，将其推迟至双方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就此问题展开正式谈判时，总之是要非常小心地避免可能导致产生蒙古存在帝国主义利益这种印象的一切行为。

5. 在对中国内部争斗及各政党和集团的关系方面，要表现出最大的灵活性，调整好与所有各方的关系，但特别要注意支持孙逸仙的主张中华民族统一的政党，并抓住最好的时机，发展对华、对其工商界的经济关系。

6. 然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还要更大一些，不要顾虑它对我使馆的公开亲近。尽管这个党现在还很弱，须知它一定会完全独立。共产国际的某些委员想让这个政党从组织上与孙逸仙的党合并的企图是完全错误的。

7. 应注意到，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阴谋的交汇点，并且，无疑地将是未来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的起因所在（如果真发生这种战争的话），因而，须在此执行更有利于分化帝国主义、离间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不要使自己的政策与其中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捆在一起，但要能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间迂回周旋，随机应变。

8. 但是，考虑到当今世界俄罗斯联邦的妥协需要，应利用中国的存在使俄罗斯联邦接近北美合众国，承认对于俄罗斯来说，美国是在这个世界上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进行合作的最重要、最理想的对象。

备注：对于东方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苏联代表的所有行为，

甚至外表都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使节，因为我想，作为苏联的外交使节，只要有一个情况，哪怕是服装上与其他国家的使节没有区别的话，也会立即被广大的群众列入“欧洲人”的营垒中，而“欧洲人”在当地只不过是“压迫者”的别名而已，但是，也没有必要完全拒绝诸如通常举止、服装式样问题上按国际惯例所要求的所有礼节礼貌。这首先是因为，在外交习惯中，某种细微的违反常规也常常被看做是有意的外交举动，也就是说，如果说苏联的使节没有出席大型宴会或没有穿应该穿的服饰，这决不会被看做他的民主作风的体现，而会当做是该场合的所在国政府表示不满的有意的表露或示威，而且，苏联政府至今在欧洲都是很注意遵守各种细节的，并且一再地将这种细节应用于各种外交活动中。

因此，如果中央委员会同意对于东方必须更彻底地推行民主主义的话，俄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应该下一道专门的命令，强调苏联代表必须坚持最严格的民主主义，禁止其穿戴除了普通西装和简单的头饰（为军人规定的制服）之外的任何其他式样的服饰。①

越　飞

① 1922年11月16日，政治局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制定一套简短的更为简易化的苏联礼节，其中包括接见无论是东方的或是西方的大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设午餐、早餐、晚餐、茶点等。”

№04273

纳扎列强就斯大林工作作风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不早于1922年8月9日）

亲爱的谢尔戈：

1. 请就中央给予你的一系列任务做出答复（你要检查一下你外出期间中央发给你的所有邮件）[①]；

2. 有关要到这里来的电报不要再发了，因为出现了完全取消这一想法的情况。

明白了吗?!

3. 柯巴着实把我苛薄地教训了一番。我所经历的很多，但是最没意思的是我成了彻头彻尾的办公室职员和检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执行情况的稽查员。关系似乎并不坏，他这人非常狡猾，一时还猜不透他的心思。但我对他的看法，比起在第比利斯时，是完全不同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他理性地行事时，他也是个温和的人：心肠软，善于珍惜人们的优点。伊里奇无疑把他看做是俄共中央令人生畏的勇敢看门人。现在，中央的工作是大大改观了，我们在这里正好赶上，真是无法形容的龌龊不堪。我们当地对中央机关是什么看法呢？现在一切都已抖落干净。秋天你来了，你会看到的。

4. 总之，我是厌烦了这种“斯大林手下的行走”——这是莫

① 8月初，奥尔忠尼启则因俄共（布）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事去过莫斯科。8月9日，他参加了中央组织部会议。

斯科对于那些在中央管辖之下但还没有任命，挂在半空中的人的时髦称谓："在斯大林手下的行走"。不错，这有一半适用于我，但对文牍主义我已厌倦到了极点。我已经向他暗示过。他说，再干一个月。就写这些吧。

祝一切好！向大家问好！

你的　阿马亚克

向济娜问好！柯巴的妻子收到他的信了吗？看一看玛尼娅吧，她怪可怜的，总要闹点什么病。如果不去别墅的话，带着列格兰到我这儿来。

№04274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驻外机构考察情况致列宁的信

（1922 年 10 月 3 日）

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是在罗马给你写信。中央政治局的一纸任命把我派到了这个地方[①]。我们已经考察了整个柏林代表处，近日准备去伦敦。我们此行的结果，据我现在看来，就是已经或许还将是对一些账目的整顿，还有，压缩了代表机构的数量，压缩了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工作有了责任心，也变得井井有条了。为此，有一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要使对自己刚结束的监察不致成为工农检查院的普通检查，因为往往工农检查院检查发现的罪犯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有时还在继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工农检查院让人鄙视。

促使我写这封信的是德国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生活中的某些事实。我对这些事实表示支持，当然，我没有对问题作深入研究，但可以得到在德国和意大利工作的同志们的证实。因为您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讲到了革命的前景[②]，那么，我想，把这些事实报告给你，是对你有用的。

---

① 1922 年 8 月 14 日，中央组织局责成雅罗斯拉夫斯基任主席的一个委员会检查驻外代表机构，建议雅罗斯拉夫斯基出国一段时间，但他写信给中央政治局对此决定表示抗议。8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肯定了组织局的决定，但准许雅罗斯拉夫斯基出国前先休假。

② 列宁于 1922 年 11 月 13 日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俄国革命五年与世界革命的前景》的报告。

在德意志，工人对德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同情正在增长。舍杰曼[①] 的追随者把工会的工厂基层委员会的活动称做共产主义的运动。它现在还不是，但在短时间内就会成为这样的运动。10月1日是星期天，我亲眼看到了工厂基层委员会在柏林市组织的游行。按我们莫斯科的标准来看，这种游行算不得多大规模，但不少于12万～15万的工人和舍杰曼的追随者与独立工人党高高兴兴实现联合，喊着共产党的口号走上大街，这件事本身就意义重大。没有一面旗帜、没有标语和传单，但同情共产党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反高利贷、反投机商、反贫困化、反物价上涨”的斗争，总能得到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支持。与此同时，游行活动的沉着镇静也令人感受颇深。这种沉着镇静表明，德国工人们对他们的口号是持严肃深沉态度的，这里除了他们对生活表示不满外，还有某些其他什么东西。

德国工人看到，关于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的话题似乎与一些事实相矛盾。克鲁普、斯金内斯以及其他工业界和财界要人，在工人的眼里，只不过是自己发了财发了福的泥足巨人，难以对德国的资产阶级做出中肯的评价，而没有这一点，他就难以使人相信有可能战胜资产阶级。

第二，是关于我们的新经济政策。关于这个问题，虽然你在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上特意讲了很多，虽然该次大会一致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并表示了赞赏，但德国工人认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这项政策并不是必需的（今天，我们的工人中，持这种看法的也不少），因此，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将该问题列入第四次共产国际大会的议事日程，加以很好地解决，应该在报告中注意到这样一部分工人的情绪，他们认为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不

① 舍杰曼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

是“共产主义的策略”，而是“妥协”。

第三，关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我和许多从俄罗斯来这里的同志都感到，德共不善于利用眼前的经济危机，提出的是含糊不清的口号，没有完全明确的路线，没有系统地教会工人：他们应该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某些惊慌失措，就失去了群众所需要的，也为我党所经常注意的明确的路线。

诚然，布哈林同志（我就《红旗》杂志和德国同志们的活动问题与他交谈过）认为，现在的德国共产党一切都顺利，但诸如德共如何从工会运动完全走向独立、德国从事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会有什么样的自身发展等问题，恐怕不能不对“一切都顺利”的结论做出修正。

说到意大利就不能不说说法西斯。在不久前罗马召开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代表大会上，对此问题几乎是不闻不问，而法西斯分子不仅企图在地方夺权，而且公然地向国家权力逼近。部长们渐渐变成了法西斯的庇护人。法西斯分子强迫整个国家机构加入他们的党。青年联盟和当地的共产党支部有时是整建制地登记加入法西斯政党。法西斯分子手中还握有几种报刊（如《意大利人民报》等），有商业银行给他们拨款，此外，他们还从法国政府那里收到大笔的资助。他们得到了20万宪兵团的同情和支持。军队或者同情，或者保持中立，还没有行动。大约75%的军官还在法希。墨索里尼完全有理由宣布，再过两个月，他就可以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只要他认真努力去做，他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当圣密克罗的法西斯分子冲进车厢，要求我摘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牌子时，谁也不敢对他们说个“不”字。共产国际的代表穆奇有一次怀疑隔壁有法西斯分子，吓得根本不敢出声了。法西斯现在已经成了国家的第二政权，它的法律地位并不比王室政府的法律低。对工人产生消极影响的，不仅由于社会党人的软弱无能和法西斯的恐怖手段，还

有意大利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以及类似谢拉季和更多的图拉季安之流的所作所为，还有法西斯的组织性所产生的作用，法西斯的实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法西斯真是让我们的意大利同志们学到了一些什么。我所说的所有这些事实，或许你都知道，但是必须让共产国际大会从中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来，因为法西斯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社会或其他国家的手段。

非常遗憾在莫斯科没有见到你，虽然我几次都想见一见。我想跟你谈谈从西伯利亚的工作经验中得出的几点关于农民问题的结论。艾特回到莫斯科一定把这件事了了。

致以同志的共产主义敬礼！

非常高兴你回到工作岗位。

雅罗斯拉夫斯基

请转达对玛丽娅·伊里尼奇娜和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的问候。

№04275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问题处理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 年 10 月 21 日）

亲爱的也是可爱的谢尔戈：

现在你那里很难，不禁使我想起过去的日子，那时情况很糟糕，我们吊在空中，仅凭直觉顽强地紧紧地把住一条路线。现在和你在一起的有斯大林，还有列宁。“老牌马克思主义者”便函的腔调，就让这儿的所有人愤慨不已。他们的厚颜无耻竟然达到了绕开斯大林而经由布哈林报告列宁的地步。现在，连最后的这一渠道也不给他们了，柯巴干得很利索。[①] 没有什么特别新的消息了。25

① 1922 年 10 月 19 日第比利斯格鲁吉亚共产党扩大的中央全会上，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钦察泽、奥库贾瓦、卡夫塔拉泽和马哈拉泽发表声明，欢迎俄共（布）中央 1922 年 10 月 6 日全会关于成立苏联的决定，同时他们还表示，将申请取消外高加索联邦，外高加索各共和国自动加入苏联。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领导认为这一声明是“对党纪的不可容忍的路线”。奥尔忠尼启则威胁要把这件事提交给莫斯科，并作了一个带些侮辱性的声明。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做出决定解除奥库贾瓦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的职务。作为对应的行动，格鲁吉亚的一些共产党员于 10 月 20 日夜间至 21 日用直拨电话要通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叶努基泽，并请他向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转达如下声明：“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威胁状态中”，“所有这些，都是奥尔忠尼启则造成的，陷害和倾轧是他用来对付不屈服于他淫威的同志的主要手段。在他专横跋扈的统治下生活和工作，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难道我们就不能得到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式思想作风领导，注定要成为刚愎自用的牺牲品”。这一声明不仅受到斯大林的谴责，而且受到了列宁的指责。列宁在发给格鲁吉亚的电报中说：“……我坚决谴责对奥尔忠尼启则的漫骂，并主张你们之间的冲突以礼貌的、合乎正当态度的方式交俄共中央书记处解决。将你们的意见以直通电报报给书记处。”

日，我们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共和国是到头了。[①] 奥托·沃尔夫该是签合同的时候了。[②] 和美国人合作也不坏。[③] 柯巴今天写完了第11封信，信的内容你已知道，比去年的要多。第一步棋马上就准备好了。你就伸长鼻子下大注吧。（不过，别骂人，我感到，在开盘时你会骂我“不体面的阿尔米亚什卡”。）

好了，祝你在这场不是对孟什维克而是对自己人，对昨天还是我们亲密战友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在这里我还担心，而且也不信，像谢廖沙[④]、科捷[⑤]、艾什巴[⑥]，还有像菲利普这样的同志竟会走得这样远，并落到如此庸俗的地步，真是天晓得，但愿俄罗斯能恢复元气。[⑦] 格鲁吉亚前领导人被建议派往格鲁吉亚共和国以外工作。

紧握你的手，吻你。

你的　阿马亚克

顺便把这张字条交给叶戈罗夫同志。

① 指红军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并取消远东共和国事。1923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达了远东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合并的命令。

② 1922年10月20日，苏联报刊发表了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了“与德国最大的工厂银行团康采恩领导人奥托·沃尔夫签订的有关建立俄－德贸易股份公司的协定”的消息。11月16日，该协定在柏林正式签字。

③ 指美国石油公司在阿塞拜疆和远东开采石油的经济协议。

④ 即卡夫塔拉泽。

⑤ 即钦察泽。

⑥ 即马哈拉泽。

⑦ 1922年10月24日，在莫斯科通过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集体辞职的决定。

№04276

斯大林就出售白金及党内关系致列宁的信

（1922 年 11 月 13 日）

列宁同志：

我认为有一些事需要分两个方面向您报告：

一、今天，加米涅夫同志通过电话告诉我说，必须批准与法国商人就组成一个合营公司出售我们的白金而签订的协议，而且，我们至少有 60 普特的白金需要交给该公司拿到境外去卖，而我们自己却无法将自己的白金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因为这一协议草案中没有任何“合营”的条款。（所有白金都是我们的，法国人没有任何白金，他们仅仅是销售白金的经纪人，而且大概由于白金差不多是专卖物品，他们法国人总是尽量少卖白金，为的是迎合美国商人，使之能够把美国的白金以高出三倍的价格卖出，而且，整个协议对于俄罗斯完全是带有侮辱性的。我建议加米涅夫把拥护这项协议的人都叫在一起，把真相告诉他们，建议他们废除这个合资公司的协议，改为从委员会成交的白金总款额中抽取一定的提成给法国人。我想，该注意被斯维尔德洛夫使劲地到处宣扬的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实在是不能指望了）[①]

二、我收到了不少莫斯科党组织的实践家们和共产国际俄罗斯

① 1922 年 11 月 23 日，政治局研究了合资公司出售白金的事。通过的决定中规定了若干措施，要求更详细地研究一下或者独立自主地或者在合资公司的帮助下出售白金的可能性问题；要求建立专门的委员会研究一下协议的准备情况。1923 年 1 月 18 日，政治局依据斯大林的建议承认：白金的问题已处理完毕，而原先建立的委员会已被撤销。

党团成员由于你与《观察家报》记者之间关于左翼与右翼共产党员的谈话造成的不便而表示的意见。他们说，列宁同志的谈话使得左派共产主义（或许就是工人反对派）的存在变得合法了。[①] 实践家们认为，现在，当左派共产主义整个从形式上被消除时（不排除工人反对派），再像谈论可能与正统党的共产主义竞争的合法现象一样来谈论左派共产主义是危险的，也是不合时宜的，况且，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已经确认了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紧接着在十一大以后，讲的也是继续从思想上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我在想，如果在外交方面强调存在着右派共产主义，或许是有益的，但在党内关系上继续强调这一点，那就会导致有损于党和有利于工人反对派的某些恶劣的结果，从而产生紊乱和是非不清。应该继续好好地纠正这个错误。

① 指刊登于1922年11月10日《真理报》上的列宁对《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谈话。对于记者提出的“拒绝批准俄罗斯与英国的一个经济协定是否意味着‘左派共产主义’的胜利”这一问题，列宁回答说，英国反对俄罗斯参加洛桑大会是很不正当的行为，“它只会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不仅会使右翼共产党员与左翼共产党员紧紧地团结起来，而且会使俄罗斯居民中广大的无党派人士、工人、农民也都团结起来。事情没有，也不可能演变成左翼和右翼共产党人产生什么分歧的地步”。

№04277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2 年 11 月 27 日）

亲爱的谢尔戈：

召到这儿来的同志们，特别是伊利科，着实逼迫了一下布哈林和别的一些人。鉴于此，为了一劳永逸地结束所有谈话，就决定委派一个委员会[①]，这样，你就得辛苦一阵了。卡巴希泽向中央监委告了你的状[②]，他们向我打听卡巴希泽。今天，施基里亚托夫哈哈大笑着说，只可惜碰上得太少了，只攻击了这一次吗?! 共和国联盟的宪法基础已经准备好，全会委员会[③] 很快就要结束工作了，有关材料近日就转给你。想必你已收到我的关于建立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外高加索人民委员会和外高加索联邦的电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柯巴表现得很坚强。除我们党外，共产国际所有其他

① 1922 年 11 月 24 日，中央书记处任命了一个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的委员会，“紧急审议由格鲁吉亚前届已经退休的中央委员会提交的声明”，并“拟定恢复格鲁吉亚和平所必需的措施”。

② 指奥尔忠尼启则与格鲁吉亚的一位领导人卡巴希泽的争吵。奥尔忠尼启则对称他为“斯大林的驴”的卡巴希泽进行了抨击。

③ 1922 年 10 月 6 日，俄共（布）中央全会审议了俄罗斯联邦与各独立共和国的关系。为制定苏联关于各共和国联邦的法律草案并提交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以及各独立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和通过相关的决定，组成了由斯大林任主席的专门委员会。

政党都存在内部的争吵。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在洛桑[①]得到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方面的很大支持（这有多奇怪）。法国继续玩得津津有味，土耳其人看起来就很困难了。他们已经停止了安卡拉对我贸易的排挤，并开始变得有礼貌了。布杜去过洛桑一趟。他来过我这里几次，我对他的客客气气觉得有点奇怪。阿廖沙现在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外汇司的司长，和我住在一幢楼里，今天还在想着妻子。甘巴罗夫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的责任教员，叶戈罗夫也一样。奥吉拉瓦泽去了奥廖尔的省工会理事会，卡卡巴泽在莫斯科的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伊利科·齐夫齐瓦泽在莫斯科州委任莫斯科工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问到列万·戈戈，他病了，在莫斯科附近的“加拜”疗养院治病。咳嗽很厉害，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安心养病。瓦尔季耶利不想走，恳求我别让他离开莫斯科，而你们那儿又是那样需要人。[②] 阿瓦涅索夫、瞿鲁巴、雅罗斯拉夫斯基、梅德韦杰夫都从国外回来了。你很快就回来了，到时候再详细告诉你。

老头子活着，身体还好，有时也闹点小病，总的来说没什么。不久前他还在莫斯科苏维埃讲了话，你大概已看到了他的讲话。[③] 这个胜利非同小可，欢呼声持续了十余分钟，这是在大剧院的事。

我看来是要死在纸堆里了，这不，柯巴又让我草拟中央委员会的内部信函，连个喘气时间也不给，似乎人快累死了，也用不着喘气了。这不是我发牢骚，而是我的实际情况。亲爱的谢尔戈，现在

① 关于近东问题的洛桑会议自1922年11月20日召开，至1923年7月27日结束。英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国家参加了会议。苏联的代表参加了有关海峡问题的讨论。会上通过的公约规定废除海峡的军事化，允许任何国家的商船和军用船只（带有若干限制条件）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这一公约破坏了苏联的切身利益，未得到苏联政府的批准。

② 指为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选配领导人的事。该问题经1923年1月4日中央书记处研究通过。

③ 1922年11月20日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

我是完全脱离了党的工作和党员群众，已经有8个月没有参加过支部会议了，好像我拥有的惟一的选举结果是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资格。我希望，尽管我长期与大家分隔两地，如果不希望我最终成为党的官僚和办事员的话，在组建外高加索中央执行委员会时请不要忘了我。

吻你！

向全体同志们问好！

向济娜和阿拉姆问好！

你的　阿马亚克

№04278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一些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3年1月24日）

1923年1月24日

亲爱的谢尔戈

1. 寄上你和瓦尔季耶利所缺的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记录。

2.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建议卡尔特韦利什维利去俄共中央听用。

3. 柯巴把你的电报（关于向土耳其人出售汽油事）转给了斯米尔加，后者把它压下了。我就得打扰你，也算对你的答复。①

4. 布杜和谢廖沙得到政治局的允许，研究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材料，而柯巴却在开玩笑。他们觉得这种劳动无益，但看来还是想武装起来，以防万一。顺便提一下，布杜和我谈起过可能对他的家庭关系产生的不好影响。他请求一切保持到重新安排为止。我要他相信，个人的政治关系不可能成为这件事的原因，他徒劳无益地把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看做是这样的复仇者，而我所知道的例子都是相反的。明天，他们的问题最终将在政治局解决。②

5. 今天收到了你的来电，可怜的贝索怎么了？很高兴，你的一切都很顺利。布杜在这里努力说服柯巴：现在的人都不可靠、大

① 1923年2月1日政治局同意奥尔忠尼启则关于向安卡拉政府出售航空用汽油和车用汽油的建议。

② 1923年1月25日政治局批准更换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和该共和国的苏维埃机构领导人。

家都在变。柯巴快休假去了，或许等他休完假就该放我走了。

6. 伊里奇暂时还没什么变化。

7. 我们的政局非常好。德国人没有我们是寸步难行。我们的威望很高，在阿拉伯国家中，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现在也靠向我们（怕妨碍俄国人作战）。[①] 英国人和土耳其人耍了手腕。他们被达达尼尔海峡问题逼得互相作了最大的让步，而现在，英国人让运河从最狭窄的加利波利半岛地峡通过，并且在他们自己的管辖下设立了海峡，在这种情况下，达达尼尔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请看地图）。

嘿，我一写又多了。同志们和朋友们都问你好，问济娜好！问马米亚和其他同志好！沙尔瓦千万别自杀，他还是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有人说，他威胁非自杀不可。

吻你！

你的　阿马亚克

① 指法国军队 1923 年 1 月 11 日开进德国鲁尔区一事。

№04279

纳扎列强就对格鲁吉亚政策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3年1月28日）

亲爱的谢尔戈：

除了这封信之外，格拉斯金还要交给你两个包：一个包里有政治局关于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一事的决定摘录和书记处就《社会主义通报》刊载（列宁、加米涅夫、布哈林）有关格鲁吉亚问题的电报的决定。另一个包里有中央委员会就列宁刊登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致各省委的信。索索本想亲自写信给你，但由于最近忙于应付欧洲事务，让我给你写信。

1. 他提请你注意对高加索独立集团军和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还有格鲁吉亚中央机关采取最灵活的政策，不要成为孟什维克及其机关刊物《社会主义通报》的信息工具。事情是因为刊登于《社会主义通报》上的电报落到他们手里只有格鲁吉亚中央机关这条途径，因为落入他们手中的电报只是发给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而直接或经高加索独立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转发给你和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电报，虽然内容上比已经公开的可能更加不受欢迎，却没有落入他们之手。我们收到《社会主义通报》正好是在开会之前和讨论有关捷尔任斯基委员会问题之前。在致《社会主义通报》的公函中，我们预先通知了索索，刊登的只是发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这就使政治局特别是布杜和谢廖沙（他们曾被召来开会）产生了非常吃惊的印象。随后布杜就骂我们，怪我

们未经调查就事先指责格鲁吉亚中央机关。他对柯巴说，饶尔达尼亚在热那亚就有过高加索独立集团军关于斯瓦涅季亚和当地我军部署的电报和通报。正是因为如此，柯巴要求你对此加以特别注意。

2. 最近这些决定的摘录和给省委的信只给了你一个人，因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和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机关暂时还不会作清洗和改组，索索要求不要寄给他们，他们需要知道的都由你传达给他们。

3. 布杜大发了一通脾气，当然，一切都是枉然。现在，他要求去卡尔斯巴德治一治他的胃病。他非常担心他的家，要求在搬迁到新地方之前一切都维持现状。谢廖沙大约要去科夫诺当全权代表。他本人没表示反对，卡拉汉向候选人李维诺夫推荐了他。现在正征求契切林的意见，很快就定下来了。

4. 老头子一切照常，只是常闹点小病。有时候还很好，甚至还能工作，怎么也不能让他歇下来。这不，刚写了一篇文章。

5. 莫吉列夫斯基在这儿，谈的也都是当地的事。大概明天他就要去见柯巴。鲁萨诺夫从塔什干来过这里，他病了。他给我写了信，要我帮他调离那里。那个地方人们都不去，他也真是很难。

6. 你收到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国家计委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信函了吗？

7. 关于最近时期最重要的政局情况，你可以从我很快就会给你寄去的一系列内部通信中得知。

8. 阿廖沙就劳动国防委员会将第比利斯水利枢纽的拨款列入1923年预算一事向财政人民委员部表示了抗议。他的理由是凭第比利斯市的财力，完全可以自己的力量建好这项工程。索柯里尼科夫把这个问题转给了政治局。索索后天就会知道这件事了。暂时还不知道他的态度如何，以及会不会把它列入议事日程。但是可恨的是，问题已经决定，而斯瓦尼泽为什么要阻挠它。

9. 想写的很多，匆匆忙忙的。近日内我再给你写一写。

吻你！

问济娜和全体同志们好！

你的　阿马亚克

№04281

伏罗希洛夫就同加里宁视察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3 年 5 月 22 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刚刚同加里宁一起巡视完边区回来。我们一起去了达吉斯坦、格罗兹尼、车臣、孙扎区、弗拉季高加索、纳尔奇克。我不在时，加里宁到过基斯洛沃茨克，一个人数众多的卡拉恰耶夫人代表团找过他。这样一来，我们所有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区都有苏联政权的最高代表参观访问过。

这种参观访问有很大的益处，我个人表示完全支持。加里宁是个好人，对于我们是不可替代的人物。要对他有个真正的了解，需要同他一起去农村走走，并听听他与农民们的交谈，那就可以充分展示出他的专长与活力。

在我们党内还没有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像加里宁这样向农民阐述我们的理论与实践的还不多。他在这方面的经验十分丰富。

农民比农民出身的最好的行家更了解自己。

简单地说吧，这老头儿是好样的，我曾经认为他有点蠢，现在我认错了，并恳求阿拉赫宽恕我这并非有意的罪过。我已建议加里宁上第比利斯你那里去，但他令人信服地说，没有中央的许可，他不可能做类似的事。我们从符拉季高加索坐车沿柯巴的格鲁吉亚军用公路捷驰，我多想到第比利斯找你去住上一天，但老头儿很倔，像个凶神一样，我们就只好返回了。

5 月 19 日，在拉宾斯克，骑兵军团为第 4 骑兵师庆祝了 4 周

岁生日。第4骑兵师、琼加尔斯克骑兵师和第14骑兵师聚在了一起。特种旅和第2骑兵师各派出了120名代表。庆祝会开得很成功，这些骑兵师看来更好了，队列训练完全令人满意。在赛马中，小伙子们真正展示了英雄好汉的本色。我非常遗憾，我已答应将骑兵军从红旗北高加索军区划出去，一切都将失去，力量一分散，就会败落下去。托洛茨基同志给布琼尼来了信，正好赶上庆祝日那天，信写得很长，详细地讲了讲最近的国际形势等，还表示不能亲自来参加庆祝会而感到遗憾。昨天，加里宁到罗斯托夫来了一趟，我们见了面。人们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今天，他已回莫斯科去了。日子过得怎么样？你的那些犯偏差错误的人怎么样了？你来参加即将召开的全会吗？

向济娜依达·加芙丽洛芙娜以及你们的儿子问好！

你的　伏罗希洛夫

№04282

捷尔任斯基就与李可夫的冲突致斯大林的信

（1923 年 8 月 3 日）

1923 年 8 月 3 日

俄共（布）中央书记处

斯大林同志

今天是 8 月 3 日，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我与李可夫主席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

劳动国防委员会在我提出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听取并非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及主管机关领导人提出的，而是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李可夫和皮达可夫同志、丘巴洛夫同志提出的有关交通人民委员部欠顿巴斯、库兹巴斯和切列姆巴斯债务问题，我之所以反对，是因为该问题并未列入议事日程，而且在会前也没得到通知说它将被列入会议议程，因而这项提议没有提到会议上。在审议顿巴斯问题时，该项提案连同我提出的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担保偿还所欠债务的修正案一起获得通过。[①] 在审议西伯利亚铁路所欠库兹巴斯债款问题时，我请求审议一下切利亚布科皮尔西伯利亚铁路债务问题，因为无论是西伯利亚铁路，还是交通人民委员部，不偿还我们的债务，企图掩盖自己的债务是不合适的，因此，仅仅通过关于偿还我并不否认的欠债的决定是无益的。我们不是不想还，我们是

① 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与顿巴斯煤矿对于燃料计算问题的决定规定：交通人民委员部必须偿还本身所欠的债款，还应偿清国家机关的债款。

无法还。我的请求与丘巴洛夫的请求不同，没有被采纳，劳动国防委员会做出了决定，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于7日内偿还305342商品卢布。我要说的是，我无法偿还这些债务。我的声明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也没有让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中央监委、国家计委等部门来考虑一下我的声明。劳动国防委员会以本部命令的方式来命令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委员的我。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甚至认为必须向会议说明，我的发言阻碍了国家对问题的解决。①

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及其成员对我完全不加理睬、不予信任的情况下，就我的秉性而言，我已无法工作——您知道我的秉性。我不适合做国务工作，我的请求是免去我在交通人民委员部、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及人民委员会的职务，或保留交通人民委员部领导成员的职位，或者这也不可能的话，干脆都给我免了，让我回去搞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事。

促使我提出这一请求的还有其他原因。我找不到正确解决工资问题的途径，我担心我胜任不了这项任务，我深信，我党，首先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执行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不积极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对工人阶级团结的破坏，会使那些能够从自己的“雇主”那里有所收获的人产生一种自发势力。这种自发势力已经出现在交通部门，并有可能破坏各种核算，从而破坏交通部门无产阶级的团结。在各省委和各省工会的支持下，已开始了罢工的浪潮。彼得格勒已处于罢工的威胁之下，有人要求我们出商品卢布（每一等级4卢布），被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没有这笔经费，

① 对于交通人民委员部拖欠债款一事，劳动国防委员会做出了如下决定：1）建议交通人民委员部于7日内偿清库兹涅茨克和切列姆霍沃煤田按计划供应的煤款305342商品卢布；2）建议捷尔任斯基同志把交通人民委员部所欠国家机关的债务问题列入既定的程序。

在党委和省工会的赞许下，在彼得格勒地区，将我们的工资提高了25%，后来又提高了25%，即把由劳动国防委员会基金会（以前的财政委员会）确定的工资总额提高了56%。

这一浪潮正在推向整个铁路系统。对于我们经济部门工作者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工会，而且还有党组织的一些人，这迫使我们签订了地方性集体合同，而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预算，这些合同是难以执行的。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势。政治局重申了对重工业的管理原则，但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经费，因为冶金部门提高工资的要求比我们强烈。就是那个财政人民委员部（弗拉基米罗夫），以仲裁的方式按比例削减了我们的预算，而同意以5或10卢布金币支付冶金业工人的工资，这是大大高于运输业工人的工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立场如何呢？向劳动国防委员会、向政治局呼吁，并证明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应该让大家都均等，给我们多一点，给其他部门少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弥补我们的贫困，使大家都趋于均等。

在群众面前应该说，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是亏本的部门，我们不能靠赔钱过日子，我们要增加工资，只有同运输行业存在的经营不善作斗争，同运输系统到处都存在的经营不得法的现象作严肃的斗争。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部门具有我们这样的斗争节奏和取得我们这样的成绩，甚至在萨拉托夫省委赞成开展罢工的时候，在传单满天飞的时候，在水运工人掀起疯狂运动的时候，我们在中央面前都没有惊慌失措。

我想，工资政策应该是在党的领导下，经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按照七大的纲领、以正确的有利于无产阶级团结统一的方式，分配共和国并不充足的资金。

运输系统经济工作者和工会工作者的任务是给予国家尽可能的多些，并与官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颠倒黑白直至罢工行为作斗争，至于资金的基本分配，那是党和国家的上层机关考虑的事。

但是，我和我所推行的路线陷入了绝境。正因为如此，运输系统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特别慢，特别难，由此可能导致严重的复杂局面。

我的论据虽然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在加米涅夫主持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比如7月27日的会议，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从国家江河船运公司计入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净收入为340万商品卢布（总消耗为790万商品卢布），我不想隐瞒，在河运工人目前这种情绪下（工人们和以伊先科为首的我们的行政部门正在罢工），我无法得到这笔钱（后果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在省委支持下，水路工人的罢工对国家船运公司的水路工人产生了威胁，在工作人员的支持下就没有上交这笔钱）。

除此之外，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给予我们的补贴经瞿鲁巴和皮达可夫的一再压缩预算后，又削减了300万。[①]

这样一来，我们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资金在上述情况下一次次地遭到削减。

要知道，在我们的未能达到目的的微弱的呼声下，另一种呼声就会出现，可是那样的话，我们的苏维埃大厦就会出现裂缝。

我，作为运输系统的领导人，陷入了死胡同；我本人因此而变得歇斯底里，反复唠叨自己的运输部门，引起别人的嘲笑，最后得到的不仅是拒绝，而且还有在正式会议上遭到的斥责。或者我应该得到支持，或者我就离开这里。

捷尔任斯基

又及。只有控制住增加工资的自发势力，才可能避免政治裂

① 1923年7月27日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审议了1923年8月的预算计划。

痕，并且以最小的付出取得最大的成就。现在均等的势头正在高涨，一定要对工资的增长给予坚决支持，然后根据党的各基层组织（首先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联盟中央、各省工会理事会、各省委的党支部）计划的完成和认同情况，逐步地提高退休人员的薪金。[①]

① 信函第一页有捷尔任斯基用红铅笔批注："不发"。

№04283

捷尔任斯基就处理投机商人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10月22日）

1923年10月22日

俄共（布）中央书记

斯大林同志：

哄抬产品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些不怀好意的投机商人。这些人利用自己的职业选择哄抬价格（特别是外汇价格），采取阴谋诡计搞乱托拉斯、集体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莫斯科，是大托拉斯的聚集地，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和银行都被吸引到这里。他们掌握着市场，掌握着黑市。他们的手段就是收买并使之蜕化。你要是问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没法告诉你，但是他们却过得很阔气。在莫斯科住房紧缺的情况下，他们都拥有充足的豪宅。这是一些寄生虫、腐化堕落分子、吸血鬼和不怀好意的投机商人，正是他们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使我们从事经济工作的一些人腐化堕落，被他们拉了过去。

当全党愤怒地痛斥这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时候，他们会继续搜罗新的目标。

我的意见是扩大驱逐委员会在驱逐这些投机商人方面的权限，研究一下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捷尔任斯基针对这些不怀好意的投机商人所提出的报告。

我相信，一个月内，我们就可以使莫斯科清除这些坏分子，使整个经济活动完全趋于正常。[①]

捷尔任斯基

① 1923年11月政治局采纳了捷尔任斯基的建议。从11月底开始，先从莫斯科，继而其他大城市也开始了驱逐投机商、黑窝点老板、走私分子和其他危害社会分子的运动。这一运动分为几个阶段，12月中旬开始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镇压外汇非法交易者。1924年4月，根据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科夫的建议，政治局命令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制止镇压外汇非法交易者，因为这些活动妨碍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在自由市场上的外汇交易。

№04284

皮达可夫就党内问题和工人状况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11月1日）

斯大林同志[①]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这是对您的来信的回复，并就我看到的几个问题与您交换一下意见。从中您可以看出为什么我迟迟没给你复信。

1. 政治局派我到这里来，我是完全同意的。[②] 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拒绝使我能够作为一名革命者贡献自己力量的任何任务。我不否认，我在这里感到很困难。寄予我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在这里我很难承认，但为了消除又一个错觉，我认为我必须把它讲出来）是要落空的。或许，在制定总方针时我还能派上用场，但说到我和安德烈[③] 都应该参加的具体的日常工作，那么我的坚强、果敢、鲜明的性格，肯定不会在工作中显露出来。原因在于，正如我现在清楚地看到的，体现上述性格必须具有的基本前提是：1）对整个具体的现实情况的充分认识，有了这种充分的认识，就可以得出直观的结论乃至理性的分析；2）人们的认识可以使政治决定变成一定的组织和技术措施。遗憾的是我缺少这个前提，因而，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就像无水之鱼。当然，由于我还没有完全失去头脑，因此，我渐渐地入了门，但直至现在，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感

① 第一页上有斯大林的批示："只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阅。"

② 派皮达可夫去德国的决定是中央政治局1923年10月4日做出的。

③ 拉狄克的笔名。

到孤立无援。每当提出“谁来干这个”的问题时，我就该等着看：其他人会说什么，并将提议信以为真，这是非常折磨人的。另一方面，我笨嘴笨舌的。当然，我可以多聊聊天，多解释解释，不过，当说到准确表达、作批示、拟政治文件时，我本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我是如此不善言词。

况且，我想，我在这里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不仅是我自己这样想，我还征求过安德烈的意见，他也是这种看法，就是这里需要我。我们俩都认为，我应该留在这里。我给你写一写我的难处是为了将来一旦我没有做成多少事，你不至于骂我。

二、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的离去导致机关出现了一系列不良现象，但我本身已经采取了如下措施：1）我已经让捷尔任斯基转告大家，我的意见是应该任命 А.Д.Ц[①] 替代 А.И.[②]，使 А.Д.Ц 一个人专任这项工作（也就是说卸去其他所任各职）[③]；2）我给您和 А.Д.Ц 都写了信，我建议你们也找尤利普谈谈，他会把那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3）请尤利普把所有情况都随时告诉您和 А.Д.Ц。我还能干什么呢？

下面谈谈这里的情况。

有三个问题让我很担心：

1）党的问题；

2）武装问题；

3）工人阶级问题。

1. 关于党

党内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这一点不用多解释，您应该

① 即瞿鲁巴。

② 即李可夫。

③ 似指对德国革命进行经济上的支持。1923 年 9 月 23 日政治局研究了向德国发送 1000 万普特粮食一事，并责成鲁祖塔克、李可夫和克拉辛负责落实此事。

明白。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出击”，然后（完全正确地）猛地收回。汉堡出击了[①]，整整一个星期，不知中央委员会的去向（从德累斯顿迁走了，地下机构也处于无序状态等），结果反对派疯狂地向中央发动了进攻，事情发展到10月31日，在中央事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仅柏林－勃兰登堡，而且汉堡、梅克伦堡、图林根等地都召开了党的会议，实际上是召开了分裂的会议。我们制止了这种会议，但召集会议的企图仍然存在。反对派要求辞退布兰德勒，柏林的两个区还做出了将布兰德勒开除出党的决定，甚至什克洛夫斯基还给我们写信，要求把布兰德勒赶出中央委员会，因为他已经毫无生气。这样的事我可以说上一大堆，所有这些都说明党内危机已经非常深刻。

明天要开党的会议，我估计又会爆发出某种丑闻来。

我和安德烈采取了我们能够采取的所有措施，企图不动外科手术巩固中央。实事求是地讲，一些“左派”是应该清除出党，但现在还不行。说起来，这完全不是左派的事，而是机会主义者的喋喋不休和左派的空话，请看事实：1）在有安德烈和我参加的柏林党的会议上，他们指责中央过分注意了武装起义的技术准备。鲁特干脆说：“武装起义需要的不是技术准备，而是政治准备”。2）柏林人尽可能地反对抗议罢工。3）柏林人把武装问题看做是第二位的问题。4）在这种时候，他们宁愿在党内闹意气，而把武装起义视同儿戏。这就是我得到的印象。

一句话，共产党内的情况非常糟糕。

这件事之所以严重，是因为中央很软弱，确实犯了一大堆错

① 1923年10月23～25日在汉堡爆发了共产党员的武装起义，并准备由汉堡推向全德。在这之前，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临时取消了原本应该转化为武装起义的全德总罢工，但关于取消罢工的消息没有送达汉堡，因而汉堡起义被镇压。

误，还由于党的秘密机构干得糟糕透了。

2. 关于武装

可以说，我们有 11000 支步枪，2000 支左轮手枪和 150 支冲锋枪。这是个最大的任务。

3. 关于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并非万众一心，积极上进，也并非全都拥护共产党。可以说，只要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相当一部分的工人阶级不会站出来。看一看今天的罢工就知道，社会民主党和全德工会联合会就持反对态度。我还没有更多的证据，但我已看到，电车照样在行驶，报纸照出不误。

当然，支持我们的力量是很大的，这一点到处都可以看到。但事情还没到可以说我们领导着工人阶级的地步。因此，我们把为工人阶级进行不懈的斗争、把同社会民主党的彻底决裂、把消灭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基本任务。许多事实都证明，社会民主党内部正在进行严重的分化。我想：第一，大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及其工人退出该党转向我们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有几件有趣的事可以作证：社会民主党的 5 个组织（莱比锡、柏林等）要求将艾伯特开除出党，10 月 30 日，在柏林召开了社会民主党党员大会，会上反中央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武尔姆说，我们也不赞成共产党，但是请记住，右派在反对你们，而左派却在支持你们，这些话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没有时间给你详述类似的事，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进攻越是猛烈，这一过程就会进行得越快。

这封信里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把有关总的局势评估的系列报告寄给你（安德烈正在写）。我想我必须再说一句：我们的军队还没有作好坚决打击

的准备，这是令人忧虑的，但却是事实。[①] 按照通常的情况，我应该现在就投入战斗，但军队的现状迫使我采取了另一种立场：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不仅是技术准备，而且还有政治准备，包括团结全党、团结工人阶级、解散社会民主党和解散德国国防军。

关于后一点，我还没来得及写。这里简单说一下：一个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似乎德国国防军动不得。是可以动的，已经有了一些哗变的例子，而且和我们建立了联系，只不过还要做许多努力。

好了，握你的手。久未回信，请别见怪。我不想仅仅告诉你一些传闻，这就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实际情况。

此信虽然是写给您的，或许也可转给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一阅，不过第一和第二点除外，那是专写给你的。

阿尔维特[②]

1923年11月1日柏林

又及。我非常关心苏联境内的党内情况。如果您老人家有空，哪怕简单说说也行：您的意图是什么，您是怎么搞的。我向您提过的会开了吗？开得怎么样？我一点消息也没有，这是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在上帝的面上，也别再吵架了，否则一切都完了。[③] 如果你们还吵架，我们就扔下这儿的工作（这不是威胁，而是在那样

① 斯大林暗中支持认为取消起义是错误的德共极左派。皮达可夫坚持认为取消起义的决定是正确的，并又一次写信企图说服斯大林。

② 皮达可夫的笔名。

③ 1923年10月，政治局内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架马车”之间爆发了尖锐的斗争。

的条件下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希望你给我回信。

对列·达·托洛茨基我也讲了这个意思。

阿尔维特

再及。中央委员会又现丑了，为此，安德烈的报告也写不成了。我们马上要去和他们，和布兰德勒、鲁特、费舍尔，还有格尔姆一起开会。我给安德烈念了这封信，他表示完全同意。请复印两份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

阿尔维特

№04285

马吉多夫就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党内的情况致斯大林的信

（1923年11月10日）

于波尔塔瓦市

11月10日

俄共中央书记

斯大林同志：

我最敬爱的同志，给你写这封私信，你不会见怪吧。

至于说为什么不宜给你写公函而要写私信，下面我给你解释。

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份报告呈给组织局（在10月份）[①]，你正好在休假，因此没能转给你。

党的基本情况，10月份所发生的党内事件我可能不完全清楚，因为按常规，有关事件并不正式通报给省委书记。在10月29～31日乌共（布）中央全会上所反映出来的顿巴斯工人的情况和情绪使我感到震惊，我作为一名党员给你写这封信。

首先，作为省委书记，凡事都被蒙在鼓里，有关党内情况中央都不向他通报，而群众却在到处议论我们这种痛心的事，连非党人士也对此进行着造谣中伤，这种现象是绝对不正常的。

我特别注意到最近俄共（布）中央的分歧，注意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和46号行动纲领（无论是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还是第46

① 1923年10月8日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对乌共（布）波尔塔瓦省委书记马吉多夫的报告进行了研究。

号行动纲领都未能看到文件本身)。

其实，因公出差去莫斯科的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干部，回来后向省委书记提出的都是在目前情况下对于他们或对于省委书记来说莫名其妙的问题。

没有正确、及时和准确的官方信息，那么即使有私人的信息，对于指导党的工作都是不利的。

如果仅仅是我一个人处在这种状态下，那就不值得为此给您写信，浪费您和我的时间。

处于这种“愚昧无知”状态的是被党中央任命或地方组织选出的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说的这些还仅仅是开了个头。

最近的乌共中央全会开会期间，和许多老党员见面时得知，老近卫军战士们受到的压制太多了。

没有活跃的党内生活，没有党内的思想斗争。

占统治地位的是所谓党的纪律（都是执行的陈规旧套)。

斯大林同志，您应该相信，迄今为止，党的十大、十一大、十二大，特别是十大，实行党内民主是很不够的，而且这种现象成了当今的时尚。

与此同时，群众，广大的党员群众和党外人士却变得成熟了，要求给予自己更多的关注，渴望了解一切，了解事情的真相。

由于最近俄共中央和乌共中央关于铺张浪费现象的通报（10月19日№58)[①]，自然可能重新提出有关“上层”和“下层”，关于“专家”，关于大本营，关于各种奖金和花红的问题。

如何防止众多的党员再一次出现错误的倾向（有些人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

① 即中央和中央监委《关于反对铺张浪费和禁止党员利用职务犯罪》的通告。

只有一条路，就是严格遵循正确的真正共产主义的路线，同时我们本身，广大的领导干部应该谦虚一点，应该以身作则，当好榜样。

正是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比如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份的薪金是100金卢布，10月份就涨到150金卢布。

当基层支部操纵机床的普通党员看见省委书记要向改善共产党员日常生活委员会缴纳35金卢布和5个金卢布的党费时，这些普通的工人党员的月工资至多也就是25～30金卢布。

正是基于此，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到“上层”和“下层”，想到令人愤慨的不平等现象。当工人群众（自然是人数众多）从报上看到，10月份（大概如此）党中央无需缴纳80金卢布款项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谈论起来，并会表现出对“上层”的不满。

您想必知道，9月和10月整整两个月，顿巴斯发生了罢工，而且10月份的罢工几乎顿巴斯的所有人都参加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拖欠了工人的工资，当然不仅如此，顿巴斯矿工的住所简直比牲口棚还不如。

一万名顿巴斯矿的矿工宁可每天下到矿井里，在200、300、500俄丈的地层深处生活，那里的感觉也比在自己的“家”里舒服。

您大概听说过沙赫特地区（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基）的全体矿工（约3万～3.5万人）整整罢工了10个昼夜，一致拒绝领取应得工资40%的事。

顿巴斯的工人们说了是什么东西妨碍了支付给顿巴斯的领导们和矿工一样的工资，是这些领导人的厚颜无耻，是5年来他们对工人的侮辱，是一贯的隐瞒和欺骗，是他们没有兑现过一次承诺，而这种承诺有数以百计……

请您相信——这位矿工重复说（可能是受了孟什维克奸细的挑唆）——只要付清拖欠的工资，就不会成为革命的叛徒。

这些话都是一位乌共中央委员、顿巴斯煤矿的负责人在乌共中央全会上的正式场合讲的。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够每月两次有条不紊地支付20万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工资，却不能如期支付顿巴斯工人们的工资。

难道不能用同样的权利暂时拖欠一下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工资而如期付清顿巴斯矿工的工资吗？

另外一件事我们也不明白：只要矿工们的罢工拖上一个星期，钱就有了（矿工们也在认真思考这种现象）。

为什么不用最严肃的方式（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别无选择的话，为什么不将一系列负责人和最重要的领导人送交公开审判。

结果怎么样呢？——波尔塔瓦是个农业省，大家都拥护苏维埃政权，认认真真地履行着苏维埃的所有义务，虽然剪刀差暂时还没有缩小的趋势，到11月5日，统一农业税就完成了64.8%（2000万普特黑小麦）。

这个省没有政治匪帮的活动，也没有罢工（只有波尔塔瓦的马车夫罢工了7天左右，这次罢工甚至还有利于该省的公用事业局。该局用自己的运输工具把乘客运离了车站，这样一来，马车过滥现象倒得到了解决）。

在农业的波尔塔瓦，我们看到了苏维埃的乐土，在无产阶级的顿巴斯，正在按计划进行罢工，而且是有组织有系统的。

是该深思一下了，斯大林同志。

在我们地方负责人中，很抱歉，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印象，甚至深信：党中央、苏维埃和经济部门的领导层，如果说也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决定性的最主要的措施是不会采取的。

老是等待着什么？老是抱着希望，或许真是无产阶级的车到山前，必然会有路的。

斯大林同志，请您费心，委托几个可靠的人，深入到工人中，到党员群众中去，请他们不要暴露来自中央的身份。

让他们公开地与普通群众一起谈论我们的缺点和不足，他们就会了解到有关共产党的令人痛苦的事实，而且比他们要想了解的更多。

我曾经与一个大工业中心的党的负责人谈过话，他非常沉痛地承认说，有一次犹豫和悲观终于战胜了他，使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我们正在钻进某个死胡同里。

地方党组织并不坚信中央和中央监委仅仅凭最近的一纸关于铺张浪费现象的公告（这也是盼望已久的，完全应该的），就能够对党员成百上千忍无可忍的犯罪和胡作非为展开坚决的斗争。

尽管我们的党中央最近一个时期来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开展对各种各样的宴请、送礼作斗争，关于制止滥发奖金，以及同诸如资产阶级的传统残余作斗争的措词严厉的通告，可是仅仅几天之前，财政人民委员部就买了金表作为礼品送给了自己的部属，这又该作何解释？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是真实的，也知道我们党内的矛盾，因为党自己发布了有关收回党员中贵重物品的公告。

总之，对于通告，至今已习惯于首先把它看成是政治行为（我们中的政客和政客手腕已经发展得太快了）。无论出了什么事，中央不会有什么责任，相反，有责任的是地方机关。

同时，与铺张浪费作斗争中最繁重的任务本身就在中央（莫斯科、列宁格勒、哈尔科夫及其他重要机关所在地）。

党的十二大以后，我们完全知道，伊里奇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很大的集体负责制。

我们非常清楚，谁也替代不了伊里奇。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无法足以使人相信：中央委员会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思想性强的集体。

这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赋予党内的团结问题以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原因所在。

为此，首先必须严肃认真、坚持不断地贯彻执行党内工作民主的原则。

党员总数，党的中间部分是大大增加了，也成熟了，他们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并且坚定不移地要求党的领导层，包括党中央委员会相信他们。

中央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正确的、及时的、有预见性的、公正公开和无需隐瞒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采取行政措施，做出行政方面的努力，而这种机会是很少见的。

应该避免以个人（无论其占据多高的职位和官衔）意见代替民选机关决定的现象发生。

中央委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地方的活动，特别是参加省委全会和省党代会是有益的。

必须坚决果断地采取实际措施，切实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

必须从根本上禁止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收受贵重物品（我们认为，只有好书可作为礼品赠送——这在地方上已经实行了）。

斯大林同志，如果说我决定侵占您的时间，那只是因为我坚信，凭我们布尔什维克固有的勇气（我们，列宁的学生），只要我们深切地关心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我们之间就会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一次也一定会光荣地走出困境。

自然而然地，任何悲观的论调也就不会有了。

十月革命六周年的事实已经表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蕴藏了多么大的力量和希望，共产党受到了劳动群众多么崇高的信任。

等着您的回信。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波尔塔瓦省委书记　马吉多夫

№04286

克列斯廷斯基就米亚斯尼科夫出境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3 年 11 月 13 日）

呈：斯大林同志

抄送：捷尔任斯基同志、特里利谢尔同志、明仁斯基同志

尊敬的同志：

收到了您于 11 月 9 日发出的关于米亚斯尼科夫[①] 提交书面声明以及中央对此进行研究之前不要给他签证的电报。11 日，特里利谢尔同志也发来了电报，他建议或者撤销米亚斯尼科夫的签证，或者告诉他启程的准确日期。9 日我已给您去电，签证已于 11 月 3 日给了米亚斯尼科夫。等收到特里利谢尔同志的电报时，我问了一下米亚斯尼科夫是否已经启程，结果是这样的：签证是 3 日给他的，他拿到护照和签证是 5 日，当时就和一些熟人告了别，可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也不知他走了没有。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我查明他还没有走，我一定想办法找到他，并撤销他的签证。如果他已经走了，您就从边防站了解一下他是什么时候过境的。他曾经打算直接回莫斯科自己的家里。

① 米亚斯尼科夫，老布尔什维克，莫托维利哈（彼尔姆省）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23 年 5 月，因严厉批评党的领导曾遭逮捕并外派到柏林。在柏林，他继续从事积极的活动，并与德国共产党的“左派”保持着联系。

现在谈谈这件事的本质。9月初，我收到过捷尔任斯基的一封信，他要我劝米亚斯尼科夫回来[①]，并附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关于撤销对他派遣的正式命令。这是关于米亚斯尼科夫的惟一正式的通知，因为有关派遣他的任何通知我都没有收到过。

我把米亚斯尼科夫叫到我那儿，通知他可能有机会回国。对于我的通报他说，他决定走。稍后他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了不至于对他进行逮捕，他说，他准备揭露这里的一个反对中央、反对共产国际的运动。后来他又来过并告诉我说，他准备走，不要求任何保证，就让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决定在俄罗斯是否逮捕他的问题。米亚斯尼科夫的这一决定是迎合由捷尔任斯基同志转给我的中央的决定的。我吩咐给他签证，并和商务代表处联系把米亚斯尼科夫派回莫斯科。护照和签证都在他手上，突然改变原先的决定特别不合适，因为该决定已按时通知米亚斯尼科夫本人，而且，该决定也是由苏维埃政府本身提议做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是无能为力的。如果米亚斯尼科夫还没走，我可以不让他走；如果已经走了，我就没法制止他了。但是，我非常希望，今后再也不要把这里的全权代表处置于这样的两难境地了。

我对改变最初决定的原因不理解。捷尔任斯基在信中已写到，显然，在库兹涅佐夫被逮捕以后，工作小组，包括米亚斯尼科夫，

① 1923年9月7日，捷尔任斯基给苏联驻德全权代表写了如下一封信："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兹寄上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分委员会关于撤销该委员会今年5月25日做出的派遣米亚斯尼科夫出国工作的决定摘要。请您尽可能地亲自把米亚斯尼科夫叫到您那儿，当面向他宣布：原先的派出计划已经撤销，允许他返回俄罗斯境内。撤销派遣计划是由于米亚斯尼科夫一到德国就与德国共产党的左派建立了联系，发展了那里的反党反苏维埃工作，因而是不适宜的。米亚斯尼科夫必须返回苏维埃俄国已成为领导层的一致认识。请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米亚斯尼科夫立即返回。米亚斯尼科夫一定会和您谈及这里对他的惩罚之类的话。有关处理结果望告知。"

在俄罗斯和境外的工作就暴露了。[①] 显然，中央当时的认识是把米亚斯尼科夫放在国外的危害要比在国内大，我现在的认识也是这样。如今，米亚斯尼科夫是抱着首先从德国开始的国际无产阶级斗争再次高涨的观点回到俄罗斯的，在这种观点下，他改变了斗争的方向，或者说减弱了在俄罗斯进行斗争的强度。如果他留在这里，那么，随着某个风平浪静时期的到来，他可能回复到先前状态中，在此开展国际性的极端行动。我并不是说，在当前德国党内危机，特别是柏林党组织出现危机，以及米亚斯尼科夫和左翼柏林人保持联系的情况下，他留在这里就一定比在莫斯科还坏。[②]

致以同志的问候！

克列斯廷斯基

① 米亚斯尼科夫被逮捕并流放后，政治保卫总局粉碎了由米亚斯尼科夫追随者组成的“工作小组”，逮捕了20多人。

② 米亚斯尼科夫于1923年11月初返回莫斯科。11月19日，捷尔任斯基给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写了如下一信：“我认为，米亚斯尼科夫重获自由是非常危险的。第一，大家都不理解，并因此会产生‘中央是怕他，或中央自认在‘工人小组’问题上有错”的误解，因为米亚斯尼科夫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毫不隐瞒。其次，米亚斯尼科夫对回到这里的原因根本不予理会（与中央进行交涉和协商），由于情绪波动，他也不理会梁赞诺夫曾经谈到的无可挽回的错误。因此，我认为还应该逮捕米亚斯尼可夫。至于逮捕以后的事还需要解决，我的想法是把他送到一个他难以逃跑的地方去”。之后，米亚斯尼科夫很快就遭到逮捕，并被判监禁。

№04287

斯大林就中央已消除意见分歧致马吉多夫的信

（1923年11月22日）

亲爱的马吉多夫同志：

您的来信已收到，为此非常感谢您。从第15号的非公开信中，您可以看到，您所提的几个问题帮我认识了我们党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收到您的信正好赶上中央政治局为检查顿巴斯的工作任命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专门委员会[①]，您会看到，您正好赶到了这个点上。您抱怨从中央方面得到的信息很少，这个意见很正确。我希望第15号非公开信能够使您在这点上得到满意。很遗憾，我不能方方面面都写到，比如，中央决定，由于政治局内部的一些分歧，有关中央和中央监委会全会今年10月做出的决议不向各级党组织进行传达。[②] 这些分歧其实并不大，它们已经在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上根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立场得到了解决，误解本身已经或者说基本上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协调地工作。而且，我也无权把中央和中央监委有关决议的文本寄给你，因为，这是党中央机关所不允许的。1月份将召开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应该能在

① 1923年11月10日，政治局研究了顿巴斯问题，决定立即派出以雅罗斯拉夫斯基为首的委员会赴顿巴斯调查当地工人的经济状况和当地党组织、工会和经营管理部门的工作情况。

② 指1923年10月25～27日召开的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做出的《因托洛茨基信件引起的党内局势问题》决定。

莫斯科见面，届时，我可以当面告诉您所发生的一切。再一次感谢您的来信。望继续来信。

握您的手！

斯大林

№04288

皮达可夫等九人就是否曾建议逮捕列宁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3年12月20日）

1923年12月20日

抄送：中央

中央监委

《真理报》编辑部

呈送：中央执委员

尊敬的同志们

由于布哈林同志开的头儿，党内现在正在盛传1918年左派共产党人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就打倒并逮捕列宁同志以及选派新的人民委员问题展开过谈判。季诺维也夫同志在12月11日对这件事作了如下的描述：

“布哈林同志近日在红色普列斯尼亚地区会议上说过的这件事应该让全党都知道，因为这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谈到党内围绕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布哈林同志说，那个时期，有人向他们‘左派’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正式建议恰好是逮捕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左派’共产党人还认真地研究了新人民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而且打算让皮达可夫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同志们，这可不是说笑话，我们党内的派别斗争曾经达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以致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发了狂的小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内的部分人寄予了众所周知的希望，并提出了这种建议……我们的同

志共产党‘左派’们，则正如布哈林同志所说的那样，愤怒地拒绝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建议。但共产党‘左派’没有把这一情况通报给自己的中央委员会，而党中央直到6年以后的现在才知道这一非同小可的消息”。

斯大林同志在12月5日的第285期《真理报》上撰文说：“大家知道，比如，当时由个别帮派组成的共产党左派已经到了如此残酷无情的地步，以至当真谈论要用包括现在的反对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皮达可夫同志、斯图科夫同志以及其他共产党左派新人组成的新的人民委员会来替代当时已有的人民委员会”。

由于这件事至此并没有反映出它的本来面目，为了恢复历史的真实，拨正我党被颠倒了的历史，我们这些当时的共产党左派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有义务说明那两件本来无足轻重的事情，即似乎我们曾给布哈林及其身后的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同志出主意，要讨论推翻人民委员会和逮捕列宁同志的问题。

存在过共产党的左派是个事实，这一派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改变党的对外政策（布列斯特和约）和对内政策（特别是经济问题上的政策）。关于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大家知道，有一段时期，中央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占了大多数，列宁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如果中央做出决定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他就主动辞去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一来，在决定性的表决中，部分反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的人使中央做出了缔结该和约的决定。党内的派别斗争一直延续到中央做出决定以后，而且，布列斯特和约的部分反对者离开了中央委员会。

在塔夫里达宫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报告。就在列宁作报告的时候，卡姆柯夫的社会革命党左翼找过皮达可夫和布哈林。他们的谈话不仅没有任何正式谈判的性质，而且连具体的事先试探性的谈话也算不上，只是卡姆柯夫

半开玩笑地说过："那么，如果你们在党内是多数派该怎么办？要知道，列宁一走的话，我们和你们就该组成新的人民委员会，我想，那时我们将会推选皮达可夫同志任新的人民委员会的主席"。

这或许不是卡姆柯夫的原话照录，但确是凭记忆尽可能回忆起来的话，对此，参与谈话者即使在谈话过程中也没有赋予其任何严肃的意义。社会革命党左翼的"建议"不仅没有受到愤怒的拒绝，而且根本就没有受到拒绝，因为没有讨论过，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对共产党左派的建议。

这是第一次，这里根本谈不上所谓逮捕或推翻人民委员会的事，就是社会革命党左翼也不记得有这回事。

后来，已经是布列斯特和约签了字以后了，当时，皮达可夫、布勃诺夫和柯秀尔到了乌克兰，有过第二次机会，准确地说也是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机会。拉狄克同志去找当时的邮政人民委员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普罗相，要把一个决议通过电报发给共产党左派。普罗相笑着对拉狄克说："您把所有决议都记下来了。别简单地逮捕列宁关上一昼夜，等向德国人宣了战，之后不久，又重新一致选举列宁同志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普罗相当时还说，或许，列宁作为一名革命者，在被迫反击德国侵略，必须进行自卫的时候，会使劲地骂我们和你们（左翼共产党），但是，无论如何他会首先展开保卫战。况且，这个所谓"建议"不仅没受到共产党左派的拒绝，而且根本未经讨论，它根本是荒诞不经的，是普罗相莫名其妙的一句玩笑。一件有趣的事是还在1918年，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起义之前，当时普罗相已去世。列宁同志为他写了悼文，拉狄克同志就把这一段故事告诉了列宁同志。列宁同志听到这项"计划"。不禁哈哈大笑了。

必须指出，有关这两件事情，至今包括以下签名的人当中，仍有许多人不清楚，虽然他们也属于共产党的左派，并且算得上派别

活动的积极分子，这就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这些所谓事实究竟有何意义了。

曾经是共产党左派的人：

皮达可夫

拉狄克

雅可夫列夫

舍瓦尔金

斯图科夫

斯米尔诺夫

波克罗夫斯基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马克西莫夫斯基

№04289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4年1月10日）

亲爱的和深深敬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你毫无根据地指责我，说我只认为自己是“诚实的”等等。我自认为没有因为集团斗争而感到迷惑，仅此而已。我认为，我也感受到，对于我来说，党是值得敬爱的；而你在发言中反对我，你就不对了。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不是帮派分子，而从政治局的多数派身上，如同从托洛茨基身上一样，我都看到了派性的倾向。①

你的　安东诺夫

① 1923年12月27日，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写了一份声明给中央监委主席团和政治局。在声明中，他对破坏托洛茨基威信的活动和分裂党的方针提出了抗议：“我知道，我的这个抗议对那些因善于抛弃领袖的历史而自认为一贯正确的人不会产生任何细小的反响”。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写道：“但你们要知道，这是有所指的。它表达了所有以自己的整个生命忘我地忠于党的利益，忠于共产主义革命利益的人的愤激心情。这些党内不爱说话的人只有在意识到党面临巨大危险时才会站出来说句话。他们从来不会甘当党内主教的臣民和应声虫。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对不自量力的‘领袖们’发出的声音，恐怕这些领袖们也得洗耳恭听，尽管因为极端的派性，这些领袖们已经相当耳聋。”

1924年1月12日，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在组织局会议上受到严厉批评。给他指出的过错是未经中央同意发布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两项命令，但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显然是12月27日的信。中央组织局的决定认为该信是“对中央的威胁”和“空前的攻击”。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已无法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04290

捷尔任斯基就如何看待党内斗争问题致安东诺夫－奥夫申科的信

（1924 年 1 月 12 日）

亲爱的朋友

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了你为党而感到的苦恼和忧愁，但你的信是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你表达了你的感受，而这种表达的政治后果却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正如你说的，你了解并表现出了痛苦和苦恼，但你仅仅是“不自量力”，并没有背叛党、背叛革命。

然后，我说说我们所经受的大大深化了的危机，并看看其危险性。这种危险并不是由我们的争论引起的，而是由于我们党的组成和无产阶级的这种争论始终保持在一种平心静气的局面中的缘故，因为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在群众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远不够开化的压力下，需要我们的党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而且行动上也要保持列宁主义旗帜下的高度一致。

而就这意味着需要与托洛茨基进行斗争。[①]

你的　Ф.Д.

① 信末附笔：“这是 1921 年 1 月 14 日在组织局会议上”，但实际上 1 月 14 日组织局没有聚会，所以，多半还是指的 1 月 12 日的会议。

№04291

皮达可夫就个人工作安排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4年5月15日）

致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捷尔任斯基同志

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我越来越发现我和您在组织领域的工作方法是不同的，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工业政策方面，我们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因而您恐怕不会产生无法一起工作的思想，因为我感到，以我的工作，我不会做损害你的政策的事，不过，无疑的是，我的行动歪曲了你的行政管理和组织路线。我不想深入地去讨论究竟谁的工作方法更好，自然是，我认为我的工作方法要好一些，你则认为你的更好些。重要的是，你和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处事方式是不同的：在你看来，我是个“公式化”的教条主义者；在我的眼里，你则是“小手工业者”，从中应该得出实际的结论来。我和您之间是很好的同志关系，我对您个人非常敬重，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冲突继续发展而导致工作上和个人关系上的决裂。为此，依我看，我和您之间不能因为行政上和组织上的原因而发生冲突。在你看来，我似乎就是一位经济专家，而不像一位组织和行政工作的行家，那就这样好了：您解除我的副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在国营工业中央局的职务，只留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只让我干完全与行政上的组织管理工作无关的事，比如经济委员会、行情委员

会、报纸编辑部等等，或者，让我去干那些以我的行政和组织管理方法不会与你发生冲突的工作，比如把我和克桑德罗夫同志调换一下，让我去当工业银行的行长，让克桑德罗夫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来工作。

这个想法我对谁都没说过，请您在做出正式决定前替我严格保密。

皮达可夫

№04292

契切林就个人工作安排致莫洛托夫的信

（1924年5月17日）

莫洛托夫同志[①]

要不要利用这次代表大会对我们遭难的机构给予一点帮助？现在我的所有时间都献给了党的事业，而认真履行职责却被说成是官僚主义，因此，已经好久不再有人过问我了，对我的照顾也不如1918年的时候了，我的耳边总有流言蜚语，已经几次对共和国的政治利益造成了损害。如果您能在代表大会上找到善于搞文件工作并且乐于到委员部这样的地方来工作的人，我这里的情况就会改善一些。按照目前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我无法长久工作下去。如果我身边最亲近的人能再多一些，哪怕是部分地增加，也会使工作顺利一些。这样一来，大概一定会增加苏维埃的编制，需要求得中央的支持才行。可是我真不愿意放弃召开党代会的这个机会来寻找适合从事这种工作的同志。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奥尔吉·契切林

① 信的左上角有莫洛托夫的亲笔批示："卡冈诺维奇：应该帮一帮契切林同志，当然不是从党代会上选人。我请戈尔东同志研究一下加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切实问题。5月19日，莫洛托夫。"

№04293

捷尔任斯基就工作安排致赖因霍尔德的信

（1924 年 6 月 12 日）

1924 年 6 月 12 日

赖因霍尔德同志

亲爱的同志！我要请您原谅，如果在辩论中我竟然说了多余的话，让您受了委屈，使您的名誉受到了损害，那我绝不是有意的，因为我认为您是个非常出色的干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完全同意您作为官方利益的保护者，我认为您的这种保护是片面的。我个人的意见是您从事生产工作是适合的，而且比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更适合。这当然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且还没有成为建议。谁也不会来替换你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位子，自然，您的辞职也不会被接受。请您别生气。

致以同志的问候！

捷尔任斯基

№04294

加里宁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斯大林的信

（1924年8月）

斯大林同志

1. 我没有对在您那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发表过我自己的看法，主要的原因是我无法立刻了解所发生的事情。①

至于说中央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聚会，预先做出这样那样的重要决定，这没什么，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每一个党都有这样的群体或者个人，它可以指明方向，定下调子，以自己本身的威望团结全党。

党的阶级性越是鲜明，政治上越是成熟，其领导集体就越有崇高的威望，这样的集体就是我们党众望所归的标志。我们的党正是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吸引到这样的集体身边，由此，大多数人的观点，也就是全党的观点都转向了他们。

① 由于俄共（布）中央全会开会期间，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加剧，于1924年8月召开了中央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斯大林、布哈林、鲁祖塔克、李可夫、托姆斯基、加里宁、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彼德罗夫斯基、古比雪夫、乌格拉诺夫等），宣告自己为领导集体。会议还组成了“七人”执行机构政治局，其成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以及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伏龙芝作为七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会议还制定了规范“领导集体”的活动的章程，该章程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将“七人政治局”置于领导集体会议的控制之下。“七人政治局”的成立为的是就有关问题预先做出研究和决定，再递交给有托洛茨基参加的正式的政治局会议。加里宁的公开信可能就是对建立“七人政治局“一事的直接反应。但不知加里宁是否把这封信寄给了斯大林。

看起来，现在的领导集体无疑是全党公认的。

我从来没听说过党因为派别问题而受指责的，也就是说党的领导集团给自己提出了特殊的任务。对该集团的最大的指责是篡夺了党员的权利和专制独裁等等，总之都是冲着党的领袖来的。这种指责并不可怕，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集体），这个集体牺牲了一、二位不受大家欢迎的人物，从而安抚了党内的人心。

派别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两派对现今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由此形成了党内两个至少是思想上不同的中心，这样一来，党内各组织正常的商讨问题往往成了派系的分歧，而不仅是个人之间的斗争。

我们刚刚得出了这样的论点，党的统一没有了。

我觉得很可能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我并不认为应该加速这种分裂，应该促使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更快地实现这种状态。

我认为，组织单方的派别，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有根据的相应反应。对广大党员进行隐瞒，说什么各级党组织只不过是政权的工具，而不是如同苏维埃机关一样的政权本身，这种隐瞒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会引起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在当前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认为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可以无条件地把我们推到这条路上去。这条路已经变得危险了，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正在获得通向政权本源的跳板。

有人可能会说，我的这种担心是徒劳的，根本就谈不上建立什么什么派别，而只是挑选出 7 个人来协调处理最敏感的问题。如果说这话的人是这么理解的，并最终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我会坚决支持这种方案的。可是我得到的感受是，会议的意向，特别是它在斯大林同志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坚持协商一致的派别路线。[①]

① 原件如此，无落款。

№04295

捷尔任斯基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方针致明仁斯基的信

（1924年12月24日）

1924年12月24日

明仁斯基同志

正在给你写信时，收到了布哈林的来信[①]，读了他的这封信后请退还给我。中央领导层的这种精神状态，我们必须注意到并认真思索一下。[②] 如果党把关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样原则性问题上的路线、政策、声明的行动自由都拱手让给庸俗的小人的话，将是一

① 布哈林致捷尔任斯基的信如下："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没有参加这之前的领导小组的会议。听说您在会上说过，似乎我和索柯里尼科夫是'反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关于前天的争吵，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吧，为了使您消除对我的怀疑，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请您了解一下我在想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使苏维埃政权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一些：少一些镇压，多一些法制，多一些商量讨论，多一些自制。我在《布尔什维克》刊物上写的一篇文章得到了您的肯定，就是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因此，我有时会反对扩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权力的建议，请理解，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您知道我是热爱您的），您没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您本人以及作为一个机构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有什么不好的想法。这是原则性的问题，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充满政治热情的人，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所以您会理解我的。紧紧地拥抱您，紧握您的手，祝您快快康复。您的布哈林。"

② 1925年3月8日，捷尔任斯基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到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大家都累得要死，有些人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而党的高层领导中的某些显要却开始怀疑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存在的必要性了（布哈林、索柯里尼科夫、加里宁、还有整个外交人民委员部……。"

个最大的政治错误，那将意味着我们输给了耐普曼[①] 和庸俗小人，意味着向否定布尔什维主义的人屈服，那将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胜利，将是放弃阵地。为了反对这种精神状态，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实践，修正我们的方法，并且消除能够滋生这种精神状态的一切温床。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必须（或许如此）变得更加静悄悄一些，更加低姿态一些，在采取搜查和逮捕行动时更加小心谨慎；要掌握更多的旁证材料，因为出于某种压力，或出于我们的、社会的、党的意见的考虑，某些类型的逮捕（耐普曼，职业罪犯）是受限制的；应更多地向地方委员会通报有关情况，更多地吸收有关党组织参与到有关案件中；必须修订我们的外派政策和签证制度；必须注意普及农民中的斗争，帮助他们与流氓行为和其他犯罪行为展开斗争。总之，要切实制定出使工人、农民和广大的党组织成为我们可靠后盾的有效措施。

此外，需要再次注意我们的情报通报，让它给中央委员们提供有关我们工作的简明扼要的实际情况，能提供所有的细节则更好。我们现在的通报所提供的只是片面的情况，是没有正确的预测，没有对我们真实作用的恰如其分的描述，只是漆黑一团的东西，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工作做一个总结。

捷尔任斯基

① 即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分子。

№04296

伏龙芝和斯大林关于如何称呼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

（1924年12月10日）

斯大林同志

请您就这份文件提出您的意见。

伏龙芝

需要查明“托洛茨基是红军的领袖”这一措词的始作俑者，并给予处罚。一定要更换这一结论。

斯大林

这一措词当然需要更换，但我也不喜欢“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领袖”这样的称呼。我考虑，对党来说，称领袖更好一些；而对范围相对较小的军队来说，不宜称呼领袖。干脆向全军介绍一下军队领导人的简历。

伏龙芝

№04298

奥尔忠尼启则就党内派别斗争致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5 年 3 月 12 日）

亲爱的克利姆

两天以前收到了你的信，使我们大家（马米亚、米亚斯尼科娃）都非常苦恼。我们都感到天旋地转，不知所措，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①] 统统都让他们去吧，可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疯狂的行为。无论他们中的什么人取得胜利，就算仅仅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个人胜利，同时也是党的最大失败，要知道，他们正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舞和支持其国内和国外的反革命，要知道，他们原本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俩都这么灵活地投入了似乎是支持和反对中央的斗争，这一点，他俩应该原原本本地公开说清楚。依我看，我们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处于危险的境地，而其外表却是平安无事。党的处境越危险，越严重，这一点就越明

① 1925 年初，斯大林及其支持者为一方，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双方冲突的起因是 1925 年 1 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做出的决定。全会解决了托洛茨基的命运问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求将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但斯大林主张应局限于解除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的职务。斯大林的主张获得通过。这一决定使斯大林获得可以加以充分利用的很大的政治上的余地。有关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加深、分成“斯大林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的消息广为传播，并引起了部分领导人的不满。考虑到这一情况，在一段时间内，双方都曾反对存在矛盾，但很快就最终走向了破裂，并在 1925 年 12 月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了。

了。无疑，双方都作好准备要消灭对方，无论如何要制止他们。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制止呢？如果你也能来和我们一起开会就好了。

№04299

皮达可夫就有意辞去劳动国际委员会职务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5 年 3 月 25 日）

午饭时我喝了一杯伏特加，睡了一个小时（5～6 时），稍稍安静了一些。这次真是发了一回疯。

一切平静下来后，我决定，我不应该去劳动国防委员会，因为这样于事无补。我看出来了，沙因曼和鲁祖塔克是在故意作难，弗鲁姆金已经表示放弃。①

如果是这样，这就不好了，因为我是作为您的副手主管工业的。您应该找另外的人，我就去当最高税务委员会的主席，我向上帝保证，这样要好得多。我无法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就是工作的话也会受损失，因为：

1）劳动国防委员会对我明显不信任；

2）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显得无能为力，就不会有工作所必需的充沛的精力。

我说这些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激愤，也不是故意为难，而是完全认真的。明天你就会收到我的正式辞呈。

① 1925 年 3 月 25 日，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会议研究了由皮达可夫提交的有关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几个问题。比如，决定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委有关机电工业生产和财务计划的报告从议程中撤销，责成最高经济委员会向国家计委提出新的计划。还决定撤销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委关于玻璃和陶瓷工业生产和财务计划的报告。

№04300

捷尔任斯基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权限致梅利斯的信

（不晚于1925年5月1日）

梅利斯同志

（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而写）

克雷连科同志要求缩小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权限，同时扩大监察机关的权限。[①] 这是为什么？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审查各色各样不归它管辖的事情中扩大了自身的权限；还因为通常情况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把案子转给法庭处理；还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案犯的惩罚过于严厉（这可以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俄罗斯联邦法庭各自判决执行

① 这是捷尔任斯基写给政治局的信，也是作为对克雷连科信函的回复。克雷连科在他的信函中说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过多过滥地使用了法院以外的手段审理被捕人的案件（通过特别会议和“三人审判小组”）。与法律背道而驰，法院以外的手段变成了通例，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向法院移交案件倒成了特例。克雷连科指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滥用极刑（枪决）。据他说，俄联邦各省法院1924年内在做出判决的65000人中，执行死刑的有615例，同一时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判的9362人中，判处死刑的达650人，而且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了1925年的前几个月。克雷连科还向政治局通报了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流放到偏远的北部地区的人所处的异常恶劣的条件。遣送到劳改营的政策实际上是把行政流放变成了监狱关押。据此，克雷连科请求：严格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法院外审理案件的权力，特别会议只适合于审理特别类型的犯罪，规定特别会议只拥有判处行政流放3年和劳改营监禁一年的权力。克雷连科认为，高于以上程度的惩处，每次都要得到主席团的批准，而不是中央执委会书记的批准，而且必须有监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检查官的书面通知，方可执行。克雷连科还建议扩大检察机关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事侦查的监督权。

枪决数目的对比中看出)。此外，案件的审查过于表面化，在一次会议上审定的案件过多；而且，劳改营事实上变成了监禁，而流放中的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被置于听天由命的自流状态。

至于其他的，克雷连科同志提出的纯粹都是政治问题，首先是同反革命、保皇党、恐怖分子、白匪军团，以及专有的审判方法作斗争，而且，显然应把惩罚减轻一些。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问题只能由检察机关提出，因为它从本身职能上就是一个护法机构，而且对政局毫无了解。对于它和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克雷连科同志，有的只是这些人或另外一些人的犯罪条文，不存在同反革命进行斗争以及有关政党增加、恐怖团体增加的预警问题。撤销我们刑法法典中有关死刑的条款和放宽量刑的程度是最简单不过的事，这一点对于法庭、对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必需的。可是克雷连科同志在自己的方案中对此却只字不提，只盯着要缩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职权。我们认为，通过一系列的法庭审讯就判定联盟范围内的恐怖组织和拥护帝制的组织增加了，这在政治上是不能容忍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恐怖活动嚷嚷的越多，它就会越频繁。复辟帝制运动只得到了在国外的复辟狂们的支持，可能还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钱财和其他的支持。最后，由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个中央直属的联盟机构，我们当然可能比 8 个司法人民委员更容易地采用包括惩罚在内的各种办法与反革命、间谍进行斗争。总归一句话，在量刑中之所以常与检察机关发生争执，是因为我们主张更严一点，而它则主张宽一点，但主要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劳教、流放等手段是分化敌人的工具，而不在于惩罚；而且，常常是我们形式上对罪犯判得比较严，而实际执行中比较松，这是法庭所做不到的。

至于其他方面的考虑，首先，克雷连科同志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问题上是惊人的无知。我似乎觉得，光从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事

务的检察官就有10个，更不用说从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大楼里对他们进行监视的庞大编制，本应该对事情了解得多一些。事实上，我们的职权没有任何的扩大，相反，我们正是适度地使用了提供给我们的权利。请问，驻我们这儿的检察官在干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对待非法行为的？他们无须与非法行为作斗争，因为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看家狗、马拉松式的竞争活动和其他危及社会安宁分子的命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完全可以将这些先生们不断地作大规模流放处理。实际上，我们只在1924年的2月对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他分子作过一次大规模的流放处理，其他的没有流放，而是移交给刑事调查局了。第二次大规模流放是去年夏天的事，流放的是窃贼，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搞的。当时，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代表们被窃贼们偷了个精光。这两次总共流放了约4500人。现在，几乎每次开会都要重新考虑数十件有关让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分子返城的事。这些事是由有检察机关参加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分管的，重新考虑也是由检察机关提出的。被流放的都是至少被判过两次刑或4次拘留的惯犯。地方上没有类似的流放权，而由民防局的专门委员会就地对惯犯进行审讯。这种审讯也有检察机关参与，由它们对每个将被流放的罪犯进行逐个认定。在莫斯科，则由检察部门参与其中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此事，由特别会议批准上述专门委员会做出的拘留决定，这样就产生了被克雷连科同志所引用过的天文数字。可是，恰恰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心甘情愿地拒绝过流放惯犯，原因是这样一来势必打扰各省的政治保卫分局，它们不得不为一个个活生生的刑事犯去忙碌，而不仅是一纸公文就完事了。

至于同时在特别会议上审理的政治案件，则早在审讯前，甚至在逮捕之前，几乎每一个被审查对象都是很清楚的，每一个参加会议的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官，不事先看一遍有关案件的材料是不能参

加审讯的。在熟悉了案情的条件下，审理 30～50 个案子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说我们转给法院的案件并不多，这是完全不对的。事实正好相反：1924 年，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特别会议经手的 8074 人，由中心转归法院的 1557 人，如果整个联盟范围内的都算上，那儿转归法院的达 42394 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留下 19576 人，而且这并不表示剩下的 1900 人都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自个审理。

为数不多的反对现行管理制度，反对个人的案件都包含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受理案件的总量之中。这些案件在侦查过程中，或者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做出判决，或者按法定期限转给检察机关。如果说有少数可疑案件的话，那也是或者涉及我们的秘密工作者或者是匪帮的案件。在审理案件时，检察机关会坚持诸如：在该情况下匪徒杀了人，并提出有关不属于我们管辖范围的法律条文，但是，因为我们已经审理了这个案子，检察机关本身只要愿意，为了避免继续拖延，在办理违法案件中会同意转给法院，因为按照现在这种拖拖拉拉的做法，被告等待开庭审理差不多要等上一年，在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少于半年。

关于死刑问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是个联盟机关，我们的数字同所有法院的数字，即使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也无法相比，因为这是拿全部与自己的局部相比，前者总是要比后者多。没有统计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的数字。

1924 年的 650 人中判死刑的有：

制造假币者 334 人

匪徒 89 人

间谍，主要是我们有双重国籍的从事秘密工作的人，77 人

反革命分子 37 人

1925 年的 245 人中：

造假币者126人

匪徒54人

间谍17人

反革命分子28人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全联盟的汇总数字，因为地方机构无权进行这种宣判。这里主要的是造假币者，占了50%以上。反革命和间谍案不在法庭审理。

关于流放问题。被流放者的情况确实很糟，对他们的货币援助极少，但国家暂时也无力提高对他们的补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没有结果。需要补充的是，根据西伯利亚分局的申请，西伯利亚分局是按苏维埃的程序办理的，因为莫斯科无法确认西伯利亚的这个那个地点，而这一权力是授予了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的。雅库茨克事件和西伯利亚农民的情绪使我们无法建立起其他程序。

要求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行使自身权利的时候建立起有利于俄联邦助理检察官的这样或那样的程序，是干涉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特权。

克雷连科同志的证言绝对是不可信的，因为通常情况下，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申请进行庭外审讯，检察机关是事先不知情的。问题在于是否向中央执委会提出过在有检察官参加的委员会或特别会议上进行庭外审理的请求，然后，在提交给中央执委会时是否附有检察官的异议。有异议的案件真是微不足道，而且克雷连科同志本身应该了解这一点。

与克雷连科同志的实际意见相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坚决地表示了反对。目前政局下，远不是剥夺我们审理恐怖分子、复辟狂和白匪案件权利的时候，也就是说还不到压缩我们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权利的时候。据此，我们会认为，把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劳改营拘押待判时间缩减到一年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只能对孟什维

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间谍们有利。在政治案件、间谍案件方面，把检察部门的权利扩充至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还大，我们认为，只会带来负面的结果，因为这将不得不使护法机关成为案情分析工作的参与者，即使审案时也得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或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多添几个按契卡方式工作的人员，但因为经验不足，无法取得我们的信任并且独立于我们，案情分析中的废话和糊涂话会大大增加；或者在参加我们工作的同时，检察机关保留固有的工作方法，那样也就无法工作了，两者必居其一。无论如何，革命的法制总是无法赢得喝彩。我们拥有与经济管理部门以及交通部门打交道的经验，检察机关这些部门办理诸如政治类案件时，也没有受到对我们有利的法典的额外束缚。通常把除了制假币者以外的所有案件都移交给法院，从形式上也未必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非常有利，因为恰恰是这些部门发生了伤及克雷连科同志这位护法使者的形形色色的案件。这些部门已经把契卡式的这种压力与经济犯罪、职业犯罪作斗争的武器丢失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且对突击性工作也有所放松，因为案件转给法院，就在那儿压着，等啊等，等到审理了，整个经济局势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这是个严重的不足，可是，如果政治案件也等到政局都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再来审理，这就将危及联盟的存在。[①]

① 1925 年 11 月 10 日政治局做出决定：建立一个有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克雷连科组成的委员会，由古比雪夫任召集人，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实际做出评估。

№04301

皮达可夫就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争吵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5年7月14日）

亲爱的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

今天我和您谈话后，我的心情感到非常沉重。我不善于表白我对别人所抱的一片好心，因此今天在和您的谈话中，我没能说出我的想法。从您那回来后。我感到头很晕。我想在我休假前把一切都向您解释清楚，哪怕是用书面形式也行。如果您感到我过于敏感简直有点可笑，那最起码可以免除您读到此信时可能带来的不快。

昨天在主席团会议上，因为一个细小的不值一提的问题，我和您之间产生了不和（需不需要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组建分局一事），我这个人好急躁，不知分寸，同您发生了争吵，请您原谅。但问题不在这里。回家以后，整个晚上我都处于苦闷之中，因为我的行为似乎损害了迄今为止咱俩之间一直挺好的关系，我感到很难过。今天早上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您气忿地拒绝谈这个问题，我就寻思，这无疑表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所受到的损害远比我昨晚想象的还要重，因此我的心情很坏，因为我想，这全是我不对。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想，您也知道，我不仅把您当成值得我尊敬的首长看，不仅把您看做无论什么人也无法相比的老朋友看，而且把您看做是真正值得我给予同志之爱的好同志。我个人有所眷恋的很少，可是对您这个人，我真有所依恋，正因为此，我乐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您的助手。您大概已经发现，按照我本人的性格和

去年一年的习惯，比起当副主席，我更倾向于独立工作。给李可夫当副主席对我是一种惩罚。给您当副手我感到很轻松，那是因为我不仅把您看做是我的首长，而且当做亲近的朋友。或许这样不好，或许我对您与我关系的评估有错，但是，毕竟我是这样看的，而且正是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才有给您当副手的良好的自我感觉。我曾经因为和您一起工作并对此有很好的感觉而高兴；正因为此，任何您对我的不满或我们间同志关系的变坏，我都会受不了；我真怕会给并不人道地对待我的同志当副手，真担心我们之间正式的工作关系受到损害。

当然，如果我的担心真的成了事实，我也不会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因为我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时我将和现在当您的副手一样，满怀激情地工作，全力以赴地从事我所喜爱的工作（工业）；还因为，尽管我的工作并不是独立自主的，但我有您这样一位一直对我不错的首长和同志。我不想离开工业部门，我怕您对我的关系会变坏。我之所以有这个担心，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脾气。我认为，像您和我这样性格的两个人在一起工作，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当下属，当下属的人并不能独立自主地干自己的工作，而只能做一些辅助的事，只有两人关系很好，很亲近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如果我的担心不幸成为事实，我会很痛苦的。

我请您，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中出现任何小小的欺骗行为，如果您对我的同志式关系真的发生了变化，请您解除我的副手职务。这肯定会使我很不愉快，但是，如果我这个“副主席”和您这位“主席”之间仅仅存在工作关系，而不存在私人友谊的话，那给我的痛苦不知还要大多少倍。

再说一遍：我的信或许是滑稽可笑的，别的我也写不出来，我只能怎么想就怎么写。

皮达可夫

№04302

捷尔任斯基就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争吵致皮达可夫的信

（1925年7月14日）

亲爱的尤里·列昂尼多维奇

我很高兴能收到您在动身前写的信，因为我很珍惜我们为加强工业而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一起工作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党的硬性分配，而是完全协调一致的，所以，昨天咱们间的小冲突也使我懊丧不已，工作起来也觉得没精打采。事先没有与你通通气，我就把这个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是我错了，要不然您也不会写这样的信，说这些荒诞的话，还猜测为什么您反对我的计划和我又为什么如此尖锐地进行了反驳。我真是空前地生了一回气，因为我发觉我成了少数派。我不能容忍作为一个主席犯下这样的错误。我的失败是对我作为我们这个机构领导人的一次打击。至今，我不能自制时就说粗话，我主宰不了自己，真是遗憾。今天早上我还不想谈这个问题，因为我担心一个晚上没有休息好，到了第二天，我仍然会像某种物质的东西一样，突然会发起火来。我也想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您的来信帮了我的忙。我不能想象，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要没有您该如何工作，虽然我们看问题的角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相同，而搞工业正需要这一点，而且我们能够一起工作，不会互相压制、互不负责，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说，我们团结合作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完全不是假装的，而且，您对工业的熟悉和了解是我无法相比的。如果说按照您的性格您不适合当“副

手”，但仍然能够干那么长时间，而且干得很成功，那就是说我们是因为工作需要“走到一起来的”。昨天的冲突确实是很难堪的，因为这样我们这个机构中就会有人产生另外的看法，这会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因为由此引起的类似我们在争权夺利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层准备要变了等等的闲话肯定会有损我们的机构。但是，这毕竟只是小事一桩，现在，我一点懊丧也没了，我们的关系不会变，人们的闲话也会自动消失的。我对您可没有一丁点儿的欺骗，因为我们之间早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一般的关系。休完假赶紧回来吧！

您的　Ф.Д.

№04303

捷尔任斯基就工农联盟问题致皮达可夫的信

（1925年10月2日）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

我完全同意您的想法。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应该无条件地与农业人民委员部结成联盟，以执行我们工农联盟的政治路线。这在经济上的体现应该是工业和农业结成联盟，在组织上应该巩固我们两个部门之间的联盟。为了这个联盟，需要制订出一个纲要，以避免目前的废话连篇毁坏了这个联盟。为了执行巩固联盟的总路线，尽管在部分问题上尚存在分歧，但斯米尔诺夫仍然希望达成一协议，并且给自己提出了制定联盟纲要和计划的任务。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一构想，我们就能腾出部分国家财政，精简一部分不必要的机构和中间环节，并且赢得很多的时间和速度。

联盟纲要中应该包括哪些问题呢？我考虑有以下这些；

1）我们为农民生产的产品价值，农民提供给工人的农产品价格，还有它们的质量；

2）农村市场的容量和需求，它们对工业的满意度；

3）协调进出口计划；

4）农业的工业化和电气化；

5）原料问题；

6）信贷政策和拨款问题；

7）工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8）国营农场的工业化问题；

其他问题。

如何从组织上落实这个联盟？在这个问题上困难还很多。我想，应该建立一个我们双方共同的研究所，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充分协商，会拿出结论来的。此外，还应该在我们的职能机关、计划机关和执行机关设置一系列双方或单方面的常设代表处作为这些机构顺利运转的小齿轮。这些常设代表处可以时时提醒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开展工作。

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再谈谈，对这些问题还要研究得更细更具体一些，然后我们再和斯米尔诺夫碰一碰头。

捷尔任斯基

№04304

捷尔任斯基就退出党派运动致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5年10月5～6日）

我请求在列宁主义党派大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

由乌格拉诺夫宣读的列昂诺夫的信揭露了列宁格勒上层组织的反党阴谋。这一阴谋的组织者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非常遗憾，我还是从乌格拉诺夫在本派会议上宣读了那封信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的，还感到遗憾的是，会议开了6个小时以后才宣读了那封信。如果会议一开始就作了宣读，整个会议和本党派的工作进程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那样的话，谈论的就不会是有关工作和七人小组工作不协调的问题，而是该说说我们党内的这个新的喀琅施塔得集团了。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派别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生存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当1917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背叛革命时，他们的背后既没有彼得格勒党组织，也没有工人和农民，而且工人和农民的领袖还活着，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可怜的胆小鬼，现在则不同了。领袖已不在了，农民中的大多数虽然不反对我们，但并不拥护我们，我们来不及把他们组织起来支持我们，因为党如今正忙于处理这件事。通过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党为自己创造了足以吸引农民中的大多数组成与工人的联盟的所有条件。我们的党曾经制定和执行了最复杂的计划。当我们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时，该如何随机应变，迂回前进？当时，世界革命已被推迟，但需要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国中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而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生产力的最大发展，特别是农业在新经济政策，即商品经济基础上的最大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都清楚，在关于托洛茨基的辩论中，大家至少在口头上，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列宁格勒的头面人物都要求对托洛茨基采取最残暴的措施，这一计划对于农村来说，只有在我们党保持团结统一，只有无产阶级本身保持团结统一的条件下才能实施。这一点是绝对没错的，因为尽管我们迅速地发展壮大和恢复了，没有这一点我们一定会死去，但发展壮大本身在产生克服困难的前提条件的同时又产生了和构成了很大的困难和危险。利用这个前提条件需要时间和忍耐，需要党和无产阶级比任何时候，比喀琅施塔得集团更团结，正是这个集团结束了我们关于工会的争论，结束了我们的军事共产主义。当时，我们的红军整个还是战无不胜的，还没有转入和平状态，完全充满了战斗激情，辩论还没有触动和揭露其正式的领袖托洛茨基。现在，党的团结、中央的团结、列宁主义成分的团结、无产阶级的团结都没有了，我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没有团结统一，没有这个条件，热月政变就无法避免，因为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完不成自己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就无力去完成这一任务。危险仍然是巨大的，还没有觉悟的还没有组织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及其专政的力量也是巨大的，而我们的每一次分裂、每一个裂痕现在就是，而且不可能不是这些反对我们的力量的卓越的组织者。结果就不可避免：列宁主义者就会像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所预言的那样，作为贪婪的剥削者被吞没掉，而他们就会登上历史舞台，一个大讲“平等和民主”，另一个充当“共产主义的”波拿巴，都成了“穷人和革命”的救世主。不管是从与托洛茨基斗争时代产生的，还是准备与布哈林－乌斯特里亚洛夫斗争时代产生的季诺维也夫公式，都是对他们，而不是对季诺维也夫有利的。我们、季诺维也夫本人、加米涅夫、索柯里尼科夫和列宁格勒上层人物们都面

临着这样的命运。现在已经显而易见的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走上了托洛茨基之路，也掀起了党所不希望的，如同不希望托洛茨基政权一样的夺取之战。他们是瞎子，他们不懂得这点。他们在进行这场斗争时，预先就强迫党赞扬他们，宽恕他们曾经为揭露其先驱者托洛茨基所做的一切，因而事先就置党于无法反驳托洛茨基论战的境地。但是他们恰恰就忘记了一点，即党之所以不得不揭露托洛茨基，惟一的原因是，在实际抨击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党中央其他成员的同时，也即破坏了党的统一。也就是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季诺维也夫与当初的托洛茨基还有区别，当初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们作好了莫斯科由加米涅夫领导的少部分党组织进行政变的准备，而现在的季诺维也夫以阴谋家的手段预先就使列宁格勒的整个官方组织道德败坏、士气低落，并把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拉了过去。这样一来，继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之后，党又投入了对不仅瓦解党的队伍，而且分裂无产阶级本身肌体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季诺维也夫拥有全部真诚的欺骗，还有所有的渺小。他以前不懂，现在也不懂我们置身其中，而且在他本身需要时也谈论过的所有危险性。这种危险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稻草人，他本人就没相信过，也没感受过像1917年切身感受过的那种烟尘滚滚、子弹横飞的场面。但是我深信这点，我不仅现在讲，而且在七人小组会、在政治局也会常常讲起。如同1917年危险紧随着列宁一样，现在我们的危险也是如此真实地伴随着我们，因为说真的，与季诺维也夫不同，我是真正地感觉到了。我以一个革命者的嗅觉感受到了“历史的步伐”，因为我不是理论家，我也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者，我一生只喜欢两位革命者同时也是领袖，那就是罗莎·卢森堡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别无他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索柯里尼科夫揭露出的你们中的卑鄙小人。你们希望成为工人和农民领袖惟一正式的继承人，虚荣心折磨着你们。你们虽然也谈论

危险性，但你们感觉不到。你们在想，这是斯大林或布哈林在妨碍你们受到赞扬。不要忘了列宁的遗言，十月你们没跟他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列宁说过的，党从本能上就能感觉到。现在，党正聚集在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党的统一及其集体领导的人的周围。

我写了我应该说出的话，因为这是如今季诺维也夫号召我们要讲的真话，而揭示出的真理或许能够为你们找到出路。我不是政治家，我不会自找出路，也不会提供出路。或许，在谴责我时，你们能找到一点点出路，但我退出党派活动，我只想作一个列宁主义者，因为我不想参与使党遭受损失的分裂，因为我也不能成为对党内政治家有用的人。我不会参与分裂活动。对于党交给我的苏维埃的工作，我会完成的。

捷尔任斯基

草于党派会议后的 1925 年 10 月
5 日深夜至 6 日凌晨，一式两份。
一份交斯大林，另一份给谢尔戈
两份均由我个人所写。[①]

① 信开头有捷尔任斯基的批示："原件送斯大林，副本送谢尔戈。"勾去了"副本送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

№04305

波波夫就统计局的数据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5年12月22日）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在党代会的讲台上[①]讲到中央统计局的工作时，您发表了一些令人无法信服的见解。

您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我希望您不会拒绝在同一次党代会的讲台上纠正您不正确的说法。

您说："也可以这样谈论中央统计局在6月公布的那个倒霉的谷物饲料平衡表。根据这个平衡表来看，富裕农民的商品余粮似乎占了61%，贫农一点也没有，而中农则占有其余的百分数。可笑的是，过了几个月以后，中央统计局又公布了另一种数字，不是61%，而是52%。不久前，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已经不是52%，而是42%了。难道可以这样计算吗？我们相信中央统计局是科学的堡垒。我们认为，如果没有中央统计局的数字，任何一个管理机关都不能进行计算和计划工作。我们认为，中央统计局应该提供任何不受偏见影响的客观材料，因为使数字适合于某种偏见的企图是一种带有刑事性质的犯罪行为。既然如此，如果中央统计局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数字，那么别人又怎能相信它的数字呢？"

1）您的推断，即似乎根据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认为富农的商品余粮占61%，是不正确的。之所以说它不正确，是因为谷物

① 指1925年12月18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所作的政治报告。

饲料平衡表作为一种统计表，无法确定商品余粮——它的作用是另外一种。只有把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数据加以对比，才能确定净余粮，平衡表余粮数字与商品余粮数字是不可能一致的。

第一，无疑，向您通报的统计表（平衡表）就其实质来说是不正确的；第二，您（在参加政治局会议时）没有注意到我非常肯定的说明，即谷物饲料平衡表无论如何不能确定商品粮余额的数量，也不可能确定。

2）您的推断，即似乎中央统计局不久前才提供的商品余粮数字是42%，是不正确的。之所以说它不正确，是因为中央统计局没有提供过这样的数字。显然，您没有完全搞清楚我在政治局出示过的表格资料中的数字。

得出商品余粮42%，而不是61%的数字，并不是中央统计局用42%的新数字替换了61%的原数字，不是这样的。61%是把3组净余粮平衡表的数字相加得来的。

净余粮平衡表的百分比数字如下：

6～8俄亩	19
8～10俄亩	12
10俄亩以上	30
	61

在政治局我出示的是两组数字，而不是三组数字。两组的数字为：

8～10俄亩	12
10俄亩以上	30
	42

也就是说：中央统计局没有向政治局搞过任何偷梁换柱的手段，也没有提供过任何不准确的数字。可能有什么人，但不是中央统计局把这3组数字合并起来，而我只是按自己的方式将它们进行

了分类，并着重强调了两组农户，即占有净余粮的农户和粮食总额高于平均数的农户。

3）您认为仿佛是中央统计局的统计受到某种偏见的影响，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之所以说不正确，是因为中央统计局是科学的机关，它从来没有，也不会搞欺骗。

我同意，拿统计数字去迁就某种意见就是刑事犯罪，可是，另一方面，也必须在某一时刻对流行的关于中央统计局工作的错误看法做出适当的评定。

您必须在同一个讲台上或者公布我这封信，或声明一下您的看法与事实是不相符的。

您必须知道，中央统计局不是某个人的机构，它是一个科学机构，从事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的工作。上述错误看法灌输给一些党内同志，又经由他们或经过刊物传给群众，而群众获得信息的准确和齐全与否应该取决于统计机关资料的准确和齐全的程度。毫无疑问，您正在造就一个国家统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环境；您无疑正在促成对国家统计局工作的怀疑和不信任，因为您说过，谁能相信中央统计局几经修改后的数据呢。

您是一位坚强的老党员，惯于讲真话，因为我深信，您会马上在以上我所指出的范围内向党员和群众说明真相，即您对中央统计局活动所讲的话与实际情况是不相符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波波夫

《真理报》刊登了一系列不利于中央统计局工作的文章，我的反驳文章都不予登载，这难道正常吗？

№04306

基洛夫就党内争论致马尔库斯－基洛娃的信

（1925 年 12 月）

亲爱的马鲁霞

一直等着你比电报要详细的信来，但还是白等了一场。出发前我给你写过信，问你要不要给你买点什么，但是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想给你买件毛线短上衣，或者，叫什么来着，反正你那里有，但是要比那件好许多倍的衣服。我不知道该买什么尺寸，什么颜色的。但愿用不着我买了。

我的精神很不好。你从报上可以看到，我们党代会上正在进行不顾死活的争吵。这样凶的争吵以前也没发生过。[①] 好好地看看《真理报》，你就明白了。由于这场争吵，这里准备让我常驻列宁格勒，到那儿去工作，今天，这一点已经说得很肯定了。当然，我是坚决反对的，谢尔戈也反对我去那儿。我不知道这件事最终会如何决定。一周以后，或许还要早点，党代会就开完了。开完会，我马上就回家去。

你怎么样！如果“皮姆”的疙瘩还没有消退的话，再给他抹一次香油，但愿能够消退下去。

祝你健康！

你的　谢尔盖

①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于 1925 年 12 月 18～31 日。

№04307

基洛夫就地方党内紧张局势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年1月10日）

亲爱的谢尔戈

真应该在这里好好地聚一聚，尤其是我们很快就到了一些大工厂，击退了一些团体的进攻。我们已经攻下了萨尔基斯的堡垒，拿下了电力厂（党员900人），我想，再过一星期后，所有大单位都该拿下了。我们党现有的党员数量真是相当多了。一些单位提出要改造区委，有的地方还要求改造省委。我知道，省委和区委的人急得要死，他们希望我们撤了他们，我在想，这会违反民主国家的基本权利。总之，局势很紧张，还要做很多工作，更要直着嗓子叫。我们还要看着时局如何发展。好了，我要去造币厂了，要去参加全体人员大会。向所有的朋友问好！

你的　基洛夫

№04308

联共（布）中央就对政治局决议进行表决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6 年 1 月 13 日）

发文：1926 年 1 月 13 日莫斯科

收文：1926 年 1 月 14 日

第比利斯联共（布）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

奥尔忠尼启则

立即译出电文。

寄给您 3 份材料：1）政治局的决定；2）加米涅夫同志的建议；3）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建议。请您马上对此进行表决，并将您的表决结果报告中央。№－169/C

中央书记　斯大林

以下是№169/C 的№1：一、政治局的决定。[①]

1926 年 1 月 11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征求全体中央委员对中央以下决定的意见：

1）取消劳动国防委员会特设的主席职务，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兼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① 在电报第 3 页上有奥尔忠尼启则的批注："我不反对。"

2）任命鲁祖塔克同志、瞿鲁巴同志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人民委员会李可夫同志的副手，同时保留鲁祖塔克和古比雪夫现有的人民委员职务；

3）任命加米涅夫同志为贸易人民委员，解除瞿鲁巴同志的贸易人民委员职务；

4）任命布留哈诺夫同志为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执行主席，解除索柯里尼科夫同志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所担任的职务，改任为国家计委副主席；

5）任命沙因曼同志为财政人民委员部布留哈诺夫同志的副手，同时兼任国家银行的行长，解除其贸易人民委员部副委员的职务，解除图马诺夫同志的国家银行行长职务；

6）责成加米涅夫同志提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自己副手的候选人，报政治局通过，同时考虑一下弗鲁姆金同志担任此职的可能性；

7）李可夫同志被任命为政治局专门委员会的主席的同时，增补政治局中央机构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的若干名副主席，责成该委员会于两周内向政治局提交自己有关劳动国防委员会组成的意见。全体中央委员要通过电报对问题进行表决，允许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于在一天内向书记处提出自己不同意政治局决定的意见，以便分送给全体中央委员。

以下是№169/C的№2：

政治局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最主要的理由如下；

1）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中必须达成最大程度的一致意见。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同志兼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有助于达成统一的意见。

2）在党代会上发生过的争论当然不应导致曾经在党代会上反对过大多数人意见的这部分党员失去参与苏维埃的领导工作的机会。与此同时，党代会上所造成的局面也不得不让加米涅夫同志和

索柯里尼科夫同志转到苏维埃另外的岗位上去发挥他们的才能与经验。加米涅夫同志在原先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整个工作中已经熟悉了市场、对外贸易的所有问题，以及市场对于国家经济的危险性，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的粮食出口委员会主席，实际领导过粮食收购和出口工作。加米涅夫对这项工作的熟悉程度反映在他的所有讲话中。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时期，把加米涅夫用在更重要的经济工作部门，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领导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是适宜的。同时，加米涅夫同志当然也应尽力协助组成这么一个班子，使之协助自己组织和实施好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各项工作。

3）索柯里尼科夫同志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领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整个经济的计划及其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索柯里尼科夫同志的这些经验和能力将在国家计委得到充分的施展，其意义和作用在目前我国经济所处的时期内还会增强。国家计委面临着最重要的财政计划编制工作，索柯里尼科夫同志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正好为党所用。

4）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工作的复杂和多样化决定着必须增加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数量，因此，除了瞿鲁巴同志继续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外，政治局又任命鲁祖塔克、古比雪夫两位同志为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

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新任命，还有对沙因曼同志为国家银行行长和财政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的任命在政治局讨论中没有遭到多大的反对。

请速将你们的意见通报中央。

联共中央书记处

以下是№169/C 的№3：

2)[①] 加米涅夫同志的意见是："任命我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是绝对不妥的。我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没有任何个人资历可言，无法胜任其业务上、组织上和行政上的工作。人民委员部机构处于完全解体状态。克拉辛今天要去英国，沙因曼已调国家银行，我对这里的业务一点不懂，随着上述同志的离去，我想学都没地方，想借用人家的经验都找不到门。对于共和国目前经济状况，对对外贸易部门进行正确内行的领导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对我的任命无论如何是没有保障的，无论对于国家的利益，还是对于正确利用我的能力和经验，都是不适宜的，即使是因为党代会上发生的事件，也不应该成为如此任命的理由。在任何适合我的能力和经验的国家公职岗位上，我从来并将永远奉行的是党和中央的路线，决不是我个人的路线，但我应该向同志们说明的是，不要指望我对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会是卓有成效的，会是真正有利于党和苏维埃的，会是真正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的。加米涅夫"。

以下是№169/С的№4：

2）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意见："鉴于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岗位已经撤销，而且李可夫同志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我建议一、加米涅夫同志作为李可夫同志的副手留任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二、索柯里尼科夫同志留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理由是：1）上述两位同志已经表明，他们留在原部门工作有利于事业的开展；2）在当前经济困难条件下，半途换马特别危险；3）党代会上的冲突不应成为做出这种组织结论的理由，况且这样做有可能危及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严重削弱这些部门的领导。季诺维也夫"

① 原文如此。

№04309

基洛夫就地方党内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 年 1 月 16 日）

亲爱的谢尔戈

我从事这一新的同时也是很困难的工作快两周了。情况是这样的：彼得格勒、戈罗德、沃罗达尔选区，都是我们的事，剩下几个小工厂，莫斯科－纳尔瓦厂，多半也是我们的。布季洛夫还没到。这里的一切都像是在战斗。这是什么样的战斗啊？昨天参加了一个2200 人团体的三人领导小组会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真是难以想象。这样的会议，不用说从十月革命以来我没见过，而且难以想象党员的会议会是这个样子。会议上时不时还动了粗，打起了耳光，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一句话，我是中了圈套了。其他区有了大的转变。近几日，可望进行区委会的改造，并选出我们的组织者。总之，谁要是喜欢吵架，就来这里好了。开会准备把你折腾得半死不活。两个星期的发言，说的都是一回事。天天都开会，开得头直发昏，谈谈你的情况，一切都好吧。你不在，真无聊。向大家致以真诚的问候。

吻你。

你的　基洛夫

№04310

捷尔任斯基就对米柳亭的态度问题致古比雪夫的信

（1926年2月1日）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古比雪夫同志

米柳亭同志通知我说，他向中央监察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就我在人民委员会食堂对他的抨击进行申诉的材料。我对米柳亭同志大体上讲了以下这些话："我应当告诉您，我认为您的行为是错误的，是属于破坏组织的行为，但这不是你挑的头，而是受了别人的指使"。对于前两点看法（错误的，破坏组织的行为），我有足够的证据，当然，这是对我而言；对米柳亭同志而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做了，但还是不做的好。至于说第三点看法（受人指使），之所以我有这样的怀疑，是因为有不少针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责难。当然，这些责难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我对他的抨击只是根据我的怀疑。

为避免任何人不需要的东西……[①]，我准备收回我的最后一点看法（受人指使），如果因为我讲了这种话，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对我进行处分，我也表示接受。至于我说米柳亭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是破坏组织的行为"，这两点我不能收回，因为这不是我的怀疑，而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Ф.Д.

① 此处字迹不清。

№04311

斯大林就基洛夫任职事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

（1926 年 2 月 1 日）

发自：莫斯科 1926 年 2 月 1 日

收电：1926 年 2 月 1 日

第比利斯联共（布）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

奥尔忠尼启则同志

一切已收阅。关于基洛夫事，等他 3 月参加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我们再讨论一下。[①] 我这边的事情尚好。我想过两个星期后休个短假，感到很累了。

斯大林

① 指基洛夫从列宁格勒回巴库重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事。

№04314

古比雪夫就米柳亭调查工业发展计划问题致捷尔任斯基的信

（1926年2月1日）

1926年2月1日

致捷尔任斯基同志

费利克斯！首先，我想纠正因米柳亭同志安排的一次会议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的一个正式说明。我对你说过，他召集这次会议是经我同意，受我委托弄清工业发展计划的。在谈话中我否认有这么一个委员会存在。这样的委员会是没有，但我忘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因为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审查所有问题而建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有着明确的分工：斯捷茨基负责进口，雅科夫列夫负责出口，赞吉维尔特分工货币资金的周转，拉林分工贸易和粮食收购，丘茨卡耶夫负责预算，米柳亭和戈尔茨曼负责工业。当米柳亭同志把会议有关文件送我签字时，我以为只是在执行我委托的任务，而忘了我们主席团下属委员会交付给米柳亭的任务。因此，米柳亭是作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所属委员会的成员召集此次会议，主要是查清委员会授权要他查清的问题。我对你说的不够准确。

但这一点并不很重要，因为在米柳亭执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托任务的条件下，他不应在你的部属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结论，而应局限于对问题的调查，把自己的建议性结论提交给委员会，由委员会（在我的领导下）研究有关国民经济的整个问题，协调所有有问题

的各个部门。在承认米柳亭同志错误的同时，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先是你同我的谈话中，然后是你与他本人的谈话中对他的行为所作的非常不客气的评价。

从他所作结论的内容和他在委员会的行为看，并不是存心找碴儿。重要的是，所有情况都说明，你对他的指责，说他是“有人指使”，我以为是缺乏说服力的。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你的所有结论也是不对的。米柳亭同志因为受到你的侮辱向中央监察委员会递交了声明。这一段过节如何了结？怎么也不好办。不能这样解决让你生气的问题。

所有资料都表明，他将下定决心周旋到底。

古比雪夫

№04313

伏罗希洛夫就列宁格勒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年2月6日）

1926年2月6日

亲爱的谢尔戈

谢谢您的来信。迟复为歉，实在是找我的人太多，把我都忙糊涂了。对于我们这些兄弟——无产者来说，整天接连不断地折腾，直至神经错乱的地步，而事情还是原地踏步不前，甚至更加糟糕，这是莫大的灾难。

在列宁格勒，我们工作得好极了，成绩是足够的，但并不出乎意料之外。到这里后，随着情况的不断熟悉才发现，我们真幸运，反对派只是不求甚解。党的基层并不知道列宁格勒的组织正在一天一天疏远党的事实。头儿们想，我们开始向积极分子作报告的时候，他们早为我们准备好了适当的见面礼，那是真正的陷阱。当我们向工厂开进的时候，捣乱分子们慌了神。接着，头儿们就没法说到点上了，我们则加快了步伐，不给他们以片刻的喘息。真正是经历了许多有意义的事件。在列宁格勒待了16天，我就变得年轻了。而这样的事件，在1904、1905～1907年间，想起来，真不知经历了多少。

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安安静静的，仿佛是一场大风暴过后，只是偶而旋过一阵风，立刻又静下来了。

“骄傲自大”的主席稍稍让我们的费利克斯受了点委屈。为此，

在小范围内谈起过。费利克斯诉了苦，还要求休息。[①] 根据是货币和进口等方面遇到很大困难。我想一切都会调整好的，虽然这些征兆我很不喜欢。我对柯巴讲过，结果并不显著。在军事部门没有任何特殊的。我们的预算被搞得乱七八糟，不成体统。拉舍维奇病了一个多星期，现在好不容易刚能做些事情。

我们的军事工作搞得比我们想象的要糟。需要采取某种大动作。什么动作？一时也难以说清，我们等一等，以后再解释。

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②] 上似乎不会有吵架的事，但总的说来，这一年中，没有争吵恐怕是不可能的。基雷奇在列宁格勒干得不坏，但心仍在石油上。本来是满怀喜悦的，瞬间 30 度的严寒上了脸，自然是留恋自己芳香四溢十分诱人的巴库的。

向埃利阿瓦、阿马亚克、奥拉赫拉什维利、拉夫连季和其他朋友们问好。

紧握你的手！

你的　伏罗希洛夫

---

① 指捷尔任斯基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之间的冲突。捷尔任斯基处保存有 1925 年 12 月 3 日捷尔任斯基致斯大林的一封内容广泛的信。信上有捷尔任斯基的批注："未发"。信中，捷尔任斯基谈了经济领导人的许多问题以及有关辞职问题，因为在现有条件下，我已不能胜任对经济的领导工作。我既没有一个正确的计划，没有一个对苏维埃经济的统一的计划，也缺乏对经济工作的统一而有效的领导，缺乏对各部门的统一的协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正在迅速陷入局部危险。如果我党不尽快地采取必要措施，这一危险还将继续发展，并有可能变成严重的危机。我本人不是个政治家，不善于及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便党及时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没有提出过一次问题，连一次也没提过，而问题总是在研究研究，协调协调之中，因此，时至今日，问题仍在研究中），反而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工作设置了障碍，不利于他尽快和按时地解决问题，因此，除去请辞外，我已别无选择。我相信，即使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活着，他也会同意我的辞职请求的。伏罗希洛夫这里写的多半是指捷尔任斯基在自己未发出的给斯大林的信中所写的 3 个问题。

② 指 1926 年 4 月 6～9 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经济问题。

№04315

基洛夫就与反对派斗争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年2月13日）

亲爱的谢尔戈

来信收悉。谢谢你没有忘记我，我想你会一直这样的。昨天代表大会刚结束，与反对派作斗争的初步工作也刚告一段落。今天是省委全会，选举了书记处、政治局和其他机构。这一方面的事情正在进行中，只是爆发了基于地方本位主义的新的争吵，不好，这一点很不好。洛博夫同志奉命调去了莫斯科[①]，这件事居然在这里引发了矛盾和争吵。一句话，你知道的，断绝与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深受欢迎。所有这些都需要应付过去。我想，我比谁都遭罪。这工作真难受，从来没有睡够的时候，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和我一位非常年轻的同乡[②]有了很大成就。代表大会总的来说开得不错，只是讨论真让人厌倦。如果晚上你能叫醒我，我可以原原本本地跟你讲一讲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新经济政策等事情。过几天，我可以详细地写一写，但现在不行。

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向济娜问好。

吻你！

基洛夫

① 1926年1月21日，政治局采纳捷尔任斯基的建议，任命洛博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一决定须经过一个月后才能生效。

② 指伏罗希洛夫。

№04312

捷尔任斯基就政治局会议冲突致古比雪夫的信

（1926 年 2 月 15 日）

古比雪夫同志

现去信是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与外高加索联邦会议记录第七款事。会议决议的措词是皮达可夫拟定的。他是坚决反对未经检查做出最终裁决的。外高加索联邦表示，他们打算为此拨款 50 万，并要求我们拨款 40 万卢布。他们没有说明这笔资金的出处，我们也不便问，只是怀疑他们因此又求助于人民委员会。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皮达可夫在这次会上表现得非常严厉，在兑现承诺和满足外高加索联邦的要求方面，表现得非常吝惜，我倒是要宽容和软弱得多。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当时既弄错了对象（称对方为皮达可娃），又在实质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再来看看皮达可夫的声明写了些什么。他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李可夫同志发言之后和会议没有答应他发表声明的情况下写下的声明。他写这个不是为了闹意气，因为他没有留下声明的副本，而是提笔就写，写完就交给了我，并问我，要不要递上这份声明。我说应该递上，因为李可夫的声明是个误会，需要打消这个误会。我相信，对此事的调查有助

于搞清事情的真相，而不是闹意气和谋求私利的无端兴讼。[①]

捷尔任斯基

① 指政治局会议上的冲突。由于会议没有记录，无法查清事情的原委。或许这场争吵早在2月4日政治局会议开始前夕就发生了。李可夫、捷尔任斯基、皮达可夫都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李可夫照样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货币干涉问题和第二季度的进出口问题和货币计划发了言。

№04316

基洛夫就派往巴库的人选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 年 3 月 17 日）

亲爱的谢尔戈

许久没有收到你的信了，怎么回事，病了吗？你从苏呼米来电说自身感觉没什么不好的，自然，这样的电报无法让人相信。

我因为流行性感冒躺了一个星期，搞得很狼狈，发高烧到了 40.6 度，至今还没完全恢复过来。这病现在在这里很流行。一周前去莫斯科待了一天，在医院里碰到过斯大林，当时他也患了流感。莫斯科一切都正常，正好你很快就来莫斯科了，你自己就会知道的。斯大林谈起过巴库，看得出，是你给他通报了有关情况。他问起可以派谁去那里，我说，暂时我还没有人选，等咱们的谈话结束时，这一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①] 斯大林微微地笑笑，说是应该把谢尔戈调离外高加索那偏远的地方了。那地方，按他的说法，是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地方，打心底觉得那里什么东西也不出产。我同意他的这一说法，在外高加索工作是有点困难。

我们谈了很多，谈到了我们的经济，谈到了财政。他谈了很多有趣的事，但忧伤的事谈得更多。索索说，事情肯定正在好转，毫无疑问。他认为，事情确在好转，乱一阵当然是难免的，再说，这对于咱们，也不是头一回了。

① 指接替调往列宁格勒的基洛夫的新任阿塞拜疆党中央书记的任命。从信中可以看出，起初，基洛夫同意调任列宁格勒工作一段时间，尔后返回外高加索。

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很快就要在莫斯科见面了。

向所有的朋友问好。

你的　基洛夫

№04317

谢列布里亚科夫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斯大林的信

（1926 年 3 月 27 日）

1926 年 3 月 27 日

斯大林同志

就你表示希望的、以几个政治局委员的名义对党的情况作一说明，以及在党中央领导下建立更加便于友好工作的条件一事，我已同一些同志谈过话。[①] 这一建议自然受到了我与之谈过话的这一部分同志的赞许。但这些同志也提出了我向你提出过的问题。如果中央想清除对 1923 年参加过反对派的人的工作过多的不必要的干扰，那么，最好应解释一下，恰恰在最近几周为什么加强了对 1923 年反对派的攻势，特别是在莫斯科党组织内？况且大家都看得见，这场自上而下发自莫斯科州委的攻势来得没有任何理由，谁也不会相信，连中央书记处也事先不知情。您几次说过关于提高党的警觉性的话，要知道，现在的这种警觉性是上头建立起来的，上面散布了毫无根据的怀疑，使党内空气变坏了。所有的同志都会问：如果中央想轻松愉快地协调一致地工作，为什么刚好在这个时候要无端掀起这场攻势？如果您想开诚布公地谈一谈，那么我认为我必须在党

① 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后，斯大林开始施展手腕，防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托洛茨基结盟。他本人或经由谢列布里亚科夫频频向托洛茨基发出合作的暗示。托洛茨基权衡利弊，期望改变自己的处境。1926 年 4 月 2 日，他给谢列布里亚科夫写了一封信："我是这样理解的，个人谈话自然有其目的，目的就在于消除因暗地怀恨而引起的责难和诽谤，……但我认为，从组织方面讲，拒绝斯大林以政治局部分成员的名义提议的谈话是荒谬的"。

代会之前把自己很为党担忧的、足以令人忧心的真正原因原原本本地跟你说一说。我同托洛茨基、皮达可夫、拉狄克谈过，他们都表示准备把在布哈林处和您处同托洛茨基的谈话，以及在您处同我的谈话继续下去，以求取得实际的良好的结果。有关谈话的时间和地点最好同皮达可夫商量而定。

谢列布里亚科夫向您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04318

捷尔任斯基就地方乱收费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6 年 3 月 28 日）

1926 年 3 月 28 日

斯大林同志

在恢复经济秩序和为完成苏联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所面临的规模宏大的任务而积蓄必需资金的斗争中，我们遇到了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难以逾越的障碍，它使得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省委会、区委会、县委会和各级苏维埃政权，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把我们经济管理机关的资金看做是与该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无丝毫关系的，按照现行法律也无权清偿的各种开销的来源。当地政权机关要求“自愿”缴纳基层组织费、学校费、无家可归者费、报纸费、出版费、粮食储备费等等，没完没了。这些要求常常是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有时甚至是我们党中央的成员提出来的。而我们的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通常只能迁就他们，因为这样才能保证相互间的良好关系和补偿他们工作中的过失及其不顾中央和法律的独立。一条反对中央的战线正在形成，同时，当时政权机关却是这样表现自己，并且对于到处泛滥的无节制行为装做看不见，听之任之。为了切实整顿经济秩序，首先必须铲除这种随心所欲的或者得到当地政府赞许的非法的苛捐杂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您有个请求；请您专门就此问题，以中央的名义写一封指示信，签上您的名送《真理报》公开发表，并指示《真理报》编辑部在编发文章和各

地通讯中注意这一问题。①

捷尔任斯基

① 1926年4月25日，全俄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了对各级党组织、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工作在经济部门、合作社、商业、银行和其他部门的全体党员为恢复经济秩序而斗争的呼吁书。由报纸公开发表的这份呼吁书讲到，不许“各级党组织直接或间接地从经济管理部门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各级党组织总之都不应超越自己的预算，而应使自己成为厉行节约的模范，只有这样，它才能够领导这场整顿经济秩序的斗争。”

№04319

捷尔任斯基与李可夫关于皮达可夫工作安排的通话记录

（1926 年 4 月 5 日）

捷尔任斯基：我很尊重皮达可夫，但看到他和加米涅夫间的秘密活动，我准备离他远点，如果在工业计划委员会给我配个副手的话。您能否同意把斯米尔加给我？

李可夫：没有人替换皮达可夫吗？

捷尔任斯基：没有。皮达可夫需要在非经济部门安排工作。

李可夫：依我看，暂时什么也不要动。

和皮达可夫在经济方面的巨大分歧会越来越少的。

他们（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在“夺权”斗争中，想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拉到自己一边。

如果解除他现任的职务，他会走得更远，陷得更深。

№04320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公布列宁信件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

（1926年4月14日）

1926年4月14日

李可夫同志提议向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差不多9年前在我们的分歧最厉害的时候写的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信[①]。大家都知道，现在，把这封信分发上百份，甚至更多，可能只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损坏别人名誉”的目的。类似于这样利用材料的行为显然是违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真正意愿的。

大家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回顾十月（1917年）分歧时写下以下这段话的：

“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俄国许多卓越的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提起。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没有特别的需要，不好去重提这些已被彻底纠正的错误。他们总是在我所指的时期瞻前顾后，动摇不定，担心布尔什维克会过分孤立自己，担心布尔什维克会冒险起义，会比著名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更执拗。事情发展到以我党的中央委员会为一方与现已隐退的

① 指列宁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的信，在信中，列宁指责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并建议把他们开除出党，因为他们发表反对武装起义的讲话。1926年4月15日，政治局决定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委员，并要求阅后交回书记处，不得复印。

人之间在报刊上展开非常激烈的辩论。经过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之后，这些同志都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回到了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岗位上”。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段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利用他9年前写的这封信来败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名声是违背列宁意愿的行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时的错误已被本人承认，列宁已经作证，并且已被他们纠正。我党还根据列宁的提议于1917年11月让季诺维也夫担任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尔后又担任了共产国际的主席，他还一直是党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而加米涅夫，刚从芬兰监禁地回到国内就当上了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政治局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副手。

李可夫同志提出在政治局散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我们有权提醒大家记住下列事实：1917年4月的党代会上，李可夫同志比布尔什维克派的任何人都要远离列宁；从4月到10月，李可夫同志比谁都要远离列宁同志的立场；1917年10月李可夫同志跟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①]；1917年4月党代会上，李可夫同志没有选上中央委员，而且由于列宁的坚持，直到1920年的第九大也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现在呢，李可夫同志却主动倡议，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也不再提起的列宁的信，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用了起来。

一、列宁还有关于民族问题的几封信。在这些信中，列宁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同志的政策。这些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收回过，相反，直至生命的最后，他还为该问题担忧。这些信在十三大代表团中宣读过，但并没有下发，因此，包括现在的许多中

① 1917年11月初，李可夫递交了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并辞去了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以抗议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决议。

央委员都没有见过原文。

二、还有一份所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言》，在《遗言》中，列宁明确提议把斯大林同志从党的总书记的职位上撤下来，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心斯大林会滥用集中于总书记手中的巨大的权力。作为列宁遗言的这封信的要点如下：把斯大林同志从党的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大家，包括托洛茨基，都在一起工作，尽管大家都犯过错误，各人有各人的弱点。这样一封最重要的信也仅仅向十三大代表团宣读过，而没有散发。

这份遗言不是写于1917年，而是写于1923年，那时虽然有过短暂的冲突，但矛盾并不突出，在那种情况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党提出了自己最后的建议，建议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从来没有收回过这个建议，相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建议没有付诸实施只是由于他已经不可能出席十二大和十三大了。这一封遗嘱信也曾被李可夫同志建议引用，并在政治局的辩论中被提起。

我们认为，把列宁的信用于非他本意的目的总归是不对的，是违背列宁的政策的。但是，如果政治局的大多数赞成这么做，那就完全应该不仅散发弗拉基米尔1917年的这封信，而且应该散发我在前面已提到的带有当时明确指示的材料。①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① 斯大林集团同反对派之间就列宁信件材料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于1926年7月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

№04322

捷尔任斯基就皮达可夫工作情况致李可夫和莫洛托夫的信

（1926 年 6 月 1 日）

1926 年 6 月 1 日

李可夫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

皮达可夫同志因违反纪律被解除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而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副委员。[①] 他向我表示，接受这样的任命是很困难的，他决定，在我任内，在我最终从乌克兰回到莫斯科以后，他都不会到劳动国防委员会上任。我感到，重新研究对他的任命，任命他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或许更合适一些。理由是，无疑，皮达可夫作为我们为数不多的经济专家之一，在实践中表现出了自身的价值，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多少偏差。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比我对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更有价值。对于劳动国防委员会，无论他的什么样的偏差都不可怕，而对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他可能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如果他出任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在领导我们的工业时贯彻他自己的路线的话。所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皮达可夫同志无论是对党的指示，还是对劳动国防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实际执行起来都是忠诚不贰的。皮达可夫同志的托洛茨基倾向或独立的、小集团的倾向只表现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以外的政治活动中。关于这一点，我不仅是从皮达可

① 皮达可夫自 1923 年苏联劳动国防委员会成立时起即任该委员会委员。1926 年 5 月，他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委员捷尔任斯基的副手。

夫同志本人的言论中，而且是根据我自己（还有许多其他同志）的直接观察得来的。

还有，让我人负责整个国家的工业，解决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所有问题，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对于财政问题，我至今还搞不大明白。劳动国防委员会要没有皮达可夫，我应付不了，不是说他应该代替我，而是事情本身使然。

最后，我在乌克兰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作为一名组织者（而不是专家），特别应该经常到各地方、到工厂去走一走，了解群众，从组织上帮助他们。我的工作不是坐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因此，我请求：在保留我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同时，提请政治局考虑任命皮达可夫为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而不是副委员）。①

捷尔任斯基

① 捷尔任斯基的建议未被采纳。皮达可夫在被调任苏联银行副主席后，又于1928年11月被任命为国家银行主席沙因曼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副手。

№04323

奥尔忠尼启则就个人工作情况致基洛夫的信

（1926 年 6 月 22 日）

1926 年 6 月 22 日

我亲爱的米罗内奇

你这个狗崽子！至今未见你写来过片言只语，难道你非要等着我先给你写，你也不害臊？也许你现在拥有一切权利，当然喽，彼得和列宁的城市的长官大人无暇顾及这区区小事，就算这样，也不至于如此自大吧！好了，那就这样，我先给你写，你呢，但愿有空给我回信。生活怎么样？工作如何？什么时候想休假？

我这儿的情况没什么，正如我们的埃特卡说的那样：挺糟糕。阿马亚克去休假了，我自己待在第比利斯，中央全会[①] 后我要去索契，希望你也能去那儿，人们都说马采斯塔温泉浴是很养人的。索索在我这儿差不多待了 13 天，日子过得不算坏，只是到处都请他讲话，使得他很苦恼。有一次真正逼得他在铁道工厂讲了话，听众不下六七千人，大家欢迎的场面真是感人极了。在巴库强使他讲话也不成，他是有些怕讲话，其实是应该讲一讲。在这里，他还回忆起了伊万尼亚，外高加索党的监察委员会把伊万尼亚开除出党了。这位伊万尼亚给人的印象是个冷血动物。

我这儿的情况总之很一般，只是在巴库靠工资生活显得很紧张，不知你那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①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例行联席会议于 1926 年 7 月 14～23 日召开。

卡拉耶夫、巴吉洛夫和卡西莫夫都去了克里木，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列昂、马米亚、拉夫连季。在巴库，除了巴吉洛夫，大家都很守规矩，都在工作。1个半月前，我们召开了外高加索大会，会议开得很成功，阿塞拜疆人在会议上真是大出风头。看起来，我们真正使农村动起来了，毫无疑问，跟去年相比，是前进了。不错，拉林着实让我们出了一通丑，但是没办法。他写的有许多都没错，要不是那篇大吹大擂的文章[①]，本来是过得去的，而且，总的来说，他的家庭也无法抱怨说在苏维埃政权下受了压迫。是穆萨别科夫把文章寄给了《真理报》，不过，暂时还看不出有什么结果。

好吧，不多写了。这已经写了不少了。

向玛莉娅·利沃芙娜致以兄弟的热情问候！深深地吻你！

你的　谢尔戈

济娜问你和玛莉娅利·沃芙娜好！埃特卡问你们好！石膏绷带已经取下了，情况还不错，我们家这位爱饶舌的已经长大了。

向你深深地鞠躬。

你的　谢尔戈

① 1926年5月20日《真理报》曾刊登拉林题为《说一说库班的新娘》的文章，文章讲到了阿塞拜疆的库班市政府歧视山地犹太市民的事实。

№04324

捷尔任斯基就驻巴黎外贸机构情况致古比雪夫的信

（1926 年 6 月 23 日）

1926 年 6 月 23 日

古比雪夫同志

一位到过巴黎的完全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无党派人士今天同我交换了一下对我驻巴黎外贸机构的看法。他告诉我说，从法国人那儿听到的反映与他得到的印象是吻合的。我们付出的美元工资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工资水准，我们的编制人数之多与工作量不成比例。法国人说，这么庞大的编制和工资总额只能这样来解释：这个机构显然在忙于别的冒险性的事业，比如宣传等。外贸代表机构的工作人员不懂法语，交易不是面对面地同法国人去做，而是经由作为中间投机商的俄罗斯侨民才能完成。

运回的则是谁也不需要的价钱昂贵的产品。

我想，既然罗泽曼同志要对我驻外机构进行检查，那就不妨也派人查证一下这个看法是否属实。①

捷尔任斯基

① 1926 年 6 月 28 日，古比雪夫的秘书写信给捷尔任斯基："……我把在你 6 月 23 日写的有关反映我驻外代表机构（人员）臃肿，开支庞大的信上的批示通报给你：'罗泽曼同志：我同意捷尔任斯基同志的意见。无论如何要尽量地缩减我驻外机构，减少其工资支出'。1926 年 8 月 9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研究了苏驻法机构的编制问题，但据记录，会议没有明确的决定。

№04325

古比雪夫和李可夫关于捷尔任斯基工作安排的谈话记录

（不早于1926年7月3日）

古比雪夫：还有一种可能的组合。费利克斯现在正为“指挥系统”而不安。[①] 现阶段的指挥管理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服从发展工业和工业化的需要。可以让费利克斯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兼职。从来也没说过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是中央监委的当然成员。或许，费利克斯可以在这个角落与“疯人院”一起干点什么名堂。

他的主动精神很强，而且远强于我。他自荐充当“经济秩序”独裁者，正是这种主动精神的本质表现。

他的情况很严重（要知道他最近的话语中已暗示要自杀），由于考虑到我的自尊心，必然安排他到二线工作。于是我的自尊不会受什么伤害，否则的话，会对我作某种安排，而我不仅会服从任何决定，而且不管受到什么委屈，我会真正乐意去从事任何工作。

李可夫：如果任命他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而恢复双重政府的实验怎么办？

古比雪夫：这一点可以排除。双重政府体系应当永远埋葬。毫无疑问，无论是神经质的费利克斯班子，还是他的印象主义，都无

① 1926年7月3日，捷尔任斯基携信找过古比雪夫，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指挥管理系统的构想和建议”。在此前，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也给李可夫写过信，请求辞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

法胜任担任劳动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他有的是主动精神，但就是缺领导者的特征（工作方法、对各种复杂表象及其内在联系的感知、对各种办法措施所产生后果的准确判断等）。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费利克斯作为领导者，其主动精神这个优点可以盖过他的缺点，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就不可能了。

李可夫：我担心，他的神经质，又不能自我控制，如不采取某种重大措施，可能会招致灾难。

№04326

托姆斯基就劳动报酬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的信

（1926年7月10日）

1926年7月10日

尊敬的同志们

鉴于经济领域一系列的迹象（首先是好收成、适当的出口等等）表明，我们的经济状况好转的可能性很大，我感到提出有关提高劳动报酬的问题是时候了，因而我提请把它交最近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自然，中央有关这个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有专家教授参加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委机关的预先审查。哪些生产部门？期限是什么？生产规模多大等等所有这类问题虽然事先已经有个数了，但还是要仔细考虑和研究。无疑，这个问题有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因而最好把贯彻这一决定安排在重订集体合同的时候。[①] 同时，我认为，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在贯彻这一决定时常见的歪曲“经济节约制度”的现象。[②]

在个人的谈话中，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同志完全赞同我对这个问

①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1926年9月20日，政治局同意只给从事生产的工人增加工资的建议。该建议附有一份拟增工资的工业部门清单。政治局的决定得到了休假中斯大林的赞成同。在1926年9月23日，他给莫洛托夫写过这样的话：“你们办了工资的事，看来办得不坏。重要的是让基层有明显的改善。”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长工资于10月30日扩大到石油工业的某些工种中。

② 1926年8月16日，政治局批准了节约制度的通令草案。8月17日，经李可夫、斯大林、古比雪夫签名的致全体党和苏维埃机关的《有关节约运动的成绩和问题》通告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通告中讲到由于节约运动工人的物质条件变差了。

题的看法。我想他们会支持我的建议的。

托姆斯基[①]

① 正文有布哈林、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边注："我同意——布哈林。赞成。莫洛托夫。将该问题提请全会结束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斯大林，莫洛托夫，7月13日"。

№04327

斯大林答复皮达可夫的信

（1926年7月13日）

1926年7月13日

皮达可夫同志

7月13日来函已阅。同样的建议已于7月10日呈中央书记处交托姆斯基、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审阅签字。他们已提请将此问题递交最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并在重订集体合同之前解决它。考虑到该问题已经完全成熟，书记处决定提交全会后就立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议。你提出把这个问题提交这次（7月）书记处会议的意见无法采纳，原因是，正如你自己所写的：你还没有把提交的问题准备好；有关工业的控制数字你也没有准备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意见也不清楚（据查，捷尔任斯基对你的信毫不知情）；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一点，全会的议程已被政治局通过；再说，你既然参加了星期一（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为什么没有在会上提出增加全会的议程？我记得，根据政治局的议事规程，有问题应当在开会前3天列入政治局的议程。我认为这个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列入全会的议事日程。

中央书记　斯大林

№04328

捷尔任斯基就公布对经济机关的调查结果致古比雪夫的信

（1926 年 7 月 13 日）

1926 年 7 月 13 日

古比雪夫同志

亲爱的 B.B.

我收到了丘茨卡耶夫同志就 14 个经济核算制机关的调查结果致政治局的呼吁书副本。我在想，我们的工作方法使得我们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而取得的成效甚微，其主要原因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没有处理好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在一个报告中罗列了一大堆与完全不同的机构有关的、包含各个完全不同时期的、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得来的致命事实，都没有及时通报给有关部门的检查机关，就不可能产生除恶戒恶的好效果。公布这些搜罗并集中在一起的材料会令人无比沮丧，因为，与此同时，并没有说这些曾经有过的恶行事实很快得到了纠正和铲除，责任者得到了如何惩处。我是这样理解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方面公布这些材料的，因为我反对全盘隐匿的做法，但是公布丑恶，以政权机关的名义予以公布的同时，却不说明这些丑恶已经被铲除，这只能是显示自己的无能。须知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这是政权机关。我知道彻底公布和揭露的是工人、农民和经济通讯员，而不是政权机关，这是一回事；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如果发现了何地何人的丑恶行为，立即通报给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要求铲除这些丑恶现象，并且也把除恶的过程公

布于众，这样做收到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又是另一回事。两者相较，当然最好是能做到尽快除恶。我们做的正好相反：发现丑恶总要保守秘密直至整个侦查工作结束，直至传遍所有各级官吏，等到事情水落石出，至少过去半年，甚至已经自行解决。

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设有监察部，直属我领导。如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赞成我的建议，我可以委托这个部的部长萨姆索诺夫同志专门负责清除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所发现的不足，因为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不足总归得由我负责。

捷尔任斯基

№04329

莫洛托夫就工作调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 年 9 月 9 日）

亲爱的谢尔戈

政治局有关你去北高加索的第一份正式任命已经发出，显然是错了[①]，责任在我。真不愿意刺痛你，但结果却不好。我希望你会同意不要对这完全是偶然的不恰当行为有别的想法，它只不过是我们众多的纷繁事务中开始时并没在意的不自觉行为。现在你已经有了第二份任命，就是对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抗议的回答（他们可能会找签发第一份任命的同一个人）。[②] 我想，边区委员会会自行消除第一份任命后可能出现的某种不良后果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件事不会使你产生任何阴影。从我个人方面讲，我希望你不会长期待在北高加索。在不远的将来能调往莫斯科。

① 1926 年 8 月 30 日，政治局采纳联共（布）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建议，解除奥尔忠尼启则外高加索边区的职务，任命其接替调任莫斯科的米高扬，担任北高加索边区第一书记。9 月 4 日，正在南方休假的斯大林为此写信给莫洛托夫："近日，谢尔戈到过我这里。他对中央召回他给以新任命狂怒不已。这一任命在他看来无异于惩罚，等于中央不明不白地让他碰了钉子。他说话的意思是，谢尔戈调任罗斯托夫'接替米高扬'，他认为这是暗示：米高扬要高于谢尔戈，谢尔戈只适合担任米高扬的副职，等等"。斯大林建议重新对他任命，并强调指出：所有对奥尔忠尼启则的任命都要征得他本人的同意。"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而且新任命要下发给所有收到过前一任命的人。你可能会说，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或许是这样，但也应该指出，这桩小事如果得不到纠正，也严重影响我们的事业"。

② 1926 年 9 月 1 日，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委员联合致信斯大林，要求重新研究中央调离奥尔忠尼启则的命令。9 月 9 日，政治局拒绝这一请求，坚持对奥尔忠尼启则的新任命，而这一次是利用了斯大林建议的结果。

我们的事情进行得不坏，也有困难（在远东和张的问题[①]；在经济上难以从进出口事务中解脱出来；失业在增加；党内，有人在进行紧张的进攻准备，看来就会在不久的中央全会上爆发），需要在经济建设和党的工作中团结合作，奋力向前。不多写了。最近的事，斯大林都已知道。

祝你养好身体！

9月9日

问济娜伊达·加芙里洛芙娜和朋友们好！

握手

莫洛托夫

① 指苏联与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因中东铁路引起的冲突。

№04330

帕尔霍缅科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 年 12 月 3 日）

1926 年 12 月 3 日

谢尔戈同志

有感于公共事业的需要，想与您交流一下自您来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后所发生的情况及感想，想必您不会见怪吧。

自从在同仁会议上发表讲话后（我曾经和许多人讲过），大家认为，有了您，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就有了坚强可信的领导，因为领导的软弱无能，曾经带给我们的是对所从事工作正确性和合理性的怀疑。

不是我要如何，只是想提醒您，坚强的领导也需要对他人以同志式的关系作补充，而不是抹杀他们的个性。

您该记得视察员在会上的抱怨：说他们已失去了个性，他们不了解工作的结果等。说这些的，彼得斯同志决不是惟一的一位。在今年 12 月 2 日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会上，您不应该那么激动（急躁对心脏不好）并打断彼得斯和米柳亭的话。可以相信，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想起了伊里奇对你处事“好出偏差”的评语。

有人得到印象是：您在工作中对同志使用恐怖手段的解释是列别德和罗曼诺夫斯基给俄联邦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派麻烦的差事，而且当面把这差事交给了丘茨卡耶夫和彼得斯，但他们却一言不发，而且没讲真话。那么，您大声呵斥他们难道不可怕吗？

如果您能克制对您评价中的负面部分，其他情况都表明，您将是一位好领导。

我给您写这封信，您不要有别的想法，我只是希望对我们的事业有所助益。

向您致以同志的敬意。

帕尔霍缅科

№04331

拉科巴就阿布哈兹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6 年 12 月 27 日）

1926 年 12 月 27 日

亲爱的谢尔戈

动手写这封信，首先我就考虑：是应该称呼“您”呢，还是称呼“你”呢？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现有关系以及我“自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难谢尔戈，我就应该称呼“你”，这是讲的大实话。但是只要是正式场合，不管是哪里，我都不会忘记尊称谢尔戈“您”。这就算我的开场白，我知道，你听了会高兴的，说不定还会加上一句；“这傻瓜”。不过，我仍然认为说这些是必要的。

现在转入正题。

共收到你两封信，第一封是迟到很久才收到的，信到的时候，我已不在苏呼米，而是在第比利斯参加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中央全会。有关莫洛托夫同志到来的消息是发密电通知我的，我刚刚才安排好他的事。这次他来我们这儿不大走运（真让我们伤心）。当时，在他下榻的以你的名字命名的休养所由于水电站的水不足，还点着蜡烛，这么一来，事情就不大好了，但是，这点小毛病是可很快纠正的，只是换个大灯泡就行了。

休养员中的不知道什么人（真该死）居然跟莫洛托夫说，房里还要点灯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就这样去加格拉了。

在圣山也出了桩怪事。巴甘吉雅同志得知莫洛托夫在圣山住一住的消息后，竟然害怕起来，张皇不知所措。显然，巴甘吉雅就没做迎接莫洛托夫的准备，这么一来，仿佛圣山休养所也没准备接待，仿佛专为莫洛托夫才需要这么紧张张罗似的，莫洛托夫就去了加格拉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厦。我碰到的巴甘吉雅和苏呼米的同志们都一副惊慌失措、抑郁不欢的样子。我们之间为此少不了吵一吵，采取了相关的措施赶紧补救，赶到加格拉去见莫洛托夫，请他返回苏呼米或圣山，但他说他想留在加格拉，理由是他的假期只剩7～10天了，这么短的时间再来回折腾就不合适了。我除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外已别无选择，不过我已暗怀“报复”之心，想着哪怕让莫洛托夫同志来打一、两天的猎，或者去苏呼米的途中把桥梁“弄坏”也成。如果不是召开阿布哈兹党代会或其他未可预知的情况耽误，我就要实施我的“报复”计划，因为这多少可以弥补我们的过错，并且向莫洛托夫同志证明，他的过分谦虚并不总是合适的。第二封关于阿利卢耶夫的信我是按时收到的。我把他安置在以你名字命名的休养所。接到这些信，我非常非常的高兴，原因之一是你还有时间想起来，并且动手给我写信；原因之二是看了你的信，我的感觉太好了，对我的工作是很大的鼓舞；还有第三，你的信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感，促使我毫不犹豫地给你写信。

下面讲讲我们阿布哈兹的情况：

简单地说，整个阿布哈兹地区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情况，总的来说，应该承认是令人满意的。1）现在我们已经开完了县级的党代会。今天是12月27日，阿布哈兹党代会正在召开。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次党代会上，除了我们的成就外（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还可以满意地断定，我们的组织内部已经没有那么多纠纷和民族纠纷。按照你的指示，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组织内建立起正常工作

的条件。（不自觉的）错误或许还是有的，但是，如果说以前我们总是指望谢尔戈会调整的，谢尔戈会纠正的，谢尔戈会为我们大家负责的，等等，自觉不自觉地犯下不少错误，那末，现在我们都在努力尽量少犯错误。2）格鲁吉亚党中央非常注意对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良好的。我可以完全实事求是地说，马米亚、沙尔瓦、拉夫连季、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米沙·卡希阿尼、列万·戈戈别里泽我们都以同志相待，我们感觉很温暖。我们希望以后能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关于烟草问题

根据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委员会决定，1925～1926 年收成的烟叶价格，应当承认，是无法叫人接受的，无论对于工业，还是对于烟草种植者，都是具有危险性的，其后果到明年就会体现出来。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执行的是去年的“已被证明的”按级定价。按去年的等级给予每普特烤烟平均 26 卢布的价格。而今年因为自然的原因（多雨、少晴）烟叶等级明显低于去年，按照苏联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说法（按去年级别定价），烟草种植者获得的不是去年的平均每普特 26 卢布，而只是平均每普特 23 卢布 25 戈比，农民加工烟草每普特就要花费 28 卢布（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人民委员部材料）。

在提请注意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利益的同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把价格压到了每普特 26 卢布，但也是在按照今年分级的情况下才行。中央执行的价格，说穿了就是实行的去年 26 卢布的平均价，但是加上今年的分级法，也就是说是个比去年高出 11.91% 的分级价格。按照这个价格，我们已经和格鲁吉亚烟草托拉斯签订了 11000 普特的合同；和外高加索国家进出口贸易签订了 15000 普特的合同，价格是按今年的分级法每普特 25 卢布。作为折衷，我们

可以采用我们与外高加索国家进出口贸易签合同的价格。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1. 每俄亩的平均收成同去年一样；

2. 种植者加工烟草的成本费为每普特28卢布；

3. 由于气象条件的因素，今年的等级普遍低于去年；

4. 与去年相比，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提高了库班和迈科普地区的烟草价格，但这样一来就不可能不使阿布哈兹与库班之间的价格关系出现问题；

5. 苏联内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纠正自己去年于库班犯的错误（这件事干得很好）的同时，有可能今年在阿布哈兹犯错误，而这个错误或许等明年才能纠正。这样的事情无论对烟草种植者还是对于工业部门，代价可能都是很高的。

去年我们在烟草上究竟赚了多少钱？

按照你的指示，我们执行了有利于烟农联合会的比去年价格每普特高出一卢布的价格（合作社积累），这就付出了50多万卢布。这一措施是完全需要的，对于烟草种植者，可适当减轻负担，因为按照去年的等级，实际上要略高于劳动人民委员部执行的价格，而且最终使烟农的每普特收益要高于每普特平均26卢布的执行价格。有关烟草业的总利润，我会往莫斯科写信向你通报的，因为眼下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大概不会少于100万卢布。

关于特克瓦尔切利煤炭

根据去年夏天你在圣山讲的意见，我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得特克瓦尔切利的事情得到了落实，也就是说，投入运行的包括所有查明的煤场（10平方俄里）。

不用罗列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种种措施，也无须列举格鲁吉亚中央和外高加索中央的有关决定，我认为，把尤什金从第比利斯寄

来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信转寄给你是必要的，它可以使你形成我们中央对这件事的性质和进展速度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关于黑海铁路

谈了特克瓦尔切利的事，不能不谈一谈黑海铁路的现状。如今这条路的情况很不好。在1926～1927年间，投入的资金总共只有200万卢布，而不是500万卢布。由此，祖格迪迪－奥恰姆奇拉－科达尔地段内的大桥工程停顿下来了。要在6个月内建成祖格迪迪至奥恰姆奇拉铁路，有650万卢布就够了，而这对于特克瓦尔切利是很重要的。没有这个条件，在1928年底以前建成奥恰姆奇拉至特克瓦尔切利各露天煤矿矿场的铁路是不可能的。黑海铁路（据我们所知）由于材料紧张、李可夫同志和鲁祖塔克同志持反对意见以及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把大批预算中的材料转往谢米列钦斯克－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决定而处于其工程大量压缩的危机之中。黑海铁路的命运似乎在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1月份的会议上应该得到解决。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我们自然就被暂时排除在北方工程之外。那边皮连科沃至布济比河之间的部分：工程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还是坚持要集中材料到祖格迪迪－奥恰姆奇利－苏呼米铁路建设上。

以上就是我认为需要向你通报的问题。该和你说再见了。我这里还有些问题没有讲，不过这些问题，用你的话来说是“可以缓一缓的”。

最后谈一谈我自己的事。

我们一家过得都挺好，身体也好。向萨里娅、劳法·济娜和埃特卡致以最热烈的问候。迈巴“从各方面”看都是“最可爱的”，我跟他讲起你还记起他时，他很高兴。格奥尔吉娅·斯图鲁河和阿

布哈兹的所有同志问你好！

受伤的狗得到教训后已经康复了，它再也不去追逐野兽了。

阿马亚克去圣山作客了，卡特韦利什维利同志也在这等着去休养。看得出来，我的精神很好：写啊，写啊，我自己也很满意。

紧紧地吻你！

永远忠于你的，你的拉科巴

我想1月的10～12日，会在莫斯科的。

№04332

拉舍维奇就中东路干部工资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 年 1 月 4 日）

亲爱的谢尔戈

应该公正地说，我所写的有关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而不是在较小的程度上，是与中东铁路的管理有关的。

我并不乐意就这个问题写这封信，可是你说怎么办？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曾经在去年通过一个决定。依据该决定给我们定的工资是每月 320 卢布，还有当代表的开销每月 180 卢布，而且这一待遇对于中东铁路的所有管理人员、管委会主席以及监察委员都是一样的[①]。我来这里不久，但可以绝对地说，这是无法实行的。我理解并且完全支持中央监察委员会使我驻外公民的生活走上正轨的努力，但可以断定，要想有个急剧改变是不可能的。当把上述决定通知我时，我就说过，在这样情况下就谈不上招待会、宴会等等了。所有同志，绝对地，都表示了反对意见，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应该逐步地减少豪华招待会和宴会的数量，不要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如果说他们的招待会都少不了香槟酒，你说该怎么办？

① 中东铁路负责人的工资定额问题已由联共（布）中央监委书记处于 1926 年 6 月 26 日和 8 月 25 日研究过，规定是：苏联政府派驻中东铁路代表机关负责人的工资以 10 卢布纸币计算不得高于 320 卢布；铁路管理局成员、管理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预支的代表开销费可以控制在平均每月 500 卢布以内。

我是早上8点到这儿的，在车站的正式见面就上了香槟酒，还有，我拜会所有中方官员时都少不了香槟，他们拜访我时也总有香槟酒。难道有人真相信，我们就是喜好这口汤水？大家知道，我宁可喝伏特加，又便宜，又养人。我喝得很少，因为我有病。如果所有管理人员大家都感到困难的话，我作为一名主席同志，靠这点工资就没法生活了。把我赶到哈尔滨这么个地方，结果怎么样呢？收入很少，脱离了社会生活，把我推到了这比莫斯科差得多的环境中，更不用说过什么好日子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会要求我降低生活水平。在莫斯科，我和我的妻子每月共能收入400～450卢布，现在，我的月薪是320卢布，而她都没法工作了。要知道，对于外界来说，我是有2万卢布的薪水和差不多1.5万卢布代表补贴的“高官”，我的妻子干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给我的劳动报酬比起在莫斯科时少了。

我该怎么过呢？难道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得穿这些衣服：常礼服、燕尾服、晚礼服、浆过的衬衫、漆面皮鞋和其他破烂货？这些东西不能不要，没有它们可能会碰到丢脸的事。在莫斯科，我喜欢穿军便服和军大衣。那时，我住在克里姆林宫，享受免费医疗，这里呢，一切都要花钱。我的住所有10个房间，3个中国用人，我要这干什么？为了这，为了我所受的苦难，为了我落到这个可怕的境地，应该奖给我一枚勋章才是。

一句话，谢尔戈，靠380卢布的月薪我无法生活，无论如何，180卢布的代表津贴是不够的。

我还有什么办法呢？预支了不还，这不是道德的沦丧吗，那将更坏。代表津贴，我应找鲁祖塔克报销，可这同样是不可能的事。或者我可以很快找个合适的时机去报销，比如：香槟酒50卢布、白兰地20卢布、巧克力、水果、募捐开销等等，谁要这个？莫斯科可以好好查一查，我有多少招待会。我的请求只是把我从这些鸡

毛蒜皮中解脱出来。

总的意见是，这里所有各级党组织低到不能再低的标准应该是：主席同志月薪500卢布，代表津贴250卢布，其他成员和监察委员的月薪也一样，代表津贴可稍低点。12月份，我已做了预支，今后可能也得这么做。请理解所处的环境。我请求批准我的上述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请求把我的信递交给中央监委主席团。我不尚奢华，我并不娇生惯养，也还谈不上挥霍无度和腐败。以前我爱喝酒，现在我也爱喝，但大家都知道，我不爱下酒馆，我只是在自己的家里和孩子们喝。如果说不得不与各色的坏蛋打交道，那是一种义举；如果说你看见我不得不与什么人握手、谈话，甚至共进午餐，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水平，使我们不得不搞点鬼？我不明白。

请一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请相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请把结果告诉我。我还得靠预支补充我们的的预算。

紧握你的手！自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和中国人谈话整个是在遭罪，我很难习惯。

祝你万事如意！能在俄罗斯工作，真让人羡慕。

向所有的同志们问好！

你的　米哈伊尔（拉舍维奇）

请尽快回信，因为我们全体都牵挂着。

№04333

叶努基泽就请求安排会见致加里宁的信

（1927年5月17日）

1927年5月17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加里宁同志

亲爱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由于我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其他成员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出现的误解，为了正确地向您反映书记处解决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问题，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内部出现的问题情况，请您每周抽出两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的时间，由我亲自向您报告整个工作进展情况。

时间最好安排在星期二和星期五的12点之前，由您决定。

我恳请您做出安排，因为这样于事有利，而且我向您的定期报告可以防止在讨论程序和解决问题方面，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或者经由我们的党组织时可能产生的误解。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叶努基泽

№04334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拉狄克的宗派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 年 5 月）

谢尔戈

我把拉狄克叫到我这里来是为了与瑟尔佐夫同志谈话和信使的事。拉狄克起初说的是哈拉托夫告诉他的这些传言。我建议他把这个写下来。信使问了哈拉托夫。拉狄克开始时想封口，说他认为这只是私人的聊天。当我坚持要书面说明材料时，他找了我，告诉我说，这些都是瑟尔佐夫干的，他可以作证。2 月份，中央全会前夕[①]，瑟尔佐夫把负责人召到西伯利亚，告诉他们说，在中央全会上将支持李可夫作总书记的候选人等等。拉狄克是这样考虑的。当然，他可以把这些都写下来，但他想，这对党并不利，因为有可能产生新的争吵。当然，如果中央监委坚持，他可以写。我答应他把这事推迟一下，等你的到来。你的意见如何？这里面有没有反对派的趁火打劫？他们难道不会因为瑟尔佐夫投向了你而向他报复吗？拉狄克表示相信，他和瑟尔佐夫（特别是跟他的妻子）关系很好，他们一定在饶舌，乱说一气。

雅罗斯拉夫斯基

① 联共（布）中央全会开会时间为 1927 年 2 月 7～12 日。

№04335

瑟尔佐夫就党内对他个人的传言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年6月22日）

于新西伯利亚

1927年6月22日

亲爱的谢尔戈

我给你写信是想请友好的苏维埃帮帮忙。不久前，我们西伯利亚党组的一名成员从莫斯科回来，他叫布里克（因持反对意见被赶出共产国际机构），开始到处散布他和斯大林就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对待农民的政策进行的交谈。据布里克的话说，我的作风，我在边区代表会议上就西伯利亚农村的分化问题、中农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的发言已经作为非党员所应有的、有害的事例，在这次交谈中向斯大林作了介绍。

我无法猜测布里克向斯大林介绍的东西有多少是符合实际的。我只知道他在利用这些闲聊使西伯利亚代表会议[①]的决议威信扫地，在进行徒劳无益的反对活动。

据我们看来，他的言论除了重复反对派的某些立场之外，没有任何新东西（反中农言论、夸大富农的增长等）。

近期内，把斯大林的名字与我本人的名字联在一起，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① 联共（布）西伯利亚边区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3月召开。

第一次是莫斯科反对派的闲聊，我已经告诉了你和莫洛托夫，说的是由于我属于李可夫派，斯大林很快就要把我调离西伯利亚。

拉狄克把这告诉了我，他说有关我属于李可夫派的说法出自“柯巴的书记处”。

或许你知道，我已将此写信给中央监委你的名下（信没有被你收到，而是落到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手里，因为你出乎我和你本人的意料，突然去了克里木）[①]，并且告诉了雅罗斯拉夫斯基。

对比这两个方面，就可看出布里克所说的具有一定的特征，显而易见的是，用反对派的阴谋，用唆使我反对中央的廉价企图并不能说明一切。显然，中央在对待我的问题上，态度是多么含糊不清。

你了解我，我不想成为扰乱中央意图的什么角色。我在西伯利亚工作得很开心，但是，或许西伯利亚需要一个比我更能得到中央信赖的人。

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简单，用不着组织上麻烦，如果要纠正我的错误，用不着拐弯抹角。

我给莫洛托夫写了信（是对他同志式来信的回复。莫洛托夫在来信中指出了我在其他会议上，而不是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中的两处措词上的错误，他指出的很对。而对于我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大会的决议，莫洛托夫认为完全正确），我也想给斯大林去信，但怕扰了他的休假[②]，未拿定主意。但真正基于对我的信任，能够给我以忠告的，我感到只有你。

---

① 1927 年 5 月 3 日，政治局决定：“鉴于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健康状态令人担忧，准其休假两周，务请赶紧离开莫斯科”。

② 瑟尔佐夫在 1930 年 11 月 4 日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说，他最终还是给斯大林写了信。在信中，他提到了对自己的政治信任问题。斯大林给他回了电话，说中央是信任瑟尔佐夫的。

如果你知道事情的原委，或者事情到了领导层认为这里需要有另外更好的人替代我的时候，请你给我写个三言两语，比如："去休假吧"这样的条子，我会马上就走开，不会向你，也不会向中央讨个什么说法，而且不会做任何使情况复杂化的事。

我只希望你到克里木稍稍休息一下恢复健康。向济娜问好。常常想起埃特卡。阿萨苏呼米之行很有好处，沉住气就不坏。用不着说身体健康之类的话，应该说坚强起来。

你的　瑟尔佐夫

№04336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党纪事件处理小组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 年 8 月 11 日）

1927 年 8 月 11 日

谢尔戈同志

我请你有空时好好思考一下这段话：

难道允许让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的这种状态再继续下去吗？[①]

中央监委的 7 个人解决事情。靠传讯活生生的人挑战，靠认真研究材料，听取方方面面的证人和其他等等人的意见。

然后，会议记录经印刷复制送中央监委书记处会议（那儿现如今除了我还有中监委的两名成员，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这种会议上，通常来不及研究材料，来不及听取大家的意见，有时候 5 分钟内，甚至更短时间内就得通过记录。

这期间还有许多往来的公函，只有 5 天的时间（自党纪事件处理小组会议至书记处会议）。

如果撤销或改变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的决定，那就能保证书记处重新做出的决定更正确？没有任何这样的保证。

我研究了一下：大约半年之内由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和书记处解决的事，只有大约 10% 在经由书记处审议后重新做出决定的。你

① 根据 1925 年 12 月联共（布）第 14 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宪章，在两次中央监委全体会议之间组成中央监委主席团及其执行机构——书记处。为审查违反党纪、党章和党纲的事件，建立了中央监委党纪事件处理小组。

就相信由书记处重新处理的这1%就比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处理得公正？我是不相信。

如果认为党纪事件处理小组靠不住，可以补充更加可靠的人，我看也只能如此。

请你想一想。按我看，会更简单，更可靠，对所作决定会更具责任感。

如果我作为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的主席显得不够坚强，那就可以找个“坚强一点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

№04337

斯大林就反对派的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 年 9 月 23 日）

谢尔戈，你好！

代问济娜好！

自打算给你写信已过了整整一个礼拜，可是还是没写成，原因是工作太忙，一直没有找到空余时间（李可夫和莫洛托夫去了克里木，布哈林刚回来不久又去了克里木，日内可以返回，鲁祖塔克病了，这样一来，常常是其他人的工作都堆到了我的身上），尽管如此，你今天的来信（今天收到的）还是促使我从呆坐中解脱了出来，并由此下决心放下一切给你写回信。

1）有关合理化问题，自始至终你是对的。我们一定得从这里派遣专家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去美国和德国。在这件事上的吝惜太不应该，而且是犯罪。如果让阿廖沙也参与到这件事中，哪怕是在参考文献方面提供帮助，你也要好好地办。文献帮助对于我们是首先必须的，否则你就无法使人们振作起来。首先应该通过报刊阐明合理化的实质、特点、方式和益处，以便取得工作人员，然后是群众的支持，做不到这一点，其他都无从谈起。

2）反对派不但没有平息下来，相反地还加紧了派别活动。就在两个星期之前，他们搞出了一个小册子（《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行动纲领》，你看他们起的书名），要求出版发行（这是 9 月 3 日的事），并立即展开公开辩论，其实，这就是新政党的新纲领。我们拒绝了，并禁止其扩散，并且拒绝在最近的全体会议上加以研

究。这份《纲领》和政治局以及中央监委主席团的答复已分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委委员。但反对派还是进行了秘密散发。9月12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获了军事阴谋家，并且撞上了一个叫谢尔巴科夫的人（无党派人士、工厂主的儿子），在他那里发现了反对派的地下印刷厂（与姆拉奇科夫斯基及其他反对派有直接关系）。政治保卫局还搜查了小小反对派（谁也不知道或很少有人知道的）中的某些人，并逮捕了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两天后，收到了一封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沙罗夫写的蛮横无理的信。信中，他们承认自己是地下印刷厂的组织者，并“要求释放被捕者”（被捕者都是无党派人士），其实，原来是类似于“米亚斯尼科夫组”或“工人真理”的组织。我们以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地下印刷厂的通知》，并决定将与印刷厂有关的“反对派中所有小人物”开除出党，暂时把有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两位的问题搁置起来[①] ……我们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报纸上对这件事暂时还没有什么反应。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3）什么时候你来这儿？你能摆脱盲肠炎的折磨就好了。

4）给你寄出一小点有关党内斗争的材料。

赶快康复吧！

向阿廖沙问好！

你的　柯巴

① 1927年10月13日，政治局批准了中央监委主席团关于从联共（布）开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沙罗夫的决定。

№04338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党内反对派的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 年 10 月 4 日）

1927 年 10 月 4 日

亲爱的谢尔戈！

我整个都想了想，只是你很快就要来了，就没动手写，现在呢，听说盲肠炎把你给缠住了，而且还要耽搁好一阵子，真是见它的鬼了。这些事你是知道的，主要的事实如下：

1）散发的新纲领，实际上是一个新政党的纲领，它的名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纲领。不用说，我和你已经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了，虽然列夫·达维多维奇直到现在似乎拿你和我不大轻意作投机买卖（他在我们关于地下印刷厂的会议上的发言起到了辩护人的作用）。

2）地下印刷厂（不止一个）

他们不掩盖存在地下印刷厂的事实。他们表示：以前搞过，以后还要搞（姆拉奇科夫斯基语）；现在你们把我们开除了“很快我们会把你们开除出去”（姆拉奇科夫斯基语）；“这算什么，你们大家不是还要审判我们吗”（托洛茨基语）。党很快会让你们长见识的（姆拉奇科夫斯基语）。除了已经公开的，还有没公开的。

3）打算在这个新的纲领上签字的主要是工人——预计有 83 人

作这可悲的尝试[①]。计划是有多少签字人（据说在莫斯科就将召集不下于5000人签字），就发放多少份反对派的文件，“那时就不怕被开除了”。

4）未经官方许可的辩论已经开始。秘密的“干部”培训正在疯狂进行。

同时，部分反对派也在觉醒和脱离他们。比如布列斯拉夫就非常犹豫不决。如果你直接给他写信，劝他不要摇摆不定，我相信是会起作用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他谈了很多，他在许多问题上也不同意反对派的观点。

对我的诽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居然还刊登了卑鄙下流的诗歌。托洛茨基说，我比佩列韦尔泽夫还坏（与地下印刷厂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事情有关）。

现在已经是真相大白了，他们已决定脱党。他们以为，我们不敢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我们害怕了，否则就是脑子有问题。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的成就。在最红火的时候，通过对党和非党人士疯狂地施加压力，他们最多能在全党范围内搜罗起1万～1.5万人，也不过占1%。

萨普龙诺夫分子送来了警卫人员的名单，约20个人，就这么一帮人。如果托洛茨基分子投降了，萨普罗诺夫分子就会壮大。

我们对阴谋分子采取了坚决清除的方针，当然，这就产生了相互的仇恨。

至于说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委的工作计划，我们之间估计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我想的只是不要缩小属于中央监委研究的党的问题的范围，也就是不要缩小中央监委。我感到在目前，那样做在政治

① 《83人声明》是指参加反对派的83人于1927年5月写给联共（布）中央的一封信。

上是有害的。

好了，已经写得够多了。

等着你的回信，我们家的“强盗”向你问好，并向济娜问好！玛丽安娜和克拉芙季娅在此一并问好。

我们期望银色森林的房间内能添置取暖设备，这样的话，冬季的周末和周日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还可以到林里走一走。我想会有的，为了你和济娜也该添置。

把身体养得好好的，把精神养得足足的。还有激烈的斗争等着我们。我毫不怀疑：我们的党一定会胜利。

叶梅利扬

№04339

施基里亚托夫就反对派公开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年10月10日）

1927年10月10日

亲爱的谢尔戈，你好！

你的来信已收到，就在这之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又收到通知说你做了手术。我听了不禁一颤，开始为这种见鬼的疾病、为你的生活感到害怕。从来连想都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竟然都发生了，怎么生命就像千钧一发呢？你还有希望，但很遥远，真是见鬼的事，不过或许还有救。我写了这封信，不知你能不能看，我希望你能看看。

亲爱的谢尔戈，这个时候你不在是多不好。我已经干了几天，休息的时候都是和克里姆在一起，工作还是满意的。都溜达到克里木去了，我是星期三回来的，回来后一头扎进了工作中，到现在工作还有一大堆，这担子真不轻。我知道，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也让你难受。我们在本地感到沉重和难过，你在远处更不好受。要是你在这儿就好了。

亲爱的谢尔戈，他们在干什么呀！如果说曾经有过他们隐瞒从事帮派活动的时候，那么现在这已经是不存在了。现在，他们正在公开地把所有只要是反对中央的人都召集到他们的旗下。他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来破坏党的威信，松懈党的纪律。你大概也收到了他们最近的一些资料。他们已公开主张建立新党。亲爱的谢尔戈，除

了把他们清除出党，没有其他出路可寻。这是迫不得已的事，但看起来，他们是自找的。你一走，他们就变多了，变得对党越来越有害了。我不能把所有的都写下来，这只能是跟你聊一聊。我还是想，你应该在这儿才好。不过，看起来，你很长时间内不会回这儿来。来参加十一大吧，我们等着听你的报告。我们的工作没什么，只是不能打扰你。我们新的计划已经编制完成，是按照你的指示做的，今天我们就可以通过。

还有先前去中央工作的一些新人也参加了对计划的讨论。工作进展得很慢，中央已经通过的名单中给的很少，有一些根本不给，我担心中央监委系统仍然是我行我素。很快我们要有意识地在城里走走，我们只能和中央的行程安排相一致，而且只能把大家送到中央监委委员所在地参加代表会议。好吧，暂时还行。

伊利芙娜·叶梅利扬娜，还有几个孩子都问你们大家好！

早日康复！！！！

你的　马特维

№04342

费金就反对派召集开会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年10月23日）

亲爱的谢尔戈

看了你给雷坚斯的来信，感到非常高兴。之所以很高兴，是因为你已经能够写信了，而且你很快就会回来了。我们都非常想念你，肖穆什金甚至做梦都梦见了你。他是昨天早上到的。他说他做了个梦，仿佛你对他大声地喊叫。为此，他的脸色一整天都是兴高采烈的。中央让我放下工作去参加一个月的辩论。[①] 下到省里去：去罗斯托夫或去基层参加辩论。如果在我下去之前你就能回来，那我得给你准备好参加党代会的材料，你来信说一声，我马上就可以干起来。我准备打一场恶仗。最近一段时间来，反对派已经变得如此不成体统，简直难以形容。他们在党的眼皮底下搞秘密活动，当着全党的面召开秘密会议，更准确点说是半公开的会议（反对派已不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来掩护自己的非法活动）。为了开这个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此人因此而被开除出党）都坐公共汽车来了。一句话，一切都发生了，就像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样。这在败坏党风党纪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是无疑的。这些举动对第三势力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无疑的。

昨天，托洛茨基还在莫斯科河南岸召集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了会，大约七八十名工人党员参加了会议。

---

① 1927年10月中央全会决定就中央对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提纲进行会前讨论。

莫斯科河南岸区监察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来过这里。本来是不允许他参加的，但托洛茨基准许了，据说是让他听听。只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出中央，他们准备在全区范围内组织上街游行。秘密接头点就设在邮政总局和革命剧场附近。不知是由于下雨天或其他什么原因，虽然在邮政总局附近聚集了 40 来个空谈家，但没有举行游行。这种事，就像反对派散发传单一样，都是小孩子的玩艺儿，观众都走散了。有人说：反对派工人已得到指示，要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在红场上喊出“打倒斯大林派”的口号，对于我们这方来说，这真是让人高兴得笑掉牙的事。莫斯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不会让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说话的，他们又是叫，又是嚷，又是敲打声，又是口哨声，四周围一片嘈杂，足以让反对派心惊肉跳。

昨天，加米涅夫参加了红场边的积极分子集会，形成的就是这样的场面。其他区的集会也无非是这个结果。

我跑遍了各个区，可以说到处都是这样的场面。不过，据我看来，这里不仅仅是谴责反对派，严厉地谴责非法活动的组织者，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

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党已经极端厌倦从 1923 年就开始的没完没了的争吵。经济在增长，情况在好转，但分歧并没有因此趋于减少，相反是越来越多，而且激化为争吵。大家的厌烦情绪已到了极点。这种现象只有其他一些国家才有的，当然，在他们那儿是完全合法的。一些愚蠢的人在说，如果某个时候党需要广泛地讨论问题来劝说党的领导机关（不能排除这种情况），那么在这样的气氛下，任何少数派，即使它握有真理，也会早早地受到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维护领导的人们在政策上不要太冒险，不能自高自大，要懂得谁也不能让他们住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需要做的是第二点，而不仅是党严厉地谴责了反对派。如果仅局限于这一点，那就忽略了一个重大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正在显露出来。

得承认，现在我非常担心中央的自满。如果不对现在尚处于萌芽中的自满情绪作一个恰当的估计，中央总是相信一切都非常顺利，那么就会在政治上表现出自满。而这种情绪虽然表现在中央监委的负责人身上——从交谈中，我可以肯定无疑——已经是很强烈了。把反对派毫不留情地清除出党，这是迫不得已的，没有其他出路可寻，这一方面，强化了党内的压制，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现在一切都很好”的情绪。正是这种自满情绪有可能导致非常不好的后果。我在想，你有可能对我们身上虽然没有继续发展但仍然存在的自满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怎么样不带自满地解释这种坚信不疑：说不管在任何条件下，全党都支持自己的中央；说大家对反对派的咬牙切齿，仅仅是因为大家都是100%完全自觉地支持并坚信中央的路线？依我看，这不对。应该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党外积极分子和全党的广大党员支持中央，当然是由于他们认为反对派的非法活动是极其有害的，但相当一部分人的支持是由于，他们认为，大多数决定了的，就是正确的，就需要支持。还有另一部分人的支持，是因为他们害怕不支持可能带来的后果。所有这几种因素，依我看，都看到了是有好处的，对将来更有用。我想就这些话找斯大林谈一谈，但未能去成。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星期开了一个共青团积极分子会议来纪念建团十周年（莫斯科团组织），捷尔·瓦加尼扬也上了主席台，他就是莫斯科河南岸团组织的负责人，没让他讲话，因为知道他是个反对派。

然后开始了游艺会，大约夜里12时放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电影。电影中出现托洛茨基在十月的镜头时，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然后，他又在布列斯特立陶宛出现了，后来又到了卡赞河前线等地，整个过程都受到热烈鼓掌欢迎。我和雷坚斯在电影场坐了3个小时，后来我们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让捷尔讲话，而电影中的托洛茨基（在夜幕中）却受到如此欢迎？如何来解释这种现

象？黑暗能否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全部？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怀疑，那些欢迎影片中的托洛茨基的积极分子，在活生生的托洛茨基于5个小时之前出席由共青团领导人在场的隆重集会的话，也不会让他发表讲话的。当然，这不是指所有的会议，但是可以有把握的说，大多数的会议都会这样做。有人说了，不要像扬松和雅罗斯拉夫斯基一样盲目乐观，去看看省里的情况吧。或许是我错了，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没有错。

在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有人给雅罗斯拉夫斯基递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据说奥尔忠尼启则不同意中央对待反对派的方针，因此给了他半年假让他休息。雅罗斯拉夫斯基对此进行了驳斥。他对那个人说，“看来该给你做手术了……”。

在中央全会上是有过急风暴雨式的斗争，那是会议开始时的事。当时，托洛茨基提出了关于军事阴谋的质询，雅罗斯拉夫斯基就用一本书向他扔了过去，然后有人把他拉下了台（“轻轻”地抱着他的腰部），托洛茨基对着这个人大声吼叫“法西斯”，穆拉洛夫就跑来保护托洛茨基。在此之前，有人朝托洛茨基掷过缸子，但并没有击中，你可以自己去拿片子看看。

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一样表现得厚颜无耻。当彼得堡工人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开会。他说，在兴登堡共和国还比我们这儿自由，那里的共产党人尚且用不着坐牢，我们这里倒要坐牢。

我已经写得太多了，该结束了。也请你给我来信，请雷坚斯把我的信转到我要去参与辩论的城市。详细地说说你的身体情况：都痊愈了吗？自我感觉好吗？什么时候回来？我指的是医生的意见，而不是你自己的愿望。

向济娜伊达，加芙里洛芙娜问好！

费　全

谢尔戈，你可能没想到，赶走反对派以后我们事情更好了，包括政治更加公正了。到现在为止，反对派只看到我们不好的一面，把它无限夸大；我们呢，在对反对派进行辩驳的同时，因为他们的片面性和吹毛求疵，有时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美化了时局。

中央美化一点，省委在这基础上又美化一点，盲目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更是加以粉饰一番。反对派说我们的富农增加得特别快，我们回答说富农是在增加，但并不到反对派所说的程度，这种争论一直延伸到各省省委，结果富农们都奄奄一息了。

这样的事很多。你想过没有，赶走了反对派对于政治上变得更加客观公正，对于因为失去了反对派而进行的反对过火行为、反对官僚主义的盲目无知的斗争是个很大的冲击。

就此搁笔，祝你健康！

№04340

施基里亚托夫就工人对反对派的态度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 年 10 月 29 日）

1927 年 10 月 29 日

亲爱的谢尔戈

看了你给同志们的来信和克列斯廷斯基的说明，看来你的身体还挺好，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亲爱的谢尔戈，听说你一切都好，我是多么高兴。更好的是一切不幸都已过去，现只要工作。你的事情挺好，我们这里似乎就没什么了。他们在胡闹，工人们在责骂他们，真是太好了。基层组织正在进行讨论，进展很顺利，党的日常生活可以平静下来了。工人们成长得多快，真让人高兴。想给你写写党内的事，可能你从别人那儿听说了，总之，情况是好的，很快就回来了，我再详细地讲给你听。不知道因为什么，我老想你。不过，我相信很快就能见到你了。我的嗓子嘶哑了，我要去看看医生。如果不困难的话，把你的近况简单写几句。

伊利芙娜·叶梅利扬娜和其他人都问你好！

吻你！

你的朋友　马特维

№04341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反对派状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

（1927年10月29日）

1927年10月29日

亲爱的谢尔戈

刚刚从斯瓦尼泽那儿得知你10月24日的身体情况，说你又开始神采焕发了，又能吃、又能喝，又开始笑了，你不知道，这让我（还有我们大家）多高兴。我们又有了希望，因为你可以出席党代会了，这该有多好。

该死的工贼们到处散布无耻的谣言，说由于你和我们意见不一致等原因，已被有意安排停职，外派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了，这显然是有人拿你在这里作投机。不过，你没参加不久前的全会[①] 也好；他们表现得是如此可恶，对我们，布尔什维克，进行了百般凌辱。我信守一句话：一切都要忍得住，但因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还是没忍住向托洛茨基开了炮。可是，我得到的是一顶“左倾”的帽子，我打错了算盘。朋友们说，我的这一失败举动导致国家计委的控制数字与反对派中一个人的思维器官联系在了一起。反对派利用了这一点到处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欺侮，而托洛茨基的表现则是教唆对身体使用暴力，大声呼叫“狱卒”、“克伦斯基分子”和“佩列韦尔泽夫分子”等等。在全会前夕，我道了歉。我说你没参加全会也好，因为我了解

① 指1927年10月21～23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了中央。

你的火爆性格，说不定由于某种原因，你会在上层对他开火。[①]

现在，会上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反对派处处都在吃败仗，甚至在有十几名反对派的地方，也只有二、三个追随者。在对七小时工作日的提案进行表决时，他们被击败了[②]，在地下印刷厂和谢尔巴科夫分子问题上，对他们的打击更加有力，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批评。他们纠集了30～100个人召开秘密会议，自吹自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柯夫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加塔耶夫等人对着共青团员、共产党员、被清除出党者和无党派人士发表了讲话。十五大之前，站在他们一边的大约有几千人（未必能超过1万人），如果我们更加强硬，十五大以后，他们更会瓦解为只剩几个“光杆”，那样，他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萨普龙诺夫分子肯定要组建秘密政党。他们把某个人从托洛茨基那里挖过来，但又失去了某个人。[③] 缓冲器被砸碎了，已经没有了，而什克洛夫斯基呢，只

① 1927年10月24日，托洛茨基就全会的速记记录写信给中央书记处。信中说：“女速记员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许多反驳的话是记下来了，但记下的远不是全部，或许由于速记员个人的好恶，漏记了一些反驳的话。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怪罪她们。速记记录中同样没有指出主席台上不断地妨碍我们的发言。没有标示出有人从讲台上向我掷过缸子来（据说是库皮亚科夫同志干的）。速记记录同样没有标出联席会议的一名参加者竟然抓着我的手生生地把我拉下了讲台，等等。”

“在布哈林同志发言的时候，什维尔尼克同志为表示对我发表的反驳性发言的不满，拿了一本书向我扔过来。什维尔尼克同志是前中央书记，现在是乌拉尔党组织的领导人。我希望他的这种英勇壮举应该永远记录在速记记录中。”

“上述的流氓行为没有一次受到主席台方面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谴责。”

② 为迎接十周年大庆，1927年10月，国家领导人讨论了把工作日缩减为7小时的问题，反对派表示反对这一举措，污蔑说这是“恶意的煽动‘和’‘冒险行为’”。

③ 萨普龙诺夫是“民主集中制”派领导人之一。该组织早在1918年就开始活动，尤其积极地参与了1919～1921的党内辩论。为了准备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该组织的成员于1927年6月27日向中央递交了著名的《十五条纲领》，以左的立场批评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政策。1927年全会提出将有关萨普龙诺夫派“分裂主义活动”的材料交十五大讨论。很快地，该组织的参加者就被开除出党了，其领导人萨普龙诺夫和斯米尔诺夫被逮捕，并被送回乌拉尔。

会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如果你能回来就好了。我们暂时决定，在所有情况下都准备两个报告人：扬松和我。当然，你要回来了，做报告就是你的事。[①]

工人们（无党派的）对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出中央的措施认识得很好，“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对他们已经够照顾的了，处理得够晚的了。

我们成了工作狂：第一天作了两个报告，第二天早上又作了第三个，面对的都是数以千计的增加了对党的任务、党内分歧的理解的听众。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知道，你的康复是让我们振奋，让我们高兴的事。如果需要的话，最好还是多躺几天。

向济娜问好！

克拉芙季娅对整个工作已经很熟悉，工作起来总是从早上直到深夜。玛丽安卡同样是全身心地扑在学校和中队的工作上。小的总想让我带他们去高加索，我打算12月底去那儿。要知道，我一个夏天没有休息过，搞得我精疲力尽，经常处于精神不安的状态。

祝你健康，亲爱的谢尔戈！

等你的回信。

你的　叶梅利扬

① 指即将于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结报告。

№04343

奥新斯基就当前经济问题致李可夫、斯大林的信

（1927 年 12 月 12 日）

1927 年 12 月 12 日

致李可夫同志和斯大林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我想只向你们两个人简单地讲一讲我个人对当前经济问题的意见。我认为这些意见之不便于在党的代表大会[①] 上讲，有两个理由：1）公开地讲出这些意见可能有损我们在国际上的威信，并使政局恶化，而要求大会公开审议又没有成功的把握，反而可能有违我们良好的本意；2）在当前政局下，我的发言有可能被看做是对前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攻击，而且在我看来，进行这种攻击是不合时宜的、有害的举动。

我简要地地讲一讲。

一、李可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②] 中断言，我们没有遭受任何普遍性的危机，只有在粮食收购方面存在局部的危机。在我看来，正好相反，我们正处于深刻的经济危机的初期，比 1923 年的危机要严重得多，也比 1925 年春季的困难严重。

二、粮食收购方面的危机无论如何不应仅仅看做是“局部”的危机，因为它牵动了国民经济的主要神经，并且对各个方面都产生

① 联共（布）15 大于 1927 年 12 月 12～19 日召开。

② 李可夫在会上作了关于编制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

了影响。如果粮食供应状况变坏，那么：1）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粮食需求省份已经发生了），1928年亚麻和棉花的生产也会下降；2）出口和外汇收入将会降低；3）粮食供应的中断将会破坏城市的经济生活；4）我们的毫无准备可能导致又一个粮食上的歉收年，明年是歉收年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三、我们的粮食收购进程让我很担心。这里不是和总的方面相比（“去年收购多少，今年也收购多少”，“是有所减少，但减得没那么多”），而是和去年及今年已经出了偏差的粮食采购活动相比，谁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过，谁就明白，粮食曲线在9月10月如此下滑，到11月滑到谷底，就表明这个战役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如果到12月还在继续下滑，就说明这个战役已经完全输掉了，即使下一个半年想纠正，提高收购价格，事情也已无可挽回。这种提价除了已有的损害之外，还有可能推动粮价继续上涨一段时间。

四、撇开政治原因不说，最近的经济原因当然是：1）粮价过低；2）在农村畅销的廉价商品不足。我曾经3次向同志们指出（1927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1927年夏天的一次中央全会和1927年初秋米高扬同志有关粮食收购问题给政治局的报告上），需要提高粮价。我认为我看得很准。在1927年6月审核降低粮价运动的总结报告时，也注意到了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的高价问题，特别强调指出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企图减少投入纺织工业的资本是错误的。

五、当人们说我们的粮食收购量减少而经济作物的收购增加，以及由于农民打短工而增加收入导致城乡之间货物流通加大时，我认为应该这么看：1）须知“令人满意的”产品是以相对更高的价格收购的；2）依靠打短工增加的流通是很困难的，而不是相反；起作用的是需求增加的因素，而不是供应农村的因素，这只能说明城市的又一缺点，而不是它的又一长处；凭借城市缺点的增长而加大的流通只能使情况变得更复杂。

六、我认为，造成这些缺陷（暂时还没有完）和我们基本的收购工作中毛病（这些缺陷和毛病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广泛深刻的困难）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发展生产的方向与速度与国家的实际能力不相符。

同志们知道，我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决拥护者。顺便说一句，这就是说，我认为，依靠本国的资源、发展社会主义的大工业、排除非社会主义的要素是有可能的。这也意味着国家采取在逐步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

七、这里讲的方向和速度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发展的方向和速度不能超越国家的实际能力。第一，过多的资源是作为长期流通消耗的方式投入的；第二，在这些消耗中，作为产出产品的投入规模过大时，不能很快转化为产品，因为经济无力消化它。我具体地解释一下：把过多的钱全部“打进”基本建设，就可能因此断了为现有企业购买原料；把钱都用于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就可能因此拖延制成品的发展，还可能使加工工业难以大量吸收为重工业生产的机器和资料；最后，把过多的钱打进运输业、电气化等等大事业中，有可能因此破坏经济管理机体发展所必需的平衡。

我要指出，这种自发产生的不成比例（失衡）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主要推动力。

八、我认为，我们这儿（不是自发的）也开始出现了这些失衡，原因是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必需的投资方向未掌握好。我们需要极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制成品的生产部门，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它们的合理化中，投入到降低其产品的价格中。我们正在改组石油工业，使煤油价格与战前水平相等。如果以前和现在都沿着这条路走，我们本来是可以在纺织工业或皮革工业上接近达到这个目标的。但我们还是在重工业方面投资过重，要求得过急（相对于我们的总的能力来说）。而且，我们又很快上了三个重大项目：德聂伯河水电

站、谢米列奇铁路，伏尔加－顿河运河[①]。1926年秋天我在人民委员会对此表示过疑问。我说，现在我只能上前两个项目，李可夫同志还笑我是“尾巴主义”。我担心的是，对凭借国内资金发展的可能速度估计不周。不良结果已经开始出现，而且今后会变得更加严重。

九、对预订计划和速度我表示过反对吗？至今没有。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和由群众意识和需求上的转变产生的需要相比，和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方面的发展速度相比还是太少了。太慢了。但是，依我看，问题应该是这样提出的：要么应该根据自身的资源情况，小心地使速度与方向保持平衡，要么应该吸收外资并且保持很大的规模，否则危机加深加重是不可避免的。

十、显然，这两个方案都应该做，但是第二个方案既具有第一个方案的“质”，而且有“量”，有增加新的资金的可能性。这第二个方案现在就具有了非常大的意义。因而，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如果说我们要“转变”的话，在经济上，看来应该是朝更多地利用外资和朝这种利用的组织准备转变。这里，整个成了对我们提出要求和我们的反要求问题。顺便说一句，政治局美国委员会筹集的资金表明，这个问题的解决看起来远比通常想象的简单。

十一、这一危机的另一原因是我们对整个经济的控制集中得过快以及削弱了某些经济单位的经济规模原则。农业合作社的收购功能在我们这里日益成为国家机关的不必要负担；一些工厂变成了托拉斯的分部；专业银行虽然暂时存在，但愈来愈感到自己是国家银行的分行；我们的一些经济部门越来越多地引进了“按照预算”工作的原则，正像任何一个委员部一样；机动灵活、对需求和市场变

① 1926年12月25日，政治局认定谢米列奇铁路和第聂伯河水电站是国家计委递交的1926～1927年大建设计划中的首要工程。伏尔加－顿河运河工程被认为局限于亚速港的最终勘测和继续施工较为合适。

动的适应能力正在减弱；军事共产主义的因素和心理已经开始出现。在当时，不断地从需要从内部战胜而不是从外部战胜的商品经济进步到不断增长计划性和合理的组织性是多么需要。

为了分散管理，把大部分经济主动权交还给生产单位，再次唤起它们“经济核算”的意识，完全有必要进行一些改革。

我在这里郑重指出，至今我也不认为在工业和商业中发展个人的“经营积极性”是需要的。我看，我们恢复时期在这方面的结论是，私人资本不会是，而且也不可能是苏维埃经济制度中有活力的、对社会有益的独立的一部分。它的作用在于对集体经济未能占据的空间的补充，是阻碍其失去市场灵活性的消极的动因。

十二、从这场经济危机中还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应该最大规模地转向农村的经济组织工作，以便与那里的私人资本作斗争，发展所有集体的、合作社的和计划调节的经济成分，当1927年4月来到沃罗涅日省作试验统计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做这项工作的机会和前提已经成熟。农村（首先是贫农）早就等着组织者下去。需要派遣成千上万的组织工作者下到农村去，他们会在那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至于富农，应该让他们占领城市的私人资本阵地，让他们去补充未能占据的空间，起消极的动因的作用。用“行政手段“废除他们是不应该的，也是有害的。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不能对他们有任何指望，比如通过向他们提供某种权利使劲吸收他们的存款等，富农的钱可以自愿作为有息提存金寄存在信贷和储蓄机构，只要国家能够保证其可靠的返还就行。农村的经济组织应该成为中农和贫农的组织，或者是为了中农和贫农的组织。这也是农村恢复时期的一个明确的结论，需要尽快完全落实的结论。

这就是我认为必须说出的一些不连贯的、考虑不充分的意见。

奥新斯基

【专题说明】

共产党情报局匈牙利会议

（1949 年 11 月）

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自 1947 年 9 月成立到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后解散，总共召开过三次全体会议，即决定成立情报局的波兰会议（1947 年 9 月），讨论南斯拉夫问题并决定将南共开除出情报局的罗马尼亚会议（1948 年 6 月），以及全面声讨和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匈牙利会议（1949 年 11 月）。当然，1947 年 12 月在南斯拉夫还召开过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建立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常设编辑部的事务。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次会议只是一次工作会议，通常不算做共产党情报局的正式会议。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和发展，与战后美苏冷战格局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情报局主要是苏联控制和约束欧洲各国共产党行动的工具，以达到阵营内部统一方针和协调动作的目的。第一次会议批判了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参见本《选编》第 24 卷有关专题），第二次会议以南斯拉夫共产党为攻击目标（参见《选编》第 22 卷、第 24 卷有关专题），原因就在于这些党的行动偏离了莫斯科设想的轨道。第三次会议召开时，南共已被开除出情报局，但仍然被作为斗争的对象，目的显然是以此训诫其他各党。同时，会议全面肯定了不久前在匈牙利审判的拉伊克案件，以此为

例，一方面说明南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和杀人犯，一方面引导东欧各党开始新一轮的政治大清洗。此外，会议还听取了联共（布）代表苏斯洛夫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报告，报告号召各党行动起来，消除新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这表明了莫斯科在柏林危机后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和担心。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斯大林要在东欧各党内部进行整肃的动机。

本专题收入的是有关第三次会议的档案文献，其中包括会议的主报告、各党代表的发言、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这些文件，对于了解共产党情报局的历史，苏联党与东欧各党的关系，以及情报局活动与冷战历史发展的关系，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王英杰、刘新宇、吴红、侯静娜、方琼翻译）

№11765

情报局匈牙利会议开幕式发言记录

（1949年11月16日）

会议于11点10分开始，于12点55分结束

苏斯洛夫[①] **同志**宣布情报局会议开幕，建议第一次会议的主席委托拉科西[②] 同志担任。

苏斯洛夫同志的建议被采纳。

拉科西同志感谢大会的各位代表给他的荣誉。拉科西代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欢迎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并表示希望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拉科西同志说："这次会议是共产党情报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他们的榜样和领导人、强大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为首的代表，第一次进行的集会，其目的是相互通报信息、交流经验和协商未来的合作。第一次会议阐明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的斗争，提高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使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除了关注本国的问题之外——国内这些问题是他们首先要集中注意力解决的，还要适当地注意和关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问题。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活动中，在本国的内部问题与共产主义国际事业之间恢复了正确的相互关系，这

① 米·安·苏斯洛夫（1902～1982），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② 拉科西·马加什，时任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

是正确的政策必须的基础。

情报局第二次大会主要研究了南斯拉夫叛徒和奸细的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所有那些威胁着新民主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错误和危险，都被列入了会议议事日程。关于共产党的作用和意义被作为中心问题重新提出。在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查明，在所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党内，明显存在着一种危险倾向，即在其他社会组织面前，尤其是在人民阵线面前，共产党有退居次要位置的危险，或者至少是掩盖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讨论关于南斯拉夫叛徒的问题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注意到，这些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

拉科西同志说：“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重新强调了，在将中欧和东南欧国家从法西斯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事业中，在建立和加强这些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事业中，苏联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对南斯拉夫叛徒的揭露，最终使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极端危险和卑鄙的计划也被揭露了。同时还暴露出，在实现这一计划过程中，南斯拉夫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奸细们应该起主要的作用。由于去年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使揭露渗透到人民民主制国家党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成为可能。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有些地方目前才开始展示，但是已经清楚，上一次情报局会议给了我们怎样极其宝贵的帮助。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怀着极其敬重和感激之情，回忆我们的伟大导师、我们无限热爱的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他的洞察力和坚定不移的意志，使得揭露和粉碎帝国主义分子的计划成为可能。在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还没有感到这个计划的危险性时，南斯拉夫的叛徒们已经与之联系起来了。

在此我应该回忆一下我们大家所遭受的巨大悲痛，即我们全体

爱戴并尊敬的日丹诺夫[①]同志的逝世。日丹诺夫同志参加了第一、第二次情报局会议的工作，他以自己渊博的知识阐述并贯彻了斯大林同志的学说，他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他的早逝，是近年来共产主义运动所蒙受的巨大损失。

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之间的这个时期，可以用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和苏联的繁荣强盛来概括。中国人民的胜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而这还不是最终的，最辉煌的证明是在原子能问题上苏联科学和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②]

情报局在前两次会议成绩的鼓舞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希望，这次会议的结果也如以前会议一样，将是富有成效的。我祝愿与会的全体代表更加有效地工作，并取得圆满的成功。”

拉科西同志宣读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

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帕·陶里亚蒂[③]（代表团团长）

爱·多诺弗里奥[④]（代表团副团长）

安·契卡里尼[⑤]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马·拉科西（代表团团长）

埃·格罗[⑥]（代表团副团长）

---

① 安·阿·日丹诺夫（1896～1948），1939年起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② 1949年9月25日塔斯社发表公报声明：“早在1947年苏联就已经掌握了原子武器的秘密”，并声称“苏联已经拥有了这种武器”。

③ 帕尔米罗·陶里亚蒂（1893～1964），1926年起一直任意共总书记。1944～1946年曾在意大利政府中任部长。

④ 爱德华多·多诺弗里奥，自1949年起担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⑤ 安东尼奥·契卡里尼，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委员，意大利共产党在拉文纳的联邦委员会书记。

⑥ 格罗·埃诺，匈牙利共产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

约·雷瓦伊[①]

亚·卡达尔[②]

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雅·杜克洛[③]（代表团团长）

艾·法戎[④]

乔·谷尼欧[⑤]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米·安·苏斯洛夫（代表团团长）

帕·费·尤金[⑥]

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格·乔治乌－德治[⑦]（代表团团长）

约·基辛涅夫斯基[⑧]（代表团副团长）

亚·莫吉奥罗希[⑨]

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雅·贝尔曼[⑩]（代表团团长）

---

① 雷瓦伊·约瑟夫，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

② 亚诺什·卡达尔，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自1948年起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1948年至1950年期间担任内务部部长。1951年被逮捕，并受到审判，根据虚假指控从事反国家的活动，被判处终身监禁。

③ 雅克·杜克洛，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

④ 艾蒂安·法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1948～1950年期间，担任《人道报》主编。

⑤ 乔治·谷尼欧，法国共产党的思想家之一，《人道报》的主编。

⑥ 帕维尔·费多罗维奇·尤金，苏联哲学家，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主编。

⑦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后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总书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⑧ 约瑟夫·基辛涅夫斯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

⑨ 亚历山德鲁·莫吉奥罗希，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⑩ 雅库布·贝尔曼，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团副部长。

亚·萨瓦茨基[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鲁·斯兰斯基[②]（代表团团长）

什·巴什特万斯基[③]

拉·柯普尔纪瓦[④]

Б. 格明德尔[⑤]

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В. 契尔文科夫[⑥]（代表团团长）

В. 波普托莫夫[⑦]

拉科西同志说："这样一来，情报局成员各国共产党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

出席会议的还有以下来宾，他们分别由本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推荐：库姆比利耶夫[⑧]同志（保加利亚共产党）、斯捷拉·莫吉奥罗希[⑨]（罗马尼亚工人党）、比罗·佐尔坦和内梅什·德热[⑩]同

① 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自1949年起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② 鲁道夫·斯兰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政府副主席。1951年因被指控犯有"反国家阴谋"罪，被免除一切职务并被逮捕。于1952年被判刑并被处决。

③ 巴什特万斯基·什特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成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④ 柯普尔纪瓦·拉迪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主席团委员。

⑤ 格明德尔·贝德日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主任。1952年因被指控犯有"反国家阴谋"罪被处决。

⑥ 维尔科·契尔文科夫，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后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⑦ 弗拉迪米尔·波普托莫夫，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担任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总书记；1949～1950年担任外交部长。

⑧ 格奥尔基·库姆比利耶夫，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部副部长。

⑨ 斯捷拉·莫吉奥罗希，罗马尼亚工人党驻《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⑩ 内梅什·德热，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驻《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沃达－佩克萨·弗朗迪舍克[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Ю. 芬格尔什坦因（波兰统一工人党）、波诺马廖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②] 同志和列·谢·巴拉诺夫同志[③]（联共（布））”。

接着，拉科西同志提议审理和批准以下会议日程：

1. 保卫和平和与战争贩子进行斗争

报告人：苏斯洛夫同志

2. 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的任务

报告人：陶里亚蒂同志

3. 关于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

报告人：乔治乌－德治同志

各国共产党代表就此问题的通报

4. 关于情报局章程的草案

报告人：杜克洛同志

拉科西同志建议的会议日程被一致采纳了。

接着，拉科西同志建议成立情报局大会技术秘书处，由下列人员组成：联共（布）的拉·谢·巴拉诺夫同志，以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比罗·佐尔坦同志。

技术秘书处负责：

1）作会议记录；

2）保证发言稿和文件的翻译。

---

① 沃达－佩克萨·弗朗迪舍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驻《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② 波诺马廖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③ 列昂尼德·谢苗诺维奇·巴拉诺夫，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自1949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情报部部长，同时担任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办公厅主任。

提议在大会结束之后，与会的各国共产党全体代表签署会议记录。

全体代表同意拉科西同志的这个建议。

拉科西同志建议批准以下会议日程：

会议工作时间：按当地时间从10点30分到14点30分和从18点到21点。

规定作报告的时间是：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发言时间为20～30分钟（不包括翻译时间）。

提议的会议日程被接受。

№11766

苏斯洛夫在情报局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49 年 11 月 16 日）

拉科西同志提议，按照会议日程的第一项，由米·安·苏斯洛夫同志作报告。

（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

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

同志们！

自从几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情报局会议举行之后，迄今已经过去两年多了。

在那次情报局会议的宣言中，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中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在战后初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指明了世界舞台上已形成两个阵营及双方的目的和任务完全相反的事实，揭露了美国所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企图建立英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力量的那种计划，揭露了右翼社会民主党首脑人物帮助帝国主义进行一切反人民勾当的叛逆作用。

最近两年中事态发展的整个进程完全证明了，第一次情报局会议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估计以及那次会议为反帝国主义阵营所规定的方向和任务，是极端正确的。

现在，我们评价第一次情报局会议各项决议以及第二次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的决议的意义时，可以十分大

胆地说，这些决议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这些决议在团结国际工人运动队伍的事业中，在动员群众来回击世界反动势力和新战争的挑拨者的事业中，在继续发展和巩固全世界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事业中，起了卓越的动员作用和组织作用。

自从第一次情报局会议举行之后直到现在这个时期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侵略者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阴谋

在过去这两年期间，更加明显和更加透彻地确定了世界政治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路线，这个阵营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和坚决彻底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争取国际和平，争取民主；另一条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路线，其目的是要奴役别人的国家和民族，用强力建立英、美的世界霸权，击溃民主力量和发动新的战争。这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已经尖锐化。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性也日益加强了。

如果说在第一次情报局会议上讲到了，美国和英国转向准备新军事冒险行动的政策的话，那么现在，主持帝国主义阵营的美、英统治集团已经在公开进行侵略政策，即准备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美、英两国统治集团走上用军事政治阴谋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道路之后，就竭尽全力来准备新的战争，并更加野蛮无耻地宣称希图取得世界霸权，希图“由美国来领导全世界”；他们公然提出了复活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狂妄计划，却忘记了历史曾经给予那些妄想“统治全世界”的疯狂之徒的教训。

目前，英、美帝国主义联盟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准备新的世界大战。这种政策的表现，就是肆无忌惮地对外行实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扩张，美国在全世界各洲执行着这种扩张政策，极力想把军事战略原料以及其他为准备战争所必需的一切资源都夺取到自己的手

中。美帝国主义者在全球各地布置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准备着新战争进攻的跳板。[①]

英、美帝国主义者扶持一切腐朽的反动政权（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希腊的保皇法西斯政府、中国的蒋介石等等），扶持[②]各人民民主国家内的已经被击溃的剥削阶级残余、特务、破坏分子和杀人犯等等，即扶持全世界的一切反动势力，这都是为了加紧准备新的战争。美帝国主义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和支柱。

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地践踏了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关于要公正解决德国问题、把德国改造成为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决议。他们本来已经承担要把德国视为统一的整体的义务，但是他们却实行着分裂德国的政策，结果竟然建立了“波恩傀儡政府”[③]。美、英、法三国政府并不实现德国的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反而恢复德国西部的军事工业，恢复以前原是德国帝国主义和希特勒制度支柱的反动垄断组织、容克势力及军国主义分子等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他们还竭力破坏订立对德和约的准备工作，力图把对德国西部的临时占领变成永久的和独霸的殖民地统治。

一切正直的人们都看得很清楚，这种对德政策取决于华尔街大亨们的愿望，因为他们力图利用西德来达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首先是把它作为进攻基地，同时力图把西德居民利用来充当实现自己侵略计划的炮灰。

美帝国主义分子想要利用德国人民充当炮灰的这种可恶的意

---

①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以便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人类。他们大肆扩充军备预算，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并强加于自己的附庸国，采取一切手段来恐吓人民，企图用仇视人类的宣传来毒化人民的意识”。

②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社会的一切败类”。

③ 指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成立，首都设在波恩：1949 年 8 月选举了共和国议会，而在 9 月份，选举了总统并组建了政府。

图，不久前已经由美国众议员鲍治泄露出来了，当时他提议说，美国应该成立由德国人组成的25个师的雇佣军。这个战争贩子对德国人是否愿为美国的大资本家流血牺牲这件事没有把握，所以他提议，供给这些雇佣军的全部弹药必须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所有高级军官均由美国人来担任”。鲍治极端蛮横无耻地声称，他决不主张在战争发生时派遣美国青年去作战，因为他相信可以按极低廉的价钱买到炮灰——据这个人贩子说：“只要用我们现在付给美国士兵薪饷中很小的一部分”就可以办到。鲍治进一步说道：美国在日本也应该试图建立这样的雇佣军。

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对德国和日本两国人民所持有的极端蛮横和无耻的计划。

准备战争的政策在所谓的马歇尔计划上也表现出来了。1947年9月间举行的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揭穿了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奴役欧洲的计划。

实际生活已经残酷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曾经相信马歇尔计划将有什么善良作用的人们。被马歇尔化的欧洲诸国的经济，经过将近两年来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之后，并没有复兴，反而陷入了完全解体的状态中。目前，这种情形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甚至联合国秘书处在1949年7月公布的关于1948年度世界经济状况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就连那些最热烈崇拜和极力颂扬马歇尔计划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计划已经破产了。

马歇尔计划迫使马歇尔化的诸国经济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使美国内部无法销售的大批存货充斥西欧市场，强迫这些国家去实行一种对东欧各国贸易关系采取歧视态度的有害政策，实际上“马歇尔计划”是使日益笼罩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经济危机加速和尖锐化起来。近来，美国更加变本加厉地向马歇尔化诸国业已解体的经济实行进攻。美国帝国主义者利用西欧诸国遵命执行的

通货贬值的机会，极力想把西欧诸国经济最终地攫为己有。

目前，当实际生活已经毫不留情地完全扯掉了马歇尔计划身上的孔雀羽毛之后，于是，这一计划也就原形毕露，使大家都能看出，它无非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所运用的一种经济政治军事手段，目的就是要迫使西欧诸国经济受其控制和支配，力求把西欧国家变为美国的殖民地附庸国。①

自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实行之后不久，接着便建立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两个侵略性的军事政治联盟，即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②。

北大西洋集团目前是美、英统治集团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而实行的侵略政策的主要武器。正如1949年1月29日苏联政府揭露北大西洋公约之真正军事政治阴谋的声明上所说的：北大西洋公约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美、英两国统治集团能控制尽量众多的国家，使其根本无法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对内政策，并利用这些国家来作为实现自己侵略计划以求奠定美、英世界霸权的辅助工具。

北大西洋集团的目的，就是要镇压欧洲各国人民为捍卫本身生活权利、民族自由和独立地位而进行的抗美运动，而把西欧变成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成准备新战争的根据地和进攻基地。③

成立北大西洋集团就是要向东欧各民主国家直接实行侵略，首先是要向苏联这一民主阵营中的主力，这一保障各国人民和平安

①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摧毁和平和民主的力量，首先是西欧的共产党，并使欧洲变成筹备战争的屯兵场"。

② 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参加的西方联盟，是以签署了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以及集体自卫条约，于1948年3月17日成立的。关于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约是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葡萄牙和冰岛于1949年4月4日签署的。

③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以及其对外冒险政策的军事行动基地。服从于美国的操纵，英国、法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背叛自己国家的民族利益，指望借助于这个政策保护自己的哪怕是些微的地位，同时指望利用东欧国家的人民捞到好处"。

全、自由独立的可靠支柱直接实行侵略。

最终，北大西洋公约及其正在拟定中的附属条约——地中海条约、近东条约和远东条约——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就是准备消灭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去反对已经战胜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反动势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因此，在美国庇护之下所成立的帝国主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对全体进步人类的威胁。一些人认为，帝国主义分子的这一最新的恶毒的阴谋，实际上是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侵略者进攻欧洲各国人民以期消灭其自由和独立以前所缔结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相同，这种评价是完全公正的。北大西洋公约也同反共产国际公约一样，以腐烂不堪的反共旗帜作掩护，实际上是侵略和战争的纲领，是扼杀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纲领。

可见，事实业已表明，由美帝国主义分子统治的各国帝国主义者，正在准备新的世界大战，他们为了一小撮亿万富翁的自私自利的目的，决心把世界上多数的国家和多数民族都抛到新世界大战的火坑里去。美国统治集团为了这一目的，正在把西德变成自己在欧洲的军事进攻基地，并极力想把德国人民赶到新战争的屠宰场上去。他们为了这个目的，便在英国工党领袖直接帮助下把英国变成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并打算把英国人民拿去充当炮灰。同时，美帝国主义分子还准备将法国变成自己的进攻基地，以便对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北部及太平洋沿岸其他各国实行侵略，并极力想利用日本人民来实现这个目的。在近东方面，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诸国建筑许多军事基地和据点，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庸国，并极力想使土耳其人、伊朗人及阿拉伯人去为美国垄断资本的利润作战。

总之，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战略目前已表露得十分明显，其目的就是要准备在世界每一角落，燃起战争的烽火，迫使各大洲的人民都遵照美国亿万富翁的意旨，去为这些亿万富翁的利益流血牺牲。

美国首要人物中最露骨的分子，如上面提到过的众议员鲍治或布雷德利将军[①] 一类的人，竟厚颜无耻地公然说明他们的计谋是要“假他人之手来作战”，并利用别国的士兵去替美国当炮灰，而美国则仅仅供给武器和捞取利润。

但是这种冒险的打算是没有得到真正的主人的同意的。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想逼使其作战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对这次战争丝毫也不感兴趣。战争只会使他们遭受重大的牺牲，只会使他们的国家遭到浩劫和破产。各国人民不需要战争，各国人民不愿意战争。

美国的人民群众也不需要战争，虽然美国垄断资本是主要的战争挑拨者。不管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帮凶们怎样拼命撒谎宣传，而美国的普通人已经日益了解到：假如战争挑拨者一旦发动战争，那么，结果只会使美国的这些普通人和士兵死在远离家乡的太平洋彼岸的国家；并且战争也会出现在美洲大陆，带来当代最骇人听闻的轰炸，使世世代代的劳动成果归于毁灭。

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者们已经公开采取发动新世界大战的方针，于是就来破坏国际合作，首先是破坏与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设法捣毁联合国组织，极力想把联合国组织变成他们进行侵略阴谋的工具，撕毁联合国大会关于禁用原子武器和缩减军备的决议。破坏国际合作的政策引起了所谓的“冷战”，煽起了战争狂热，人为地造成了由那些军火制造商和猖狂的战争贩子们所利用

① 奥马尔·布雷德利，美国著名的军事领导人，自 1947 年起担任美国陆军司令部参谋长，自 1949 年起担任美国武装力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的国际紧张局面。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对拉伊克－布兰科夫间谍匪帮的审讯[①]，揭露了美、英帝国主义为了反对各民主国家和苏联、为了反对和平和民主而组织的巨大的国际阴谋。帝国主义分子的这次阴谋是要实现种种深远的计划：利用已经成为国际反动势力代理人的铁托法西斯间谍集团，来推翻匈牙利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的民主制度，使这些国家离开和平民主阵营，在这些国家里恢复法西斯反动政权，把东南欧和中欧各国变成为受帝国主义分子操纵的傀儡，变成为实行侵略的进攻基地。

侵略政策和新战争准备的直接后果，就是狂妄不羁地进行军备竞赛，而使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承受沉重的负担。只举出美国下一财政年度的军费预算达220亿美元，即是战前的20倍这一点，也就足以说明了一切问题。据美国总统直属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任主席诺尔斯所作出的计算，美国政府每星期所支出的军事经费超过该政府全年国民教育经费。一个星期的军费开支，可以完全抵付该国全年的公共保健费用。

由此可见，杜鲁门政府由于疯狂地实行军备竞赛，以致每年花在准备战争上的费用，竟然是美国国民教育费和公共保健费合计的26倍。英国目前的军费开支是1939年的3倍。原先因希特勒“大

① 拉伊克·拉斯洛是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后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副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年8月之前担任内务部部长，而后直到1949年5月被逮捕之前担任外交部部长。布兰科夫·拉扎尔是南斯拉夫原驻匈牙利大使馆参赞，苏南分裂后于1948年10月脱离南政府，并作为共产党情报局的支持者反对南斯拉夫当局。在1949年逗留在苏联期间被逮捕，在布达佩斯进行庭审时被利用，仿佛他是拉伊克的同谋者，在拉伊克和南斯拉夫领导人之间建立联系。1949年9月开始的布达佩斯审判，指控以拉伊克为首的一批匈牙利党和国家领导人犯有策划反对国家的阴谋、从事有利于“帝国主义侦察机关”和“铁托集团”的间谍活动。以拉伊克为首的绝大部分被告被判处了死刑并被立即处决，其余的人（包括布兰科夫）被判处期限不等的监禁。

炮代替黄油”口号而闻名的政策，目前又在马歇尔化的诸国里实现着。

不言而喻，这一导致税务负担无限增长的政策，当然使资本主义各国劳动群众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下去。垄断资本家为了准备战争，便向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准举行疯狂地进攻。其表现就是借提高劳动强度和缩减工资来加紧剥削工人，及大批解雇非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人等等。

准备战争又是与加紧向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进攻同时并行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了便于自由地对外采取冒险行动和发动战争，就极力企图扑灭工人运动和整个民主运动，使国内制度能毫无阻碍地法西斯化和完全军国主义化。斯大林同志还在1927年就说，帝国主义若不镇压反战派，若不镇压民众，就不能准备新的战争。“为了进行战争，只是增加军备还不够，只是组织新联盟还不够。为此还要巩固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后方力量。如果不预先巩固自己的后方，如果不预先压倒“自己的”工人和“自己的”殖民地，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进行重大的战争。由此就有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政策的逐渐法西斯化（《约·斯大林选集》，第10卷，第282页）[①]。

向共产主义进行“十字军的讨伐”，对共产党员实行迫害和采用公开恐怖手段（如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拉丁美洲诸国、中东诸国等等），颁布了反劳工和反工会的法律（如在美国、希腊、土耳其等等），遵循华盛顿的旨意，在马歇尔化诸国内建立俯首听命于金元帝国主义的反动制度，在西德复活法西斯主义，利用铁托法西斯间谍集团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内进行破坏工作——所有

① 此处援引的是斯大林在1927年12月3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这一切都是准备战争这同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战争挑拨者在反共的幌子下建立着由帝国主义势力、法西斯势力、梵蒂冈以及右翼社会党人组成的一种类似“神圣”同盟的东西。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阵营大规模地在思想上进行新战争的准备。它采取了日新月异的手段来制造社会舆论，用种族思想和仇视人类思想的疯狂宣传，用掀起原子弹狂和战争狂等手段来麻痹群众。把一切能够影响心理的工具，如刊物、书籍、无线电广播、电影、教堂等都极力动用起来了。

战争挑拨者及其帮凶用以进行宣传的思想资本是非常简单的，然而他们所做的这种宣传毕竟能造成危害。这种资本的主要内容，就是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宣传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拼命散布谣言，诬蔑苏联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①]；鼓吹世界主义[②]，鼓吹放弃国家主权，以求摧毁各国人民反抗美、英帝国主义分子侵略行为的意志。[③]

在思想上征服各“美利坚化”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在这些国家内广泛散布美国的下流作品和好莱坞影片，其中照例是把暴徒和凶手、色情狂和淫乱者、假善人和伪君子描写成主人翁。而这类“艺术”和“文学作品”只是在毒害和麻醉读者和观众。

在美国刊物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动刊物上，连篇累牍地鼓吹新战争。虽然第二届联合国大会曾经通过了谴责战争宣传的专门决议，但美、英两国统治集团，不但不采取任何办法来制裁战争挑拨者和

①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处在英、美侵略的道路上的（国家）”。

② 1948～1949年在苏联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提出的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具有反犹太主义和反西方的性质。

③ 在苏斯洛夫报告的原文本里，代替“帝国主义分子”一词的是如下内容：“帝国主义强盗，以及和平和独立的扼杀者，在精神上使爱好和平的人们丧失斗志，从而更容易实现华尔街的罪恶阴谋”。

战争宣传者，反而还公然怂恿他们。如今公开号召战争的，除了反动刊物和无线电广播中那些卖身求荣的下贱作家之外，还有大批的官方人物，即杜鲁门政府的官员们、国会议员们、将军们、海军上将们和英国的贵族们。

由此可见，美、英帝国主义联盟，也同法西斯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干过的那样，正在各方面准备新的战争：如采取各种军事战略设施，实行政治压迫和讹诈手段，经济上向外扩张和奴役他国人民，思想上麻醉群众以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反动势力。

美、英统治集团抱有一种疯狂的计划：就是想用武力征服全世界，使人类处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中。正因为如此，所以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侵略阴谋，对于世界命运，对于千百万普通人的生命和福利，对于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成果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①]

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日益增长和巩固

但是，如果认为帝国主义阵营所表现的疯狂活动，是这个阵营强大有力的证明，从而证明战争是无法防止的，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过去这两年中，帝国主义阵营更加削弱，这一链条上又有一些环节挣脱出去，那里一切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都更加尖锐化了。同时，在这一时期内，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却一往直前地发展和巩固起来。所以现在，不管帝国主义阵营如何大规模地准备战争，但在战争挑拨者的道路上，已经横着一座强大的而且日益增强的屏障。

①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最近的事件是：在美国继续扩大军事开支的拨款，军事狂热情绪继续膨胀，在一系列国家里追捕和平的积极勇士，——证明战争贩子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继续动员侵略力量，没有放弃自己对军事冒险行动的希望"。

当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准备军事冒险行动的时候，反帝国主义阵营正团结着自己的力量来坚决回击好战的帝国主义侵略者，正在为了孤立新战争的挑拨者，为了粉碎其骇人听闻的阴谋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与挑拨战争的黑暗势力相比，保卫和平的民主力量的增长要迅速得多。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性变化。

证明这一阵营发展和巩固的事实，首先就是领导反帝国主义阵营、领导争取持久和平这一斗争的苏联实力更加增强起来。帝国主义分子本来指望苏联因承担战争的主要负荷，而无法克服由于战争和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对苏联部分领土的经济掠夺所引起的困难，可是他们的这种指望已经永远地破灭了。

苏联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部门都有了迅速发展。让帝国主义者先生们去好好想想苏联所公布的关于战后五年计划执行进程的统计材料吧。今年10月苏联的工业产量比战前1940年工业月平均产量提高了50%，并且超过了五年计划上所规定的1950年度月平均工业生产水平。

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情形，表现为日益成熟的危机和经济衰落过程在庞大军费开支的影响下愈益变本加厉起来，而苏联的经济却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地高涨起来。1949年的头十个月内便超额完成了已经扩大了的工业生产计划：全部工业生产总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

苏联的农业经济也是一往无前地发展着。今年的谷物总收获量不仅比1948年多，而且还超过了战前1940年的水平。棉花、亚麻及其他许多经济作物的收获量，也比去年好，并超过了战前水平。国营牧畜业也大为增长了。

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进一

步的提高，这鼓舞着他们去争取日新月异的成就。

目前，形势已经十分清楚，自由的苏联人民的忘我劳动，千百万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劳动，一定能保证提前完成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五年发展计划。而这不仅意味着苏联的实力更加巩固，并且意味着整个和平与民主阵营力量更加强大。

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生命力，还表现在苏联已经达到的巨大的技术进步方面。新的技术日益发展，被人们所掌握，并不断地运用到生产中。

证明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发展的实例之一，就是我国在短时期内掌握了原子能的秘密，而使美国丧失了核武器的垄断地位。

1949 年 9 月 25 日塔斯社通报，苏联早在 1947 年就已经掌握了核武器的秘密，并拥有了这种武器。这一消息粉碎了帝国主义各国统治集团，以及对他们奴颜婢膝的资产阶级学者们屡次宣扬的俄国人在 1952 年以前将不会拥有原子弹的“预言”。

塔斯社的这个消息，使帝国主义者和战争贩子张皇失措和惊恐不安，削弱了这个阵营的力量，并且给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原子外交”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一外交依靠的是对原子弹的垄断，并借这种武器来恐吓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同时，一切拥护和平的人士却热烈庆贺苏联拥有核武器，认为这是和平事业的胜利，因为他们知道苏联政府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和平政策，所以它虽然拥有核武器，但它始终坚持主张无条件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立场。

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就是巩固和平与民主阵营的最强大因素。这种政策符合于全世界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因而鼓舞着和团结着一切和平战士的队伍，加强他们对胜利的信心。

苏联政府的和平政策，源于在我国根本不存在好战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苏维埃国家坚决反对民族压迫政策，所以

它的外交政策是以尊重世界上一切大小民族的权利和独立地位为基础的。我国人民充满了建设共产主义的热情，所以保持和平是与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我国人民深信，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定能保证他们在与资本主义体系实行和平竞赛中获得胜利。

苏维埃政府所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共处，两者间可能和平合作这一立场出发的。斯大林同志早在1934年就以下面的讲话明确规定了这一政策，他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很明显的。它是维护和平并增进我们与各国贸易关系的政策。苏联并不想威胁任何人，尤其是不想侵犯任何人。我们是主张和平并坚持和平事业的。可是，我们并不害怕他人的威胁，而是准备着用打击去回答战争挑拨者的进攻"。

苏联政府在最近的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关于制裁许多国家内尤其是美、英两国内的准备新战争的行动、关于采取实际措施无条件禁止使用核武器以及关于缔结为了巩固和平的五大国公约等建议，是对争取和平的斗争的宝贵贡献，是对战争贩子阵营的又一次打击。

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稳固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样说明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的发展和巩固。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迅速高涨，其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完成，人民物质福利的增长，人民民主制度内部力量的巩固，站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最前列的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人政党的建立，东南欧诸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其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合作关系的巩固，这些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巩

固——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巩固民主的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实力和团结民主的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一共同事业的重大贡献。

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绩，已经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树立了榜样，证明他们无需同帝国主义者签订奴役性的协定，而依靠本身力量，依靠相互合作，以及依靠苏联的友谊和帮助，保持本国经济的和民族的独立地位，就能在最短期间医治好战争和法西斯统治所造成的创伤，就能保障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和文化领域迅速发展。

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对拉伊克－布兰科夫匪帮的审讯中揭露了铁托叛徒集团，从而使世界反动势力指望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内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遭到了破产，这些事实都证明人民民主制度的力量和巩固。[①]

证明反帝国主义力量增长和巩固的又一事实，就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中国人民因推翻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维持殖民地剥削和封建压迫的统治制度，而获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美帝国主义打算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和新军事侵略基地的侵略计划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并在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新的缺口，因而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中国加入到爱好和平的各民主国家这一大家庭内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民主和平阵营的变化，同时使和平阵线更加扩大和巩固起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和平与民主阵营的极其重大的胜

①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在布达佩斯进行的诉讼程序，给帝国主义阵营以及战争贩子们以沉重的打击，并为继续巩固和平和民主阵营事业做出了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战争贩子及其走狗的营垒里引起疯狂的仇恨和愤怒"。

利，同时也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又一次失败。斯大林同志在致威廉·皮克[①] 和奥托·格罗提渥[②] 的贺电中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上的转折点。[③] 这一历史性事件表明在德国人民中，民主力量的增长和团结，这种民主力量在为统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而奋斗，它们从两次世界大战经验中做出正确的结论，并且不愿意再被人利用去充当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家的雇佣走卒。

德国民主力量把本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它们的胜利也就是美、英战争挑拨者的又一次失败。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义，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与爱好和平的苏联的并肩存在，使得欧洲不再有新战争的可能，结束了欧洲的流血，并使世界帝国主义奴役欧洲成为不可能"。

由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工人运动到处高涨的事实，也雄辩地证明民主阵营力量的增强和帝国主义阵地的削弱。无论全世界的反动势力怎样疯狂地对共产党人加以迫害，但各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强，欧、美、澳三洲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罢工运动愈益高涨起来，这也就是一种最好的证明。

明显地证明和平与民主阵营力量日益增长和巩固的事实，就是大规模地发展的强大的和平运动，这一运动已经拥有好几亿人了。

---

① 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在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共产党于1946年4月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成德国统一社会党之后，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两主席之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担任其第一任总统职务。

② 奥托·格罗提渥，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主席，在其与在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共产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之后，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两主席之一，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担任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

③ 斯大林给皮克和格罗提渥的1949年10月13日电报，当时正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际。

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产生了有组织的和平阵线，其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类使之免遭新世界大战的灾难，要孤立新的战争挑拨者集团，并保证各国人民间的和平合作。这一运动反映了由于各国人民进行过反法西斯奴役威胁的解放战争而在全世界发生的种种根本变化。同时，这一运动又证明群众政治觉悟有了空前的提高，证明各国人民已经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中取得教训，并且充满着不屈不挠的意志，一定要防止新的战争，捍卫和平事业，粉碎战争贩子的一切恶毒计划。

各国人民在近几十年中经历了严酷的考验，现在他们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掌握到自己手中，这也就是和平运动的重要特点之一。

无论战争挑拨者及其帮凶怎样疯狂，但目前的世界形势是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时期的形势是根本不同的。“不久以前发生的那场战争的恐怖，依然生动地留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而拥护和平的各种社会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丘吉尔的侵略信徒根本无法战胜这种力量，根本无法转向到新的战争”（斯大林语）。[①]

拯救世界使其免遭新战争的威胁，这在目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是什么空想，而是实际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各国人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警惕起来，积极行动和一致努力，在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表现出坚定和不屈不挠，那么战争挑拨者就绝对无法实现他们那种燃起第三次世界战火的血腥阴谋。

和平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它团结了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中等阶层内不分种族民族、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信仰的亿万人民。其次，和平运动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已经成了有组织的运动。为和平而斗争的战士在地区范围、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都日益团结和组织起来。

---

① 这是斯大林1948年10月29日答复《真理报》记者提问时说的。

和平运动最初是作为反对马歇尔计划、反对侵略性的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的群众运动出现的。当时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各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发出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呼声，参加了抗议罢工和示威，并为和平请愿书征集签名。

在开展和平运动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是在弗罗茨瓦夫召开的世界文化工作者保卫和平大会[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妇联代表大会（1948年秋）[②]，特别是今年4月20日至25日在巴黎和布拉格召开的代表着6亿有组织的和平战士的世界和平大会。

和平运动继续不断地发展和巩固起来。今年7月初在米兰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工会代表大会赞同了巴黎世界和平大会的宣言，制定了世界工联7200万会员的具体行动纲领。[③] 在许多国家里召开过全国保卫和平大会。在全西欧各国，普遍举行过多次罢工、全民示威和群众大会，反对批准北大西洋公约。在许多国家成立了保卫和平全国委员会，并在各个城市中、企业中和机关中，也开始组织这样的委员会。和平运动在美国和英国也发展起来，因为这两国人民愈益感到本国统治集团那种灾难性的侵略政策所造成的苦痛。

同志们！我对国际形势所做出的这一简要的分析，表明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是壮大了和巩固了。苏联实力的进一步增长，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上

---

① 文化活动家保卫和平世界大会，是经苏联批准根据波兰工人党领导人的倡议，于1948年8月在弗罗茨瓦夫召开的。

② 此处指的是于1945年成立的、并受共产党人领导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③ 世界工会联合会是于1945年在世界工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成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米兰召开的，其中许多国家，主要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为世界工会联合会组成部分一些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没有参加这次大会（英国工联代表大会，美国劳动工会代表大会，等等）。世界工会联合会剩余部分继续使用原有的名称，其领导权完全由共产党人控制。

和经济上的巩固及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的巩固和民主运动的发展，以及和平运动大规模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已经有了空前的扩大和巩固。

同时，帝国主义的反民主阵营却接连不断地丧失自己的阵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正在来临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体系的总的危机更加尖锐化，这一体系的所有外部和内部矛盾愈趋紧张等，都是证明帝国主义的阵营愈益削弱，证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历史上必然灭亡的命运。

世界反动势力阵营内部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而且也不能不尖锐化，尽管这种矛盾被这些国家所共同实行的反苏反共政策所掩盖着。

美国对马歇尔化诸国所实行的政策，即由美帝国主义奴役西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质上带着殖民政策的性质，以及为了争夺销售市场、为了争取对殖民地的剥削权，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疯狂竞争，都在加深着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首先是美、英两国之间的矛盾。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而且不能不尖锐化。与资产阶级“消灭经济恐慌的卫士”所做的一切预言恰恰相反，经济危机无论在美国或欧洲都在不可避免地成熟着。生产缩减，商品输出额和国内零售贸易缩减。失业工人数量不断上升，资本主义各国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已经达到巨大的数目——4000 万人！由于军备竞赛，劳动人民承受着日益繁重的纳税负担。工资和工人阶级整体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通货贬值，无非是对劳动群众的再次盘剥，因为他们用自己原来就很微薄的工资，现在只能购买更少的生活必需品。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变得无法忍受了。

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形势的尖锐化，不能不引起严重的阶级斗争。所有这些情形都在削弱着，而且将更加严重地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削弱战争挑拨者的力量。

华尔街和伦敦城的帝国主义分子所进行的冒险的对外政策，也使反民主的阵营更加削弱下去。这一政策节节遭到失败。“原子外交”破产，马歇尔计划垮台，帝国主义分子在东南欧和中欧的阴谋的破坏计划失败，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这一切还只是帝国主义分子对外政策惨败事实的一部分。当然，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尖锐化以及帝国主义阵营力量的削弱，本来就是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现象。而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冒险对外政策，则更加速了这一过程。

三、共产党和工人党是反对战争挑拨者斗争中的先锋

从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削弱的事实中，决不能做出结论，说战争威胁已经削弱。这种结论是极端错误和极端有害的。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状况愈加绝望，反动势力就会愈加疯狂，来自反动势力方面的军事冒险行动的危险也就愈加严重。

由于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和平与民主阵营的变化，帝国主义和战争挑拨者阵营中的分子便更加疯狂。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打算通过战争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解决自己外部和内部的矛盾和困难，以此巩固垄断资本的阵地，并夺取世界的统治地位。[①]

为了粉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计划，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各国人民的警惕性，必须更加扩大和平阵线，必须使一切拥护和平的力

① 会议记录删去了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如下内容：“感觉到时间对他们不利，帝国主义分子极端疯狂地准备实现自己的敌视全世界的侵略计划”。

量更加团结起来，努力奋斗。

反战运动的开展证明，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具有保卫和平、不让侵略者把人类投入血腥屠杀中的意志和决心。现在全部问题就在于要把群众的这种意志变成积极的具体行动，以粉碎英、美战争挑拨者的各种计划和措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反战运动的全部历史经验，都证明单是愿意和平还不够，应该积极地为和平而斗争，应该运用一切力量和必要的手段来抵抗那些准备战争和发动战争的举动。

在新的战争危险日益加紧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担负着伟大的历史责任。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运用一切斗争的手段来保证巩固持久的和平，使自己的全部活动都服从于目前这一中心任务。

必须更加坚决地巩固和扩大和平运动，要接连不断地把一批一批的人民群众吸收到这一运动中来，要把这一运动变当代不可战胜的全民运动。这一运动能够并且应该不问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及党派，而把所有一切珍视和平，珍视本国荣誉、自由和独立地位的人们包容进来。

必须特别努力设法把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合作社组织、体育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宗教组织等等以及一切主张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学者、作家、新闻记者、文化工作者、国会议员及其他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吸收到和平运动中来。

为了进一步开展和平运动，工人阶级更加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其队伍的统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头等任务，就是要把工人阶级最广泛的阶层吸收到和平战士的队伍中来，建立工人阶级巩固的统一，坚决反对那些分裂和瓦解工人运动的右翼社会党人，在为和平与本国民族独立

而奋斗的共同行动纲领的基础上，组织无产阶级中各种队伍的联合行动。

在反对战争挑拨者和保卫和平的战士阵营中，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已经占有光荣的地位。世界工会联合会是和平与国际合作的积极捍卫者，是千百万工人和职员去进行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组织者。加入世界工联的各国工会中央机关在组织和平拥护者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在许多国家中它们是和平运动和建立该国全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倡导者。在组织抗议罢工和组织示威来反对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中，在组织全民请愿及其他群众性的措施来保卫和平与各国民族独立自由的事业中，工会占有主导的地位。

但是，工会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开展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全民斗争，使和平阵营更加积极行动起来。在这方面，各企业和各机关的保卫和平委员会能够成为而且应该成为工会活动的中心，而巴黎世界和平大会和米兰世界工会代表大会所号召建立的就是这样的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在法国、荷兰、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许多企业中都已经建立起来。保卫和平委员会应该不分民族，不分党派和工会会籍，而把一切工人和职员联合起来，以期成为争取各国全体劳动人民一致努力保卫和平、保卫民主及保卫受资本主义剥削的民众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心。

许许多多的事实，例如由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德国东部总共1100万妇女联名向联合国大会递交请愿书，表示拥护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和裁减大国军备的提案，例如各国妇女组织和世界民主妇联参加巴黎和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都证明妇女和妇女组织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具有很重大的作用。

全世界各国民主青年，在1948年华沙国际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以及1947和1949年两次国际青年联欢大会上，都显示了自己争取和平的意志，以及愿为和平而奋斗的决心。包括有6000万以

上青年男女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是和平事业的积极拥护者。

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一切群众社会团体争取和平的斗争，使其成为目标集中而能产生实效的斗争。

为了联合居民中最广泛的阶层参加保卫和平的斗争，就必须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方法，如群众示威，露天大会，群众集会，写请愿书和抗议书，举行民意测验，在城乡中建立保卫和平委员会等等，这些办法在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广泛采用。

当然，在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运用各种措施时，决不能千篇一律，必须从各个国家的具体条件出发，善于把运动中各种形式和方法与总的任务配合起来。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战争贩子在群众中没有支持力量，而总是用各种诽谤宣传手段来极力欺骗各国人民。因此，应该揭露战争贩子的伎俩，广泛地报道他们反人民活动的真实情况，这一工作不是临时性的，而要经常开展。

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广泛地宣传各国人民之间坚固持久的和平，不倦地揭发各种侵略联盟和军事政治联盟，以此来对抗侵略者及其所雇佣的文人墨客所进行的虚假和仇视人类的宣传。必须广泛地解释：假如新的战争爆发，就只会使各国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和破坏；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

和平力量，首先是各国的共产党，务必做到使帝国主义代理人宣传战争及鼓吹种族仇恨和民族敌视的行为，遭到全体民主人士的严厉谴责，使战争贩子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回击，这种回击可能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包括广泛抵制一切鼓吹战争的电影片、报纸、书籍、杂志、无线电广播公司、团体及人物。

准备新的战争与美帝国主义奴役欧洲及其他各洲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马歇尔计划，西欧联盟，北大西洋公约——所有这些危害和平的阴谋手段，同时也就是大西洋彼岸的垄断资本家套在其他国

家人民头上的锁链。

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职责，就是要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保卫和平的斗争结合起来，不断地揭露那些已经变为美帝国主义直接走狗的资产阶级政府所进行的背叛和卖国政策，要把每个国家内一切民主爱国分子统一和团结在这一口号周围：消灭甘受美国束缚的可耻政策，转而实行符合各国民族利益的独立的对外对内政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把捍卫本国民族独立自主的旗帜，高举在自己手中。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团结广大的群众，保卫民主权利和自由，坚持不懈地向他们解释，保卫和平是与保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联系的，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反贫困、反饥饿和反法西斯势力的斗争。

法国、意大利、英国、西德及其他各国的共产党负有特别重要的任务，因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想要利用这些国家的人民去充当炮灰以实现其侵略计划。这些国家共产党的职责，就是要用更大的努力开展斗争，坚决保卫和平以及粉碎英、美战争挑拨者的罪恶阴谋。

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苏联共产党的任务，除了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及其帮凶而外，同时还要为了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更加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阵营。

各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仍然是要彻底地揭露右翼社会党领袖。事态的进程完全证明了共产党第一次情报局会议对右翼社会党人所作的估计的正确性，当时认为右翼社会党人起着一种卑污不堪的作用，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新的战争挑拨者的帮凶，本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叛徒，借社会主义辞藻和世界主义空谈来掩盖自己的卑鄙活动。所以，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不倦地为保卫和平而斗争时，应该时时刻刻来揭露右翼社会党领袖的这些和平死敌的作用。

同时，必须全面地发展和巩固与各国社会党基层组织和党员群

众在保卫和平方面的行动上的合作和统一，支持这些国家党员群众中的一切真正忠诚的分子，向他们说明右翼反动领导人所执行的是极端有害的政策。

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把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特别是在中欧和东南欧实现侵略计划的重要角色，派给为帝国主义分子当间谍的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去担任，因此，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任务，要求更进一步地揭露这个已经叛逃到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死敌的阵营，即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阵营中去的匪帮。

*　　*　　*

同志们！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共产党曾经是全民抗战中的先锋队；在战后时期，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为本国人民切身利益、为全世界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先进战士。在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之下，一切反对新的战争的人，即团结在坚强的和平阵线内的劳动人民、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是能够粉碎帝国主义分子的罪恶阴谋的。

民主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较之反动势力要强大得多。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更加巩固和发展强大的和平运动，力求把这一运动变为全民运动，要不断提高各国人民的警惕性，以防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施行的阴谋诡计。必须动员各国人民的一切力量去积极保卫和平和进行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为全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的神圣斗争必定获得胜利的保证。

№11767

法、匈、捷、波代表团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发言记录

（1949年11月16日）

会议于18时开始，20时30分结束。

拉科西同志提议委托杜克洛同志主持本场会议。

提议被通过。

对苏斯洛夫同志报告的辩论发言

法戎同志指出，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完全同意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同意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党的全部活动必须服从保卫和平这一中心任务的结论。

帝国主义分子认为法国是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桥头堡和未来的炮灰。从按照华盛顿的命令把法共挤出政府之时起两年半的时间里，统治集团首先是右翼社会党的政策方针是让美帝国主义分子奴役法国。

在分析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后果时，法戎同志指出，法国成品出口减少，原料出口增加，许多企业倒闭。10月份登记失业人数达到43900人，1948年4月为12368人，455000工人每人每周劳动不足40个工时。当然，实际失业人数比这个数字还要高。从实施马歇尔计划以来，法郎贬值了2/3。

在思想领域，美国人为颠覆我国的民族精神而加紧活动，输入电影、报刊、书籍，在中小学实行所谓的“美国教学法”。在军事领域，由于政府加入了受“马歇尔计划”制约的侵略集团，如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军费开支加大了。军事负担因在越南进行罪恶性的战争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一战争的目的是保护法国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为战争贩子保留在东南亚的战略基地。

法戎同志说，法国所承受的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的负担，导致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者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在不久前召开的艾奇逊[①]、贝文、舒曼[②] 三国外长会议以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法国代表的行为表明，法国代表完全成了华盛顿意志的执行者，他们同意从 12 月 15 日起取消对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国家进口的某些限制措施。因此，为德国和美国商品进入法国大开了方便之门，其必然结果是失业人数增长，法国农民破产。法国当权者已公开声明同以反动和复仇立场著称的西德傀儡当局建立关系。同时，法国当局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视为敌人，尽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和平，承认纳粹德国在法国和其他人民面前犯下的罪行，并表示要赎罪。

法国当权者同意重新武装德国侵略者和恢复他们的军事潜力。法戎同志指出，这一叛卖和战争政策，不是法国反动派有力量的标志：我国当权者倾向于把这一政策看成是反对反帝和民主阵营在全世界和法国取得明显成绩的惟一手段。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国形势有利于和平斗争的发展。

法国广大居民对于在美国指导下德国军国主义在波恩伪共和国的复活反应强烈。他们对拒绝赔款和拒绝保证安全、对荒谬绝伦地同屠杀法国爱国者的刽子手联盟——即旨在反对斯大林格勒英雄们的联盟义愤填膺。从总的情况看，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贫困同

① 迪恩·艾奇逊，自 1949 年起担任美国国务卿。

② 罗伯特·舒曼，1947～1948 年期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自 1948 年起担任法国外交部部长。

准备战争的政策之间，争取生存的斗争同争取民族独立和和平的斗争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明显。因此，共产党员团结一切和平拥护者的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法戎同志接着分析了法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开展政治斗争的一些基本问题。他指出，法共把主要力量用于发展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阵营的领导力量——苏联无条件团结的感情。在这方面，法戎同志提起了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在1948年9月30日通过的著名宣言，其中宣布法国人民永远不同苏联作战。1949年2月22日在党中央会议上，莫·多列士以斯大林的和平政策同法国政府参与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结果相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法国人民在“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参加反苏战争，以及苏军因此为捍卫人民的事业即社会主义事业、为追击侵略者而踏上法国领土的情况下”的立场。两天之后，法共总书记在国民大会讲坛上向全国重申并发挥了自己的声明。

法戎同志说，从这时起，法国共产党广泛宣传这些声明的基本原则，这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共产党坚决指出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同志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领导作用。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下了很大力量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对和平和保卫和平的问题估计不足。多列士在今年（1949年）2月色当省共产主义联合会会议上讲话时提醒全党注意这个问题。在多列士这一讲话之后，直到目前，展开了广泛的宣传运动，旨在使全党和工人阶级坚信和平和保卫和平问题是当前的关键问题。

法戎同志继续说，我党中央帮助一些工会积极分子避免了“经济主义”倾向，这些同志认为既然争取现实要求的斗争同争取和平的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工会主要是通过争取现实要求的斗争帮助维护和平的斗争（从正确的原则中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部分同志中存在这种认识，导致了工会没有

充分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

然后党确定了有效地开展争取和平斗争的条件。一方面，党反对自己队伍中的派别之争，不分政治观点和信仰，吸引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另一方面，党又号召工人阶级进行具体的活动以反对战争贩子。例如，在军工厂开展斗争反对生产武器，主张把这些企业变成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

最后，党系统地向群众解释两个阵营的斗争问题，指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作的努力，揭露帝国主义分子计划的实质以及法国政府和右翼社会党领袖所贯彻的出卖政策和战争政策。在这方面，我们使用了各种宣传手段和议会讲坛。

法戎同志接着分析了党对群众争取和平斗争的领导。他指出了1948年12月28日在巴黎召开的全国和平和自由卫士代表大会，大会把各方面和各流派的民主代表联合到了一起，如法奇、布利耶这样一些代表；高级将领佩季和海军元帅米捷利耶；司法机关的代表如法官吉季耶和检察长杜勃斯特。大会通过了全法自由和和平运动宪章，决定在全国最基层行政单位——公社选举成立争取和平和自由斗争委员会。法戎同志说，应该指出，这个任务仅部分地完成了。就公社委员会的数量和活动而言，在这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不符合争取和平斗争的要求。

1949年4月巴黎国际和平大会的召开使法国的和平运动有了大规模的发展。随着大会的准备，各种争取和平和自由的组织、法国妇女联盟、总工会、争取和平和自由的自由职业者及其他组织的临时联系委员会开展了规模很大的运动。为支持大会，很多工厂举行了统一的游行示威。在不少地方，属于不同党派的公社委员会的委员们在其决议里表达了祝大会成功的愿望。政治活动家，如人民共和运动代表——市长蒙杰佩里耶，以及一些著名的科学、文学和艺术活动家参加了大会。在这方面，我们最薄弱的工作环节是农

村。出席国际和平大会的农民代表最少。

法戎同志提到，为祝贺国际和平大会的召开，在巴黎布法洛体育场召开了50万人的大会，法国很多省组织了涌向巴黎的和平游行。和平大会之后，兴起了广泛的抗议国会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的运动。2月27日，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战士民族委员会给杜鲁门寄去了一封信，其中声明说：法国人民不认为这一公约对自己有约束力，他们不参加这一公约所准备的战争。5月18日，该信征集到100万人签名，毫无疑问，这一数字是不完全的。各工厂举行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示威游行和短时间的罢工，天主教工会成员参加了这些活动。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战士公社委员会给议会议员写了信、请愿书和抗议书。但是同北大西洋公约的重要性相比，这些行动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国会不顾我们议会党团的坚决反对，批准了该公约。

法戎同志说，尽管如此，当美国布雷德利将军在国会批准北大西洋公约之后几天来到巴黎时，他就会确信，在国会批准公约和人民支持战争之间还有很大距离。法戎同志讲述了在巴黎大街上举行的盛大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不顾警察暴力和逮捕，从美国大使馆门前通过。

在分析反对在越南进行战争的斗争时，法戎同志指出，近几年这一斗争加剧了。在这个问题上，党采取了下述立场：立即停止战争，声援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殖民地战争特别不受全国百姓的欢迎。从6月开始，许多港口拒绝为驶往印度支那的船只装载。这一行动是从国外传入法国的，该倡议属于阿尔及利亚的码头工人。这些行动席卷了法国各港口：敦刻尔克，波尔多，拉罗谢尔，马赛，巴斯蒂亚。

法共在陆海军中的工作开始收到成效。9月26日，“迪克斯迈德”号航空母舰乘务组以拒绝工作来抗议把16名乘务员派往印度

支那。因拒绝去印度支那，许多战士被投入监狱。反抗常常带有个人的形式。不满情绪甚至渗透到宪兵和共和国近卫军。许多宪兵和共和国近卫军成员因拒绝开赴印度支那被送上军事法庭。越南地下报刊登载了站在解放军行列里作战的法国士兵的信。

法戎同志说，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斗争是民主青年活动的基本任务之一。从1949年1～5月期间，在要求停止战争的信上签名的已超过50多万青年。这方面法国妇女联盟的积极性最高。在北部省戴艾，印度支那阵亡战士的母亲们要求工人们停止生产武器。在敦刻尔克，母亲们呼吁码头工人拒绝给开赴印度支那的轮船装货。9月30日，由印度支那阵亡士兵的母亲400人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巴黎军事部长拉马迪埃那里，他不但不接待她们，反而令儒勒·莫克[①] 派警察部队驱赶她们。

需要指出，印度支那远征军遇到的困难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领导人士之间现在经常谈论需要“休战”，以调整力量。

法戎同志指出，尽管这些游行示威十分重要，但至今法共也未能发动可以迫使政府让步的全民运动。

在谈到法国开展保卫和平的斗争时，法戎同志列举了以下最重要的事实：为庆祝国际妇女节妇女们所举行的活动，组织在和平簿上签名，为参加布达佩斯联欢节青年们的准备活动，为出席弗罗茨瓦夫大会知识分子们的活动。然后法戎同志指出了因10月2日国际和平节法国开展的和平投票运动的伟大意义。为更多地征集对和平的投票使用了各种方法。许多企业成立了保卫和平委员会或和平投票组。在市场上，积极分子，尤其是妇女呼吁居民们为和平而投票。逐门逐户征集签名，利用体育场和运动组织征集签名。应该指出，许多天主教徒不顾梵蒂冈的禁令，积极地参加了所有这些活

① 儒勒·莫克，法国内务部部长。

动。至目前征集到700万张赞成票。对这一数字法共感到不满，它表明了保卫和平运动的一个主要薄弱环节。凡政治工作做得比较好和投票组织得好的地方都取得了好的结果。在“雷诺”工厂，95%的人员投票赞成和平。在一些农村所有居民都参加了和平投票。在这样的条件下，投和平赞成票的只有700万，这意味着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得不够。这表明，维护和平运动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展开。

不过应该指出，这一运动遇到了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激烈反抗。在这方面法戎同志列举了许多事实：许多主张反对新战争的民主报刊受到指控，维护和平的战士受到审判和被剥夺公民权利，出于同一原因一些市长被免职，几十次要求调查共产党员代表，进行威胁和施加压力，直至使用暴力，对参加游行示威和其他维护和平活动的人进行政治迫害。

法戎同志继续说，在思想领域，敌人也展开了积极的活动。敌人企图利用某些居民的个人倾向分裂和平爱好者，利用和平主义，利用加里·戴维斯之类的人，组织“和平日”，甚至召开反和平大会，以此赢得右翼社会党人、托洛茨基分子和某些资产阶级假民主主义者的积极支持。组织类似克拉夫琴科诉讼案[①]的公开挑衅，利用电台和报刊，在群众中大量散布帝国主义思想，吹捧美国，为希特勒的将军们恢复名誉，攻击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敌人的这些活动近来达到了顶点。揭露铁托叛徒集团的本质和作用，审判拉

① 1949年1～3月，在巴黎的苏联移民、《我选择了自由》（1947年）一书作者B.A.克拉夫琴科对法国共产党的周刊《法兰西文学》提出指控。起诉的原因是《法兰西文学》周刊用假名刊登了一篇文章，在该文章中确定说，克拉夫琴科在书中对苏联镇压制度的揭露是谎言，而克拉夫琴科本人是叛徒，是道德败坏的人，把自己出卖给美国的特工机关，而且是冒名顶替的人，并不是真正的作者。克拉夫琴科在指控《法兰西文学》周刊对其中伤以及给其名誉和尊严带来损失的诉讼案中胜诉。

伊克和其他帝国主义间谍，使他们的法国庇护者们更加疯狂。帝国主义报刊的诽谤活动旨在把和平阵营里的动摇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中某些所谓的“左倾”人士吸引到自己这边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孤立共产党员，然后狠狠地打击他们。

不久前，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战士民族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反对铁托集团的决议，这表明敌人对和平捍卫者的阵线没有造成严重破坏。

提到目前党的任务，法戎同志指出，苏斯洛夫的报告给和平拥护者运动以真正的援助，帮助这一运动成为真正的全民运动，帮助它运用所有手段和形式，以便把要求和平的群众的意志变成具体的行动。

法戎同志列举了和平拥护者运动目前应解决的一些主要任务：

1. 需要使保卫和平运动涵盖全国。在这方面，准备开展两周和平运动——支持核武器不受法律保护和削减军备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拟在明年1月开展的这一运动应帮助巩固和平投票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并把它们推广到全法国。

2. 为了发扬游行示威和和平宣传取得的成绩，需要强调，必须加强反战的实际行动，组织工人反对武器生产，在法国和印度支那组织士兵和水手的集体行动，反对在越南进行战争。

3. 必须改变工人社会党员参加共同争取和平的斗争不得力的情况。为此，必须加强反对右翼社会党政策和思想的斗争，同时在劳动者社会党员中加强宣传工作，排除一切宗派活动。

4. 和平拥护者运动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作为历史事件和巩固欧洲和平的重要因素的意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是对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德国、把它作为反对苏联、反对人民自由的一种军事力量计划的沉重打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大扩大了欧洲的和平和民主阵营。必须向法国人民指出，反对美帝国

主义复活的反动的德国军国主义的斗争是同和民主德国结成兄弟联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5. 法共把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组织维护和平的斗争看成自己的职责。必须根除我们队伍中时而出现的错误意见和倾向。必须同一些人的幻想——认为苏联的强大使其他国家维护和平的努力变得无关紧要——作斗争。必须同那些遭到敌人压力而放弃同苏联无条件团结、放弃承认苏联在一切领域，其中包括在科学和进步思想领域的领导作用的人作斗争，反对他们的动摇和不坚定。宗派活动是和平拥护者统一和团结的主要障碍。

在结束发言时法戎同志指出了在最近法共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挽救民族的纲领，其基本条款是阐述争取法国独立和贯彻法国维护和平政策的条件。法共充满信心，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和解释这一纲领，以便把工人阶级和主要的劳动群众动员起来，团结在法共周围。

法国共产党为完全改变法国政策，为建立与全体人民一起站在反帝、民主阵营一边的民主统一的政府而奋斗。法国共产党在全体兄弟党面前重申自己以法国人民的名义所承担的庄严义务：法国人民不会并且永远也不会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如果帝国主义分子胆敢发动罪恶的战争，法国人民将尽一切努力使这场战争变成埋葬法国和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坟墓。

法戎同志最后说，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重申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共产党的责任。各兄弟党完全可以相信，法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这一责任。

拉科西同志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的名义声明完全同意苏斯洛夫同志在报告中阐明的政治路线。匈牙利代表团同意，保卫和平是目前形势下的中心问题，尽管和平力量在不断增长，而战争危

险并没有减少。

然后，拉科西同志简要叙述了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拉科西同志说，最近两年来，人民民主制度不断得到巩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应将这一成绩归功于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斗争。匈牙利劳动人民从两次世界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这首先表现在匈牙利劳动人民积极支持一切保卫和平的运动。我们之所以能取得政治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应感谢劳动人民把我们看做是最彻底的和平卫士。争取和平的斗争为我们开辟了把妇女，尤其是农民吸引到我们这边来的途径。

人民民主制度和我们党的成绩既表现在政治方面，又表现在经济方面。这反映在，目前的工业生产额超过战前最后一年生产额的35%。对我们也有重要意义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至少也得到了同样程度的提高。根据我们的经验，大概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巩固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普通群众衡量我党政策正确与否，首先是根据自己状况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来判断的。无疑，这里面有很大的真理成分，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发扬成绩的政治因素。

拉科西同志说，除经济成绩外，对劳动者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也很重要。例如，认购五年计划国债的已有250万人，其中农民占很大比重。参观苏联画展的已达21.6万人。在匈牙利的条件下，这是很不平常的，它不仅表明对苏联生产工艺的兴趣增长，而且表明有多么广大的群众对此感兴趣，这在旧匈牙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拉科西同志接着分析了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宣传工作的错误。他说，帝国主义者的企图之一是引起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恐慌。我们曾几次努力克服这种恐慌，但我们没有充分强调这种现象的某些危

险性，对这些现象的存在和它们的影响应给予充分注意。应该制定出有效的斗争方略，杜绝敌人在人民群众中散布战争恐慌的可能性。

我们还经常有这种情况，没有把和平宣传和保卫和平的社会斗争放在首位，认为我们和平的主要保卫者是国家和现在掌握在劳动者手中的国家武装机关。

与此相联系，还经常碰到一种意见，即认为宣传和平是准备发动战争的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所有国家劳动者的任务。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和平捍卫者及社会主义建设者阵营和帝国主义者阵营。和平事业是共同的事业，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应该反对所有不利于保卫和平斗争的观点。我们这里还有和平主义者。这些和平主义者绝对地反对战争。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现在的条件下不是绝对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发动的战争。这种和平主义尤其表现在，我们部分年轻人不愿参军。这同政治水平落后有关。拉科西同志说，我国劳动人民掌握政权才2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已经习惯于国家和军队是他们的敌人。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们不能使我们的人民充分理解新的爱国主义及其相关的东西。

由于建设新的军队，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认为军队对我们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苏联保卫着我们。我们已经克服了这种观点。匈牙利共产党员和与他们在一起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已经明白，在这方面应表现出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但尽管如此，部分领导国家经济活动的同志还有尽量少为建设军队拨款的倾向。这些同志不明白，一支好的军队也是保卫和平事业的巨大因素。

然后拉科西同志谈到了布达佩斯对拉伊克的审判。拉伊克审判在我国的影响暂时还难以完全评价，因为事情才过去两个月。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它触动了全体劳动人民，唤起了人

民的警惕性，揭示了帝国主义的计划。拉伊克案件加强了党的团结，使党在政治上更加警惕，更加成熟，提高了党的威信。这里所说的不是泛指帝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分子反对匈牙利民主制度、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反对苏联的具体的秘密计划。毫不夸大地说，全国人民都密切关注了电台广播和报刊登载的这一诉讼过程。关于拉伊克匪帮的诉讼材料出了单行本，印数达 10 万册，在几天时间里便销售一空。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拉伊克案件教训的报告，也出版了单行本，印数40 万册，没有几天也销售一空。这一切都表明，群众多么关注这一诉讼案件。

谈到拉伊克案件的教训时，拉科西同志强调指出，教训之一是不能容忍自由主义，不能对违反党性的行为采取宽容的态度。我们以前也注意到阴谋者的某些行为，并且探究了这些行为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考虑到我们是在同敌人打交道。从这时起，我们学会了，凡是党或民主制度发生困难的地方，都需要考虑，除客观原因外，是否有敌人作祟。

另一个教训是，对待苏联的态度是检验领导者和共产党员是否忠诚的试金石。自然，敌人也伪装自己，假装对苏联忠诚，但我们的经验表明，这迟早会败露。拉伊克匪帮一个重要的可疑特征是对苏联的态度不确定。审判拉伊克之后，我们在评价每个同志时，都将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拉科西同志谈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对待社会民主党左翼的经验。从保障人民民主国家大多数党的统一的观点看（这些党或多或少都有大批左翼社会民主党党员加入），这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一部分自愿地真心地同我们工作，但也暴露出，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奉敌人指示而加入我们党的。在一份

没有公布的供词里，尤斯图斯·帕尔[①] 说，他从拉斯基[②] 那里收到了英国工党的指示。拉斯基对尤斯图斯宣称，在人民民主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只能借助于“左的口号”才可以带领群众跟自己走，所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应以“左的”词句带领群众跟随自己，才可以继续阻止以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统一的形式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假如共产党争夺社会民主党的群众，这时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尤其是“左翼”领导人，应该大批加入共产党并占据其领导位置，并注意在合并之后使社会民主党以组织或派别的形式继续存在。现在我们党内部分所谓“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正在遵循这一指示行事。

根据自身经验，我们肯定苏斯洛夫同志报告中所说是正确的：尽管帝国主义正在衰落而和平阵营正在巩固，但战争危险依然存在。对于我们来说，军事危险首先来自铁托的南斯拉夫。对南斯拉夫的叛徒当局，我们已进行了充分的有根据的揭露。尽管如此，我们看到，他们仍在准备战争。今年秋天，他们没有复原超期服役的战士，而且进行了例行征兵。因此，现在毫无疑问，这是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办的。南斯拉夫现在有武装士兵60万人。

在结束发言时，拉科西同志提到了组建新军队时的一个教训。在组建我们民主主义军队时曾企图使用原霍尔蒂军队的军官，但我们发现，这些军官的大部分或者是公开的敌人，或者是怠工者，他们尽量又慢又少地传授自己的知识。幸运的是，我们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在这方面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

我们认为，苏斯洛夫同志在报告中给我们阐明的路线是正确

① 尤斯图斯·帕尔，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活动家之一，拥护与共产党联合，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之后当选为中央委员，因“拉伊克案件”受到指控，并被判处监禁。

② 哈罗德·拉斯基，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的，我们支持这一政治路线。我们工作中的切身经验证明这一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努力进一步顺利地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者阵线而斗争，牢牢地巩固这一战线交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守卫的地段。

斯兰斯基同志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的名义表示完全赞同苏斯洛夫同志在报告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深刻而正确的评价，完全赞同报告中提出的捍卫和平和反对新战争贩子的任务。

斯兰斯基同志说，我们现在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是在另一种比二战前优越得多的条件下进行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增长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和平阵营的领导力量和最强大的力量是苏联。苏联政府彻底而坚定的和平政策为和平事业建立了伟大的功绩。苏联政府关于禁止核武器、限制军备的建议，关于各国和平合作的建议，关于实现波茨坦有关德国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协定的建议，在亿万群众中引起了强大反响。以往任何时候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计划也没能团结和动员如此众多的群众。苏联的和平政策和亿万群众争取和平的斗争成了揭露战争贩子和阻止他们实现其战争计划的强大的国际因素。

吸取了慕尼黑教训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在为和平而斗争。慕尼黑背叛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明，争取和平的斗争同时也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斯兰斯基同志说，慕尼黑背叛还向我国人民表明，我国民族独立最可靠的保障是苏联，保障我国主权同巩固与苏联的亲密联盟和兄弟合作，同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建立新的民主德国是苏联为实现德国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而坚决斗争的结果，它对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具有特殊的意义。

千余年来，日耳曼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占领者先后给捷克人民的生存带来了威胁，他们进攻和压迫捷克人民。在数百年的时间里捷克的政策中心就是所谓的“德国危险”。而现在，千余年来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另一个德国——新德国，在那里掌权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它没有也不可能有占领意图。在二战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处于德国的胁迫之下。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和外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是我们已成为与我们结成联盟的和兄弟的苏联，以及与我们结成联盟的人民民主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邻邦，在与它们的关系中，我们解决了所有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解决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感情正在增长，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共和国是建立在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斯兰斯基同志说，我们知道，尽管争取和平的国际斗争取得了成绩，但帝国主义分子还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他们的军事计划。和平阵营的增长和经济危机的到来将促使帝国主义分子加紧备战。

英、美战争贩子们感到非常不满的是，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所以帝国主义阵营削弱了，在中欧和东南欧出现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它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帝国主义分子企图重新使我们这些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样，把这些国家变成他们反对苏联、进行军事冒险的基地。

捷克斯洛伐克每天都是帝国主义分子卑鄙企图——千方百计破坏我们和平奠基工作的目标。我国人民1948年2月的胜利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梦想：借助在此之前他们在我们最高权力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代表的合法地位，在我国重建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所以在2月以后，帝国主义分子更加疯狂地对我国实行敌对政策，努力组织暴乱、怠工、间谍和破坏活动，想以此颠覆我们的制度。

在我们拒绝马歇尔计划之后，英国和美国资本家开始在经济上对我们进行抵抗和歧视。但苏联无私和有效的援助以及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使我们克服了困难，尽管有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歧视措施，我国经济还是在顺利发展，我国工人阶级还是顺利地完成着自己的生产任务。

英、美帝国主义者无耻地干涉我国的内政，同时粗暴践踏一切国际准则。我们不断揭露英、美外交代表，他们搞间谍、怠工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活动。仅今年我们就揭露和粉碎了三起暴乱的企图，同时完全证实，这三起反国家的暴乱小组都得到了美国或英国大使馆的指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每天我们都要抓获各种恐怖分子、间谍和怠工分子，他们都受过美国和英国人的专门训练，然后受命返回我们国家从事犯罪活动。

最近我们破获了一个很大的专门从事间谍和怠工活动的原民族社会党（贝奈斯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的非法集团。原来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招募的部分间谍和怠工分子是由南斯拉夫侦察机关的间谍领导的。因此，我们便获得了直接的证据，正如拉伊克案件表明的，英、美和南斯拉夫间谍到处都在紧密地合作。

苏联在自己的照会里指出了铁托反革命集团的叛徒面目，揭露帝国主义间谍的危险性，这是对和平事业的伟大贡献。苏联指出了铁托及其集团是英、美战争贩子们的间谍。拉伊克诉讼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帮了我们的忙，这一案件揭穿了铁托的面目，说明这个为英、美战争计划服务的头号间谍企图使人民民主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而转入帝国主义阵营。

斯兰斯基同志强调说，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联共（布）和斯大林同志多么具有远见卓识，还在去年第二次情报局会议上就向我们指出，铁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公开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我们明白，铁托集团是最危险的间谍和叛徒的集团。

铁托集团的冒险目标并不只限于南斯拉夫。这个为战争贩子效劳的反革命集团努力使自己的间谍打入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以便从内部颠覆它们。在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在各个工作环节都揭露出了铁托的间谍。为了加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必须加大思想工作力度，解释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害性；为了揭露所有帝国主义间谍和从党的队伍中肃清他们，必须提高全党的布尔什维克警惕性。

斯兰斯基同志接着说，天主教会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反对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具，我们正在同他们开展激烈的斗争。[①] 我们知道，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既不是轻松的，也不是短时

① 修改记录时删掉了斯兰斯基讲话时的如下段落："根据梵蒂冈的指示，特别是在1948年2月反动派遭到失败之后，天主教的主教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国家的运动。在这次运动过程中，以贝兰为首的天主教领导人转向了公开进攻和挑唆反对共和国，其目的是在天主教教徒的广泛阶层中，主要是在农村的各州引起骚乱。但是教会的计划没有成功。我们向人民表明，那些试图在人民中引起骚乱的主教们，是为共和国外部的敌人进行工作的。教皇关于脱离教会的法令更加清楚地表明，教会领导人为在我们国家里实现反对国家、反对民主的意图而滥用宗教信仰。当教会领导人在一些场合下企图实施教皇关于脱离教会的法令时，我们对此的反应是，对于执行这个法令的神职人员，将判处8～10年的监禁。这样一来，其余的神职人员也就失去了重复这种尝试的兴趣。我们还取缔了所有的教会学校，停止了一切教会刊物的出版，派自己的全权代表进驻教会机关，逐渐消灭作为外国间谍活动中心的修道院。主教们没能成功地破坏我们人民的团结统一，没能成功地分裂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团结统一。正相反，我们却非常成功地揭露了这些主教，在天主教教徒中孤立了他们，使他们孤立于宗教界下层的绝大多数教徒。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关于对教会提供物质保证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提高了神职人员的薪水，这笔支出由国家承担，这样一来可以使神职人员不依赖于教会的主教们。新法令还规定，只有那些对国家持拥护态度的神职人员，才能得到国家发放的薪水。这个法令还使国家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任命各个级别的神职人员。如果说在公布这个法令之前，主教们给神职人员下达了不接受国家的薪水以及不承诺对国家忠诚的命令的话，那么在法令公布之后，他们不得不同意这些内容，因为他们懂得，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会拒绝服从他们。主教们开展了反对关于国家有权任命神职人员的新法令的运动，并继续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但是他们的影响已经降低了。"

的。但我们还知道，最终我们将顺利地击败和消灭反动派的这一有力支持者。

在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反动走狗的斗争中，我国人民坚信，只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和依靠苏联的劳动人民可以保障我国的独立。侨居国外的和国内的出卖人民利益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早就放弃了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思想，他们知道，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借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冒险的军事计划。反动派接受了帝国主义欧洲联邦的概念，在这一联邦里，捷克斯洛伐克将肢解，某些部分将变成帝国主义分子的殖民地。所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保卫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同时也是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所有阶层中都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在巴黎和布拉格和平大会期间及其以后，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动员，在工厂和农村劳动者、工会组织、妇女和青年组织、合作社、教会组织、知识分子当中，兴起了空前的拥护和平的运动。仅一个“和平周”，在工厂和农村就召开了 10600 次大会，参加者近 300 万人。和平运动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拥护者委员会为首，该委员会出版了《和平报》。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保卫和平和保障我国独立的斗争同进一步加强和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32 周年之际和捷克斯洛伐克 - 苏联友好旬期间（11 月 1～10 日）进行的隆重的庆祝活动，深刻地表达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苏联的爱戴和忠心。在此期间，捷苏友好协会吸收了 120 万新会员，现在达到 180 万人。在庆祝斯大林同志 70 诞辰的祝贺信上签名的，至 11 月 14 日，已达 650 万人。因此，这一运动已变成对同苏友好和同意苏联和平政策的全民表决。参加俄语学习小组的已超过 15 万人。学习俄语伴随着这样的口号：苏联是我们建设社会

主义的老师，而俄语是进步的语言——帮助我们天天直接地向苏联学习如何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此外，在所有小学，从二年级起便学习俄语。

斯兰斯基同志继续说，我们党为解释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关于南共形势的决议在自己队伍里做了大量工作，指出我们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在苏联帮助下才有保障。同时承认以前曾出现过各种错误的表述方式，这些表述方式掩盖了通往社会主义只有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条道路。[①] 布尔什维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我们在所有基本原则上都是适用的。加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今天首先在于，应进一步意识到我们的利益和命运同苏联的利益和命运是一致的，应进一步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学习联共（布）的经验。对待苏联的态度——这对于每一名共产党员和每一名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爱国者来说，都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加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首先要靠使党员更好地了解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学说。我们党开始出版斯大林同志的选集：捷克文版20万册，斯洛伐克文版5万册。我们组织“党学习年”活动，所有党员都参加学习，目的是提高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水平。

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加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斗争需要在布尔什维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每日每时地进行，尤其是在出现思想动摇、党的队伍里出现同我们格格不入的思想的地方。我们清楚地记得布尔什维克的指示：如果我们不同党内出现的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思想作斗争，如果我们不克服这些思想或者不能克服这些

① 在斯兰斯基发言中这句话原是：“1945年在我们这里出现了关于所谓捷克斯洛伐克式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很清楚，这些表述方式掩盖了……”。

思想，我们便不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和有力地打击阶级敌人。

斯兰斯基同志说，迄今为止，我们党的弱点是广大党员对阶级敌人的反抗估计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敌人拼命把自己的间谍塞到党内来，进行颠覆活动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由于对阶级敌人估计不足，结果党员未充分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仅口头上说必须提高警惕性是不够的。提高警惕性需要在实践中每日每时检验干部政策，需要善于了解这些干部和经常考验他们，需要及时消除不可靠的、异己的和敌对的分子。

在部队军官中，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在揭露敌人的间谍。经验告诉我们，除个别人外，我们应以新人取代全部旧军官，所以应多开学习班和学校，应从工人和劳动农民中培养出众多的新军官。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一个最重要环节就是继续巩固我们的经济，因为战争贩子们企图阻止我们的经济建设。

斯兰斯基随后指出，如果国内外反动派的一切敌对企图已经统统破产，反动派的基础正在日益缩小，那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的经济在政策上和管理上得到巩固的结果，是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排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因素残余的结果。

国内外反动派曾经预言，拒绝马歇尔计划将导致我们五年计划的破产、国家财政的瘫痪、对外贸易的停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在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基础上，我们正在完成和超额完成我们的生产计划。人民生活水平正在提高。我们取消了面包和一切食品的凭卡供应，而价格依旧。同时，我们对许多工业日用品、肉类和其他食品也实行了自由市场买卖。最近一年，私人零售贸易额下降到25%，而相应的合作社和国家成分达到75%。

农村实行了农产品国家定购，同时保留多余粮食自由出售的权利。捷克斯洛伐克现有450个农民合作社，按照统一计划进行农田

的共同耕作。所有地区都有国家农机站。公有养猪场生产了全国所需猪肉的近30%。但我们知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们最国难的问题。我们正在进行严格的政治、组织和技术训练，但愿这一任务能顺利完成。我们教育党和党员不要害怕困难，要善于克服它们。

在结束发言时，斯兰斯基说，依靠伟大的苏联，坚定地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我们将进一步巩固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无情地消灭敌人的一切破坏企图，从而使我国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顺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我们将以此极大地促进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

贝尔曼同志说，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变化有利于以伟大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作了详尽的分析。波兰代表团完全同意苏斯洛夫同志报告中提出的任务，波兰代表团想简要地向同志们介绍一下在反对战争贩子前线的波兰战线上工作和斗争的一些结果。

贝尔曼同志说，“我国所取得的结果，同苏联的巨大成绩，和它对人民民主波兰的全面援助，同最近一年来波苏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巩固密不可分”。

贝尔曼同志指出，波兰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由于统一的波兰的工人阶级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之下对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实施了坚决的进攻。这一进攻削弱了战争贩子及其走狗在波兰搞阴谋的基础，并戳穿了他们的一系列阴谋。这一进攻之所以可能，仅仅是粉碎了党内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以及波兰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结果。在这一斗争中，完全确定了波兰的人民民主主义特征，并巩固了它的独立。在同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同联共（布）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波兰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49年4月合并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继续扩大和巩固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

贝尔曼同志指出，在贝鲁特[①]同志的报告中，对党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批判性总结，并强调指出，“由于波兰在反帝阵线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波兰拥有2500万居民和有觉悟的、热爱劳动的工人阶级，煤炭、锌等矿藏大量开采，冶金和机械制造业飞速发展，机车车辆生产发达，农业生产正在发展，交通干线已经建立”，波兰党和工人阶级肩上的担子加重了。贝尔曼同志说，我们党由于坚定地贯彻排挤和孤立敌对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的路线，从而大大改变了波兰的阶级力量对比，使其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加强了工人阶级在顺利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职能的人民民主制度中的领导作用。

这些变化首先是在国家迅速工业化、提前完成三年计划的基础上实现的。工业产量与战前相比，增长了75%，按人均计算是1938年的2.5倍。1938年雇佣工人（不含农业工人）占居民的18.2%，而1949年占到全体居民的35.9%。1946年底，波兰有工人和职员271.7万人，到1949年上半年底又增加100多万人，达到382.6万人，即增长了41%。无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增长大大加强了它的力量和对劳动农民的影响。

下面事实可以说明波兰社会的深刻变化：如果说1938年全国农业人口占64.5%，那么到1949年，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51.6%。

在工业和批发贸易中，波兰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成分。在零售贸易中排挤资本主义成分的速度也加快了。

党内粉碎哥穆尔卡集团之后，人民民主制度的巩固，社会主义

① 贝鲁特·波列斯瓦夫，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波兰总统。

工业化的成绩和党保护劳动农民的坚定方针导致了工人阶级同贫、中农联盟的巩固，加速了限制和孤立富农的进程，使我们建起了第一批2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贯彻农业集体化原则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这样，在农村大大缩小了战争挑拨者们搞阴谋的基础，为吸引新劳动者阶层参加保卫和平的斗争创造了可能。

彻底限制和排挤资本主义成分，以及削减敌对政治力量（宗教、反动地下组织、反革命集团）引起了波兰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

英、美战争贩子的间谍机构以及它的辅助侦察机关（南斯拉夫、法国、以色列侦察机关）疯狂地试图加强自己的活动。他们利用了自己官方代办处的大批人员，其中有的在波兰已工作几十年。

他们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是以往众多的所谓慈善机构（首先是美国人的），如公谊会教徒、卫斯理教派、红十字会、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等等，这些机构已停止活动，它们的代表和随从人员多数已离开波兰。

我们已采取了限制这些机构一切宣传活动的措施。例如，1949年没收了35500份美国期刊，大大削减了美国电影和报纸的数量。阻止了利用各种教派进行间谍和破坏活动的阴谋。

美国人的一个典型阴谋是：企图在原有居民中，即西部过去被德意志化了的波兰人中为自己建立基础。美国人和他们的走狗不遗余力地要使这些人转向西德，在西里西亚，在这些人中组织破坏和怠工集团，最近已经取缔了一部分这样的集团。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和随之进行的群众宣传运动，大大改变了原有居民的情绪，这对美国人的计划是一个沉重打击。

波兰公众社会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看成是对波兰安全的加强，看成是和平战士阵线的胜利。波兰公众社会理解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知道作为预备炮灰和法西斯复仇主义的后备力量，作为美帝国主义工具的西德是对和平事业和波兰的威胁，因此它将加强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这要求做深入的宣传工作。

贝尔曼同志说，关于同波兰的铁托代理人的斗争，波兰代表团在相应的日程讨论时将详细论及。但他强调指出，在卡托维兹，对铁托间谍米利奇·彼得罗维奇的审判表明，在著名的情报局决议之前很久，南斯拉夫驻波兰使馆就是间谍破坏工作的中心。

贝尔曼同志随后指出，最近几个月，波兰地下组织（大部分已被安全机关破获）遵照英、美侦察机关的指使，企图加紧自己的活动。重新出现了一些主要由富农子弟组成的反革命集团，恐怖行动、暗杀党的积极分子、抢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案件增多了。

贝尔曼同志列举了一些说明波兰同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数字。他说，1949 年头 10 个月，枪毙了 152 名匪徒，逮捕了 1989 人，缴获各种武器 7500 件。去年一年，在一些小城市共破获小型地下组织近几百个，它们主要是在中小学青年中搞颠覆活动。在高等学校里，由于挑选工农青年入学，那里的形势明显好转，敌人在那里失去了活动基础。

而工业企业，国家农场和交通运输部门里的怠工和破坏活动明显加剧了。在重大的破坏活动和颠覆活动中，贝尔曼同志指出了“罗基特尼察”矿井以及重新修复的埃尔布隆格重型机床厂主车间纵火案。

贝尔曼同志说，应该指出，尽管在加强工厂、矿山保卫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许多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里还存在着盲目乐观情绪，还存在麻痹大意。不久前公布的国家保密法，以及工业企业、交通运输的重组和加强，在同怠工和破坏活动作斗争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然后，贝尔曼同志分析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全面巩固国防、首先是加强军队和国防工业建设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在纯洁和从政治上加强部队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今年春天，解除了斯彼哈尔斯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在3天前结束的中央全会上，因对敌对分子在政治上划不清界线，他被开除出中央。

任命罗科索夫斯基[①]元帅为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不仅是进一步加强反对战争贩子斗争战线的重要步骤，而且是波兰与苏联之间友好和兄弟般情义的鲜明证明。

贝尔曼同志说，从弗罗茨瓦夫和平大会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扩大保卫和平运动方面取得了成绩。波兰保卫和平委员会把工会（370万会员）、农民互助协会（200万成员）、波兰青年联盟（110万成员）以及许多其他组织联合了起来。

在和平运动中，日益增长的波苏友好协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最近一年时间里，协会成员几乎增长了两倍，今天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已超过220多万人。

以保卫和平为口号的五一游行表明了维护和平运动的增长。参加游行集会的有950万人，其中农民人数大大增加了（1949年达到250万人，而1948年是110万），同去年相比，妇女（超过200万人）和青年参加游行的人数也增长了一倍。

通过希特勒进攻波兰十周年和国际和平斗争日两项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加强了保卫和平的运动。成立了省、县和市保卫和平战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还在许多大企业和机关里活动。

报刊和广播在开展争取和平运动和解释苏联在和平运动中的关

①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苏联元帅，1945～1949年任苏联驻波兰的北方集团军司令员；1949年波兰和苏联政府发布公告：已成为波兰军事领导人的罗科索夫斯基，系波兰人，被任命为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并被选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

键作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对农村的报刊 10 月份达到 250 万份，其中党的机关刊物《基本知识》高达 100 万份。

在劳动农民积极性增长的基础上，我们的报刊顺利地抵消了敌对的军事宣传。《女友》周刊在全国发行量的增加（180 万份）也表明了妇女积极性的增长。

波兰著名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越来越积极地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平运动还涵盖了天主教领域的大部分知识分子。

波兰统一工人党旨在瓦解敌对力量和吸引动摇人员的努力，在反对战争贩子的梵蒂冈代言人的斗争中收到了某些效果。天主教神职人员参加和平运动的人数不断增加。

贝尔曼同志说，在去年一年的时间里，波兰天主教的阵地严重地削弱了。人民民主国家大大削减了过去天主教得到的权利和特权，限制了天主教反动部分对群众的影响。最近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以下结果：由于政府颁布了信仰自由的法令，使梵蒂冈开除共产党员及其追随者天主教教籍的决定化为泡影。颁布了社会组织法，该法赋予国家全面监督所有天主教会、组织和团体的权利，这导致大部分这种组织自动解散，也大大限制了剩余组织的活动。集会法限制了宗教街头游行的机会。天主教组织被剥夺了所有大的印刷所。大大限制了天主教刊物的份数。天主教组织或僧团管理的大医院都转交国家管理。

使教会感到难以承受的严厉措施还有：对神职人员和天主教会财政的监督以及税收——税收是瓦解宗教和使基层信教人员反对上层神职人员的灵活工具。

教会企图通过上演宗教“奇事”（例如在卢布林和其他城市）引起宗教狂，但这些企图在信教人员和部分僧侣参与下被很快镇压下去了。对罪大恶极、被揭露参与盖世太保和反革命集团活动的神甫进行审判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同时，就国家和天主教会协定问题正同波兰主教团进行谈判。已向主教团提出要求：在政治上它应同梵蒂冈划清界限，坚决反对反革命集团和地下组织，最后，责成神甫们不要反对农村生产合作社。贝尔曼同志说，能否达成协议还很难预料，但谈判本身已导致天主教会进一步瓦解，导致越来越多的教徒支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贝尔曼同志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旨在揭露战争贩子宣传及其反对波兰活动的各项群众政治工作中，都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审判拉伊克－布兰科夫对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铁托集团的罪恶计划起了重要作用。这一审判所兴起的运动涵盖了广大劳动群众，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和警惕性。

最近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以尖锐的自我批评为标志，作为全党的中心任务，会议提出了全面提高警惕性的问题。全会揭露出这方面所存在的许多严重缺点，指出了克服这些缺点的途径。

贝尔曼同志说，在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和他们在我国的走狗的阴谋的斗争中，全会决议武装了全党。最近一年来的经验表明，加强警惕性和动员人民民主国家一切手段反对战争贩子及其走狗的斗争，只有在它们同群众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亿万群众被动员起来完成旨在瓦解战争贩子计划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线力量的具体的生产任务的时候，才能取得圆满结果。

在思想战线，正在加强反对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斗争。党第一次召开了全国生物学家、建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作曲家、作家和记者大会，这些大会将促使克服对帝国主义“文化”的卑躬屈膝。

波兰知识分子对苏联科学和文化的兴趣极大地增长了。在

“波－苏友好月”里，参加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周年大会和出席苏联戏剧和电影汇演的超过700万人，这表明贝鲁特同志宣布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口号——“同苏联的友谊，苏联的援助，苏联的榜样是我们力量的基本源泉”已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已同他们争取和平的积极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贝尔曼同志说，但应该指出，尽管在我们反对战争贩子的阵地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党在三天前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还是尖锐地提醒全党，防止各种盲目乐观的倾向。不能忘记，在反对战争贩子的前线，我们还有落后的地方。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的口号可以动员更多的少地农民和中农。为把和平运动变成苏斯洛夫同志所说的全民运动，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毫无疑问，妇女，尤其是在农村，还没充分动员起来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还没有采取适合波兰具体条件的各种具体斗争形式。在这一工作中，还没有根除突击方式，还没有把争取和平的斗争同“妇女联盟”、“农民互助协会”、中小学家长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结合起来。

在发言结束时，贝尔曼同志指出，苏斯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对战争贩子的任务的报告以及在这次情报局会议上交流的经验，将帮助我们党进一步动员波兰数百万劳动群众参加保卫和平的斗争，以此加大人民民主波兰在保卫和平共同阵线里的贡献；这一阵线的鼓舞者和领导者是强大的战无不胜的苏联、联共（布）和伟大的斯大林。

№11768

保、意、罗代表团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发言记录

（1949年11月17日）

会议于10时30分开始，13时30结束。

继续就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发言

杜克洛同志建议由斯兰斯基同志主持这场会议。

建议被通过。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保加利亚代表团完全同意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既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和两个敌对阵营之间力量对比的分析，也同意根据这一分析所提出的任务。对于掌握政权和领导国家的共产党员来说，保卫和平斗争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巩固这个国家。现在保卫和平和民族安全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政策的关键问题。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从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以来，我党在巩固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资本主义企业和银行实行了国有化。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两年经济计划。尽管困难重重，我们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这一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因此，基本上消灭了城市和资本主义成分。我们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我国农村已有1600多个农业合作社，它们拥有10%的全国耕地。由于经济的发展，劳动群众的物质福利在不断提高。

契尔文科夫同志接着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在全国已经形成并且得到巩固。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共产党是社会公认的领导力量。处于党领导之下的现在有：总工会（近70万会员），保加利亚妇女人民协会（60万成员），季米特洛夫青年联盟（60万成员），保苏协会（保加利亚会员200万人），合作社运动（200万成员）。

全国完全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派和右翼社会党反对派——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走狗，捣毁了许多在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指示和援助下建立的秘密巢穴。劳动群众的战斗团结大大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完全加入了共产党。这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完全实现了。环节党和激进党声明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出现。契尔文科夫同志指出，因此，现在的祖国阵线是，除了共产党外，只剩下保加利亚人民耕作协会，它公开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最近几年，劳动群众对共产党的信任特别增强和坚定了。在今年5月15日最后选举中，祖国阵线获得92%的选票。全国充满了巨大的劳动热情。契尔文科夫同志说，这样，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制度近两年来，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大大巩固了。这种巩固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是保苏之间深刻的全民友谊。保苏友谊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现在工厂、农村、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中，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正在迎接斯大林70寿辰的旗帜下进行。

我们的劳动群众把斯大林同志当做自己的直接导师和领袖。他们在他面前汇报自己的成绩，领受新的任务。[①] 契尔文科夫同志

① 在契尔文科夫的发言中接下来的内容被删除了："当然，同全体共产党员一样，我们永远视斯大林同志为我们的导师和领袖。当季米特洛夫同志逝世后我们声明，我们将斯大林同志看做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人时，这受到了劳动人民大众的热烈欢迎。"

说，我应该指出这一事实，因为它表明保加利亚广大劳动群众对苏联和斯大林同志满怀深刻的感激之情和忠诚。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和爱护。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为和平而斗争，这对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来说，意味着竭尽全力巩固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制度，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加强国防能力推向前进，对保加利亚南部边界以卑劣的铁托挑拨者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

契尔文科夫同志继续说，为和平而斗争，这对我们来说，正如拉科西同志正确指出的，意味着不惜花费力气和资金加强我们的军队，以及国家安全机关。我们已采取重大举措加强了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建设。我军现在的指挥员几乎全部是共产党员。在军队的领导中已免除所有旧将军们的领导职务。我军的教官是苏联的军事同志。我们正采取重大措施加强我国西部和南部边界的守卫。

为和平而斗争——这意味着不遗余力巩固同伟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不破坏同伟大苏联的友谊，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这是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全部斗争的基础。

所以，无情地同共产党内各种民族主义表现作斗争是一项直接的任务，绝对必要的前提，或确切说，是争取和平斗争的组成部分。

契尔文科夫同志强调指出，民族主义不仅符合战争贩子的心愿，这也是和平的敌人、苏联的敌人和新战争贩子的真正思想。民族主义者就是帝国主义的真正走狗。

对拉伊克－布兰科夫的审判表明了帝国主义分子反对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阴险计划，以及他们的期望。他们想借助成为国际反动派代理人的铁托法西斯间谍集团在人民民主国家复辟资本主

义。

这里，正如苏斯洛夫同志讲的，问题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策划的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反对和平和民主的国际大阴谋。

这就是拉伊克审判所表明的，我国当前对科斯托夫的审判也将表明这一点。[①]

这里指的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计划——从内部颠覆共产党，在共产党内部安插民族主义间谍特务。

为和平而斗争，——这首先意味着，要认真严格地审查共产党的队伍，揭露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无情地镇压他们，清除党身上的这个脓疱。对这种清除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清除之后，党将更加巩固。目前我党正在紧张地进行这一工作。

契尔文科夫同志声明说，在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亲自帮助下——保加利亚人民为此将永远深怀感激之情——揭露了原党中央书记科斯托夫。[②]

科斯托夫何许人也？他是英国的间谍。他承认，早在1942年他就被英国情报部门招募，并从1944年起同铁托集团勾结起来。

根据英、美间谍头子下达的任务，科斯托夫同国内的铁托分子勾结起来，在党内和国家机关里成立了由他这样的间谍组成的小组，该小组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尽力利用我们的弱点，利用我们

① 关于“科斯托夫案件”的诉讼程序，是于1949年12月进行的。

② 在契尔文科夫讲话的另一份记录中还有如下的表述：“我们将这一点归功于斯大林同志。我们将执行他的忠告，将清洗运动进行到底。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停止不前。”契尔文科夫此处所指的是发生在1948年12月的一个事实：斯大林根据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所提供的情报，对科斯托夫提出了指责，说科斯托夫妨碍苏联代表们获得感兴趣的关于保加利亚经济状况的情报资料。斯大林声明说，与铁托的冲突也正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因此，有必要核查一下，科斯托夫到底是什么人。斯大林所提出的这个指责，实际上成为对科斯托夫审判的序幕。

的信任和粗心，伤害党和国家（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在铁托分子的帮助下准备使保加利亚脱离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把保加利亚拉向帝国主义阵营。

首先想利用南部斯拉夫人联邦和巴尔干联邦的口号。[①]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当然，科斯托夫的南部斯拉夫人联邦同我们理想的南部斯拉夫人联邦没有也不可能有丝毫的共同之外，因为科斯托夫的南部斯拉夫人联邦目标是反对苏联。科斯托夫分子要求保加利亚并入南斯拉夫，还指望铁托分子给予军事援助。

他们知道，我党和我国人民对俄国人民、对苏联深为爱戴和忠诚，深知这一传统深久。所以他们深深地伪装自己，千方百计地玩弄两面派手法，口头上发誓如何如何忠于苏联，而实际上在精心掩盖自己的卑劣阴谋，准备借助铁托反革命集团的援助强行改变党和国家的政策。这再次表明，考核领导人，不应看他如何表白自己，不应看他的声明，而应看他的工作结果。考验一个领导人，首先要看他对苏联的实际态度，看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对待苏联。

拉科西同志在发言中正确地指出，必须认真分析工作中出现的困难的原因。应该认真研究党的领导人的整个生活道路，要用布尔什维克的光辉映照他生活道路中一切不清楚的部分。

必须同参加反党派别的人、同经常发牢骚表示不满的人进行斗争。

契尔文科夫同志指出，敌人正是把科斯托夫作为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名重要奸细在战后把他保留了下来。他是英、美计划的执行者。早在战争时期，在监狱里科斯托夫就同其他被招募的在党内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间谍勾结在一起。这伙人散布科斯托夫在警察

① 契尔文科夫发言的原话是："首先想利用在党内和国内都非常普及的南部斯拉夫人联邦和巴尔干联邦的口号"。

局表现英勇。出狱之后，这伙人的第一件事就是销毁有损他的名誉的材料。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自然，英、美情报部门感兴趣的不只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它们的触角伸向各处，伸向所有人民民主国家。所以，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应广泛地、坚定地利用匈牙利和我国同敌人走狗作斗争的经验。

我们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进攻削弱了敌人的基础。这是明显的。这很好。不就是因此帝国主义分子才对我国虎视眈眈吗？不就是因此他们才想通过自己的间谍搞乱我党吗？不就是因此他们才千方百计向我党渗透吗？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我认为，应尖锐地提出清除我党内、国家机关和军队中钻进来的间谍的问题。敌人间谍受命要千方百计爬上领导岗位。他们伪装潜伏，竭尽虚伪卑劣之能事，一心爬上领导岗位，以便在英、美情报部门认为合适的时机反对我们。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如果没有科斯托夫分子的破坏，我们的成绩会更大。他们主要是通过歪曲党和政府的政策，造成人民群众的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的经济政策领域，在我们同农民的相互关系领域，他们给我们造成了危害。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在一个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实际上禁止一切非国家性质的商品交换。国家从农民生产者手中实际上征集了所有剩余的产品。

党坚决反对严重歪曲党对农民的政策。我党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阐明了这个问题。党现在正为消除有害后果进行严肃的斗争，并动员劳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勇敢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即将举行的国家权力机关选举的整个准备工作是在对这些缺点进行无情的批评和坚决改进我们的工作的旗帜下进行的。契尔文科夫同志说，整个党的工作，国家机关，社会和经济部门的工作都受到了认真的批评。劳动群众都被吸收来参与对缺点和错误的批评。

谈到党最近的任务，契尔文科夫同志强调指出，首先必须从上至下清除党内科斯托夫分子和对科斯托夫分子妥协的人。这一任务即将完成。虽然没有正式宣布清党，但对党的队伍的清理正在进行，在审判科斯托夫之后，清洗将进一步有力地展开。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应该讲，我们及时地揭露了科斯托夫。为此我们应感谢联共（布）和斯大林同志。

契尔文科夫同志指出，对科斯托夫的斗争使我们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了，警惕性提高了，党内民主扩大了和加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锻造过程向前推进了。我们明白，科斯托夫绝不是一个人。党内隐藏着科斯托夫分子。但在科斯托夫和他的老战士们被揭露之后，他们在党内不能藏身了。①

契尔文科夫同志指出了苏联专家所给予的巨大帮助——按照新的任务，帮助对国家机构进行了改造。② 他说，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和政府正在制定和贯彻关于解决保证居民粮食供应问题、关于同旱灾做斗争、关于提高谷物和其他作物收成、关于加强出口作物的生产和改良、关于加强工业原料的开采、关于改善畜牧业、关于国家电气化、关于矿藏研究等一系列问题的措施。

全国正在采取在经济基础上巩固工农联盟和加强农业劳动合作社的措施。

保共中央六月全会意味着在发展现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切实

① 在契尔文科夫发言中接下来还有一句话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我们将清除国家机关里的科斯托夫分子，清除可疑分子，根据广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来重建国家机关。"

② 在契尔文科夫发言中这句话原是："在这方面苏联的同志们给予了我们以巨大的帮助。在部长会议里我们拥有四名优秀的经济问题苏联专家。在许多最重要的部门我们也拥有这样的苏联专家。苏联同志尤其在研究我们的土地方面给予了我们最多的帮助，正如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土地里含有丰富的煤、铁和有色金属。"

开展反对科斯托夫分子、消除人民敌人造成的不良后果和消灭敌人本身等各项斗争中所出现的真正转折。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执行六月全会决议的初步成果，表明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城市和农村劳动者对党的信任增强了。党同中农的关系亲密了。我们已着手认真纠正我们的缺点和坚决改进我们的工作。中央和政府关于改造交通运输工作的决定证实了这一点，在交通运输部门，一些不称职的人和可疑分子被撤职，现在负责交通运输工作的是保共中央书记恰科夫同志。中央合作社协会也清除了科斯托夫分子，现在领导这一部门工作的是从人民群众中推举出的新干部。

这一过程还在继续，我们将完全按照我国已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今形势的要求，改造党、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经济和工会组织的全部工作。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为和平而斗争，现在对我们来说，这正是意味着顺利地结束这种改造，从而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我们的国防。

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全面提高我们的警惕性，增强忧患意识，消灭国家机关尤其是党内各种帝国主义间谍的巢穴，无情地揭露和清除从外部派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和国家的所有环节把反对科斯托夫分子和铁托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联系群众和人民，不仅是教育人民，而且要向人民学习，深入倾听各种关于工作和方法中存在的问题的反应，认真核查这些反应，采取措施消除敌对分子，防止敌人诬陷好人的企图。

——对活动家进行审查，正如斯大林同志教导的，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工作的结果，而且为了保障这种审查，不只是自上而下，而且要——正如斯大林同志教导的——自下而上，倾听劳动群众的意见。这是最可信的审查。

——大力加强和改善我们在居民中的政治解释工作。我们应该比以前加大力度，正确说明国际形势，解释防止新战争的现实可能性，揭露战争挑拨者的先遣队——铁托－兰科维奇卑鄙集团所起的极坏作用。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使每个保加利亚人深刻意识到是民族的根本利益决定了我们同伟大苏联保持牢不可破的友谊，没有这一友谊，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不仅不能进行顺利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使我国摆脱长期以来的落后和贫穷，甚至国家的独立都是不可思议的。没有苏联的支持，我国就可能成为英、美帝国主义手中的牺牲品，沦为它们的殖民地。

契尔文科夫同志在发言最后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利益同保加利亚的民族利益完全是一致的。保苏友谊的坚强生命力就在于此。这一友谊是保加利亚民族独立的主要保证。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举手反对苏联的保加利亚人，他首先举手反对的是保加利亚，他是保加利亚的敌人，帝国主义的走狗。

科斯托夫主义——这是对祖国的背叛，对国家民族独立前程的断送。这就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应该坚定地带给人民、努力向人民解释的东西。

契尔文科夫同志说，在我们国家，和平运动同保苏友好运动一样，是全民运动。党和国家整个政策的方向是在苏联共同领导下保卫和平。

为此，国家将动员一切可能。参加这一运动的有工会、妇女联盟、青年协会、所有的合作社组织、体育组织、文化教育机关、教会和全体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运动已经没有缺点和错误。不，还是有缺点和错误的。

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些错误，进一步积极地扩大和平运动。应逐渐扩大揭露战争贩子的宣传运动，传播他们反人民活动的消息，在人民之间宣传持久和平。应该在每一座城市，

每一个乡村建立保卫和平委员会。我们将做到这一点！

多诺弗里奥同志说，意大利代表团完全同意苏斯洛夫报告对形势的分析，无条件赞同报告中提出的结论和指示。意大利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在实践中贯彻这些指示。

多诺弗里奥同志说，谈到我国的斗争，再指出意大利因按照马歇尔计划实施经济政策而造成灾难性后果已是多余的了，因为这一题目苏斯洛夫同志在报告中已谈过了。意大利生产正在下降。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生产均未达到战前水平。由于英镑贬值，出口下降10%；1946年失业人口达135.5万人，1949年上升到220万人，其中还不包括100万减少了工作日或偶尔有工作的工人。需要指出，最低生活费指数从1948年7月的100提高到1949年6月的108.49，同时平均名义工资只提高到101.7，而实际工资下降到93.77。多诺弗里奥同志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马歇尔计划范围内，意大利政府的经济政策使意大利不能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现在电力生产领域出现了危机，其结果造成电力分配受到限制，居民和企业的需求被缩减，这证明在“马歇尔计划”标志下所实施的经济政策根本不符合意大利的利益。

在国家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和意大利全国劳动大会正进行积极的斗争，保卫意大利经济，保障劳动群众的最低生活水平，彻底改变现有的经济政策——现在政策是战争政策，是使意大利屈从于美国的政策。

多诺弗里奥同志说，在简短的发言中，不能论及苏斯洛夫同志报告中所阐明的一切问题。所以，我只根据我们的经验，谈两点对于意大利反对战争危险最重要的情况。

第一，尽管毫无疑问和平阵线加强了，但新战争的危险依然存

在，而且在加大。

第二，经常有组织地开展争取和平的斗争。

意大利争取和平的斗争，不论从广泛动员群众的角度看——大部分群众确实已意识到新战争的危险，意识到必须克服这一危险；还是从孤立战争贩子的角度看——迫使他们越来越暴露出自己政策的反民族性质，都取得了积极的结果。毫无疑问，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在意大利，在这个问题上下的力量最大，但是，不能认为，这一进步是彻底的和巩固的。

在意大利所开展的保卫和平的基本运动给我们带来了成绩；但这些运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还没来得及实际解决。

多诺弗里奥说，保卫和平的第一次重大战斗发生在今年3月的议会中，当时提出了原则上赞同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反对党激烈地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同执政党展开了辩论，辩论进行了70个小时，在辩论过程中，反对派党团的每一位代表都发了言，阐明了自己对公约的否定态度。在议会里，在面对集会群众的广场上进行的这一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议会代表，我们的讲演者，对敌人的每一种议论都进行了批驳，在论战中和议会辩论中占据了主动。同时在全国组织了各种集会和游行示威：临时集合或者暂时放下工作聚会，争论会，群众大会，抗议游行，同警察冲突，有时甚至是流血冲突。所有这些行动首先在广大劳动者面前揭露了德加斯佩里政府和天主教民主党，在全国居民中孤立了他们。在议会里，属于当权派的多数代表和议员，在反对战争、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运动的压力下，被迫反对赞同这一公约或放弃政府立场，或投弃权票，有的则回避投票溜出议会大厅。

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议会党团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在全国工厂、在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聚会和游行中，可以看到

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萨拉盖特）和共和党的普通党员。

这些大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德加斯佩里党的发言人多半去教堂里讲演，解释自己赞成北大西洋公约的理由，他们不敢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或公开同我们辩论。

多诺弗里奥同志指出，第二次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运动是和平请愿书签名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通过这种合法的全民公决手段对基督教民主党政府及其议会多数派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决定施加压力。请愿书要求不批准北大西洋公约，至少要拖延批准公约；不把意大利军事基地交予其他国家管辖，并按照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11条，谴责任何一种战争政策。印发了777150份通报，每份通报上可容纳25000个签名。多诺弗里奥同志指出，最大的困难在于，按照法律，使每一个签名合法，赋予请愿书分量和意义。尽管警察威胁、逮捕、收缴通报和神甫恫吓，从今年4月到7月初征集签名达700万个。如果考虑到政府、教会、地方长官和警察制造的困难，这已是很大的成绩了。仅罗维戈一个省，因征集签名遭逮捕的人就近600，他们每人被处以一万里拉的罚金。还应该注意到，这是意大利第一次全民公决。不但如此，每一个居民点都成立了委员会，它有权宣布签名的法律效力；这次没有顾及国家机关的百般刁难和阻力，通常每当国内举行什么选举活动，国家机构都给以刁难和设置障碍。

与议会里辩论批准北大西洋公约问题的同时，举行了和平请愿书签名活动，这不仅是一种宣传，而且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政治因素，是一种符合宪法的行动，它使意大利政府批准北大西洋公约的行动而失去了让意大利人民承担义务的意义。

“北大西洋公约下没有我们的签名，你们永远不会得到这一签名！”——人民代表团的代表们说，他们把带有700多万签名的通报递给了基督教民主党议会主席。多诺弗里奥同志指出，如果把

700万签名的政治意义同1948年4月18日选举时人民民主阵线所获得的800万选票相比较，其意义就更大了。在困难的条件下，在受迫害的条件下，为了让他们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意见，竟动员起了如此多的人，几乎与大选时顺利动员起的人数相差无几！

无论如何可以说，关于和平请愿书征集签名运动证明了意大利人民民主阵线的力量仍是不可征服的。在许多大的居民点，如在博洛尼亚、摩德纳、拉韦纳、雷焦－艾米利亚、佛罗伦茨、里窝那、比萨、锡耶纳、那波利、罗马、巴勒莫，所征集的签名人数超过了1948年4月18日选举人民民主阵线获得的票数，这一事实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没有警察的迫害、逮捕、罚款和恫吓，如果全党更加注意这一运动，更好地进行组织，那么和平请愿签字人数就会超过800万，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和平力量在意大利的真正影响。

多诺弗里奥同志继续说，第三次大的反战运动是支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的运动。为出席这次大会，意大利派出了1200名代表。代表是由群众工会、农民合作社组织选出的。其中145人是地方妇女组织选出的，242人是村、城市各区地方和平委员会选出的。

按照巴黎和平大会的榜样，意大利各地也举行了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热那亚，各工厂、各区都召开了大会，还召开了全市和平大会，在会上选出了出席巴黎大会的代表。“在这座楼里，我们都反对军事条约，拥护和平！”“在这座工厂里，我们都反对北大西洋公约——战争公约！”——楼房上、工厂里都挂上了这样的标语。代表们从巴黎回来之后，立即又在工厂里组织会议和群众大会。6月2日，即意大利共和国宣布成立2周年之际，全面进行了宣传和平大会的报告和决议的活动。全国举行了700多次拥护和平、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群众大会和各种飞行集会。7月10日，在罗马，在保卫和平旗帜下召开了全国青年飞行集合。在土地改革斗争委员会的全国会议上，提出“要土地，不要战争！”的口号。召开了意

大利妇女协会和意大利全国劳动会议代表大会（意大利全国劳动会议有成员 550 万人），还召开了意苏协会代表大会，该会议取得重要结果。

多诺弗里奥同志声明说，召开的所有这些大会、飞行集会以及其他的群众措施，都以坚决彻底谴责战争、谴责北大西洋公约为特点，表示完全支持苏联的和平政策，对人民民主国家表示出好感。

争取和平、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运动，大大提高了大部分党组织和群众协会的积极性。在这些运动过程中，毫无疑问，坚定了必须进行斗争以克服战争危险的意识。但不能不指出，这些运动主要带有抗议性质，它们还没有使广大群众充分明白战争威胁的原因以及战争威胁本身。

多诺弗里奥同志继续指出，在工人运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修正主义，它导致无所作为，不是通过自身的斗争去解决问题，而是期待外来力量的干预解决问题。有这样一些工人，一方面他们期待资本主义总危机导致帝国主义衰落，另一方面，又期待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进一步胜利而导致在意大利建立社会主义。这些情绪导致了消极后果，“好吧，让战争来吧！”类似情绪妨碍了和平阵线的巩固，所以应该同它进行坚决的斗争，把反对战争的问题提到首位，向群众解释，正因为帝国主义衰落，它才不会放弃自己疯狂的战争政策。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运动导致了我们联盟的巩固，有时还导致了我们联盟范围的扩大，不仅是在和平阵线的领导层，特别是在外围组织里。在争取和平、反对北大西洋公约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动员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阶层以及其他政治派别和宗教派别的追随者。我党在争取和平口号下开展的运动鲜明地证实了这一点。但在这些运动中，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没做我们应做的一切。不久前，我党中央完全公正地评价了这一事实，把它作为党的一次失

误：在争取和平、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请愿书上只征集到了近700万个签名，假如积极地动员我党、我们的盟友——社会民主党（在组织关系上很薄弱）和其他民主团体的基层组织，那就可超过1948年4月18日议会选举时所获得的800万张选票这一数字，就可使政府和整个意大利社会舆论界面对基督教民主党所实施的美国政策的敌人的阵线，就可使目前的政府继续存在成为不可能。如果说没能做到这一点，那只是因为没有做相应的组织工作，没有全面地广泛地动员我们自然的盟友。这一失误的原因，应该到上面指出的机会主义立场以及群众没有深刻意识到战争的严重危险中去寻找。

多诺弗里奥同志说，所有我们这些保卫和平的运动，实际上都意味着在意大利进一步深入地经常地开展保卫和平阵线工作的开始。在最近几个月，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委员会：保卫和平委员会，征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签名委员会，召开全国保卫和平大会和地方和平会议的倡议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的存在表明了倡议的多样性，表明了意大利争取和平组织形式和能力的不同。但是这些委员经常活动的不多。完成某种作用后，它们便消失了。这些委员会的消失是因为它们未能捍卫自己的存在，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很清楚，在保卫和平的斗争中，需要发展和鼓励各种主动精神。但同样清楚的是，需要有一个领导中心，即有一个能够协调各种倡议、把被吸收来参加保卫和平运动的群众以不同形式统一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的委员会。在意大利，这种保卫和平的协调组织中心很少。多诺弗里奥同志指出，意大利共产党离陶里亚蒂同志在一次议会讲演中所提出的指示还相差甚远，陶里亚蒂同志说：

“建立和平阵线，就意味着要做到，每一座楼房，每一座工厂，每一个农村，每一所住宅，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城市，每一类劳动者当中，都有保卫和平委员会。”我们距离建立这种保卫和平委员会网还差得很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得不克服在今年年初还在意

大利社会民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中间集团的投降主义立场。众所周知，中间分子在最近的社会民主党大会上遭到了失败，但他们控制着社会民主党，他们反对和平阵线的组织形式，只同意进行“和平运动”。多诺弗里奥同志说，我们应该使我们的民主党盟友坚信存在现实的战争危险，应迫使他们承认，如果我们真想防止战争，那就必须转入斗争和组织群众的高级形式。意共认为，世界和平委员会不仅应从事宣传，还应开始政治行动，坚决捍卫和平事业。

多诺弗里奥同志指出，为和平而斗争是意大利共产党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在议会中占多数，但它越来越失去根基。它的政府联盟正在经历危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不断斗争越来越削弱它的力量。为了指明方向和团结所有这些力量，为了向它们提出具体的政治目的，意共通过陶里亚蒂之口向全体意大利人民提出了彻底改变意大利政策的问题，以便使国家免遭外来压迫和经济破产，避免警察制度和战争。这要求放弃北大西洋公约政策和回到和平政策上来，正如否定战争的宪法第 11 条指出的，要把这一点作为国际政策手段。这意味着开始实施同一宪法中所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

多诺弗里奥同志说，意大利制定了工会经济活动计划以保卫工人阶级最迫切的利益（最低工资、反对辞退等）。为解决某些最迫切的问题和向失业工人提供工作岗位，全国劳动大会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如建设新的水电站，对垄断电力企业实行国有化，为人民建设住宅，排干所有适于耕作的土地，等等。多诺弗里奥同志说，我们党要求彻底改变对内对外政策和政府的经济政策。[①]

我们的问题和经验就是这些。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苏斯洛夫同

① 在多诺弗里奥的发言中此处还有一句话：“意大利的社会舆论最终会赞成这些的，如果它愿意挽救自己祖国的话。”

志的报告将会为我们提供帮助。[①] 世界和平阵线可放心地指望，意大利工人阶级和意大利人民在粉碎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新战争企图的事业中将开展积极的活动。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完全赞同[②] 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③]

涵盖全球数亿人的保卫和平运动，我党也积极参加了。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我国社会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群众组织，科学机构。在我国，保卫和平运动是在弗罗茨瓦夫世界文化活动家大会之后才升温的。

弗罗茨瓦夫大会之后，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文化活动家会议，会上出席世界文化大会的罗马尼亚代表汇报了大会的情况。成立了召开罗马尼亚文化活动家代表大会的倡议委员会。该大会是今年3月召开的。

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各市及其各区召开了文化活动家会议。这种为代表大会作准备的会议，各高等学校、中小学和农村文化之家都举行过。

有800多名文化和科学活动家出席了代表大会。大会热烈支持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的倡议。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指出，在罗马尼亚组织保卫和平运动的初始

① 在多诺弗里奥的发言中此处还有一句话："不容置疑，借助于其报告中所包含的指示，我们的这种争取和平的斗争将在意大利发展并得到巩固，而这种巩固将成为新的成就的保证。"

② 在基辛涅夫斯基的发言中接下来有"内容详细的、动员性的"两个形容词。

③ 在基辛涅夫斯基的一份经过其签字确认的讲话稿中，接下来的一段内容在将其列入会议记录文本时被删掉了："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认为，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是进行反对战争贩子、争取持久和平和各族人民安全的斗争的纲领性文件。"

阶段，没有提出吸收城市和农村劳动者参加的问题。只是在代表大会和成立保卫和平常设委员会之后，保卫和平活动的范围才有所扩大。

保卫和平运动使党能够巩固自己在文化队伍中的阵地。我们把保卫和平的斗争同反对世界主义联系起来，动员科学和艺术界人士同科学文化领域的各种反动流派做斗争，并且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例如，许多生物学家这时期开始接受米丘林的生物学理论。

在公布了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的呼吁书之后，许多群众组织、文化机构、工厂集体、农民会议等都表示赞成召开这一大会。这表明了和平事业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即全体人民的事业。

党是在进一步发展对和平阵营的领导力量苏联的爱戴之情的口号下开展和平运动的。

整个党的宣传大军——12 万人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同争取和平的斗争有关的问题，在党的会议和青年、工会、妇女会议上进行了讨论。罗苏友好协会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组织会议、作报告、出版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宣传苏联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材料。报刊和广播电台也积极参与了和平宣传。

罗马尼亚代表团从世界和平大会回来之后在群众大会上做了汇报。此外，从巴黎和布拉格和平大会之时起，工厂和农村，全国各个角落都举行了反对战争贩子的群众大会。科学文化普及协会和罗苏友好协会做了一系列报告，宣传和平问题，揭露英、美战争贩子。

保卫和平委员会出版了小册子和传单。从文化界保卫和平大会到和平日期间共出版小册子和传单 80 万份。

在布加勒斯特和全国 5 月 1 日，8 月 23 日，10 月 2 日，11 月 7 日的群众大会上，数百万城市和农村劳动者表达了自己为和平而

斗争的坚强决心。

从1948年11月至今，在反对英、美战争贩子、保卫和平口号下展开的宣传活动涵盖了广大劳动群众，加强了群众积极保卫和平的意识，加深了他们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罗马尼亚代理人的憎恨。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接着说，尽管在保卫和平运动中取得了成绩，但还存在严重的缺点。某些同志出现了缩小运动规模的倾向，另一方面，只重视召开大会，忽视日常在劳动群众中做宣传解释工作，忽视日常保卫和平的斗争，有时忘记了必须同国内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做具体斗争。

党注意到了现有的缺点，决定从带有临时性质的行动转向城市和农村经常性的行动。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给全党提出了以下任务：为组织保卫和平的群众运动开展经常性的个人和群众宣传；动员群众参加和平斗争，完成国家计划和增加生产，从而从经济上巩固和平阵营的积极因素——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努力工作，进一步加深同国际无产阶级友好、合作和相互声援的感情，加深对苏联无限热爱和忠诚的感情；宣传苏联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在各民族之间兄弟友好的思想基础上培养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宣传仰仗罗马尼亚的解放者——苏联军队，罗马尼亚人民真正获得了国家主权这一历史事实。

必须加倍努力保卫这种真正的独立、自由、政治权力和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生活，从而为这一全民事业做出自己全部的贡献。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随后指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已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保卫和平的普遍斗争同千方百计巩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任务，同保卫民族独立和反对英、美战争贩子威胁的任务联系在一起。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我党中央决定，出版一系列保卫和平的小册子和材料，并组织这种性质的广播；为积极分子专门编写涉及保卫和平的群众政治工作任务的指导材料；在县城和区中心召开积极分子指导性会议；印刷保卫和平题目的海报和传单（类似《塔斯社之窗》）。

党和罗马尼亚工人阶级明白什么是保卫和平的斗争。这首先意味着，必须全面巩固人民民主制度，进一步深入掌握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

斯辛涅夫斯基同志说，由于党组织和工会，尤其是罗苏友好协会在群众中传播的文献资料，现在成千上万的工人、工程师及其他人，正在学习苏联在科学、文化、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苏联先进工人的工作方法。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作为这方面的结果——国家年度计划第三季度计划超额完成 9%。

我国部分企业已在完成 1950 年的任务。某些数据表明，将超额完成计划。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的重工业正在得到加强。苏罗社会主义合作形式是我国经济振兴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兄弟般援助的榜样。乔治乌－德治同志指出罗苏经济合作是苏联对罗马尼亚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民族主权的伟大援助。

众所周知，我国正在建设多瑙河－黑海运河。运河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意义。现在在这一工地上活跃着数万建设者。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接着说，农村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表明，集体劳动的思想越来越深入劳动农民之中。我国集体农庄，如不包括共耕互助组，数量还很少。一共才有 55 个集体农庄。但它们在具体教育劳动农民群众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央和政府收到了许多农民申请，申请允许他们成立新的集体农庄。但党提出了在农村全面发展合作社的任务。除集体农庄外，还有国家农业企业和机械拖

拉机站，它们也在日益巩固，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些初步胜利是在同阶级敌人进行激烈斗争中取得的。不少时候这一斗争带有流血的性质。武装匪徒进攻农村的党和国家机关、纵火、暗杀——这些法西斯富农活动几个月之前同时出现在几十个村庄里。在这方面，我国履行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在罗马尼亚，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正在增长。工人、劳动农民、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地为巩固人民民主制度而工作。人民意识到，只是由于苏联军队解放了他们，只是由于苏联，他们才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独立；他们应该捍卫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民族主权和独立，应该同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所有力量一起积极奋斗；而站在这一阵线前头的便是自己的解放者和伟大的朋友，帮助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生活的苏联。

在本次会议之前，我们就想说，保卫和平运动已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顺利发展。但听了苏斯洛夫的报告之后，我们发现，尽管我国召开了大会，也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一些企业和农村也有保卫和平委员会，但和平运动还没有吸收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还同现在的任务不相适应。

听了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之后——其中提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保卫和平的任务，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必须加强、扩大和巩固伟大和平阵营的组成部分之一——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和平运动。

我们应该完善和加强对群众的教育，教育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及其法西斯间谍走狗——铁托集团，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教育群众在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以及反对战争贩子的斗争中，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实现兄弟般的团结，我们应该提高我们的教育工作水平。在农村和城市建设社会主义，在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反对敌人

阴谋的斗争中，必须千方百计加强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加强同农民的联盟。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为了实现苏斯洛夫同志报告中提出的任务，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打算：

——在所有企业和农村建立保卫和平委员会；

——动员群众组织（全国劳动会议、青年劳动联盟、罗马尼亚民主妇女联盟、农民协会、匈牙利人民联盟和其他民族委员会）为实现保卫和平行动纲领而积极活动；

——召开作家、演员、诗人会议，讨论有关保卫和平题材作品的创作问题；

——吸引原政治犯、红十字会、残废军人、孤儿、原战俘等有关组织加入保卫和平运动；

——在工人俱乐部、文化之家组织讲座以及上演保卫和平节目的文艺晚会。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随后指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认为，自己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我们党意识到，通过不断加强军队，巩固国家抵御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能力，以此促进和平事业。我们从部队中清除了不少敌对分子，但继续和完善这种清洗是加强军队的基本条件之一。

党通过研究和利用苏联英勇军队的伟大经验来巩固我们的军队。党努力在军队中保持适应的社会成分。我们部队的基础是参加过劳动青年联盟的青年。从受过党的教育的工人、农民队伍中提拔新军官（共产主义者）。军事学校配备的干部几乎完全是受过考验的党的工作者。军事政治学校网正在形成，学校的社会成分得到了改善。例如某军事政治学校 1650 名学员，他们分别来自工人（1000 人），农民（200 人），知识分子（221 人），职员（223 人）。

我军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经验，学习它的军事、精神素质，培

养对美、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仇视和对苏联、对伟大的斯大林、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的无限热爱，我军正在成长为一支保卫和平的重要力量。

苏斯洛夫同志在报告中说必须加强对右翼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众所周知，在两党合并过程中，罗马尼亚工人党消灭了以季捷尔·彼得勒斯库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小组，在审判马尼乌和其他美国间谍人员（牧师及其同伙）[①] 时，右翼社会民主党作为帝国主义的奸细也被揭露出来。

但我们党里还残留一些以左倾词句为掩饰的危险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他们同托洛茨基反革命分子、铁托间谍分子、各种民族主义者勾结起来，秘密地准备加强自己的破坏和间谍工作。但对我们党来说，这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对他们正在采取断然措施。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在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同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城市和农村的妇女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妇女们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所有城市和农村，都有罗马尼亚民主妇女联盟的地方组织。这个联盟有成员150多万。由于妇女的积极参与，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我们获得了胜利。现在我们已采取了加强民主妇女联盟工作的措施——为它派去新的干部，采取措施改善党中央对它的领导。

苏斯洛夫同志完全正确地指出“从反民主、帝国主义阵营衰落的事实中绝不能得出战争威胁减少的结论。这一结论是非常错误的和有害的。历史经验表明，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处境越是没有希望，它就越是疯狂，帝国主义进行战争冒险的危险就越大”。这对我们

① 在1948年11月进行的诉讼程序中，罗马尼亚著名的企业家马克斯·阿乌什尼特、扬·布若伊、阿列克山德鲁·波普和其他一些人，因被指控受英、美帝国主义者的指派，犯有怠工和从事破坏罗马尼亚经济的活动而被判刑。

国内形势来说也是正确的。

我们代表团声明，罗马尼亚工人党将无情地对待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和以此削弱和平阵营的敌对阶级代理人的活动。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力量正在增长，国家机关正在加强，20万工人取代了大量剥削阶级出身的反动工作人员的岗位。至于地方政权机关——临时人民苏维埃，74名主席中67名是工人，99%的厂长是工人。尽管如此，国家机关还远没有完全肃清敌对分子，他们仍以各种阴险方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尤其在布达佩斯审判拉伊克－布兰科夫之后，我党领导人坚决提出肃清国家机关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的任务。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由于先后审查了党的积极分子和所有党员，我们取得了重要成绩。这一时期审查了近60万党员，其中开除了8万人。下述事实说明了党组织的不纯程度：上面所说的被开除党籍的人有多一半以前完全没有受到过审查，被开除因有谎报情况和进行挑拨者2000人，在苏联领土上犯罪和进行抢劫的人——2500人，民族主义者和剥削阶级出身的人——近11000人。

清洗大大加强了党。但罗共领导人认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地揭露和无情孤立党组织中的所有敌对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分子，无情地同背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路线的倾向作斗争，必须牢记，在这一背离倾向幕后总是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敌人。

为了教育干部，帮他们认识敌人活动的阴险方法，党出版了大量布达佩斯审判的材料和拉科西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指出，众所周知，1948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全会认定帕特拉什卡努是我们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秉承者。现已查明，帕特拉什卡努曾为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人工作，为

美帝国主义集团效力。[①] 自然，不只他一个人。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说，只有揭露、驱逐和消灭所有帝国主义间谍，党和人民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必须清除右翼社会民主党法西斯地下工作者集团、各种民族主义者、反党分子的反革命活动，提高全党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从而使每个人都清楚，不消灭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走狗便不能保卫和平。

中央向全党提出：学习揭露拉伊克－布兰科夫间谍分子和铁托法西斯走狗罪行的布达佩斯审判材料，从而提高警惕性，而警惕性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最重要条件，我们正在坚定地完成这一任务。

在反对美、英思想进攻的斗争中，我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美、英电影和文学作品等早就被禁止进入罗马尼亚。但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和铁托法西斯间谍匪徒为其反动的种族主义的法西斯思想渗透开辟了和正在开辟着道路。我们党和政府将坚决消灭这种可能性。

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集团派了不少间谍和特务、怠工分子、破坏分子、造谣分子到巴纳特地区，收买人心，积极地为美、英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活动。他们的一部分人已被我们揭露。

作为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党中央提出要把无情揭露巴纳特的铁托间谍分子同不断教育这一地区的塞尔维亚族居民联系起来，——教育他们热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热爱人民民主国家，教育他们憎恨铁托－兰科维奇卑鄙集团中的法西斯篡权者。我们知道，在同敌人的斗争中，党将受到更大的锻炼，会进一步巩固。

---

① 基辛涅夫斯基发言中的原话是："众所周知，在1948年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帕特拉什卡努的评定是：我们党的队伍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的代表。目前已经清楚，司法部部长先生帕特拉什卡努尤其还是企图统治世界的美国觊觎者利益的代表，并为美帝国主义集团的特工机关工作。"

我们以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的名义，让以联共（布）和伟大的敬爱的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共产党情报局各党放心，我们将进一步坚定地提高警惕，我们将无情地对待战争贩子的一切代理人。

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工人阶级，以及我国的一切进步力量，在苏联和伟大的人类天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同志所领导的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将坚定地完成自己的职责。

斯兰斯基同志宣布会议日程第一个问题的发言结束，请苏斯洛夫同志讲话。

苏斯洛夫同志说，代表们的发言很有意思，内容翔实，因此没有必要再作总结发言。

苏斯洛夫同志提议选举所讨论问题的决议起草委员会。

提议被通过。

尤金同志提议由以下同志组成起草委员会：米·苏斯洛夫同志、艾·法戎同志、拉科西·马同志、帕·陶里亚蒂同志、雅·贝尔曼同志、鲁·斯兰斯基同志、维·契尔文科夫同志、约·基辛涅夫斯基同志。

提议被通过。

№11769

陶里亚蒂在情报局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49年11月17日）

斯兰斯基提议由陶里亚蒂同志做议事日程第二个问题的报告。

陶里亚蒂同志的报告

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

（一）

同志们！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顺利结束之后的这一段时期中，工人阶级的统一事业在全欧洲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阶级获得了巨大的政治经验。民主力量只是由于本身的一致，才得以击败并粉碎德国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势力。苏联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始终一贯执行着统一的政策，特别是首先由于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英勇奋斗所获得的胜利，对于全世界工人和各国人民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战争过程中，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所有一切政治信念不同的工人和劳动人民，都坚定地响应着共产党人的号召而联合起来，共同在武装游击队里，进行反对法西斯及外国侵略者的战斗。工人党－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民主人士和天主教徒都已经互相了解，并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必须继续共同努力根除一切法西斯残余，建立新的、自由的和爱好和平的社会，以保障世界各国国家的独立和社

会的进步。

在德黑兰、雅尔塔及波茨坦国际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以及联合国组织的成立，本来使人可以希望：世界各大国在战时既已为获得胜利而合作过，那么在战后也会为保障全世界和平而继续合作。这种希望也就更加巩固了力求达到在各个国家里及国际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统一以至人民统一的趋向。

在欧洲那些因驻扎着苏联军队而使反动势力不能抬头的地方，工人阶级统一道路上的成绩，是更为迅速而且是包罗一切的：这里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签订了一致行动的协定，建立了广泛的民族阵线组织，在统一基础上改组了工会。这样就使工人阶级的代表能够在政府中起重要的作用；能够采取必要的办法根除法西斯主义残余而使法西斯主义无法复活；开始实行工业国有化，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及国家机关的民主化，执行保障和平、国际合作以及与苏联建立友谊关系的政策。

但是，与此同时，在战争胜利之后，有些国家被英、美军队占领，因而受到外来军事当局的支配。英、美占领军当局自一开始就力求恢复旧时反动的资本主义秩序，并公开扶持保守派资产阶级，甚至法西斯党徒。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也在统一的基础上改组了：这里共产党和社会党彼此签订了一致行动的协定，工会内包括有一切政治信念不同的劳动人民，在群众逼迫下提出并且广泛讨论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

在工人阶级统一道路上的这些成果，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与政治情况无疑是发生了良好的影响；促进了议会内工人政党庞大党团的产生；使得为工人阶级统一而最坚决奋斗的共产党能够在某些国家争取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世界工会联合会这个统一的国际工会组织的建立，是为争取工人阶级统一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巨大胜利。在这个组织内，苏联工会

第一次与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各人民民主国家、美洲、中国以及各殖民地国家的工会联合起来了。

世界工会联合会制定了民主的行动纲领，其目的是保卫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争取并保卫政治自由和工会自由，使全世界劳动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分子把全世界投入新战争的一切企图而进行的斗争行动统一起来。除世界工联以外，同时还产生了其他强大的、联合一切党派及无党派工人和劳动人民的国际统一运动，即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等。

（二）

资产阶级把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运动的任务，指派给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去担任。①

当资本主义总危机因受大战影响而加深，苏联的威信与力量大规模地增长起来，欧洲一些新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社会民主党的援助，就成为暂时挽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寿命所必需。社会民主党再一次充当了工人阶级队伍中资产阶级的政党。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忠实的同谋犯，他们极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毒害工人阶级的思想”（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在许多国家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曾经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假装同意统一战线的思想，其目的分明是要不让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完全转入共产党人手中；可是接着他们就在所谓“在两条阵线上行动”的口号下，即在所谓组织“第三种势力”的口号下，说这

① 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陶里亚蒂报告的下面一段话：“再一次证实了已经被列宁证明过的真理，即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为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采取直接的和公开的暴力的同时，还诉诸于其他的斗争形式，如分化工人，破坏工人的队伍，收卖无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或者是单独的小组，以便将其吸收到资产阶级方面。”

种势力应该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以便保持他们相互间的“均势”，防止它们相互间的冲突。这种组织“第三种势力”的思想，分明是一种掩耳盗铃的骗局。试问有哪一个诚恳的社会主义者，竟然会觉得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利益与垄断资本主义和特权阶级利益之间，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存在呢？当苏联一贯执行和平政策，而帝国主义分子则用鼓吹和挑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手段来毒害世界的时候，在这两者间是不能有什么“中间地位”的。所谓“第三种势力”论，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用来进行卑鄙勾当的一种武器，他们居然把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与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和战争挑拨者领导集团相提并论。但是鼓吹“第三种势力”论的那些人干着这种卑鄙勾当的时候，总是想方设法表明他们在每个国家内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利益的“忠诚可靠的管理人”，在国际事务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当帝国主义势力，首先是美国领导集团撕破了大战结束时所订立的协定，拒绝了一切国际民主合作政策而开始进行“冷战”来反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时候，于是所有一切右翼社会党人及其所领导的政党就立刻毫无例外地和毫无条件地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他们立刻就把鼓吹保持中立的所谓“第三种势力”这一论调改换过来，使其与旧有的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科学的机会主义理论相配合，即主张要从“民族的”资本主义过渡到超资本主义的组织。他们认为这种组织应按美国垄断资本的样式，并且应在美国垄断资本领导下建立起来。于是，美国蛮横无耻地向外扩张的趋向，夺取政治军事基地以图消灭各国独立主权并准备新战争的行动，专为巨大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马歇尔化诸国的经济利益，一贯企图建立美利坚环球帝国等等，都被他们厚颜无耻地看做是消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途径。对各个民族利益和传统最后一点尊重正在消失；美帝国主义正在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和主导；

社会民主党正在代表美帝国主义和专为美帝国主义利益来宣传与国际团结原则以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根本背道而驰的所谓“欧洲主义”和世界主义。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劳动人民一致团结的基础，是各国人民在捍卫国家独立免受帝国主义侵略方面，在保障和平方面实行合作的基础。它教导工人群众在每个国家里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它教导工人阶级以及各国人民发展国际友谊和团结，以求更顺利地进行争取和平的斗争，把新战争的挑拨者孤立起来，并使其没有能力进行破坏活动。

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教育工人和各国人民，在为民主、国家独立与保障和平的斗争中，他们应该以苏联为伟大的榜样：苏联各族人民在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已经建成了新社会，战胜了帝国主义，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各国人民指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正确道路。

反之，社会民主党人的世界主义和“欧洲主义”却是帝国主义的宣传武器，其目的是要把各国人民引入迷途，使人民彼此分裂而变为帝国主义的奴隶。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高谈欧洲“联合”，实际上是想要破坏欧洲各国人民间的合作，在他们中间建立一道高墙，以便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孤立起来。列宁早已预见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欧洲主义”，不过是要共同窒死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并共同来保卫殖民地统治。所谓组织“欧洲议会”或“世界政府”的含糊不明的口号，不过是用来向各国人民隐瞒那种专为美帝国主义利益而实行掠夺各国人民的方法的一种可怜的掩蔽工具罢了。

一切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特征，就是他们仇恨苏联和各人

民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罪恶”就是抛弃了资本主义道路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知道，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实际上就意味着他们的灭亡。他们捏造和散布一切最卑鄙的谣言和诽谤以期诬蔑和孤立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各种方法企图破坏工人及一切劳动群众对苏联及其领袖所持的信仰和忠诚。他们最先响应了丘吉尔所提出的关于组织新十字军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他们在思想方面极力鼓吹帝国主义分子专为准备这种十字军而组织起来的种种政治和军事联盟。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机关实行合作，企图动摇各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阵线，所以他们公开地接纳了铁托间谍和奸细集团。

在现今构成社会民主党立场的思想基础中，没有丝毫的社会主义影子，也没有丝毫的民主精神。这个立场就是公开背叛各国的国家独立，背叛民主和进步事业的立场，是背叛和平事业的立场。

（三）

根据这种反民主和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领导的政党，无论过去和现时，在国际关系方面都进行着一种公然与美帝国主义分子政策处处完全相符合的政策。他们最积极地拥护原子外交以及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的“冷战”，他们拼命地宣传马歇尔计划，要把西欧各国变成美国大工业和农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场。他们毫不犹豫地由拥护马歇尔计划转而拥护美帝国主义所强加于欧洲各国人民身上的军事公约和军备竞赛。在法国，当共产党人声明说法国人民永远不会同意参加反对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时，布吕姆之流的社会党人则担任了仇恨共产党运动的先锋。在意大利，萨拉盖特之流的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把要求采取“中立”政策的那种假招牌都抛弃了。在挪威，社会民主党人要求拒绝苏联提出的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无论在什么地方，

进行挑拨战争的罪恶政策[①] 的分子，由贝文至斯巴克[②]，由布吕姆至萨拉盖特和舒马赫，都是社会民主党所捧出来的。

在对殖民地人民的关系上，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正在开展解放运动的殖民地人民进行侵略、压迫和公开战争的鼓励者和直接执行者。英国工党分子正在发动对马来亚和缅甸人民的掠夺战争，指使杀害这些国家和近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运动领袖，支持印度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以求保持印度人民的分裂状态，并用强行扼杀共产主义运动和农民的革命运动。在法国，正是社会党人，掀起了对越南的战争，并为在马达加斯加岛上所施行的残酷镇压进行辩护。在荷兰，也正是社会党人，准备并继续准备着反对印尼民族运动的侵略战争。

在经济政策方面，[③] 社会民主党人现在正在致力于把西欧卷入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轨道，使美国大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已经成为这些集团代表人的欧洲资本家，不仅能把大战恶果，而且能把新经济危机的损失转嫁到欧洲劳动人民的身上。凡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地方，工人的生活条件都在日益恶化，失业工人不断增加，工人已经争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受到威胁，而资本家的利润却在不断增长。任何的，甚至极微小的一种改良经济机构的意图，都被置于脑后。在英国所实行的国有化，丝毫没有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道路，没有促使金融寡头的经济权力消减。在法国以及在西欧其他大部分国家里，社会民主党人仿效英国工党的例子，帮助了美国资本

①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除了报告中的“政策”一词前的定语：“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签署而确立的”。

② 保罗·亨利·斯巴克，比利时社会党的领袖之一，曾任比利时首相和外交大臣。

③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除了报告中的以下内容：“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管理欧洲马歇尔化事务的美国人哈里曼所作的声明，他说：社会民主党人是合众国在欧洲最具潜力的盟友”。

家所强迫施行的欧洲通货贬值，以此作为更加降低欧洲劳动人民生活水准的手段。

在国内政策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公开赞成并且亲自执行着资本家现时在各国为了破坏工人的组织和斗争，并为了完成其准备战争的工作所采取的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在法国，正是社会党人的部长下令向那些为工会正当要求而罢工的工人们开枪射击的。在英国，正是工党政府违犯罢工权利而宣布了紧急状态，以便破坏码头工人的运动。在芬兰，正是社会党人所领导的政府运用警察来对付工会运动，并且企图借此挑起工会内部的分裂。在意大利，正是萨拉盖特及其同谋者坚决赞同教权派警察部长所采取的残酷杀害工人和迫害游击队员的办法。

各国社会民主党根本反对一切建立工人统一和民主力量统一的政策，他们甚至在形式上都无法建立任何一种国际统一组织来代替已经死亡的第二国际。他们执行着帝国主义分子的直接指示，企图分裂已由世界工联所实现了的工会运动的统一。

“社会党国际会议委员会”在产生时，本来不过是一个负责召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机关，但在其存在时期，它屡次企图在国际范围内和在个别国家内制造并加深工人运动中的分裂。英国工党成立“社会党国际会议委员会”来作为自己帝国主义政策的拙劣工具，曾企图利用它使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党拒绝与共产党合作，破坏意大利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间的一致行动。但是这种手腕已经失败。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真诚的社会党人已经与这种虚伪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断绝了关系，而仍然忠实于统一的事业。[①] 如意大利社会党

①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除了报告中的以下内容：“社会党国际会议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卑微的宣传机构，它在由欧洲已经马歇尔化的诸国签署的政治和军事公约的范围内进行自己的工作”。

这样一个巨大的党，仍然站在统一的立场上和阶级立场上，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或中间派在虚伪的“社会党人一致”的口号下所玩弄的一切手腕，迄今都遭到了失败，因为一切真诚的社会党人都日益明白地认识到，右翼分子只是企图把德加斯佩里教权派政府以及英、美帝国主义的压迫重担都强加在意大利劳动人民身上。

英国工党曾发起了一次对世界工联实施分裂主义的打击，当时英国工党分子在美国工会官僚的支持下，以英国职工大会的名义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要求，要世界工联停止工作。这种对统一事业的无理攻击，被大多数参加世界工联的工会彻底地揭穿了，世界工联仍在继续进行工作，在它的队伍中团结了7000万以上的劳动者。

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人继续攻击工会的统一运动，但这两个国家里的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仍然留在统一的工人队伍中，而那些领导分裂运动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教权派分子虽然极力活动，终究只是诱惑了很少一部分人。

（四）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特别是在成立了情报局并公布了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宣言以后，在实现统一工人阶级以及团结民主力量方面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就。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是由于战胜希特勒侵略者及其代理人和亲敌分子的结果，是由于苏联军事当局实行民主政策的结果，是由于民众力求实现深刻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以及由于必须保卫各国独立和前途，以免遭帝国主义者侵害和威胁的结果。

各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根据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优良传统以及反法西斯统一阵线的良好经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一直在进行着争取统一的斗争。反之，在各国社会党内，由于反对法西斯残余和争取必要社会改革这一斗争的加强，致使真正拥护工人阶级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分子，与那些先前做过反动资产阶级

盟友和同谋者的旧机会主义分子间的分歧更加尖锐化了，因为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又想在劳动群众中间充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鼓吹回复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即回复到传统的反动资本主义去，利用狭隘的党派沙文主义思想等等，公然破坏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事业，设法阻挠各种必要而且已经答应了的经济改革办法的实现，再次与当地及国际反动势力勾结起来，替英国工党分子和美帝国主义者效劳，与英、美谍报机关实行合作，以期破坏工人的统一和人民的统一，而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

为了在实现统一的道路上和在巩固人民民主的事业中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必须公开地、坚决地进行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揭露他们，孤立他们，撤消他们的领导职位，把他们从社会党的队伍中驱逐出去。这一任务是由左翼社会党人在共产党人的有效帮助下加以解决的，虽然有时作得很慢并且不坚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党在这种反对右翼社会党人的斗争中已经复兴起来，并且在政治上已经得到了锻炼，恢复了自己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坚决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一为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当时已经看得很明显，这种统一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实行荒谬妥协的结果，而只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基础上实现的。正因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行了捍卫这一学说并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这一学说的斗争，所以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始终能把无产阶级一切先进分子都联合到统一的政治阶级组织中来。

右翼社会民主党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已不复存在，这应该看做是工人阶级统一事业的巨大胜利。新战争的挑拨者遭到了极端严重的失败：工人阶级政党已经成了人民政权的基本因素，成了工农联盟的坚强基础，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

（五）

对于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真诚的社会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首

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有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以便打破帝国主义分子准备新战争的阴谋，阻止反动势力消灭自由的企图，实现为保卫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准所必需的社会改革。工人力量的分裂和分散，就是为民族独立的敌人开辟道路。工人阶级的统一，就能保证把所有一切愿意挽救民族独立的人的努力结合起来。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工人阶级统一力量周围联合起来，那么要打破那些恢复法西斯式反动统治制度的企图也就容易得多了。只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统一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实现自己的进步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反击帝国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计划。

为达到工人阶级统一而顺利地进行斗争的基本条件，就是要在各方面揭穿替帝国主义当奴仆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实行的政策，揭露他们背叛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共产党人在这一斗争中不应表示动摇。同时他们又必须记住，为要推进工人阶级统一的事业，就必须在全体工人及一切劳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那些尚跟着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及其政党走的人中间，不断地和耐心地解释这种统一的重要性。

在资本主义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中，有些共产党在近几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变成了群众性的党，并且领导着有劳动人民中最积极部分参加的广大运动；但是其中有些共产党至今还是很小的政党，而同时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却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和强大的组织。在前后两种情形下的共产党都必须始终把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任务放在第一位。近来，在一切国家里进行这种斗争的条件和前景都已经改善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进行的背叛劳动群众利益的政策，引起工人队伍中的不满和憎恶情绪，这就使得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不得不用新的左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并引起一部分工人退出社会民主党。我们首先必须在维护劳动人民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在为

工资、为保障结社自由及罢工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在为和平而斗争的过程中，与这些社会党工人及劳动群众建立联系。

为了这个目的，应该向社会党工人提议，在工厂里，在各城市和乡村中建立联合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可以成为达到工人阶级统一的有效手段，有助于下层劳动群众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产生。这是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活动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表明自己是否真正愿意工人阶级实现统一，还是他们那些左的言论仅仅是用以掩饰其与右翼民主党人朋比为奸的护身符。最后，还须指出一点，就是甚至在阶级性的工会已很发达而共产党已成为群众政党的国家里，广大劳动群众，有时甚至是大部分劳动人民，却还没有加入任何工会、合作社及政治组织，所以在发动这些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和在组织这些群众方面所获得的最终成果，完全可以帮助达到统一的目的。

在为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到信仰天主教的工人群众以及他们的组织。在某些国家里，这些组织近几年来已经具有了巨大的作用，而在那些社会民主党特别薄弱的地方，这些组织力求取而代之，以便给资产阶级反动集团以广泛的支援。例如在意大利，天主教的工会就比那些弱小的社会民主党分裂派集团强大得多。在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三国，天主教政党是执掌政权的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

可是，在所有这一切天主教的组织中，都可以看出教会上层分子所实行的政策与劳动群众间的深刻矛盾，因为教会上层分子是与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结成联盟来反对社会进步的，而劳动群众，甚至其中最落后的分子，却希望和平和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不管教会当局怎样采取高压手段，但天主教运动中终究经常有一些因出于本能而力求与非天主教的工人运动取得合作和统一的左倾的进步派别出现。教会领袖宣布革除共产党人的教籍，原来是想使这种合作和这种统一无法实现。但是，情形并没有因

为革除教籍而有所改变，因为这种办法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没有发生过任何影响。

革命的工人必须记住，宗教信仰上的区别，特别是在目前需要劳动人民统一来拯救和平的时候，不应成为劳动人民统一事业的障碍。在共产党执政的各人民民主国家里，并没有什么因宗教原因而发生的斗争：在这些国家里，一切公民都保证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只有那些在虚伪的宗教口实掩护下，遵照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进行活动以图破坏民主成果和准备战争的人，才受到民主政权方面的惩办。

必须毫不间断地设法与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密切联系，以便说服他们，使他们了解工人阶级统一的必要。这种联系的目的，就是要同他们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以及在政治斗争方面能具体地共同行动，就是要阶级工会与天主教工会在为经济要求的斗争方面，特别是在下层取得协同的动作，就是要在妇女、青年中间建立联合委员会。把大部分天主教工人群众吸收到为保卫和平、自由与劳动人民生活条件而斗争的统一阵线中来，这是保证这一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提之一。

工人阶级的统一是保证在每个国家里建立人民力量和民族力量的最广泛联盟的可靠基础，其目的是要抗拒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并同这种政策进行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挑拨者威胁着一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们为了便于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企图瓦解和分裂各国内部人民力量的统一。为此就展开了纯粹是法西斯式的广泛的反共活动，鼓吹仇视革命工人的思想，凌辱并迫害所有虽属中等阶层出身、但不愿意替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效劳而力求使自己的国家免遭战争浩劫的人士。工人、工人组织以及最有觉悟最有威望的和平拥护者的任务，就是要努力设法增加这种真诚的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的数量，并领导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统一起来，以便与所有人民

的阶层实行合作，共同保障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迄今表明，代表着一切社会阶层、青年、妇女和知识分子的广大的、群众性的和平拥护者的民主团体，是执行这种任务的良好工具。所以这种团体应该在每个国家里，都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应该成为广大的人民阵线的基础，这种人民阵线不仅能够进行保卫和平的有效宣传，而且能够采取政治行动，以便对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阴谋。执行这个任务，就能克服那些反对统一的人在许多国家里用挑拨的手段所造成的民族力量的分裂状态，就能造成真正统一的民主力量和民族力量的运动，就能有助于各国人民建立这样的政府，这种政府将凭借工人阶级、人民和民族力量的统一，打破准备新战争的政策，对抗那种想使他们的国家屈从美帝国主义支配的企图，这种政府将坚持国际和平的纲领，消灭军备竞赛，恢复本国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并致力于和平经济恢复事业，提高劳动群众生活水平。法国、意大利以及欧洲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目前特别需要的正是这种政府，而不是替美帝国主义分子当奴仆的政府。工人阶级统一事业上的成果，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保证。

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应该坚持工人阶级的统一事业，并使之获得胜利。为了这个目的，它们必须进一步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提高自己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思想水平，更加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更加精确地进行组织工作，更加有效地进行宣传工作。必须孜孜不倦地和毫不动摇地反对任何一种机会主义的表现，必须努力设法消灭宗派主义思想，因为这种思想很严重地阻碍共产党人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目前对于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最严重的危险，就是在日常事变面前所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向困难投降，把反对和平、反对民主阵营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不明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斗争对于实现工人阶级统一与拯救和平是

具有决定的意义的，不明白这一斗争的胜利首先是取决于共产党人的坚韧不拔的工作。

美帝国主义与各国反动的资产阶级，都肆无忌惮地利用铁托间谍匪帮，以便阻碍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并在共产主义先锋队行列中间制造分裂和实行挑拨离间。拉伊克审判的结果对于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次审判向我们表明，必须经常提高革命警惕性，必须坚决地斗争，必须无情地铲除在同敌人斗争中的任何动摇的表现。我们应该用这种方法来捍卫和巩固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保持并加强共产党人对于统一事业的忠诚，保持并加强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苏联共产党，对领导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为民主、社会主义与和平而奋斗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忠诚。

工人阶级的统一事业，就是所有一切不愿意做帝国主义奴仆而力求打破资本枷锁，拯救和平，在和平环境中向美满的未来前进，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工人阶级的统一事业是我们切身的事业。在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艰苦奋斗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统一事业应该并且一定会在全世界上获得胜利。

№11770

法、波代表团关于陶里亚蒂报告的发言记录

（1949 年 11 月 17 日）

会议于 18 点开始，19 点 40 分结束

斯兰斯基同志建议委托契尔文科夫同志主持会议。

建议被接受。

就陶里亚蒂同志的报告进行的发言

杜克洛同志以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名义声明说，他完全赞成陶里亚蒂同志所做的报告。杜克洛同志说，我们把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看做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个任务与必须动员广大群众保卫和平有着直接的联系。右翼社会党人是帝国主义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的任务是分裂工人阶级队伍。

杜克洛同志还证明了，在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是如何企图完成这个任务的。法国解放之后，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成立了调解委员会，但是，在 1946 年 9 月 3 日社会党人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并以此取消了各党之间的统一行动。应该指出，当时使欧洲马歇尔化计划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莱昂·布吕姆作为全权特使被派往美国。显然，社会党人拒绝参加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是执行了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同时还谈到关于实现马歇尔计划的准备措施。

杜克洛同志继续说，但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莱昂·布吕姆，

为了给消灭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统一行动创造条件，在此前很久就已经不遗余力地行动了。在所谓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掩护下，布吕姆企图建立社会党与人民共和运动融合的基础（天主教徒）。伴随着这种企图的是对共产党进行疯狂的攻击，右翼社会党人将共产党称为外国民族主义党。这样一来，布吕姆就再一次表现出，他是反动派进行反共产主义宣传的工具。

在为欧洲的马歇尔化创造条件的同时，莱昂·布吕姆还发挥了关于必须放弃国家主权的论点，并企图用国际主义的旗帜掩盖这种恶劣的世界主义的表现。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人为接受马歇尔计划努力地创造着有利的政治条件。随着美帝国主义分子意图的暴露，社会党领导人的政策也越来越转向使法国服从于美国的利益。在加强旨在否定苏联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反苏运动的同时，一切宣传工具都投入到美化马歇尔计划，颂扬美国的仁慈等等的活动中。

但是，社会党人实行的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和疯狂地反对苏联的政策，在一部分劳动人民中间引起了不满情绪。考虑到劳动人民这种不满情绪的增长，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人想出了一种关于两个阵线斗争的谎言，提出了所谓的第三势力的理论，即为掩盖他们在美帝国主义分子面前的奴颜婢膝而制造的理论。但是，在马歇尔化两年之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确信，马歇尔计划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化了。越来越多的人民大众开始谴责马歇尔计划，并在揭露和谴责欧洲马歇尔化的同时确信，共产党人是正确的。

杜克洛同志接着指出，还有一些劳动大众，他们没有把马歇尔计划与北大西洋公约必然地联系起来，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进了一步。但随着共产党光荣地完成了业已形成的政治局势所赋予它的任务，群众对许多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体现在：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发放不足，提高中小纳税人的税率，军费支出的增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法国开展了工人阶级为争取自

己队伍统一的斗争，同时分裂工人阶级力量的运动也开始了。这些运动的结果却辜负了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人及其主子们的希望。在1947年整个第4季度期间，在法国工人阶级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运动。劳动人民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政府迫使议会对旨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卑鄙的法令进行表决。不甘心让诺斯克[①]抢先的儒勒·莫克，向正在为争取自己要求的工人们开了枪。

与莱昂·布吕姆串通并按照他的命令，若奥[②]采取了分裂法国总工会的行动，自此以后，在官方的各界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谈论，说法国总工会组织将被取缔，而旨在孤立共产党的政策将会取得成功。自然，若奥的分裂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总工会，这不仅是因为总工会的一些成员转向了分裂者一边，而且还因为，分裂对工人某些阶层的道德状况也是一个打击。尽管如此，法国总工会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法国工人的主要的工会组织。

谈到法国的罢工运动，杜克洛同志指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化了。在1948年10月和11月，发生了矿工的罢工运动，显示了法国劳动人民的辉煌战斗力。法国政府利用恐怖的方式企图摧毁工人的抵抗运动，但是遭到了失败。借矿工的罢工运动，政府企图打击共产党。企图孤立共产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其倡议者所想像的那样。

杜克洛同志接着指出，1948年在法国实行马歇尔化的后果是出现了一系列的政府危机。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情绪。工人和职员

① 诺斯克·古斯塔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之一，自1918年11月的德国革命之后，参加了政府的工作，作为镇压德国工人运动急进派的革命行动的组织者之一而闻名。

② 若奥·莱昂，法兰西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之一，1945～1947年担任法国劳工总联合会书记，1947年组建独立工会联合会“工人力量总工会”，该组织亲近法国社会党。

坚决要求提高工资，同时中产阶层也反对过高的税收。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条件下，法国共产党认为，必须把主要的力量集中在争取工人阶级队伍统一的斗争上。在1949年4月，在蒙特勒伊召开的全国党的代表会议工作中，这个问题成了主要问题。代表会议动员全党，必须重视在社会党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解释工作。各县的选举经验表明，在进行过认真工作的那些地方，都获得了良好的结果。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动员全党将揭露社会党右翼领导人的政策应该与争取基层统一行动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是绝对必要的。

杜克洛同志说，今年的夏季，工人争取直接要求的斗争还表现在，他们要求发放一次性休假津贴。这实际上已经是提到日程上的关于提高工资的问题。最近数月已经可以确认，工人进行斗争以及实行统一行动的愿望更加强烈了。还应该指出，对马歇尔计划造成的后果的不满情绪也更加强烈了。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工人的阶级觉悟的提高，这是我们党努力揭露造成劳动人民艰难处境的原因的结果。还应该强调指出，法国总工会所进行的争取消灭出现在企业的某些生产委员会中的与企业主合作的倾向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从7月和8月开展的罢工运动情况，可以预见这个运动在秋季将会更加猛烈。正是恐惧罢工运动的再一次高涨，才引起了1949年10月5日的政府危机。罢工运动是在统一行动的旗帜下进行的。最后，在法国总工会的各个工会组织、法国基督教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工人力量总工会”之间，签署了协定，在个别情况下甚至是在各省的范围内也签署了协定。

这种统一在工人们为争取自己的直接要求的斗争中实现了。与此同时，参加共同行动的不仅有法国总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组织的成员，而且还有“工人力量总工会”分裂派的各个基层组织的成员。在那些进行统一行动的地方，罢工运动绝大多数是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的。

杜克洛同志说，经验表明，工会组织的右翼领导人只是在基层组织的压力下才同意了实行统一的行动。害怕在群众中失去影响迫使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同意在那些群众提出要求的地方实行统一的行动。而与此正相反的是，在基层组织中实行统一行动的工作做得不够充分的那些地方，以及在那些还不具备实行统一行动所必需的条件的那些地方，分裂派工会组织的领导人破坏争取统一行动的运动，这正如在不久以前在北部省纺织工人的罢工中所发生的那样。

在最近一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是，人数众多的工会基层组织，在争取自己的直接要求的斗争中联合起来，赞成建立一个将实行另外一种政策的政府。

在政府危机期间，法国共产党开展了运动，其口号是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和实现包括 11 项条款的广泛的纲领，一切坚持和平事业、坚持民族独立和捍卫人民权利的法国人，都可能接受这个纲领。

接着杜克洛同志举出了一系列的例子，表明群众的行动是有利于建立这样的政府：10 月 10 日，里昂电话厂的 1800 名工人派出由法国总工会、法国基督教劳动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团来到省城，提出建立新政府的要求。第二天，在法国的北部省、加来海峡和菲尔米尼亚，22000 名矿工宣布罢工，而在博连运河地区，有 6000 名工人进行了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建立民主统一的新政府。在整个 10 月份，这样的罢工运动和群众集会还出现在土伦省、拉芒什省、佩季特－罗塞尔、蒂尼（萨瓦）、罗纳河口等地区。

杜克洛同志说，应该着重强调在法国业已形成的新局面的全部意义，而不必担心被指责夸大了事实。改变政策和改变政府的思想已经越来越渗入到群众之中。统一的思想已经获得了相当的成就。法国总工会提出的关于实行统一行动的建议，加强了罢工运动的发

展。需要的是我们应该向工人群众说明他们斗争的前途。虽然还不能说群众对必须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已经有了明确的概念，他们提出的直接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但是，可以说，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不但如此，我们还应该与过低估计现存条件的现象进行斗争。我们的一些同志对现存条件估计不足，应该与在群众运动赋予我们的责任面前缺乏坚定性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杜克洛同志说，战争贩子十分清楚在那些良好的条件下群众会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在法国已经存在了，正是由于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中，人们都在思考着如何打击我们的党。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不久以前开始的反对共产党报刊的诉讼案，要求剥夺共产党人在议会中的不受侵犯权，以及为取消共产党人的议会代表资格而准备的政治策略。

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目前尤其表现在美国与英国之间的这些矛盾，同样也反映在被马歇尔化了的国家的政党身上。反对建立没有英国的欧洲联盟的社会党领导人已经暗示，他们竭力使工人阶级脱离开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希望加强分裂的政策，其目的是在全国各地的日益激烈的争取统一行动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谈到法国共产党在对待社会党人的政策时，杜克洛同志提醒说，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之后，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这个政策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从日丹诺夫同志报告的结论出发，法国共产党阐明，社会党领导人是美国共产党在法国打击的重点目标，因此必须向群众解释清楚，共产党人的主要打击目标是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人。法国共产党详细地解释了关于右翼和左翼原有的概念，尤其是在法国，这些原有的概念妨碍对一些政治问题的正确理解，鉴于这一点，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批评性的态度分析了战前时期建立统一阵线的经验。对于法国共产党在那一时期的旨在建

立统一战线的政策来说，最具代表性的是与社会党上层人物达成的协定。法国共产党没有成功地在基层组织里建立调解委员会，这有利于社会党领导人在战前时期的分裂策略。

杜克洛同志接着说，我们纠正了“滑落到右倾的方向”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述，在评价社会党的政策时我们使用了这种表述方式，因为这种说法有助于掩盖右翼社会党人所扮演的真正角色——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走狗。法国的右翼社会党人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阻碍我们党联合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如果将目前的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力量对比情况同战前的情况相比较的话，那么应该说，在这种对比中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深刻变化。

战后时期在一些国家里，社会党人得以在工人运动中保持了领导地位。在法国，共产党要比社会党强大得多。社会党人在工人之中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但是，如果认为社会党人完全没有这种阵地是错误的。不应该怀疑，在北部省、上维埃纳省、上加龙省等省，跟随社会党人的还有很多工人。除此以外，还应该考虑的不仅仅是作为社会党党员的工人，而且还有处于其影响之下的工人。

杜克洛同志指出，我们应该与我们某些同志所持的倾向进行斗争，他们认为，由于社会党丧失了许多党员以及它在竞选运动中遭到的严重失败，社会党人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这种倾向将会导致削弱甚至是停止我们反对右翼分子的斗争，并导致取消我们与社会党的工人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

目前，在社会党成员之中存在着对国内业已形成的局势强烈不满的情绪，鉴于这种情况，社会党的某些领导人，如居伊·摩勒、丹尼埃·麦耶，赞成党拒绝参加政府。他们认为，通过进行蛊惑宣传就能够轻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工人们脱离共产党人的影响”。社会党领导人还指望对议会中共产党的代表进行打击，并以此来缩小共产党的影响力。在反共方面社会党人是改变选举法的最

积极的拥护者。

为了实施我们的旨在建立统一阵线的政策，必须向群众说明社会党领导人所扮演的真正的角色。我们应该向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发动进攻，揭露他们的谎言，借助这些谎言他们企图欺骗和瓦解部分工人阶级。当我们在社会党的工人之间进行这些解释工作时，应该更着重强调处于和平阵营之首的苏联所起的作用。我们应该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恢复、发展经济以及推广苏联文化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此一来，我们将提出更加明确的口号："法国人民不会，永远也不会与苏联战斗"。

我们的目的是吸引社会党的劳动人民为争取直接要求（提高工资、降低税收、消除失业现象等等）而进行共同的斗争，并向他们表明，人民群众的贫困处境都是欧洲马歇尔化的后果。杜克洛同志说，法国共产党应该在社会党的劳动人民中加强解释工作，向他们说明，目前庞大的军费开支，一方面是由于在越南，布吕姆开始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另一方面是由于实行了北大西洋公约，这些是造成国家生活各个领域中困难的原因。法国共产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应该与自己队伍中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回击那些企图将社会党的领导人和普通的工人党员同等看待的人。他们的那种立场将会使我们在争取社会党工人党员方面的条件变得毫无用处。显然，那种立场有利于社会党右翼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如果共产党希望尽全力地实行与社会党工人统一的政策，那么，它就应该更加坚决地、以更加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揭露社会党右翼领导人的这种政策。已经有无数的事实，使我们能够表明帝国主义分子的政策所造成的一切罪恶，而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人是为这些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

杜克洛同志声明说，在本次情报局会议结束之后，法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吸引社会党的工人党员与共产党人共同进行斗争，因

为这是保卫和平斗争取得胜利的条件之一。杜克洛同志说，在法国，我们有这样的环境，这种环境与意大利的环境是有区别的。确实，在法国有着单一制的社会党，但是，它有一些党员在议会于1947年底对卑鄙的法令进行投票表决之后脱离了社会党，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党。这个党在社会党的工人群众中没有多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的宗派立场阻碍了该党的发展。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够将这个党看做是建立与社会党工人统一阵线的充分工具。

至于说作为天主教徒的劳动人民，杜克洛同志指出，可以确定：在工会组织的计划中，他们对于同我们进行一致行动的态度，要比社会党的工人党员和“工人力量总工会”成员的态度更积极一些。梵蒂冈的法令没能阻碍这个运动的发展。在我们与天主教上层的活动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还执行着一个帮助天主教中的劳动人民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进步的天主教徒的运动——这个运动具有知识分子运动的性质，并把那些值得我们尊重的人进行了分类——看做是为与天主教中的劳动人民建立广泛的统一阵线的一次不充分的运动。在这方面工会运动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

目前正在召开的法国总工会人民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几天之前向法国基督教劳动人民代表会议、“工人力量总工会”以及工业干部独立会议提出了关于实行统一行动的建议，并号召他们在所有的企业里实现这个统一行动。这就是使工人阶级达到统一的道路。在这个运动中，共产党人的任务还应该包括，展示斗争的前景，积极进行提高群众觉悟的工作，使他们坚信，改变现行政策和现任政府是非常必要的。

在发展和巩固为争取和平和自由而斗争的市政委员会的同时，我们已经沿着工人阶级统一的道路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但是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任务。不可以将统一与斗争分开，因为只有在斗争中以及为了斗争才能够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的统一，这是更广泛地

联合人民的必不可少的基础。

杜克洛同志说，从苏斯洛夫同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我们必须动员全体人民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只有当我们将全部力量投入到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事业中，这种动员工作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这一任务与我们争取和平的斗争分开的原因。

杜克洛同志表示坚信，陶里亚蒂同志报告中的指示，将被法国共产党广泛地用于为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陶里亚蒂同志是正确的，他强调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最大的危险是在事件面前的消极态度，以及在困难面前的投降行为。如果不克服这种消极的危险的弊病，就不可能认真地进行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

杜克洛同志说，法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它在和平阵营所进行的斗争中应该起到的重要作用，法国共产党将努力做好一切工作，以使工人阶级的敌人和右翼社会党人旨在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破产。

杜克洛同志说，我们将努力做好一切工作，以使工人阶级的统一具有现实性，不能由于这要求进行非常顽强和系统的工作而放弃。谈到为吸引受到欺骗的阶级兄弟实行符合劳动人民现时和将来利益的阶级政策时，不应该吝惜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敌人害怕我们的行动具有民族的和国际的意义，他们打算将我们党的作用变得毫无意义，但是他们的愿望最后还是落空了。遵循着情报局本次会议的受到列宁－斯大林伟大党的指示鼓舞的决议，作为伟大的斯大林的忠诚的学生去行动，我们必将使敌人的计划遭到破产。我们不仅不允许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社会党的右翼领导人降低法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正相反，我们将通过进行持续不断的、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英勇斗争来扩大这种影响力，这也可以加强争取粮食、争取自由和争取和平的斗争。

实现自己力量的战斗统一，法国的工人阶级就可以阻止我们的

国家变成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国际民主和工人运动的侵略行动的根据地。

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是加强工会组织、妇女运动和青年运动的工具。这种斗争也是加强和平和自由勇士运动的工具。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争取广泛联合全体法国人民的旗帜下，我们将奋勇战斗，并在保卫和平和恢复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取得胜利。

我们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还要解释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部意义，它的和平政策应该得到支持。我们将动员我们的人民参加反对西德政府的斗争，这个政府不是别的，而是发动战争的工具，它将法国的安全置于威胁之下，并在战争赔偿方面践踏了法国的权利。

我们将去战斗，并永远牢记莫里斯·多列士代表党所承担的义务。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主义联邦议会代表会议上声明说："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相信，目前，如同在 1919 年和 1939 年时一样，您将不会为您的忠诚的法国儿女们感到惭愧"。

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杜克洛同志表示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法国人民将联合起来，进行保卫和平的斗争，同时坚信，以自己的统一和自己的斗争，法国人民能够有助于拯救和平的事业，并以此来获取第一个胜利，随后将获取其他的胜利。

萨瓦茨基同志说，波兰工人运动的联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进行的[①]，这种联合结束了其队伍的长达 50 多年的分裂状况，无可争议，这种联合是工人阶级和民主波兰自国家被英勇的苏联红军解放之日所获取的最重大的成果。这种联合结束了波兰共产党人进行了 30 年之久的斗争，即依据列宁－斯大林学说的精神所进行的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顺利地解决这

① 指的是 1948 年 12 月波兰社会党与波兰工人党联合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

个根本问题的斗争，而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

战前以波兰社会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其各种各样的反苏民族主义倾向的有害影响，是分裂的主要原因，这种分裂削弱了波兰的工人运动，并致使工人阶级遭受了许多失败。对于波兰法西斯主义的、导致波兰被希特勒占领者所奴役的背叛政策，这个波兰社会党负有不小的罪责。

萨瓦茨基同志说，在1940年被占领期间，在波兰社会党队伍的内部出现了分裂，并形成了一个左派社会党人的集团（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右翼社会党人在希特勒分子占领期间，在所谓的伦敦流亡政府里形成了臭名昭著的反苏集团。在波兰获得解放之后，曾经是英、美侦察机关的分支机构和法西斯地下突击队的一支队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挑衅和破坏活动，组织了间谍、怠工以及恐怖行动。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的左派在波兰工人党的直接帮助下，逐步地加入了反对希特勒占领者斗争的统一阵线。

左派社会党人在转向领导工人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进行联合的道路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过程，是充满了犹豫和动摇的过程。例如，只是在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本身于1944年分裂之后，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左翼才加入已经成立的、领导波兰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全国人民会议。

在苏联红军解放了波兰之后，已经复兴的、当时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领导的波兰社会党，在已经加入其中的并进行活动的右翼社会党人的影响下，企图阻碍统一阵线的发展。

萨瓦茨基同志强调说，与社会党的统一阵线使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达到了统一，几年来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陶里亚蒂同志在其报告中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运动所做的深刻评价，尤其是陶里亚蒂说的这样一句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与右翼分子进行不可调

和的斗争中才能实现统一。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奥苏布卡的右派被驱逐出社会党的领导层。

1948 年 6 月，当联共（布）中央在自己的信件中预先警告铁托集团的背叛立场时，哥穆尔卡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取党的领导权，提出了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社会党进行联合的纲领，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个纲领将导致向社会民主主义投降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哥穆尔卡企图为波兰社会党及其历史进行辩解，伪造波兰工人党的历史，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以及波兰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先驱的历史。哥穆尔卡竭力将整个波兰社会党归入联合以后的党。

萨瓦茨基同志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分子已经注意到这些企图，并在制定与铁托法西斯匪帮有关的计划时以这些企图为基础。例如，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机关刊物《外交》季刊，在标题为《波兰社会主义的命运》的文章里写到："哥穆尔卡认为，如果建立这样的群众性政党，即参加这个党的社会党人，首先是传统的波兰族人，只是在与波兰工人党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假马克思主义者联合之后才成为社会主义的，那么在波兰，民族的共产主义将会获得如此牢固的基础，以至于不借助苏联的直接的武装干涉，就不能顺利地推翻它。"

哥穆尔卡在 1948 年 7 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所进行的暗中攻击，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立即回击。

萨瓦茨基同志说，联共（布）的警惕性以及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案，使我们预防了面临的危险。

利用联共（布）的经验，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在党中央的七月和九月全体会议上（1948 年）勇敢地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粉碎了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正确地制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思想

基础和纲领性任务。[①]

萨瓦茨基同志说，还应该指出，在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体会议与去年12月的统一代表大会期间，进行了清洗运动，其结果是从波兰工人党中清除了大约5万名，而从波兰社会党中清除了大约8万名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

清洗党的队伍的斗争始终是在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的。与此同时，每时每刻都没有忘记侨居国外的、很久以前就被英、美侦察机关招募的右翼社会党匪徒，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阴谋诡计，并极力在从前的社会党人中间进行破坏活动。在争取实现统一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的斗争中，对党的队伍以及全体工人阶级的广泛动员工作，使工人阶级和波兰的全体劳动人民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经济和发展这个他们感觉自己是真正的主人的国家方面，以及在大大改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到今年11月1日前，根据统一代表大会的号召，提前两个月完成了恢复波兰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三年计划。这就为在1950年开始实行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六年计划预先创造一些条件。

人民波兰在前几年里取得的经济成果，使工人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逐年得到了改善。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已经超过战前水平的26.6%。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由于国内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以及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家、党和工会组织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工人阶级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成就。今年，有45万多名

① 1948年7月6~7日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对波兰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的评价，这种评价有别于哥穆尔卡在六月全会报告中所作的评价。在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哥穆尔卡被指控犯有“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并被免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工人和职员在由工会组织管辖的休养所和疗养院度假，有120万名工人和职员的子女在儿童夏令营度假。

对于工人和职员来说，这些实际的利益是看得见和感觉得到的，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加入了工会组织。因此，在遵循党的思想和政治行动的这个组织的范畴内，波兰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广泛地参加开展的竞赛、革新创造活动，以及踊跃提出合理化建议，进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波兰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以新的社会主义态度对待劳动和社会所有制形式。

克服改良主义的残余，清除自己各领导层中的社会党右翼官僚分子，工会组织学会了更顺利地履行在人民民主制度的条件下由党到群众这一传动皮带上自己的职能。

萨瓦茨基同志说，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右翼以及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工人阶级进行了联合，这使得工人阶级作为工农联盟的领导者，其毅力和主动精神都得到了发展。这一点表现在城市与乡村的结合中，表现在工厂对在全国各地组织和成立的新的生产合作社的支援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明年将建成130个功率强大的、适合波兰条件的国家机器拖拉机站，这个决定同时还将导致建立有组织的、强大的工人阶级有计划地援助劳动农民的基地，将加强对富农阶级的进攻，并在建设新的生产合作社方面给予有效的帮助。

萨瓦茨基同志说，人民的波兰在与被粉碎的、但还没有被彻底粉碎的资产阶级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激烈斗争中，在与英、美帝国主义破坏分子和间谍分子的斗争中，在与右翼社会党的反苏代理人的斗争中，在与铁托的特务挑唆者匪帮的代理人的阴谋的斗争中，取得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成绩。在阻止敌人的代理机关的破坏活动方面只取得了部分的、还远远不足的成绩。但是，这个斗争仍以非常尖锐的形式继续着。

萨瓦茨基同志强调指出，在波兰现有的条件下，同帝国主义的敌对代理机关的斗争，与彻底根除右派和民族主义倾向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是紧密相联的。萨瓦茨基同志说，同时我们还要为消除这种倾向的后果而斗争，还要与存在于许多波兰同志之间的和党的许多基层组织里的政治上的盲目无知以及缺乏应有的革命警惕性而斗争。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证明，仅仅一次打击是不能消灭这些倾向的说法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一次打击也不能消除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产生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总的根源是波兰资产阶级在数十年期间植根于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之中的反俄罗斯的以及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争取彻底消灭这种根源及其后果的斗争，要求付诸更大的努力、持续不断的和顽强的斗争。

萨瓦茨基同志说，利用联共（布）的丰富经验，我们党在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旨在贯彻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上的和组织上的原则。

今天已经有1300万名党员和候补党员的党，其社会组成情况如下：工人占总数的51.9%，农业工人占4.9%……（拉科西同志说是4%，这太少……），农民占14.3%，职员占26.1%，全会认为这种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职员所占的百分比过高，而农民所占的百分比明显是不足的。

力图改善党的社会成分，加强党的各个领导环节，全会做出关于调整接收入党的工作的决议，以便使90%的新入党的人员从优秀的工人、少地的农民和中等土地所有者的农民中挑选，而只有10%是从优秀的脑力劳动者中，首先是从技术知识分子和教师中选出。

将全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全面提高警惕性和清除其队伍中混入党

内的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的工作方面，全会决定对党的全部机关进行重新选举。选举总结运动应该加强党务机关中无产阶级的核心力量，阻碍从反对党中脱离出来的人员渗入到党务机关里。还要对党务机关的候选人实行见习期制度。

萨瓦茨基同志说，自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统一代表大会召开之日起已经过去一年了，一年的经验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声明说，统一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良好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对原社会党分子重新进行思想教育、铲除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精神教育全体党员的工作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只有在这方面做出巨大的努力，波兰统一工人党才能成为团结一致的、新的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全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完善政治教育工作的措施。

萨瓦茨基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了党的出版工作。如果说在 1948 年党务出版社出版了总共 50 万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那么在 1949 年将出版大约 650 万份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 110 万份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 1948 年出版量的 13 倍。最近还将用波兰语出版斯大林同志文集第 1 和第 2 卷。

还将扩大党校学习网，而直到今天，只有少数的党员能够参加各级党校的学习。

例如，各市和各县党委员会属下的夜校和短训班的数量明显不够，目前只能容纳 9 万名学员，乡党校只有 4 万名学员。近期将大大增加党校的数量。

对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单独学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了更好地组织这项最重要的工作，将扩大咨询网，增加讲座和参考材料，以帮助学习联共（布）历史的学员。

中央全体会议号召加强党内的民主，提高阶级警惕性，与盲目

乐观和自高自大现象进行斗争。全会号召更加密切地接触群众，以便了解群众的日常需要；勇敢地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在劳动和斗争中，利用联共（布）的经验，研究自己的错误，加强与各国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联系，使我们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变得更加巩固。

最后，萨瓦茨基同志指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应该使全党和全体工人阶级了解斯大林同志——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生活和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贡献，并通过这一途径达到预定的目标——使人民的波兰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研究斯大林同志的生活和斗争历史将提高党的思想水平，有助于教育列宁－斯大林式的活动家，为社会主义波兰奋斗不息的、与人民永远相连的、无限忠诚于苏联并与人民的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的战士。

联共（布）极其丰富的经验和给予的援助，以及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忠告，帮助波兰统一工人党找到了人民波兰发展的正确道路，使它在沿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了工人阶级的统一，并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统一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没有人打算发言，**契尔文科夫同志**宣布就会议日程第二个问题的发言到此结束，由陶里亚蒂同志讲话。

陶里亚蒂同志没有做结论性的发言，并建议成立委员会，按照会议日程的第二个问题起草决议案。

拉科西同志建议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陶里亚蒂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杜克洛同志、萨瓦茨基同志和雷瓦伊同志。

苏斯洛夫同志问，就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是否还有建议。

斯兰斯基同志建议将巴什特万斯基同志增补进委员会。

由斯兰斯基同志做了补充的拉科西同志的建议被采纳了。

№11771

乔治乌－德治在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1949 年 11 月 18 日）

会议于 10 点 30 分开始，13 点 55 分结束。

契尔文科夫同志：建议委托贝尔曼同志主持本场会议。

建议被采纳。

贝尔曼同志：请乔治乌－德治同志就会议日程中的第三个问题讲话。

乔治乌－德治同志的报告

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握之中

同志们！

从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这一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公布之日起，迄今已有一年多了。在这一时期内，南斯拉夫事变的发展情形，在布达佩斯进行的审判，以及铁托代表团在联合国组织中进行的挑拨活动，完全证实了这个决议的正确性，完全证实了这个文件对于世界革命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这个决议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揭露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反苏反共的本质，并确切地证明了这些人根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毫无共同之处。这个决议非常英明地预测到南斯拉夫后来事变的根源，指出“这种民族主义的路线只能致使南斯拉夫蜕化成为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它的独立，并变成帝国

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决议对铁托集团专为诬蔑社会主义而采取的那些蛊惑人心的和冒险的措施的经济后果所做的分析，也具有同样的科学预见性。决议大大地帮助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健全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分子反对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南斯拉夫的人民群众已经深深地体验到并且继续体验着这个决议的精神，他们从亲身的经验中体会到这个决议对攫取了国家统治地位的那些血腥刽子手的估计是正确的。

情报局的这个决议对于整个世界革命运动的方向和实践活动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由于这个决议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明确性，及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形成的局势下的阶级斗争问题有深刻的分析，使得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得以顺利地消除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并巩固了党内思想上的统一。世界革命运动得以更坚决地沿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前进。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更加深刻地领会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并认识到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苏联，这就是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和准绳。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成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多次胜利的基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由于这个决议而获得了反对民族主义倾向以及巩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确的斗争方向，并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确定了坚决而鲜明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非常英明和远见地警告我们注意某些思想倾向和糊涂观念，并帮助我们与这些现象做斗争。斯大林同志的这种帮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党有着无限宝贵的意义。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帮助，才使各国共产党得以避免了在实践和理论工作中的许多错误。

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杰出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帕尔米罗·陶里亚

蒂、福斯特[①] 等人在其关于各国共产党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时应采取何种态度的声明中，表示了他们本国劳动人民誓与具有解放使命的苏联军队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意志和决心。这种坚决反对英、美战争挑拨者的立场，在全世界各国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并成为群众争取和平斗争的重要推动力。

情报局决议是提高革命警惕性的一种强而有力的号召。它提醒大家：凡是陷入反苏主义泥潭的人都不免有滚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道路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是斯大林同志还在 22 年前就已经警告过的。当时斯大林同志说：

“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应该是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准备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而如果不保卫苏联的话，捍卫和推运这种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谁认为不经过苏联或者是反对苏联来捍卫世界革命运动的话，他就是在进行着反革命，他必然滑落到革命敌人的阵营去。”（《约·维·斯大林文集》第 10 卷，第 51 页）。[②]

我们的伟大导师的这些话在今天显得如何地恰当啊！阶级斗争的辩证法是毫不留情的。在全世界革命运动面前，在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前，铁托集团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对现今世界所分成的两个阵营采取所谓“独立路线”的辞藻，来掩盖其反苏反共立场，这种卑鄙无耻和虚伪骗人的企图，已经完全破产，并引起了人们的无限厌恶。铁托集团已经公开转到了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阵营方面，并正在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效劳服务。铁托集团转到了法西斯主义方面，这是反苏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它将南斯拉夫和南斯拉

① 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② 该文引自斯大林于 1927 年 8 月 1 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夫人民出卖给了美国垄断资本家，丧失了南斯拉夫的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和最后的一点自由，而在国内建立了极端残酷的法西斯恐怖制度。

在布达佩斯的审判中，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所揭露出来的种种事实，都充分证明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雅德、戈什尼亚克[①]、马斯拉里奇[②]、贝勃勒[③]、姆拉佐维奇[④]、伏克曼诺维奇、波波维奇[⑤]、基德里奇[⑥]、涅什科维奇[⑦]、兹拉蒂奇[⑧]、韦莱比特[⑨]及其他人，拉伊克、布兰科夫、科斯托夫、帕特拉什卡努及其同路人，都是英、美帝国主义谍报机关的代理人。他们这些卑鄙下贱的间谍和叛徒，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帮助过英、美帝国主义分

① 伊凡·戈什尼亚克，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南斯拉夫国防部副部长。

② 马斯拉里奇·鲍日达尔，南斯拉夫交通部部长。

③ 阿勒什·贝勃勒，1945～1949年担任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自1949年起担任南斯拉夫驻联合国组织的常任代表。

④ 卡尔洛·姆拉佐维奇，1948～1949年担任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1949年10月25日在苏联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依据是根据拉伊克诉讼案中提出的那些指控，仿佛在1947～1948年他在担任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期间，是反匈牙利和反苏联间谍活动的组织者之一。自1949年底从苏联返回之后，担任克罗地亚议会主席团主席。

⑤ 科查·波波维奇，南斯拉夫军队的总参谋长。

⑥ 鲍里斯·基德里奇，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政府计划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主席。

⑦ 布拉戈耶·涅什科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塞尔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塞尔维亚政府主席。

⑧ 萨沃·兹拉蒂奇，南斯拉夫共产党著名的党务活动家，在1946～1948年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代表，1948年5月起担任南斯拉夫轻工业部部长。1948年底，兹拉蒂奇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声明，不赞成与苏联和共产党情报局对立，为此于1949年1月被开除出党，随后遭到逮捕。

⑨ 弗拉吉米尔·韦莱比特，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在联共（布）中央于1948年春天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的信函中，确定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

子去准备立足点，以实现其统治全世界的计划。这个间谍和叛徒匪帮就像古代木马计中的木马那样钻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队伍中。铁托匪徒奉行他们主子的命令，力求达到一个罪恶的目的，即在已由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那些国家中，夺得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政权，镇压革命运动并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

在由苏联解放的中欧和东南欧的各国，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治家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是声名扫地了。人民的革命力量已经揭露了他们，并在政治上把他们击溃了。世界反动派曾经拼命地保护其在这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但是，反动派并没有以此为限。既然资产阶级政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自己没有能力来对抗那些受共产党与工人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于是帝国主义分子就来寻找用以恢复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的后备力量，以便引起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中的分裂，并在这种运动内部造成混乱状态。

列宁曾经告诫我们说，资产阶级具有很多政治经验，它即使在似乎已经山穷水尽的最困难的关头，也会企图找到一批一批出人意外的新的后备力量，以求挽救自己灭亡的命运。

铁托集团并不是偶然转到法西斯主义方面去的。这种转变是遵照他们那些主人，即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令而实现的，现在业已查明，铁托集团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英、美帝国主义分子雇佣了。

南斯拉夫的叛徒们奉行着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旨意，力图在各个人民民主国家里造就一些由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教权派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分子组成的政治匪帮，以便依靠他们来在这些国家里实行政变，使这些国家脱离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去听受帝国主义统治势力的支配。铁托集团把贝尔格莱德城变成了美国间谍活动中心和反共宣传中心。

还是在大战时期，即在 1943 年时，当时对米哈伊洛维奇和前

国王彼得的流亡政府表示赞助的英国广播公司，即已经急剧地改变了论调，而对铁托表示好感。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有个英国军事代表团驻在铁托的司令部里[①]，接着，铁托还任命了韦莱比特上校（现时已经是将军）这个英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充任驻伦敦的代表。帝国主义的阴谋开始显露出来了。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关对马其顿问题发表了一篇实质上带有民族主义性质的政治宣言，公然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号召马其顿的爱国志士从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中逃走而转归铁托支配。于是铁托所派派遣的密使（伏克曼诺维奇亦在其中）便马上着手在马其顿共产党和希腊共产党内进行破坏工作。

丘吉尔当时派了自己的儿子伦道夫负着专门的使命到铁托那里去。不久以后，这个老反动分子兼苏联的死敌，又亲自与铁托会过面。[②] 铁托及其党羽早在当时就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特别的关照和信任。

另一方面，据南斯拉夫波比沃达将军[③] 的揭发，真实地暴露了铁托、兰科维奇及其他等人对纳粹侵略者及德国秘密警察机关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并且暴露了他们在战争最艰巨的时刻卑鄙地背叛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行为。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铁托集团尔后所采

① 关于1943年向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最高司令部派英国军事代表团这件事，苏联政府一开始就从铁托和英国政府那里知道了这件事。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苏联的支持，英国被迫于1943年与铁托建立了关系，而在苏联与南斯拉夫冲突时期，这种关系被苏联的宣传机关描绘成仿佛是“帝国主义分子”与自己的“代理人”之间的秘密联系。

② 丘吉尔与铁托的会面是1944年8月在那不勒斯进行的。

③ 彼罗·波比沃达，南斯拉夫的空军少将，1948年8月逃离了南斯拉夫，是1949年春天在苏联成立的南斯拉夫“革命侨民”组织的负责人，稍晚些时候成为在苏联的庇护下，在苏联以及东欧其他国家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侨民反铁托联盟的领导人。

取的立场。因为工人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被资产阶级警察机关收买了一次，那他就会终身受着资产阶级警察机关的支配。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极力宣扬铁托匪帮的卑鄙观点，把这种观点推崇为国际范围内的反共榜样。他们力图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也吸引到铁托的影响之下。但是帝国主义分子的计划失败了，“元帅”的帽子终归掩盖不住国际资本间谍的真面目。

一切真正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朋友，都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是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坚固可靠的保卫者，是和平的主要支柱；然而假冒苏联的朋友而攫得政权的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却按照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令进行着诬蔑挑拨的反苏宣传，为此竟不惜采用希特勒匪徒武器库中最卑鄙的手段。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想在南斯拉夫境外传播铁托的反苏反共破坏政策的一切企图，都被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钢铁般的统一打得粉碎。

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贝尔格莱德的法西斯暴徒们便开始诉苦，说他们受到了不公允的处置。但他们的惟一用意，是要设法更长久地隐藏其卑鄙的过去及其与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事实。布达佩斯举行的审判，就是对铁托集团的一种迅雷般的打击。

事实证明，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由于犯了某种错误，**而是由于一个久已在警察机关和资产阶级谍报机关中服务的间谍、告密专家和奸细的匪帮自觉地执行着反革命、反苏、反共的政策**。南斯拉夫现今的领导人，大部分都是1941年由德国秘密警察机关从法国集中营派到南斯拉夫去的。

对拉伊克－布兰科夫匪帮罪行的揭露，对他们的审判以及处决，应该被看成是社会主义和民主阵线在反对帝国主义阴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在布达佩斯的审判中所查明的事实，最终撕破了铁托及其党羽的假面具，在南斯拉夫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揭露了

他们的真面目，使大家都认识他们是以美、英帝国主义雇佣走狗的身份钻进了工人运动队伍中来的老间谍和奸细。

美帝国主义分子旨在恐吓和破坏各人民民主国家，在中欧和东南欧建立以铁托集团为前锋的反苏联盟的计划，就**是帝国主义发动新世界大战的总战略计划中的一部分。因此，这个计划的被揭穿是战争挑拨者所遭受的重大失败，是和平拥护者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铁托－兰科维奇集团最终变成帝国主义直接代理人和战争挑拨者同谋犯的表现，就是南斯拉夫政府公开加入联合国组织中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联合国组织中，卡德尔、吉拉斯和贝勃勒之流对于国际政策在各个最重要的问题上，都与美国反派采取一致的行动。[①]

铁托集团的对外政策——**就是卑鄙龌龊的反苏联的政策**。贝尔格莱德的反革命代理机构执行着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新世界大战的挑拨者所分派给他们的任务。

法西斯暴徒们企图向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隐瞒自己想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的实质。他们那种已经在布达佩斯审判中被揭穿的行动，就是他们积极参加实现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军事计划的确凿证据。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分析铁托集团对外政策趋势时早已经说过，在不久的将来，铁托为了效忠于自己的主人，也许会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现代战争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及其矛盾，不是帝国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现在，这种说法果然已经成为南斯拉夫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口号了。贝尔格莱德法西斯匪帮关于对外政策问题所发表的一切言论，都只是力图诬蔑和诽谤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铁托集团说

① 这里指的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选举东欧的非常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时，苏联提出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而南斯拉夫则提出自己作为候选人，驻联合国的西方代表团支持了南斯拉夫的提案。

来，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帝国主义分子的存在。铁托集团的每一言论都充满了反对苏联和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仇恨和恶意。

英、美帝国主义主子们会要求自己的代理人铁托在目前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加紧积极的活动。苏联所获得的巨大声望，使帝国主义分子深深地感到不安。帝国主义分子所授予联合国组织中铁托代表们的任务，是要他们来破坏和平主力苏联的威信，并施放一种烟幕，使人们识别不出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是战争的挑拨者。

铁托的代表们用尽一切力量来企图诽谤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家间建立在平等原则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新型关系，即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对于世界各国所有一切渴望和平、自由的人民，所有一切依赖于美帝国主义的各国人民，都起着吸引的作用。狂暴嚣张的铁托集团在这些事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是由于来自苏联方面的社会主义的帮助，“各人民民主共和国业已进行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此时人民已经体验到自由和独立生活的快乐，感到他们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把他们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于巩固和发展祖国的事业”（格·马·马林科夫 1949 年 11 月 6 日的报告）。同时，美国经济却面临着灾难性的危机，这种危机将把所有一切与美国相依为命的国家，包括南斯拉夫在内，都牵扯进去。

铁托集团在当前这次联合国大会上完全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现在大家都很明白，谁是这个集团的后台老板，这个集团究竟是为谁服务的。

铁托竭尽全力地执行着他那些主人的一切命令。铁托奉行华盛顿的旨意，甘心情愿地出卖任何一种民族利益。《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贝尔格莱德的记者，早在今年 6 月他那篇题为《美国将要求铁托作政治让步》的文章中就声称：南斯拉夫政府对奥地利提出的各项要求，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以及在对希腊游击队的问题上，其立场将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奴仆——叛徒铁托，确切地执行了主人

的一切命令。他放弃了斯洛文尼亚的卡林西亚地区[①]，并阻碍的里雅斯特区内南斯拉夫人问题的公正解决。至于希腊问题，那么艾奇逊在此次联合国大会的开幕词中已强调指出，南斯拉夫卖国政府已经改变了对该问题的立场。[②]

所有这一切就使得《泰晤士报》指出：在对外政策方面，铁托已经把某些妨碍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联系的障碍消除了。若用资本家的语言来表示，这就是说可以向代理人铁托提供他所要求的美元了。

在对内政策方面，铁托－兰科维奇叛徒集团活动的主要结果，便是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制度事实上已经被消灭。

由于篡夺了党和国家权力的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实行反革命政策的结果，在南斯拉夫已经确立了反共产主义的、法西斯式的警察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社会基础就是乡村中的富农和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南斯拉夫的政权实际上是操纵在反人民的反动分子手中。在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里活动的有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积极分子，富农及其他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分子。掌权的法西斯上层分子倚仗着无限庞大的军警机关，对南斯拉夫的各族人民进行压迫，把全国变成了军营，消灭了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压制任何意见的自由发表。

---

① 在1949年5～6月召开的巴黎外长会议第6次会议上，苏联改变了以前的立场，拒绝支持南斯拉夫提出的对居住着斯拉夫居民的奥地利卡林西亚省的领土要求。结果是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四国外长达成了不改变战前奥地利边界的协定。在答复南斯拉夫提出的致莫斯科的抗议照会时，苏联政府声明说，早在1947年，南斯拉夫政府在与西方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时，实际上已经背着苏联放弃了以前提出的对奥地利的领土要求，因此，南斯拉夫已经没有权利就这个问题向苏联提出抗议了。南斯拉夫人批驳这一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

② 1949年夏季，南斯拉夫停止了此前经过它的领土进行的援助由共产党领导的、为反对希腊政府而战斗的希腊游击队武器、弹药和提供基地的行动。

南斯拉夫的统治者蛮横武断地欺骗人民，硬说他们是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明白，在南斯拉夫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建设，因为铁托集团既同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决裂，因而也就使南斯拉夫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铁托集团已经使南斯拉夫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听命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支配。

最近的事变表明，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处在完全依赖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并已经变成了后者侵略政策的工具，结果使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主。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同帝国主义分子集团完全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反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

铁托和兰科维奇在国内实行疯狂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民主思想的自由发表都不免要招致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一切人权都受着残酷的践踏。监狱中充满了共产党员、罢工工人和拒绝参加所谓的“自愿的”强迫劳动的农民。监狱中实行严刑拷问，毒打和鞭挞，使人失明和挨饿的制度，弄得全国惊惶不安。掠杀和枪决事件数不胜数。今天的南斯拉夫乃是杀人不眨眼的国家，乃是囚禁各族人民的监狱。①

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仆从篡夺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地位之后，就广泛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那些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

① 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乔治乌－德治报告中的下面一段话：“无产阶级冶金企业”的工人们写道：“我们的处境同占领时期的处境没有什么区别。不久以前，我们每小时只挣 12～16 第纳尔。后来又将明显具有剥削性质的规定强加于我们。从前每月可挣到 3200 个第纳尔的工人，现在只能得到 2400 个第纳尔，而其余的都被由国家保安处任命的作业队负责人拿走了。铁托对工人的‘社会主义’就是如此表现的！”

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南斯拉夫独立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成千上万名忠于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爱国志士被开除出党籍，被囚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其中有许多人在监狱里惨遭杀害或者是被暗害，例如有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阿尔索·约万诺维奇[①]就是其中的一个。南斯拉夫用以摧残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残酷手段，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或者希腊的察尔达里斯[②]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刽子手们所采用的那种暴行，才可与之伦比。

茹约维奇同志、赫布朗同志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其他许多领导者，许多英勇进行过反希特勒斗争的将军、上校及其他军官，出色的党务工作者、大学教授、进步知识分子、工人和劳动农民，——这些爱护自己的祖国并渴望它很快能从帝国主义爪牙下解脱出来的人，这些爱戴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人，都被囚禁在牢狱里，并随时有惨遭杀害的危险。

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一面把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加以种种摧残，一方面又为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大开入党之门。

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健康力量被铁托匪帮摧残的结果，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关已经完全落到一群间谍、杀人犯及帝国主义仆从的掌握之中。这些擅自用党的名义出来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公然把持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大家知道，资产阶级老早就采用着一种惯用的伎俩，在工人阶级政党内部为自己招收间谍和奸细。现在，帝国主义分子正是用这种伎俩来力图从内部瓦解工人阶级政党，使其

① 约万诺维奇·阿尔索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活动家，而是一名军人，南斯拉夫军队的上将，他在1948年8月企图越过边界逃亡到罗马尼亚时，被南斯拉夫的边防部队击毙。

② 察尔达里斯·康斯坦丁诺斯，在1946～1947年担任希腊总理和外交部长，1947～1950年担任希腊副总理和外交部长。

听从他们的支配。在南斯拉夫方面，他们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

铁托集团的法西斯思想，他们的法西斯对内政策，也如他们那种完全受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支配的卖国的对外政策一样，使得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间谍集团与爱好自由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处于水火不能相容的地位。因此，铁托集团所干的祸国殃民的勾当，受到来自南斯拉夫所有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员方面，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方面日益增长的抵抗。

我们向南斯拉夫所有一切在兰科维奇刽子手主持下的监狱和集中营里勇敢地经受血腥恐怖痛苦的同志们，致以共产主义的战斗敬礼！

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一天比一天更使劳动人民难于忍受。国营部门并不是人民的财产，这是专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部门。

南斯拉夫的工人不是在为自己做工，不是为本国人民做工。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被外国银行和托拉斯攫为己有。在各个企业里，例如在斯图拉铸铁厂、马利波尔附近的修车厂和特尔波弗勒各矿井中发生的罢工，都遭到兰科维奇手下的血腥镇压。

铁托集团为反对劳动群众而实行的法西斯恐怖专政是有利于外国资本和本国城乡资产阶级的。与富农势力的巩固同时发生的，还有城市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贝尔格莱德法西斯骗子们想用“消灭剥削”或“社会主义胜利前进”的胡说，来掩盖其恢复资本主义的措施。一年半以前叛徒卡德尔曾经声明说：“在我们国家里，人剥削人的最后残余存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实际南斯拉夫城乡中的资本主义剥削更为加强了；富农和其他剥削者都在赞美着自己的恩人——叛徒铁托。

由于对苏联和对各人民民主国家采取敌视政策的结果，铁托集团即使南斯拉夫失去了这些国家的援助，因而也就使**本国的五年计**

划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越来越清楚，铁托关于在没有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并且反对他们的条件下，也能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的胡说，该是多么卑鄙和下贱的谎言。

乡村中劳动农民的状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了。农民惨遭富农方面的残酷剥削，备受苛捐重税和强迫劳动的痛苦。用强力建立起来并由富农领导的“生产合作社”，乃是剥削劳动农民的新形式。拥有农具的富农在所谓的“合作社”中剥削贫农的劳动，比在他们私自的农庄里更残酷得多。①

最近以来，铁托愈加频繁地实行一种最残酷的剥削形式，即无报酬地强迫劳动，以利于外国资本。他把砍伐木材、建筑公路等等的工作都称为“自愿工作”。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强迫去参加这种伐木工作。

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诸森林地区砍伐木材运往英、美去的所谓“自愿工作”。在招募人员参加“自愿工作”时，事先不作任何通知。国家政权机关代表乘吃午饭时或者在夜间跑来，把列入预先拟定的名单中的人员强迫拉去。这些人往往是不符合条例中所规定的条件的，即是说他们或者太老(55岁)，或者是太幼（不满14岁），其中还有许多病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病人和老年人占被动员参加工作者总数的20%。甚至医生发给的免除“自愿工作”的证明书也被置之不理。每日的工作时间由10小时到14小时，饮食很差，午餐是一碗豆汤、200克面包和200克玉米粥。衣服是不发给工作人员的，他们在森林的地上睡觉，雨天就常常睡在泥泞中，因为那里连棚子都没有。除人以外，工作牲畜，如马和公牛也“自愿地”被拉去。这种强迫劳动受

①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报告中的下面一句话：“这些‘生产合作社’是铁托制度的最荒谬绝伦的发明。”

到来自群众方面的日益激烈的反抗。

在南斯拉夫执掌政权的杀人犯和间谍匪帮所实行的民族政策，乃是法西斯式民族沙文主义的种族政策，是对少数民族实行野蛮压迫及剥夺其任何自由发展权利的政策。

少数民族的组织被解散了，他们的忠诚领导者被逮捕了，并在南斯拉夫法西斯刽子手监狱里惨遭杀害。

由于南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刊物，也如南斯拉夫的其他全部刊物一样，是由法西斯分子把持着，所以少数民族不能用本民族语言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

南斯拉夫的刊物，完全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铁托间谍和杀人犯匪帮。

南斯拉夫已经成了马歇尔化的国家。如果起初铁托及其集团大吹大擂，说他们没有债款也行，并发誓说美元决不能玷污他们“自己的力量”和他们的“特殊的道路”，那么今天的这些政治骗子却已经在公开向美国银行乞援了。然而谁都知道，美国银行家并不单以取得利息为满足。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派往南斯拉夫的代表团团长美国人豪尔，在贝尔格莱德城里主宰着一切，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声明说，他将要检查该银行的放款究竟作何用途。南斯拉夫的经济计划先要提交给这些垄断资本家去批准。凡此一切，都使人民不免受到马歇尔化所引起的种种苦难。

外国资本经过各种路线侵入南斯拉夫，结果已经使南斯拉夫丧失了经济独立的地位。

反革命代理人铁托所负担的最卑鄙的任务，就是要残害希腊民主军队。南斯拉夫刽子手铁托和希腊刽子手察尔达里斯彼此间达到了完全一致的协定，秘密商定要共同来消灭英勇的希腊游击队。当铁托命令自己的军队从背后攻击希腊民主军的时候，他的走卒伏克曼诺维奇便在《战斗报》上评论希腊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伏克

曼诺维奇在希腊爱国志士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公然用险恶至极的卑鄙手段攻击希腊共产党的领袖和萨哈利阿第斯同志。铁托匪帮知道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希腊游击队抱有极大的同情心，所以才准备了这样一套荒诞“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老奸细伏克曼诺维奇当时写道：“由于领导机关对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军队的组织和训练问题、政权问题、与帝国主义者的相互关系等问题）采取了绝对错误路线的结果，‘激战’已经失败了”。

这些文章并不能掩盖铁托集团的卑鄙行为，因为在该集团所做出的一切罪恶中，协助保皇法西斯反对希腊游击队的行为乃是一种穷凶极恶的罪行。

所有这些事实，都充分表明了铁托集团所施行的秘密政治警察统治和法西斯主义政策。

然而南斯拉夫人民向这个间谍、奸细和杀人犯匪帮作总清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根据以上对南斯拉夫状况的分析，应该做出一些什么结论呢？

1. 铁托间谍集团所代表的不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意志，而是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志，因此，它出卖了本国的利益，并使南斯拉夫丧失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的地位。

若不进行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便无从进行反对新世界大战挑拨者的斗争，因此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显然具有国际的意义。

2. 当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已落入人民公敌手中，所以它已经不配被称为共产党了，它现在不过是执行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集团间谍任务的机关而已。

反对这个受人雇佣的铁托间谍和杀人犯集团的斗争，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

3. 反对铁托法西斯专政这一斗争中的主要任务，应由革命的

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来担任。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对于解放了他们的苏联表示真诚的爱戴，并诚心诚意地希望回到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伟大家庭中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深刻痛恨铁托间谍集团及其主人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南斯拉夫劳动人民为推翻法西斯专政者而进行的斗争日益加强。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责任，就是要竭力援助为使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来的事业而奋斗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

4. 在南斯拉夫，反对铁托集团法西斯统治的斗争正在采取日益尖锐的形式：举行罢工、进行消极抵抗（主要是反对强迫征调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散发秘密传单、反对各工厂的生产计划和政府的采购计划等等。南斯拉夫工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增加生产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分子，所以他们已经在实行消极怠工。

组织革命共产党人的地下活动。在其队伍中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建立新的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党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阶级，为将南斯拉夫从法西斯篡权者手中解放出来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内以及党外革命分子进行积极的斗争，以求把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南斯拉夫独立的真正革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恢复起来。

5. 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及其领导者共产党人应该利用国际工人阶级全面声援和支持来建立自己的党。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已经开始采取更加积极和协调一致的方式开展工作，以便能够展开和加强推翻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对于在南斯拉夫开展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新的共产党应该利用革命活动的全部形式，给予积极有效的帮助。

必须以更大的努力继续在政治和思想方面揭露铁托集团的真面目。这个帝国主义代理机关的反人民政策应该受到世界舆论一致的谴责。铁托分子到处大声地呼喊，说人家把他们从一切国际民主组织中开除出去了。这样他们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惶恐心理，害怕他们不能继续顺利地进行间谍工作而被美国主人所抛弃。

我们将铁面无私和毫不留情地对待这些卑鄙的奸细！使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

我们认为，应该讨论一下关于从南斯拉夫逃到国外的政治侨民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铁托法西斯间谍集团的斗争问题。在一些国家里，有数百名这样的政治侨民，他们已经获得了相应国家的国籍，并开展了有组织的政治活动，成立了党的组织，进行无线电广播和出版报刊读物。他们进行这项工作就是为了反对铁托杀人犯和间谍集团。我们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某种形式的联合中心，在这个中心的领导下，加强政治侨民共产党员的反铁托集团的斗争。类似这样的中心可以更加具体地组织在国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们开展斗争，并在揭露派遣到我们国家来的铁托集团的破坏分子方面，给予积极有效的帮助。

6. 在加强警惕性方面，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面临着极重要的任务。这里所说的不仅是党员，而且是劳动人民，应该以革命警惕性来教育他们。教育群众提高警惕性，应该采取有组织的形式。

必须在自己的队伍中间揭露和清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及帝国主义的一切代理人，不管他们是用什么幌子进行掩饰。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提高国家方面的警惕性——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方面的警惕性，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旧的国家机关并不像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那样一下子就被打破了。这就是说，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员的警惕性应该特别提高。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从布达

佩斯对间谍拉伊克和布兰科夫举行的审判中做出应有的结论。

应该注意到，美、英帝国主义分子虽然在布达佩斯审判中遭到了重大失败，但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里进行的间谍和阴谋活动。不久前在伦敦举行的美国驻东欧各国大使会议，其目的就是因布达佩斯审判发生后而要把欧洲这一地区内的美国间谍工作加以改造。据西方那些不隐瞒美国外交人员究竟干些什么勾当的报纸承认，在伦敦会议上通过了在贝尔格莱德建立间谍中心的决定。同时，美国国务院由臭名远扬的美国谍报机关头子艾伦·杜勒斯主持的委员会，又制定了在东欧各国进行活动的纲领，其中包含有各种“新方法”。

毫无疑义，这种卑鄙活动中的主要角色，将分配给铁托集团的老间谍和奸细破坏分子们。他们一定会企图利用如像拉伊克一类的人，并且会利用党内和国家机关中即令是最细微的弱点和裂痕，利用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来历不明的人。

必须像布尔什维克主义所教导的那样经常记住，应该消灭那种由一种错误的假定中产生出来的机会主义的自满情绪，按照这种假定，仿佛敌人将因我们力量增长而愈加驯顺，愈加温和。这样的假定是根本不正确的。应该记住，敌人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会愈加乐于采取“极端手段”。

我们应该加强教育工作，将其当做提高警惕性的基础。因此，《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机关报在《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一文中曾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归纳如下：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工人阶级党只有经常提高自己干部的政治和思想水平，教育自己的干部对任何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偏向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队伍，无情地铲除党内的异己分子，及时地揭露和消灭任何民族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倾向，同时又提高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阶级觉

悟，才能有效地在各处识破和打击敌人，不管敌人是用什么假面具进行掩护”。

由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经验中得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教训就是，为提高警惕性，必须在我们党内确立一种布尔什维克的秩序。在这方面的主要办法就是审查党员。这种办法在几个人民民主国家的党内已经实行过了，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我国的党内，由于至今仍在实行的审查党员的办法，已经把先前公开广泛征收党员时钻进党内来的那班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都开除出党了。毫无疑义，这种措施将大大阻碍敌人想在我们党内找到立足点的企图。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提高自己党员的思想警惕性。他们对于任何一种离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倾向都应该持真正布尔什维克的不调和的态度，应该加强共产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教育他们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任何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忠实于人民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忠实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社会主义阵线。

在科学、文艺、绘画、音乐和电影方面，都必须提高警惕性，对任何一种敌视工人阶级的倾向，对任何一种宣传世界主义的言论，都应该采取毫不调和的态度。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旗帜，发扬热爱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基础、为各国人民的和平与自由而奋斗的主要堡垒——苏联，热爱世界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热爱劳动人类的英明导师和各国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领袖——斯大林同志。

№11772

波、法、苏代表团关于乔治乌－德治报告的发言记录

（1949年11月18日）

贝尔曼同志请求批准由萨瓦茨基同志主持会议，因为他，贝尔曼将就会议日程的第二个问题进行发言。

贝尔曼同志的请求得到了批准。

就乔治乌－德治同志的报告所进行的发言

贝尔曼同志说，波兰代表团完全赞成德治同志在报告中所做的结论。正如德治同志在其详细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对拉伊克－布兰科夫的审判充分揭露了铁托－兰科维奇这个法西斯间谍匪帮的叛徒嘴脸，并引起了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对这个卑鄙的美帝国主义分子雇佣的集团的极大愤怒。

对拉伊克的审判沉重地打击了战争挑拨者的罪恶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不仅仅是反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而且是反对波兰和其他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贝尔曼同志说，对拉伊克的审判使我们学会了正确地理解阶级敌人行动的方式。这次对拉伊克的审判过程，尤其清楚地表明了与我们国家里的怠工分子、间谍和破坏分子的地下反对集团阴谋有关的现实的和极其严重的危险，这些反动分子是在英、美侦察机关的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并服从于在贝尔格莱德和梵蒂冈的中心。

联共（布）及时地揭露了铁托叛徒集团，从对拉伊克－布兰科夫的审判尤其可以看出，这为全体进步人类，首先是全体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多么巨大的帮助。

根据联共（布）倡议通过的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不仅在揭露将南斯拉夫变成了美国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南斯拉夫叛徒政府方面起了历史性的作用，而且有助于战胜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在实质上与苏联的道路有区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的”道路的理论，关于不需要农业合作化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那些在各人民民主国家流行的并没有遇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应有的打击的“理论”。

对铁托集团的揭露和对拉伊克的审判证明铁托政权以及与它相类似的政权在思想上已经堕落，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们与间谍中心，首先是与英、美侦察机关是遥相呼应的。铁托叛徒分子的破坏活动并没有局限在南斯拉夫，他们还把自己的代理人派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同时还联合和利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代理机关。

贝尔曼同志说，在波兰，我们在1947～1948年期间，进行了反对“哥穆尔卡集团”的斗争，这个集团是从对苏联的完全不信任发展起来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右翼和民族主义倾向的全部反党特征。

哥穆尔卡集团变得越来越危险，它与极其顽强的，尤其存在于工人社会党人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了共鸣，其体现者就是党的总书记本人。

贝尔曼同志说，党的领导层在最初阶段就反对哥穆尔卡集团，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只是联共（布）的帮助和情报局决议，才使我们完全认识到哥穆尔卡集团的全部实质和危险性。

由于党的领导骨干的警惕性，哥穆尔卡的计划才以失败而告

终，该计划企图在全党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把它推上投降主义的道路，而与整个波兰社会党结盟。

这种对党造成威胁的危险状况，使党动员起一切革命力量，而与党内的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斗争，以及与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是全党更加牢固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最重要的方法。

接着，贝尔曼同志声明说，党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铁托法西斯－托洛茨基匪帮的斗争，揭露了它的背叛的、反苏联和反人民的活动。

从对拉伊克－布兰科夫的审判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是波兰数百万劳动人民的财富，而对于审判过程本身，所有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都进行了阐述。出版了一系列宣传手册，其中包括审判速记记录，首批发行了10万份。

揭露驻波兰的南斯拉夫大使馆和贸易代表们的间谍阴谋，以及他们的敌对宣传活动，对完成米利奇·彼得罗维奇的审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次审判揭露了铁托分子的挑拨方法和他们与法西斯地下组织的联系。

制止了铁托分子代理人在波兰散发自己的龌龊的传单，尤其是在博列斯瓦维茨县（下西里西亚）建立自己的基地的企图。在下西里西亚县居住着16000名从南斯拉夫被遣送回国的波兰族人，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是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参加者。

清除了铁托代理人的波南友好协会，揭露了铁托－兰科维奇集团的犯罪活动，同时宣传推广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对铁托法西斯专政的斗争。增加了用南斯拉夫语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工作人员。无线电播音增加到每天30分钟。在波兰的南斯拉夫革命政治侨民小组，共计约30人，这个小组还出版了名为《为了胜利》的杂志。

鉴于进行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在波兰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解释工作，发散的超过10万份的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给予了这项工作特殊的帮助，这个刊物中的许多材料被整个波兰报刊转载，并通过无线电台进行了报道。

在与南斯拉夫的铁托法西斯专政及其在波兰的阴谋进行斗争方面，党的任务并不仅仅局限于在报刊和无线电广播上说明这些事实。

贝尔曼同志指出，在自己的党内和群众政治工作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对这些事实做出了深刻的结论。

贝尔曼同志说，现在，我将转入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不容置疑，贝尔格莱德间谍中心及其美国保护人在哥穆尔卡及其在波兰的小集团的活动方面是有自己的打算的，布兰科夫的供词也证明了这一点。数十年期间，在这个与苏联直接接壤的波兰境内，活动着各种各样的反苏间谍集团和组织。

在历次战争期间，波兰的毕苏斯基统治集团及其法西斯制度，企图扼杀波兰强大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他们不仅采用了恐怖和镇压手段，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如通过挑拨、招募和安插代理人的方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二局”（总参谋部第二处），开展活动。

共产党领导了英雄的波兰无产阶级进行了很多年的斗争，但是，众所周知，由于奸细分子的捣乱破坏，使波兰共产党于1938年遭到了解散。

早在战前就与盖世太保进行密切合作，并且与其他帝国主义侦察机关合作的“二局”，在德国占领期间，竭力让自己的代理人领导波兰的革命小组，其目的是使这些代理人钻进革命队伍的领导层中。贝尔曼同志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波兰工人党第一总书

记、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马里扬·诺沃特科[①] 同志，于 1942 年 11 月在华沙被奸细分子莫洛耶茨杀害[②]，此人曾是活动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的一员，并成功地钻进了地下波兰工人党的领导层。还有其他许多忠诚的和具有忘我牺牲精神的同志，都被“二局”出卖给盖世太保了。“二局”的代理人——老牌间谍列霍维奇和雅罗舍维奇[③] 以及其他的间谍分子，至少是由于某些党员，首先是斯彼哈尔斯基在政治上的盲目无知，使他们成功地钻进了“人民近卫军”的侦察机关——波兰工人党游击队组织和党内。在国家被解放之后，这些破坏分子获取了重要的职务，甚至是部长和副部长的职务。

贝尔曼同志说，去年我们成功地获得了“二局”的部分档案，此后，又找到了一些可以揭露奸细匪帮的文件，并将这些奸细全部逮捕。

鉴于对拉伊克案件的调查，在匈牙利同志的帮助下，我们成功

---

① 诺沃特科·马尔采利，其化名之一是马里扬，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1941 年 12 月，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决定，担任住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人小组的领导，后被空投到波兰以组建波兰工人党，并于 1942 年 1 月在建党之时，成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② 莫洛耶茨·波列斯拉夫，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曾参加诺沃特科领导的小组，成为波兰工人党的组建者之一，后担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负责人民近卫军（在波兰工人党领导下成立的武装部队）事务。自诺沃特科在街上被不知名人士枪杀之后，波·莫洛耶茨被指控是枪击事件的策划者，而他的弟弟 З. 莫洛耶茨是执行者。结果，根据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的决定，莫洛耶茨兄弟均被清除。至今，枪杀诺沃特科的真正原因以及清除莫洛耶茨兄弟的情况仍然是个谜。

③ 列霍维奇·弗洛德季梅什，波兰政府的一名部长，雅罗舍维奇·阿尔弗列德，波兰政府的一名副部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均为军事反侦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但是对于波兰的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抱有好感，而在战争年代就参加了由波兰工人党领导的武装部队。在 1948 年，根据虚假的从事卖国和敌对活动的指控，他们被逮捕并被判处监禁（1956 年二人均被平反）。列霍维奇和雅罗舍维奇“案件”成为后来捏造的斯彼哈尔斯基“案件”的开端。

地揭露并摧毁了在波兰的菲利德[①] 间谍集团的一个分支机构。消灭了一个重大的间谍小组，这个间谍小组在军队中安插了许多自己的代理人。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在波兰活动着间谍网里的一个分支机构。

历史经验表明，敌人总是非常熟练地利用党内的任何一个细小的裂痕。1944年是这样，1948年在哥穆尔卡集团的事件上仍然重复了这一点。

11月11至13日期间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一次全体会议，将全面提高对各种敌对的代理机关，首先是铁托法西斯代理机关的阴谋的警惕性作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作为全党关注的中心问题。全会决定动员一切力量，为彻底消灭哥穆尔卡集团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任何表现而斗争。

全会还做出了相应的组织结论。哥穆尔卡、斯彼哈尔斯基、克利什科[②] 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贝尔曼同志说，我们将彻底查清奸细们的一切来龙去脉，我们将彻底揭露混入党和国家机关中的一切间谍分子。我们对待人民的敌人将毫不留情。敌人表现得很猖獗，但是，这绝对不能证明他们的实力。

---

① 菲利德·诺埃尔，美国外交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年代，在瑞士从事帮助反希特勒抵抗运动人员、难民以及来自欧洲各国包括东欧各国纳粹集中营的囚徒的工作；在这方面还与美国的侦察机关合作。同时自战前开始就对共产党人抱有好感，并与苏联的特工机关建立了联系。1948年决定移居捷克斯洛伐克。1949年5月，根据苏联、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方的安全机关达成的协定，在布拉格逮捕了菲利德·诺埃尔，并将其送到匈牙利（随后逮捕了菲利德·诺埃尔的妻子以及他的居住在波兰的弟弟）。菲利德·诺埃尔及其家庭与东欧各国的一系列著名活动家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被指控为菲利德·诺埃尔在那里建立的美国间谍网。据此捏造一系列虚假的审判，其中包括在匈牙利的“拉伊克案件”和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案件”。

② 泽农·克利什科，1944～1948年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8～1949年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根据虚假的指控被逮捕。

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衰落的阶级进行抵抗，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比我们强大了，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发展太快，比他们快，他们变得越来越比我们弱小了。正是因为他们变得弱小了，他们才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才不得不采用一切手段，进行全力的抵抗"。（斯大林，第十二卷，第 38 页）[①]

在发言结束时，贝尔曼同志说，波兰代表团坚信，本次大会将有助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更加提高自己的警惕性，加强同铁托败类分子，以及企图进行反苏攻讦的每一个微小的尝试，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贝尔曼同志说，对于苏联及联共（布）的态度，是衡量我们每一个人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抱有革命的诚实态度，是否忠诚的关键性标准。

在反对铁托法西斯匪帮的斗争中，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联共（布）和斯大林同志周围。

杜克洛同志说，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赞成乔治乌－德治同志的报告，赞成报告对铁托集团奉行的政策所做的分析，赞成从这个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杜克洛同志指出，他想从这一立场分析研究一下，法国共产党进行斗争时所处的环境。首先他提到，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无条件地拥护情报局六月会议通过的决议；其历史意义已经被大家认同。在这次情报局会议之后，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听取了法戎同志的报告，做出了决议，谴责了铁托及其同伙的政策。我们的报纸也公布了情报局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我们的报刊还发表了许多表

① 斯大林在 1929 年 4 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论联共（布）中的右倾分子"。

明铁托集团变节活动的文章和信息资料，但是，与此同时也犯了一些错误。有一份处于共产党监督之下的报纸，发表了铁托致情报局的答复函，但是，这却被敌人利用来作为诽谤的材料。另一份报纸在公布情报局决议时采取的形式，却使人无法了解这份决议。我们的中央新闻局在专门的通报中批评了这两份报纸。这些措施是否就足够了呢？当然，在揭露铁托匪帮政策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再犯类似的错误，也没有再出现类似的倾向。不但如此，我们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解释工作。后来，党的中央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铁托事件主要是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产生了影响，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即在我们党内不存在支持铁托的派别。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件，我们保证我们的报纸用最大数量的情报，揭露铁托的犯罪活动，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老实说，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对那些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高额报酬的铁托奸细和间谍分子所拥有的能力有些估计不足。我们还做了许多工作，以便表明情报局决议提出的问题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具体问题是：论社会主义运动，关于农民阶级的政策，关于苏联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作用，关于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铁托及其集团的影响。

铁托代理人的行动是秘密的，他们极其关注在南斯拉夫侨民中开展工作。目前，在法国南斯拉夫侨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00人。这个数字里包括生活在法国北部和东部省的劳动者和矿工。铁托代理人在南斯拉夫侨民中进行这种活动时得到了儒勒·莫克警察局的支持。

利用恐吓的手段，铁托的代理人掌握了生活在法国的南斯拉夫人文化协会的领导权。不仅如此，他们还成功地将梅尔列巴赫市的

南斯拉夫文化协会的共产党领导人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至于说我们这方面，塞纳的共产主义者联盟被迫开除了4名南斯拉夫出身的党的领导人，因为他们从事有利于铁托集团的反党活动。

党还与南斯拉夫侨民中的铁托代理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南斯拉夫侨民区只是铁托代理人进行活动的地区之一。随着铁托代理人挑拨性活动的频繁开展，在最近几个月里，我们党在所有地区都加强了揭露南斯拉夫叛徒的斗争。我们的报刊增大了发行量，并把铁托的问题与拉伊克案件紧密地联系起来。

根据《新战斗报》[①] 编辑部的同志从布拉格转来的材料，我们出版了名为“南斯拉夫处于铁托集团的恐怖之中”的宣传手册。

南斯拉夫驻巴黎大使馆对南斯拉夫侨民施加了压力，如果他们不表达对铁托有利的意见的话，就对他们的家庭成员进行镇压，以此来恐吓他们。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将他们驱逐出法国的威胁。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南斯拉夫侨民是南斯拉夫大使馆施加强大压力的对象。大使馆的代理人在塞纳、圣瓦兹、涅夫勒、罗纳河口、阿尔卑斯－马里季姆、诺尔、加莱等省组织了南斯拉夫侨民的集会。他们还成立了名为“同盟会”、“兄弟会”等法西斯类型的组织。在尼察举行的一次这种类型的集会上，驻马赛的南斯拉夫领事，只是因为一个南斯拉夫同志的反对，并以此影响了全体与会者，而没能建成这样的组织。

我们的联合会总是过低地估计敌人在南斯拉夫侨民中所进行的工作。力图改变这种情况，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了专门的同志，委托他们对铁托代理人的活动进行监督，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进行定期的研究。例如在最近一次的会议上，政治局对这个问题

① 《新战斗报》，于1948年9月开始在布拉格出版，是以南斯拉夫“革命侨民”的名义在东欧各国出版的第一份报纸。

进行了专门讨论。

我们的联合会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性，因为，目前大使馆有十分明显的迹象，表明他们企图向我们党的队伍中派出自己的代理人。

接着，杜克洛同志指出，数百名法国青年曾经被派到南斯拉夫，于1946～1947年期间，在那里参加修建铁路的工作。南斯拉夫大使馆知道这些法国青年的姓名，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地址，给他们寄去宣传材料，有时还派自己的代理人去找他们。这些代理人前往的目的是，争取这些法国青年人同意前往南斯拉夫旅行。

以下是我们所掌握的一份通报的节选："自7月份起，大使馆组织了两批法国青年前往南斯拉夫旅行。第一批共有114人，其中有70人是法国人；第二批共有40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南斯拉夫出生的"。在第一个代表团里有4名法国共产党员，后来他们被开除出党。这些人中最起码有两人从前是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

在准备第二次旅行时，由于我们对同志们进行了预先的警告，在四个省里铁托的代理人没有达到目的。在伊泽尔省有5名大学生，最初他们同意前往南斯拉夫，后来又拒绝了。在上加龙省，我们的同志公开揭露了警察局的一名监察员，他为前往南斯拉夫旅行进行招募人员的活动。在伊泽尔省我们的同志揭露了一名南斯拉夫的工程师，他负责组织旅行的工作，并且是英国侦察机关的一名间谍分子。在洛特和加龙省，我们党还揭露了一名曾经到过南斯拉夫的可疑分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已经被我们揭露的法国出身的铁托分子，是一些堕落和孤立分子，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与居民有联系。在法国生活的南斯拉夫人中，那些在多数情况下拥护铁托的人，是一些被蒙骗的人。

南斯拉夫大使馆通过散发报刊和书籍的方法开展了疯狂的宣传活动。铁托的代理人把主要力量集中在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因为知

识分子中的某些代表，在应具有客观态度的借口下，听从他们。铁托分子还拥有托洛茨基分子的支持。在拉伊克－布兰科夫审判之后，巴黎有几名大学生退出了共产党。在利尔，大学生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拒绝说出对拉伊克审判的意见，其借口是，这仿佛对党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由于铁托间谍分子的活动，在某些省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明显地活跃起来了。从另一方面来说，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这些事实表明，南斯拉夫大使馆企图将那些已经被开除出党的人物联合起来，其目的是想制造这样的印象，即党内存在铁托派别的说法，无疑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反对铁托间谍分子的斗争中，是高度的警惕性使我们揭露了一些混入党内，直至国家和部门领导机关的敌对分子。自然，铁托大使馆的活动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为了按照警察局提供的地址向工人组织寄发报刊、宣传手册以及南斯拉夫通讯社的公报花费了巨额资金。

几天以前，在巴黎的南斯拉夫领事馆前举行了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人们在领事馆前的街道上烧毁了宣传铁托的材料。

接着，杜克洛同志指出，资产阶级公开吹奉铁托是为了制造混乱，它希望把这个叛徒分子作为一名竭力追求成为“独立的”共产党员展示出来。这里指的是为掩盖铁托所扮演的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尽管如此，在最近的一个时期里，极具说服力的事实仍然证明了铁托及其集团的变节行为。很显然，由于同意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选举时成为美国和法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候选人，而反对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候选人，铁托分子消除了关于代理人这一角色是否存在的最后幻想。大概，铁托奸细最近将被充分利用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货真价实的诽谤者取代右翼社会党领导人。

杜克洛同志继续说，这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极大地关注和监视铁托叛徒分子活动的原因。必须采取措施，以便提高党务干部的警惕性。必须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铁托间谍分子显然是得到了命令，尽一切努力以便留在工人组织里并进行瓦解和破坏工人队伍的工作。还必须警惕那些已经被揭露的、进行过自我批评并对铁托的行动进行了谴责的铁托代理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表现出轻信的态度，不应该忘记，铁托间谍分子所表现出的两面派，正如过去托洛茨基间谍分子和奸细所表现的那样。

鉴于对拉伊克进行的审判，我们在巴黎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并邀请了那些曾为这个叛徒分子进行过辩护的新闻记者参加了大会。这些记者没有出席会议。集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这个集会允许向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少数的最初是动摇后来又坚定起来的人们证明，在拉伊克的叛变行动与铁托集团之间确实存在着最密切的联系。自然，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铁托的代理人企图引起人们的怀疑。颇有声望的知识分子代表卡苏·让[①]，在南斯拉夫旅行期间曾经发表过声明，在声明中他广泛地利用了铁托的宣传材料。返回法国并参加了全国保卫和平和自由战士委员会会议之后，正是这个卡苏·让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即将铁托的南斯拉夫认定为美国战争贩子手中的武器的决议。

很清楚，铁托集团目前已经站在了反苏战争挑拨分子的最前列。我们应该坚决地进行反对这个荒谬绝伦的匪帮的斗争，并揭示它所进行的反对南斯拉夫人民的犯罪活动的全部意义。在这方面，我们赋予了在巴黎成立的保卫被监禁和被追捕的南斯拉夫民主人士委员会以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杜贝尔将军领导下的这个委员会坚信，他们将吸引“法南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

① 卡苏·让，法国著名的作家和艺术理论家。

作，为保持自己对法南友谊的忠诚，奋起进行反对铁托——这个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委员会在成立之后发表了公报，谴责了铁托的制度，召号全体珍视和平、自由和人类尊严的男女公民们，对南斯拉夫的民主志士给予帮助。

保卫和平，不应该低估反对铁托匪帮的斗争。我们赞同乔治乌－德治同志在其报告中所做的结论，我们坚信，与铁托奸细分子进行彻底的斗争，我们将以此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加强其在秘密条件下进行的斗争，并给战争贩子和法西斯主义阵营以沉重的打击。

不但如此，我们应该从铁托犯罪的事实中得出相应的结论。德治同志强调必须提高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他是正确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反对铁托集团斗争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应该揭露铁托分子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在群众之中造成混乱并混淆视听。提高警惕性要求揭露隐藏的敌人的代理人，要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牢不可破的依靠，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忠诚，这是使我们能够评价人们及其对和平事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是否忠诚的试金石。

尤金同志：尤金同志说：“联共（布）代表团完全赞成乔治乌－德治同志关于铁托叛徒集团的报告，并支持他所提出的建议”。

继续自己的发言时，尤金同志提醒大会参加者，今年9月26日《美国之声》广播电台是如何转播莫舍·皮雅德的声明的。在声明中他说：“情报局实际上已经被取缔，目前它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情报局仿佛已经不存在了，除了机关刊物之外，它什么也没留下。

尤金同志说，违背皮雅德及其同伙的意愿，情报局仍然存在着，并正在发挥着作用。

尤金同志说，在资产阶级阵营里，政治背叛是普通的事情。资产

阶级国务活动家和政治领袖为外国侦察机关服务，这不会令人感到特别的惊奇。对此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甚至对于右翼社会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说，政治背叛和为外国侦察机关服务也是普通的事情。

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政治背叛，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现象，通常，将其归结为个别人或者是小集团的背叛。

尤金同志继续说，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集团的背叛，是很特殊的事件，因为这个集团是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领导的，并以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义参加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众所周知，铁托和卡德尔是以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名义，并将自己伪装成联共（布）和苏联的朋友才夺取了政权的。否则南斯拉夫人民绝不会允许他们跨进民主南斯拉夫的门槛。①

布达佩斯的审判表明，为什么铁托集团如此匆忙地由民主和社会主义转入法西斯主义，并逃到了帝国主义的阵营里。这个集团早就成为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间谍和走狗了。铁托集团转入法西斯主义阵营完全是按照自己主子的直接命令行事的。

在美国国务院内部曾经制定了一个十分阴险的计划，即利用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政府，作为推翻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武器，使这些国家脱离苏联，并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②

情报局决议揭露了铁托集团对内对外政策的资产阶级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实质，这个间谍集团已经不可能再伪装成苏联和人民民主

① 在尤金的发言中，这段话原来是这样说的：“在情报局做出决议之后，铁托和卡德尔作为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分子，最初是秘密地，后来是公开地急剧地倒向了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亲近，这一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如果在党内不被粉碎，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转向资产阶级立场，并与国内国际的资产阶级完全融合在一起。”

②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尤金发言中的下面一句话：“铁托－兰科维奇只是国家议会手中的小卒而已。”

国家的“朋友”进行活动了。这就是为什么铁托集团及其帝国主义的主子们如此憎恨情报局决议的原因。情报局决议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献：它不仅揭露了铁托集团政策的资产阶级和背叛的实质，而且它还更加团结了国际共产主义阵线和整个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

帝国主义分子手中的反对共产主义阵线的这个“共产党的”武器被打掉了。拥有这个武器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是多么有利，有一个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即直到目前为止，美帝国主义的头子仍然竭力地将铁托政府冒充为“共产党的政府”。例如，今年的10月2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声明说，南斯拉夫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失去了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地位，巴尔干不再是欧洲的“火药库”了。这使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感到不快。因此，为了夺回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地位，将巴尔干变成战争策源地，帝国主义分子决定利用自己的代理机关——铁托集团。

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代理人的反革命活动内容之一是，对于希腊人民英勇革命斗争的背信弃义的叛变行为，这也是按照其英、美帝国主义的主子们的直接命令进行的。如果说希腊人民解放运动在这一年的秋天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失败的话，那么其原因就是铁托集团对希腊君主法西斯分子的直接援助。

现在，借助于南斯拉夫恶棍们的帮助，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希腊成功地获得了他们在这四年期间依靠公开的武装干涉没有获得的东西。[①]

南斯拉夫政府向希腊君主法西斯的军队敞开了边界，使他们能

①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此处删掉了尤金报告中的一句话：“希腊共产党没有预料到，铁托－兰科维奇集团能干出这样卑鄙的勾当”。

够从后方打击希腊的民主军队。[①] 铁托集团的南斯拉夫强盗们是无法摆脱这样可耻的事实的，正如他们无法摆脱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的责任一样。

在所有这一切之后，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头子们，不顾联合国的宪章和传统，如此殷勤地将南斯拉夫拉入安全理事会。

铁托－兰科维奇集团是帝国主义的直接代理机关和战争贩子的走狗——这种身份的对外表露是从它在联合国组织里与帝国主义集团公开结盟开始的。

众所周知，在最近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帝国主义强国出席会议的代表是一群最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是扼杀国际工人运动的刽子手，是最凶恶的战争贩子。铁托－兰科维奇集团之所以看中联合国大会这个组织，主要是想让它来对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诽谤性的攻击。甚至连铁托集团的政治对手也无法想象出，比这一集团在联合国大会中对苏联所持有的立场，以及在联合国对其他人民民主制国家进行诽谤，更能充分暴露其本来面目的事实了。由货真价实的美国间谍分子卡德尔、吉拉斯、贝勃勒组成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再也找不到比在这一诽谤行动中赞成英、美殖民主义者、南非奴隶贩子和中国的买办更合适的做法了。[②]

---

① 在尤金的发言中，这句话是以另外的一种形式表述的："南斯拉夫政府不仅为希腊的君主法西斯军队敞开了边界，使他们能够从后方打击希腊的民主军队，而且南斯拉夫的军队还与希腊的君主法西斯军队一起对希腊游击队进行了阴险的打击。"实际上，无论是南斯拉夫为希腊政府军敞开了边界，还是南斯拉夫军队与希腊军队共同进攻游击队的说法，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②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尤金发言中的如下段落："铁托－兰科维奇集团的帝国主义立场此前已经变得明确和清楚了，例如，如果英、美帝国主义明天进攻苏联，那么，南斯拉夫的统治者会事先知道这个消息，并第一个站到帝国主义分子一边，来反对苏联以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后，世界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走狗们竟然毫不羞耻地说，看，我们在与苏联“辩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问题。在共产党人与法西斯分子之间还能谈到什么样的平等呢？铁托和卡德尔先生，到英、美帝国主义分子那里去找“平等”吧！他们会告诉你们，在帝国主义阵营里“平等”是个什么东西！

由于实行了铁托－兰科维奇集团的政策，南斯拉夫已经处于美国完全的政治监督之下。目前，贝尔格莱德已经变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从事间谍活动，进行反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和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国家阴谋的公开中心。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领导着这个中心。“独立的”铁托目前在外交政策方面，在没有同美国国务院协商的情况下不能做出任何一个举动。

接着，尤金同志说，在情报局揭露了铁托集团之后，英、美帝国主义的雇佣分子开展了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健康力量的恐怖行动，枪杀了所有忠诚的共产党干部。成千上万名忠诚于共产主义的爱国志士被开除出党，被投入监牢、集中营，并被杀害。铁托集团利用警察机关镇压了数万名共产党员。[①]

对共产党人的镇压行动带有真正的法西斯匪帮的性质——是采用暗杀的手段。这就是兰科维奇的助手佩涅季奇[②]在国家保安局大会上所说的话：“在情报局决议出台之后，应该提高警惕性和加强监督。对在边界上停留的任何人，必须进行检查，如果是共产党员在边界上停留，立即就地枪毙，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哪怕是中央委员，部长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无一例外，但是不能声张”。[③]

---

① 在尤金的发言中，这句话原是：“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总共消灭了近十万名共产党人”。

② 佩涅季奇·斯洛博丹，塞尔维亚内务部长。

③ 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尤金援引了佩涅季奇的声明，但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这部分内容：“报告执行情况。没有必要将这些人留在监狱里。”

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头目铁托，对所有支持情报局决议的人公开声明说："我们应该继续收拾他们，直到把他们全部收拾干净为止"。在南斯拉夫枪杀为争取共产主义、为使南斯拉夫摆脱英、美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坚强战士时，其残酷性只能与兰科维奇曾为之效劳过的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兽行相比。

接受了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任务，铁托－兰科维奇集团确定了摧毁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方针，并实现了这一方针。他们将一系列忠诚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的队伍，并枪杀了这些共产党人，同时，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向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敞开了大门。[①] 他们遵循着什么原则接收人员入党呢，对此涅什科维奇是这样说的："为了使我们能够顺利地领导社会各个阶层，我们应该使党内拥有相同比例的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例如，在中农和富农之中，党员的比例数应该与贫农和工人、手工业者、律师和医生是一样的，同样，在神职人员和退休职员中也是一样的比例。"[②]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处于间谍和杀人犯以及英、美帝国主义爪牙的共同掌握之中。

驻在贝尔格莱德的英、美间谍分子，粉碎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重要的共产主义核心力量，篡夺了党的权力，在国内实现了反革命的政变。完成了历史上空前的背叛和变节行动以后，南斯拉夫资产

① 在尤金的发言中，这句话是以如下形式表述的："铁托集团将真正的共产党员处决，取而代之的是将乌斯塔什分子、切特尼克分子、富农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破坏分子和特务分子招募进党。"

② 在尤金的发言中，接下来还有一段话，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其内容为："要判断目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立场上，铁托在所谓的人民阵线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宣言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人民阵线成员之间，和人民阵线成员的基本群众之间，不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而这个阵线有776.8万成员，他们来自于国内901.4万选民。"

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加快了消灭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反民主的、反共产主义的法西斯制度的行动。[①]

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主要支柱是军事警察和反民主的官僚主义机构。南斯拉夫军队目前共有60多万人，而兰科维奇的警察局、边防部队和特种部队就有不少于30万人。这样一来，在南斯拉夫被武装起来的人就不少于90万，也就是比在进行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期间要多三倍。国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兵营。在国家机关里，受贿、盗窃国家财产、任人惟亲和形形色色的滥用职权现象盛行。这些滥用职权行为的范围之大，最终，连惯于撒谎的《战斗报》也开始敲起了警钟。今年7月13日，《战斗报》写道："敌人的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广泛了，盗窃行为已经具有系统性和组织性，并达到了很大的规模。被盗窃的国家财产已经达到数百万"。

在南斯拉夫，一切民主程序都被取缔了，剥夺了最起码的自由，严厉禁止民主思想的自由表露，践踏了一切人权。[②] 铁托－兰科维奇的专政——是标准的法西斯专政。

接着尤金同志说，铁托集团利用建设社会主义的蛊惑宣传做掩护，实际上在各方面所实行的政策都有助于城市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

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在"理论上"的杜撰和实际上的行动表

① 尤金发言中接下来的一段话，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向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里指派了一大批富农分子、原乌斯塔分子和切特尼克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务和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涅什科维奇于1948年12月在议会里发言时说，在人民委员会的财经委员会中有40%的人是富农分子。还是那个涅什科维奇在1949年4月说，"在人民阵线中有15.7万以上的富农分子"。

② 在尤金的发言中，这句话原来是这样说的："在南斯拉夫一切最起码的民主自由都被消灭了，在这里践踏了任何一种自由思想的表达，以及人的全部权利。工会、妇女、青年以及其他组织的领导权都掌握在作为铁托代理人的官员和警察手中，这些组织都变成了法西斯盖世太保国家的附属品，其目的是在政治上瓦解和欺骗人民大众"。

明，他们企图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并永久地保留南斯拉夫的阶级关系。南斯拉夫工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复辟表现在，处在反人民政府手中的国家部门已经不再是人民的财产了。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在篡夺了政权之后，全面加强工业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资本垄断，并利用外国资本剥削工人阶级，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铁托集团为外国资本渗入南斯拉夫的经济，创造了一切可能性。

反革命的、反人民的对内政策，以及南斯拉夫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赖，导致现存的人民民主制度的财政和物质基础的崩溃。这一点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是目前已经达到灾难性程度的通货膨胀。处于流通中的纸币数额从1945年的1781.1万第纳尔增长到1948年的3923万第纳尔。

无论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怎样宣传南斯拉夫经济的“增长”、“繁荣”，也不可能掩盖那样一个事实，即南斯拉夫的经济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当南斯拉夫的经济濒于瓦解的时候，各人民民主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生活却在经历着直到目前为止从未有过的繁荣。

人民民主国家经济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劳动人民创造性的热情，他们不是为资产阶级工作，也不是为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工作，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祖国的繁荣工作；苏联曾给予的并继续给予的大公无私的援助；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密切友谊与相互帮助。

铁托集团的警察法西斯制度，扼杀了人民中间的各种创造性精神，以及劳动人民扩大生产的愿望。甚至在他们的报刊中还出现了关于劳动力巨大流动的报道。1949年7月29日的《劳动报》写道：在7月最初的15天里，向博尔矿场派出了4306名新工人，而在这段时间离开的却有5070名工人。

南斯拉夫劳动部长留布切·阿尔索夫在今年的10月26日的《战斗报》上抱怨说，绝大多数被动员强迫到矿井工作的农民都逃回了农村。部长写道："我们总是不能成功地使他们成为固定的工人"。如果说部长，或者是总是善于杜撰和歪曲的《战斗报》也被迫说出这样的话，那么，可以想像，南斯拉夫的工业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何种地步。

南斯拉夫当前的统治者试图运用军事警察的手段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1949年4月，各地方组织传达了南共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命令，其中说道："不要接受雇农和部分中农参加农业合作社，以便使他们同家庭成员一起前往矿场参加生产和建设"。为了迫使雇农到工业部门工作，地方人民委员会剥夺了他们的土地。①

铁托犯罪集团将所有这一切冒充为"社会主义劳动"。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还从来没有遭受过像现在这样的剥削。

在南斯拉夫的许多企业和矿场里，规定一个工作日实际上是

---

① 在尤金的发言稿中，接下来的三段话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其内容如下："由于工业中的劳动力的巨大流动性，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们，将士兵、工人和农民强行组建成'前线大军'，迫使他们进行无偿的繁重的劳动。

在整个南斯拉夫正在实行着一种农奴式的'劳役制'制度。每个公民必须是'人民阵线'的一名成员。每个'人民阵线'的成员每星期在工作之余必须参加一次无报酬的劳动。城市和农村没有在企业里工作的居民，强行被动员去参加期限很长的'自愿'的劳动。

这种'自愿'劳动的成果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官方当局通常是以消耗的小时数量来计算这种劳动。贝尔格莱德市的《人民阵线》报9月16日公布了关于8月份'自愿人员'工作量的情况资料。根据这个毫无疑问是虚假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贝尔格莱德的居民'自愿的'工作量是每个月790027小时。在这段时间里掘土28368立方米，丈量土地102565平方米，清除地段上的1494945石头块，收集木材1413立方米。如果将所完成的工作量按照时间来分配的话，那么结论是：1小时掘土0.03立方米，丈量土地0.13平方米，收集1.88块砖和0.002立方米木材。"

10小时以上。[①]

南斯拉夫工人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②] 事情甚至达到这样的地步，有时就连铁托集团的工作人员也会泄露一些关于工人阶级困难的情况。例如，人民青年组织书记米·内奥里契奇[③] 在塞尔维亚人民青年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声明说，青年男女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患上了结核病。[④]

南斯拉夫的报刊大谈特谈“社会主义建设”，其目的是为了掩盖日益增长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以及铁托集团从政治上瓦解工人阶级并欺骗他们的企图。

谈到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在农村的政策时，尤金同志指出，该政策的宗旨是使贫农和中农沦为赤贫，使富农奴役农民阶级。[⑤]

---

① 尤金发言中接下来的内容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在阜姆（即里耶卡）的兰科维奇工厂里，工人要工作10个小时，而在那里的造船厂工人要工作10～12个小时，在博尔斯克矿井、整个蒂莫克斯基地区的矿井和矿场里，也确定了这样的工作日，这样的规定还存在于阿列克辛纳茨、伊德里亚以及其他等等。

在南斯拉夫的各个企业，特别是在矿场里，劳动条件是异常艰难的。几乎没有安全技术。这致使大量的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根据官方的资料，1948年在矿山工业中，人员伤亡的数量与1947年相比，增长了38%。”

② 在尤金发言中这句话原是这样说的：“南斯拉夫工人的生活水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过，它低于战前的水平。食品价格同1945年相比，上涨了740%，而同一时期工资收入平均只增长了9%。因此，所有这一切导致普遍的疾病和工人身体衰竭，是不足为怪的。”

③ 米利扬·内奥里契奇，南斯拉夫人民青年中央委员会主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书记。

④ 尤金发言中接下来的内容在整理记录时被删掉了：“卫生保健事务委员会主席П. 格列戈里奇在国民议会会议上承认说，在南斯拉夫每年死于结核病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这是官方的统计）。在一些工厂里，这些数字更显得可怕。在贝奥琴市水泥厂有40%的工人患有结核病。实际上，由英、美帝国主义的特务和杀人犯犯罪集团，以及铁托－兰科维奇集团所造成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一幅非常可怕的景象。”

⑤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尤金发言中的如下内容被删掉了：“铁托分子为巩固富农阶级在农村的经济地位而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合作社”。

铁托集团的资本主义富农政策的公开基础是“关于富农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顽固不化的美国间谍分子之一，已经爬上南斯拉夫外交部副部长职位的阿·贝勃勒，在1949年4月29日召开的外交部会议上说：“我们这里已经没有了像苏联那样的富农分子了。我们的富裕农民已经广泛地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因此他们在政治上是成熟的。除此而外，我们的富农分子还阅读了许多关于在苏联的富农命运的书籍。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们变得更加聪明了，并投降了……难道我们应该消灭富农分子，以此来满足已经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残余？如果我们在不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就能成功地使富农分子转向社会主义，难道这是一个错误?”。贝勃勒所说的这番话代表了整个铁托统治集团在对待富农态度上的立场，颇有声望的涅什科维奇的声明也证明了这一立场。在1949年2月28日召开的贝尔格莱德大会上，涅什科维奇说：“不应该加强虚构我们这里存在着某种阶级斗争。我们的富农阶级不同于苏联的富农，他们在战争中帮助了我们。因此，应该将他们列入劳动农民阶级中。我们应该吸收富农分子参加人民政权委员会，参加人民阵线，参加合作社等等”。

铁托于今年8月初在斯科普里讲话时确定说：“我们无法说出，中农和富农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不应该根据拥有土地的公顷数量来划分富农”等等。

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这个“哲学”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这个哲学与颇有名气的富农“哲学家”布哈林的哲学如出一辙。铁托“绝顶聪明地”引用了他的哲学。

以强制手段成立的所谓的农村“生产”合作社，被冠以“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名字，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类型的普通的合作社，

在这里富农分子及其代理人掌管着一切。[①] 像这种类型的合作社是富农阶级剥削贫农和中农的一种形式。[②]。

劳动农民阶级对这种全面掠夺的富农政策进行了抵抗。例如，他们不完成播种计划。在南斯拉夫的农村，收购粮食、购买肉类及其他的非法勒索只能借助于警察的力量来实现。科瓦切维兹村（潘切沃县）的农民公开地议论说："报纸上写到，交公粮是自愿进行的。这不是事实。曾经向我们村里派来了大约45人组成的警察支队；整整一天他们大吃大喝，夜里他们开始打人，并收集公粮。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奥波沃村，在那里还逮捕了5个人"。

尽管实施了残暴的警察手段，农民仍然顽强地抵抗着当局，无论是粮食，还是肉类，都没有自愿上交。[③]

南斯拉夫劳动农民阶级经历着自摆脱土耳其桎梏以来其历史上最艰难的一个时期。

毫无疑问，在与这个为外国资本的利益正在大肆掠夺着南斯拉夫民族财产的铁托集团进行斗争中，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

---

① 在尤金的发言中，这句话原来是这样说的："在这些合作社里丝毫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果农户加入合作社，即使被算做集体的股份，土地、耕畜、农具仍然是私有财产"。

② 尤金的发言中接下来的两段话在整理记录时被删掉了："劳动农民阶级对这种强迫的富农的合作化运动进行了抵抗。例如，在6、7、8月份，在科察尼市，妇女们多次聚集在'人民阵线'委员会大厦门前，要求解散'合作社'。他们坚决地要求对他们说，合作社的建立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还是以被迫的方式。经常有被赶入合作社的农民从那里退出，但是，他们又被迫重新'参加了合作社'。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图尔莫沃（斯特鲁米察）村。"

③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尤金发言中的以下内容："在某些州，情况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计划只完成了6%和9%。在南斯拉夫农村，当动员农民自愿参加矿山、工厂、建筑工地的劳动时，也使用了兰科维奇的警察暴行。所有这一切都证明铁托－兰科维奇集团与劳动的农民阶级是对立的。农民对铁托集团的政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南斯拉夫的统治者几乎将森林工业和采矿工业的全部产品运送到英国、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以此方式悄悄地吞食了国家的财富，给国家的民族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例如，木材出口量与1935～1939年同期水平相比增长了3倍。除矿石以外，矿藏出口总值从1935～1939年同期水平的83123第纳尔增长到1948年的260688第纳尔。这一时期的矿石和金属出口总值自850093第纳尔增加到2279204第纳尔。

南斯拉夫已经变成了外国资本的农业原料附属国。

尤金同志指出，铁托集团事先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向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苏联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诽谤。它千方百计地竭力证明，帝国主义分子并不是反苏战争的煽动者，而仿佛是苏联正在准备着新的战争。最近，关于这一点吉拉斯在联合国里曾做出了声明。华尔街上的南斯拉夫代理人企图证明，仿佛在所有的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巩固，目前“并不需要战争”。铁托及其同伙指责苏联是“帝国主义”、“正在对其他民族进行剥削”，而联共（布）是“修正主义”，等等。

没有必要批驳铁托及其同伙的反革命谎言。但是，鉴于铁托及其同伙散布的诽谤性论点，即苏联“企图在经济上占领南斯拉夫”，“将不平等的关系强加于南斯拉夫”，甚至“阻碍南斯拉夫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必须回忆一下几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在战争结束之后，苏联立即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便帮助南斯拉夫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国民经济。根据1945年4月、1946年6月和1947年7月与南斯拉夫签署的贸易协定，1945～1948年期间，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货物总额为54160万卢布，而在此期间，南斯拉夫的供货通常少于苏联。

苏联希望帮助南斯拉夫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并确保它的继续发展，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请求，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向南斯拉夫提供了

总额为79500万卢布的货物贷款。根据这些贷款，南斯拉夫获得了黑色金属、毛料、橡胶和其他货物，总值为4300万卢布，以及85辆机车和大约5700节车厢，总额为3200万卢布。除此而外，苏联在1947年7月还承担义务，以贷款的方式供给南斯拉夫一个年生产力为40万吨铸铁、50万吨钢材、30万吨轧材和60万吨焦炭的冶金联合企业的工业设备；功率为年产30万吨的石油加工厂的设备，以及石油开采、矿石开采、有色金属企业和硫酸工厂的设备。①

仅仅这样几个关于苏联在经济上援助南斯拉夫人民的事实，就可以彻底地揭露诽谤者和奸细们——铁托及其同伙。

不仅所有国家的共产党清楚，铁托集团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机关，这个集团已经处于反对以苏联为首的所有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争贩子的前列，而且目前清楚这一点的还有国内国际广大的无党派民主主义组织。

最近，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将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代理人驱除出自己的队伍，如世界和平大会、国际妇女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以及国际法律工作者协会。没有允许南斯拉夫代理人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和国际青年大会，其他一些国际民主组织也驱逐了南斯拉夫战争贩子。

判断政府、政党、社会组织和政治活动家们的立场，不能根据

① 由于已经开始的与南斯拉夫的冲突，苏联方面没有完成这个协定。

尤金发言中接下来的两段话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苏联担负起给南斯拉夫以技术援助的责任（研究设计工作、建设企业、安装设备、使工厂投入使用、培训专业技术干部、派出苏联专家，等等）。苏联的有关组织为南斯拉夫的工业研究和设计工作已经付出了300多万卢布，到1948年中期依靠贷款结算提供给南斯拉夫的工业设备已经达400万卢布以上。几年以前苏联政府满足南斯拉夫政府的请求，作为贷款提供给南斯拉夫军队武器和军用物资数额超过了41300万卢布，在10年之内以贷款清偿。这笔贷款南斯拉夫使用了38900万卢布，也就是总额的94%。"

他们的言论和声明，而要根据他们的具体行动。仅此而已。铁托－兰科维奇集团的具体行动，使一切诚实的人们，一切拥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人们确信：这个集团是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代理机关。铁托集团的整个对内对外政策就是一个证明：这个集团是一个同希特勒分子毫无任何区别，与察尔达里斯和佛朗哥之流的法西斯分子毫任何区别的的法西斯分子匪帮。①

目前，当铁托－兰科维奇集团被揭露，并作为英、美帝国主义雇佣的间谍匪帮被钉在耻辱柱上时，民主革命力量的运动在南斯拉夫毫无疑问将会得到巩固。

南斯拉夫国内革命力量的行动，以及为反对反革命叛徒集团正在进行斗争的南斯拉夫革命侨民的行动，具有非常深刻的进步性质，并成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阵线共同斗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出版的南斯拉夫革命侨民报，在这一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南斯拉夫革命侨民还通过专门的无线电台向南斯拉夫境内进行无线电广播。②

---

① 尤金发言中的以下段落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指出，继续揭露作为法西斯分子和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凶恶敌人的铁托集团，要求共产党继续致力于巩固共产党阵线的团结一致，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以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教育共产党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经验教导说，对待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先锋队的苏联的态度问题，是确定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的主要问题。共产党在以极其友好的感情对待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的精神来教育人民群众时，应该遵循斯大林同志的至理名言，即'国际主义者'就是无条件地、毫不犹豫地准备捍卫苏联的人，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而如果不捍卫苏联，那么，是不可能做到捍卫和推动这种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如果有人认为捍卫世界革命运动可以绕过或者是反对苏联的话，那么他就是反对苏联，他必将跌入到革命的敌人的阵营中。"

② 无线电广播是由共产党情报局机关通过其设在布加勒斯特的无线电中心进行的。

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以及整个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全面支持和帮助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以及全体劳动人民，进行反对那些将南斯拉夫变成了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英、美帝国主义雇佣分子、间谍、杀人犯的斗争。

在发言结束时尤金同志说，参加或没有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都已了解到关于英、美帝国主义雇佣的间谍和杀人犯犯罪行动的全部事实，通过这些事实可以得出无可争辩的结论：南斯拉夫的铁托集团是把南斯拉夫拖入帝国主义阵营的那些间谍、杀人犯的法西斯匪帮。因此，情报局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不可能不认为，这个匪帮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敌人，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敌人。这个间谍集团是按照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命令行动的，它反映的不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意志。目前已经处于人民的敌人手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失去了被称之为共产党的权利。它已经变成了执行铁托－兰科维奇集团的间谍任务的机关。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政治侨民的积极支持下，南斯拉夫国内的革命力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在目前的恐怖和追捕行动盛行的条件下，在国内建立秘密的组织，以便以这些组织为基础，实现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传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复兴。

可以充满信心地说，铁托－兰科维奇警察机关对共产党人进行的任何恐怖和追捕行动，都无法消灭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斗争的烈火中，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将领导着工人阶级，集合他们的一切力量，摧毁帝国主义雇佣分子的统治集团，并带领本国的劳动人民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

为了顺利地揭露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间谍和代理人的铁托－兰科维奇集团，为了消灭他们的破坏活动，重要的是要保证我们的报

刊和电台协同一致的行动。必须加强出版揭露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宣传材料的工作，并将这些宣传材料投放到南斯拉夫境内。

应该加强反对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破坏活动的斗争。为此必须坚决消除在国际民主组织中以及在这些组织实施的措施中，铁托代理人的一切反革命攻击行为。同时，必须牢固地封锁铁托集团代理人用来向人民民主国家散发宣传材料的一切可能的渠道。南斯拉夫的法西斯分子，利用资产阶级国家的保护，在意大利、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积极地开展了反革命活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经常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南斯拉夫代理人并阻止他们的挑拨性活动。

各国共产党的使命是，要特别关注以忠诚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的任何表现毫不妥协的精神，以忠诚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精神继续教育共产党员的工作。①

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在反对共产主义和民主阵营的斗争中的阴险计划，再一次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兰科维奇的叛徒间谍集团，作为英、美帝国主义分子雇佣的代理机关被彻底地揭露了。目前，任何人也无法再将这个集团冒充为“共产党”，而将目前的南斯拉夫冒充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南斯拉夫的走狗们无论如何也不希望这样。彻底揭露了伪装成共产党员的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在统一阵线中，各国共产党将自己的队伍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

① 在尤金的发言中还有以下内容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去了：“显然，党务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应该与继续向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介绍联共（布）的历史活动和革命经验，以及苏联所取得的成就和它的对外政策的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11773

情报局会议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决议的讨论记录

（1949年11月18日）

萨瓦茨基同志建议讨论和通过关于会议日程第一个问题的决议。

建议被采纳。

萨瓦茨基同志请苏斯洛夫同志进行建议性的发言。

苏斯洛夫同志通报说，制定决议委员会表示完全赞成报告的基本内容，并提交决议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苏斯洛夫同志说，显然，已经没有必要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论据，并建议通过如下程序对其进行审批：

——作为基础讨论并通过草案；

——进行可能性的修改（逐页地）；

——大体上通过决议。

苏斯洛夫同志的建议被采纳了。

萨瓦茨基同志建议通过作为基础的决议草案。

该建议被采纳了。

法戎同志建议在第5页上，补充“工人的”一词，整个建议的表达方式是：“……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

谷尼欧同志建议，在列举右翼社会党人时，将斯巴克的名字写在摩勒和舒马赫之间。

苏斯洛夫同志说，这个位置对斯巴克是合适的。

谷尼欧同志的建议被采纳了。

苏斯洛夫同志建议，在第9页用“他们的职责……”来代替“他们应该……”这句话。

该建议被采纳了。

谷尼欧同志建议：在第9页，出于策略性考虑用“……在各国共产党进行决定性协作时……”取代“根据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倡议……”这句话。

陶里亚蒂同志同意谷尼欧同志的意见，同时建议完全省略以下句子：“……根据共产党的倡议……”。

谷尼欧同志和法国共产党的全体代表都赞成陶里亚蒂同志的建议。

陶里亚蒂同志的建议被采纳了。

萨瓦茨基同志将决议交付表决。

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决议。

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

保加利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代表，讨论了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问题之后，一致得出如下的结论。

最近两年的事变完全证明，1947年9月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次情报局会议对国际形势所作的分析是正确的。

在这一时期，更加明显和更加透彻地表明了世界政策中的两条路线：一条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的路线，这个阵营进行着坚忍不拔和贯彻到底的斗争，争取国际和平，争取民主；另

一条是以美国统治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的路线，其基本目的是要用强力建立美、英两国的世界霸权，奴役其他国家和民族，击溃民主制度和发动新的战争。同时，帝国主义阵营的侵略活动还在继续加强。美、英两国统治集团公开执行着侵略的和准备新战争的政策。

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阵营的斗争中，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增长和巩固了。苏联实力的更加增长，各人民民主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臻于巩固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国人民的革命打破国内反动派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而获得了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的巩固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这一切都表明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有了大规模的扩大和巩固。

同时，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则日益削弱下去。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日益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更加尖锐化，这一体系的外部和内部各种矛盾日趋紧张，都证明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削弱下去。

由于国际舞台上势力对比关系中发生了有利于和平与民主阵营的变化，所以帝国主义的战争挑拨者便疯狂暴怒起来。英、美帝国主义者打算借战争来改变历史发展的进程，解决自己外部和内部的矛盾和困难，来巩固垄断资本的阵地并夺取世界统治地位。帝国主义者感觉到时势对他们不利，所以他们就拼命赶紧建立反动势力的各种同盟和联盟，以求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

英、美帝国主义联盟的全部政策，都是为了准备新的战争。这一政策具体表现于阻挠对德和对日关系问题的和平解决，完全分裂德国，把德国西部的区域和美军占领的日本变成培植法西斯主义和复仇主义势力的场所，变成实现该联盟侵略计划的进攻基地。盘剥性的马歇尔计划，以及紧接着这个计划成立起来而以反对一切爱好

和平国家为目标的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军事联盟，美国和西欧诸国疯狂的军备竞赛，庞大的军费预算及美国军事基地网的扩大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政策。同时，这种政策还表现于英、美联盟不管所谓美国垄断原子武器的神话已被打破而始终拒绝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以及在各方面极力掀起战争狂热。这一政策决定了英、美联盟在联合国组织内所进行的整个路线，其目的就是要破坏联合国组织，并把它变为美国垄断组织的工具。

其次，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新战争的政策，还表现于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对拉伊克－布兰科夫匪帮的审判中已经被揭露的阴谋上，这一阴谋是由英、美集团借助于那已经变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奸细的铁托民族主义法西斯集团所组织进行的，专为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

准备新战争的政策，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群众所负担的沉重税赋不断地增加，意味着借军备竞赛发财的垄断组织的超额利润惊人地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劳动群众更加贫困化。日益成熟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劳动人民经着受更大的贫困、失业和饥饿的痛苦，使他们对自己明天的命运表示惊恐不安。同时，为了贯彻准备战争的政策，帝国主义各国当局又不断侵犯人民群众起码的生存权利和民主自由，在社会、政治和思想生活各方面加强反动势力，运用法西斯手段摧残各国民主进步势力。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企图用此种种手段来准备强盗战争的后方。

由此可见，英、美联盟也同先前的法西斯侵略者一样，正在各个方面进行准备新的战争。例如采取各种军事战略措施，施加政治压力和讹诈手段，在经济上向外扩张和奴役他国人民，在思想上愚弄群众以及加强反动势力。

美帝国主义的头子们在拟订自己的发动新世界大战和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时，并没有估计到帝国主义阵营力量和社会主义阵营力

量间的真实对比关系。他们统治世界的计划甚至比以前希特勒党徒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计划，更加没有根据，更加带有冒险性。美帝国主义分子显然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对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和组织性估计不足。

目前的历史形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时期的形势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战争挑拨者要想实现自己的血腥计划，更加困难了。“不久以前发生的这次战争的惨状如此深刻地留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拥护和平的各种社会力量如此强大，致使丘吉尔的侵略信徒们绝对无法克服这种力量，绝对无法把它扭转到新战争方面去”（约·斯大林语）。

各国人民不愿意战争，并且憎恨战争。他们日益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正企图使他们陷入如何可怕的深渊。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始终不渝地为和平、为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为反对战争挑拨者而进行的斗争，现在日益获得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广大阶级的更加强大的拥护。

这正是强大的和平运动发展的原因。这个团结了6亿以上人士的和平运动正在日益扩大和发展，它普及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并接连不断地把一批一批反对战争威胁的战士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和平运动显然表明，各国人民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掌握到自己手中，显示自己捍卫和平事业和防止战争这一不屈不挠的意志。

但是，如果对于以美、英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所准备着的新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便是很错误的，而且是极其有害于和平事业的。

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巨大发展，决不应该在真正和平战士的队伍中引起任何自满的情绪。如果认为战争威胁仿佛业已减轻，那就是不可饶恕的莫大错误。历史经验教训人们，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愈是绝望，则这反动势力就会愈加猖狂，其军事冒险行动的

危险性也就愈加严重。

只有各国人民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只有他们坚决用一切力量和办法来积极为保卫和平而斗争，才能粉碎新战争挑拨者的罪恶阴谋。

在新战争威胁日益加剧的形势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负有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责任。争取巩固持久和平，争取组织与团结和平力量去反对战争势力，这一斗争现在应该成为各国共产党和民主组织的全部活动中心。

为了实现使人类免除新战争威胁的伟大而崇高的任务，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认为自己负有如下重要的任务：

一、必须更加坚决地在组织上去巩固和扩大和平运动，接连不断地把一批一批的民众吸收到这一运动中来，使这一运动变为全民运动。必须特别努力设法把职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体、合作社组织、体育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宗教组织等等，以及一切主张保卫和平和反对战争的学者、作家、新闻记者、文化工作者、国会议员及其他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们吸收到和平运动中来。

今天特别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在和平与反对业已来到人类面前的新战争威胁这一最广泛的斗争纲领上，不分宗教信仰、政治观念和党籍而把一切诚心拥护和平的人团结起来。

二、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平运动，工人阶级更加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其队伍的统一，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的最广大的阶层吸收到和平战士的队伍中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牢固统一，在为和平与本国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共同行动纲领基础上组织无产阶级各个队伍的联合行动。

三、只有坚决地反对分裂和破坏工人运动的右翼社会党人，才能争得工人阶级的统一。

右翼社会党人如贝文、艾德礼、布吕姆、摩勒、斯巴克、舒马赫、伦纳、萨拉盖特之流，以及反动职工会头子如格林、凯利、迪金[①] 等一类执行分裂主义反人民政策的人，是工人阶级统一运动的主要敌人，是战争挑拨者的帮凶，是借助于假社会主义的和世界主义的词藻来掩盖其叛徒行为的帝国主义奴仆。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不倦地为保卫和平而斗争时，应该时时刻刻来揭露右翼社会党领袖这些和平的死敌所起的作用。必须尽力发展和巩固与各国社会党下层组织及其党员群众在行动上的合作和统一，支持各该党的党员群众中一切真正诚实的分子，向他们说明右翼反动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的灾难性质。

四、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广泛地宣传各国人民间的坚固的和持久的和平，不倦地揭露各种侵略联盟和军事政治联盟（首先要揭露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这样来对抗那些力图把欧亚各国变为流血战场的侵略者所进行的仇恨人类的宣传；必须广泛地解释说：假如新战争爆发，那就只会使各国人民遭受严重的灾难和极大的破坏；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必须做到，使美、英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宣传战争和鼓动各民族之间仇怨的行为遭到每一个国家全体民主舆论的严厉谴责。必须做到，使新战争宣传者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真正的和平拥护者的回击。

五、广泛运用各种已经完全证明有效的动员群众拥护和平的新方式，例如在城乡中建立和平委员会，写请愿书和抗议书，举行民意测验，这种方式在法意两国已经广泛地采用过。同时印行和散布各种揭发准备战争行为的书籍，募集保卫和平的基金，组织大家去

① 凯利·詹姆斯，美国劳动工会代表大会财务书记；迪金·阿尔杜尔，英国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委员。1946～1948年期间，迪金是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主席，而在1945～1948年期间，凯利是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委员。1949年世界工联分裂后，此二人成为新建的自由工会国际代表大会的重要组织者。

对那些宣传新战争的电影片、报纸、书籍、杂志、无线电广播公司、团体及人物进行抵制，——所有这一切都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重要的任务。

六、资本主义各国内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职责，就是要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争取和平的斗争结合起来，不倦地揭露那些已经变为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直接走狗的资产阶级政府所进行的叛国卖国政策，要把国内一切民主爱国分子统一和团结到这一口号周围：消灭甘受美国垄断组织盘剥的可耻政策，转而实行符合本国民族利益的独立的对外对内政策。

必须团结各资本主义国家内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不倦地向他们解释：保卫和平是与保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切身利益，是与保卫他们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密切相联系的。

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西部及其他各国共产党负有重大的任务，因为美帝国主义者想要利用这些国家的人民去充当实现其侵略计划的炮灰。这些共产党的职责就是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展为保卫和平与挫败英、美战争挑拨者的罪恶阴谋而进行的斗争。

七、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苏联共产党的任务，除了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及其帮凶而外，同时还要为了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更加巩固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阵营。

八、美、英帝国主义分子把实现自己的侵略计划，特别是在中欧和东南欧实现侵略计划的相当重大的任务，交付给那个为帝国主义分子当间谍的铁托民族主义集团。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任务，要求更进一步地去揭发这个已经投往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死敌的营垒，即投往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营垒中去的匪帮。

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产生了有组织的和平阵线，这个阵线

是由作为全世界和平的支柱和旗手的苏联所领导的。

各国共产党发出了理直气壮的号召，这个号召宣称：各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参加反对苏联，即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这一号召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群众中愈益广泛地传播开来。

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共产党曾经是全民抗战中的先锋队，在战后时期，共产党和工人党乃是为本国人民切身利益，为反对新战争而奋斗的先进战士。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团结起来的一切反对新战争的人，即一切劳动者、科学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正建立着足以打破帝国主义各种罪恶阴谋的强大的和平阵线。

蓬勃发展的伟大的和平斗争的结局，在许多方面要有赖于各国共产党的毅力和主动性；要使打破战争挑拨者计划的可能变为现实，这首先要取决于作为先进战士的共产党员。

民主力量与和平力量，较之反动势力要优越得多。目前的问题就是要更加提高各国人民对战争挑拨者所应该持有的警惕性，要组织和团结各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自由而积极地保卫和平。

№11774

匈、意、捷、保代表团关于乔治乌－德治报告的发言记录

（1949 年 11 月 18 日）

会议于 18 点 00 分开始，于 20 点 30 分结束

作为嘉宾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阿·萨卡希奇和捷·马罗山[①]。

萨瓦茨基同志建议委托乔治乌－德治同志主持会议。

建议被采纳。

就乔治乌－德治同志的报告继续发言

格罗同志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认为，德治同志的报告是正确的，并完全拥护报告的内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既赞成对铁托－兰科维奇集团进行的政治评价，也赞成德治报告中所做的结论。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 1948 年 6 月做出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揭露了已经走上背叛社会主义和南斯拉夫人民道

① 萨卡希奇·阿尔帕德，1948 年之前担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总书记，自 1948 年起成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49 年担任总统，自 1949 年 8 月起担任匈牙利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马罗山·捷尔吉，担任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副总书记，自 1948 年起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自 1949 年 6 月起担任轻工业部部长。萨卡希奇·阿尔帕德和马罗山·捷尔吉均于 1950 年因被指控从事反对国家的活动而遭到逮捕。

路的铁托集团，自那时起直到今日的这段时间里，铁托集团完成了其背叛行动，转入了反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的阵营，并与帝国主义分子公开结成统一阵线。

斯大林同志以其远见卓识及时地揭露了铁托匪帮，同时尽一切努力，使全世界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武装起来，反抗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代理机关的破坏活动，这种对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工人阶级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的事业以及和平事业的帮助，具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1948年6月的情报局决议，不仅揭露了铁托集团，而且同时在全体人民民主国家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面前提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主要问题，决议将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注意力集中在：不应该只在城市建设社会主义，还必须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是会尖锐化的，对此共产党人应该有思想上的准备；决议还特别强调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教育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的意义，强调以对苏联的忠诚进行教育，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平和各族人民独立的重要支柱。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竭力做到这一切，以便从铁托集团背叛行径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并在更大的程度上，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实现情报局六月会议的决议。

获得了我们党全体党员和广大的无党派劳动人民群众支持的党的领导层，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措施，以便完全弄清铁托集团所扮演的真正角色，以便阻止它在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上和我们党的队伍中的破坏活动。

接着格罗同志谈到了以拉科西同志为首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从情报局决议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格罗同志说，第一个经验教训是：应该比现在更多地巩固联接匈牙利人民与苏联人民友谊的情

结，对于苏联取得的成就，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泛泛的，经常是表面的宣传，必须把介绍苏联取得的成就、列宁－斯大林英雄党的战斗历程、苏联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领域里的丰富经验，变成我们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日常政策。

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甚至即使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到，那么随着最后一次情报局会议的召开，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和匈牙利人民，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2周年当做自己的节日庆祝。在青年国际联欢节期间，我们的人民以无法描述的热情接待了来到匈牙利的共青团员代表团。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为以何种方式迎接代表团成员展开了竞赛。

成千上万的人听取了我们的农民代表团参观苏联的总结报告。

我们的全体工人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以具体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用于生产中。我们的优秀工人和工程师学习苏联的斯达汉诺夫式工作者的工作方法，并在自己的工作中顺利地使用了这些工作方法。拉科西同志已经谈过苏联油画展览的空前成就，这在我们那里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所有领域都在以巨大的规模宣传介绍苏联的成就和意义。我们党、匈牙利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都已经意识到，苏联是和平、安全、我们人民的繁荣昌盛和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保证。因此，正值目前即将来临的斯大林同志70周年诞辰之日，我们这里开展了全体人民的庆祝活动，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所有阶层都参加到这个庆祝活动中，与此同时，这种庆祝活动表现在广泛地开展和加强劳动竞赛，在城市和农村出现了自愿进行义务劳动的群众，成千上万次革新和发明创造活动等等。

我们党从情报局决议中吸取到的另一个经验教训是，应该着手开始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在进行了相关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

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党确定了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并实行了限制富农阶级的政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重大的成果，尽管毫无怀疑这只是该政策最初的成果。目前大约有4万个农户联合起来，组成了共同的生产合作社，有32万公顷的播种面积，也就是占总播种面积的3.5%。平均每户有8公顷播种面积，在匈牙利的条件下，这符合中等农户的利益。这意味着，合作社和集体农庄的思想对于我们的劳动农民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不仅仅是雇农，而且还有中农，都已经开始认真关注合作社的问题了。在组织和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方面，给予了我们的劳动农民阶级的援助是：提供拥有3300台拖拉机以及大批量其他农业机具的221个物资技术供应站。国家经济的播种面积一年之内增长了5倍。

我们党从情报局决议中吸取的第三个经验教训是，必须明确党与各种群众性组织之间、党与人民阵线之间的关系。我们当中存在着这样的观点，即应该把人民阵线变成这样一种群众性的组织，这个组织将掩盖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但是，我们党的领导人坚决批驳了这些观点，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解释工作，以便充分明确，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接着格罗同志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开始更加严肃认真地研究关于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问题，以及在党内、社会和国家生活中开展与敌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毫无疑问，在这个领域里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这还远远达不到我们面前的任务所要求的那样。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在一年之内增长了5倍，出版量达到200万份。我们还成立了两年制和一年制的党校，并扩大了党校的短期培训班的数量。在高等学校里我们还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学活动；利用无线电广播和其他工具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但是，所有这一切还远远

不够，因此最近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完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工作和理论工作的专门决议。

我们党认为自己有责任尽自己的力量，帮助揭露铁托叛徒分子，并正确通报南斯拉夫人民的情况。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以自己所掌握的方法支持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和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

为此，首先需要做的是整顿居住在匈牙利的南斯拉夫人的秩序。在匈牙利生活着数万名南斯拉夫人，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富农分子，铁托集团竭力利用他们进行自己的破坏活动。但是，生活在匈牙利的绝大多数南斯拉夫人，都坚决反对铁托集团，并因此成功地使他们之中的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大部分富农代理人变得无害了。顺便应该指出，不仅对于生活在匈牙利的南斯拉夫富农分子，而且对于匈牙利本国的富农分子和还留在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人民民主制度的每个敌人来说，铁托及其匪帮都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匈牙利人民的敌人是那样一些人，以前他们以极其野蛮的沙文主义态度对待塞尔维亚人民，而现在对铁托充满了极端的热情。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竭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帮助诚实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使他们能够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宣传南斯拉夫的真相。除了秘密散发传单和宣传手册之外，匈牙利的无线电广播电台在这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它每天用塞尔维亚语进行两个半小时的播音，在全国各地的南斯拉夫人民的广大阶层，都不顾兰科维奇刽子手的意愿收听这个广播。对此可以证明的是，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收到了南斯拉夫听众的数千封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他们一方面对给予他们了解真相的机会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还向我们通报了铁托匪帮的犯罪行为，最终，有些信件甚至谈到，南斯拉夫人民的健康力量以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反对铁托匪帮、争取南斯拉夫独

立和人民自由的斗争。

格罗同志说，苏斯洛夫同志在其报告的第一部分以及乔治乌－德治同志在会议日程的第三篇报告中都指出，在揭露铁托匪帮以及帝国主义分子的卑鄙计划时，布达佩斯进行的对拉伊克－布兰科夫的审判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接着格罗同志谈到一个问题，即在反对南斯拉夫匪帮叛徒分子和间谍的斗争中党做了什么，以及在拉伊克事件上的某些经验教训。

格罗同志说，首先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警惕性，我们是否及时地揭露了隐藏在我们党的队伍中和我们国家里的这个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机关？

由于阴谋的破产，由于成功地粉碎了铁托分子及其英、美主子的卑鄙计划，我们也得以及时地揭露了这个阴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关注某些令人震惊和担忧的现象，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分析这些现象，如果我们不是以肤浅的态度对待这些现象的话，我们本可以更早一些揭露这个阴谋的。众所周知，拉伊克是用叛乱的方法使党的组织落入警察之手的。我们曾倾向于认为这是非党性的行为，是政治错误或者其他的什么，但是没有认识到也没有发现，敌人在这方面所做的手脚。我们发现，在拉伊克身边经常发生宣传和赞扬他的人为的运动。自然，这样的事并没有脱离我们的视线，但是，甚至在这方面我们也没有发现敌人所做的手脚。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内的敌人，还是国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都称赞拉伊克，将他这个所谓的“祖国的”和“民族的”共产党员与党的其他领导人－“莫斯科人”[①] 对立起来。自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方面，但是，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以及战争期间，拉伊克在匈牙利从事地下工作，而拉科西以及与之亲近的匈牙利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移居到苏联，并于1944～1945年从苏联返回祖国。

没有做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看到，作为内务部长的拉伊克尽一切可能来阻碍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拒绝给它们提供必备的物质工具，并希望将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到这个部门等等，甚至当时，我们也只是认为，这里可能有挑唆的行为，可能有敌人的捣乱，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拉伊克本人就是我们队伍里的敌人。我们甚至还对拉伊克本人说，敌人企图首先渗入到中央委员会，然后是内务部和军队里。当免除他的内务部长职务时[①]，我们还对他说，这是因为他没能揭露敌人在内务部进行的破坏活动。同志们，之所以必须谈到这一切，是为了强调拉伊克案件留下的异常重要的经验教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揭露敌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帝国主义分子非常懂得如何来伪装自己的代理人，很多年以前他们就将自己的这些代理人派遣到共产党内，人为地给他们制造威信，并用“英雄”的荣誉来包装他们。例如，拉伊克就是被伪装的，有一次，他十分尖锐地攻击自己最亲近的同僚肖尼[②]，说他从事间谍活动，要求对肖尼追究刑事责任，等等。还有这样的情况，正如在消除拉伊克事件的过程中弄清楚的那样，各个间谍集团的成员，根据自己主人的命令，互相之间进行殊死的斗争。例如，他们之中的一名成员在社会保障部担任一个重要的职务，另一个是在医疗工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他们进行争斗，以便使社会保障部与工会组织之间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合作，从而在各派别之间相互斗争的情况下从事自己的破坏活动。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处理非党性的行为、政治错误以及派别和集团之间的斗争方面，不应该表现出丝毫的自由主义，在对这些

① 指的是1948年8月将拉伊克从内务部部长的职位，调任到外交部部长的职位。

② 肖尼·蒂博尔，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干部部部长，与拉伊克一起被判处了死刑。

问题进行调查时，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实际上谈论是否仅仅是错误和无纪律性，还是敌人在起真正的作用。

在我们看来，应该做出的另外一个结论是：清除我们党的队伍、群众组织和国家机构中敌人的代理人的工作，并没有伴随着拉伊克的案件结束。应该镇静地将这个斗争进行到底，不但如此，不应该有丝毫的惊慌，正如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这可能使我们遭遇到十分不幸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应该将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分析拉伊克的案件使我们懂得，渗透到我们队伍中的敌人，为了伪装自己，并不总是干不好自己的日常工作。拉伊克匪帮的部分成员——在此我所指的是肖尼集团——得到的任务是：努力好好工作，干一切对党“有利”的事情，并以此来使集团的成员获得党和国家重要的职位，然后，当形势需要时，他们就可以将以此种方法组织起来的机构投入到间谍和怠工运动中。也就是，在自己的破坏活动中敌人力图实行长远打算的政策。对此切不可以掉以轻心。

应该注意到，这正如拉伊克案件所表明的那样，敌人总是愿意招募那些曾经在某个时候与党有过不和的人、有不满情绪的人、以前的派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其是，如果这些人作为侨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短期或者长期居住过，英国、美国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特工机关通常是在那里招募这些人并使他们为自己服务。因此，对于提拔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或者是群众组织的领导职务上的那些人，应该对与其过去活动有关的一切事情进行详细的调查。

阶级敌人斗争的最典型的方式是，它造就了一个拉伊克，并在15年期间发挥着他的作用。1931年霍尔蒂的警察局招募了拉伊克，作为奸细，后来又把他转交给了盖世太保，然后交给了美

国的间谍中心。美国间谍中心使拉伊克与铁托间谍机关建立了联系，并使拉伊克服从于铁托间谍机关，以便使拉伊克在匈牙利完成已经在南斯拉夫完成的反革命政变。帝国主义分子通常是将报酬很低的奸细培养成为这样一些代理人，即可以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战略任务委托给他们去完成。拉伊克的道路就是铁托－兰科维奇的道路。

对拉伊克－布兰科夫案件审判得出的进一步经验教训是，越是当人民民主国家消灭各种资产阶级组织和政党时，越是当缩减它们的群众基础时，敌人就越是更多地、更坚定地试图在领导工人阶级、人民和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安插自己的代理人，因为敌人非常懂得，当党在政治和组织上强大、健康，在思想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时，到这时为止他们的卑鄙的破坏计划注定就破产了。因此，我们应该更加提高警惕性，在各方面确保我们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以防止敌人混进党内的任何企图。

拉伊克匪帮案件相当重要的经验教训是：民族主义是敌人进行破坏活动的最好的条件，情报局去年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已经坚定和正确地提请我们注意这种民族主义的极大危险性。在我们这里，民族主义的危险不止一次地表现为过高地评价我们所取得的经济和其他成就，过低地评价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这种危险还表现在对苏联的成就谈得很少或者是避而不谈。但是，不管它是以何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都应该持续不断地与这种危险进行斗争，广泛地宣传真正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并不矛盾，而是对它辩证的补充。

正如苏斯洛夫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拉伊克－布兰科夫的阴谋，不仅是反对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而且是反对匈牙利、反对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具有国际性质的阴谋。我们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善于从以上这个重要的定义中做出必要的结

论，不仅如此，在拉伊克的审判材料中，还有十分具体的摘录说，这个帝国主义阴谋的线索已经被直接传播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布兰科夫说，兰科维奇给他举出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说他的代理机关在那里要比在匈牙利渗透得更深。

格罗同志说，拉伊克－布兰科夫间谍匪帮的阴谋案件，再一次证明了列宁－斯大林学说的正确性，即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仅没有熄灭，与此相反的是，它更加尖锐化了。毫无疑问，拉伊克－布兰科夫－铁托－兰科维奇匪帮的阴谋以及他们的阴险计划，是人民民主国家内以及国际舞台上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失去影响和力量的人民的敌人，通常采取的方针是：联合各种反动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教权主义党人以及法西斯分子，进行反对和平和民主、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斗争，他们企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活动，从而掩盖自己的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反人民的政策。

接着格罗同志说，英、美帝国主义计划的目的是：在拉伊克阴谋集团和被雇佣的铁托杀人犯匪帮的帮助下，使匈牙利，不仅仅是匈牙利，还有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苏联，脱离和平阵线，并破坏和摧毁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这个领导着人民民主制国家的政党的内部统一。可以说，随着拉伊克－铁托匪帮的被揭露，这些计划不仅被彻底粉碎了，而且给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于揭露了拉伊克匪帮和消灭了阴谋分子，我们劳动人民的政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同时加强了我们党的威信；不仅是我们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有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承认党的领导作用并拥护我们的党。我们人民的大多数都意识到并承认列宁－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的学说的正确性。

帝国主义分子的关于使匈牙利与苏联对立的计划还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例如，我们劳动人民的绝大多数由于拉伊克案件明白了，是党使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复辟以及恢复资本家和地主的枷锁的威胁，更确切地说，由于消灭了拉伊克匪帮我们的劳动人民懂得了，在反对帝国主义分子破坏活动的斗争中，在保卫我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中，加深与伟大的苏联的友谊是至关重要的任务。在揭露了铁托－拉伊克匪帮之后，我们与苏联的友谊以及对苏联和敬爱的斯大林同志的爱戴，以空前的规模加强了，对这一点每个人都能够确信无疑，即使他只在我们国家里度过几天的时间。

在发言结束时格罗同志说，正如苏斯洛夫同志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消灭拉伊克集团不仅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取得的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战争贩子的胜利，而且是以我们全体的领袖和榜样——伟大的苏联为首的整个和平阵线的胜利。

契卡里尼同志声明说，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完全赞成德治同志的报告，意大利共产党在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和南斯拉夫国内的工作过程中获取的经验教训，完全证明了报告人所做的结论及其建议的合理性。

契卡里尼同志说，在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铁托法西斯集团加强了自己的挑拨和间谍活动，他们企图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中为自己找到同盟者和朋友，以进行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斗争，并削弱和瓦解意大利共产党和意大利社会党的队伍。

针对共产党，铁托匪帮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运动，他们给党的各级组织和一些党员寄去了数千份宣传小册子。

同时铁托分子还通过自己在罗马的大使馆，力图与过去的游击队员、新闻记者、左翼民主党人、知识分子、社会党人等等建立联系，并邀请他们访问南斯拉夫。同时，铁托的代理机关还在民主和

进步运动的队伍中，尤其是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扩大自己的间谍网络。因此，共产党被迫在以下几条战线在意大利开展反对铁托分子的斗争：无论是在党的内部，还是在党的同盟者和劳动人民群众之中，以及在报刊界等等，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和组织战线上开展斗争。

在情报局决议的基础上，共产党在自己党内直至基层组织，开展了思想和政治运动。

契卡里尼同志继续指出，当得知南斯拉夫大使馆与意大利的游击队员建立了联系（这些意大利游击队员是自1943年到1945年期间在南斯拉夫游击队里战斗的，在意大利这样的游击队员总共有5000多人），共产党立即召开了有过去游击队的指挥员、政治指导员以及在南斯拉夫解放战争中阵亡的游击队员的家属参加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揭露了铁托匪帮的背叛行为，指出它已经转入帝国主义阵营，并呼吁游击队员拒绝类似的邀请。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个由谁也不认识的10名游击队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了南斯拉夫，在那里，他们按照兰科维奇警察局的意愿进行了参观，但是，返回意大利之后，他们没有做任何有益于铁托分子的工作。前往南斯拉夫的还有一个米兰社会党人小组。这些人曾经受到过意大利社会党领导的谴责，并已经被开除出社会党的队伍。南斯拉夫驻罗马的大使，在遭受失败之后，写了一份“抗议书”，并将它寄给了罗马最反动的报纸——《意大利日报》（内务部长谢尔巴和外交部长斯佛尔查伯爵的喉舌）。社会党领导人发表了公报作为对这份“抗议书”的答复，在公报中写道：“我们认为不需要参加与伊文科维奇[①]先生的辩论。伊文科维奇先生早已经

① 伊文科维奇·穆拉德恩，南斯拉夫驻意大利的公使。

知道了意大利社会党人对他的政府的民族主义蜕化堕落的看法，这种蜕化堕落很久以前就发生了，我们的人民是根据自己的直接而又痛苦的经验教训得知这一点的……共产党情报局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辩论已经持续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它并没有引起意大利社会党人立场的变化。只有那样一些事实，即南斯拉夫大使徒劳无益地竭力进行驳斥或者是贬低，使社会党人和和平的拥护者承认，南斯拉夫已经处于持续不断地为和平而斗争的和平阵营之外了”。

契卡里尼同志声明说，这证明了意大利的反铁托斗争阵线并不仅仅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而且它还包括社会党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共产党人与他们一起为争取将铁托的代表从国际民主党人－法律专家组织中，以及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执行委员会中清除出去而斗争。不久前在罗马还举行了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例会。

在谈到革命的警惕性问题时，契卡里尼同志通报说，意大利的共产党人发现并揭露了铁托分子间谍网里的一部分成员，这部分成员还存在于艾米利亚和马尔凯的一些党组织中，并与罗马的内务部有联系。

发言人认为，在党内和党外——在社会党人和左翼知识分子之中开展反对铁托分子的斗争时，无论是在思想问题上，还是在加强警惕性方面，都应该加强斗争的力度，因为这个斗争尽管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然后，契卡里尼同志谈到意大利共产党在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他说，在情报局决议发表时，那里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当时，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共产党是由铁托分子巴比奇和乌尔希奇领导着，他们完全控制着出版、印刷和党的其他工具。铁托分子几乎掌握着所有的群众性组织：工会组织、妇女联盟，等等。在经过了顽强的思想和组织上的斗争之后，铁托分子处于少数并被驱逐出党，被免除了他们在民主的群众性组织中的领导

职务。[①] 这样一来，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共产党才得以返回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并在反帝民主阵线的队伍之中占据了自己的位子。铁托分子还遭受到党外来自的里雅斯特劳动群众方面的失败：在最近的市政选举中，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共产党获得了42500张选票（21%），而铁托分子只获得了3900张（1.8%）。契卡里尼同志声明说，如果考虑到，几乎所有的斯洛文尼亚族的农民都投票赞成共产党、拥护和平、反对铁托、反对帝国主义的话，那么铁托分子遭受到的失败就更加严重了。[②]

---

① 巴比奇·布兰科是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乌尔希奇·鲁道夫是该党第二号人物。当时这个党联合了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两个区（由南斯拉夫的军队监管的东部区和由英美的军队监管西部区）的全体共产党员——意大利族和斯洛文尼亚族的共产党员。党当时的活动是依靠南斯拉夫的财政支持并由贝尔格莱德进行调整的。当南斯拉夫当局脱离了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之后，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党就分裂成了两个相互敌对的党：以巴比奇和乌尔希奇为首的亲南斯拉夫的党，以及B. 维达利领导的亲共产党情报局的党。

② 在整理会议记录时，删去了契卡里尼发言中的以下内容："现在简单地说一下，我们在南斯拉夫国内，在帮助我们的在斯洛文尼亚和伊斯特拉的同志以及帮助他们进行反对铁托政权的斗争方面所获得的工作经验。

在完成这项任务时，我们力求使用在过去20年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我们所获得的经验。我们成立了由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和意大利族的同志组成的专门机构，这个机构拥有自己的办公地点，以及与我们党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分开的办事机构。同时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收集关于国内状况的信息资料，建立可靠的联络站，散发宣传材料，帮助国内的同志进行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

我们成功地与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的主要中心建立了联系，并建立了由一些小组、一些经过考验的记者组成的组织网络。但是，这种联系还十分簿弱，因为这些小组的绝大部分成员是侨民——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族人，还因为这些小组没有来自省和州委员会的统一领导。这些独立自主的小组的结构是我们按照极其秘密的意图建立的，其目的是为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即当整个组织还没有巩固下来之前，可能出现的挑唆行动将给整个组织带来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专门机关还发表了在南斯拉夫国内使用的宣传材料。例如，10月份我们的专门机关印制了1000份斯洛文尼亚文字的小册子，其内容是已经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上发表过的就与铁托进行斗争的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此外，在10月份还向斯洛文尼亚和伊斯特拉寄出了大约500份报纸，这些都是

接着，契卡里尼同志说，他们从伊斯特拉和斯洛文尼亚获得的通报和信函，完全证明了德治在其报告中以及尤金同志在其发言中，对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所做的分析。最近一年内，南斯拉夫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极端地恶化了；缺乏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在农村中，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以及人民阵线的各级组织和地方政权机关中，富农分子主宰着一切。

地方机关上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逐渐地变成了政治警察的工具，被利用来防止劳动人民和民主党人公开表现出对现存制度的不满情绪。工会组织也逐渐地变成了压制工人们的工具。

对这种情况提出抗议的工人们，甚至即使他们提出抗议的方式是法律和章程所允许的，也会遭到解雇、逮捕和由于犯有仿佛是怠工和教唆罪而被判处监禁。

在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内部，逐渐占主要地位的是出身于南斯拉夫老的民族主义分子阶层的一些人，而出身于工人阶层并与劳动群众密切相联的那些干部，却受到监视或者是被调到次要的领导岗

（接第622页注释②）居住在布拉格、莫斯科、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的南斯拉夫政治侨民出版的报纸，以及在的里雅斯特用斯洛文尼亚文字出版的《事业》周刊。应该承认，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所有这些出版物是远远不够的。

将这些宣传材料转寄给我们的小组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美国人和铁托的警察对边界把守得非常严格。由我们所组织的渠道，我们每周利用一次，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船员、铁路员工、侨民的家庭成员等等。

目前我们小组的能力还很薄弱，政治主动精神还很有限，在当地出版传单、小报等宣传材料的技术设备还很不足。

我们还从这些小组和可信赖的同志那里获得了一些报告和通报，并给他们发出书面或者是口头的指示。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组织还很薄弱，这些小组不能够组织大规模的反对铁托当局的运动以及大规模的群众性浪潮。”

位上。对政府和党的政策表现出怀疑或者是没有信心的那些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都被开除党籍或者是遭到逮捕。

在南斯拉夫人民的各个阶层广泛地传播着对铁托政权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或者是以单独的和集体的抗议书形式，或者是以消极的抵抗、怠工和要求食品的妇女们示威游行等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契卡里尼同志说，但是，为了转入对抗和斗争的最高形式——罢工、街头示威游行等等——必须拥有一个地下的革命的共产党组织，它要比现存的这个党组织在政治上更牢固、更强大。由此可见，必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

契卡里尼同志声明说，意大利共产党的经验证明，必须尽快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心，这个中心能够协调居住在各个国家的南斯拉夫政治侨民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

最后，契卡里尼同志宣称说："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可以使情报局的同志们相信，我们党将以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以及本次会议即将给我们下达的指示为基础，由于意大利是马歇尔化的国家之一，是铁托匪帮——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代理人匪帮进行挑拨和间谍活动最公开的国家之一，因此在各个方面应加强反对铁托匪帮的斗争。"

柯普尔纪瓦同志说，事件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一年半以前通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所有论点是正确的。这个决议对于各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以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事业具有真正的历史性的意义。

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人民民主国家，无限感激联共（布）及其领袖斯大林同志，感谢他们在揭露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最坏的敌人——铁托集团的背叛政策时，所表现的倡议精神以及给予的帮助。

柯普尔纪瓦同志继续说，根据通过的决议展开的运动，是对我们党员重要的政治磨练。决议以实际的例子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害性，对它必须进行揭露和消灭。决议向我们的党员表明，走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斗争道路的人，不可能不落入到工人阶级的敌人的阵营，以及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阵营，即使他能用一些假的社会主义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活动。决议成为我们党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强有力的工具。决议将必须告知党员群众的一些问题提到了会议日程上。党员群众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布）是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劳动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决议使我们的工人阶级坚信，只有思想上深刻的统一和与联共（布）的团结一致，才能赋予我们共产党必不可少的力量和威力。这个决议再一次向我们的劳动人民表明，只有我们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联盟和友谊，才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和独立，使它免遭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并保障我们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有助于我们党的许多党员同志战胜关于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阶级斗争自动熄灭的危险幻想，有助于提高党的队伍的警惕性。

柯普尔纪瓦同志说，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来说，决议的重大意义在于：与决议有关的工作，有助于顺利地克服压制党内的民主，压制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逃避自我批评和实行独断专行的倾向，这些倾向在某些地方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并给党带来了危害。

与情报局决议有关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阐明关于正确地理解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党的基层工作人员多次错误地看待这种作用，将其看成是如下行为的结果，即他们采用专制、颁布命令以及履行监护义务的方法，以此取代在实现通过说服群众的途径来

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时争取群众的日常工作。[①]

最后，情报局决议是加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提高党员对国际工人政策问题以及兄弟共产党活动情况的兴趣的促进因素。

决议的内容引起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的广泛兴趣。结果是党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思想辩论活动，表现出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知识的源泉的意愿。党的各级组织扩大了思想学习，深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以及党员之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尤其是力图加深对联共（布）经验的学习。

在情报局决议公布之后不久，在捷克斯洛伐克“索科尔”体育组织集会期间，发生了一起铁托分子的挑拨事件。一批反动的捷克大学生，手拿着美国的旗帜进行挑拨性的示威游行，并高喊着“铁托，光荣”。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受到了南斯拉夫的无线电广播和报刊的毒害，兰科维奇的雇佣者残酷地毒打了在南斯拉夫发电站工地工作的几名捷克族的工人。这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强烈愤怒。数百家工厂通过了决议，抗议铁托当局的恐怖行为。

我们共和国与铁托的南斯拉夫在贸易关系中的体验是众所周知的，并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体验是一样的。由于这一点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与南斯拉夫断绝了贸易关系。

柯普尔纪瓦同志说，为揭露铁托集团的背叛行为，我们还利用了那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支持南斯拉夫政府在安全理

① 柯普尔纪瓦发言中接下来的一段话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决议有助于我们中央委员会纠正我们的个别同志在占领社会主义农村的方法问题上的观点。这些同志希望越过必要的发展阶段，提出立即实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以便绕过使农村确信集体化优势的比较困难道路，以及创造实现集体化的必备条件而应该进行的大量漫长的工作。这些同志完全忘记了在我们的日程上摆着这样一个问题，即限制和排挤城市和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事会中的候选人资格，并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候选人资格，以此他们还公开承认，总是竭力冒充社会主义者的铁托，是他们顺从的、并领取他们报酬的走狗。

铁托分子到处雇佣间谍分子，尤其是在那些英、美帝国主义侦察机关难以行动的地方。南斯拉夫驻布拉格的外交代表，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尝试着在我们这里招募自己的代理人，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我们党的队伍。

铁托匪帮特别关注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击队员，并使他们确信，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已经将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捷克斯洛伐克的游击队员也应该走这条道路。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机关揭露了游击队员之中的铁托匪帮的代理人和我们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

南斯拉夫外交使团的成员还干涉我们国家的内政。乘坐外交使团的汽车出行时，他们还散发了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传单和宣传手册。在南斯拉夫用捷克文字和斯洛伐克文字印刷的传单和宣传手册，通过走私的途径运入捷克斯洛伐克，然后由南斯拉夫大使馆将他们分别寄发给个人。

接着，柯普尔纪瓦同志说，已经公布的苏联政府给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书[①]，对于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苏联政府的这些照书，撕下了铁托及其集团的面具，将他们作为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从社会主义阵营逃到战争贩子的帝国主义阵营和法西斯－盖世太保制度在南斯拉夫的体现者，并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提并列。

① 指的是关于南斯拉夫对奥地利的卡林西亚省的领土要求的照书，以及关于在南斯拉夫逮捕了一些人员的抗议照书，这些被逮捕的人都是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之后从俄罗斯移居的侨民，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已经获得了苏联国籍。南斯拉夫当局对于逮捕行动的解释是：这些人从事有利于共产党情报局的破坏活动。

这些照书在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工厂和其他集会上，通过了数千份决议，谴责了铁托的法西斯政府，表达了对苏联的热爱和忠诚。

对拉伊克的审判也同样引起了类似的反响。正如苏斯洛夫同志所说的那样，这次对拉伊克的审判，揭露了一个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巨大的国际阴谋，一个反对和平和民主制度的阴谋，这个阴谋的目的是要借助已经成为国际反动派代理人的铁托法西斯间谍集团，推翻匈牙利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使这些国家脱离和平和民主的阵营，在这些国家里恢复法西斯的统治，将它们变成帝国主义分子的傀儡和军事进攻行动的基地。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们，在自己的无数次集会上，谴责了作为战争贩子代理人的铁托法西斯分子，并意识到，这些代理人的犯罪活动使共和国的生存、独立和主权受到了威胁。在自己的基层组织集会上，向全体党员介绍了苏联政府照书的内容，以及在布达佩斯进行的审判的有关材料。

对拉伊克的审判还向党表明，必须加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和它的代理人铁托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代理机关的斗争。党对那些在布达佩斯诉讼过程中披露出来并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的各种线索进行了追查。结果是揭露和消灭了一系列间谍分子。因党的机关报《红色权利报》主编粗暴地破坏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撤消了他的职务。党还揭露了几个为南斯拉夫侦察机关和英、美侦察机关服务的集团。在布拉格还逮捕了一大批原捷克国家社会党党员，其中还有几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所有人都供认，他们得到了命令，必须加入共产党，获得重要的职务，然后破坏党的队伍并向英、美侦察机关提供情报。

柯普尔纪瓦同志说，党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经济机关的薄弱方面。在有了对拉伊克审判的经验之后，党应该尽快地清除管理

机关中的不可靠分子和异己分子，撤换干部并提拔新的工作人员。

党已经提拔了几万名新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到国家机关的各个岗位上工作。党极其关心对新干部的教育工作，为劳动群众参加高级学校组织短期培训班、以及培养在国家经济和管理机关、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担任重要职务的新干部的长期培训班。

当国家机关和管理部门出现某种困难和不顺利的情况时，党立即进行了调查，什么人应该承担这些责任。结果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这些困难和不利是疏忽大意造成的。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罪犯都是那些异己分子、怠工分子和人民民主制度的敌人。

我们在整个国家机关里，在工业、贸易等各个部门的领导岗位上，都有自己的干部，我们给他们树立威信，任命他们担任副部长或者是总经理。这些机关的干部处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干部部合作，其任务是研究、挑选、撤换干部并在工作中帮助这些干部。

柯普尔纪瓦同志说，德治同志是正确的，他指出，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国家机关是不会立即被摧毁的，因为这些国家在自己的机关部门接受了大量的旧的工作人员，他们之中有许多不可靠分子，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撤换他们。

在我们所掌握的帝国主义侦察机关的命令中，建议在寻找特工人员时应该注意那样一些人，即对党的路线方针不满的人，以及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等等。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提高警惕性，对这些人的活动进行监督并及时地揭露他们。

党所面临的任务是：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警惕性——教育这些群众对于间谍和破坏分子提高警惕性。

党公开批评了我们在布拉格的州党委员会的粗心大意行为，在这里有两名布拉格市党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是党内的异己分子，他们滥用自己的职权并帮助了阶级敌人。以同样的方式党还批评了卡

罗维发利市的事件：这里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以行动命令代替集体领导的原则，压制党内的民主和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撤消了州委书记，免除了其他几名负责人员的职务，并在全党内利用这一事件加强了党内的民主制度。

去年年底，全党开展了对全体党员进行核查的运动。

在核查期间，有107133人被开除出党，占党员总人数的4.5%，有522685人被转入候补党员，也就是占党员总人数的22%。今天，党员和候补党员的人数总共是230000人。明年，党将开始更换党证，这是对党员进行新一轮的核查。

党目前正在实施措施完善自己组成的社会成分。党内工人所占的比例数是45%，这令我们感到十分不安。我们已经停止接收非工人阶层的人员入党，我们只是接收突击队中最有觉悟的工人入党。

我们已经达到，使我们的州和区党委员会中的组成人员大多数是工人。基层和区组织党的委员会的改选，在遵守党内民主制度和广泛进行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条件下，每年进行一次。

我们支持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的斗争，直接的做法是：关心南斯拉夫的革命侨民，在出版《新战斗报》以及向南斯拉夫境内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工作方面帮助他们。的确，南斯拉夫革命侨民的活动具有分散性的缺点。因此，德治同志建议成立统一的中心，以便协调在各个国家内的南斯拉夫革命侨民的工作和斗争，这个建议将有助于加强重新建设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斗争。

在结束时，柯普尔纪瓦同志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根据布达佩斯审判案的经验教导全体党员，不能低估阶级敌人及其将自己的代理人安插在党内的企图。我们清楚，阶级敌人每时每刻都在加强自己的间谍和破坏活动。我们懂得，我们还远远没有揭露阶级敌人的全部代理人，1948年2月以前这些代理人完全可以合法地渗入到各个地区，并且已经渗入到那里。我们丝毫也不怀

疑，在具备充分警惕性的条件下，我们将能够揭露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更多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党中央委员会给全体党员提出一个任务：对阶级敌人的代理人每日进行揭露，清理党的队伍中的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不这样做就无法向社会主义迈进。

柯普尔纪瓦同志说，在此我将表达我们代表团的信念：本次情报局会议、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任务、苏斯洛夫同志和陶里亚蒂同志的报告，将更加有助于我们党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队伍，使党充分实现自己在由伟大的苏联领导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务。

波普托莫夫同志声明说，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完全赞成乔治乌－德治同志在报告中所阐述的结论。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对于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整个保加利亚来说，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从保证民族独立、国家安全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条件的这个角度来说，已经实现了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保加利亚来说，铁托分子不仅是民主和社会主义阵线的卑鄙逃兵，不仅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和间谍，是反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最凶恶的挑唆者和奸细，而且还是最危险的邻居。目前，铁托分子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对保加利亚领土的觊觎，而且还公开地放肆地说出自己打算占领皮林地区——保加利亚的马其顿。他们与希腊君主派法西斯分子达成一致：不仅要扼杀希腊的人民解放运动，不仅要肢解阿尔巴尼亚，而且还要建立反对保加利亚的共同阵线。

准备加入巴尔干半岛上这个反动阵线的还有土耳其。波普托莫夫同志说，这样一来，英、美帝国主义分子打算将巴尔干置于经常的混乱之中，挑起边界事件甚至更严重的冲突，当他们需要时，就对保加利亚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实施系统的压力。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铁托集团是非常危险的敌人，这还因为，它们利用邻邦、两个斯拉夫民族的语言和风俗

相似这些条件，企图用自己的宣传来瓦解我们党的队伍和我们的人民，制造对我们党的领导人、对联共（布）的领导人和苏联的不信任。铁托集团企图在各种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具有反苏情绪的人之中，招募自己的拥护者，在各种倾向分子中和党内其他的腐朽分子中招募特务、奸细等等。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及其同伙就是这样被招募的，他们变成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职业代理人，同时与铁托匪帮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并处于铁托匪帮的直接影响下。

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匪帮的任务是：借助于铁托分子的帮助，完全夺取保加利亚的领导权，然后使保加利亚与苏联以及和平和民主阵线断绝关系，并在某种联邦的幌子的掩盖下，加入铁托的南斯拉夫，也就是使保加利亚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真正的殖民地。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最近，大概在今年的12月初，将举行对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及其同伙的审判，届时还将揭露在我们国家里的这个外国代理机关的一系列敌对活动，以及铁托匪帮反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反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反革命间谍活动的一系列新内容。

目前，清理党、国家和社会机关里的帝国主义在保加利亚的代理人的工作，正在全力地开展。毫无疑问，这对于铁托集团及其帝国主义主子们，将是一个新的、沉重的打击。

波普托莫夫同志指出，铁托集团此前曾做过一切努力，以使南部斯拉夫联邦计划破产，而现在又装出一付这个联邦的热烈支持者的样子，企图利用两个斯拉夫民族的兄弟感情，赋予这个联邦的口号以反苏的性质，这将会有助于南部斯拉夫人脱离苏联。铁托分子的这种投机的做法，还表现在对巴尔干－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口号上，他们力图建立一个东南欧人民反对苏联的集团。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这样一来，铁托分子的关于各种联邦的一切闲言碎语，正是遵循了今天的这个反苏联的反革命的目的——使

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与苏联以及反帝统一阵线断绝关系，并将他们纳入到英、美帝国主义的阵线中。众所周知，目前，南斯拉夫外交使团正在按照自己英、美主子的命令，为制定作为对大西洋公约补充部分的所谓的地中海公约，紧张地工作着。为达到这个目的，铁托分子不仅与希腊的君主法西斯分子、土耳其的反动分子，而且还与当政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天主教集团调情。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在极其复杂阴险的条件下，我们党的队伍和我们的人民之中就会发生混乱，而铁托匪帮在这种卑鄙的诽谤面前并没有停止下来，其目的就是利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光荣的名字进行自己罪恶的勾当。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这个已被揭露的极其凶恶的间谍集团为达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它善于进行任何一种卑鄙和挑拨的勾当。

波普托莫夫同志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里，铁托分子对于保加利亚的挑拨行动变得越来越放肆了。铁托分子越来越多地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边界上挑起事端。目前，铁托－兰科维奇集团更加强了边界地区的警卫，并在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边界附近的地区部署了新的兵力。居住在南斯拉夫境内的保加利亚公民处于极端的恐怖和恣意妄为的统治之下。数十名保加利亚公民被无辜地投入到监狱和集中营里。在塞尔维亚东北部地区的保加利亚少数民族，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苏联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各国抱有好感，目前他们正处于十分可怕的血腥的恐怖之中，并面临着在肉体上被消灭的威胁。铁托分子还对在所谓的马其顿共和国里的马其顿居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些居民的绝大部分也是拥护苏联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众所周知，铁托的南斯拉夫，目前已经变成了从人民民主国家逃跑的所有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分子、一切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的反党坏分子，以及一切杀人犯、盗窃犯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聚集地。铁托分子

正是从上述这些坏分子中招募组成了土匪颠覆小组，并将他们派往保加利亚进行破坏活动。还成立了一个由上述犯罪分子组成的政治中心，在相邻的人民民主国家里进行铁托分子的宣传活动。例如，铁托的南斯拉夫出版了两种报纸，指定在保加利亚进行发行：一份是在贝尔格莱德印刷的——《保加利亚人之声报》，另一份是在斯科普里——《皮林之声报》。

波普托莫夫同志指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铁托匪帮是如此猖狂地活动，其目的就是使相邻的人民民主国家陷入混乱并导致最后的解体。自然，这一点绝不代表铁托集团是如何强大并具有影响力。正相反，这只能说明，我们是在与如此阴险和狡诈的敌人打交道。这还说明了，铁托分子在南斯拉夫本国内的基础越不稳固，他们就会越加疯狂地破坏和离间相邻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的关系。

波普托莫夫同志声明说，从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直接地关心进行最坚决、最有效的反对铁托集团，争取更快地将南斯拉夫人民从血腥的法西斯的暴政下解放出来的斗争。波普托莫夫同志说，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声明：我们党和保加利亚人民是多么地感谢联共（布）、苏联以及斯大林同志，是他们如此详细地揭露了铁托集团阴险狡诈和挑拨离间的本性。

波普托莫夫同志强调指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反对铁托集团的斗争都不能带有防御的性质。这个斗争应该具有进攻性并不断地得到加强。这个斗争的任务还包括更加深入地揭露铁托匪帮，使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群众能够更加看清他们的背叛活动，正是他们作为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代理人，出卖了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并将南斯拉夫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当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和全体诚实的南斯拉夫民主人士推翻铁托分子的血腥统治、恢复劳动人民的政权并使南斯拉夫返回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时，我们的斗争

应该给予他们政治和组织上的帮助。在建立一个新的、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共产党的事业中，必须给予他们政治和组织上的帮助，这个新的共产党应该站在推翻铁托匪帮的群众斗争的前列。

接着，波普托莫夫同志又谈到在与铁托分子斗争中，保加利亚共产党所采取的措施。

揭露铁托集团的宣传活动，是通过口头、无线电广播和报刊的形式进行的。在会谈、报告、会议和群众集会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揭露铁托分子的。最近，尤其是在苏联给南斯拉夫照书以及对拉伊克－布兰科夫进行审判之后，反铁托分子的运动更加高涨了。波普托莫夫同志说，最近几天，全国各地进行了集会，抗议铁托分子的卑鄙阴谋。在这方面，边界各地区尤其受到了关注。

波普托莫夫同志指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和充分地利用像无线电广播这样强有力的工具。的确，每天要用塞尔维亚文进行专门的报道，每周五次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两次用马其顿文进行广播。但是，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这还远远不够。报道所采用的材料经常带有偶然的性质，因此，这些报道不能总是击中要害，也不能经常打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的心。

无线电广播这种工作，如果能够很好地组织并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督，它是能够也应该在揭露铁托分子的事业中起到巨大的作用。

同样也可以说说报刊宣传工作。几乎每一期党的中央机关报——《工人事业报》，同《祖国阵线报》一样，都刊登揭露铁托的原文和翻译文章或者是通报。例如，《工人事业报》在3个月内，即8、9、10月共刊登了45篇揭露铁托分子的文章，其中有8篇是翻译文章。《祖国阵线报》自今年的9月1日至11月10日期间，也就是在58期里共刊登了26篇揭露铁托分子的文章，其中8篇是翻译文章，以及52条外国报刊的消息和评论。《劳动报》在这一期间公布了23篇反对铁托分子的文章。

波普托莫夫同志指出，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被发表的文章的质量和内容。

总之，保加利亚的普通劳动人民群众，对于铁托分子以及敌视民主和社会主义并与我们国家切身利益相对立的铁托集团，持有正确的立场。保加利亚共产党认为，直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充分广泛地开展反对铁托集团的揭露运动。

波普托莫夫同志继续说，在保加利亚的南斯拉夫革命侨民采用两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和马其顿语出版了《前进报》，每种发行5000份，总发行量为10000份。报纸的出版工作由编辑委员会负责，其成员有南斯拉夫侨民－共产党员，而总的政治监督工作由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行。

拟定这个报纸主要是针对南斯拉夫国内的南斯拉夫群众。为此，需要将这些报纸通过边界运出并在南斯拉夫境内秘密散发。波普托莫夫同志说，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取得大的成绩。在大规模地将这些报纸运过边界并在南斯拉夫境内散发方面，还存在着大量的困难，目前还没有克服这些困难。离边界较远一些的地区，还没能将报纸散发到那里。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倡议，最近采取了专门的措施，我们希望这些措施能在这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波普托莫夫同志继续说，这个宣传工作的最主要的缺点是，它不是基于南斯拉夫局势发展的准确情况上，而是基于表面的现象上，基于对偶然事情的报道上。因此，所进行的宣传不足以令人信服，不能给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和心灵以需要的帮助。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我们的宣传工作，没有利用来自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生活中的具体事实，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正在日益恶化。只有利用这样的具体宣传，我们才能够揭露关于“铁托式的社会主义”的神话，而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群众才能够明显地相信，铁托分子将他们出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充当奴隶。

波普托莫夫同志继续说，由此可见，为了使我们的反铁托分子的宣传变得更加有效，更加生动和更有说服力，应该使这种宣传更加具体，应该依靠准确的事实进行这种宣传。因此，首先必须经常获得关于如下内容的可靠的情报：南斯拉夫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人民群众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的情绪如何等等。没有准确的情报就不可能进行揭露铁托分子的正确的宣传活动。[①]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正确的做法是：使我们的宣传密切地注视着南斯拉夫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殖民地的过程，并用手中掌握的事实直接揭露铁托集团的背叛行为。

铁托分子最多地是利用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感情，他们认为，这是他们重要的力量所在。波普托莫夫同志说，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宣传没有充分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角度，从联共（布）和苏联的经验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方面，对这些国际主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国际主义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联共（布）的领导作用的问题，以及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领导作用问题，我们还研究得不够。

波普托莫夫同志继续说，在反对铁托匪帮的斗争中，我们党的另一个任务是：在南斯拉夫革命侨民中开展工作。此处所指的是，在政治方面正确地组织侨民，使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铁托叛徒匪帮的斗争。在与南斯拉夫建立联系方面，在帮助建立南斯拉夫新的共产党并对其进行组织上的巩固方面，在运送和散发报刊宣传材料方面，南斯拉夫政治侨民能够给予异乎寻常的有益的帮助。

① 波普托莫夫发言中接下来的内容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在我们的宣传工作方面我们的错误在于，没有考虑到南斯拉夫居民的大部分阶层继续成为铁托分子虚假宣传的牺牲品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仅仅满足于做出总的结论和声明，即铁托分子是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特务。"

在这方面的结果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波普托莫夫同志说，最近党中央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应该使我们反对铁托分子的斗争出现一个转折。这些措施是：更正确地利用南斯拉夫政治侨民来建立与南斯拉夫的联系和散发宣传材料的渠道，给新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以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帮助，加强边界的警卫工作，提高边界地区居民的警惕性，因为铁托分子在保加利亚的边界地区加强了挑拨性活动。①

结束时，波普托莫夫同志说，简而言之，这些就是我们党所做的以及它今后在加强反对铁托匪帮——反对这些卑鄙的挑拨分子、英、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和整个进步反帝阵营最凶恶的敌人的斗争事业中应该做到的。

尤金同志建议，成立制定关于乔治乌－德治同志报告的决议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以下同志组成：乔治乌－德治同志、苏斯洛夫同志、陶里亚蒂同志、拉科西同志、贝尔曼同志、杜克洛同志、契尔文科夫同志、斯兰斯基同志、格罗同志、契卡里尼同志、尤金同志、柯普尔纪瓦同志和波普托莫夫同志。

该建议被采纳了。

---

① 在波普托莫夫发言中的如下段落在整理会议记录时被删掉了，其内容如下："概括地说，这些措施是为了达到以下目的：

在边界上我们的边防军要加强警备力度；

扩大边界防卫地区的深度；

在边界线纵深15～20公里的地区，采取措施彻底清除铁托分子和一切可疑分子；特别关注对边界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领导机构的清洗工作；

消除南斯拉夫驻索非亚大使馆成为铁托分子在保加利亚的宣传中心的可能性。对于散发铁托宣传材料的人将按照保卫人民政权的法律处置；

建立在南斯拉夫国内散发宣传材料的专门机构，以及给予同铁托集团进行斗争的战士以政治和组织帮助的专门机构，该机构应该在党中央的直接监督下工作。

责成党中央的三名委员负责组织和实施与铁托集团进行斗争的一切必要措施。"

№11775

情报局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决议的讨论记录

（1949 年 11 月 19 日）

会议于 10 点 35 分开始，于 11 点 50 分结束

苏斯洛夫同志建议委托陶里亚蒂同志主持会议。

建议被采纳。

陶里亚蒂同志建议讨论并通过按会议日程的第二个问题所做的决议。他提议开始先进行总的批评意见，如果有这方面意见的话，然后再以提交的草案作为基础对决议进行逐页的讨论。

陶里亚蒂同志的建议被采纳了。

对草案没有批评性意见。开始对决议进行逐页的讨论。

谷尼欧同志建议第 6 页的句子：“……确保工会运动的统一……”，用以下句子代替：“……极力设法保证工会运动的统一……”。

格罗同志建议这一条用如下句子表述“……尽一切努力，以保证工会运动的统一……”。

陶里亚蒂同志建议：“……极力设法做到一切，以保证工会运动的统一……”。

陶里亚蒂同志的建议被一致地接受了。

陶里亚蒂同志将决议交付表决。

一致通过了经过修改后的决议。

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

（一）

由于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准备新的战争，由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向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与经济利益实行进攻，所以工人阶级必须加紧斗争来保持并巩固和平，对战争挑拨者以及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攻击组织坚决的反击。

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是保证这一斗争获得胜利的前提条件。

战后时期的经验证明，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是帝国主义分子用以实行发动新战争、镇压民主与社会主义力量、急剧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各种策略手段中的一种主要手段。

工人阶级在各别国家和全世界范围内的统一，在国际工人运动全部历史中从来还没有像目前这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现时必须把工人阶级的队伍统一起来，以便保持和平，打破帝国主义分子反对民主与反对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制止建立法西斯方式统治的企图，坚决回击垄断资本对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进攻从而达到劳动群众经济状况的改善。

为要实现这些任务，首先就必须把广大工人群众不分党派、不分工会组织和宗教信仰而一致团结起来。从下面团结起来，——这就是为保卫和平与本国独立，为保卫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与民主权利而团结一切工人的最有效的途径。不管分裂分子和反对统一的分子所领导的那些工会或党派的中央领导机关怎样阻挠，工人阶级的统一最终是完全可能达到的。

战后时期在消灭工人阶级分裂状态和团结一般民主力量方面已

经有了巨大的成就，其具体表现就是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国际民主青年联盟的成立以及世界和平大会的召开。统一运动的成绩表现于法国总工会的巩固，意大利工会联合会（意大利总工会）的建立，以及法意两国无产阶级战斗性的行动。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内，工人阶级统一事业方面，达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成立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统一的工会、统一的合作社、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以及其他各种团体。工人阶级的这种统一，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在确保国家政权机关中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以及根本改善劳动人民群众物质状况方面所取得的种种成绩，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工人群众非常愿意团结自己的队伍，目前已经有实际的可能来建立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从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到右翼社会党人的反动联合势力。

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欧洲诸国的仆役，力求分裂和瓦解无产阶级力量和全体人民的力量，他们在这一点上特别指望着右翼社会党人和反动的工会活动家。右翼社会党的领袖和工会中的反动分子，听从美、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指示，从上面实行分裂工人运动的队伍，以图破坏在战后时期中所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统一组织。他们曾企图从内部去破坏世界工联，他们在法国组织了叫做“工人势力团”的分裂主义团体，在意大利组织了称为“劳动同盟”的分裂主义团体，现时他们又在准备建立分裂主义的国际职工总部。天主教组织的领导者在个别国家也有过这种分裂主义的企图。

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对右翼社会党领袖那种背叛行为所作的估计，即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统一事业的死敌和帝国主义的帮凶，这一估计，已经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右翼社会党人现时不仅充当本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且充当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把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亲美的政党，变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直接工具。

在有右翼社会党人参加政府的那些国家里（在英国、法国、奥地利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他们拼命地拥护马歇尔计划、西欧联盟、北大西洋公约以及美国其他一切扩张手段。这些假社会主义者在破坏那些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工人组织与民主组织方面起着极卑鄙可恶的作用。

右翼社会党人日益叛卖工人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已经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现在他们极力拥护和宣传美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思想。他们的“民主社会主义”和“第三种势力”的理论，他们那些认为必须放弃国家主权的世界主义胡说，都不过是在思想上去掩盖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所谓“社会党国际会议委员会”，原是已经活活腐烂了的第二国际的可怜产物，这个委员会已经变成了工人运动中最凶狠的分裂分子与破坏分子集合的场所。这个组织已经成为替美、英谍报机关服务的间谍中心。

只有坚决反对那些分裂和瓦解工人运动的右翼社会党人，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

（二）

情报局认为，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不倦地进行为联合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全部力量而进行斗争，强有力地回击美、英帝国主义的厚颜无耻的野心，粉碎他们发动新世界大战的阴谋，维持并巩固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挫败垄断资本降低劳动群众生活水平的企图。

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各国共产党的直接职责是要向大众解释，若是工人阶级不能保证本身队伍的统一，那么它在反对日益增长的新世界大战的威胁、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斗争中，就会缺乏最重要的武器。

共产党人一方面应该在理论上进行不调和的和一贯的斗争，去

反对右翼社会党人和反动的工会活动家，无情地揭露他们并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还应该耐心地、坚韧不拔地向社会民主党下层工人说明工人阶级统一事业的全部重要性，应该吸引他们来积极参加为和平、面包和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应该进行组织共同行动以求达到这种目的的政策。

工人阶级队伍的一致行动，乃是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已经经受过考验的一种方法。在各个企业范围内、在各个生产部门范围内、在各个城市和省区范围内、在全国和国际范围内一致协同动作，就能动员极其广大的群众去为最切身的并且是群众最易理解的需要而斗争，同时又能帮助建立无产阶级队伍经常的统一。工人阶级下层行动统一的实现方式，可能是在各企业和各机关里建立和平委员会，组织反对战争挑拨者的群众示威，以及工人为保卫民主权利和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而采取共同的行动。

在为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到信仰天主教的工人群众以及他们的组织；应该记住宗教信仰上的区别，特别是在目前需要统一工人阶级来拯救和平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统一劳动群众的障碍。在经济要求方面具体的共同行动，阶级工会与天主教工会彼此配合开展斗争等等，都是吸引天主教工人加入保卫和平的共同阵线的有效手段。

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极力设法做到一切，以保证工会运动的统一。吸引没有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加入工会并积极参加斗争，这在目前具有巨大的意义。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工人占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若是共产党能在这些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中认真加强自己的工作，那么，他们便能在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事业上获得重大的成果。

情报局认为，必须以工人阶级的统一为基础，来建立全国所有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以便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对美、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作斗争。在妇女团体、农民团体、合作社团体

以及其他劳动群众团体中进行的日常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统一工人运动和团结全部民主力量，不仅为的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日常的和目前的任务，而且为的是要解决摆在无产阶级这一领导人民群众去为铲除垄断资本权力和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而斗争的阶级面前的根本问题。根据在统一工人运动队伍和团结全部民主力量方面已经获得的成果，就有可能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扩展斗争以求建立一种政府，这种政府将把国内所有一切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奴役政策的爱国分子团结起来，将采取巩固国际和平的立场，停止军备竞赛，并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内，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是要更加巩固工人阶级已经达到的统一和已经成立的统一的工会组织、合作社组织、妇女团体、青年团体以及其他各种团体。

情报局认为，要保证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团结民主力量的斗争取得更进一步的成绩，首先就需要每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改善自己的全部组织工作与思想工作。

在思想上揭露并坚决无情地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防范敌人奸细混进党内来，这对于共产党和工人党确实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由于有揭穿铁托－兰科维奇间谍匪帮时所得到的那些教训，共产党与工人党绝对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铁托匪帮的奸细，目前正奉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志，在工人运动与民主运动中间进行凶狠的分裂勾当。所以凡是这些帝国主义奸细企图在工人组织与民主组织中活动的地方，都必须对其阴谋予以坚决的击破。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在组织上和思想上政治上巩固共产党和工人党，乃是工人阶级为统一自己队伍、为和平事业、为本国民族的独立、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顺利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

№11776

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握中”决议的讨论记录

（1949 年 11 月 19 日）

陶里亚蒂同志提议讨论和通过会议日程第三个问题的决议。

格·乔治乌－德治就提交决议的情况发言。

乔治乌－德治同志说，委员会一致同意将拟定的会议日程第三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进行审批。

陶里亚蒂同志提议对决议案不再进行讨论和审批这一程序，就如同日程的第二个问题那样。

对提交的决议草案不再进行变动和修改。

陶里亚蒂同志提议对决议案进行表决。

决议被一致通过。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握中

（共产党情报局决议）

由保加利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组成的情报局，讨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这一问题之后，一致达成如下的结论：

在 1948 年 6 月期间，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已经指出铁托－兰科

维奇集团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方面转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面去的事实，而在情报局那次会议之后所经过的这一时期内，该集团则已经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完全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出卖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去了。

最近的事变表明，南斯拉夫政府处在完全依赖外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地位，并变成了后者侵略政策的工具，结果已经使南斯拉夫共和国丧失了独立和自由。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和帝国主义分子完全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整个社会主义与民主阵营，反对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反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

贝尔格莱德那个受人雇佣的间谍和杀人犯集团，公开与帝国主义反动派相勾结，并已经在为反动派效劳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对拉伊克－布兰科夫的审判已经最鲜明地揭露了这一点。

这次审判表明，南斯拉夫现今的统治者已经由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逃到了资本主义和反动派阵营里，已经变成了新战争挑拨者的直接帮凶，并力求以叛变行为来向帝国主义分子讨好，在他们面前尽忠效劳。

铁托集团并不是偶然转到法西斯主义方面去的，这种转变是遵照他们那些主人，即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令而实现的。现在业已查明，铁托集团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奴仆了。

南斯拉夫的叛徒们遵照帝国主义分子的旨意，力图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里造成一些由反动的、民族主义的、教权派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分子组成的政治匪帮，以便依靠他们来在这些国家里实现反革命的政变，使这些国家脱离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而去服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配。铁托集团把贝尔格莱德变成了国际间谍活动的中心和反共宣传的中心。

一切真正和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朋友，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是各国人民自由独立的坚固可靠的保卫者，以及和平的主要支柱，然而假冒苏联之友而攫取政权的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却按照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指令进行着诬蔑和挑拨的反苏宣传，为此竟然不惜采用希特勒匪徒武器库中极卑鄙的诽谤手段。

铁托－兰科维奇集团最终变成帝国主义直接代理人和战争挑拨者帮凶的表现，就是南斯拉夫政府公开加入联合国组织中的帝国主义联盟。在联合国组织中，卡德尔、吉拉斯和贝勃勒之流在国际政策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上都与美国反动派采取一致行动。

在对内政策方面，铁托－兰科维奇叛徒集团活动的基本特征，就是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制度事实上的消亡。

由于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权力，铁托－兰科维奇集团实行反革命政策的结果是在南斯拉夫已经确立了反共产主义的、法西斯式的警察国家制度。这种制度的社会基础就是乡村中的富农和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分子。南斯拉夫的政权实际上是操纵在反人民的反动分子手中。在各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内活动的有旧资产阶级政党的积极分子、富农及其他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分子。当权的法西斯上层分子倚仗着无限庞大的军事警察机关，他们利用这种机关来压迫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把全国变成了军营，取消了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压制任何意见的自由发表。

南斯拉夫的统治者厚颜无耻地欺骗人民，硬说他们是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实际上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明白，在南斯拉夫根本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因为铁托集团既然和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分裂，因而也就使南斯拉夫失去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支柱，因为铁托集团已经使南斯拉夫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在听从着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支配。

南斯拉夫经济中的国营部门已经不是人民的财产，因为国家政

权握在人民的公敌手中。铁托－兰科维奇集团为外资侵入南斯拉夫经济大开方便之门，使南斯拉夫经济落到了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控制之下。美、英工业和金融集团投资到南斯拉夫经济中去，这样来把南斯拉夫变成专为外国资本供给农业原料的附庸。南斯拉夫处在日益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依赖地位，结果使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日益加强，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急剧地恶化下去。

南斯拉夫统治者在乡村中的政策带有富农资本主义的性质。在乡村中用强力培植起来的假合作社都落到了富农及其代理人的手中，而成为剥削广大劳动农民群众的工具。

在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奴仆夺取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地位之后，就广泛采用恐怖手段来对待那些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反对帝国主义而争取南斯拉夫独立的真正共产党员。成千上万忠于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爱国志士被开除党籍，被囚禁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其中有许多人在监狱里惨遭杀害或者被暗害，例如有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约万诺维奇就是其中的一个。南斯拉夫用以摧残坚定共产主义战士的残酷手段，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或者是希腊的察尔达里斯和西班牙的佛朗哥刽子手们所采用的那种暴行，才可与之伦比。

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一面把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加以种种摧残，同时又给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大开入党之门。

由于南斯拉夫党内健全分子被铁托匪帮摧残的结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已经完全落到一群间谍、杀人犯即帝国主义仆役的掌握之中了。这些擅自用党的名义出来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公然把持了南斯拉夫共产党。大家知道，资产阶级老早就采用着一种惯用的伎俩，在工人阶级政党内部为自己招收间谍和奸细。现在，帝国主义分子正是用这种伎俩力图从内部瓦解工人阶级政党，使其

听从他们的支配。在南斯拉夫方面，帝国主义分子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

铁托集团的法西斯思想，他们那种完全受外国帝国主义分子支配的法西斯对内政策和卖国的对外政策，使得铁托－兰科维奇法西斯间谍集团和爱好自由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处于水火不能相容的地位。因此，铁托集团所干的祸国殃民的勾当，受到南斯拉夫所有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日益增长的抵抗。

根据上述证明铁托集团已经完全转到法西斯主义方面和完全逃到了国际帝国主义阵营中去的无可争辩的具体事实，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

一、铁托、兰科维奇、卡德尔、吉拉斯、皮雅德、戈什尼亚克、马斯拉里奇、贝勃勒、姆拉佐维奇、伏克曼诺维奇、波波维奇、基德里奇、涅什科维奇、兹拉蒂奇、韦莱比特、科里雪夫斯基及其他等人的间谍集团，乃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公敌，乃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公敌。

二、这个间谍集团所代表的不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意志，而是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意志，因此，它出卖了本国的利益并消灭了南斯拉夫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地位。

三、目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落入人民公敌的杀人犯和间谍手中，所以它已经无权被称为共产党了，它现在不过是执行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集团间谍任务的机关而已。

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认为反对这个受人雇佣的铁托间谍杀人犯集团的斗争，乃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职责。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责任，就是要竭力援助为使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中来的事业而奋斗的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劳

动农民。

南斯拉夫回到社会主义阵营中来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南斯拉夫共产党党内以及党外革命分子进行积极的斗争，以求把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南斯拉夫独立的真正革命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复兴起来。

在极其残酷的法西斯恐怖条件下，南斯拉夫忠于共产主义的分子既然没有可能公开反对铁托－兰科维奇集团，于是只好采取那些在没有合法活动可能的国家内共产党人所采取的手段，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情报局坚决相信：南斯拉夫工人和农民中间一定会有力量能战胜资产阶级复辟派的铁托－兰科维奇间谍集团，坚决相信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一定能恢复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用重大牺牲和英勇斗争的代价所获得的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民主成果，并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情报局认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提高自己队伍的革命警惕性，要揭露和根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及帝国主义的一切代理人，不管这些人用什么招牌进行掩饰。

情报局认为：必须加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党内的思想工作，即加强用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对任何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行为都毫不妥协的精神，用忠于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共产党员的工作。

№11777

匈牙利会议关于情报局章程草案的报告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记录

（1949 年 11 月 19 日）

陶里亚蒂同志让杜克洛同志就会议日程的第四个问题进行发言。

杜克洛同志的报告

关于情报局章程的草案

同志们！

在 1948 年 6 月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确定了由苏斯洛夫同志、贝尔曼同志、杰奥尔杰斯库同志和杜克洛同志组成的情报局章程草案制定委员会。

委员会制定了草案并提交给你们审批。在今年 6 月份召开的秘书处会议上，对这个草案进行了研究，并对其做了一些改动。

这样一来，就能够说，目前的草案已经得到参加情报局秘书处工作的各党代表的赞同。

在指出这种情形之后，我将对草案做一些简短的说明。正如我们可以确信的那样，章程草案简短的前言重新提到了 1947 年情报局建立的情况，重复了 1947 年 9 月根据日丹诺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报告所作的决议的内容。

这个决议强调说，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缺乏联系，这是

极端不正常和不正确的现象。从这一情况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决议强调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流经验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协调其行动的必要性。

接着，决议强调说，在战后复杂的局势下，各党之间的行动缺乏一致性，将会给工人阶级的事业带来损失。

自通过了这个决议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产生这个决议的那些政治理由，还完全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甚至可以说，随着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分子所实行的战争政策斗争的增长，这些政治理由变得更加强烈了。

争取和平的斗争获得了国际意义。巴黎和布拉格和平代表大会就是这个事实的明显表现。这种情形使各国共产党之间定期联络、交换信息和协调行动具有了更大的必要性。

章程草案的目的是确定参加了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正如章程草案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情报局号召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流经验，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为联合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为有效地进行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的和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协调自己的行动。

这种协调行动的必要性是源于我们应该进行的反帝国主义的这种斗争本身的性质。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我们成为布鲁塞尔军事联盟成立的见证人，这个军事联盟将自己的总参谋部设在了法国。

接着又成立了欧洲联盟，并拟定将西德政府列入其中，众所周知，西德政府是美帝国主义准备实施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世界工人阶级和民主运动的政策的工具。

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的范围之中，实行这一公约

表现在疯狂的军备竞赛上，以及大幅度地增加军费开支上，这样的结果是降低了购买力，使劳动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正如苏斯洛夫同志在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因此，当战争贩子利用其帝国主义分子走狗的角色越来越公开的铁托及其仆从们，作为挑拨者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自己的卑鄙活动时，共产党和工人党就有机会协调自己的行动，这是十分自然和必须的。

这完全符合各国劳动群众和人民的愿望，他们已经意识到，是这种团结一致的精神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并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争取社会主义——这一草案中指明的目标而斗争。

完全清楚，不谈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苏联，也就不可能谈到社会主义。

因此，如果在章程草案第3条的第1点指明，党认为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保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是自己的职责，我们全体一致认为，这意味着，对苏联的态度是评价各国共产党和个人的思想基础。

经验表明，过低评价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中，在粉碎法西斯主义的军事行动中，在反帝阵营保卫和平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最终导致了与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利益相对立的立场。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是与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伟大的战斗团结，而且还包括，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坚不可摧的信仰，对苏联以及它的天才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毫不动摇的热爱。

在这方面我认为必须明确章程草案的这一条，在此我想起了斯大林同志关于对苏联态度问题的一段话：

“一个革命者，他应该是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不需要任何秘密的军事协商，就准备着保护和守卫苏联，因为苏联是世界

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应该是无条件地、毫不动摇地准备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而如果不保卫苏联的话，捍卫和推运这种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谁认为不经过苏联或者是反对苏联来捍卫世界革命运动的话，他就是在进行着反革命，他必然滑落到革命敌人的阵营去。”①

铁托及其集团的叛变行为更加证明了这一原则。这些坏蛋断言，仿佛除了苏联之外只有他们才是共产党人，并且他们是反对苏联的。但是，事实表明，他们不过是一伙特务，是为帝国主义分子效劳的奴仆和奸细。

我还想提醒一下，在谈到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资本家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者和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时，斯大林同志说：

“尽管是在新的基础之上，历史还是重复着。正如从前，在封建主义进攻时期，‘雅各宾派分子’一词引起了一切国家的贵族分子的恐惧和极端厌恶一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在资本主义进攻时期，布尔什维克一词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引起了恐怖和极端厌恶。与此正相反的是，正像从前一样，巴黎是资产阶级革命代表的避难所和大学校，而现在莫斯科也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代表的避难所和大学校。对雅各宾派的仇恨没能挽救封建制度的垮台。难道还能怀疑，对布尔什维克分子的仇恨能够挽救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灭亡吗？”

国际工人运动变得更加强大，以及人民民主制国家的诞生，给了帝国主义分子以沉重的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目前更加重

① 斯大林1927年8月1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了这个打击。在和平阵营和战争阵营之间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站在反帝力量的前列的苏联。

因此，应该在情报局章程中指明，对于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来说，必须保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忠诚，必须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不懈的斗争。

但是，只有与领导着反帝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才能在任何条件下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下面我将分析一下章程草案的条例。

章程草案的第一条谈到，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有权：

“1. 参加情报局大会，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在情报局秘书处和机关刊物编辑部有自己的代表；

2. 有权相互获得有关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情报”。

由于章程草案规定了各国共产党相互提供信息，也必须规定有权提出批评。正如大家所记得的那样，这种权利在 1947 年就被使用过。我们能够说，对法国共产党进行的批评，给它提供了改正错误的机会，并通过提高自己干部以及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的途径，来完善自己的工作。

与此相反，应该指出，在去年，由于拒绝听取其他共产党提出的批评，铁托以此表明，他已经走上了叛变的道路。自然，为了保持对列宁主义精神的忠诚，只是听取批评是不够的，每个共产党应该将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自我批评看做是自己的义务。关于这一点章程的第二条将谈到。

“二、参加情报局的每一个共产党，承认其他各国共产党有权对其活动提出批评，并将实现自我批评以利于自己队伍思想水平的提高和组织的巩固看做是自己的义务”。

章程的第三条确定了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第 1 点，确定各国共产党应该忠诚的原则，以及他们斗争的目

的——工人阶级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一点还强调，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应该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保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忠诚。

对这一点我将不作详细的分析，因为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这些内容。

第2点，给共产党归纳了如下义务：

“2. 遵守情报局的章程，贯彻执行一致通过的情报局决议；”

在这方面表现了各国共产党是完全平等的，在共同采纳的决议被批准之后，他们自然应该将其贯彻到实践中。

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还有：

“3. 定期向情报局通报自己党的日常工作情况；

4. 积极参加和协助传播和推广情报局的机关刊物；

5. 按规定的数额交纳会费”。

此处指的是具有最伟大意义的政治义务。为了使其他党能够对本党的活动进行评价，如果需要，能够对其提出批评，必须定期向情报局通报自己党的日常工作情况。

准确地说，在情报局出版机关里积极合作也是一项义务，对它不需要进行详细的说明。毫无疑问，在情报局机构里任何一种逃避合作的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会费确定的数额十分合理，使每个共产党都能够定期交纳会费。

章程的第四条谈的是情报局的组成：每个共产党应有两名代表参加，其代表人员由相应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派和更换。

章程的第五条谈的是情报局会议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参加情报局的每一个共产党，可以建议召开情报局非常会议，并提交该次会议的议事日程。

章程的第六条指出，由情报局任命情报局机关刊物的主编和编

辑部的成员，并批准情报局的财政预算。

章程的第七条指出，情报局拥有自己的常设机关——秘书处，由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代表组成，每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出一名代表参加情报局秘书处。

章程的第八条规定了秘书处的职能：

“八、情报局秘书处应保证：

1. 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定期联系；

2. 实行必要的措施，在通过情报局决议和各党之间协商问题时，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行动；

3. 对机关刊物编辑部的工作以及情报局的一切出版活动实行监督；

4. 准备关于情报局会议的日程问题的材料”。

章程的第九条确定了秘书处的工作程序：

“九、根据需要召开情报局秘书处会议，但是至少每 3～4 个月要召开一次会议”。

章程的第十条谈的是情报局的资金问题：

“十、情报局的资金由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交纳的会费，以及出版活动的收益组成”。

同志们，以上这些就是情报局章程草案的规定，在今年 6 月份召开的秘书处会议上对这个草案进行了讨论，现在将这个草案提交给你们审批。

通过这个草案将加强我们各党之间的联系，更准确地确定我们的任务，以及各地区反帝阵营的战士的任务。

确定召开秘书处定期会议和情报局大会的周期，承认参加情报局的每个共产党有权建议召开非常会议，章程草案还为每个共产党规定了自己的任务，同时提请各国共产党关注自己的国际义务。

通过本章程并将其贯彻到实际中，无疑将有助于提高我们斗争

的能力，并以此加强反帝阵营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的力量。

陶里亚蒂同志建议各位代表，就杜克洛同志的报告进行表态。

出席会议的各国共产党代表，都声明自己赞同杜克洛同志的报告和情报局章程草案。

陶里亚蒂同志将情报局章程提交表决。

一致通过情报局章程。

共产党情报局章程

成立于1947年9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号召各国共产党之间交流经验，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为继续团结一切反帝国主义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为有效地进行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的和平、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协调自己的行动。

一、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有权：

1. 参加情报局大会，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在情报局秘书处和机关刊物编辑部有自己的代表；

2. 有权相互获得有关各国共产党状况的情报。

二、参加情报局的每一个共产党，承认其他共产党有权对其活动提出批评，并将实现自我批评以利于自己队伍思想水平的提高和组织的巩固看做是自己的义务。

三、参加情报局的共产党，认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如下：

1. 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忠诚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坚持不懈地为工人阶级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

2. 遵守情报局的章程，贯彻执行一致通过的情报局决议；

3. 定期向情报局通报自己党的日常工作情况；

4. 积极参加和协助传播和推广情报局的机关刊物；

5. 按规定的数额交纳会费。

四、情报局由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组成，每个共产党派出两名代表参加。共产党代表的指派和替换由相应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

五、情报局大会每年至少要召开一次。

参加情报局的每一个共产党，可以建议召开情报局非常会议，并可提议大会的日程安排。

六、由情报局大会批准情报局机关刊物的主编和编辑部的组成人员，并批准情报局的财政预算。

七、情报局的常设工作机构是秘书处，由参加情报局的全体共产党代表组成，每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派出一名代表参加秘书处。

八、情报局秘书处应保证：

1、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定期联系；

2、实行必要的措施，在通过情报局决议和各党之间协商问题时，协调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行动；

3、对机关刊物编辑部的工作以及情报局的一切出版活动实行监督；

4、准备关于情报局会议的日程问题的材料。

九、根据需要召开情报局秘书处会议，但是至少每 3～4 个月要召开一次会议。

十、情报局的资金由参加情报局的各国共产党交纳的会费，以及出版活动的收益组成。

接着，会议讨论了几个具体问题。

听取了：

一、关于审批情报局会议公报。

尤金同志的通报。

决议：

批准情报局的公报。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公报

1949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在匈牙利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保加利亚共产党——维·契尔文科夫同志和B. 波普托莫夫同志；罗马尼亚工人党——格·乔治乌－德治同志、约·基辛涅夫斯基同志和A. 莫吉奥罗希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马·拉科西同志、埃·格罗同志、约·雷瓦伊同志和亚·卡达尔同志；波兰统一工人党——雅·贝尔曼同志、亚·萨瓦茨基同志；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米·苏斯洛夫同志和帕·尤金同志；法国共产党——雅·杜克洛同志、艾·法戎同志和乔·谷尼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鲁·斯兰斯基同志、什·巴什特万斯基同志、拉·柯普尔纪瓦同志和Б. 格明德尔同志；意大利共产党——帕·陶里亚蒂同志、爱·多诺弗里奥同志和安·契卡里尼同志。

会议听取了米·苏斯洛夫同志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报告，帕·陶里亚蒂同志关于“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的报告，以及格·乔治乌－德治同志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报告。

代表们对以上诸报告交换意见之后，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并一致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听取了：

二、关于发表情报局会议的公报、决议和会议上的各个报告的期限和程序。

波诺马廖夫同志的专题报告。

决议：

1. 在 194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二，在参加了情报局各共产党的所有机关报上，以及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情报局会议公报以及情报局就苏斯洛夫同志、陶里亚蒂同志和乔治乌－德治同志的报告所做出的决议。

2. 情报局的章程不予发表。

3. 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情报局决议之后，将依次发表苏斯洛夫同志、陶里亚蒂同志和乔治乌－德治同志在情报局会议上所做的报告。

听取了：

三、关于审批情报局会议所有的会议记录。

巴拉诺夫同志的专题报告。

巴拉诺夫同志通报说，根据情报局会议决议，除情报局章程、决议和公报用俄文和法文两种文字书就以外，会议记录均采用俄文书就。

会议记录包括 1949 年 11 月 16 日至 19 日期间召开的情报局七场会议的全部即席记录；苏斯洛夫同志、陶里亚蒂同志、乔治乌－德治同志和杜克洛同志的报告；在会议上就会议日程的四个问题所做出的决议，以及情报局的章程。

各代表的书面发言稿由发言人在会议上亲自宣读。在将这些文本列入会议记录时，秘书处将考虑代表们所做的修改内容。

秘书处请各位代表签署情报局的会议记录，具体如下：

1. 就如下问题所做出的决议的俄文和法文两种文本：

保卫和平和与战争贩子的斗争；

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各国共产党的任务；

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握之中。

2. 情报局的章程俄文和法文两种文本；

3. 情报局会议的公报俄文和法文两种文本。

决议：

批准情报局会议的会议记录。

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

法国共产党代表团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团

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

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

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

№11778

情报局匈牙利会议闭幕式

（1949 年 11 月 19 日）

陶里亚蒂同志，陶里亚蒂在宣布会议结束时，作了结论性的讲话，其中说：

同志们！在此已经谈了关于我们情报局上一次会议以及会上所作的决议的意义。众所周知，我们的敌人围绕着这些决议掀起了多大的喧嚣。

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曾经庄重地宣布，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意味着，也不可能意味着，在各个独立的共产党之间以及我们运动的队伍之间不再存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

当时，我们提请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注意在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作为主要任务提出：组织以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同志为首的并在其领导下的统一阵线。

在第二次情报局会议上，我们将民族主义的铁托－兰科维奇叛徒匪帮开除出我们的队伍。这有助于我们大家提高在工作方面的思想和政治水平，更加巩固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更加清楚地了解在我们工作的关键领域里我们的任务。

在本次，即第三次情报局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的问题，面临着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领导人准备新战争的危险。

我们向共产党员和全体人民指明了争取和平、争取巩固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工人阵线的斗争道路，毫不留情地同铁托间谍匪帮进

行斗争的道路，统一和巩固我们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我们还通过了我们的章程，这个章程有助于我们更加牢固地进行我们的合作。

在此所进行的辩论，证明了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一致，证明了在我们队伍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占主导地位，再一次证明，我们全体一致认同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作用，不仅仅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而且在为争取和平所进行的一切斗争中。

同志们！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情报局会议期间，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不幸，我们失去了日丹诺夫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位同志在我们的运动中起到了如何巨大的作用。让对他们的怀念鼓舞和激励我们，在实现我们的目的的事业中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我们还应该向匈牙利的同志们，特别是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领导人拉科西同志，表示我们的谢意，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

我们再一次向联共（布）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尤其是向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再一次表示我们全体的热情谢意，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尤其是在目前的艰难时期，当我们正在临近我们的运动的最后胜利的时候，是斯大林同志一直给予并正在给予着我们巨大的帮助。

我祝愿同志们在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

再见，同志们！

附录

作为记录员和翻译人员出席会议的同志的名单：

1. С.П. 加夫里洛夫

2. B.B. 莫舍托夫[①]

3. H.H. 普赫洛夫[②]

4. A.И. 安季波夫[③]

5. C.Г. 扎沃尔斯基[④]

6. B.И. 列萨科夫[⑤]

7. П.B. 叶菲莫夫

8. Д.П. 舍夫利亚金

9. Л.C. 法克托尔[⑥]

关于将情报局会议（1949 年 11 月）的文件交给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即保加利亚共产党、罗马尼亚工人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证明》：

1. 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公报。

2.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保卫和平，与战争贩子进行斗争"。

3.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决议："工人阶级的统一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任务"。

4. 关于第三个问题的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处于杀人犯和间谍的手中"。

---

① 莫舍托夫·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机构的工作人员。

② 普赫洛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办公室通讯部主任。

③ 安季波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办公室技术部主任。

④ 扎沃尔斯基·谢尔盖·格尔马诺维奇，共产党情报局秘书处办公室工作人员。

⑤ 列萨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重要工作人员，被委派协助《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而斗争!》报编辑部的工作，这份报纸是以侨居在苏联的反铁托的南斯拉夫侨民的名义在莫斯科出版的。

⑥ 法克托尔·利季娅·萨穆伊洛夫娜，《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编辑部工作人员。

以上所列的文件于1949年11月19日分别交给：

1. 波普托莫夫同志————保加利亚共产党。
2. 基辛涅夫斯基同志———罗马尼亚工人党。
3. 比罗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
4. 贝尔曼同志————————波兰统一工人党。
5. 杜克洛同志————————法国共产党。
6. 陶里亚蒂同志————————意大利共产党。
7. 斯兰斯基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8. 加夫里洛夫同志————联共（布）。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 版 人：谢曙光

编 审 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 行 人：胡鹏光　王　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　　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喀琅施塔得事件（1921年2月至1923年4月）
专题说明
№04783　波德沃伊斯基等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1921年2月13日）
№04787　共和国保卫芬兰边界部第二分部情报处处长的工作报告（摘要）（1921年2月14日）
№04784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就彼得格勒局势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报告（摘要）（不早于1921年2月16日）
№04785　梅辛和萨姆索诺夫致捷尔任斯基的电报（1921年2月24日）
№04788　俄共（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委会会议记录（摘要）（1921年2月24日）
№04789　彼得格勒防区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第一号命令（1921年2月25日）
№04791　波罗的海舰队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报告（摘要）（1921年2月26日）
№04792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次会议记录（1921年2月28日）
№04793　全俄肃反委员会关于加强同反革命斗争的命令（1921年2月28日）
№04797　季诺维也夫致列宁的密码电报（1921年2月28日）
№04798　托洛茨基致波罗的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博季斯的电报（1921年3月1日）
№04802　驻喀琅施塔得第1、第2战列舰队全体会议的决议（1921年3月1日）

№04803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二专门处处长的报告（不晚于1921年3月2日）

№04905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告要塞和喀琅施塔得市居民书（1921年3月2日）

№04809　苏俄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号召书（1921年3月2日）

№04811　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关于对彼得格勒防区实施戒严的命令（1921年3月2日）

№04814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1921年3月3日）

№04883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出的第二号战斗命令草案（不晚于1921年3月4日）

№04880　喀琅施塔得俄共组织临时局的呼吁书（1921年3月4日）

№04882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给“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的命令（1921年3月4日）

№04850　苏俄国防委员会关于从彼得格勒抓获人质的通告（1921年3月4日）

№04822　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发布的616号命令（1921年3月5日）

№04823　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致驻喀琅施塔得军民的公告（1921年3月5日）

№04820　苏俄情报机关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报告（不早于1921年3月5日）

№04988　俄共（布）中央主席团关于十大召开时间的讨论记录（1921年3月7日）

№04842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特派员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报告（1921年3月7日）

№04827　托洛茨基致俄联邦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电报（1921年3月7日）

№04828　彼得格勒局势报告（1921年3月7日）

№0500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公告（

1921年3月7日）

№0500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传单（1921年3月8日）

№04831　彼得格勒局势报告（1921年3月8日）

№04832　第七集团军作战部部长普柳托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1921年3月8日）

№04839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摘要（1921年3月8日）

№04835　普柳托致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电报（1921年3月9日）

№04914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1921年3月9日）

№04916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的作战情况报告（1921年3月10日）

№04889　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部第69号令（1921年3月10日）

№04891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1号令摘要（1921年3月11日）

№04892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2号令（1921年3月11日）

№04893　关于保卫喀琅施塔得海军要塞及其区域的第3号令（1921年3月12日）

№04924　南方军队集群政委伏罗希洛夫给芬兰湾南方军队集群政治部的命令（1921年3月13日）

№04932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斯大林的作战情况报告摘要（1921年3月14日）

№04935　北方军队集群司令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指令（1921年3月14日）

№04938　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呈列宁、斯大林的战事密码电报摘要（1921年3月15日）

№04941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向明斯基团归还武器和革命称号的命令（1921年3月15日）

№04903　喀琅施塔得港地方革命军事三人小组成员全体联席会议记录（1921年3月15日）

№04904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消息报》发表的文章（1921年3月15日）

№04957　加里宁和克列斯廷斯基发给各省委员会和各省执委会的电报（1921年3月16日）

№04962　南方军队集群司令的命令摘要（1921年3月17日）

№04963　图哈切夫斯基给南方、北方军队集群关于强攻喀琅施塔得的命令（1921年3月17日）

№04968　南方军队集群参谋部的报告（1921年3月18日）

№04972　喀琅施塔得卫戍司令命令（1921年3月18日）

№04973　图哈切夫斯基向北方军队集群、南方军队集群发出的命令（1921年3月19日）

№04911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致芬兰卡累利阿战区司令的报告（1921年3月19日）

№04979　托洛茨基致政治局的电报（1921年3月20日）

№04981　关于喀琅施塔得共产党员重新登记的报道（1921年3月20日）

№04897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工人、红军和水兵发出的呼吁（1921年3月）

№04851　喀琅施塔得要求释放人质（1921年3月）

№04898　喀琅施塔得临时革命委员会向铁路职工发出的呼吁（1921年3月）

№04956　共和国芬兰边界特别防卫部第一专门处对芬兰湾南方战区的居民发出的呼吁（1921年3月）

№04987　特派员阿格拉诺夫关于叛乱调查结果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1921年4月5日）

№05046　全俄肃反委员会负责人致芬兰边界特别防

卫部的电报（1921年4月18日）
№05047　捷尔任斯基致亚戈达的信（1921年4月19日）
№04867　彼得格勒省肃反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1921年4月20日）
№05048　波德盖伊斯基致全俄肃反委员会秘密作战部的电报（1921年4月23日）
№0504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1921年4月27日）
№05050　全俄肃反委员会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计划草案（1921年6月4日）
№05055　彼得格勒省委关于清除反革命分子的建议（1921年6月28日）
№05054　科兹洛夫斯基、佩特里琴科等人的口供摘要（1921年）
新经济政策与党内斗争（1921年2月至1927年12月）
专题说明
№04232　波德沃伊斯基、梅霍诺申就群众不满情绪致列宁的信（1921年2月24日）
№04233　契切林就与土耳其代表团会谈事宜致斯大林的信（1921年3月10日）
№04234　穆拉洛娃就某些党员的恶劣行为致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信（1921年3月21日）
№04235　拉柯夫斯基就乌克兰经济情况致列宁的电话电报（1921年3月31日）
№04236　布琼尼就骑兵状况致列宁的信（不早于1921年4月6日）
№04237　皮达可夫就顿巴斯煤矿租让问题致列宁的信（1921年4月8日）
№04238　别洛博罗多夫就斯塔夫罗波尔省情况致列宁的信（1921年4月10日）
№04239　别洛博罗多夫就边疆区形势严峻致列宁的

信（1921年4月23日）

№04240　奥新斯基就粮食税执行情况致俄共（布）中央的信（1921年5月11日）

№04241　契切林就拉脱维亚党的情况致列宁的信（1921年6月9日）

№04242　扎斯拉夫斯基就莫斯科地区党员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1921年7月22日）

№04243　契切林就发布收成情况信息致加米涅夫的信（1921年7月30日）

№04244　契切林就国际援助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1921年8月11日）

№04245　契切林就南森提出的援助条件致莫洛托夫的信（1921年8月27日）

№04246　斯大林就援助阿富汗起义者致托洛茨基的信（1921年11月2日）

№04247　克拉辛就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致列宁的信（1921年11月8日）

№04248　契切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列宁的信（1921年11月10日）

№04252　李维诺夫就租让对象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1921年11月13日）

№04249　契切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1年11月22日）

№04250　斯大林就东方政策问题致契切林的信（不早于1921年11月22日）

№04251　契切林就卡累利阿问题致托洛茨基的信（1921年11月26日）

№04253　奥尔忠尼启则就顿巴斯煤矿情况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1月10日）

№04254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转寄电气化计划意见致列宁的信（1922年1月10日）

№04255　鲁祖塔克就工会作用和任务致列宁的信（

1922年1月10日）

№04256　季诺维也夫就工会提纲草案致列宁的信（不晚于1922年2月4日）

№04257　契切林就西藏考察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2月6日）

№04258　拉科巴就外高加索联邦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2年3月12日）

№04259　加里宁就党员队伍的规模问题致列宁的信（1922年3月27日）

№04260　索尔茨就接收新党员问题致列宁的信（1922年3月27日）

№04261　斯米尔诺夫就限制工人入党问题致列宁的信（1922年3月）

№04262　彼得斯就布哈拉政权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2年4月3日）

№04263　斯大林就解决布哈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2年4月21日）

№04264　卡拉汉就阿富汗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2年4月25日）

№04265　奥尔忠尼启则就布哈拉局势致斯大林的电报（1922年5月12日）

№04266　斯大林就处理布哈拉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2年5月14日）

№04267　奥尔忠尼启则就土耳其斯坦问题致斯大林的电报（1922年5月18日）

№04268　纳扎列强就个人工作状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2年6月14日）

№04269　奥尔忠尼启则就格鲁吉亚情况致斯大林的信（1922年6月26日）

№04270　纳扎列强就斯大林的东方政策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2年7月12日）

№04271　纳扎列强就列宁身体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

的信（1922年7月19日）

№04272　越飞就对华政策总方针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7月22日）

№04273　纳扎列强就斯大林工作作风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不早于1922年8月9日）

№04274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驻外机构考察情况致列宁的信（1922年10月3日）

№04275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问题处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2年10月21日）

№04276　斯大林就出售白金及党内关系致列宁的信（1922年11月13日）

№04277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2年11月27日）

№04278　纳扎列强就格鲁吉亚一些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3年1月24日）

№04279　纳扎列强就对格鲁吉亚政策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3年1月28日）

№04281　伏罗希洛夫就同加里宁视察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3年5月22日）

№04282　捷尔任斯基就与李可夫的冲突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8月3日）

№04283　捷尔任斯基就处理投机商人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10月22日）

№04284　皮达可夫就党内问题和工人状况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1日）

№04285　马吉多夫就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党内的情况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10日）

№04286　克列斯廷斯基就米亚斯尼科夫出境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3年11月13日）

№04287　斯大林就中央已消除意见分歧致马吉多夫的信（1923年11月22日）

№04288　皮达可夫等九人就是否曾建议逮捕列宁致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12月20日）

№04289　安东诺夫-奥夫申科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4年1月10日）

№04290　捷尔任斯基就如何看待党内斗争问题致安东诺夫-奥夫申科的信（1924年1月12日）

№04291　皮达可夫就个人工作安排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4年5月15日）

№04292　契切林就个人工作安排致莫洛托夫的信（1924年5月17日）

№04293　捷尔任斯基就工作安排致赖因霍尔德的信（1924年6月12日）

№04294　加里宁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斯大林的信（1924年8月）

№04295　捷尔任斯基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方针致明仁斯基的信（1924年12月24日）

№04296　伏龙芝和斯大林关于如何称呼托洛茨基的来往便条（1924年12月10日）

№04298　奥尔忠尼启则就党内派别斗争致伏罗希洛夫的信（1925年3月12日）

№04299　皮达可夫就有意辞去劳动国际委员会职务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5年3月25日）

№04300　捷尔任斯基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权限致梅利斯的信（不晚于1925年5月1日）

№04301　皮达可夫就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争吵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5年7月14日）

№04302　捷尔任斯基就主席团会议上发生争吵致皮达可夫的信（1925年7月14日）

№04303　捷尔任斯基就工农联盟问题致皮达可夫的信（1925年10月2日）

№04304　捷尔任斯基就退出党派运动致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5年10月5～6日）

№04305　波波夫就统计局的数据问题致斯大林的信

（1925年12月22日）

№04306　基洛夫就党内的争论致马尔库斯-基洛娃的信（1925年12月）

№04307　基洛夫就地方党内紧张局势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1月10日）

№04308　联共（布）中央就对政治局决议进行表决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6年1月13日）

№04309　基洛夫就地方党内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1月16日）

№04310　捷尔任斯基就对米柳亭的态度问题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2月1日）

№04311　斯大林就基洛夫任职事致奥尔忠尼启则的电报（1926年2月1日）

№04314　古比雪夫就米柳亭调查工业发展计划问题致捷尔任斯基的信（1926年2月1日）

№04313　伏罗希洛夫就列宁格勒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2月6日）

№04315　基洛夫就与反对派斗争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2月13日）

№04312　捷尔任斯基就政治局会议冲突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2月15日）

№04316　基洛夫就派往巴库的人选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3月17日）

№04317　谢列布里亚科夫就党内派别斗争致斯大林的信（1926年3月27日）

№04318　捷尔任斯基就地方乱收费问题致斯大林的信（1926年3月28日）

№04319　捷尔任斯基与李可夫关于皮达可夫工作安排的通话的记录（1926年4月5日）

№04320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公布列宁信件问题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26年4月14日）

№04322　捷尔任斯基就皮达可夫工作情况致李可夫

和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6月1日）

№04323　奥尔忠尼启则就个人工作情况致基洛夫的信（1926年6月22日）

№04324　捷尔任斯基就驻巴黎外贸机构情况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6月23日）

№04325　古比雪夫和李可夫关于捷尔任斯基工作安排的谈话记录（不早于1926年7月3日）

№04326　托姆斯基就劳动报酬问题致中央书记处的信（1926年7月10日）

№04327　斯大林答复皮达可夫的信（1926年7月13日）

№04328　捷尔任斯基就公布对经济机关的调查结果致古比雪夫的信（1926年7月13日）

№04329　莫洛托夫就工作调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9月9日）

№04330　帕尔霍缅科就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12月3日）

№04331　拉科巴就阿布哈兹情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6年12月27日）

№04332　拉舍维奇就中东路干部工资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月4日）

№04333　叶努基泽就请求安排会见致加里宁的信（1927年5月17日）

№04334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拉狄克的宗派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5月）

№04335　瑟尔佐夫就党内对他个人的传言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6月22日）

№04336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党纪事件处理小组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8月11日）

№04337　斯大林就反对派的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9月23日）

№04338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党内反对派的活动致奥

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0月4日）
№04339　施基里亚托夫就反对派公开活动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0月10日）
№04342　费金就反对派召集开会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0月23日）
№04340　施基里亚托夫就工人对反对派的态度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0月29日）
№04341　雅罗斯拉夫斯基就反对派状况致奥尔忠尼启则的信（1927年10月29日）
№04343　奥新斯基就当前经济问题致李可夫、斯大林的信（1927年12月12日）
共产党情报局匈牙利会议（1949年11月）
专题说明
№11765　情报局匈牙利会议开幕式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6日）
№11766　苏斯洛夫在情报局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1月16日）
№11767　法、匈、捷、波代表团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6日）
№11768　保、意、罗代表团关于苏斯洛夫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7日）
№11769　陶里亚蒂在情报局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1月17日）
№11770　法、波代表团关于陶里亚蒂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7日）
№11771　乔治乌-德治在匈牙利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1月18日）
№11772　波、法、苏代表团关于乔治乌-德治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8日）
№11773　情报局会议关于“保卫和平与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决议的讨论记录（1949年11月18日）
№11774　匈、意、捷、保代表团关于乔治乌-德治

报告的发言记录（1949年11月18日）
№11775　情报局会议关于“ 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任务 ”决议的讨论记录（1949年11月19日）
№11776　情报局会议关于“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的掌握中 ”决议的讨论记录（1949年11月19日）
№11777　匈牙利会议关于情报局章程草案的报告及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记录（1949年11月19日）
№11778　情报局匈牙利会议闭幕式（1949年11月19日）
封底